

南京大屠杀 史料集

⑦ 东京审判书证及苏、意、德文献

张生 杨夏鸣 编
吴世民 谈礼英 郑寿康 等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京审判书证及苏、意、德文献/张生,杨夏鸣编. --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 2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

ISBN 978-7-214-06805-7

I. ①东… II. ①张… ②杨… III. ①南京大屠杀—
史料 IV. ①K265.6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14182 号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

张宪文 主编

第七十一册 东京审判书证及苏、意、德文献

张 生 杨夏鸣 编

吴世民 谈礼英 郑寿康 等译

责任编辑 左 衡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210009)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者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960×1304 毫米 1/32

印 张 16.875 插页 4

字 数 433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06805-7

定 价 52.00 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

名 誉 顾 问 李源潮 梁保华

顾 问 孙志军 洪银兴

学术指导委员会 (以姓氏笔画为序)

尹玉兰 叶 皓 朱步楼 刘健屏
孙宅巍 杨永建 李恩涵 步 平
吴 源 张异宾 张伯兴 张海鹏
周世康 荣维木 章开沅 笠原十九司[日本]
蒋晓星 谭汝谦

编 纂 委 员 会

主 编 张宪文

副 主 编 (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振犊 王 正 王 崑 王卫星
杨夏鸣 张 生 张连红 陈沈张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 菡 杨 斌 吴 斌 吴 静
余 翔 张建宁 陈宝珠 陈谦平
林伯耀 松冈环 彼萨洛夫[俄国]

周 红 孟国祥 经盛鸿 胡菊蓉
姜良芹 段月萍 夏 蓓 高晓星
郭必强 曹大臣 曹必宏
萨马拉尼[意大利] 潘 涛

翻 译 委 员 会 (以姓氏笔画为序)

叶 琳 刘 军 吴世民 吴立新
何慈毅 谷肖梅 陈世华 罗萃萃
郑寿康 侯 锐 秦文华 雷国山

主 要 编 译 者

张宪文 南京大学教授
吴世民 南京大学教授
叶 琳 南京大学教授
张 生 南京大学教授
陈谦平 南京大学教授
刘金源 南京大学教授
何慈毅 南京大学教授
郑寿康 南京大学教授
姜良芹 南京大学副教授
曹大臣 南京大学副教授
雷国山 南京大学副教授
舒建中 南京大学副教授
郑安光 南京大学副教授
龚洪烈 南京大学副教授
张 红 南京大学副教授
李茉莉 南京大学副教授
王弈红 南京大学副教授

- | | |
|-----|----------------|
| 汪 平 | 南京大学副教授 |
| 李 斌 | 南京大学讲师 |
| 汪丽影 | 南京大学讲师 |
| 仇蓓玲 | 南京大学讲师 |
| 朱 适 | 南京大学讲师 |
| 沈 琳 | 南京大学讲师 |
| 吕 斌 | 南京大学讲师 |
| 朱圆圆 | 南京大学讲师 |
| 庄 倩 | 南京大学讲师 |
| 吕 晶 | 南京大学讲师 |
| 张连红 |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 |
| 经盛鸿 |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 |
| 秦文华 | 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 |
| 季爱琴 | 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 |
| 刘 灿 | 南京师范大学讲师 |
| 罗 锋 | 南京师范大学讲师 |
| 马振犊 |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 |
| 胡菊蓉 |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 |
| 曹必宏 |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 |
| 郭必强 |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 |
| 杨 斌 |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 |
| 张开森 |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 |
| 林宇梅 |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副研究馆员 |
| 陈宝珠 |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副研究馆员 |
| 文俊雄 |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副研究馆员 |
| 王 正 |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 |

心研究员

- 孙宅巍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王卫星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崔巍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
 杨夏鸣 江苏省行政学院教授
 章开沅 华中师范大学教授
 萨马拉尼 意大利威尼斯大学教授
 彼萨洛夫 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大学教授
 张建宁 南京市档案馆副研究馆员
 夏蓓 南京市档案馆副研究馆员
 周红 南京市档案馆副研究馆员
 高晓星 南京海军指挥学院教授
 王述坤 东南大学教授
 谷肖梅 东南大学副教授
 罗萃萃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教授
 王鹏飞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教授
 魏高修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讲师
 侯锐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副教授
 孙继强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副教授
 吴立新 南京工业大学教授
 陈世华 南京工业大学副教授
 刘军 上海海洋大学副教授
 李红 南京农业大学副教授
 严楨 南京农业大学讲师
 朱敏 南京农业大学讲师
 丁晓伟 南京工程学院讲师

- 潘秋风 南京财经大学副教授
沈 俊 三江学院讲师
钱彩琴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
费仲兴 解放军炮兵学院南京分院教授
罗文文 连云港市图书馆副研究馆员
张志刚 江苏亚欧区域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谈礼英 爱德基金会前秘书长助理
戴袁支 《中国青年报》主任记者

总 论

张宪文

—

1931年9月18日,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中国东北沈阳地区挑起事变,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这场战争由局部地区蔓延到全国,先后经历了14年。中国人民虽然经过艰苦卓绝的武装反抗斗争,取得了战争的最后胜利,但是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它不仅对中国国民经济造成了严重破坏,延缓了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也给广大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难以弥补的重大损失。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各地制造了许多大规模暴行,其中以南京大屠杀最为严重、最为残酷,它与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法西斯大屠杀、广岛原子弹爆炸,同为世界近代历史上著名的三大惨案。

1937年11月12日,日本侵略军在攻占中国上海之后,迅速沿京沪铁路、京杭公路,向中国首都南京推进,并计划绕行高淳、芜湖一线,以截断南京守军退路。中国军队由于沪战新败,在苏南地区未能组织有效抵抗,故南京保卫战处于军事上极端不利的地位,未能给日本侵略军以沉重打击。12月13日,南京沦陷。日军在南京进行了大规模的屠杀活动。在差不多六个星期的时间中,古城南京遭受了一场空前的浩劫。主要表现在:

说明:2007年10月,《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29—55册出版时,“总论”内容作了部分修改。2010年11月,第56—72册出版时,再次作了订正。

第一,日军大量屠杀南京的和平居民及放下武器的或被俘的中国军人。他们采取集体屠杀和分散屠杀的形式,在南京城区和近郊制造了许多大规模屠杀活动。其中,最惨烈的有燕子矶、草鞋峡、煤炭港、鱼雷营和宝塔桥、中山码头、江东门、凤台乡、花神庙、汉中门等处的屠杀。这些屠杀行动,多者杀害数万人,少者也有两三千人。更多的是到处滥杀无辜。屠杀的对象,不仅有青壮年,连老人、学生、儿童、妇女,也不放过。屠杀的方式也是形形色色,有枪杀、砍杀、刺杀、活埋、焚烧、溺水等,甚至进行杀人比赛、杀人取乐。当时,南京的许多慈善机构留下了大量的埋尸记录。日军官兵的日记和西方媒体,都有大量记载和报道。

第二,日本侵略者采用各种方式奸淫中国妇女。被其强暴的中国妇女,不仅数量多,而且连古稀妇女、未成年的少女和孕妇,也惨遭污辱。日军还在南京设立多处慰安所,强征中国妇女,供其蹂躏。

第三,对南京城市的破坏和财产的抢劫。日军占领南京后,到处焚烧、掠夺,市民的房屋、家具、粮食、牲畜等财产,受到重大的损失。全城满目断壁残垣、瓦砾废墟,一片凄惨景象。

日本侵略军在南京制造的这一大规模屠杀事件,给南京人民造成了长期的心灵创伤,受到中国人民、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也包括日本人民的强烈谴责。

二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的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苏联、美国、英国、法国、荷兰、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菲律宾等 11 个国家,在东京组织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东条英机等重要战犯进行了审理。同时,在南京也组织了中国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谷寿夫等人进行了审讯。这些审判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重大的国际事件,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深远的政治影响。这些审判都以大量的、确凿无疑的犯罪事实为依据,对日本战争罪犯作出了正义的判决。如东京审判,自 1946 年 5 月 3 日至 1948 年 11 月 12 日,历时两年半。开庭 818 次,419 名证人出庭作证,779 人作了书面证言,受理证据 4336 件,英文审判记录共 48412 页,判决书长达 1213 页。

东京和南京两个法庭,严格地依照国际法,对日本战犯的战争罪及违反人道罪作出了正义的判决,受到了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的热烈称赞。日本政府作为战争挑起者,理应深刻地反省战争罪行,总结教训,以史为鉴,与曾被其侵略践踏过的国家开创新的国家关系,共同面向未来,维护世界尤其是东亚地区的和平。

可是,战后六十多年来,日本政府在对待战争性质和战争责任问题上,基本采取暧昧或含糊其词或躲躲闪闪的态度,助长了右翼势力的发展。他们否认自19世纪以来侵略中国的历史,否认对华战争的侵略性质,美化侵略战争,美化殖民统治,散布歪曲南京大屠杀的言论,把南京大屠杀说成是中国人“虚构”的,是“谎言”、“捏造”。他们对战争不反省,对被侵略国家不道歉。每年的8月15日,都有许多官员包括内阁大臣等,去靖国神社参拜。前任首相小泉纯一郎,更是连续几年坚持参拜活动,而那里除了供奉着一般战死者的亡灵外,还供奉着东条英机等战争罪犯的亡灵,这无疑严重地伤害了亚洲被侵害国家人民的感情。1996年8月,日本公开出版了《大东亚战争的总结》这部书。说什么要对“大东亚战争”进行总结,实际上是对侵略战争包括南京大屠杀全面翻案。该书是日本自民党及与靖国神社有关的三个协议会(“回报英灵的议员协议会”、“遗族议员协议会”、“大家都来参拜靖国神社国会议员协议会”)组织的“历史研究委员会”,对国会议员所作的20次报告的记录。出席报告会的议员达到1116人次。这些报告对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全面翻案。

日本右翼的活动越来越频繁。2005年5月,日本厚生劳动省政务官森冈正宏更进一步妄称“甲级战犯在日本国内已经不是罪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是“任意以反和平罪和反人道罪进行单方面审判的”。这种为战争罪犯正名,否定东京审判的目的,不仅是为了美化侵略战争,更是为日本政府官员继续坚持参拜靖国神社制造根据。日方一连串的翻案言行,导致中日关系、日本与亚洲各国的关系日趋紧张。

为什么战后日本某些人始终坚持侵略史观,我们认为有极其复杂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

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由于美国执行新的远东政策,导致日本

一些人不能正确对待战争责任,更不肯承认战争罪行。

战后,美国的主要目标是对付前苏联和共产主义。美国从远东及太平洋地区的战略格局出发,极力扶植日本,企图利用日本的力量对付共产主义,为此采取独占日本的政策,不认真清算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侵华战争的重要罪犯冈村宁次,逃脱了法律的制裁;1950年11月,在美国操纵下,重光葵刑期未滿即被非法释放,并再次担任了日本外相。美国更错误地赦免了侵略战争的主要责任者天皇裕仁的罪行,不仅未给予批判,而且使天皇制度继续保存下来。这是导致日本不能深刻反省的重要国际因素。

第二,日本不能正确对待亚洲各国尤其是中国政府和人民对日本军国主义者所犯罪行的宽容政策。

14年的日本侵华战争,使中国人民蒙受惨重灾难,中国人民完全有权利、有理由向日本讨回战争损失。中国政府和人民为了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下去,以无比宽大的胸怀,主动放弃了日本对华的战争赔偿。可是,日本的某些人却“以怨报德”,不能正确认识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沉重灾难,反而将自己打扮成战争的受害者。民意调查显示,相当多的日本普通民众认为日本是战争的受害者。一年一度的广岛原子弹爆炸事件纪念活动也给日本民众造成了错觉。同时,中国海峡两岸国共两党早年对抗战的认识差异和对日本政策的分歧,也增加了日本政府认罪的难度。当今,台湾民进党执政当局,试图利用日本牵制中国,也使中日关系增加了变数。

第三,被日本传统文化扭曲的道德观念,成为日本不能承认侵略罪行的精神枷锁。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宪法规定天皇是日本帝国的最高统治者,是创造日本国家的天照大神之子孙,是神权之化身。日本人民长期受皇道主义、国家主义教育,培养了一种盲目服从的观念意识。日本广泛鼓吹武士道精神,主张献身。20世纪20年代以后,这种精神与法西斯主义结合,成为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并誓死效忠天皇的精神支柱。在这种观念的诱导下,许多年轻的日本军人以能为军国主义牺牲生命、入靖国神社成为“护国神”而感到无比骄傲和自豪。那些曾因发动侵

略战争而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处死的战争罪犯,都被美化为“护国神”,并在战后被某些人视为民族英雄。基于这种认识,日本右翼势力不肯承认战争罪行,亦不可能批判军国主义的危害。

日本历史上甚少与外界沟通和往来,形成了单一的大和民族结构,存在着狭隘的民族观念,他们不能以宽大的胸怀面对世界,面对各国人民。日本国土狭小,资源匮乏,人口众多,因而一些人认为,要生存就必须向海外扩张,并把发动对外战争视为国家发展的关键。日本根深蒂固的扩张主义观念,是其不愿意承认侵略战争的思想根源。

第四,日本不愿采取明确、深刻的认罪态度,还有复杂的现实原因。

日本是世界经济大国,虽然近十年来经济不景气,但其经济实力仍居世界第二位。日本不仅要以经济大国身份,影响亚洲乃至世界经济,而且在积极谋求成为世界军事大国、政治大国,并想获取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席位。日本的兵力不足,但有强大的军事装备。它通过提升军事自卫队的地位,谋求向海外发展军事力量。日本担心中国的发展和强大,对中国的军事潜力极为忧虑,认为中国在未来是它的最大的竞争对手。在对华政策上,日本政界存在明显分歧,有人友好,有人敌视,也有人怀疑。在对华贷款问题上,日本政界有人提出不能再给中国以支持,否则将使中国“如虎添翼”。在对台湾问题上,日本为了遏制中国的发展,不仅将日美安保条约的范围扩大到台湾,而且把对台湾关系的表态,限定在1972年中日建交声明的框架内,不明确表示不支持或反对台独。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中日关系的复杂性。同日本右翼的分歧在短期内是难以逆转的,要日本右翼和某些官方人士转变侵略史观也几乎是不可能的。

三

由于日本政府的政策误导和不恰当宣传,使日本一些群众特别是年轻一代对中日历史问题漠然无知,甚至有人对日方曾经有过的反省也采取不理解的态度,对历史问题的解决产生抵触情绪。故加强中日关系史的宣传和密切两国友好往来,使广大日本人民了解历史真相,正确认识历史,理解受害者中国和亚洲人民的感情是十分重要的。

战后,许多中西方人士开始关注南京大屠杀这一残暴的历史惨案。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和日本的历史学者已经开始从事南京大屠杀的研究。他们从大量的历史事实出发,坚持正义立场,写出了一批有说服力的著作。一些当年曾参加南京战役并直接屠杀南京人民的日本老兵,在多年后公布了他们的日记或回顾了那段惨痛的历史,如《东史郎日记》等。许多欧美传教士、新闻记者、学者、医生,曾亲眼目睹日军在南京的各种残暴行为,他们写下了许多有价值的日记、新闻报道,如《拉贝日记》、《魏特琳日记》等。但是,更多的南京大屠杀史料散落在海内外各地的档案馆、图书馆及一些文化部门,也还有些材料保存在私人手中。为了加强南京大屠杀历史的研究,严正驳斥日本右翼否定或歪曲南京大屠杀的谬论,把大量的有关史料搜集、整理、汇集起来,是一项有重要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工作。为此,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提出课题,建议并支持南京地区历史学界的专家、教授,联合海内外的学者、朋友,合作编辑一部《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十年来,本课题编委会成员曾分赴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意大利、俄罗斯及台湾等地档案馆、图书馆和有关史料保存机构,获取了大量有价值的档案和各种历史文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市档案馆和设在台北县新店市的国史馆,都提供了一批未曾公布过的史料。我们先后从海内外搜集到近四千万字的原始材料。如此浩繁的史料将为历史研究工作提供更多的科学根据,也强有力地印证南京大屠杀是一个否认不了的历史大惨案和人类悲剧。日本右翼千方百计地抹煞它的存在终将是徒劳的。正义的、爱好和平的日本人民完全可以从中做出正确的判断。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分若干专题,汇集了来自各方面的史料。

本史料集收集了日军连续不断轰炸南京和中国军队为保卫首都南京与来犯日军进行顽强作战的档案材料。其中,包括中方有关作战计划、战斗方案、作战命令及执行情况,蒋介石与南京战役指挥官唐生智等人的往来文电,各参战部队的战斗详报、战况报告、战斗序列,中方参战部队的撤退与损失情况报告、战役总结,以及参战人员的回忆资料等。

本史料集收集了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尸体掩埋情况的大批资料。其中,集中了迄今为止最为完整的中国、日本及西方国家有关南京大屠

杀中尸体掩埋和处理的原始档案和回忆资料；集中了各慈善团体、市民团体、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伪政权掩埋尸体的资料，以及日军处理遇难者尸体的材料。我们还发现了一些新的慈善团体和伪政权机构埋尸的原始档案。埋尸记录材料是日军实施南京大屠杀最有力的证据。

本史料集收集了大量的侵华日军官兵的日记、书信、回忆和证言。作为加害者，日军华中方面军所属部队的官兵是南京攻击战和南京大屠杀的直接参与者和见证人。战争期间，他们中间的一些官兵曾将自己在战场上的亲身经历、所作所为、内心感受以及某些见闻，以日记形式记载下来，或在书信中较多地流露出来。战后，这些日记、书信陆续被披露或出版。它是日军在南京实施暴行的真实记录。

本史料集收集了一大批西方人士和美英德外交机构及驻华使领馆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文字史料。众所周知，日军攻陷南京后，一批英、美、德等国的新闻记者、传教士、教师、医生、企业机构和使领馆人员，以其中立的身份，得以留在南京。他们是日军在南京实施各种暴行和破坏活动的目睹者，亲历了古城南京的这场浩劫。新闻记者以其良知真实地报道了南京屠城的情景，众多的报道发表在美国《芝加哥每日新闻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及前苏联、意大利、中国等国的报刊上。在南京的外国传教士、教师等，在积极建立国际安全区救助受难南京市民的同时，写下了许多日记、书信和各种文字材料，详尽、真实地记载了南京人民的那段苦难历程。大批第三者的亲历史料是日本右翼无法推翻的铁证。

本史料集收集了一批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证言。其中，重要的如原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所负责人程瑞芳女士的日记，她逐日记载了日军的暴行。也还有幸存者在南京事件后撰写的大量回忆，如《陷京血泪录》、《陷京三月记》等。本史料集还收录了一批幸存官兵、幸存难民的回忆等。这些材料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本史料集收集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中国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的史料。其中选录了东京审判的相关法律文件。在有关南京大屠杀起诉证据方面，首次翻译出版了大量经法庭确认的有关证据，如审问松井石根记录、审问武藤章记录及证人的书面证词等。也完整地介绍了东京审判的过程，介绍了控辩双方对证人的质证等，读者阅后完全可以对

日军的罪行作出正确的判断。1953年,中国曾翻译出版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再次就英文原件作了新的翻译,希望译文更准确、更符合原意。本史料集还介绍了中国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有关审判战犯的国际法、中国刑法等法律依据,介绍了法庭的组成、审判条例、量刑标准及审判的全过程。

本史料集收集了战后国民政府所做的大量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调查统计材料。国民政府还都后,从1945年底到1947年初,首都警察厅、南京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南京市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南京大屠杀案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和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先后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南京大屠杀案进行过较为深入的社会调查。前期调查内容的重点为战争损失和民众受害情形,后期重点则为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的暴行事实。其中由南京市临时参议会主持的南京大屠杀案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是为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而成立的,其调查表对被害人、证人和调查者均有较为详细的记录,调查方法具有相当的专业性质。其调查程序、表格设计、证人证词等均具有法律意义。1946年11月9日,国民政府内政部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改称行政院赔偿委员会。本史料集主要收录其存档中大批关于南京沦陷初期的人口伤亡与财产损失统计材料。这些都是有关南京大屠杀的珍贵史料。

本史料集还编纂了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的名录,这是一项困难细致的工作。经过努力,我们从大量原始档案中,并通过向幸存者调查,搜集到大批遇难者名单及其受害简况。这批名单,均注明资料来源和原始出处,它为研究者提供科学依据。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是一项大型学术工程,史料的搜集、整理及英、日、德、意、俄等文献的翻译和编辑出版,是十分复杂艰巨的工作,因而只能分批陆续出版。相近的史料内容,安排在不同卷次先后出版,也是迫不得已的,敬请读者原谅。我们希望这套史料集能为海内外广大的历史研究者和众多读者提供尽可能多的、内容丰富全面的历史资料。但是,由于材料来源广泛,有加害方、受害方、第三方的亲身经历、亲见亲闻材料,也有回忆材料、各种档案文献材料、报刊材料等,其对南京大屠杀的记述有不一致的地方,甚至受记述者立场、观察角度或认识上的局限,记

述有矛盾之处,也有一些错误的或不正确的观点,这并不奇怪。对这么一件震惊世界的大惨案,声音不可能完全一致。保存史料原貌,是历史工作者应具有的职业道德和学术规范。因此,我们对史料均照原样收录,不加任何更动,提供给历史研究者,由他们在使用时加以考辨、解析,得出符合历史事实的科学结论。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南京大屠杀这段惨痛的历史已经过去 70 余年,我们期盼正义的日本人民与中国人民一道,深刻地总结历史教训,为维护东亚和世界和平,为两国人民世代代的友好而共同奋斗。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续编

第 56—72 册说明

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张宪文教授主编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 1—55 册，于 2005 年至 2007 年先后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和凤凰出版社顺利出版。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 1—55 册，共约 3000 万字。它的资料，来源于国内外档案馆、图书馆和有关史料机构。它涵盖着加害方日本、受害方中国和第三方欧美国家的大批重要历史文献、亲历者的原始记录和口述回忆等；绝大部分是原始文本、第一手的历史资料，在海内外首次公开出版或第一次译成中文出版。它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在学术上是一项重要的文化工程。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所收录的史料，从不同的角度厘清了历史事实，揭示了历史真相，最详细、最全面地鉴证了南京大屠杀是日本军国主义制造的反人类文明和基本道义的惨剧，使日本右翼散布的种种谬论和谎言不攻自破。它对于教育广大青少年，促进人类的理性反思，实现和坚持中日友好，维护世界和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而它也是一项重要的政治工程。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出版后，受到了海内外各方面的关注，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反响。国内外各类媒体做了大量报道，反响强烈。

鉴于仍有一些南京大屠杀的原始材料散落在海内外有关部门，近几年编委会成员再次赴海外深入搜集资料。除英文、日文等方面史料外，还在意大利、俄罗斯学者的帮助下，获得了当年日军南京大屠杀在意大利、前苏联一些重要报刊上的报道材料，从而进一步佐证了日军在南京

的大屠杀罪行。

我们将这批新获得的英文、日文、俄文、意大利文、德文的原始资料，经过认真的整理、翻译、检阅，编辑成《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56—72册，继续交付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这批史料，有美国政府外交文件、耶律大学收藏的欧美在华传教士日记和书信、日本侵华军军事文献、日军军官日记及回忆录、日本媒体报道、东京审判检方和辩护方资料，以及一批中方档案如南京市民向伪政府的呈文和当年中方出版物对日军暴行的报道等。这些材料都进一步佐证了南京大屠杀是日军制造的惨无人道的大惨案。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56—72册的编撰工作，仍由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南京大屠杀史研究所主持。参加这项工作的有南京师范大学、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江苏省行政学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市档案馆等单位的学者。南京大学历史系、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及南京师范大学、东南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财经大学、南京农业大学、南京工业大学、南京信息工程大学、上海海洋大学、南京三江学院以及台湾淡江大学的学者，承担了日语、英语、俄语、意大利语、德语的翻译和校阅工作。

这批史料的搜集、编纂、出版等工作，得到了有关方面、海内外朋友及江苏人民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在此表示深切敬意及感谢。

出版凡例

一、本史料集按不同专题分册出版,一般情况下,一个专题一册,亦有少数为两个或三个专题一册,或一个专题因内容太多而分成数册。

二、史料集所选中文资料,个别行文中有人名、地名、别字、错字及用词不规范者,为尊重历史、保存原貌,均原文照录。但在别字、错字后面注明正字。原文文字不清之处,以“□”表示。其中内容重复或与主题无关部分,编者则略加删节。史料集所编译外文史料中原有对中国人民的污蔑之词和对日本侵华的溢美之词,不作改动。

三、所选史料一般以一件为一题,凡同属一事彼此间又有直接联系的成组材料,以一事为一题。

四、所选史料一般不作注解。如确有需要时,则在页下作注。

五、所选史料均在文后注明史料来源。如外文史料属首次翻译刊出,则注明译校者。

六、由于收录的资料形成时间不一,因此,不同时期所涉及的人名翻译差异较大,有的外国人的译名甚至多达五六种,为了保持史料的完整性,我们一般未作改动,而是在相关册里附加外国人名(包括简称、别名、中国名等)译名对照表。

本 册 说 明

本册内容由三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书证。书证是东京审判中南京大屠杀一案审理的主要依据,来源有四方面:一是检方证人提供的宣誓证词和书面证词,如马吉牧师、威尔逊医生、许传音博士等,由于当时南京政府忙于内战,在清算日本战争罪行的东京审判上,甚少投入,许多检方证人的书证是国际检察局起诉处的托马斯·莫罗上校和约翰·克劳利先生到中国收集的,他们得到了袁劭恒、涂莹光等人的帮助。二是被告和辩护方证人的宣誓证词、讯问笔录等,松井石根等人及其辩护律师们,为了洗脱被告罪行,要求饭沼守等一批与南京大屠杀有关的日本官兵出庭作证,他们精心准备,与南京政府形成了鲜明对比;结合这些证人的日记等文件,我们可以发现,这些信誓旦旦的辩护方证人,除石射猪太郎等个别人外,集体做了伪证,严重影响了东京审判的结果。三是南京大屠杀前后形成的《安全区档案》、《南京战祸写真》、美国传教士日记等书面文献,作为第三方的客观记录,对判明南京大屠杀的基本面貌起到了重大作用。四是中、美、日、德、英等国的官方文献和文件。四个方面的书证中,前两项多经过当庭质证,其具体质证过程可见本史料集第7册《东京审判》。国际检察局的萨顿等人,在某些中方证人出现重大差错、被告证人和辩护律师狡计百出的情况下,发挥了高度智慧,对法庭判决松井石根有罪起到了关键作用。

东京审判书证均来自美国国家档案馆(二馆),由张生、杨夏鸣在美国照相、扫描收集。由于中、英、日三种文字档案原件的使用,改善了原据英文翻译的相关文件的不足,建议读者比照阅读、使用。

第二部分是来自前苏联《真理报》等处的文献,第三部分是来自意大

2 东京审判书证及苏、意、德文献

利《晚邮报》的报道和《国际关系》等处的文献，它们提供了观察南京大屠杀的不同视角，具有文本上的重要意义。第四部分为德国方面资料，涉及到德国人士对南京大屠杀史实的记录，罗森、沙尔芬贝格和拉贝三位德国人士在大屠杀之后的人生遭遇。

本册编者：张 生 杨夏鸣

译 者：吴世民 谈礼英 郑寿康等

校 阅 者：张 生 杨夏鸣 王卫星 刘宇菲

目 录

本册说明	1
第一部分 东京审判书证	1
1. 书证第 204 号	
罗伯特·威尔逊宣誓证词(略)	1
2. 书证第 205 号	
许传音宣誓证词	1
3. 书证第 206 号	
尚德义宣誓证词	5
4. 书证第 207 号	
伍长德宣誓证词	6
5. 书证第 208 号	
陈福宝宣誓证词	8
6. 书证第 250 号	
梁廷芳宣誓证词	9
7. 书证第 251 号	
多田骏宣誓证词	11
8. 书证第 255 号	
讯问武藤章(略)	12
9. 书证第 256 号	
讯问畑俊六	12

2 东京审判书证及苏、意、德文献

10. 书证第 257 号	
讯问松井石根	20
11. 书证第 258 号	
讯问桥本欣五郎	33
12. 书证第 262 号	
松井军司令官声明	45
13. 书证第 263 号	
海军部调查文书	47
14. 书证第 264 号	
桥本欣五郎:革新的必然性(节选).....	52
15. 书证第 265 号	
日本政府复英国大使馆(节选)	55
16. 书证第 266 号	
文部省:日本精神——在中国事变上的意义.....	57
17. 书证第 306 号	
史迈士宣誓证词(略)	59
18. 书证第 307 号	
费吴生宣誓证词(略)	59
19. 书证第 308 号	
程瑞芳书面证词(略)	59
20. 书证第 309 号	
麦克伦宣誓证词:麦克伦日记.....	60
21. 书证第 310 号	
孙远震书面证词	75
22. 书证第 311 号	
李滌生书面证词	77
23. 书证第 312 号	
陆沈氏书面证词	79

24. 书证第 313 号	
吴经才书面证词	80
25. 书证第 314 号	
居鸿恩和张其兴的书面证词	81
26. 书证第 315 号	
黄江氏书面证词	82
27. 书证第 316 号	
哈笃信书面证词	83
28. 书证第 317 号	
王陈氏书面证词	84
29. 书证第 318 号	
吴君清书面证词	85
30. 书证第 319 号	
袁王氏书面证词	86
31. 书证第 320 号	
王潘氏书面证词	87
32. 书证第 321 号	
吴张氏书面证词	89
33. 书证第 322 号	
陈贾氏书面证词	90
34. 书证第 323 号	
《安全区档案》(略)	91
35. 书证第 324 号	
南京慈善机关暨人民鲁甦报告敌人大屠杀概况统计表	91
36. 书证第 325 号	
南京市崇善堂掩埋队工作一览表	103
37. 书证第 326 号	
世界红卍字会南京分会救济队掩埋组掩埋尸体具数	

4 东京审判书证及苏、意、德文献

统计表·····	106
38. 书证第 327 号	
首都地方法院检察处奉令调查敌人罪行报告书·····	112
39. 书证第 328 号	
美国使馆有关日军暴行的外交电文(略)·····	116
40. 书证第 329 号	
德国外交部原始文件和档案(略)·····	116
41. 书证第 330 号	
联合国战争罪行调查委员会(UNWCC)对日本战犯的 指控·····	116
42. 书证第 2521 号	
日本政府向美国政府提交照会·····	119
43. 书证第 2526 号	
青木武宣誓证词·····	121
44. 书证第 2530 号	
三井贞三宣誓证词·····	123
45. 书证第 2537 号	
日高信六郎宣誓证词·····	126
46. 书证第 2548 号	
塚本浩次宣誓证词·····	134
47. 书证第 2560 号	
大山文雄宣誓证词·····	137
48. 书证第 2577 号	
中山宁人宣誓证词·····	139
49. 书证第 2578 号	
文件遗失证明·····	146
50. 书证第 3287 号	
石射猪太郎宣誓证词·····	147

51. 书证第 3304 号	
陆军次官有关陆军部队之通令稿·····	149
52. 书证第 3393 号	
大杉浩宣誓证词·····	158
53. 书证第 3394 号	
大内义秀宣誓证词·····	161
54. 书证第 3395 号	
胁坂次郎宣誓证词·····	165
55. 书证第 3396 号	
西岛刚宣誓证词·····	168
56. 书证第 3397 号	
松井石根训示和西岛刚证明·····	171
57. 书证第 3397A 号	
美山要藏证明·····	173
58. 书证第 3398 号	
中泽三夫宣誓证词·····	174
59. 书证第 3399 号	
饭沼守宣誓证词·····	178
60. 书证第 3400 号	
小川关治郎宣誓证词·····	181
61. 书证第 3401 号	
榊原主计宣誓证词·····	183
62. 书证第 3403 号	
下中弥三郎宣誓证词·····	186
63. 书证第 3409 号	
松井石根:我辈之大亚细亚主义(节选) ·····	189
64. 书证第 3409 号	
冈田尚宣誓证词·····	191

6 东京审判书证及苏、意、德文献

65. 书证第 3454 号	
武藤章宣誓证词·····	199
66. 书证第 3466 号	
美山要藏证明·····	223
67. 书证第 3498 号	
松井石根宣誓证词·····	225

第二部分 苏联文献中的南京大屠杀 ····· 234

1. 占领者的暴行 ·····	234
2. 日本飞机野蛮的轰炸 ·····	235
3. 在中国的军事行动 ·····	236
4. 华中地区 ·····	238
5. 日本占领者的暴行	
杀死超过 41 000 位平民 ·····	239
6. 日本在中国的暴行 ·····	240
7. 日本占领者在中国的暴行 ·····	241
8. 宋庆龄的宣言 ·····	242
9. 日军的暴行 ·····	243
10. 日本占领者在中国的暴行·····	244
11. 日军在中国的暴行·····	245
12. 中国妇女的爱国心·····	248
13. 日本在中国的暴行·····	250
14. 群众运动的现况与中国共产党	
中国人民参加对日抗战·····	251
15. 我们的基本方针与动员群众·····	253

第三部分 意大利报刊报道的南京大屠杀 ····· 255

1. 上海陷于火海	
-----------	--

由于日军轰炸浦东居民区引起大火——租界遭受中国 炮火袭击——南京军队猛烈反攻——以五十万大洋赎 回传教士	255
2. 三千中国人在轰炸中丧生	
天皇的郑重声明:新一批日本援军登陆上海	258
3. 中国战事	261
4. 中国战事	263
5. 中国战事(9月23日—29日)	265
6. 日本的猛烈进攻	
对上海重新开始猛烈的进攻 40 个小时的狂轰滥炸——中国 战线在罗店镇被攻破——日军在北部五个省份的中心马不 停蹄地前进(《晚邮报》特别专稿)	267
7. 轰炸下的上海	
在中国和日本占领地乘坐出租车——对中国和日本两家新闻 办公室的访问——“出云”号主力舰上的日军高级指挥部 ...	270
8. 在中国北方的野战	
日军包围了石家庄	273
9. 日本决定抵制他国操纵“民主”	
东京召开内阁会议——今天,日本外务省将明确日本 立场	275
10. 中国战事(10月7日—13日)	276
11. 日军在上海的压倒性胜利	
日军火攻进入闸北,中国军队四十支分队逃向南方,标志着 整个防御系统的崩溃	278
12. 在死亡与冷漠中进入上海	
“改变航向”,战争的第一个信号——日本海军舰船在中国 射手的眼皮底下平静地航行——早上轰炸,晚上轰炸	281
13. 日军包围圈紧逼上海	

中国的富庶之地将与首都南京隔离 英国的银行守护着南京城内一些豪门显贵的财产,因此一项守护和平、拯救银行存款的运动开始了.....	286
14. 上海完全落入日本人手中 松井将军遵守了他的诺言,中国人被迫放弃最后的防线。 成千上万的战败者和难民进入租界寻求庇护,只有一小股部队仍然在南市抵抗.....	289
15. 日本对租界的企图 ——松井将军的宣言.....	293
16. 五十万中国人进入南京 南京政府的军队在中国官员面前被击溃了——仅昨天早上就死了两万人.....	295
17. 盟军向中国首都进军.....	297
18. 中国战事(11月18日—24日).....	299
19. 日本军队包围南京 中国人中的反对派对抗共产党煽动者——据说要在上海建立自治政府.....	301
20. 逼近南京 日军势力扩展至首都西南方——大量中国市镇被占领.....	304
21. 日军在南京上空的胜利 13架苏联制造的飞机被毁——日军阅兵式将穿过上海公共租界.....	305
22. 中国战事(11月15日—12月1日).....	307
23. 南京沿途中国防线失守 一场由俄国煽动、蒋介石期望的在上海发生的日法武装冲突奇迹般被避免.....	309
24. 日军先头部队今日即将进入南京 日军新闻发言人通告——城市临江区域处于战火之中	

——恐慌的掠夺场面·····	312
25. 迫在眉睫的占领·····	314
26. 日军在南京	
蒋介石逃离,可能放弃手中权力·····	316
27. 日本人在攻占南京前发出最后通牒	
对城市的轰炸还在继续——日本皇军在江阴附近的长江	
北岸登陆·····	319
28. 日军命令南京最后的守军投降	
30 万中国人飘忽不定的命运——在被包围城市里的焦虑	
时光·····	323
29. 日本人占领芜湖,包围 30 万敌军	
南京大战 皇军直到今天中午才占领南京 日军沿长江	
北岸挺进,直指浦口·····	326
30. 南京陷落	
日本军队准备攻击南市 城市防守在松井的最后期限到达后	
半小时内被日军攻破 蒋介石想在湖南组织一支军队·····	329
31. 今天“最后通牒”降临南京卫戍军	
“我们将严惩抵抗者,而宽大缴械的人”,松井将军说	
——日本军包围了首都·····	332
32. 南京落入日本人手中	
“敢死队”在城墙上找到突破口——日军挺进南京在首都街	
道上作战——东京将宣布蒋介石政府垮台·····	335
33. 中国战事(12 月 2 日—8 日)·····	338
34. 日军击溃南京最后的抵抗	
南京的指挥官逃到江对岸——北方的省政府宣布从中央	
政府中独立出来·····	340
35. “巴纳”号命运悲惨 桑德罗·桑德利英勇牺牲	
炮舰遭到轰炸——桑德罗垂死登陆——沿江岸艰难行进·····	343

10 东京审判书证及苏、意、德文献

36. 中国战事(12月8日—15日)	
南京陷落·····	348
37. 在上海公共租界的新恐怖主义行为	
向日本财产投掷炸弹,在萨沃依精锐部队的两处地方爆炸	
——没有人员伤亡——共产主义煽动者制造麻烦·····	350
38. 日本海军大臣米内对英国人发出明确警告在必要情况下	
日本将动用武力阻止对中国的任何军事援助·····	353
39. 日本要求上海的行政控制权 关于公共租界的问题 萨沃依	
精锐部队之壮举 孔子之城被占领·····	356
40. 日军控制下上海的重建	
对电报电缆公司所有权的掠夺——日军在山东省的新进展	
——23架飞机轰炸汉口·····	358
41. 前往南京	
当几百艘挤满中国逃亡者的帆船和轮船沿长江逆流而上时,	
日军正沿江岸前进,他们越过了江堤、稻田和沼泽地·····	360
42. 桑德罗·桑德利的讲述:我们在等待日本人·····	365
43. 在中日间调解的传闻	
意大利和英国驻华大使在香港会面——上海又发生屠杀	
事件·····	370

第四部分 德国方面资料····· 372

1. 国务秘书冯·马肯森随笔·····	372
2. 国务秘书冯·马肯森随笔(摘要)·····	373
3. 德国悉尼总领事馆呈送外交部报告·····	374
4. 美国麦美伦公司火油物产中国总经理嘉第火油物产公司致	
南京德国大使馆函·····	375
5. 陶德曼致德国外交部电报·····	376
6. 东京德国大使致德国外交部电报·····	378

7. 德国外交部长诺伊拉特致东京德国大使电报	379
8. 外交部长冯·诺伊拉特致东京德国大使电报	381
9. 德国驻华大使馆致德国外交部报告	382
10. 汉口德国大使馆编号 1702/1098/38 的附件	383
11. 汉口德国大使馆致许尔特尔公函	385
12. 礼和洋行致南京德国大使馆函	386
13. 迪克森致柏林外交部报告	388
14. 德国驻上海总领事馆电报	397
15. 领事秘书霍特随笔	398
16. F. 伯勒尔先生永庆巷 46 号房子看守人宋其昌的报告	399
17. 菲舍尔发给德国南京大使馆电报	401
18. 德国外交部对日中冲突形势的分析	402
19. 许尔特尔致安曼公函	406
20. 罗森致汉口德国大使馆函	407
21. 罗森致 E. M. 陈女士函	408
22. 罗森致上海德国大使馆商务专员公函	411
23. 许尔特尔致劳滕施拉格尔公函	412
24. 劳滕施拉格尔致德国大使馆南京办事处公函	413
25. 汉口德国大使馆致南京办事处公函	414
26. 罗森致上海四川路 110 号德商孔士洋行函	415
27. 布尔勃里斯先生扬州路 21 号房子的仆人易利兴、赵洪和栾 兴希的报告	416
28. E. 玛尔加蕾特·陈·齐默尔曼太太致沙尔芬贝格信函 ...	417
29. 克勒格尔先生关于中央路 392 号德商孔士洋行房子情况的 陈述	419
30. 罗森致汉口德国大使馆公函	420
31. 罗森致汉口德国大使馆公函	421
32. 劳滕施拉格尔致香港德国总领事馆函	422

12 东京审判书证及苏、意、德文献

33. 罗森随笔·····	423
34. 德商孔士洋行致德国大使馆函·····	424
35. 伯勒尔(伯禄)先生房子的看守人宋其昌给德国大使馆的 报告·····	425
36. 罗森致汉口德国大使馆公函·····	426
37. 罗森致汉口德国大使馆公函·····	427
38. 德国驻东京大使馆诺贝尔致德国上海总领事馆菲舍尔参赞 公函·····	428
39. 罗森致汉口德国大使馆公函·····	429
40. 罗森致西格尔先生等人的公函·····	430
41. 陶德曼致柏林德国外交部公函·····	433
42. 罗森致上海德国总领事馆公函·····	439
43. 许尔特尔随笔·····	440
44. 贝克博士石碑巷 12 号房子的仆人报告 ·····	442
45. 许尔特尔致唐瓦莉·冯·比勒公函·····	443
46. 德国大使馆致日本外务省口头照会·····	444
47. 德商西门子电机厂致德国总领事馆函·····	445
48. 重庆办事处致德国大使馆公函·····	447
49. 许尔特尔致上海广州路 20 号汉堡—美国航线函 ·····	448
50. 德商西门子电机厂致许尔特尔函·····	449
51. 施佩林致埃曼先生函给德国大使馆南京办事处的副本·····	450
52. 保罗·沙尔芬贝格之死·····	452
53. 罗森的受迫害遭遇·····	458
54. 约翰·拉贝 1945 年《柏林日记》·····	469

第一部分 东京审判书证

1. 书证第 204 号

罗伯特·威尔逊宣誓证词(略)

参见本史料集第 7 册第 376—378 页。

2. 书证第 205 号

许传音宣誓证词

本人许传音,哲学博士,目前居住在中国南京市高楼门峨嵋路 7 号。我为以下的事实作证:

本人现年 62 岁,中国人,1917 年获美国伊利诺斯州立大学博士学位。我曾在中国多所大学执教,并在中国交通部任职 25 年,1928 年起在南京安家。

1937 年,日本攻击南京及南京陷落前后,我都在这座城市里。我是国际安全委员会委员,负责难民住房事宜,也是国际救济委员会秘书长;并在南京陷落后的红卍字会任主席。

对于日军攻陷南京以后发生的情况,我是目击者:日军从城南进入;

2 东京审判书证及苏、意、德文献

在日本军队破城后，中国士兵没有作相应的抵抗。进城后一路上，日军看到中国老百姓，便会毫无理由地恣意枪杀。

随后，日军开始按户检查，拿走他们找到的食品和其他东西，并且带走他们认为可以为军队服役的适龄的青壮年男子，把他们和解除武装的士兵捆绑在一起，驱赶着往某地或就地枪杀。我可以确定地说，那些被驱赶带走的男子随后被集体屠杀或烧死了。

日军还坚持他们有搜查安全区的权利，带走许多在那里的男子，就我亲眼所见的一次就带走了1500人。后来我知道这批人被机枪扫射杀死，他们的尸体被扔到了一个水池里，事后红十字会发现了这些尸体并将其重新掩埋。

日军要那些被抓走的人们排好队，向他们训示承诺些什么，但只要被问的人回答不如日本兵的意，或是那个发问的日本士兵认定他是当兵的，那人即被就地枪决，或是和其他人一起被驱赶到某地集体枪杀，而那些认定是毫无根据的。

城市里没有任何抵抗行动。而日军以抓捕交战的士兵为借口，将大量抓走的青壮年男子处死；然后日军便恣意杀害平民百姓，强奸妇女，烧杀掠夺。遭受强暴的有13岁的少女至70多岁的老妇，数以千计的妇女被多次强奸以后，再被日军杀死，她们的躯体往往还要遭受亵渎。作为日军连续在南京和周边地区暴行的一个例子是南京南门新开路7号一家11口的受害经过。

日军到这家敲门，祖父应声来开门，当即被枪杀；他七十多岁的妻子出来想看个究竟，被一枪打死在离她丈夫几步远的身边；他们的女儿怀抱着一个婴儿，日本兵将母子俩都枪杀了。这家有二个未出嫁的女儿，一个17岁，另一个14岁，两人都被日军强奸后杀死：她们一个躺在桌子上的一片血泊中，下身插了一根棍子；另一个则是倒在满是鲜血的床上，下身塞着一个香水瓶。日军在这家还杀害了其他五个女人。这就是说，日本兵将他们在那里看到的十一个人人都杀死了。这家只有一个小孩子躲在屋子邻近过了一天一夜，保住了性命。

类似的暴行在南京沦陷后持续了近三个月，然后奸淫烧杀行为才渐趋停止。

我曾在南京沦陷后第三天驱车通过南京街道，因为日本人就尸体掩埋问题来找过红卍字会，我外出以了解情况。只见路的两边都是死尸，屋里屋外都有；这些尸体表明他们生前是被暴力杀害的，有的尸体还受到侮辱。

红卍字会一共掩埋了4万多具尸体，这些人都是南京陷落前后受害的。除红卍字会外，还有其他好几家慈善机构参与掩埋尸体。此外相当多的死者是由他们的朋友或是他们幸存的亲人掩埋的。

南京沦陷后的第二天，城里已不再有任何的抵抗举动，日本兵便开始有计划地放火，一辆辆军车会开往某一店家，将所有货物运走后，士兵便放火烧了这店铺。住户也是一样，士兵抢掠了财物后便放火烧房子。私人的财产，只要能拿走的都给士兵掠走了。

大约有25万人挤在难民营里。日本士兵不断地闯入骚扰，有时几个人，有时是一群，他们抓走成批年轻姑娘和妇女，她们被带走后，通常先遭受强奸，随后被杀害。

全市有25个难民营，外国公民人手不够，无法照顾所有难民营的人。因此更为残忍的暴行常在那些远离大学或传教士居所的难民营里发生。

我协助马吉先生拍摄了一些照片，据我所知，这些照片由费吴生带出了南京。

据我最乐观的估计，在南京沦陷前后，在所有的抵抗完全停止以后，被杀害的人数不会少于20万。至于被强奸的妇女或女孩，受伤的人数，被日军破坏或焚毁的房屋及被日本士兵掳掠的财物的数量和价值则是难以计算。

向日本军事当局及日本领事馆的投诉不仅受到冷遇，甚至在我们去送投诉状时，被粗暴地赶了出来，他们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制止这些暴行。日军绝不能有任何借口和理由制造这些罪行，而这样的暴行竟延续了三个月之久，才慢慢平息。

在日军占领期间，他们还尽其所能来伤害中国的道德文化。他们鼓励赌博、嫖娼、公开出售鸦片和麻醉品，并将社会上最不齿的分子扶持到统治老百姓的位置上。

4 东京判决书证及苏、意、德文献

日军恣意焚烧和破坏教育机构、教堂、宗教团体的房产,基督教男青年会 YMCA 的楼房、俄国公使馆以及南京的许多名人府邸均遭破坏。

日本人还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掠夺中国的货物和原材料。它垄断了所有的商业企业,千方百计扶植日本人或与日本人合作的企业,不容许中国人自己做生意。这种情况在一些小城市里更为突出。

日军每到一处,不论是城镇或是乡村,都实施同样的烧杀奸淫掠夺。在一些没有国际组织出面阻止这些行为保护中国老百姓的小地方,情况更加糟糕,这就是他们的战争模式,南京只不过是一个例子而已。就我所知,在江西省,在我老家安徽省的贵池情况都是一样的。

日本人和他们的傀儡组织开设大烟馆,允许公开买卖鸦片和麻醉品。

日本人还用恐吓对中国人进行心理战,摧毁他们原本认为美好和神圣的东西。即便是一个小孩子写了一些反对日本的话,全家便要因此承担责任,甚至处死。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由于有人被控对日本人不满意,整个村落完全被毁,村民被杀;离南京不远长江北边的一个叫天王树(Tian Wang Shu)的村子便是一例。

中国人不论在哪个地方看到一个日本兵,就必须向他弯腰鞠躬,如果日本兵认为他们行的礼不到位,他们马上会受到严厉惩罚,甚至被杀。

我愿对以上陈述签名盖章。1946 年 4 月 6 日 许传音(盖章)

以上证词由许传音当面向我陈述,然后由他写成书面材料并于 1946 年 4 月 6 日在南京当着我的面签名。

东京国际起诉部助理检察官 萨顿(David Nelson Sutton)

许传音首先起誓,于 1946 年 4 月 6 日提供上述陈述作为宣誓证词,并以其知识和信仰保证所述事实真实可信。

我愿签名证实此事,1946 年 6 月 19 日。

J. A. C. D. 少校 休谟

(谈礼英 译)

3. 书证第 206 号

尚德义宣誓证词

尚德义，城西升州路彩霞街进去住五间厅第六号。

(年龄)，三十二岁；(籍贯)，南京人；(职业)，广货——百货

事由 予于民国二十六年，住上海路华新巷 1 号(属难民区)，十二月十六日约十一时许(上午)，余弟兄三人(大哥名德仁，原在嘉兴航空站任秘书，堂兄德金，业绸缎)与同院不知姓名者五人，被日兵(似中岛部队)拘捕，以一绳将二人之手缚在一起，绑赴下关江边，在彼坐候一小时许，共集有平民(男子)千余人，约隔四五十码处，置机枪十余架，面对我等。不久，有日本军官乘汽车而至发令，下午四时许开始屠杀，开枪以前，令所有平民起立，余立即扑地，枪声起处，尸体盖满余身，余当时昏厥，晚九时许，始由尸推[堆]中爬出逃回住宅。

尚德义 卅五年四月七日

战地服务团南京第七所 涂莹光 笔录

卅五年四月七日正午十二时

以上笔录由涂莹光君根据尚德义所述事实作成，曾向尚德义郎[朗]读并解释一过，经承认与原意无讹。

袁劭恒

(张生 据原档抄录)

4. 书证第 207 号

伍长德宣誓证词

余,伍长德,兹证明如下:

余年三十八岁,系中国南京城内一粮食商人,民国廿六年十二月间,我任南京市警察,我从未当过兵。南京城沦陷后,我与三百许警察同住司法院。我们均去武装,盖武器已交与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司法院是时系一难民收容所,院内除我们警察外,尚有许多平民在内。民国廿六年十二月十五日,日军至司法院命令我们跟他们走,当时有二个国际委员会委员告诉日军,我们并非正式军人,日军置之不理,将该二委员逐走,令我们进向南京城西门。到达后,日军令我们于城门内坐下,日军遂将机枪置于城门外,门边有城河,河岸颇峻,门外有一桥跨过城河,但并非正对城门。日军以刺刀每次将约一百许人一群,驱出城外,以机枪扫射,尸身大多滚入城河,未被机枪扫死者,则以刺刀戳死,在我们前面,有十六群、每群约一百许人被日军驱至城外以机枪扫死。

当我一群一百许人被日军驱至城外时,我即向外狂奔,在机枪扫射时,我即躺倒于地,但我并未被射中,一日兵以刺刀在我背后猛戳一刀,我当即躺下乔装业被刺死。日军后以汽油浇于尸体上纵火焚烧,乃行离去。是时天刚开始黑暗,尸身多处均有,我幸未被浇着汽油,我见日兵离去后,即从死尸堆爬出,爬到一附近空屋,在屋中住了十天,该处附近有人每天送些粥给我吃,十日后我即进城到鼓楼医院,有一魏可逊医师医治我,我在该院住了五十多天,离院后,我即回故乡,在江苏北部。在上述三屠杀中,约有二千人(包括平民和警察)被杀死。

以上所述均系事实,余作此文并签字。

伍长德

卅五年六月十八日

兹证明

上述结文系在我等前为之

刘继盛

徐节俊

国际检察局调查部 少尉

乔·E. 亚历山大

(张生 据原档抄录)

5. 书证第 208 号

陈福宝宣誓证词

陈福宝，南京白下路东井巷 22 号。

十二月十四日，即日军占领南京之第二日，日军从难民区捕去三十九人，皆系平民。将彼等加以查察，凡额上有帽印，或手上有因拿枪而生硬块者，皆带至一池塘之对面，将余与另一人置于塘之这边，那边的人全被日军用轻机关枪击毙。余目见此事被害者多为平民，余住于南京，认得好几位确是南京之平民。余特别认识一人，是南京的警察。是时，余十八岁，见此种尸体皆投于塘中，日兵曾命余投尸于塘。此种尸体，至四个月后始为红卍字会掩埋，此事发生于晨间，在美国大使馆附近。

本件曾由中国陆军上校译出告余，甚为正确，同日下午余见三日人在一学校内当余强奸一十六岁之哑女。

十二月十六日，余又被日兵拘捕，并拘得大批年轻人，日兵将彼等聚集成群，与之角力。凡日兵不能取胜之人，则用刺刀刺死，余目见一人因此被杀。同日下午，余被解至太平路，见三日兵放火焚烧二屋。一为旅馆，一为木器店。放火日兵之姓名为向井部队桑田队的马屋原伍长和村上伍长。

余尚见另一日兵强奸案件，被奸者为一孕妇，丈夫是摄影师。此案发生于日军攻入南京之第三日，是在白天，余与此妇同住一屋，一日兵进来后赶出屋中四个男人，包括其丈夫在内。并拖此妇同入一室，将门关闭，余在邻室得见，十分钟后日兵始去，妇人同时哭而离室。

（张生 据原档抄录）

6. 书证第 250 号

梁廷芳宣誓证词

余平在救护队服务，当国军自上海撤至南京时形势紧急，余等奉令留驻南京保护伤兵，未几南京陷落，余等因日军野蛮对于红十字会并不保护，乃换衣改装避于难民营中。同月十六日，日军至难民营命令余等齐向下关江边出发。营中人数据余估计不下五千人，四人一排由日军监督行走，队伍长约四分之三哩。到达下关后，日军命令我等在江边附近排队站立，队伍四周由日军架置机枪防守。日军更置备绳索二车，将所有华人五人一组，两手反背，分批以绳捆绑，余亲见日兵以步枪向已捆绑之华人扫射，继又将其推入江中。当时在场行凶之日官兵不下八百人，其中数人系乘汽车而来。余友在余等共站于江边行将被缚时谓余曰：“与其被日寇机枪扫死，何若投河自尽。”

余等于傍晚五时自难民营出发，七时到达下关江边，日军即开始捆绑扫射屠杀华人，直至深晚二时方毕。时明月当空，余乃目击日寇所为，且余之手表当时亦戴在手上。

余友及余于日寇连续枪杀四小时后决定出逃，晚十一时许，余友与余乘日寇不留意时，向江边狂奔，跳入水中，日军见此即以机枪向余等扫射，幸未被命中。江边岸壁峻峭，水仅及腰，余等躲于壁后为黑影所遮，未被日军发见。惟日军仍以机枪向江边扫射，余臂部被打中一枪，日军枪杀华人至凌晨二时方毕。余以臂部创口出血过多，昏觉[厥]不省人事，至晨醒来，余友已不在，彼事后告我彼当时认为我已被击身死。于是我爬至江边躲于附近一茅屋中，时在晨二时后惟在日出前。余居于该茅屋中历三日无食无水，后一日兵来焚烧余所居住茅屋，余不得已爬至屋外。日兵见我即加盘问，余诿称系一苦力佣于日军营中搬运重物，该日兵并未问我臂部创口，仅给我派司一纸命我回去。

当日军在难民营命令难民排队出发时，数美国人企图阻止，惟日军令其走开不许过问。

10 东京审判书证及苏、意、德文献

当时站立河边之华人中亦有跳江图逃者,惟日军即向其射击,余不知彼等是否脱逃成功。据余所知,仅余友及余二人庆获生还。当日军以机枪扫射站立河边华人时,有一青年大呼“中华民国万岁”,此外未闻有他仅枪声而已。

余此后即往自由区,余曾再被捉一次,余于民国三十七年六月到达自由区。

余所述证言由杜[涂]上校翻译,以上所述,皆系事实。

梁廷芳

一九四六年四月七日于南京

(张生 据原档抄录)

7. 书证第 251 号

多田骏宣誓证词

1937 年 8 月到 1938 年 12 月,我是日本军队的一名将军,在东京担任参谋次长。因此,我制订了日本武装力量的战役计划,包括 1937 年 11 月 12 日占领上海,最终导致 1937 年 12 月 13 日占领南京的那场战役,和 1938 年 10 月 27 日占领汉口的那场战役。占领上海的计划是在上海事件发生时制定的,在上海战役进行的过程中又制定了占领南京的计划,占领汉口的计划是在 1938 年 6 月或 7 月制订的。

多田骏

见证人

托马斯·H. 莫罗

1946 年 6 月

(张生 译)

8. 书证第 255 号 讯问武藤章(略)

参见本史料集第 7 册第 235—280 页。

9. 书证第 256 号 讯问畑俊六

日期和时间:1946 年 1 月 14 日,15:45—17:00

地点:日本东京巢鸭监狱

出席者:畑俊六元帅

卡利尔·W. 希金斯(Carliale W. Higgins), 讯问者

莫罗上校(Col. Thos. H. Morrow), 讯问者

丹尼斯·基尔多亚尔(Denis Kildoye), 翻译

克莱尔·法瑞尔(Claire Ferrell), 书记员

希金纳首讯

问:告诉元帅,国际检察处希金斯先生和莫罗上校此时在这里,如果他不介意,愿意回答问题的话,他们愿和他谈谈。

答:他说好的。

问:元帅现在的年龄是?

答:今年 7 月他将是 67 岁。

问:元帅是否在军事院校学习过?

答:他毕业于士官学校,以后又进入陆军炮兵和工程学院;还有陆军

大学。

问：他的服役部门在哪里？

答：他不是专业人员，他在炮兵部门，但不是专门从事哪一项。

问：他在什么时候开始作为日本帝国军官的？

答：1901 年作为陆军少尉。

问：他在军队里有哪些职务？

答：他曾是第 16 野战炮联队司令——他记不得具体日期。是地震的前一年——一定是 1922 年。1926 年他是第四工兵旅团长。

问：元帅在本土有什么职务？

答：1936—1937，他是台湾军司令官，1938 年他是华中派遣军总司令官。

问：1938 年 2 月 17 日他有没有接受任命？

答：是的。他成为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

问：他是去接替松井石根大将的吗？

答：他接替松井将军在中国中部的职务。尔后他又接替西尾（寿造）将军成为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

问：西尾大将的司令部在哪？

答：在南京。

问：松井大将的司令部呢？

答：先在上海，后迁至南京。

问：作为司令官，元帅在什么时候到达中国的？

答：1938 年。

问：他第一次到中国本土的时候是什么职务？

答：1937 年 8 月他回国后被任命为教育总监；1938 年他又去了中国。中国事变的时候，他在台湾。

问：他是否从台湾直接到中国任职的？

答：不是。他回到了东京。那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战事，他是回到东京成为总监的。那时在中国发生的冲突还是很小的。

问：他第一次去中国的时候有多少军队受他指挥？

答：他第一次去中国的时候有 5 个师团受他指挥。

14 东京审判书证及苏、意、德文献

问：是不是 80 000 人左右？

答：他记不得了。但他认为还要多一些，因为有些部门也附属在他的部队——譬如补给部。

问：这些军队人员来自日本本岛，还是其他地方的，如台湾和朝鲜，或两者均有？

答：他们都来自日本本土。他指挥的师有第三、第六、第九等师团，以及第 13、18 预备役师团。他们都是从日本本岛来的。

问：当元帅接受职务时，这些军队已经在中国了，还是从日本调遣过来的？

答：他们原是松井大将的属下，他是接收过来。

问：元帅是否知道让他去接替松井？

答：是的，他说松井派遣军的目的随着南京的陷落已经完成。他受派遣的主要任务是对这些占领的地方进行安抚。给他的指令是南京——不要脱离上海、南京、福州这个三角地带，他是被要求去绥靖这个地区——如果他认为要离开这个三角地带，他应该先得到大本营的命令。

问：他有没有得到过大本营离开这个三角地带的命令？

答：没有。他去了杭州。

问：这是否在大本营不得离开这个三角地带的命令之后呢？

答：不，是大本营的命令要他离开这个三角地带地区的。

问：离开这个三角地带给他的军事任务是什么？

答：指令给他的任务是占领杭州。

问：当他接受这项任务的时候，他有多少军队？

答：他说，杭州战役的作战部队来自北方，大约有 4—5 个师团。

问：谁是部队的指挥？

答：是受他指挥。

问：在他之前，谁是实际的指挥官？

答：HEIGSHI-KUNI 亲王。另外还有一支部队是冈村将军指挥的，是从扬子江上游下来的。这些都归他指挥。

问：这两支部队之前都是从南方开始的，他们总部在那里吗？

答：它们并不固定在某一地方，而是随着前进而变动的。

问：从北方来的军队兵力有多少？

答：他认为是 300 000 至 400 000。他不能肯定，这是从记忆中推断的。

问：在你向杭州推进的时候中国军队总司令反对你吗？

答：他想一定是蒋介石本人。

问：从他一开始发动战事到杭州陷落一共是多少时间？

答：5 个月。

问：在杭州战役中他的部队有多少兵力涉及其中，包括他在三角地区的军队以及从北方来的兵力？

答：在三角地区的兵力全部出动之后，又有 2—3 个师团补充进来，所以这地区应该有 11 至 12 个师团的兵力。

问：每个师的兵力是多少？

答：他想是 15 000—16 000 人。

问：这些都是有经验的兵士还是新招募的？

答：他们都是有经验的士兵，有 4 个师团是新近招募的，其他都是有作战经验的。

问：当然，根据日本的招募规定，新的士兵也受过训练了。

答：是的。

问：元帅估计在这五个月作战中人员的损失有多少——就是伤亡数字？

答：他说有很多，但他不知道，即便他作一个猜测，那也不可靠。伤亡数字并不太多，但因病死亡的不少。

问：我想要一个战争中伤亡数字，有多少？

答：这已经过去很多年了，他记不得了。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他知道了，但他记得在他当了中华派遣军总司令官以后的数字。

问：他当总司令官有多久？

答：十个月，从 1938 年 2 月至 11 月。

问：他在位期间日本军队的伤亡数字是多少？

答：刚才有一点小错误，从 1938 年 2 月至 11 月他是中华派遣军的指

挥,他作为总司令官是1941年至1944年。

问:直至11月左右伤亡数字是多少?

答:他记不得那么多。他记得1941—1944年的数字,但是忘了早些时候的数字了。在1941—1944年间,在中国死亡的日军为50 000人。

问:按一般的比率估计,是否可以说,伤者达200 000人?

答:他计算是大约200 000人。他提到1:5的比率——其他则死于疾病——但他不记得具体数字了。

问:杭州陷落是哪一天?

答:他想是1938年10月25日。

问:元帅难道不记得那次战役他的军队的损失了吗?

答:他可以猜想,但这数字只是随便想出来的。

问:元帅能否估计从他离开原来那个三角地带至他占领杭州期间中国军队的损失吗?

答:不,他不知道。

问:他的军队抓捕了多少中国士兵?有多少战俘?

答:他认为不多。他并不在意俘虏的数字。他认为他们中的许多人在战场上便逃跑了。

莫罗上校提问

问:请问一下元帅,将他放在松井大将的位置上,是否是大本营的安排?

答:是的。

问:当时谁是大本营统帅?

答:KAN-IN亲王。

问:是书面的命令吗?

答:命令实际上是来自天皇,因为是天皇将命令发给了大本营,所以实际上是天皇的命令。

问:当他从松井大将接过来的时候,军队的纪律如何?

答:那时是在南京事变之后,比较马虎一些。

问:他的意思是不好?

答：他认为不好。他接收过来以后，下决心要改善军纪。

问：松井大将卸任后去了哪里？

答：他回到了后备役——不是现役。

问：松井大将的卸任是否因为他的军队在占领南京后，军纪差的缘故？

答：也许有此原因，但是战役的目的已经完成——攻占南京。

问：那么，他被派往那里去整治军纪的，是吗？

答：不，这不是唯一的原因。刚才他已指出是原战役的任务已经完成。

问：那么是原因之一了？

答：是的，他尽了最大的努力来改善军纪。

问：当时大本营决定必须要调任司令官以改善军队的行为，是吗？

答：是的。

问：他当时认为这是对华的战争，还是仅仅是前线的冲突而已？

答：虽然事实上这是一场战争，而他们都认为是“中国事变”。事实上是战争。

问：成千上万的人死亡或受伤；大炮、空军、陆军都用上了；他攻打占领城镇，这就是你们在战争中干的事。你告诉他。

答：他们的看法是遵照来自大本营的说法，对于他们占领三角地带，他们从不称之为占领，而是军队在那驻扎。这是大本营的命令。

问：是他命令占领杭州的？

答：是的。

问：根据大本营的命令？

答：是的。

问：是文字的吗？

答：是的。

问：他是否知道命令从哪儿发出的？

答：他想是从大本营发出的。他先是收到一个电报命令，随后是正式的书面命令。

问：我的理解是元帅从未发起过进攻或侵略的战事，如果他没有得到大本营的命令的话？

18 东京审判书证及苏、意、德文献

答：他不可以这样做。他离开那三角地带是因为他收到了来自大本营的命令才可以这样的。

问：当他受命的时候，他有没有听到过，日本军占领南京以后，把妇女送到妓院，将男青年用绳子绑在一起，一群一群地枪杀，外国侨民强烈投诉，这也是松井大将卸任的原由，他知道吗？

答：他本人也听到了这些暴行，他以为大本营决定更换司令召回松井，部分也是这些暴行的结果。

问：那么，他们在攻下南京以后干的事，不是大本营让他们干的吗？

答：他以为不是的。这不可能是大本营的命令。

问：当这样的事发生后，根据军法，军队的指挥官是否要负责任？

答：是的，依照日本的想法，他负有责任。

问：元帅在陆大期间，他学习过国际法吗？

答：是的，在陆大时。

问：元帅是否知道日本过去曾有条约，承诺不侵略中国和不向中国开战吗——例如 1922 和 1928 年的？

答：条约的名称是什么？

问：九国公约。

答：是的，他知道。

问：这样，他认为他们是在破坏条约吗？

答：他知道有这个条约，但他不知道其中的条款，而且看来也没有其他方法可以解决。在别无他法的情况下，只能诉诸武力了。

问：有没有想到条约说，在没有努力取得和平之前，是不可以使用武力的？

答：他对九国条约不甚熟悉，仅仅知道有这么一个条约而已。

希金纳讯问

问：元帅在日本投降时，军中如果还有职务的话，是什么职衔？

答：第二军总司令官。

问：司令部在哪？

答：广岛。在原子弹袭击的时候他正好在那里，他的头部至今尚未

康复。

问：元帅在离开中国战场的时候，他把军队的记录留在哪里了？

答：都在中国。

问：元帅的部队在占领三角地带期间，民法是否被替代了，而他，作为受日本军法所制约的司令官，军法是否不仅是针对军队，同时也适用于平民百姓？

答：他说，一般来说，法律在中国人手里。

问：“一般来说”意味什么？

答：任何和军事无关的事。

问：元帅是否监督中国的法庭，是否有权干预或取消民事法庭的判决？

答：不，他没有权力这样做。军法只是适用于日本军队，但军事规定则适用于日本公民，或是冒犯了军队的中国人。

问：松井的卸任是由于对他所管辖的军队的投诉，元帅当然去查看过在松井期间的军事法庭执行的有多少案例。

答：不，他没有去看那些档案。

问：元帅接替职务时知道那些投诉，他为什么不去看那些档案呢？

答：他认为这些事已经结束，所以他没有那样做。事情都发生在 12 月，而他是 2 月份到那里的。他想他可以认为事情已经过去。

翻译声明

本人丹尼斯·基尔多亚尔在此宣誓，我真实地翻译了从英文到日文，从日文至英文的讯问和回答，而以上包含 9 页的问答我认为最佳和最确切的译文。

签名

1946 年 1 月 15 日

（译注：以上文字都是用第三人称，是翻译和讯问者的对话。）

（谈礼英 译）

10. 书证第 257 号

讯问松井石根

日期和时间:1946 年 3 月 8 日 13:30—16:15

地点:日本东京巢鸭监狱

出席者:松井石根

审讯人:托马斯·莫罗上校(Thomas H. Morrow)

翻译:丹尼斯·基尔多亚尔先生(Denis Kildoyle)

记录员:利昂娜·P. 科伯利小姐(Leona P. Coberley)

由莫罗上校提问

问:如果你确实听说过,那么你什么时候是第一次听说,欧洲和美国人认为你的军队在南京犯下了许多暴行?

答:几乎刚一进入南京。

问:你听说了吗?

答:是的。

问:你从什么渠道听说的?

答:从日本外交官那儿。

问:这位日本外交官是谁?

答:一个职位很低的外交官员,我不记得他的名字了,是一位驻南京的领事。

问:那么我是否可以认为,当日本军队向南京城挺进的时候,日本领事已在城中?

答:他们是随日本军队进城的。他们被配备在部队里以参加维持和平的工作。

问:有一本《远东现代史》,作者是文莱克(Vinacke)。他写道,中国居民被用长绳成串地捆绑在一起,并遭机枪扫射,妇女们则被带到妓院供日本士兵玩乐,许多市民在南京被刺杀。你知道这位历史学家是从哪

儿得到这些信息的？

答：我不知道。可能是从中国人那儿。

问：你进南京城的时候是否听说过诸如此类的传闻？

答：没有。

问：我手头的资料表明，你曾公开发表过公然藐视外国政府的讲话。我现在不想指出具体内容，不过你能做出解释吗？

答：我从来都不拒绝调停和藐视外国政府，事实上，我在南京和上海与美国、英国和法国的外交官和领事们合作帮助中国人（建立）难民营。一个从事此项工作的法国传教士求助于我，我捐献了一万日元支持他的工作。

问：你还记得他的名字吗？

答：我现在不记得了，但是我将努力去回忆。

问：那是在 1932 年还是在 1937 年？

答：1937 年。

问：还有一种说法：你因为南京的局势而被解职，畑（俊六）元帅在 2 月份接替了你。是这样吗？

答：不是这个原因。我认为我在南京的使命已结束，我希望脱下军装从事和平工作。

问：我是否可以这样理解，你刚才说的捐献了一万日元给法国传教士，这笔钱是来自你个人的资金，还是日本军队，还是日本民众（包括你自己）？

答：是军饷。

问：这笔钱是用来帮助上海周围收容中国人的难民营的吗？

答：是的。

问：我是否可以认为你在 1938 年被解除了职务？

答：可以。但这是应我的请求。

问：这一请求是向参谋总长提出的吗？

答：是向陆相杉山（Sugiyama）将军提出的。

问：是以书面形式吗？

答：通过写信。

问:是以私人名义还是以公函?

答:各占一半。

问:阿本德(Abend)说,在你被解职的同时,桥本欣五郎(Kingoro Hashimoto)和朝香宫(Prince Asaka),以及约80名官员被送回日本。你还记得吗?是否正确?

答:是的。不过阿本德先生在推论上有错误。遣返2名官员和80名参谋官员的原因是,在南京的10个师团被削减为5个师团,由此带来了人员的富余。两个司令部被削减为了一个。

问:我知道有一支来自北方来的军队,接着有一支曾在上海的军队,加入到你的部队里。是这样吗?

答:这是在我回到了日本之后。

问:我知道在上海战役和占领南京的过程中有一些部队,例如,第6师团,由谷寿夫统率,隶属北方来的第10军中。是吗?

答:它来自上海。

问:据我所知,第6师团在你到南京之前就加入了你的部队,第10军也是吗?

答:是的。

问:有指控说,占领南京的部队纪律很差。

答:我认为纪律是很好的,但是行为举止不好。

问:是指士兵吗?

答:是的。

问:是在南京吗?

答:是的。我觉得部队中有一些违法分子。

问:那么我可以认为,你将士兵在军事行动过程中的服从命令与士兵在执行任务之外的所作所为区别开来,具体地说,是将日军占领南京和占领南京后的表现加以区别,是吗?

答:是的。

问:那么,南京部队的指挥官理所当然地应对他们士兵行为负有监督之职责,这包括在执行任务中和执行任务后,是吗?

答:是的。

问：为什么你说你认为日本士兵的行为举止不好呢？你的理由是什么？

答：是基于他们对中国人的行为举止。

问：在占领南京之前你的司令部是否发布过命令？尤其是有预见性地规范士兵占领南京后行为的命令。

答：我一向主张严守铁的纪律和严惩邪恶之徒。在整个南京事件的调查过程中，在与外国官员和外交官的合作中，我也是这么主张的，而且也是这样做的。

问：你能提供给我那些从事事件调查的外国外交官的名字吗？

答：一个是日本大使馆的日高(Hidaka)先生。我不记得当时在南京的外国外交官的名字了。

问：你本人是否曾与这些外国外交官谈过话？

答：没有。不是在南京。

问：之后你是否与其中某些人交谈过？

答：我17日进入南京城，一周后返回上海。我会晤了美国、英国的指挥官和海军将领以及意大利、法国的大使，就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事端与他们进行了讨论。

问：这些人当中有海军上将雅内尔(Yarnell)吗？

答：是的，我会晤了他两次。还有英国海军上将。我记不起他的名字了。

问：除了巴纳号(Panay)外，你和海军上将雅内尔还谈了些什么？

答：美国人因为敌对行动遭受了极大的损失，我得知了海军上将雅内尔对这一事件的看法。我希望能圆满地解决这一问题，并使各方满意。

问：在12月13、14、15、16日是否有军队进城？进城的是新部队还是老兵？他们是由有经验的军官指挥呢，还是相反？

答：他们都是由有经验的军官指挥的训练有素的部队。

问：在这之前你是否指挥过这些部队？

答：没有。

问：在此之前你是否曾听说过这些部队平时行为不检点的情况？

答:没有。这支部队是在日本新组建后来华的,当然包括了许多有经验的老兵。我从没有听过这些军队在中国的其他地方有劣迹。

问:是否在满洲也没有?

答:是的。

问:这些军队中的一些人曾经参加过上海战役,其中那些从北方来的则经历过平津周围的一些小冲突。是吗?

答:有一个师团来自于平津地区。

问:据称,朝香宫中将是一个战地指挥官,他本应该督察那些首批进城的部队。对吗?

答:是的。

问:朝香宫娶了明治天皇的一个女儿,是吗?

答:是的。

问:有人称朝香宫应对南京发生的事情负极大的责任,但是因为他与天皇王室的关系,很少有人,或根本没人追究这点。是吗?

答:我不这样认为。在这支部队进城前 10 天朝香宫才加入这支部队,他和这支部队的联系时间很短。我认为他不应负责。我要说的是,倒是那些师团指挥官们应对此负责。

问:这些师团指挥官指何人?

答:朝香宫的部队包括了藤田(Fujita)中将麾下的第 3 师团、吉住(Yoshizumi)中将麾下的第 9 师团、山室(Yamamuro)中将麾下的第 11 师团和中岛(Nakashima)中将麾下的第 16 师团。柳川(Yanagawa)中将指挥的第 10 军包括了谷寿夫中将麾下的第 6 师团。还有第 14 师团和 106 师团,但他们没有进南京城。

问:朝香宫指挥的军队名称是什么?

答:上海派遣军。

问:第 10 军加入的正是这支部队,是吗?

答:是的。

问:你提及的这些将军中除柳川中将外,还有谁死了?

答:中岛中将也死了。其他人都活着。

问:你知道,除谷寿夫以外,其他人现在都在哪儿?

答:我不敢确定在哪儿,但是我相信他们在东京或大阪的某个地方。

问:除谷寿夫以外,还有人在监狱中吗?

答:没有。

问:你说过你在17日进入南京城。你看到了死去的市民,包括妇女儿童的尸体吗?或其他诸如此类的事情?

答:那时,尸体已经都被清理走了。我只在西门看到了一些中国士兵的尸体。

问:中国的战争罪行委员会称,13日南京城被占领后,几十万居民被杀,南京城被焚烧、掠夺。除了你陈述南京在被占领时(居民)受到虐待外,还有其他证据吗?

答:这完全不属实。如此指控毫无事实根据。我敢以我的名誉担保。

问:在此之前,你是否听说过朝香宫被指控让手下在南京城放纵自己?

答: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我不相信有这样的事。

问:占领南京后,你什么时候首次见到哈立特·阿本德?

答:我在中国见到他的。我首次见到他是在,可能是在占领南京的一个月后。

问:是阿本德要求会见的吗?

答:不是的。是我请求阿本德先生来看我的。因为我已听到谣言,我希望通过向阿本德先生阐述事实来平息谣言。

问:你和阿本德先生都谈了些什么?结果怎样?

答:我向阿本德先生解释了我对外国人在南京的权利和利益的看法。也表达了我们不会对中立国财产和利益造成损害的愿望。同时我也表示,我希望寻求和平,希望与那些放弃战斗的中国军队发展友谊,但是惩罚那些继续抵抗的中国军队仍是我的职责。

问:阿本德先生是否向你转达了他在南京听到的谣言,并告诉你对日本军队在那里表现的指控呢?

答:他只字未提日本军队的事。也许他知道那些是谣言,但是我们在会谈中没有涉及。

问:那么我可否认为阿本德先生没有对你讲到朝香宫?

答:没有。

问:那么你不知道阿本德是从何处得到朝香宫应对日本军队在南京的表现负极大的责任,但是因为朝香宫与王室的特殊关系而从未被点明的信息?

答:我不知道他从哪里得到这个信息的。

问:朝香宫现在在哪里?

答:在东京。

问:现在,就问一句关于桥本大佐(Hashimoto)的问题。你记得在南京战役中桥本指挥的是第10军的重炮兵联队?是这样的吗?

答:他是第10军的重炮兵联队的指挥官。

问:你记得12月14、15、16日这些军队(桥本的)在哪里吗?

答:我想他在南京和芜湖之间。

问: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在占领南京城和17日你进城之间,桥本的部队应在离南京约20至25英里的地方。对吗?

答:是的。他们从未进入南京城。

问:你是否曾经听说过桥本的部队在占领南京城时表现不佳?

答:他们从来没有进过南京城,这不可能。

问:还有一种说法是,南京城被占领后,大量的鸦片和海洛因被走私进南京城,用以腐蚀市民。你曾经听说过这样的指控吗?你是如何知道的?

答:我从未听说。

问:还有一种说法是,那时日本人禁止用船运大米入南京城。你听说过这样的指控吗?

答:事实上,大批中国难民吃的都是从日本和南京^①运去的大米。

问:是由军队来实施的吗?

答:是的。

问:奉你的命令吗?

① 原文如此。

答:是的。

问:你2月份回日本后,是否曾被要求提交你的军队在南京城的表现的报告?是参谋总长要求的呢?还是陆相要求的呢?还是其他的什么人?

答:我一回到东京就被编入了预备役,所以不知道确切情况。但是应该有调查报告。

问:你是否被要求提交报告或被询问有关日本军队在南京表现的谣言?

答:没有,我没被要求写报告。如果有任何这样的事件发生的话,即使不被要求,我也会理所当然地递交报告。如果你们要寻找报告的话,它们可能会在复员局(the Demobilization Bureau)。

问:川部将军(Kawabe)告诉我,它们都被烧毁了。

答:肯定会留下些什么的。

问:你想它们会在哪儿呢?

答:如果它们被留下来的话,一定在复员局。

问:我这么问的原因是,川部将军说陆相曾发布过这样的命令,而该大臣正好在天皇签署投降书后,大约在8月15或是16日之后不久即自杀。你是否知道我能从何处得到我想知道的文件资料。

答:我曾请求陆相让我拥有某些文件,但是我被告知,官方的绝大部分文件都被处理掉了,但是私人手上的文件还是可以得到的,我被告知如果可能的话我可以得到这些文件,它们现在被收藏和保管在复员局。

问:你什么时候被告知的?

答:我刚被通知认定为战犯的那一刻。

问:那么当然是在今年深秋或冬季的某个时候吧?

答:是在12月。

问:你是否有文件、通信或日记能表明1936—1937年间你在南京和上海活动的情况?

答:我日记中的唯一记载是1名军官和3名士兵因在南京强奸和掠夺,被军事法庭审判。

问:那天是多少号?法庭的判决是什么?

答：我想军官被处决了，士兵被监禁了。这是我倡导严惩罪犯的结果。当我到上海时我得知了此消息并把它记入了日记。

问：我想你能提供给我们一份吗？为我们找到它？

答：我的所有资料包括这份日记都被烧毁了。但是我有一些根据记忆所写的笔记，因为我认为一旦我被审判它们可能会有用。我的房子在一次空袭中被炸毁了。

问：是什么时候？

答：8月26日。

问：有另一种说法是，你在2月份被解职和召回日本是因为你和英国人结怨。是这样吗？你曾经得罪了英国人吗？

答：我听说过此谣言，但这不是真的。

问：你是否曾与英国陆军上将、海军上将或外交官发生过争执？

答：有过一个小分歧，但和平解决了。我在午餐时见到了这个英国人，并得到了这位海军上将的照片。我觉得当我2月份回日本时我的使命就结束了。

问：我是否可以理解为，当畑元帅接替你的职务的时候，他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确保对长三角地带（南京、上海、苏州）的占领。

答：是的，事实上是这样。不过，畑元帅的部队还和沿京浦线南下的驻扎在苏州的寺内将军（Terauchi）的部队保持着联系。

问：当你1937^①年2月离开的时候，你的指挥部在哪里？

答：在上海。

问：你是否听说过，当畑元帅接替你的指挥权时候，他对上海远征军的纪律很头痛？

答：我觉得不正确。因为战役已经做过总结，犯罪者已经被惩罚。

问：你是否听说过，畑元帅接替你指挥权以后，他的手下仍有不当举止吗？

答：没有。

问：你是否听说过，畑元帅的部队1938年在华犯下暴行吗？

① 原文如此，但显然应为1938年。

答：没有，我从来没听说过。

问：追溯到 1932 年，据我所知，你是第一次淞沪停战协定签署前发生在上海战斗的指挥官之一。是这样吗？

答：我不在那儿。那时是白川将军指挥的。我只是在前往日内瓦的途中经过上海。

问：当时你是第 11 师的指挥官，1932 年你不是与这个师团一起在上海吗？

答：我被委派为谈判代表后，广渡中将(Koto)解除了我第 11 师团指挥官职务。

问：那时该师在上海吗？

答：在。

问：南京事件是我最关心的问题，如果你愿意的话，我想知道除了你已提供给我的名单外，还有哪些人我应该与他们交谈以便描绘出在南京所发生的事情？

答：我认为师团指挥官们是最能讲述出细节的人。我也认为应该与那些当时在南京和上海的外交官们联系。我前面已经提供了日高先生的名字，我建议还有一个人应该找一下，他叫冈崎(Okazaki)，现在外交部工作。

问：这些人都在东京吗？

答：冈崎先生现在东京。日高先生是驻罗马大使，现在应该在回日本的路上。

问：这方面你还有什么进一步的建议？你知道这些师团指挥官的地址吗？

答：知道一些，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已死了。我建议与饭沼(Iinuma)中将联系，他是朝香宫的参谋长。我想复员局可以提供他的地址。我知道他住在立川(Tachikawa)机场附近。他名字叫守(Mamoru)。

问：你们上海远征军的参谋长是谁？

答：是饭沼将军。我的参谋长死了。他的名字叫塚田(Tsukada)。他死于安庆的一次飞机事故。

问：你觉得《伦敦时报》的弗雷泽先生(Mr Frazier)能告诉一些关于

南京事件的情况吗？后来你和他谈过话是吗？

答：我们见面时，他和阿本德先生在一起。

问：那么我可以理解为，你与阿本德先生会谈时，弗雷泽在场。你是与他们两人一起交谈的。

答：是的。

问：那是在 1938 年 1 月，在上海吗？

答：是的。在 1 月或 2 月。会见时的翻译是我昨天向你提及的在外交部工作的冈崎先生。

问：你认为是否值得与雅内尔海军上将交谈以获得他对当时局势的看法呢？

答：我想与雅内尔海军上将联系是个非常好的主意。

问：了解南京的情况以及你对他所说的有关巴纳号和瓢虫号（the Ladybird）的情况？

答：是的，还有那位英国海军上将，但我不记得他的名字了。

问：是那位负责在中国江河里行动的炮舰的海军上将吗？

答：是的，那位海军上将负责炮舰。

问：你是在上海在海军司令部与他交谈的吗？

答：在两个司令部都谈过——英国海军和我的司令部。

问：还有其他的曾与你交谈过的外国外交官、军人或水手你认为我应该去找，因为他们知道关于南京事件的一些情况？

答：我见过的大多数人都并不重要。因此，我认为 1937 年和 1938 年在南京和上海的美国领事和官员将是最可靠和可信的情报来源。我和阿本德先生谈过话，我也信任他，至于其他的许多人我不敢确定。

问：有报道说正是阿本德说过朝香宫应对南京暴行负极大责任，他说你在谈到桥本时告诉过他，“或者桥本回家或者我回家。我不能再为如此玩火的行动或政策负责任。”如果你信任阿本德，那么你是否仍然认为我们记录下的阿本德的讲述是言过其实了或是讲错了？

答：我真的弄不明白。

问：我所知道的都是有案可查的。

答：我不明白。

问：我理解你说的是，总的来说，阿本德先生是可靠的。

答：我知道他是一家信誉很好的报纸的记者，因此，我信任他。

问：你是否对弗雷泽先生有相同的印象？或者说你觉得弗雷泽先生具有同样的可信度？

答：在上海的所有通讯记者中，我认为阿本德先生和弗雷泽先生为最可靠和最有责任感的人。

问：那么，这就是你派他们去发掘这些谣言的真相和向他们发表你的看法的原因。是吗？

答：是的。

问：所以，在那时你觉得他们是依靠的，可以进行毫无偏见报道的人，是吗？

答：是的。

问：你觉得雅内尔海军上将的可靠度和责任感如何？

答：我觉得他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可靠的人。我们是在非常友好的气氛中交谈的。在会谈中我陈述了下面的看法，我想这位海军上将会记起这点的，“我来上海是为了保护日本的利益，但是在进行过程中，我也希望尽可能小地对其他国家的利益造成损害。”结果是，日本的利益遭受了严重的损害，我说我不知道我呆在这儿是在保护日本的利益呢还是在保护美国和英国的利益。我们都大笑起来。雅内尔海军上将说他将向他的政府转达这层意思。在分手时，我们握手并表达出这样的愿望，希望我们这两个正在代表美国和日本军队的人能够合作，一起来维持远东的和平。

问：那么，我是否可以理解为，就雅内尔海军上将而言，你们之间的私交一直很好，从来都没有发生过摩擦？

答：是的。甚至在巴纳号事件中，雅内尔海军上将也持着非常非常理解的态度。

问：当然，这件事由于日本政府的迅速赔偿而得到解决。

答：是的。

问：你认识从越南来的疆抵王子(Cuongde)有多长时间了？有何种联系？

答:我认识他很多年了。事实上,日俄战争后,当他在东游运动失败后来日本时,我初次与他认识。我成了他的朋友。

问:我相信,越南政府是王子感兴趣的政府。

答:是的。

问:1945年,在印度支那纷乱中,王子来到日本寻求保护的,是吗?

答:他断断续续地来这儿已大约有40年了。

问:王子现在在哪?

答:不久前他还在东京。他可能已去台湾了。他说过他要去那儿。

问:你还有什么要告诉我的吗?

答:我很乐意告诉你任何事情,但是如果你能提出问题来,我回答起来会容易些。许多事情我很难向你讲述细节,因为,正如你自己也知道的那样,麦克阿瑟将军不可能知道驻扎在大阪的美国士兵的任何情况。他可能不得不去问那些指挥官,因此,我也不可能熟知小的细节,因为我是高级指挥官。所有好的消息会马上传到最高司令部,但是坏消息就不会了。

答:阿本德先生提供的情况可以向冈崎先生核对。

问:我们会找到他,和他谈的。

(蒋耘 译 杨夏鸣 校)

11. 书证第 258 号

讯问桥本欣五郎

“我原本对巴纳号事件一无所知,直到英国炮舰瓢虫号经过芜湖,我命令炮击实施扣留时,瓢虫号司令告诉我,他是得到了巴纳号遇到麻烦的消息后,过来援助他们的。这是我第一次了解到巴纳号事件。”

“这是遵照柳川中将的命令来行事的。命令的内容是:‘南京正处于被包围状态,敌军似乎正溯江而上逃逸,桥本大佐要将所有驶离南京的船只,不论国籍,予以击沉。’我想我们是在南京沦陷前二天发布这些命令的。”

日期:

1946 年 1 月 17 日

1946 年 1 月 18 日

讯问者:

吉尔伯特·沃斯(Gilbert S. Woolworth)上校

J. J. 罗宾逊(J. J. Robinson)上尉

休·B. 赫尔默(Hugh B. Helm)先生

对桥本欣五郎大佐的讯问

日期和时间:1946 年 8 月 7 日上午 10:00—11:30

地点:日本东京巢鸭监狱

出席者:桥本欣五郎大佐

吉尔伯特·沃斯上校(讯问者)

J. J. 罗宾逊上尉(讯问者)

休·B. 赫尔默先生

弗兰克·希金斯上尉(Lt. Commander Frank Huggins)(翻译)

埃德娜·希坎小姐(Miss Edna Hickam)(书记员)

由罗宾逊上尉主持译员宣誓

罗宾逊上尉:你能在全能的上帝面前郑重宣誓,将遵照程序所要求

34 东京审判书证及苏、意、德文献

的,真实、准确地进行英、日语互译?

希金斯先生:我能。

由吉尔伯特·沃斯上校提问

问:你的姓名和军阶?

答:桥本欣五郎,后备役大佐。

问:你的出生日期?

答:1890年2月19日。

问:你在什么时候从军事学校毕业的?

答:1907年我毕业于熊本(Kumamoto)士官学校,两年后,1909年我从东京军事学院毕业。

问:你何时从陆军大学毕业的?

答:1911年我从东京陆军大学毕业。1911年年底,我成为一名二级中佐。

问:你在哪个部门服务?

答:我是炮兵军官。

问:从1911年至1927年,你曾在哪些地方和哪些国家服务?

答:1913年我去了炮兵工程学校;1914去了青岛(Chinta Tao)。1915年我回到了炮兵工程学校,并在该校毕业;1917年我进入军事作战学院并于1919年在该校毕业。1922年我在陆军参谋部任职,1923年我是哈尔滨特种兵机构官员,同时我还属于陆军参谋部。从1923至1925年我是满洲特种兵部官员,同时,在1925至1927年我仍属于陆军参谋部。

问:1927年你是否成为驻俄国武官?

答:1928至1930年我是驻土耳其的武官。

问:你当过驻俄国武官吗?

答:没有。

问:你什么时候从土耳其回到日本的?

答:我想是1930年5月回日本的。也可能是4月,不过我相信是5月。

问：你什么时候在关东军中服务的？

答：我从未在关东军中呆过。

问：你有没有在其他任何时间服务过关东军？

答：我在哈尔滨的时候是受关东军领导的，因为哈尔滨是属于关东军控制地区的一部分。

问：那是在 1930 年之前，是吗？

答：是的。

问：您有没有当过海拉尔(Hailier)特种部队的司令？如果是，在什么时候？

答：1932 年末。

问：你在什么时候当上野炮兵联队司令官的？

答：1933 年我是第二重炮兵联队的一名军官，而后于 1934 年我成为该联队联队长。

问：然后，就在那年，你被晋升为大佐？

答：是的。

问：第二重炮兵联队在什么地方？

答：在三岛(Mishima)。

问：你有没有参与组织大日本协进会(Dai Nippon Seinen To)？

答：1936 年我退休以后，我组织了这个协会。

问：你是这个协会的主席，是吗？

答：我是协会的头。

问：这个协会的目的是什么？

答：那时的政治，依我所见，是腐败，组建协会旨在改善这种情况。

同时主张：

1. 以天皇为中心来改进政治；
2. 运用日本精神推进国家结构；
3. 在国内建立一个不依赖外国的国民经济；
4. 以空军为重点加强国防；
5. 向国外宣传日本文化。

这五项便是上述这个协会的目的。

问:协会的经济来源?

答:协会每年向每个成员收取一元的费用,而协会每月需要有一千元的运作费。

问:协会有多少会员?

答:我不知道具体数字,但我相信在后期有 20 000 人。

问:这个协会现在还存在吗?

答:它于 1940 年解体。此后协会的主要目标是政治改革。我又启动了一个新的组织,叫做 Seki Sei 协会,着重在于推进精神文明建设,这个组织于 1944 年解散。

问:1931 年你在哪里服务?

答:我在东京总参谋部。

问:1931 年你有没有去过满洲?

答:1931 年我从未去过满洲。

问:你在退休后什么时候被重召回军队服务的?

答:1937 年 8 月。

问:你去那里服务了?

答:我去了中国,至 1939 年回日本的。

问:在中国你是否指挥一个炮兵联队?

答:我作为炮兵联队联队长参加了中国事变。

问:是否在上海附近?

答:原本我是去中国北方的一个地方叫做 Sekkaso^①的,但很快就去了上海。我当时参加了攻打南京,随后又去了罗山(Rosan),1939 年我回到了日本。

问:然后,你又被列入了预备役名单?

答:是的。

问:由于你在中国的服务,你获得了勋章,是吗?

答:是的。

问:什么样的勋章?

① 无法得知此地中文译名。

答：帝国级的大勋章。

问：巴纳号事件发生时，你的联队驻地在哪？

答：在一个叫做芜湖的地方，扬子江南京的上游。

问：那时谁是你的上司？

答：柳川中将。

问：怎么会对巴纳号攻击的？什么原因？

答：我原本对巴纳号事件一无所知，直到英国炮舰瓢虫号经过芜湖，我命令炮击实施扣留时，瓢虫号司令告诉我，他是得到了巴纳号遇到麻烦的消息后，过来援助他们的。这是我第一次了解到巴纳号事件。我仅仅知道巴纳号是沿江而上时受的攻击，并不知道其他更多情况。

问：你有没有允许瓢虫号前往帮助巴纳号？

答：是的。随后有人来要求用我的车辆去运送巴纳号的几名伤员，我们的车辆也确实沿江而下了，只是没有完成任务就回来了。

问：你是根据谁的命令来攻打瓢虫号的？

答：这是遵照柳川中将的命令来行使的。命令的内容是：“南京正处于被包围状态，敌军似乎正溯江而上逃逸，桥本大佐要将所有驶离南京的船只，不论国籍，予以击沉。”我想我们是在南京沦陷前二天发布这些命令的。我认为那是在1937年12月10日。我接到这些命令是凌晨2点，当时我在距离芜湖5至10公里处。接到命令以后，我马上返回芜湖作准备。第二天，江面被浓雾所笼罩，大约在10点左右雾逐渐散去，我看到河流里有四艘船，三艘是灰色的，一艘是漆成白色的。我马上对其进行炮击。三艘灰色的往下游逃去，而一艘白色的却向我们位置驶来，这原来是英国炮艇瓢虫号。另外三艘船只已在运送士兵上岸了。当瓢虫号在我扣留期间，很明显，他们收到了无线电报，知道了巴纳号受到攻击的信息。瓢虫号艇长请求我允许他们去救援巴纳号。

问：当时巴纳号在哪位置？

答：由于有相当距离，我不好说它在哪里。（我可以从我所制作的草图上指出它约在南京上游的一个地方。）

问：在芜湖下方？

答：在芜湖下方。

问:你说说大概距离芜湖有多远?

答:因为我不能看到任何船只,我真不知道。但是芜湖和南京的距离是约 50 公里。

问:你有没有看到任何巴纳号的幸存者?

答:没有。

问:你是否知道是哪个炮兵连轰击巴纳号的,以及巴纳号是如何被击中的?

答:那时我毫无所知。我只是从报纸上看到它是受到了轰炸。

问:回到日本以后,你是否就成为 IRAA 的一员?

答:IRAA 皇家法则援助政治协会(Yokusan Seiji Kai)是 1942 开始的。在此之前,并没有这个协会,我也不是一名会员。

问:以后你是这个协会的会员是吗?

答:我在该组织总务任职六个月。随后六个月,我是该组织议会的副会长。以后我和这个组织就没有什么关系了。

问:1942 年 4 月左右,你被选入众议院了?

答:是的,在 1942 年 4 月,我被选入众议院。

问:你在众议院有多久?

答:作为众议院议员直至我被投入巢鸭(Omori)监狱。

问:你有没有当过 IRAPS 的主任?

答:在 1945 年初的某一时候,我和另外 29 名议员离开了众议院,成立了一个组织,称为 Gōkoku Doshi Kai。我反对 IRAPS 的主张,因为它是受一些老的政客所领导。

问:你是否在某一时候参加了黑龙会?

答:没有。我甚至不知道他们在哪。

问:你认识富山充(Toyama Mitsuru)、中野正刚(Nakano Seigo)和大川周明(Okawa Shumei)吗?

答:是的,这些人我都认识。

问:你是否在那时是东亚协会的成员?

答:不是。

问:你曾经是樱花会(Sakura Kai)的成员吧?

答:是的。

问:这个组织的经费是从哪里来的?

答:这个组织没有资金,因为它是一个学习组织。

问:你曾是近畿会(Kinki Kai)的成员吗?

答:不是。

问:你是樱花会的创始人之一吧?

答:是的。

问: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 1931 年滨口首相辞职的?

答:他被一个叫做佐乡屋留雄的人刺伤了。

问:谁被刺了?

答:那个人行刺了他。当他还没有去世前,他已不能在议会上露面,所以他辞职了。

问:大约在 1931 年 10 月或 11 月你是否被投入过监狱?

答:约在 10 月 17 日我被宪兵拘押在牢中有 15 天。

问:什么原因?

答:我计划发动起义推翻当时政府。我去找了荒木将军,请他当新政府的首领,但荒木将军反对这个计划,把我的名字报告了军事部,于是我在当天被拘押了。

问:南将军是赞成这次暴动的,是吗?

答:我在那时候没有和南将军见过面,所以不知道他的想法。

问:东条(Tojo), Doihara 和板垣(Itagaki) 是否赞同这次革命?

答:我没有和他们见过面,所以不知道。

问:你有没有参加过 Kokoku Sei Sheko Domei?

答:……

问:你曾是 Seiei 会的成员吗?

答:我都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问:你是否和石原(Ishiwara)少将熟悉?

答:我认得他。但是他是一名中佐不是少将。

问:1931 年他是少将了吧?

答:我相信他是中佐。此人是中佐,因为我当时刚刚也成为中佐。

问：你曾是神武会(Jinmu Kai)的成员吗？

答：不是。

问：谁创建了这个组织？假如你正好知道的话。

答：我想是大川(Okawa)。

问：有关中国事变，由于你那时在事件中的行动你受到了日本军事当局对你的谴责了吗？

答：没有任何说法。

问：我知道你说当时的指挥官是柳川中将。

答：是的。

问：当时松井石根大将的指挥怎样？

答：松井大将在柳川中将之上。

问：松井大将当时是你们指挥官？

答：松井是大将……柳川中将当时是军司令官。

问：我再重复一遍，松井大将是你们的司令官吗？

答：我是在柳川中将手下，而松井大将是负责所有在中国的军队。

问：包括桥本和他的指挥官？

答：是的。但是我关于瓢虫号事件的命令是出自柳川中将。

问：在事件发生以后，松井大将对于你在瓢虫号—巴纳号一事中的行为说了或做了些什么？

答：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问：他有没有就你在此事件中所作所为和你谈话？

答：我没有见到松井。

问：你有没有感到松井对于你在瓢虫号—巴纳号事件中的行动认为是对的呢？

答：我没有见到松井，所以不确切知道，但是我相信松井是反对这样做的。只是我是听别人这样说的，所以不能肯定。

问：在这事件以后你没有被召回日本？

答：没有。我后来参加了攻打罗山。

问：你是在1938年被召回的？

答：是。

问：为什么？

答：不，是1939年4月。当时只有那些不是从预备役征召回的现役军官才能当联队长。因此他们对我说，他们不用我了，我再一次转入预备役了。

问：你的退休是否多少和瓢虫号—巴纳号事件有关？

答：不是。

问：在瓢虫号—巴纳号事件之后，你在日本受邀发表演说，是吗？

答：是的。

问：然后，你在演说中肯定和赞扬日本当局在这些事件中所采取的行动，是吗？

答：我对巴纳号事件没有发表言论，因为我对此不清楚。

问：那时你认为巴纳号事件中日本的行动是对的？

答：不，我认为这是一个误会。

问：为什么？

答：因为报纸上登载了。

问：从军事或国际立场来说——你为什么要谴责日本在巴纳号事件的行为呢？

答：我相信他们是出于误会轰炸了巴纳号，但这样的事件不应该发生。

问：为什么是误会？是怎样的误会？

答：他们不知道这艘军舰是友邦的还是敌人的，便进行了轰炸。

问：不过，命令不是说，不管是友邦的还是敌人的，都进行轰炸吗？

答：是。

问：那怎么能说是误会呢？

答：巴纳号事件是海军的事，而海军司令长谷川随后就轰炸事件道歉说，这是一场误会。而关于我发出的命令，那是十分清楚的，是不管是友邦的还是敌人的，都要进行射击。

问：在芜湖和南京地方，海军司令和你们司令之间的关系如何？

答：在我的地方没有海军。

问：海军飞机是从哪里过来的？

答：我不知道。

问：你们那时就海军军事行动没有协调工作吗？你难道没有在协调方面起一些作用吗？

答：当时海军不在那里，我和他们没有任何联系。

问：你们和海军有没有交流呢？

答：没有。

问：你不知道谁是海军航空兵的指挥员吗？

答：我只是听说，所以不甚了解。

问：你听说了些什么？

答：我仅仅是听瓢虫号军舰上的英国海军上尉说，巴纳号受到了打击，后来又从报纸上读到，海军飞机轰炸了巴纳号。

问：你当时没有调查吗？

答：由于巴纳号被轰炸的地点和我们有一定的距离，那里不属于我管辖，我没有做任何调查。

问：你确实派了车辆去（帮助），是吗？

答：派车是应英国海军军官的要求，我猜想，他是从无线电里收到的消息。

问：那个英国海军军官叫什么名字？

答：我不知道。——巴纳号事件发生的地点和芜湖是那么远，我既没有看到，也没有听到。——我想轰炸巴纳号是一个误会。

问：从与美国的国际关系的观点来看，你认为是一个误会？

答：毕竟这事件已经无可挽回，因为是一个误会；但是我想对于和美国关系来说，总不是一件好事。

问：你后来有没有听说，巴纳号军舰和其幸存者还遭到了机枪的扫射？

答：不，不知道。

问：你从未听说过？

答：从未听说。

问：瓢虫号军舰上的司令没告诉你吗？

答：没有。

问：那他告诉你派车到哪里去接那些幸存者呢？

答：他只是要求我沿江而下。

问：你是在 1942 年 1 月 24 日被授以勋章的？

答：我记不大清楚了，但我想不是在 1942 年而是在 1939 年我接受的勋章。

问：为什么要授你勋章？

答：我相信是为了表彰我在罗山的行动。我也不敢肯定，因为没有文字说明。

问：当时报纸有没有说，你得到勋章是因为攻打了巴纳号和瓢虫号军舰？

答：没有。

问：你攻击了瓢虫号军舰有没有受到赞扬或审查？

答：我听说松井大将因瓢虫号事件要审查我，而柳川将军向松井大将解释，我只是服从命令行事。我是在 4 000 米之远的雾中向船只发射炮弹的，并不知道其中有一艘是英国炮舰；当我认出以后，马上便停止了炮击。

问：当你在攻击的时候，你认为这是些什么船只呢？

答：我以为这些是扬子江上的渡船，用来装载中国兵士的，而当我看到有一艘是军舰时，我想这艘船很可能是友邦的，我便停止了攻击。

问：随后怎样了？军舰有没有进行反击？

答：没有。

问：那军舰干什么了？

答：瓢虫号向岸边靠近，我命令他们停泊在那里等待，这时，他们明显地已收到了巴纳号的信息。瓢虫号被我们的炮火击中二次。我没有去瓢虫号舰上，而是在岸上在作为司令部的海关办公室里会见的船长。

问：船长为什么要上岸？

答：为了要和我说话。

问：是你命令他上岸的？

答：不，我没有命令他。

问：随后船长又回瓢虫号军舰了？

44 东京审判书证及苏、意、德文献

答:是的。

问:然后瓢虫号继续向前了?

答:是的。

问:去南京?

答:我不知道它是否去了南京,但是他们是顺着江向下而行的。

问:你是否是 1941 年组建的大东亚联盟的成员?

答:不是。

(谈礼英 译)

12. 书证第 262 号 松井军司令官声明

假以时日,民众反省

同盟社十八日南京发

(十八日发)继十七日举行威风凛凛、盛况空前的南京入城式后,十八日我上海方面军最高指挥官松井主持了阵亡官兵慰灵祭。当天下午 4 时,作为南京入城后的第一次讲话,司令官特地发表讲话,表明南京沦陷后皇军坚定态度的同时,期望国民政府及支那朝野反省,并重申如下恩威兼顾、情理兼具的重大声明。

我军占领了南京,并于 17 日举行盛大入城式。18 日举行了慰灵祭。为迅速适应今后的作战,将进行新的部署。部分队伍直奔江北,另一部直下浙江、安徽地区继续作战。由于全军自登陆 4 个月来,不断进行大会战,并不间歇地进行追击战,部队已疲惫不堪,需要一些休整。因此,在现阶段,军队需要休整,需要添置军事设备,要控制作战地区的警备工作和对战区人民的宣传安抚工作,同时为下一场战役做好准备。今后军队如何作战,则要看蒋介石及国民政府的态度。

虽然现在还无法定论,不过,我认为江南地区军民,通过过去的战斗,感受到皇军的震慑力。而且,我相信这自然也让国民政府进行了真正的反省。

当然,此次征战让支那军民蒙受重大损失,我本人也深表同情。因此,希望国民政府迅速反省,希望支那军民信赖皇军,希望友好事业早日实现。但是,如果国民政府仍无反省之意,军队任务就是决意前进,直至国民政府逐渐认输。天气寒意渐浓,年末在即,此刻,

46 东京审判书证及苏、意、德文献

促使军民反省的同时，军队要伸张正义。今天，我们追悼我军阵亡官兵，这是为了慰藉阵亡官兵，但这绝不是仅仅对于日本官兵，对导致东洋局势如此的国民政府所虐待的不幸的支那军民也是一样的。尤其对身陷战争中的几百万江浙地区无辜人民所受到的伤害，我也痛心不已。如今，太阳旗飘扬在南京城内，江南地区皇道复兴如曙光即将来临。值此之际，期待支那4亿人民反省。

（汪平 译）

13. 书证第 263 号

海军部调查文书

海军机关首长为了将事实真相刊登在周六的晨报上,公布了调查了调查会议关于“巴纳”号遭到轰炸以及沉没的调查结果。据海军机关首长的断言,亚洲舰队司令也认可这份判定调查结果。报告的具体内容如下:

1. 1937 年 12 月 12 日,合众国亚洲舰队扬子江警备队的“巴纳”号舰,在江上遵照法规,进行作战。

2. “巴纳”号舰当时的使命是保护美国人,传达美国驻南京大使馆与驻汉口的大使之间的通信,因军事作战,南京处于危险期间,为大使馆工作人员提供临时办公室,而且还兼作美国和其他外国人的避难所。

3. 由于南京附近遭到集中轰炸,“巴纳”号舰船为了躲避直接袭击,再三变更停泊地点。1937 年 12 月 12 日早晨,它一边守护着美孚公司的船舶“美平”号、“美峡”号、“美安”号,一边向上游方向移动。

4. 正如日本当局确切知道的那样,“巴纳”号舰船的动向是按严格手续依次进行的。

5. 加上一般的定员,舰上同时乘有 4 名美国大使馆工作人员、4 名美国人、5 名外国人。

6. 上午 9 时 40 分,“巴纳”号舰船在向上游航行时,因接到日本卸货船的信号而停了下来,由警卫陪同的日本陆军军官登上了“巴纳”号,于是告诉他“巴纳”号舰和护送船正驶向南京上游 28 英里的停泊地点。对方没有警告会遭遇什么样的危险。

7. 1937 年 12 月 12 日上午 11 时左右,“巴纳”号和护送船组成周密的队形,抛锚在距长江吴淞上游约 221 英里、南京上游 28 英里的地方。

8. 上部设施和烟筒为暗黄色、其他都涂成白色的“巴纳”号舰,在最上层甲板掩盖物上水平展开两面大型宽幅的国旗。此外,桅杆上也悬挂着很大的国旗。

9. 美孚公司的轮船“美平”号、“美峡”号、“美安”号也分别在横竖两方向悬挂着好几面美国国旗,它们全都是巨幅国旗。

10. 下午1时38分,可以看见日军3架大型双引擎飞机成V形编队,一边保持着相当距离的高度,一边从上游飞来。此时,在“巴纳”号和护送船的附近看不到其他船只,他们根本想不到会处于危险区域。

11. 这三架飞机连警告也没有就投下了炸弹,其中一到两枚炸弹直接袭击“巴纳”号舰,落在了其船头极近的地方。其他的有一枚直接袭击“美平”号,落在靠它最近的地方。

12. 一开始轰炸,“巴纳”号就受到了很大的损失。前部3英寸炮无法使用,舰长等人受了重伤,操舵驾驶室、医务室、无线电机遭到破坏,器械室陷入瘫痪,动力全无。另外,由于船体出现裂痕进水,舰船从头部开始下沉,向右侧倾斜。基本上由于以上原因,结果“巴纳”号舰船沉没了。

13. 似乎自第一次轰炸以来,便不间断地有6架单引擎飞机组成的编队从“巴纳”号舰的头顶上一架架地下滑,集中轰炸它。共计约有20枚炸弹落下,多数落在了舰船的两侧附近。由于炸弹的碎片和震动等,使船体和人身受到了极大的伤害。轰炸大约持续了20分钟,至少有两架飞机用机关枪进行了扫射。这机关枪袭击目标之一就是伤员运送到对岸的小船。由于这样,又出现了伤员,小船因弹痕而出现了洞口。

14. 在日军进行轰炸期间,天气很好,视野开阔,连风也没有。

15. 根据记号就能明确轰炸“巴纳”号和护送船的飞机绝对是日军的。

16. 最初袭击以后,进行了防空配备。30毫米口径的机关枪立刻开火,一直对抗到轰炸结束。由于没有配备3英寸炮,所以3英寸炮弹一枚也发射不了。这完全遵从了舰船上的防空规定。

17. 因交错乱飞的碎片和震动等,另外还因最初轰炸而受到冲击,爆炸中出现了大量的伤员。舰长腿部受伤,受到重创,紧接其后,安德斯上尉因为炸弹的碎片,喉部和手都受了伤,无法说话。机械军官盖斯特中尉腿部被炸弹碎片击伤,巴伊瓦斯少尉的衣服被爆炸气浪完全吹跑,身体受到强烈的冲击。以上包括了舰船上所有的现役军官。

舰长无法指挥,副官依据笔记上的命令代替指挥。他发出指示叫舰船靠岸,但是由于舰船受损范围很广,已经无法操作了。

18. 下午2时左右,舰船不可避免地要沉没。而且,考虑到要把大多数伤员运送到对岸很费事,舰长命令放弃“巴纳”号舰。运送工作大约在下午3时左右才结束。这时主甲板已经完全进水,“巴纳”号舰开始慢慢下沉。

19. 首先运送重伤员,但舰长拒绝第一个被运送走。负伤的副官已无法指挥,乘着倒数第二艘船离开了“巴纳”号舰,最后离开该舰的是巴伊瓦斯上尉。

20. 放弃“巴纳”号以后,掌帆长马尔曼和一等水兵机械员瓦默斯(G. L. Weimers)为了把储藏品和医药品弄到手,返回了舰船。两人在踏上旧途的时候,日军汽艇满载着全副武装的士兵,刚接近“巴纳”号,紧接着就一边扳动机枪扫射,一边停靠在它的旁边。他们上了“巴纳”号舰,约5分钟后离开了。

21. 侵入“巴纳”号舰的一伙日军离开不久,舰船于下午3时45分向右侧一边倾翻,沉了下去。沉没地点为北纬30度44分30秒、东经117度27分,水深7—10呎。

22. “巴纳”号舰上的幸存者一到达左岸堤坝,舰长鉴于自己的伤势、所剩现役军官们受伤、舰员受到打击等因素,并进一步考虑到大家预计日军进行搜索幸存者的战斗,就委托没有受伤、长于陆上作战的、还会中国话的陆军罗勃兹上尉以代理身份一直坚持到1937年12月15日,出色地指挥幸存者乘上“瓦湖”号舰,完成了任务。

23. 美国大使馆工作人员艾奇逊和帕克斯顿两位先生在陆地上也给予了我们很大的帮助。在陆地上得到他们提供的丰富的地理知识、中文知识以及时机方面的教导,给予一行人以安全上很大的帮助。

24. “巴纳”号的幸存者登陆后约50个小时,一直饱受苦难和恐怖的煎熬。不过,中国人的亲切援助减轻了他们的苦难,他们一行得以乘上美国舰船“瓦湖”号和英国舰船“瓢虫”号。

25. 自那史无前例、意想不到的野蛮轰炸开始后,到他们一行最后返回到舰船为止,“巴纳”号舰船上的乘务员和乘客就处在持续的重大危机

和困苦中。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的行动与他们所具有的海军优良传统有很大关系。

26. 乘客中,桑德罗·桑德利于12月13日1时30分死亡。J. 豪尔·帕克斯顿先生、爱米尔·加西、罗尔·斯夸尔先生负伤。

27. 轰炸一开始,美孚公司的船舶“美平”号和“美峡”号就开着船,到开元(音译)码头的栈桥处避难。“美安”号却无法操作,和那两艘船相隔很远,靠在下游的左岸处。三艘船都在最初的轰炸阶段中受到了创伤。面对“美平”号上的大火灾,“巴纳”号上的8名队员由于灭火而无法返回到舰船上。

28. 轰炸“巴纳”号一结束,日军飞机就转向轰炸“美平”号、“美峡”号,它们被炸起火而焚毁。在这轰炸之前,位于码头附近的日军部队挥动着日本国旗,想避免轰炸。可是,结果无效,出现了一批死伤者。“美安”号船长卡尔松(C. H. Carlson)死亡,马夏尔、巴茵兹、皮克林、斯夸尔4人受伤。这些船舶上的中国死伤者占多数,不过无法确切把握。

29. 以下所记下的8名“巴纳”号上的乘务人员想扑灭船上石油、汽油火灾,却以徒劳而告终,因此他们只得离船登岸。他们是机械长帕凯特、炮手古莱茵兹一等兵、狄龙豪法一等水兵、护士长考尔曼、炮手朋考弗斯基三等水兵、负责电气的三等水兵布拉乌宁格、负责消防的一等水兵郝基、负责机械的二等水兵郝伊鲁。

30. 这些从“美平”号上逃出来的“巴纳”号舰上的乘务员,除了负责消防的一等兵郝基以外,他们一起留在了岸上。第二天,他们被英国舰船“蜜蜂”号救走了。郝基去了芜湖,12月14日乘日本海军飞机返回了上海。

31. 在搜索、抢救“巴纳”号幸存者之际,以英国海军舰队司令霍尔特为首的“蜜蜂”号、“瓢虫”号官兵们在这严峻的情况下,能给予他们最有价值的援助,表现出他们善于援助、合作的崇高精神。

32. 负责补给的查尔斯·L. 恩斯敏噶因在“巴纳”号遭轰炸过程中受伤,于12月13日下午1时30分在和县殉职。

33. 舵手爱德加·C. 哈塞巴斯(Hulsebus)因在“巴纳”号遭轰炸时

受伤,于12月19日上午5时30分在上海殉职。

34. 以下重伤人员的名单从略。

35. 以下轻伤人员的名单从略。

(叶琳 译)

14. 书证第 264 号

桥本欣五郎：革新的必然性（节选）

“我所在的部队原计划是过芜湖后攻打南京，然后溯扬子江北上。但是在南京陷落前两天，我们意外接到命令，要我们攻击所有北上的运载撤退的中国士兵的船舶。于是我们马上返回芜湖，在沿江地区安排了长达一日里多（原文注：1 日里约 4 公里）的大炮阵，有重炮、野战炮及机枪等。正巧此时，在芜湖下游处几千米远的江面出现了几艘船舶，船上搭乘的似乎都是战败的中国兵，于是我们就向他们开火。

“我听说这些船舶中有一艘是属于英国的，也被我们的炮弹击中了好几处，后来这便成了一个问题。但是作为皇军，我们只是采取了适当的措施而已。”（pp. 13—14）

“此刻，还发生了一件有意思的事。在炮轰了英国军舰和南京陷落之后，有一艘日本驱逐舰出现在芜湖的江面上。我立即要求它停下，于是船长海军少校过来见我们。在彼此交换了信息以后，我对少校说：‘说实在话，我们目前正处于没吃没喝的困境，如果你们有，能否匀给我们一些大米和清酒。’他当即答应了，说他将派他的人送来。

“‘这就好了，’我们说，于是便急切地盼着。一会儿，几个海军陆战队士兵送来了米，但是他们说可没有清酒了。那位船长的传令兵则告诉我们：‘我们原来是有清酒的，在从南京过来的时候，我们击沉了无数游弋在水面上运载中国士兵的船只。一想到这些敌军都喂了扬子江里的猫鱼，我们感到无比欢畅，禁不住将清酒都喝了来庆祝我们的胜利。我们很抱歉没有省给你们一些。’‘OK。’

“在那时候，即便英国的军舰要过芜湖都不能不受炮击，中国的船舶更不用说了。江的对岸已经被日军占领了，因此跳到船上的战败的南京士兵，既不能溯江而上，也不能沿江而下。敌军的船只如同是一条大蛇吞下了一只象，在南京和芜湖之间被逼得走投无路。想到我们的驱逐舰给予敌军的毁灭性的打击，我们十分开心，战事卓有成效，真是令人高兴

的快事。”(pp. 14—15)

“新制度的首要一点是大力彰显我们的国策。就是我们的政治、经济、文化、国防以及其他一切都必须以天皇为中心,整个国力集中在一个点来展示。特别是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过去曾被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者所掌控,我们必须按照天皇唯一的原则重新组织。(TN. KODO ITTAT SHUGI)

“我们新制度是所有制度中最强大和最伟大的,同时也决定了我们国家今后一千年的趋向。世界上有那么多国家,但绝对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同我们民族血一般的团结相比较,它使得以天皇为中心的统一体成为可能。

“从这意义上来说,新制度不仅使我们发展‘八紘一宇’原则在目前世界的纷乱中得以成功,并且还能将危机转化为天赐良机使我国抓住带领世界走向新世界秩序的缰绳。支那事变或可称为是构建世界新秩序的开场战。

“因此新制度彰显了我们种族在此危机时刻的理想特征,同时也只有新的制度才能为彰显‘八紘一宇’原则开辟道路,引领世界走出疯狂的混乱。所以这不仅是一个意向问题。如果认为这是我们国策的需要,那么当形成决策的环境消失以后,新制度也就没有必要了。举例来说:假若我们向美国、英国妥协,于是,新的制度也不是必需的了。而新制度目的是建立世界新秩序,形成我们民族国家特色制度,不论环境如何发展,以‘八紘一宇’的原则来引导环境,并以我帝国的原则方法涉足全世界,来彻底解决目前的危机。”(pp. 52—53)

“一种论调是除非我们和美、英联合,避免事变解决过头,支那事变是难以解决的。事实是当我们要把英国人和美国人赶出中国的决策制定以后,中国会开始向新的秩序迈步的。当我们下决心和德国、意大利组成联合战线,欧洲的局势也将迅速变化。如果我们妄想德国和英国永远战争下去,那欧洲的战事将要比我们想象的要提早结束。只有我们排除了必须依靠英国和美国的想法,计划建立一个日满支自给的经济体,我们才能实现我们军事、生产力的扩大而不受美国、英国的影响。政府有没有研究和制定过关于消除亲英美策略以巩固我们的经济计划呢?

我们会失去大不列颠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但满洲、中国和南海将属于我们。

“当然，要花很大的力气组成这个集团，而且这还不能简单地和亲英美政策相提并论。但是当我们面对前线作战的不屈不挠的士兵，就可以知道事情越是困难，结果才是血肉的真实。用自己的艰苦卓绝劳动取代依赖外国的物质资源，才是我们国家所持态度。

“只有我们坚信和德国、意大利联合，清除英美在中国的影响，采取一定的措施和计划来解决事变，才是我们国家应该采取的步骤，才能制定国家的各项行政计划，决定人民的目标；而人民则是不怕艰难困苦的，他们热切地怀着对未来的希望，为解决事变而奋斗。政府是不是并不打算努力地去实现这些计划，因为他们从自身考虑认为这完全是一种理想而没有实践的意义的呢？现在已经到了在维持或破坏现状之间做抉择的时刻了。妥协是不能容许的。我们向米内首相呼吁，请求政府对这些事情做出决定。”(pp. 73—74)

(谈礼英 译)

15. 书证第 265 号

日本政府复英国大使馆(节选)

日政府致英大使馆有关中国事件声明节选(第一册)1937 年 ——日外交部长答英国大使函

1937 年 9 月 21 日

大使先生:

有关英王陛下驻中国大使许阁森(Hughe Knatchbull-hugesser)爵士受伤事件,我已于 1937 年 9 月 6 日临时简复。现荣幸地敬告阁下,在上海及其附近的调查已经结束,日本政府愿答复如下:

*

2. 作为十分认真调查结果,情况如下:

p. 126

8 月 26 日下午在距嘉定东南 3 公里处有两辆被确认为载乘中国官兵的军用客车或卡车。该处为中国军队集结的地方,自 8 月 18 日起,不仅日本飞机多次对该处进行了袭击,并且还时有日中两国空战发生。

3. 鉴于目前难以进行现场调查,在已经收到的各项报告中,有关大使受伤时乘坐车辆的位置,说法略有不同,但可以肯定的是,在大使首次报告受伤的地方,没有日本飞机进行过机枪扫射或投掷过炸弹。

但是,日本和英国当局同时进行的详细调查可以得出结论,那辆汽车的位置可能在嘉定南面 6 英里处,而不是英国早先报告中所述的太仓南面 6 英里。

4. 根据各种情况来看,日本政府认为事故的发生是由于日本飞机误将大使的座车当作军用车辆了,大使也因此受伤。

p. 127

由于日本飞机的上述行为,尽管不是出自故意,日本政府希望能向

英王陛下政府正式转达日本政府对此表示的深深的遗憾。

5. 至于对飞行员的惩处问题,毋庸置疑,一旦事情清楚,飞行员是致人死亡或是受伤;是有意,或是疏忽第三国权利的缘故,日本政府将采取适当的步骤处理。

6. 诚如9月6日即时简复所示,我方已再次向我在华军队指示,必须十分注意保护非作战国的安全,日本政府希望,同时也是政府的政策,即将目前存在的由于对中国的战事而造成对非交战国的危险缩小到最低的程度。

借此机会,我再次向阁下致以崇高的敬意!

英王陛下驻日本国大使

罗伯特·L. 克雷吉(Robert L. Cragie)爵士阁下

(谈礼英 译)

16. 书证第 266 号

文部省：日本精神——在中国事变上的意义

近来事态发展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国事变进入到一个战斗之前所未有的、具有创意的、更加积极而具有深远意义的新阶段。日本初始对待（中国）国民政府的政策难以实施，于是日本军队便予以惩罚性的打击，以期他们能意识到抗日主张是一种灾难性的错误，从而回到促进两国友谊和合作的理性的轨道上来。

然而，国民政府和中国军队坚持他们的盲目性；即便如南京陷落如此重大的打击也未能唤醒他们对其所面临严重局势的认识。他们盘踞中国内地，招募士兵，进口武器，依靠第三方国家的援助，而置他们国家的灾难和百姓的苦难于不顾。

于是，日本政府在（1938 年）1 月 16 日发表了重要声明，表明决心，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简言之，日本放弃了和国民党和平解决事变协商的种种希望，转而期待并帮助在中国北边建立一个新政权作为中央政府，为东亚建立公正秩序努力。

日本目前在中国行动的最终目标，已如官方公开申明过的，完全是为了消灭妨害东亚和平和安全的因素，使世界上这个部分的国家在坚决建立不仅在国内生活而且在国际关系方面的独立民族的同时，能共享我们理想中的共存共荣。一旦我们不能成功地解决目前的事变，整个东亚便将陷于西方国家可能出于利益冲突引发的混乱之中，日本的生存也将受到威胁。因此我们必须号召全国团结一致应对危急。

日本民众的理想

日本在亚洲行动的非自私性，远非领土企图可比，而应追溯到日本 2600 年光荣历史来理解。“八紘一宇”（世界一家）这个理想是日本帝国的创始人神武（Jimmu）天皇即位时便制定了的，帝国是按照这个理想来建立的，并构成了日本国计民生内外政策的基础。“八紘一宇”用现代生

活来理解,意味着一种生存状态,其间个人、大众、国家在人类生活的所有的阶段,都有其不同的、独特的、合法的位置,他们独立生活,但同时互相帮助,友好合作。

这种理想和精神,即使处于目前危急状况下,仍是我们目的和行动的指导。全国民众深信,当前的局势是天意,是给我们一个机会去实现我们民族崇高的理想,并将最后证实,这是整个世界最大的利益。依照这个观点,中国事变则是日本先辈赋予现代日本人的历史任务。很清楚,我们接受的神圣任务是为我们祖先,为我们的繁荣富裕——更是为我们的子孙后代,我们必须将成功执行的结果传给他们。

对国家的全心奉献和感恩服务,一直是日本人的光荣传统。日本民族生活的基本特点在于紧密和协调的团结,其间所有一切都向着天皇陛下——远古以来惟一的皇朝。在日本人的心目中,个人的思想不会和国家相悖,这是很自然的。所有国家的成员都将自己看作是国家的一部分。既然他们是一部分,他们必将融入国家整体。面临目前危机,日本人民惟一可遵循的道路是将此民族精神体现在他们的生活之中,自觉依照调动民族精神运动的号召,从事变之初一直遵循着的行为历程继续下去。

(谈礼英 译)

17. 书证第 306 号
史迈士宣誓证词(略)

参见本史料集第 7 册第 369—370 页。

18. 书证第 307 号
费吴生宣誓证词(略)

参见本史料集第 7 册第 370—372 页。

19. 书证第 308 号
程瑞芳书面证词(略)

参见本史料集第 7 册第 375—376 页。

20. 书证第 309 号

麦克伦宣誓证词:麦克伦日记^①

我,J. H. 麦卡论证明前面的日记副本是我在 1937 年 12 月和 1938 年 1 月在中国南京写的,内容是真实和正确的,日记里引述的事实是真实的,我的日记的原件目前不在,前面提到的日记共十一(11)页,是打字格式。特此证明,1946 年 6 月 27 日。

(签名)

中华民国
南京领事区
江苏省
南京市
美国大使馆

该证明在我,罗伯特·B. 穆迪(Moody),美国南京领事区副领事,面前签名和宣誓。程序规范,特此证明。1946 年 6 月 27 日。

1937 年 12 月 19 日,南京

自中国军队在南京的防卫溃散后已过了一个星期。星期一,日本士兵沿着中山东路浩浩荡荡地经过(鼓楼)医院,日本国旗也到处可见。我们松了口气,认为秩序就要恢复了,由于中国军队撤退引起的恐慌与混乱将要结束。飞机从头顶飞过将不再引起害怕和紧张。但一个星期已过去,这里简直是人间地狱。

我要讲的是恐怖经历,但我既不知从何处开始,也不知在那里结束。我从未听过和看过这样的残暴。强奸! 强奸! 强奸! 我们估计夜晚至

^① 本史料集第 7 册相关部分未能译全,特此增补。

少有1000起,白天也有许多。只要有反抗或是拒绝,随之而来的将是刺刀和子弹。每天我都可记录数百件案例。人们已经有些歇斯底里,只要我们外国人一出现,就跪下磕头。他们请求帮助。那些被怀疑为士兵的人被带到城外成百成千地被机枪屠杀。我们医院的工作人员三次遭到日本士兵的抢劫,被抢劫的物品包括自来水钢笔、手表和钱。即使是难民营里贫穷的难民也被反复洗劫,直到一无所有,往往只剩下最后一件衣服和最后一条裤子。但就连这恐怕也持续不了多久。

妇女们从早到晚都会被日本兵士拖走。所有日本士兵似乎都可以要到哪就到哪,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美国国旗被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金陵大学和希尔克雷斯特(Hillcrest)学校^①(为美国孩子办的)扯下。在神学院、圣经师资培训学校、金大、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金大附中、蚕桑楼、图书馆和其他许多地方每晚都有强奸、抢劫、枪击和刺人的案件发生。

在一些情况下,现场的外国人能够阻止这些事的发生,但15—20个(外国)人不可能在所有的地方出现。

1937年12月29日

这个星期每天和五个晚上一直很忙,写日记的时间都没有。为了对付日本士兵的不断来访,外国人必须每天24小时在医院值班。天下雪了,很冷。我们的心为无数拥挤在破烂不堪的小棚子里的人而痛苦。我们的医院已满,受轻伤的人挤在金大的宿舍楼里。我们不能叫这些人出院,因为他们没有地方去。上个星期这里就出生了15—20名婴儿,圣诞节就有6名。很容易找到海因兹(Hynds)小姐,她总是在婴儿室里照顾所有的婴儿。

我们完全与世隔绝,没有人能够进入南京,似乎要出去也很困难。我们曾谈论从我们中派个人出去,把这里正在发生的事告诉外界,但我们知道这个人一旦走了就再也回不来了。我同米尔士(Mills)、费吴生(Fitch)、史迈士(Smythe)、宋煦伯(Sone)、贝德士(Bates)和林查理

^① 即五台山学校。

(Riggs)住在卜凯家(Buck)^①。我们所有的人都干双份工作。我们很少有机会坐下吃饭,每隔5分钟总有人来找,或请求帮助。我们常常狼吞虎咽地吃饭,然后匆匆跑出房间去阻止日本士兵偷汽车,但更多的是保护妇女免遭日军的强奸。我们很少能大家一起坐下吃饭,天黑后我们不敢单独外出,而是两三个人一道出去。每隔一两天我们就出去视察一下教会的财产。每次我去我们在白下路的房子都看到有人进去过。在南京每座外国人的房屋都是一个景点,但从未被乱动过。日本人来后没有什么他们不碰的。所有的锁都被砸坏,箱子被洗劫,他们找钱和财物甚至找到了笛子和钢琴里。我们的相册全被弄坏,被打碎的盘子满地都是,还有日本兵抢劫后扔在地上的其他东西。钢琴的前面被拆掉,琴键被重物砸过。我们的房屋在安全区外,发生这样的事不足为奇,但安全区内的房屋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我们孩子学校的两幢房屋被人放火,其中一幢被彻底烧毁。南京一片狼藉。日军进城时,市内的建筑几乎没有受到什么破坏,但自那以后商店被抢劫一空,且大多数被烧毁。太平路、中华路,实际上城市所有主要的商业街都成了一片废墟。在城南,大街后面的大片地区也被烧毁。每天我们都看到新的大火,不知何时这种野兽般的破坏才会结束。

但人民的遭遇更惨。他们处在恐惧中,许多人除了身上穿的是一无所有。他们无依无靠,手无寸铁,完全由日本人宰割,而这些兵却能为所欲为,四处游荡。日本士兵不受任何纪律约束,许多人还喝醉了。白天到安全区的房子里来“踩点”,晚上返回把妇女抓走。如果妇女们躲起来,她们的丈夫将当场被刺死。从11—12岁的女童到50岁的妇女都逃脱不了这种命运。任何反抗都是致命的。重伤者被送到医院,一名怀孕6个月的妇女由于反抗,其脸上和身上被砍了16刀,肚子上也挨了一刀,被送到医院后,她的孩子死了,但自己的命保住了。在日本人保证人身安全后,自首的人没有几个返回安全区,其中一个人说,他们被当做练习刺杀的靶子。他们的身体显然证明了这一说法。另一批人被抓到古林寺附近,其中一人设法逃了回来讲述了他们的经历。他说他们从头到脚

① 现在南京大学校园内,赛珍珠的故居。

被浇上汽油,接着日本兵点火。这个人没有其他的伤,但头和脖子严重烧伤,几乎没有人样。同一天,另一个全身一半被烧伤的人来到我们医院,他还有枪伤,很有可能他们这批人被机枪打倒后,尸体被堆起来焚烧。我们不知道细节,虽然他爬出来,并设法来到医院,但后来他们俩都死了。

我所讲述的这些可怕的事情能使你几天没有胃口吃饭。真是难以置信,数以千计的人被以这种残忍的方式屠杀。很难估计究竟有多少人,有人相信已达一万。我们也遇到了一些令人愉快的日本人,他们对我们尊重且有礼貌。其他的却非常凶狠,威胁我们,还打过一些外国人。里格斯先生多次被打。偶尔也看过一两个日本人帮助某个中国人,抱起中国小孩和他们玩。不止一名日本士兵告诉我他不喜欢战争,要是能回家就好了,但有觉悟的很少,介于两者之间的更多。尽管日本使馆的人员很友好也想帮忙,但他们也无能为力。

现在该巡视医院了。我们有工作人员一百多名。当水电恢复后情况就好多了。现在由于每天要照料油灯和抽水,我们的工作量大增。天气不错,走到户外感觉很好。情况有所缓和但远没有正常。今天医院来的一个人,肚子被打穿,有4英尺长的肠子流了出来。他能够恢复的机会是千分之一。威尔逊医生整个上午差不多都在抢救他。午饭前,一名12岁的姑娘被两名开着一辆黄色出租车^①的日本士兵劫持走。又有不少被认为是士兵的中国人被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马吉的地方及其他地方抓走。许多人认识被抓走的人,证明他们是平民,但因为他们在手上有老茧,日本人就认定他们是士兵,而不再调查,不顾他们的抗议。许多人力车夫、摇舢板的船工以及其他干体力活的,只是他们手上有诚实劳动的印记而被屠杀。昨天一名为德国人看房的上了年纪的佣人在建安汽车站附近被枪杀。日本人在那找不到年轻人为他们干活,而他也拒绝去并抗议抓他,于是日本人就把他枪杀了。今天是平静的一天,你能想象如果我没有时间坐下来写日记将会发生什么样的事。

忙着为医院和鼓楼教堂里住的中国教徒运送大米,一共50袋,约65

① 原文如此。

吨。日本人加紧控制警察和中国人,这预示着进一步限制外国人的行动。尾木(Okii)先生建议我们美国人集中住到一个有警卫的地方,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知道有多少行动自由,但我们怀疑目的是限制我们的行动。没有登记的中国人只能在安全区内活动不准外出。

就写到这里,我必须把一些病人用救护车送回家,任何人出院都必须有一个外国人陪伴。我甚至是警察的官方警卫!我们这里非常拥挤,很高兴有些人能出去。许多人没有地方去,没有钱、没有衣服。这是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

我们不能一方面医治好他们,同时把他们赶走,让他们死于疏忽和饥饿,或是被打死,或是重新受伤。大多数人都是自南京陷落后由于刀伤和枪伤而进来的。

1937年12月31日

今天是一年的最后一天,人们正在准备庆祝新年,这一定是我们日本朋友所喜欢的节日,(日本人)宣布要放假三天,我们担心日本士兵有更多的闲暇时间会引发不测事件。有迹象表明情况有所好转。今天我看到大批人群穿过中山路离开安全区。后来他们带着大米返回,这些大米是日本人在考试院分发的。

今天有些人很高兴。医院又多了许多婴儿,母亲和婴儿在离开医院的时候总是很高兴,尽管他们没有像样的地方可去,只能到十分拥挤的几百个人一个房间的难民营里去。一个老奶奶和另外三个孩子护送新生儿回“家”,他们是这么说的。我们把他们塞进救护车,送他们到金大,在那里他们同2万名难民呆在“家”里。哥哥坚持要抱小弟弟,在这短暂,但是开心的途中,他们喜笑颜开。他们对什么感到高兴?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他们以高贵的方式成功地超越了客观环境。另一名在美国大使馆工作的工人来进行最后的检查,医生为他的枪伤拆线,他也是喜笑颜开。

到日本人那里登记正在圣经师资培训学校进行,花了大半个上午想为我们医院的职工登记,但人太多,我们没有进去。我们的人很想快点登记,担心登记的期限过了,没有登记就意味着死亡。由于有这么多的

工作要做，我们的人不可能天天去排队等待。上午我的其他时间花在为 我们 300 多人的大家庭弄食物上。他们一天当然要吃不少，食物很难得到，我们到南京城墙附近去弄，路很难走，由于大火使得许多瓦砾散落在街道上，不少地方几乎过不去。除非采取措施从外部运入，粮食问题将变得非常严重。

另一位刚生过孩子的妇女坚持要离开医院，尽管她没有地方可去，没有钱，没有朋友，没有婴儿用品。两天前她的丈夫被抓走，至今未回，也许永远也回不来了。她想自己去找他，踏破铁鞋也要找到他。她的身体非常虚弱，怎么能做到这点？我把她的名字给了一些难民营，试图找到（她的）一些朋友和邻居，但一切都是徒劳的。上帝！我们见证了一件什么样的苦难啊！

我们估计新政府明天将在南京就职，下午将在鼓楼举行一个庆祝仪式，过去的五色旗已被恢复，据说已定制了这样的旗帜，它们将同日本国旗挂在一起。

1938 年 1 月 1 日

这一年的第一天光荣地开始了，一片鞭炮声吵醒了我，我睁开眼睛，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太阳像个火球挂在蓝天上，天气很好。远处的紫金山看上去似乎像一条蓝色的瀑布。一派假日的气象。鞭炮是免费发给中国人的，谁会拒绝这种放纵地发出声响，从而释放自己内心压抑的机会呢？我们得知昨天他们分发了数万袋 200 磅的大米。大家相互道了新年的祝贺。

前天晚上我们被邀请到拉贝家做客，在那里我们看到了一棵点着蜡烛的漂亮的圣诞树，除了妻儿不在，一切似乎都很完美，但这一缺憾却是非常大的。我们邀请了特威纳姆（Twinem）夫人、马吉（Magee）先生、福斯特（Forster）先生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陈夫人来吃饭，庆祝新年。我们吃了我们最后一只鹅，当我们吃完饭时，我们的节日被破坏了。马吉处来了两个人（他有三个地方住满了难民），并说来了两名日本士兵来找妇女。我们准备好车，菲奇把马吉和福斯特送过去。后来，我们把两名姑娘送到医院，一个被强奸，另一个被毒打，后者在其父亲的帮助下逃

脱,但她在跳窗的时候受了伤。她们俩都有些歇斯底里。

不久,住在南京城东南地方的一名尼姑被送来,她是在12月14日被打伤的,她们5人躲在一个洞里,日本人从两边向洞里开枪,打死了3人,打伤了另外2人,这两人——这个尼姑和她十岁的徒弟躲在她们朋友的尸体下,躲过一劫。她们5天没有吃东西,18天没有得到任何医治。附近的一个中国人设法把这名身负重伤的尼姑送到了医院,她告诉我们那名被刺伤的小女孩后我开着救护车把她接来,此刻她的伤已愈合,需要的是食物,洗澡和舒适的环境。住在城东南的居民被吓坏了,他们被日军包围,在我们等这名小姑娘的时候,他们(日本士兵)聚集在我们周围,但这队日本士兵举止尚可,但在我等待的时候,来了一个醉酒的日本兵,欺负两位中国老人,他们吓坏了,跪下请求我的帮助,必须承认,对带枪的醉鬼,我也有点害怕,但在一名清醒的日本兵的帮助下——他分散了那个醉酒的日本士兵的注意力,这两个老人乘机逃脱了,这名醉酒的日本士兵显然为另一个日本士兵生气而迁怒于我,他拿起一根棍子向我走来,当我退到救护车边的时候我发现另一伙日本兵把我的勤杂工抓走了,他是一名厨师,出于好奇要求和我一起来,他的红十字袖章被扯了下来,他吓坏了,认为日本人一定要把他打死了。我把他救了下来。这时我担心我的救护车会被日本士兵抢走,但当我匆匆返回时,那些较正派的日本人仍然围着我们的救护车,因此我们笑着离开了他们。

过了几天,我们去了城郊,那里几乎没有人敢去,但每次我们都带着食物或伤员返回。今天我试着估计财产的损失的程度,从医院到中山路和白下路约有50%的房屋被破坏,白下路约有50%被破坏,中华路到建康路有60%以上的被破坏,城市最南端约有相同百分比的房屋被烧毁,鼓楼以南至东城墙约有20%—30%被烧毁,(破坏)主要集中在一些地区。今天下午另外一名妇女来到医院,她是在南京陷落前受的伤,她的家在城南的一个村子里,她同5个孩子一起离开了家的,最小才3个月,最大的12岁,日本飞机从她头上飞过时用机枪扫射,打中了她的眼睛,子弹从其喉咙附近飞出。她带着孩子挣扎了一段路程,但最终昏了过去,她的孩子聚集在她的周围。早上她意识到她无法抱着这个孩子继续走了,她把婴儿丢在一所空房子里,然后继续挣扎着前进,后来她遇到了

一些村民，他们帮助她来到一个难民营，18天后她才来到医院接受治疗。

今晚黄昏时分，我数了一下，城里不同地方共有5处大火。纵火、抢劫、强奸仍在继续着。安全区内的情况好一些，不过日本士兵还是来。然而，同过去我们日夜在好多地方阻止他们进来相比，情况要好多了，至少，我们有时间写日记了。

1938年1月3日

今天我们成功地使我们医院的一半职工登了记。我必须记下一些日本人今天干的一件好事。近来有数名很有礼貌的日本人到我们医院来，我们告诉他们我们医院的病人缺少粮食。今天他们给我们带来了100斤大豆和一些牛肉。医院已经一个月没有肉了，这些礼物真是太受欢迎了。他们还问我们想要什么。但每天都有长长的坏事记录。昨天下午，在国际委员会总部有个人被打死了。今天下午，有一个日本兵企图强奸一名妇女，她丈夫帮助她反抗，后来这个日本兵返回，开枪打死了这位丈夫。

今天早上来了一个处境困难的妇女，讲述了一个可怕的故事。她是被五名日本人抓到一个日本医疗机构里去的三人之一。她们白天为日本人洗衣裳，晚上被强奸。其中两位妇女要满足15—20名日本人。最漂亮的一个晚上要被40名日本人强奸。到我们这里来的这位妇女，被三个日本兵带到一个没人的地方，在那里他们企图砍下她的头。她的脖子上的肌肉被割断，但颈椎骨没有被砍断，她昏死过去，后来她还是挣扎着来到医院。众多日本暴行的见证人中又多了一名。

威尔逊医生试着缝合她的伤口，认为她还有存活的机会。日复一日，我们把这些可怕的情况报告给了日本当局。他们加强控制，发布命令。然而，每天不断有新的暴行的报告。今天一早，12架日本飞机从我们头上飞过。天仍然晴好，但对那些住在露天或是帐篷里的穷人来说却太冷了。我忘了提，在星期一中国人进行了一次空袭，我们差不多已忘记了空袭的滋味了，这次空袭打了日本人一个措手不及，最后日本飞机起飞了，疯子般地在天上追击着。我们的生活变得非常单调，我们对这些毫无理性、没有必要的残暴及中国人的苦难感到非常厌倦。我们在医

院的整个时间都花在缝合和拯救被日本人枪击和刀砍的受害者身上，所有这些人都是无辜、朴实的中国人。据说日本人到中国来就是为了帮助这些人的！当他们在元旦发表美妙动听的演说，并指责国民党不关心劳苦大众疾苦时，我们情不自禁地想到我们医院住满了他们的受害者。毫无疑问，外国对中国事务的援助与支持将被藐视和否认。

1938年1月5日

一个美丽早晨。从我住的阁楼窗户可以看到一幅壮丽的日出景色。我在X光室用零星拣来的配件修好了一台收音机，昨晚收听的效果不错。同外界的联系又建立起来了。到城南去了一趟，为我们的大家庭弄了一些蔬菜，看到大火在燃烧。

1938年1月6日

今天是星期天！日本领事馆的一位官员通知我们今天美国使馆的三位官员将到南京。他们这样说已有十天了，但显然在得到日本军队许可方面遇到了一些困难。我们曾试着通过日本人向他们发电报要他们回来，但日本人拒绝发这样的电报。他们希望我们所有人都离开南京，但我们在这里呆了这么长时间，知道了这么多东西，他们不允许我们离开。我们实际上成了囚犯。

我的收音机收听效果很好。我们设法又弄到了一台收音机，但收不到短波。我们收到了东京、马尼拉和上海的英文报道，还有好听的音乐。昨天我花了几小时听收音机。从各个电台常听到同一唱片，我都能为我们屋子里的其他人演唱了：

“我是眼球突出的水手，我是眼球突出的大力水手，
我要战斗到最后因为我吃了菠菜，
我是眼球突出的大力水手。”

有了新的工作，为新生儿接生。喔，对了，是特里默(Trimmer)和威尔逊医生接生，但我把他们送回家，送到拥挤不堪的难民营。差不多每

隔一天我们就要开着救护车出去,买蔬菜、大米和其他食物。外国人必须陪伴着,以保证交货。最近弄到了三条牛。张夫人为我们做了一些黄油。我们这些单身汉吃了 26 打庐州府桃子罐头,在过去的一个月的时间里,我们每天都吃。我们现在更多地吃大米和蔬菜。我了解日本人开始小批量的卖苹果,一毛钱一个。一些其他的物品也来了。

1938 年 1 月 6 日^①

今天最大的消息传来了,我们领事馆代表告诉我们,麦克伦、特里默、米尔士和史迈士的家属 30 号离开了杭州前往香港,他带来了你(麦卡伦家属)在 11 月份写的信,这是一个多月来,第一次得到有关外界的消息和信件,真是太好了。我希望你旅途舒适,不过我知道你一定遇到了许多不便甚至危险。当我知道你现在在哪儿,下站到哪里去后,我感到松了一口气。我得出结论,如果可能的话,你会去上海并把孩子放到美国学校读书的,我希望这种机会的到来,因为这意味着我不久之后就可以见到你,尽管我们还不敢肯定我们会被允许离开南京。我很高兴我留了下来。尽管我们只有 20 个人,但我们外国人在安全区各个难民营帮了很大的忙。如果我们要是 100 个人来防备 5 万名日本兵士的话,我们本来可以取得更大的成绩。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住了 1 万 2 千人,金陵大学房子里住了 2 万 5 千人,神学院和圣经师资培训学校各住了 2—3 千人,附近所有的房子都挤满了人。现在一些男子从事运送煤炭和大米的工作。我们不敢把卡车和汽车放在我们视线之外。

1938 年 1 月 7 日

我们白下路的房子里仍有一具尸体。南门妇女楼的一楼也有一具尸体。在波劳珀(Plopper)的院子里也有一具尸体。所有这些人都是在 13 号被打死的。在普赖斯(Price)的院子里有一个 6 个月大的婴儿的尸体,日本士兵在强奸其母亲的时候,婴儿在旁边哭,这个日本兵为了使他安静下来用手把他的鼻子和嘴巴捂了起来。我们还没有得到可以掩埋

^① 原文如此。显然作者将日期写错了。

尸体的许可,我自己在我们医院的防空壕里埋了 36 具尸体,主要是从附近的街道收集来的,大多数是士兵。死亡人数之多令人吃惊,男人、妇女、儿童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为什么战争这么具有兽性?日本人谈论让市民回家,重开生意,并运来了许多日本商品,外交使团想建立一个市政府,但是日本军队不同意。日本军队想要中国人回家,但日本士兵继续恐吓他们,因此他们不敢从安全区出来。老百姓想重操旧业,但日本军队抢走了货物,烧毁了商店;他们想做点小买卖,但日军把他们的钱抢光了;日本人想要他们生产,但日军杀死了所有的鸡、猪、牛,所有活的东西,多么具有讽刺性啊!

1938 年 1 月 9 日

一些(日本)记者来到一个难民营的门口,分发蛋糕、苹果,并递给难民一些零钱,日本人把这些拍成电影。与此同时,一伙日本兵从院子后墙爬进,强奸了十多名妇女,后面可没有人拍电影!

一些日本人想要恢复水、电的供应,前天,通过拉贝做出安排,让一些工人回来上班。后来一名军士领着一队日军往前往英国进出口公司,挑了一批发电厂的雇员,共 43 人,让他们站好队,用机枪把他们打倒。该厂是一家私人公司,日本兵没有调查说他们是政府雇员。这是一个月后南京的现状,几乎没有什么改善的希望。

现在日本人试图诋毁我们在安全区的工作。他们威胁和恫吓中国人来否定我们所说的话。一些中国人甚至愿意证明抢劫、强奸和纵火是中国人而不是日本人干的,有时我觉得我们在和白痴打交道,我想所有外国人都有这种可怕的经历。(我们)竟然也活了下来真是奇迹。

我们不知道我们何时才会被允许离开南京,因为这里的外国人很少,因此,在更多的外国人被允许进来之前我们也不想走。在我们的单身汉驻地生活还算正常,大家相处得很好。除了危险的情况外,我们都有滑稽的经历。我们相互讲述彼此这种经历时,大家都很开心。要是能换换口味,不吃桃子和青菜就好了。鸡蛋和黄油的味道有多好呀!但我们有许多面粉、大米,我们的花园还长着莴苣、胡萝卜、甜菜。如果日本军队安排得当的话,城市的大米是够 20 万人度过冬天的,但细想经济整

体状况很令人担心,没有生产,只有消费。刚刚得到消息,我的家属平安到达上海,感谢上帝!但现在她在哪儿?

1938年1月11日

两天前我们请美国使馆的人来吃饭,今天请了英国使馆及德国使馆的官员来吃饭。这可是真正的请客,由于一个多月没有见到外面的人,我们谈了许多,这简直是一顿谈话餐。我们仔细地听他们说的每句话,但仍有许多问题要问。医院已度过了紧急状态阶段。现在有电了,这样我们就可以听收音机了,这使得我们与世界靠得更近了。当我们能得到更多的医药物资时,我们将会觉得局势快要恢复正常了。强奸、抢劫仍没有结束,但这已成为旧的故事,仅仅重复也没有价值。现在有人希望通过威胁与贿赂来诋毁现存救援机构的声誉。其他一些人正从事着提供燃料与食物的工作。国际委员会卖的米价是11.25美元一袋(1.5吨),而自治政府卖的价格是每袋10美元,他们以每袋4美元的价格从日本人那儿买来的。而日本人一分钱也不花,全是抢来的战利品。

今天有人给了我们4条牛,我找了一个地方把它们养了起来,我乐意接受它们,因为我们可以得到牛奶。但我们面临着牛饲料不够的问题。

今天最有价值的消息是与日本领事馆的一位警察田中(Tanaka)有关。当我们跟他走时,我们看到了被抢劫的外国人的财物。人们还常常看到他在不同的场合出现。时不时地拣起一些小玩意。但昨天施佩林(Sperling)先生遇见了他,他正从一座漂亮的德国房子里出来,拖着两黄包车的古玩,毫无疑问他很喜欢这些东西。

我希望你能给我们带些信来。英国、德国和美国使馆工作人员非常帮忙,如果你知道他们何时有人来,可叫他们帮忙。

我们一直很忙碌,没有时间照顾我们的财产,我经常到医院附近我们的地方去看看,但这也没有多少用处,美国和日本贴的封条被撕掉了,日本兵在刚进城的几天里,对这些东西完全不当回事,每处都被多次抢劫,在有办法阻止他们进来前,打扫被日本士兵弄得一团糟的房子是没有用的。只有一两处,存放东西还是比较安全的。我没有能找到人来看

守这地方,到目前为止,日本士兵对日本使馆写的布告仍不买账,因此看守也将不安全。任何中国人不论是否在外国人的房子里,都会遭到日本士兵的抢劫或刺刀的屠杀。我们也找了一些日本人来看门,但他们要木炭、炉子、食物和一张床,他们很可能把床也带走了,如果他们冷,他们就会烧家具来取暖,美国使馆雇了日本人来守卫,但第二天就将其解雇了。

1938年1月13日

今天很忙,一早到和平门弄割牛饲料,但前天这里被焚烧,然后我们到莲花湖^①附近,在那儿弄到半车饲料,在另一地方我们弄到了一车棉籽饼。近来我们的救护车扮演着双重角色。我们还要返回再装一车,然后我要为马吉运一口棺材,他们的来自汤山的一位牧师死了,据我所知,他是抗议目前的局势而自杀的。然后,我们运了一桶豆油,重380斤,现在我们有了三个月的存货了。如果有时间,我会为供应的问题操心的,昨天我们运来了15袋大米,每袋100斤,这些主要是为我们在鼓楼教堂的中国教徒准备的。我们有四五名忠诚的来自南门的看门人在那里避难,他们没有受到骚扰。南京没有我们教会雇用的福音派新教会的工人和其他工人,这里只有该市的牧师。

我决心再接收4头牛,这样我们一共有8头奶牛,2头小牛。这4头牛在一个牛棚里被关了一个多月,那里的条件糟糕透了,因此,我们把它们及2头小牛、1只山羊和1只小羊排着队赶回医院。一路上(它们)叫声不断,引起抗议,但我们还是设法把它们赶回,拴在车库门前,这意味着能为病人提供更多的牛奶,因为我们得不到我们通常使用的豆奶,因此我们需要牛奶。

我外出弄了几救护车的白菜,农民不能把菜送来,因此必须有人去找。今天我们又找到一名合格的护士,芜湖医院的毕业生,我们50名护士中,大约只有10人是真正的。

今晚请美国使馆的官员来吃饭,特里默还没有和他们见过面。他们那里现在还没有供热,没有电和水,很难正常地运转和得到物资供应,当

^① 即玄武湖。

然他们也没有我们其他人所有的情趣和活动,没有报纸和外部的任何活动,有的只是需要解决的问题,对他们来说,生活有点太单调了。人们就像被关在什么里面一样。我们必须承认气氛非常暗淡和沉闷。

我们大家现在都非常希望到上海与家人团聚。

1938年1月15日

今晚英国使馆的一个人要到上海去,并答应为我们带信去,我把我给你写的但一直没法寄出的许多信带给你。

情况有所改善,但可怕的事情仍在发生,两天前我到门诊,看到一名15岁的孩子躺在桌子上,一部分胃和肠子流在外面,他是两天前受的伤。他住在武定门外,被日本士兵抓去挑蔬菜,干完后,日本人搜他的身,抢走了他的6角钱,然后刺了他几刀。

我们的英国朋友在听我们的讲述在南京发生的事情时,非常难受,这些事情对他们来说有些过于写实。因此在讲述时,我们尽量地不那么具体生动,但他们自己也遇到了一些可怕的事情,得到了一手材料。他们在视察英国财产的途中,在和平门附近看到了一具妇女的尸体,一根高尔夫球杆插进了她的下身,一部分露在外面。现在你知道这就是难民们为什么还呆在难民营里,为什么他们仍然恐惧的原因。当我们在场的时候,我们能够在美国财产的范围内保护他们,但我们所能做的仅仅是杯水车薪。

花了很多时间弄来了草和棉籽饼喂我们的奶牛,下个星期我将不得不寻找大米和煤,今天我开着救护车出去,格蕾丝·鲍尔(Grace Bauer)开着另一辆车去运白菜。她开到通济门外装货,并安全返回,在一定的程度上,我们外国人进出不成问题,这太好了。最近刚刚返回的一些外交官对我们没有被排上队拉出去枪毙感到惊奇,因为我们的确做了许多在日本人看来是不被允许的事。

我很高兴你在上海,男孩们上学。你仿佛就在身边,我希望不久能和你团聚。请勿责怪我把家庭的重担压在你一个人身上,我真希望能驱走艰难,因为我觉得亏欠家里很多。我们差会的工作结束时,我希望能溜过去。医院里急需一个经理人,人手奇缺,他们央求我,我无法拒绝。

74 东京判决书证及苏、意、德文献

我被卷入工作的漩涡中,尽管我多么想轻松一些。我的思绪一次又一次滑向你。我不批评那些离开的人,我想这是必做的事,我一直要求我的中国朋友和工人离开,但是我很高兴自己留在这里,这让我能分担帮助那些可怜人的重担。

如果你能在书店看到一份《斯帕汀新闻》,请记得把它和家信一起送来。

(杨夏鸣 张生 译)

21. 书证第 310 号

孙远震书面证词^①

我在南京长大, 现年 40 岁, 已婚。在(日军)占领南京前, 我曾是一名大米商人。我住在难民营, 日本人认为我曾当过兵, 以此为由将我从难民营抓走。后来日本鬼子终于承认我是平民。他们让我为日军做工, 我被安排在日军厨房烧水, 正是在这里, 我看到了一起屠杀南京平民的事件。日军光顾难民营, 检查通行证。日军兵营靠近南京火车站。百姓被命令去日军司令部领取通行证。第一次来的时候, 他们就被拘留, 第二次也是如此。^② 就是这些人被屠杀。日军以要求这些人(有男有女)在河堤点名为由, 将他们排成队。载着机关枪的卡车开了过来, 车上的日军对准人群开火。每辆卡车上都有 15 到 20 名士兵。日本军官在场, 每辆军车上都有一名佩带军刀的军官。我在厨房, 离遭枪杀的人群大约 40^③ 远, 射击持续了一个小时左右。在我观察的那段时间, 我估计有 10 000 人被枪杀。(见证人: 马仲仁 马秀英 牛肉饭店 在下关)

上文提到其姓名的那个女孩和男子也同样看见上述场面, 他们与我一道在厨房干活。大部分尸体被扔进河中, 而且我看见日本士兵把这些人扔进河中。有一些尸体就留在堤岸上。向河中扔尸体的士兵大约有 400 名, 他们干了一个半小时左右。有一些尸体遗弃在岸上, 并在那里停放了数月之久。机关枪射击的声音离我非常近, 我的左耳都被震得有点聋了, 直到现在仍有问题。我干了三个多月, 然后逃跑了, 但在出逃中受伤。这份陈述由中国军队的涂上校翻译给我听, 内容属实。这次屠杀发

① 参见本史料集第 7 册第 379—380 页, 此次补译了相关时间、地点和人名。

② 原文如此。

③ 原文没有单位。

76 东京审判书证及苏、意、德文献

生在 1938 年 12 月^①

孙远震 集庆路终所巷 7 号

见证人：涂莹光 莫罗上校

1946 年 4 月 7 日

(文俊雄 译 杨夏鸣 张生 校)

^① 原文如此,应为 1937 年。

22. 书证第 311 号

李涤生书面证词^①

李涤生, 现年 28 岁, 已婚, 南京本地人, 家住南京终所巷 7 号。

大约在 1937 年 12 月 15 日早上 8 点左右, 当我从下关兴中门内北祖师庵 46 号出来的时候, 看见两个日本士兵向我走来。日本士兵正征召中国平民做劳工, 我看见他们已经征召到一批, 约 30 名中国平民。日本士兵命令我停下, 当时我手上拿着饭碗, 我弯下腰把饭碗摆在一块木板上。日本士兵对我没有立即停下来感到不高兴, 他们打我耳光, 强行把我推入劳工队伍。我们被人押解到下关兴中门, 日本人要我们搬走中国政府军队在打仗时为阻挡日军而堆在城门前的沙袋。头一天平安无事。第二天我再次去干活时发现, 就因为没太明白日本人叫他们做什么, 与我们一道干活的劳工中有三人被日军开枪打死。于是我决心在干完当天的活后逃走。

第二天, 我在难民区再次被日本兵抓去作劳工, 与我一起的还有三人。日本人命令我们用扁担替他们挑行李。其中一人挑不动, 问日本人他是否能回家。日本兵命令他跪下, 用扁担活活将这个可怜的同伴打死。

大约在 12 月 23 日, 我当时正住在北平路的一栋房子里, 上午 9 点左右, 两名日本军官和几名士兵带着一个中国人来到我们住的这条街, 并让这名中国人为他们传话。日本人命令所有街坊邻里从屋里走出来, 然后, 这个中国人告诉他们: 所有人都要从日本人那里领取居住证。这些居民被告知, 那些曾为中国军队工作过、那些适合为军队服务、那些曾被征召到劳工团的人走到前面来, 这些人将受到日本人的照顾。他们将为日本人工作, 并有报酬, 得到住处。当他们不想再为日本人工作时还允许他们随时回家。有 50 至 60 个人从队伍中走了出来。大多数人都是

^① 参见本史料集第 7 册第 381—382 页, 此次补译了时间、地点和人名。

些无家可归者、失业者,都以为日本人会履行承诺。事后,我回到家中,从楼梯窗口观察。我看到日本人押着这 50 至 60 名男子往这条街的另一头走去,这条街叫虎踞关。所有这 50 至 60 名男子在小水塘边的空地上排成行,被机关枪打死。我看到有一个还没死,挣扎着,日本人向他们所有人身上浇汽油,用火烧他们。

大约在 12 月 27 日上午 10 点,当我走在上海路时,我看见一名日本士兵从一名国际安全区警察身边走过。这名警察在擦身而过时向这个日本士兵敬礼,日本兵命令他不准动,然后用刺刀刺他的腹部,这名警察当场死亡。

以上陈述由亨利·裘(Henry Chiu)^①为我译成中文,内容属实。

李涤生

见证人:约翰·J. 克劳利(John J. Crowley)及亨利·裘

1946 年 4 月 7 日

(文俊雄 译 杨夏鸣 张生 校)

① 即裘劭恒。

23. 书证第 312 号

陆沈氏书面证词^①

陆沈氏,45 岁,南京人,住洋珠巷三号。

本人现居南京,是一名 45 岁的寡妇。大约在 1937 年 12 月 21 日,一伙日本士兵从南京过长江来到我在六合新集的家中。我的丈夫是名教师。这伙日本士兵约有 20 人,他们找女人,其中 8 人将我围住想把我带走。但由于我四个孩子当时在哭闹,日本兵不耐烦就离开了我的屋子。这样,日本兵没有将我带走。这是大约 7 点或 8 点钟的事,过了一会儿,又来了 5 或 6 个某中岛部队的日本兵(另一伙)。他们带走我丈夫想把他送进劳工队。日本人要他扛谷子,但因为他扛不动,日本兵在相距 100 码远的几个地方用刺刀将他刺死。我看见了这一幕,因为我跟在他的后面想看看日本人会把他怎么样。我丈夫的尸体第二天就埋了。

他的颈子、肾、前额等数处被刺。看到他被刀刺死,我就逃回家中。

我与父亲一道回家,他也看到这一幕,现在他也住在南京。还有其他人看到这件事。我父亲的名字叫孙松延。

这份陈述由亨利·裘翻译,内容属实。(手印)

见证人:莫罗上校、约翰·J. 克劳利以及亨利·裘。

1946 年 4 月 6 日

(文俊雄 译 杨夏鸣 张生 校)

① 参见本史料集第 7 册第 382—383 页,此次补译了时间、地点和人名。

24. 书证第 313 号

吴经才书面证词^①

吴经才, 现年 26 岁, 南京本地人, 住同仁街 11 号。

在 1937 年 12 月 13 日日军进入南京之前, 我已经搬进难民区。大约在 12 月 17 日, 日军在我住的那条街上入室搜查。当他们搜到我住的房屋时, 命令我替他们挑他们抢来的东西。之前他们已经找了好几个中国人替他们挑战利品。

在前往日本士兵当时驻扎的和平门外幕府山的路上, 又有一些平民被抓来替他们挑沿途继续入室抢夺来的物品。到达幕府山后, 日本士兵命令我们所有人都留在那里服侍他们。大约在 12 月 20 日晚上 7 点左右, 日本兵检查所有被抓过来为他们干活人的手掌。其中 5 人被发现手上有老茧, 于是他们被日本兵用刺刀刺死。我之所以看见这一幕是因为我在场, 而且双手也被检查过。在日本兵带我们前往幕府山的时候, 我发现有许多尸体躺在路边以及其他一些地方, 估计有 200 名中国人, 其中包括许多儿童。多数人, 包括儿童, 都是被刺刀刺死的。

这份陈述词由亨利·裘翻译给我看, 内容属实。

吴经才

1946 年 4 月 7 日

约翰·J. 克劳利以及亨利·裘见证。

(文俊雄 译 杨夏鸣 张生 校)

^① 参见本史料集第 7 册第 383 页, 此次补译了时间、地点和人名。

25. 书证第 314 号

居鸿恩^①和张其兴的书面证词^②

居鸿恩,住船巷 108 号;张其兴,住船校巷 43 号。高邮人。

我们住在同一条街上,靠的很近,街名叫船板巷。日本人进城的第一天,这两人带着全家逃到名叫沙家韦[圩]棉花地的郊区,在那里住了下来。日军指控我们曾在中国部队干过。在一所房子里有 14 口人(两家),日本兵来后杀死了居鸿恩的儿子(他儿子 30 岁,还有个女儿 27 岁,当时还怀着身孕)。女儿被踢死,儿子被枪杀。我们两人都看见这一惨景。我们在房屋前被日军排成队,另有两人被杀害,即张其兴的父亲,当时 13 岁^③和张其兴的叔叔。其父被枪杀,其叔被刺刀刺死。我们两人都是目击者。我们当时都跪在日本人面前。

事后,其余的人都逃走了。我们之中没有一个男人曾当过兵,全是南京市民。

这份陈述词由亨利·裘翻译并念给我们听,内容真实无误。

居鸿恩、张其兴

1946 年 4 月 6 日

见证人:莫罗和约翰·J. 克劳利

(文俊雄 译 杨夏鸣 张生 校)

① 签名作“居鸿恩”,当时的日文翻译误为“居宏恩”。

② 参见本史料集第 7 册第 383—384 页,此次补译了时间、地点和人名。

③ 原档如此,这里显然手写有误。

26. 书证第 315 号

黄江氏书面证词

黄江氏,66 岁,洋珠巷 3 号。

本人系南京居民,日本人攻陷南京时,我居住于本市。当时我儿子和女婿和我住在一起,女婿被枪杀,儿子被带走后再也没有回来。我女婿是名会计,儿子是法院文书。女婿是在难民区被日本人枪杀的,我的女婿和儿子都没有当过兵,也没有在军队里做过事。我给日军下跪,求他们放过我女婿,但没有用。那起事是五六个日本兵干的,其中有一两个带有佩刀,他们杀人不要任何理由。那时我女婿 46 岁,儿子 41 岁。我本人是个 66 岁的寡妇。虽然我没有目睹其他杀戮情景,但是我亲眼看到了南京那时遍地的尸体。

这份陈述由亨利·裘翻译读给我听,内容确实无误。

黄江氏指印

1946 年 4 月 6 日

见证人:莫罗上校,约翰·克劳利

(谈礼英 译)

27. 书证第 316 号

哈笃信书面证词^①

我是南京市民,出生在南京。我现年 27 岁,家住建邺路 36 号,出生以来一直生活在那里。我是一个平民。

12 月 14 日,我看见一个日本士兵向一名平民开枪,将其打死。就因为这人的右手有老茧。日军声称,老茧表明这人当过兵,手上的老茧是使用枪支的结果。而事实上,这人只是一个做面条的平民。我也因同样的原因被检查过,好在我手上没有老茧。枪击发生在我当时所住房屋的院子里。

我看见一名中国妇女被两名日本士兵拖进一间房内。她当时大声哭叫,试图反抗。大约两星期后,我还看到一个日本兵将一个大约 13 岁的女孩拖进一间房里,事后得知,这个女孩在那里被强奸。

这份陈述词由亨利·裘翻译并念给我听。

哈笃信

1936 年 4 月 7 日

见证人:莫罗上校,约翰·克劳利,亨利·裘

(文俊雄 译 杨夏鸣 张生 校)

^① 参见本史料集第 7 册第 384 页,此次补译了时间、地点和人名。

28. 书证第 317 号 王陈氏书面证词^①

(41 岁,南京本地人,寡妇)12 月 26 日下午 4 点左右,四个日本兵来到我家(洋珠巷 17 号)将我丈夫杀害。他们准备强奸我,3 个日本兵强行扒开我的裤子,在扒上衣的时候,我丈夫正好过来护住我,他被日本兵活活踢死。我的孩子也在这个房间,他们哭着。我的孩子一个 4 岁,一个只有 2 个月。在杀害我丈夫后,日本兵没有强奸我而是离开了我家。

以上由亨利·裘翻译给我听。

王陈氏指印

1946 年 4 月 6 日

见证人:莫罗上校,约翰·克劳利,亨利·裘

(文俊雄 译 杨夏鸣 张生 校)

^① 参见本史料集第 7 册第 384—385 页,此次补译了时间、地点和人名。

29. 书证第 318 号

吴君清书面证词^①

(家住南京金沙井 41 号)日本兵命令我兄弟跪在他们面前,由于他没有立即这么做,日本兵用刺刀刺他的左胸口。我兄弟当时手无寸铁。发生这一幕时,我嫂子,我兄弟的妻子以及妈妈和我本人都在场。

我兄弟在制服外面穿了件便装。他当场死亡。这件事发生在 1938 年 1 月,地点在南京附近的一个村子里。亨利·裘为我翻译,该陈述词真实无误。当天下午,我还看到其它许多具被刺刀和被殴打死的中国平民的尸体,有男有女。

吴君清

无日期

见证人:莫罗上校,亨利·裘

(文俊雄 译 杨夏鸣 张生 校)

^① 参见本史料集第 7 册第 385 页,此次补译了时间、地点和人名。

30. 书证第 319 号 袁王氏书面证词^①

袁王氏,47 岁,南京当地人,家住中正路 457 号。

我弟弟王生英是当地一家志愿团体的成员,1937 年日军刚进南京,他就被抓住,前额被刺刀刺了三刀,脊背被刺数刀。我本人看到了这一幕。他当时身着便装,举止像个难民。出事时,我们住在阴阳营的一家难民营中。他很快就死了。这一志愿团体的职责是制止抢劫。出事时,我在附近还看到许多其他中国平民的尸体。该团体并非军事组织,是由市民发起的。亨利·裘翻译

袁王氏指印

1946 年 3 月 7 日

见证人:莫罗上校

乔治·李 上海愚园路 611 号里 16 房

(文俊雄 译 杨夏鸣 张生 校)

^① 参见本史料集第 7 册第 385 页,此次补译了时间、地点和人名。

31. 书证第 320 号

王潘氏书面证词^①

王潘氏, 24 岁, 南京当地人, 家住九儿园 40 号。

1937 年 12 月 13 日日军人城时, 我和父亲、姐姐已经迁入难民区内上海路 100 号的一座房子里住着。这座房子里住着约 500 人, 我经常看见日本士兵过来索要和搜寻妇女。有一次, 一名妇女在露天院子里被强奸。事情发生在晚上, 我们都能听见这名妇女在遭强奸时的哭喊声。但当日本士兵离开的时候, 我们却没能找到这名女子, 原来日本人把她带走了。

还有一次, 我看见日本士兵开着卡车过来, 把房子里的女人赶到一起。这些人都被日本兵带走, 除一名女孩外全都没有再回来。这名女孩被日本士兵强奸后设法逃回家, 她告诉我, 被卡车带走的所有女孩都被日本兵多次强奸、轮奸。这名设法逃回家的女孩还告诉我, 她曾看见一名女孩被强奸后, 日本兵还把纸烟塞进她的阴道里, 这个女孩就这样被折磨至死。当时我只有 15 岁, 每次日本人来的时候我都躲了起来, 这也是日本士兵从未抓到我的原因。

我奶奶和 3 个叔叔住在离上海路我住的地方不远的一间芦席棚里。大约在 1937 年 1 月^② 16 日下午一点左右, 我到芦席棚看望奶奶。我到那里的时候, 3 名日本士兵来到这里, 从屋里往外拖一名妇女。这位妇女一直与其丈夫、婆婆住在同一间芦席棚中。她的丈夫跟在后面, 试图制止日本士兵。日本兵抓住他, 往他的鼻子里穿电线, 并把电线的另一头系在一棵树上, 就像系一头牛一样。然后, 日本士兵用刺刀刺他身上多个部位。这名男子的妈妈也跑出来, 在地上打滚嚎啕。日本兵讨厌老太的哭求, 继续用刺刀刺她的儿子。日本士兵叫她回屋去, 否则将杀死

① 参见本史料集第 7 册第 385—386 页, 此次补译了时间、地点和人名。

② 原文有误, 应为 12 月。

88 东京审判书证及苏、意、德文献

她。由于伤势过重,老人的儿子当场死亡。我目睹了整个情景,因为我站在门内看到了一切。

王潘氏指印

1946年4月7日

见证人:约翰·克劳利,亨利·裘

(文俊雄 译 杨夏鸣 张生 校)

32. 书证第 321 号

吴张氏书面证词

吴张氏, 现年三十一岁, 中国南京人, 现住金沙井四十一号 供述

日军进入南京约两星期后, 吴张氏(彼时尚未结婚)随其家人避往美国大使馆对面之屋内。此屋原为一德国医生所住, 是时在此屋内的人很多, 因为他们以为在美国大使馆附近当可安全。某日下午三时(日子不能记忆)三日兵冲入此屋, 屋内之人皆逃往上层。仅一十八岁之女孩未能逃脱, 遂被捉获, 为此三日兵轮奸致死。日兵去后, 其余的人下楼, 见女已死, 且下部流血。此女之父, 曾充德医生之司阍, 当将其女尸体埋葬。

证人: 吴张氏

上开证言, 作成记录后, 曾向证人宣读讲解, 经自认无误。裘劭恒

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四月七日

(张生 照原档抄录)

33. 书证第 322 号 陈贾氏书面证词^①

陈贾氏,年 51 岁,家住南京健业[建邺]路 86 号。

日军进入南京的第一天,他们放火烧毁了我们的家,一家老小,包括我婆婆,我弟弟和他妻子,我的两个孩子,我姐夫家年龄分别为 5 岁和 2 岁的孩子,只得住进难民营。

在我们前往难民营途中来到一个名叫老王府的地方时,我们撞上了 12 名日本士兵,包括一些佩带军刀的军官。其中一个带军刀的日本士兵,我想他应该是个军官,抓走我的弟媳,并当着她丈夫和孩子的面将其强奸后杀死。她的丈夫想保护自己的妻子而被杀害,她的两个孩子在受蹂躏时大哭也被杀害。其中,5 岁的女儿嘴里被塞了衣服而闷死,男孩则被刺刀刺死。他们的父母都被刺刀刺死。我的婆婆也被刺刀刺伤,12 天后死亡。我跌倒在地,后来与我的两个孩子一起逃走。这一切发生在上午 10 点左右,发生在大白天,发生在南京的大街上。我目睹了所有这一切。我走向难民营,在路上看到多具女尸和男性平民尸体。女尸衣服被掀开,看来死前遭到强奸。我看到大约有 20 具尸体,大部分是女人。

陈贾氏指印

1946 年 4 月 6 日

见证人:莫罗上校,约翰·克劳利

(文俊雄 译 杨夏鸣 张生 校)

^① 参见本史料集第 7 册第 387 页,此次补译了时间、地点和人名。

34. 书证第 323 号

《安全区档案》(略)

参见本史料集第 12 册第 269—388 页。

35. 书证第 324 号

南京慈善机关暨人民鲁甦报告 敌人大屠杀概况统计表^①

中华民国三十五年一月二十日

首都地方法院首席检察官陈光虞

南京慈善机关暨人民鲁甦报告敌人大屠杀概况统计表

证人或机关	死亡人数
南京市崇善堂	十一万二千二百六十七人
世界红卍字会南京分会	四万三千零七十一人
下关区	二万六千一百人
伍长德	二〇〇〇余人
鲁甦	五七四〇〇余人
芮芳缘张鸿儒杨广才	七〇〇〇余人
无主孤魂之碑	三千余人
总计死亡人数约共二十六万人	

^① 该书证由中国方面提交给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其编排与内容与本史料集第 5 册相关文件略有不同,请参照阅读。

南京市崇善堂掩埋队工作一览表

区别		城 区													乡 区				总 计																																																																											
时间	年	二十六年 中华民国				二十七年 中华民国									共	二十七年 中华民国				共																																																																										
		月	十二月				一月			二月			三月			共	四月																																																																													
队别	崇字掩埋队第一队		第二队	第三队	第四队	第一队	第二队	第三队	第四队	第一队	第二队	第三队	第四队	第一队	第二队		第三队	第四队	计	第一队	第二队	第三队	第四队	计																																																																						
收尸处所		沐府西门至估衣廊				挹江门以东				新街口以南				中华门以东				北门桥至唱经楼				兴中门至小东门				老王府至芦政牌楼				小府至莲子营				鼓楼至大石桥				御史廊至高桥门				花牌楼至洪武门				长乐路至半山园				太平门至富贵山				大树城至蓝家庄				石板桥至尚书街				清查城内东半边				共				中华门外兵工厂雨花台至花神庙				水西门外至上河				中山门外至马群				通济门外至方山				共								
掩埋地点		五台山				城根				五台山				城根				红大桥及北极阁				城根				观音庵及竺桥东首				城根				鼓楼及倒钟场浮桥等处				土城根及南城				三条巷大中桥城根等处				城根				城根及山脚				城根				公园东边及浮桥				附近各荒地墓园				计				附近各荒地菜园				全上				全上				全上				计								
尸数		男	九六				三四二				八三				三五二				二七二				三五〇				二八四				四三二				三五四				五八七				五二九				八七八				六一〇				四七二				七一五				三八五				六七四一				二五七五二				一八四二九				三三六〇一				二四八三九				102621				109362			
女			二二				三八				七				三四				二九				五一				四六				三一				一三				二八				二四				三六				二二				三九				四八				五四				五二二				五六七				三三六				一九一				四七五				1569				2091			

续 表

尸体	小孩	六	十二	一	一八	九	二二	四	二五	八	七	一五	二八	一六	一七	六二	三五	二八五	二九三	二二	三六	一七六	528	813
	合计	一二四	三九二	九一	四〇四	三一〇	四二三	三三四	四八八	三七五	六二二	五六八	九四二	六四八	五二八	八二五	四七四	七五四八	二六六一二	一八七八八	三三八二八	二五四九〇	104718	112266①
备注		至廿八日工收埋以上数 十二月廿六日开始工作				一月三日至二月四日				二月五日至三月六日				三月七日至四月八日			三月七日至四月六日		四月九日至十八日		四月九日至廿三日		四月七日至廿日	

世界红卍字会南京分会救济队掩埋组掩埋尸体人数统计表

城 内 区							
埋葬地址	尸体具数			合计	月	日	备 注
	男	女	小孩				
清凉山后山	一二九			一二九	十二	二二	在收兵桥一带收殓
金陵大学农场	一二四	一		一二五	一	二六	在西桥塘内收殓
五台山荒山	一七	二		一九	二	二	在汉中路一带收殓
清凉山坟地	四九			四九	二	六	在龙蟠里一带收殓
韩家巷西仓山上	一四七		二	一四九	二	七	在西仓塘内收殓
五台山荒山	一六		四	二〇	二	十一	在上海路一带收殓
古林寺山上	一〇七	二		一〇九	二	十四	在古林寺山上收殓
阴阳营南秀村	六五〇	二	二〇	六七二	二	十九	在城北各处收殓

① 此数字与前一表差一人，但原文如此。

续 表

城 内 区							
埋葬地址	尸体具数			合计	月	日	备 注
	男	女	小孩				
古林寺后山	一五四			一五四	二	二〇	在龙池庵收殓
全右	二九	一		三〇	二	二二	在城北各处收殓
阴阳营北秀村	三三七			三三七	二	二七	全右
城 外 区							
埋葬地址	尸体具数			合计	月	日	备 注
	男	女	小孩				
中华门外望江矶	一〇〇	九		一零九	十二	二二	在城内各处收殓
中华门外高竿柏村	二五〇	一一		二六一	十二	二二	城内各处收殓
中华门外普德寺	二八〇			二八零	十二	二二	同右
	六、四六八			六、四六八	十二	廿八	
上新河黑桥	九九六	二		九九八	一	十	在上新河一带收殓
中华门外望江矶	四〇七	二一	三	四三一	一	二三	在城内各处收殓
水西门外二道杆子	八四三			八四三	二	七	在水西门外河边收殓
上新河太阳宫	四五七			四五七	二	八	在太阳宫河下收殓
水西门外南伞巷	一二四	一		一二五	二	九	在水西门外各处收殓
上新河二埂	八五〇			八五〇	二	九	因尸已烂就地收殓
上新河江东桥	一、八五〇			一、八五〇	二	九	在江东桥一带收殓
上新河棉花堤	一、八六〇			一、八六〇	二	九	因尸已烂就地收殓
汉西门外广东公墓	二七一	一		二七二	二	十一	在汉西门外一带收殓

续 表

埋葬地址	城 外 区			合计	月	日	备 注
	男	女	小孩				
水西门外大王庙	三四			三四	二	十二	水西门外塘中收殓
下关渡固里	一、一九一			一、一九一	二	十二	因尸已烂就地收殓
中央体育场公墓地	八二			八二	二	十四	在体育场附近收殓
上新河中央监狱	三二八			三二八	二	十四	在中央监狱内收殓
上新河观音庵空场	八一			八一	二	一五	在该处火场内收殓
上新河凤凰街空场	二四四			二四四	二	一六	在该处西街收殓
汉中门外二道杆子	一、一二三			一、一二三	二	一八	在该处河边收殓
上新河北河口空场	三八〇			三八〇	二	一八	在北河口一带收殓
下关九家圩	四八〇			四八〇	二	一八	在下关沿江边收殓
下关鱼雷军营旁	五二四			五二四	二	一九	因尸已烂就地收殓
下关草鞋闸空地	一九七			一九七	二	二一	在鱼雷营码头收殓
全右	二二六			二二六	二	二一	同右
下关鱼雷军营码头	五、〇〇〇			五、〇〇〇	二	二一	因尸已烂就地收殓
下关石榴园	一四七			一四七	二	二一	在幕府山旁收殓
幕府山下	一一五			一一五	二	二一	在草鞋闸后收殓
下关鱼雷军营码头	三〇〇			三〇〇	二	二二	因尸已烂就地收殓

续 表

城 外 区							
埋葬地址	尸体具数			合计	月	日	备 注
	男	女	小孩				
中华门外普德寺义地	一〇六			一〇六	二	二三	在城内各处收殓
下关姜家园	八五			八五	二	二五	在下关各处收殓
下关石榴园	一、九〇二			一、九〇二	二	二六	在幕府山旁收殓
下关东炮台	一九四			一九四	二	二六	在煤炭港码头收殓
下关上元门外	五九一			五九一	二	二七	在上元门内一带收殓
中华门外望江矶义地	八七			八七	二	二八	在城北各处收殓
三汊河后边	二九			二九	三	一五	在该处一带收殓
和平门外永清寺旁	一四〇九			一四〇九	三	二	在该处大涡子收殓
下关石榴园	一、三四六			一、三四六	三	一	在幕府山旁收殓
三汊河西南空场	九九八			九九八	三	一	在三汊河一带收殓
上新河五福村	二一七			二一七	二	二一	在五福村电台等处收殓
下关草鞋闸空地	一五一			一五一	二	二二	在鱼雷营码头收殓
下关石榴园	七八六			七八六	三	三	在幕府山旁收殓
下关煤炭港江边	一、七七二			一、七七二	三	六	因尸已烂就地收殓
下关海军医院后堤边	八七			八七	三	一四	在该处及怡和码头收殓
上新河甘露寺空场	八三			八三	三	一五	在该处一带收殓
中华门外华严寺山顶	一〇〇			一〇〇	三	一九	在安德门一带收殓

续 表

城 外 区							
埋葬地址	尸体具数			合计	月	日	备 注
	男	女	小孩				
中华门外普德寺 西安里堂	七九九			七九九	三	廿五	在城内各处收殓
太平门外城墙根	五〇〇			五〇〇	三	廿七	因尸已烂就地收殓
上新河甘露寺 空场	三五四			三五四	三	廿三	在该处一带收殓
中华门外安德里 西山上	一三三			一三三	三	廿四	在上新河附近收殓
中华门外普德寺 义地	一、一七七			一、一七七	四	一四	在城南北各处收殓
上新河贾家桑园 空地	七〇〇			七〇〇	四	一六	在上新河各处收殓
三汊河空地	二八二			二八二	四	一九	在三汊河口一带收殓
下关煤炭港空地	三八五			三八五	四	二七	在江边水上收殓
下关兵站处江边	一〇二			一〇二	四	二九	在下关沿江边收殓
中华门外普德寺	四八六			四八六	四	三〇	在兵工厂及城内收殓
下关石榴园	五一八			五一八	五	一	在兵站处江边收殓
老江口埂边	九四			九四	五	一五	全右
下关江滩边	六五			六五	五	一八	在江边水上收殓
上新河黑桥	五七			五七	五	二〇	在上新河江边收殓
中华门外普德寺 山上	二一六			二一六	五	二六	在城内各处收殓
下关煤炭港	七四			七四	五	三一	在该处江边收殓

续 表

城 外 区							
埋葬地址	尸体具数			合计	月	日	备 注
	男	女	小孩				
中华门外普德寺山上	二六			二六	六	三〇	在城内各处收殓
同右	二九	五	一	三五	七	三一	同右
同右	一四	四		一八	八	三一	同右
中华门外普德寺	三一	八	九	四八	九	三〇	同右
同右	四二	一三	七	六三	十	三〇	同右
城外区总计	四一一八三	七五	二〇	四一二七八①			
城内区总计	一七五九	八	二六	一七九三			
城内外合计四万三千〇七十一名							

下关区掩埋被敌惨杀死亡尸体具数统计表

城 内 区							
埋葬地址	尸体具数			合计	月	日	备 注
	男	女	小孩				
上新河黑桥	九九六	二		九九八	一	十	在上新河一带收殓
上新河太阳宫	四五七			四五七	二	八	在太阳宫河下收殓
上新河二埂	八五〇			八五〇	二	九	因尸已烂就地收殓
下关渡固里	一、一九一			一、一九一	二	十二	全
上新河江东桥	一、八五〇			一、八五〇	二	九	在江东桥一带收殓
上新河棉花堤	一、八六〇			一、八六〇	二	九	因尸已烂就地收殓
下关渡固里	一、一九一			一、一九一	二	十二	全
上新河中央监狱	三二八			三二八	二	十四	在中央监狱就地收殓

① 原文如此。

续 表

城 内 区							
埋葬地址	尸体具数			合计	月	日	备 注
	男	女	小孩				
上新河观音巷空场	八一			八一	二	一五	在该处火场内收殓
上新河凤凰街空场	二四四			二四四	二	一六	在该处西街收殓
下关石榴园	一、九〇二			一、九〇二	二	二六	在幕府山旁收殓
下关姜家园	八五			八五	二	二五	在下关各处收殓
下关东炮台	一九四			一九四	二	二六	在煤炭港码头收殓
下关上元门外	五九一			五九一	二	二七	在上元门内一带收殓
下关石榴园	一、三四六			一、三四六	三	一	在幕府山旁收殓
下关煤炭港江边	一七七二			一七七二	三	六	因尸已烂就地收殓
下关海军医院后堤边	八七			八七	三	一四	在该处及怡和码头收殓
三汊河后边	二九			二九	三	一五	在该处一带收殓
上新河甘露寺空场	八三			八三	三	一五	全
全	三五四			三五四	三	二三	全
上新河贾家园空地上	七〇〇			七〇〇	四	一六	在上新河各处收殓
上新河北河口空场	三八〇			三八〇	二	十八	在北河口一带收殓
下关九家圩	四八〇			四八〇	二	十八	在下关沿江边收殓
下关鱼雷军营旁	五二四			五二四	二	十九	因尸已烂就地收殓
下关草鞋闸空地	一九七			一九七	二	二〇	在鱼雷营码头收殓

续 表

城 内 区							
埋葬地址	尸体具数			合计	月	日	备 注
	男	女	小孩				
全	二二六			二二六	二	二一	全
下关鱼雷军营 码头	五、〇〇〇			五、〇〇〇	二	二一	因尸已烂就地 收殓
下关石榴园	一四七			一四七	二	二一	在幕府山旁收殓
幕府山下	一一五			一一五	二	二一	在草鞋闸收殓
上新河五福村	二一七			二一七	二	二一	在五福村电台等 处收殓
下关草鞋闸空地	一五一			一五一	二	二二	在鱼雷营码头 收殓
下关鱼雷军营 码头	三〇〇			三〇〇	二	二二	因尸已烂就地 收殓
三汊河空地	二八二			二八二	四	一九	在三汊河口一带 收殓
下关煤炭港空地	三八五			三八五	四	二七	在江边水上收殓
下关石榴园	七八六			七八六	三	三	在幕府山旁收殓
三汊河西南空场	九九八			九九八	三	一	在三汊河一带 收殓
下关兵站处江边	一〇二			一〇二	四	二九	在下关沿江边 收殓
下关石榴园	五一八			五一八	五	一	在兵站处江边 收殓
老江口埂地	九四			九四	五	一五	全
下关江滩边	六五			六五	五	一八	在江边水上收殓
上新河黑桥	五七			五七	五	二〇	在上新河江边 收殓
下关煤炭港	七四			七四	五	三一	在该处江边收殓
总计	二六〇九八	二		二六一〇〇			

民国廿六年古历十一月十三日，寇中岛部队入城后，民等由沙洲圩避难回归，眼见沿途尸横遍野惨不忍睹，乃于初四日由芮芳缘至中国红卍字会接洽拟办理掩埋工作。当由红卍字会负责人介绍至第一区公所救济组领列红卍字旗帜及符号等件后，即集合避难回归之热心人士卅余人组织义务掩埋队。当于初六日开始掩埋工作，由南门外附廓至花神庙一带经四十余日之积极工作，计掩埋难民尸体五千余具，又在兵工厂内宿舍二楼三楼经掩埋国军兵士尸体约二千余具，分别埋葬雨花台山下及望江矶花神庙等处，现有骨堆可证。所有难民尸体均系在如街巷及防空壕等处而得，其姓名固无从获悉，此系日寇入城时屠杀事件。谨特报呈核办。

具结人	姓名	性别	年龄	籍贯	职业	永久住址
	芮芳缘	男	四六	南京	花园	高輦柏村十四号
	张鸿儒	男	四四	南京	农	雨花路三二号
	杨广才	男	四三	南京	商	雨花路一〇二号

余谨将被敌人罪行侵害之事实据实陈述如下：于廿六年十二月十五日，中岛部队在南京难民区司法院无故查出军警、百姓二千余名，用机枪十二架将我等压[押]送汉中门里。每一行列分别用绳捆绕圈住，赶至城外用机枪扫射，已死者及受伤未死者被该日军用木柴、汽油焚烧之。同时本人业已受伤逃脱。

具结人	姓名	性别	年龄	籍贯	职业	永久住址
	伍长德	男	卅七岁	江苏邳县	商	南京糖坊桥九八号之一

倭寇入城后将退却国军及难民男女老幼，计五万七千四百十八人圈禁于幕府山下四五所村，断绝饮食，冻饿死亡甚多。十六日夜间，用铝丝两人一札，排成四路，驱至下关草鞋峡，用机枪悉予扫射后，复用刺刀乱戳，最后浇以煤油纵火焚烧，残余骸骨悉投入江中。在此大屠杀中，有教导队廿总队冯班长及保安队警郭某将绑扎挣脱，佯仆地上，拖尸盖身，因而得免。惟冯班长右膀上刺刀戮伤，郭某脊背烧焦。逃至上元门大茅

洞,由具结人觅便衣更换偷渡至八卦洲,始脱险(当时具结人服务警察所,与敌巷战被敌炮弹炸伤腿部,匿于上元门大茅洞内,相距咫尺目睹惨况)。

具结人	姓名	性别	年龄	籍贯	职业	永久住址
	鲁甦	男	卅三	湖南	政	南京义兴巷五号

无主孤魂之碑

中华民国二十七年十月,余奉命董京市,惟时去南京事变将及一载,城闾丛莽、山巅水浚有遗骨焉,余既收残骸于城上,得二十有六而瘞之。越二月,村民来告茆山、马群、马鞍、灵谷寺诸地遗尸尤多,乞尽瘞之。乃下其事于卫生局,选夫治具悉收残骨得三千余具,葬于灵谷寺之东,深埋以远狐兔,厚封以识其处,立无主孤魂之碑,且使执事夏元芝以豚蹄只鸡酒饭奠之,俾妥幽魂。呜乎!诸君遭时丧乱,膏血肉于荒原,寄骸骨于丘陇。为军为民为男为妇为老为稚,有后无后举莫能知。人生憎痛,莫大于生无所养,死无所丧,况暴骨无依如诸君者。虽然,死生有命,修短有数,洵如达人之论。彭殇可齐,随化俱尽。盖人之所争者,不在久暂之岁月,而在不朽之德业与精神也。余既怜而瘞诸君,又以为诸君告。二十八年一月,督办南京市政高冠吾记。

(张生 照原档抄录)

36. 书证第 325 号

南京市崇善堂掩埋队工作一览表^①

南京市崇善堂掩埋队工作一览表

区别	年	月	队别	收尸处所	掩埋地点	尸数			合计	
						男	女	孩		
城 区	中华民国二十六	十二	崇字掩埋队第一号	沐府西门至估衣廊	五台山	九六	二二	六	一二四	日寇入城难民立, 区外同胞家中留守或逃避在途被杀者, 死尸遍地, 实在可恨。本堂组织掩埋队于中华民国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开始工作至二十八日共埋如上数
			二	挹江门东	城根	三四二	三八	一二	三九二	
			三	新街口南	五台山	八三	七	一	九一	
			四	中华门东	城根	三五二	三四	一八	四〇四	
	中华民国二十七	一	一	北门桥至唱经楼	红土桥及北极阁	二七二	二九	九	三一〇	一月三日至二月四日
			二	兴中门至小东门	城根	三五〇	五一	二二	四二三	
			三	老王府至芦政牌楼	观音庵后身竺桥东首	二八四	四六	四	三三四	
			四	小鹰府至莲子营	城根	四三二	三一	二五	四八八	
		二	一	鼓楼至大石桥	鼓楼北及倒钟场浮桥等处	三五四	一三	八	三七五	二月五日至三月六日
			二	御史庙至高桥门	土城根及南城	五八七	二八	七	六二二	
			三	花牌楼至洪武门	三条巷大中桥城根等处	五二九	二四	一五	五六八	
			四	长乐路至半山园	城根	八七八	三六	二八	九四二	

① 本书证由中国方面提交给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其编排与内容与本史料集第 5 册略有不同, 并与第 324 号书证略有不同, 请参照阅读。

续 表

区 别	年	月	队 别	收尸处所	掩埋地点	尸 数			合 计	
						男	女	孩		
城 区	中 华 民 国 二 十 七	三	一	太平门至 富贵山	城 根 及 山脚	六一〇	二二	一六	六四八	三月七日至 四月八日
			二	大树城至 芦家庄	城根	四七二	三九	一七	五二八	
			三	石板桥至 尚书街	公园东边 及浮桥北	七一五	四八	六二	八二五	
			四	城 内 东 半边	附近各荒 地及菜园	三八五	五四	三五	四七四	三月七日至 四月六日
乡 区		四	一	中华门外 兵工厂雨 花台至花 神庙	全上	二五七 五二	五六七	二九三	二六六 一二	四月九日至 十八日
			二	水西门外 至上河	全上	一八四 二九	三三六	二三	一八七 八八	四月九日至 二十三日
			三	中山门外 至马群	全上	三三六 〇一	一九一	三六	三三八 二八	四月九日至 五月一日
			四	通济门外 至方山	全上	二四八 三九	四七五	一七六	二五四 九〇	四月七日至 二十日
	乡 区 说 明		乡区民众未能避难他方,又未入难民营者,日间集合一起守望相助,不幸为日寇所见,多数被难。有背部受枪伏地者,此逃避而死也;有侧卧刀戳流血者,此生前被打也;有口鼻血流面青腿折者,此生前被多人拳打脚踢也;妇女更有蓬头掩面割乳刺胸无小衣者,此生前拒奸也。惨哉惨哉! 每天夜间则结党成群向远方逃避,一闻枪声即匿草堆中,或避田埂下。最危险时系天明后强寇登高远望,逃难者被其看见则枪弹飞来。内有妇女,手示止步,即刻追来,野性大作,不从固死,从亦轮奸而死;不停步仍走者,则枪声愈密愈多,死伤益重,故被难之人乡间多于城区。本堂得各种报告,不禁泪如雨下,哀悼同胞,默祷时日曷丧而已。							
			城区统计			六七 四一	五二二	二八五	七五四八	
			乡区统计			一〇二 六二一	一五 六九	五二八	一〇四 七一八	
			总计			一〇九 三六二	二〇 九一	八一三	一一二 二六六	

续 表

总说明	本堂哀悼同胞惨死,尸体遍地,特组织崇字掩埋队与红卍字会合作。卍字会担任西城掩埋,本堂担任东城掩埋。共立四队,每队主任一人,供给伙食,无薪给,队员一人日给米八合,队夫十人日给米六合。本队戳记清册等件于中华民国二十七年十二月三十日,因本堂通行证被敌宪带领南区伪宪兵搜去未还,其随同伪宪兵来者翻译等依占敌势,百般威吓,顺便劫去案卷书籍衣物甚多,三次搜查,室中如洗,敌人威胁,惨辱已非人所能受,孰知我同胞为其走狗,伤心害理尤甚于敌,迄今回忆,仍胆战心惊也。
-----	---

工表系本堂经手负责办理证明确实

负责人 周一渔 堂长

南京市崇善堂(印)

(张生 照原档抄录)

37. 书证第 326 号

世界红卍字会南京分会救济队掩埋组
掩埋尸体具数统计表^①

世界红卍字会南京分会救济队掩埋组掩埋尸体具数统计表

慈字第 号

区 别	埋葬地点	尸体具数			合计	月日	备 注
		男	女	小孩			
城 内 区	清凉山后山	一二九			一二九	十二、二二	在收兵桥一带收殓
	金陵大学农场	一二四	一		一二五	一、二六	在西桥塘内收殓
	五台山荒山	一七	二		一九	二、二	在汉中路一带收殓
	清凉山坟地	四九			四九	二、六	在龙蟠里一带收殓
	韩家巷西仓山上	一四七		二	一四九	二、七	在西仓塘内收殓
	五台山荒山	一六		四	二〇	二、十一	在上海路一带收殓
	古林寺山上	一〇七	二		一〇九	二、十四	在古林寺山上收殓
	阴阳营南秀村	六五〇	二	二〇	六七二	二、十九	在城北各处收殓
	古林寺后山	一五四			一五四	二、二〇	在龙池庵收殓
	同上	二九	一		三〇	二、二三	在城北各处收殓
	阴阳营北秀村	三三七			三三七	二、二七	同右

① 本书证由中国方面提交给远东国防军事法庭,其编排与内容与本史料集第 5 册略有不同,并与第 324 号书证略有不同,请参照阅读。

续 表

区别	埋葬地点	尸体具数			合计	月日	备 注
		男	女	小孩			
城外区	中华门外望江矶	一〇〇	九		一〇九	十二、二二	在城内各处收殓
	中华门外高攀柏村	二五〇	一一		二六一	同右	在城内各处收殓
	中华门及普德寺	二八〇			二八〇	同右	同右
		六、四六八			六、四六八	十二、二八	
	上新河黑桥	九九六	二		九九八	一、十	在上新河一带收殓
	中华门外望江矶	四〇七	二一	三	四三一	一、二三	在城内各处收殓
	水西门外二道杆子	八四三			八四三	二、七	在水西门外河边收殓
	上新河太阳宫	四五七			四五七	二、八	在太阳宫河下收殓
	水西门外南伞巷	一二四	一		一二五	二、九	在水西门外各处收斂
	上新河二埂	八五〇			八五〇	同右	因尸已烂就地收斂
	上新河江东桥	一、八五〇			一、八五〇	同右	在江东桥一带收殓
	上新河棉花堤	一、八六〇			一、八六〇	同右	因尸已烂就地收斂
	汉西门外广东公墓	二七一	一		二七二	二、十一	在汉西门外一带收殓
	水西门外大王庙	三四			三四	同右	在水西门外塘中收殓
	下关渡固里	一、一九一			一、一九一	二、十二	因尸已烂就地收斂

续 表

区别	埋葬地点	尸体具数			合计	月日	备 注
		男	女	小孩			
城外区	中央体育场公墓地	八二			八二	二、十四	在体育场附近收殓
	上新河中央监狱	三二八			三二八	同上	在中央监狱内收殓
	上新河观音庵空场	八一			八一	二、十五	在该处火场内收殓
	上新河凤凰街空场	二四四			二四四	二、一六	在该处西街收殓
	汉中门外二道杆子	一、一二三			一、一二三	二、一八	在该处河边收殓
	上新河北河口空场	三八〇			三八〇	同上	在北河口一带收殓
	下关九家圩	四八〇			四八〇	同上	在下关沿江边收殓
	下关鱼雷军营旁	五二四			五二四	二、一九	因尸已烂就地收敛
	下关草鞋闸空地	一九七			一九七	二、二〇	在鱼雷营码头收殓
	同右	二二六			二二六	二、二一	同右
	下关鱼雷军营码头	五、〇〇〇			五、〇〇〇	同上	因尸已烂就地收敛
	下关石榴园	一四七			一四七	同上	在幕府山旁收殓
	幕府山下	一一五			一一五	同上	在草鞋闸后收殓
	上新河五福村	二一七			二一七	同上	在五福村电台等处收殓
	下关草鞋闸空地	一五一			一五一	二、二二	在鱼雷营码头收殓

续 表

区别	埋葬地点	尸体具数			合计	月日	备 注
		男	女	小孩			
城外区	下关鱼雷军营码头	三〇〇			三〇〇	同上	因尸已烂就地收敛
	中华门外普德寺义地	一〇六			一〇六	二、二三	在城内各处收殓
	下关姜家园	八五			八五	二、二五	在下关各处收敛
	下关石榴园	一、九〇二			一、九〇二	二、二六	在幕府山旁收殓
	下关东炮台	一九四			一九四	同右	在煤炭港码头收殓
	下关上元门外	五九一			五九一	二、二七	在上元门内一带收殓
	中华门外望江矶义地	八七			八七	二、二八	在城北各处收敛
	下关石榴园	一、三四六			一、三四六	三、一	在幕府山旁收殓
	三 汉 河 西 南 空 场	九九八			九九八	同右	在三汉河一带收殓
	和平门外永清寺旁	一、四〇九			一、四〇九	三、二	在该处大湾子收殓
	下关石榴园	七八六			七八六	三、三	在幕府山旁收殓
	下关煤炭港江边	一、七七二			一、七七二	三、六	因尸已烂就地收敛
	下关海军医院后堤边	八七			八七	三、一四	在该处及怡和码头北收殓
	三汉河后边	二九			二九	三、一五	在该处一带收殓
	上新河甘露寺空场	八三			八三	同上	在该处一带收殓
	中华门外华严寺山顶	一〇〇			一〇〇	三、一九	在安德门一带收殓

续 表

区别	埋葬地点	尸体具数			合计	月日	备 注
		男	女	小孩			
城外区	中华门外普德寺西安里堂	七九九			七九九	三、二五	在城内各处收殓
	太平门外城墙根	五〇〇			五〇〇	三、二七	因尸已烂就地收敛
	上新河甘露寺空场	三五四			三五四	三、二三	在该处一带收殓
	中华门外安德里西山上	一三三			一三三	三、二四	在上新河附近收殓
	中华门外普德寺义地	一、一七七			一、一七七	四、一四	在城南北各处收敛
	上新河贾家菜园空地	七〇〇			七〇〇	四、一六	在上新河各处收殓
	三汊河空地	二八二			二八二	四、一九	在三汊河口一带收殓
	下关煤炭港空地	三八五			三八五	四、二七	在江边水上收殓
	下关兵站处江边	一〇二			一〇二	四、二九	在下关沿江边收殓
	中华门普德寺	四八六			四八六	四、三〇	在兵工厂及城内收殓
	下关石榴园	五一八			五一八	五、一	在兵站处江边收殓
	老江口埂边	九四			九四	五、一五	同右
	下关江滩边	六五			六五	五、一八	在江边水上收殓
	上新河黑桥	五七			五七	五、二〇	在上新河江边收殓
	中华门外普德寺山上	二一六			二一六	五、二六	在城内各处收殓

续 表

区别	埋葬地点	尸体具数			合计	月日	备 注
		男	女	小孩			
城 外 区	下关煤炭港	七四			七四	五、三一	在该处江边收殓
	中华门外普德寺山上	二六			二六	六、三〇	在城内各处收殓
	同右	二九	五	一	三五	七、三一	同右
	同右	一四	四		一八	八、三一	同右
	中华门外普德寺	三一	八	九	四八	九、三〇	同右
	同右	四二	一三	七	六二	十、三〇	同右
附 记	总计四万三千〇七十一人						

(张生 照原档抄录)

38. 书证第 327 号

首都地方法院检察处奉令调查敌人 罪行报告书

首都地方法院检察处奉令调查敌人罪行报告书

(一) 调查之经过

窃本处自奉命调查敌人罪行,遂即印制用表文告,昭告市民,同时函请本市中央调查统计局、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南京市政府、首都警察厅、南京市党部、宪兵南京市区司令部、三民主义青年团南京支团部、南京市商会、南京市农会、南京市工会、首都律师公会、首都医师公会、红卍字会南京分会,暨本院等十四单位,指派代表于卅四年十一月七日下午二时假本院会议室举行第一次会议,即席议决成立南京调查敌人罪行委员会,由各代表将印制之表结转发所属调查,并议决由市政府推动各区乡镇坊保甲,由警察厅推动各区局所,分别负责,此外各以其性质,确定其调查对象,以免重复,惟此间经敌伪摧残最烈,民气销沉不特自动举发者甚少,即派员访问,亦竟有噤若寒蝉,或否认其事者,此外涉及名誉赧然不宣者有之,事过境迁人去楼空者有之,生死不明无从探悉者尤有之,故此五百余件均系经极大困难所访得。而南京大屠杀,尤为旷古之浩劫,亦即敌军罪行之重心,故尤不能不特予注意。经辗转设法访觅,关于几次集体屠杀,尚能获得珍贵材料,经一一审查后,获悉本市被杀人确数,已三十余万,其未及获得确切材料者约计亦不下二十万人。现已将第一期材料审查完毕,今后工作已商请各有关机关团体采用公开方式尽量宣传,务使调查工作更为彻底,所收材料仍拟陆续整理汇报。此本处奉令调查敌人罪行之经过也。

(二) 敌人罪行种种

敌人之罪行,约言之,可概分为下列数类:

1. 关于屠杀者：在南京方沦陷时，雨花台区有军民二三万不及退却，经敌人扫射，哀声震地，尸积如山，血深没胫。又八卦洲争欲渡江之军民，悉被扫射，尸体蔽江，水为之赤。至已沦陷时，将男妇老幼五六万人禁于幕府山四五所村，绝其饮食。十六日夜間，用铅丝将二人并捆，排成四路，趋至草鞋峡，悉用机枪扫射，复以刺刀密刺，继又浇以煤油，纵火焚烧余骸又悉投入江中。既沦陷后，又复于难民区内，强驱军民至汉中门，缚之以索，扫射而死之，此役又丧数千人。计自入城之日起，除集体屠杀二十余万外，凡我军民未及退却者，遇敌必难幸免。其躲藏而被搜获者，亦多丧身于刀枪之下，肢离体裂，血肉模糊，无处无之，此任意屠杀之惨状，实亘古所无。又有强征民夫，诱作征役，曳上汽车，风驰而去，迄今八年，杳无音信，此殆不知其以何种方式杀之矣。

2. 关于伤害者：敌宪兵队任意诬人民为中国兵，被捕而去，以索或钢丝捆起，悬之空中，不使着地，再以铁棒皮鞭或木棍痛击之，遍体鳞伤，逼其招供。更有以水或煤油灌鼻，濒死者屡。尤禁止受伤者不得呻吟，倘有一人犯戒，必全体悉被毒打。且每日任意以长棍向被掳人乱捣以取乐，禁止躲避，若有违抗则立毙杖下。如此酷刑，虽幽厉之暴虐，秦政之狠毒，无以过之。又常拘捕人民，冻之馁之，或使负笨重之物，奔驰于道路上，稍有迟缓，即遭鞭挞。如是虐待甚于牛马，更有将人民任意殴辱，反手一掌正手一掌，复踢一足，名之为“三面相交”。凡沦陷区之国民，其受敌寇之殴击者，比比然矣。

3. 关于奸淫者：一般青年妇女以至六七十岁之高龄老妇，被害者甚多。其方式有强奸者，有轮奸者，有拒奸致死者，有令父奸其女，兄奸其妹，翁奸其媳，以为笑乐者。更有割乳刺胸腮破齿落，下部肿烂，种种情况，惨不忍睹。

4. 关于劫夺者：城中商店住户，所有衣物器皿珍宝，任情搜刮，所劫财物，悉被搬运一空。

5. 关于破坏者：除飞机大炮轰毁者外，敌军进城复到处纵火，酿成莫大之灾害，市民损失，不可以数计。

6. 关于其他者：敌多摩部队将我被俘虏之人民，引至医药试验室，将各种有毒细菌注射于其体内，观其变化。该部为最秘密之机构，其因此

而死亡之确数，无由探悉。夫供医药之试验，即以猫狗供牺牲，尤仁者之所痛，今竟以我被掳之同胞充之，诚猫狗之不若也。可不哀哉！

总之敌人罪行残暴凶悍毒辣，无所不用其极。总计所获材料，被杀害人之确数达三十余万，烧毁房屋达四千余幢，被奸淫及拒奸而死者二三千人，被逮捕生死不明者共一百八十四人，其他尚待调查，实人类史上空前未有之惨剧。

(三) 战犯及有关材料

敌人在南京之暴行，除以性质分类外，兹再就战犯及有关材料加以说明

1. 个别犯罪之调查

查数人施行屠杀，死者故不能为证，即幸而苟全，其身罹灾劫，方避其凶焰之不暇，谁复能叩其姓名，志其番号，此种调查仅得其一鳞一爪，其有被告姓名可指者，仅中野、黑木已六、山崎新、石藤、吉田曹长、藤田军曹、冈本一诚、山本、吉板、矢木丑治、永野贞信、元木、清山尚次、及中原、千代叶而已。其余有部队番号而无姓名者，计有大野、中岛、长谷川、支那派遣军、西部、畑中、日本特务机关、金陵、日本空军、日本海军、桥口、日本警备队、登一六二九部队、箕浦、山田、后藤、荣一六二五、多摩、大熊、塚部、石冈、一九二六部、治骨、铃木、日本宪兵队、日使馆、猪木、德川、俘虏收容所等二十九个单位。

2. 集体屠杀之证据

南京沦陷时，敌人集体屠杀，计部队有中岛、畑中、山本、长谷川、箕浦、猪木、德川、水野、大穗九个单位，屠杀我同胞二七九五八六名，计上新河地域二八七三名，由掩埋者盛世徵、昌开运具结；兵工厂与南门外花神庙一带七千余名，由掩埋者芮芳缘、张鸿儒、杨广才具结；草鞋峡五七四一八名，由被难者鲁甦具结；汉中门二千余名，由被害者伍长德、陈永清具结；灵谷寺三千余名，有汉奸高冠吾之无主孤魂碑及碑文为证。此外崇善堂与红卍字会所掩埋者，计尸体十五万五千三百余具，俱列有表册。关于掩埋地点与人数，均极明了，并经各经手人具结。为使各该机关掩埋之情形益臻明白起见，特将各掩埋区数经销毁犹未全泯之地摄成

照片二十余帧,以供佐证。

(四) 调查后之感想与建议

抗战八载,人民涂炭,庐墓为墟,为害之烈,罄竹难书。今者丑虏屈膝,腥秽荡涤,先宜旌表忠烈,赙恤孀孤,褒扬慈善机关,保存惨痛史实,以儆民心,而培国魂。兹就其荦荦大端者而言之:

1. 纪念被祸军民:此次被祸军民之葬地,均系因陋就简,草草成殓,荒烟蔓草,日即湮没,似宜营建佳城,使安首邱。复镌碑勒铭,载其事迹,以慰幽灵,并使我千万世之后代,有所凭吊,有所警惕。

2. 救济被害人及其家属:经查被害者,田园荒废,骨肉生离,况经八年困苦,其中饔飧不继者有之,颠连疾病者有之,或饥寒交迫,日望救济者有之,似宜由政府统筹救济,使生者有所养,死者有所安。

3. 褒扬慈善机构:当敌寇在南京大屠杀之际,即有崇善堂、红卍字会组织之掩埋队,从事掩埋工作。查崇善堂连续工作有四月,掩埋尸体十一万二千二百六十七具;红卍字会连续工作半年,掩埋尸体四万三千〇七十一具。尔时留守南京之金陵大学及金陵女子大学美籍教授目击心伤,乃组织国际救济委员会,先后收容难民达数万人。此可敬之盟友及善士,激于人类之同情与义愤,不顾敌人之侮辱与威胁,躬冒矢石,或抢救或掩埋,其丰功伟绩,将永远不可磨灭。似宜分别题赠匾额或颁发奖章,以示褒扬,以彰善德。至于崇善堂之堂长周一渔先生,疾病裹老,生活维艰,似亦应有以救济之。

4. 设置腊人馆:敌人所加于我同胞之暴行,震撼鬼神,似应设一专馆绘塑模型穷形极相,使人一入其中触目惊心,以资惕励。此腊人馆之所宜设者也,将式仿巴黎,截长补短,择京中胜地,闢构栋宇,罗致国内著名之艺术家,描摹刻画,实其内容,用以开诸后来,垂于永久,使我炎黄帝胄,染于目而烙于心,而思所以图存之道也。

首都地方法院首席检察官陈光虞

中华民国三十五年二月一日

(张生 据原档抄录)

39. 书证第 328 号

美国使馆有关日军暴行的外交电文(略)

参见本史料集第 7 册第 322—350 页。

40. 书证第 329 号

德国外交部原始文件和档案(略)

参见本史料集第 7 册第 350—356 页。

41. 书证第 330 号

联合国战争罪行调查委员会(UNWCC)

对日本战犯的指控

指控的罪行

案例

1. 1937 年 10 月 10 日日军在其司令官松井石根的指挥下占领了江苏省的南翔县,开始肆意杀戮抢掠。200 余名平民被机枪扫射致死。其中有李(2621)锦(6930)明(2494),30 岁,广东连江籍商人。他的私人财物被抢劫一空,随后被杀害。

2. 1937 年 11 月敌军由沪抵达无锡(苏州),杀害 4 名商人,其中有留在该市的商民沈(3088)志(1807)强(1730)。敌军还宣称他们可以处死任何在他们手上的中国人。

案例的目击证人

例 1:陈(7215)亚(0068)清(3237)先生,32 岁,湖北荆门县人,住中荆市郊三平板区,曾目睹日军士兵枪杀了李锦明等数人。陈先生表示愿意在任何情况下法庭上作见证。

胡建勋先生,中二路警所所长,于 1944 年 12 月 20 日调查核实此案例。

例 2:刘德山先生,34 岁,湖北襄阳县人,目睹了日军该项暴行,并宣誓申请,作为目击证人。

胡建勋先生,中二路警所所长,于 1944 年 12 月 9 日调查核实此案。

证 明

1. 本人张彼得在此申明:本人熟谙中英文两种语言,经本人核对比较中英文本,确认该国际起诉文件 2076 号翻译正确无误。

签字:张彼得

宣 誓 书

我诚实地申明,下列敌人的罪行均系本人亲眼目睹:

日军于 1937 年 11 月占领了江苏省苏州。他们杀死了沈志强等四名商人,并公开声称,他们可以杀死所有他们看到的中国人。由此,无数百姓被害。

以上事实系本人目睹。如有朝一日敌人罪行受到法庭指控,我愿意作为控方或证人出庭;若疑恶意中伤或虚假证明,本人愿意承担相关惩处。

姓名:刘德山

签章:手印

性别:男

年龄:34

籍贯:湖北信阳

职业:伤兵

地址:重庆伤兵实验工厂

在做出声明之前,上述申明人被告知签署宣誓书的含义以及如若恶
意中伤或作假证的所涉及的惩处。之后,申明人倾听了该声明的内容,
并阅看了文件,认定正确无误。

调查人姓名:胡建勋

盖章:章

性别:男

年龄:40

籍贯:湖南

职务:重庆中二路警所所长

日期:1944年12月9日

英文翻译:国际检察局中文部

(谈礼英 译)

42. 书证第 2521 号

日本政府向美国政府提交照会

1937 年 12 月 14 日

日本外务省发言人今日公布了外相广田弘毅(Koki Hirota)先生于 12 月 4 日就美国炮艇巴纳号及美孚公司三艘货船沉没事件致美国驻东京大使约瑟夫·G. 格鲁(Joseph G. Grew)先生的照会内容,文中要求格鲁大使向美国政府转达日本政府诚挚的道歉。

照 会 内 容

1937 年 12 月 14 日

大使先生:

有关 12 月 12 日美国炮艇巴纳号及美孚公司三艘货船在南京上游 26 英里处被日本海军飞机击沉事由,本人在接到尚未公开报告的此刻,致意请求阁下转达日本政府对美国政府的道歉。从随后收到的我国在中国的代表的报告中知悉,日本海军航空兵获悉中国军队当时正自南京溯江乘船逃逸,奉命追击,于是在上述地点发现了这些船只。虽然飞机降低了相当的高度,但由于可见度太差,未能见到任何美国或军舰的标志。结果误将美国炮艇巴纳号及美孚公司三艘船舶当作载运中国逃兵的船只予以攻击并沉没。

目前事态清楚:由于上述情况,事件的发生完全是一种误会。日本政府对造成美国军舰和三艘货船沉没以及人员的损失深感遗憾,愿在此表示衷心的歉意。日本政府愿对所有损失作出赔偿并对事件的责任人作相应的处置。更甚者,日本政府已向有关地区当局发布了严格命令,以阻止类似事件再度发生。

日本政府热切希望日美两国的友好关系不致因为该不幸事件受到影响,坦诚表明其态度,请求阁下向贵国政府转达其诚意。

本人在此再度向阁下致以崇高的敬意！

广田弘毅

美国驻东京大使约瑟夫·G. 格鲁先生阁下

(谈礼英 译)

43. 书证第 2526 号 青木武宣誓证词

签署了宣誓书如另纸之后,按照我国通行的格式,我谨作出如下证明。

供述者,神奈川县叶山町堀内 761。

我是第二联合航空队与中国派遣军之间的联络官。我于 1937 年 9 月中旬抵达上海。我是第三舰队的参谋,同时兼任上海派遣军参谋。

我的职责是向海军提供情报,并向海军传递陆军方面提出的要求。同时,我还是陆军内部的海军专家,为了便于保持联络,我在机场和第三舰队司令部之间作定期往来飞行。

1937 年 12 月 12 日,我们收到陆军方面轰炸中国船只的请求,船上载有从南京逃跑的中国士兵。据报告,7 或 8 艘满载中国军队的大型商船溯江而上逃跑,他们请求海军航空队协助对此加以阻止。我通过电话向航空大队转达了这个请求。航空大队同意派数架飞机完成这个任务。

当时根据陆军报告,南京附近水域没有外国船只。但后来报告说,这次行动造成了极大的后果。

1937 年 12 月 14 日,我首次听说“巴纳”号军舰被炸。第一份报告上说,一艘外国船只可能被炸,当我抵达上海就报告中提到的情况进行调查时,我就知道这些情况。在上海,我发现“巴纳”号是被误炸,误把它当成了一艘企图逃离南京的中国船只。在随后飞行员的报告中指出,对他而言,轰炸“巴纳”号是一个明显的失误,他原本没有打算轰炸外国船只。他确信“巴纳”号只是一艘逃离南京的中国船只。

至于提到的飞机用机关枪开火一事,飞行员的报告中否认发生过这种事。在执行这类轰炸任务时,用机关枪攻击目标是不符合惯例的。

第三舰队司令和航空队司令发出非常严厉的命令,要求严加小心避免炸到外国船只,这件事被认为是件极其令人遗憾的事件。有鉴于此,

122 东京审判书证及苏、意、德文献

那些被认为疏忽大意或玩忽职守的人将受到惩罚。

1947年4月15日于东京

我证明，供述者在我面前宣誓并盖章，同日于东京。

见证人 稻川龙雄

我发誓，我本良心实事求是，并无虚饰。

青木武

(文俊雄 译 张生 杨夏鸣 校)

4. 书证第 2530 号

三井贞三宣誓证词

签署了宣誓书如另纸之后,按照我国通行的格式,我谨作出如下证明。

供述者,大阪府三岛郡味生村新在家三,明治 22 年 4 月 26 日生。

本人按照日本通行方式首先如附件所云进行宣誓。所供述内容与上次无异。

我是一名前日本海军少将。我自 1937 年(昭和 12 年)7 月 12 日至同年 12 月以第二联合舰队司令官的身份服役。以下为事实的陈述,当时我是上海地区第二联合舰队司令官,与此事实有直接关系。

我们于 1937 年(昭和 12 年)9 月 18 日收到有关中国空军将会开始对我们发动攻击的情报。我们计划在敌人准备对我们采取行动之前对敌施行反进攻。但由于机场情况恶劣,我们除了推迟计划外别无选择,延至 9 月 19 日那天(才实施行动)。

然而,中国空军正如我们所预料的那样在 18 日对我们的阵地进行了突袭。19 日我们的飞机同敌人在南京上空开展了两场空战。我们的飞机在这场战役中摧毁了许多敌机,但我们也损失了三架飞机。结果,我们获得了南京地区上空的控制权。

同年 9 月 20 日,我们实施了一次空袭,袭击目标是南京政府各大机关、参谋本部和无线电台。21 日由于天下雨,我们取消了袭击。22 日,我们空军对诸如航空委员会、防空委员会办事处、中央党部指挥部、狮子山阵地等军事设施开展了三轮袭击。

为了指导这些袭击,我召集指挥官——我认为开列出来的勘误表上有个错误。应该是指指挥官而不是中佐——中原(Nakahara),他住在南京有许多年了。他查阅南京城地图,为机组人员校对袭击目标的位置,这样就不至于发生错误,(轰炸)效果很好。我又一次下令机组人员实施俯冲轰炸,尽管我们在这种特别行动中不得不面对许多障碍。

我们对中立国的权力和利益特别给予了注意。这里举这样一个例子,我们军队在对镇江的进攻中要求我们对中国部队发动一次空袭,攻击长江众多船只上撤退的中国军队,但我们没有这么做,因为英国的商船正停靠在附近。

9月19日,第三舰队的司令又事先通告第三国的外交官,我们将在南京进行一次空袭,同月20日,我们又将空袭事先通告给中国的非战斗人员,并警告他们采取避难措施。

接下来,我想提及误炸巴纳号的事件。

巴纳号是在12月12日大约下午1时遭到轰炸并沉没的。很明显这是一次误炸。它沉没的那天,我们还未意识到我们炸沉了巴纳号这一事实。直到12月13日被美国舰队司令部告知,那时我们才第一次得知我们误炸了那艘船。

第三舰队司令部立即派遣快船载着军医、医药设备和其他东西去现场。舰船也被派去参加救助船上的人。我们又马上派参谋长去美国舰队司令部表达我们的歉意。

作为当时的联合舰队的指挥官,我为该事件承担了全部责任,并通过电报向海军部长和海军军令部长提交了非正式辞呈。结果,我被“训诫”,并受命于1937年(昭和12年)12月15日从战区返回,同时被授予第二舰队指挥官。——那应该是航空母舰而非航空舰队,对此也将列出一份勘误表。〔相龙(Soryu)号和龙城(Ryujo)号航空母舰〕

1938年(昭和13年)5月5日,相龙号旗舰受命作战,因此龙城号航空母舰成为旗舰,我属下的司令部全体人员受命保持原状。1938年(昭和13年)8月11日龙城号航空母舰也受命出发进入战区,我是唯一一个受命留在后方的人,被任命为海军军令部的观察员。

直到1940年(昭和15年)12月16日我才被调入第一预备役部队,我一直都未进入过战区。

我相信这些行动——未派我到战区去,是因为我的上级为了巴纳号事件而对我进行的惩处。

1946年12月20日于东京

我证明,供述者在我面前宣誓并盖章,同日于东京。

见证人 稻川龙雄

我发誓,我本良心实事求是,并无虚饰。

三并贞三

(文俊雄 译 张生 杨夏鸣 校)

45. 书证第 2537 号

日高信六郎宣誓证词

签署了宣誓书如另纸之后,按照我国通行的格式,我谨作出如下证明。

1. 我现居住于东京都世田谷巴松原町三丁目 1030 号。1937 年 4 月至 8 月 16 日任日本驻南京大使馆参赞,1937 年 8 月 29 日至 1938 年 3 月 3 日移住上海,仍任原职。1938 年 3 月 17 日我被任命为总领事,并掌管上海总领事馆至 1938 年 12 月 12 日奉命回国时为止。

我在上海期间曾赴南京四次:第一次是 1937 年 12 月 17 日至 18 日,此行是去参加入城式庆典和庆功大会;第二次是 1938^① 年 12 月 25 日至 26 日;第三次是 1938 年 2 月 1 日至 8 日;最后一次是 1938 年 3 月 27 日至 28 日,此行是去参加维新政府成立的庆典。

2. 我与松井大将相熟,由来已久。特别是 1932 年他以全权代表身份参加日内瓦军缩会议期间,我是日本代表团随员而与他住在一起。

当松井大将以上海派遣军司令官身份莅临上海时,我第一次见到他是 1937 年 9 月 10 日在吴淞。其后在 1938 年 2 月他回国之前,我常常在上海与他见面。

3. (甲) 松井大将长期以来持中日合作的主张,他对中国文化是有所了解的,而且对中国及其人民怀着很深的感情。我与他交谈时,他常常表露出上述情怀。

(乙) 9 月 10 日我在吴淞与他交谈时,他说出了下列想法:

(1) 正确对待俘虏。

(2) 对一般居民保持公正的态度。

就此而言,他想以派遣军司令官名义发布一个公告。

(3) 以合理价格征集粮食和其他物品。

① 原文如此。实系 1937 年之误。

他谈及在居民逃逸一空的情况下如何付钱的几种考虑,并说此事应向一般民众公示,以便使他们放心。

此外,就我记忆所及,在他与我,与使馆人员或与海军人员交谈时,曾多次表露他对中国人民的关注。

(丙)他经常特别注意与外国的关系,并不时征询冈崎总领事的意见。而且,他也注意与外国新闻记者保持接触。他多次特地会见《纽约时报》特派记者阿本德和伦敦《泰晤士报》的福莱萨(David Fraser)。

(丁)就我所知,松井大将在对南京发动攻击前曾采取下列一些措施:

(1)他制作了多份南京市地图,图上明显标出外国使馆和公使馆以及其他涉及外国权益的财产所在。这些地图均分发给各部队。日本大使馆协助制作这些地图,因而我有机会看到一份这样的地图。

(2)图上的中山陵和明孝陵均圈上了红圈,并标明此二陵绝对不容破坏。松井大将属下的一位参谋军官告诉我,这都是按照将军的意思标划的。

(3)此二陵附近,禁止发射大炮。这一点是我后来从沿该地区周边前进的一位名野田谦吾(Noda Kongo)的联队长亲口告诉我的。

(4)对南京发动攻击前,松井大将在上海曾对我们说,他打算让部队到达南京城墙外时停止前进,劝使中国司令官投降;还说,他将派纪律高度严明的精良部队入城。

(5)在他从上海启程前去指挥攻击南京之役后,我于次年1月1日在上海再次见到他,当时他表露了出自内心的悲痛,因为他首次发现某些部属为非作歹。那天给我留下很深印象的是:发现他竟然是直到那天才得知这些情事的。他本人及其参谋人员都坦率地告诉我,他已以司令官名义对那些作恶之徒发出严厉的警告和训令。

4. 至于司令部的参谋部和其他负责人员的想法,我碰巧了解到的如下:

(甲)公正对待俘虏问题,他们曾从各个角度考虑过;至于建立合适的俘虏收容所,他们正在进行商议。

(乙)当进入南京城之时,日本宪兵队的态度是确实公正的。他们得

到了外国人和中国人的好评。

起初他们的人数很少,包括队长在内只有14人。我们在12月17日听说,在几天内抽调来另40名临时宪兵。

(丙)我从未听到或见到军内干部曾下令粗暴对待外国人或滥用外国人的权益和中国人的财产。

(丁)按将军的主意,上海和南京的外国大使馆和公使馆以及在涉及外国人权益的产业前,均竖起“不准入内”的告示牌。我们这些外交官员协助办理此项工作。

(戊)特别是军内的主办参谋官员在调查和处理涉及对外关系的案件时,都是认真地竭尽全力的。例如一位参谋军官偕同一名外交人员前往刚发生美国国旗事件的芜湖,以便在现场调查此事件。当他们到达芜湖,发现涉案的部队业已开拔他去,于是随即追赶这支正在进行作战的部队,一直到杭州时才追到,之后又花了两周的时间完成调查。

5. (1) 迄今为止,每当中国发生内战或暴乱以及中国与任何其他国家之间发生纠纷或交战,日本外交当局所力求保护的都不单是日本侨民,还有外国侨民以及他们的权益。

在这次事变发生后,即便政府没有下达按既定政策办的特别指令,我们也是把按以往政策行事视为当然的。

司令官松井大将赞同我们的建议和意见。

(2) 当攻击南京之役发动之际,十多名原属于南京总领事馆的人员派去随军,以便在日本军入城时与军队合力做好保护外国侨民和外国权益的工作。他们也奉命力求正确对待中国民众,以便维持治安。他们全都竭尽全力按这些方针行事的。举例如下:

(甲) 起初,从南京发出通讯是极其困难的。因此,在进入南京后,他们就利用一位新闻记者的无线电设备,将关于外国侨民安然无恙的报告发往上海。

(乙) 他们迅速调查外国权益所在以及其他需加保护的地点,并与军方合作,竖起“不准入内”的标志牌。

(丙) 他们使用领事馆的警卫人员来保护外国侨民,使他们合适。

(丁) 他们指示总领事馆全体人员正确对待中国民众,特别是要保护

平民。这些人成功地履行了他们的职责,因为他们以前全都在南京工作过,也就对该城平时的情况非常熟悉。(他们有时在设于金陵大学的难民区的人口设置夜间警卫。)

(戊)是一些关于传闻日本军人为非作歹的报告,由外国侨民送交给总领事。但是,这些报告大部分出自耳闻,由于总领事没有时间去调查事情的究竟,因而将这些报告都转往在东京的外务省(我在上海通读过其中的几份副本)和在南京的军方。看来在东京的外务省将这些报告知会了陆军省。

(3)在此期间,我到南京去过几次,每次我都从南京总领事那里听到种种报告,亲眼看到实际的状况,也和外国侨民交谈过。我将这些见闻写成报告送呈外务省,而在我于1938年1月底回国请示时,也口头向广田外相和其他外务省官员报告过。随后我听说,每当有身处现场的官员送呈报告来,东京当局总是要军方予以注意的。正如我在前面说过的,其结果是陆军省总部有时就此向在现场的陆军军官发出指令。再者,就我所知,2月初参谋本部办公室主任本间少将前往南京。他对我说,尽管此行的目的主要是与对外关系问题有关,但也涉及其他一些与中国人有关的问题。

(4)南京一沦陷,我就派奥村(Okumure)书记官乘海军飞机前往南京和芜湖。他从芜湖带回一位曾因伤住过院的美国记者和负伤的“瓢虫”号军舰副舰长。我还采取措施使某几位记者能任意顺江而下至上海。

6. 刚沦陷时,南京全城确实是混乱的,但平静逐渐得以恢复。特别是1938年1月中国市民成立了自治委员会,开始管理这座城市,并在日本军队和一般民众之间起着斡旋者的作用之后,彼此的误解和疑虑就减少了。3月底维新政府成立,统治长江下游地区,之后一般民众的生活就大为改观了。

7. 在南京陷落前后,发生过下列一些事件:

(1) 在上海战役中,中国军队的抵抗比日本军人预期的要猛烈得多,因为那里抗日情绪非常强烈。

派往上海保护日本侨民和日本权益的日军在人数上要比中国军队

少得多。因此战斗非常艰苦,日军的伤亡是大的。这自然就增强了日本士兵的战斗精神。(起先,日本士兵对中国人的反感并没有那么强烈。)

(2) 因此,与我们的期望相反,在开初很少有中国士兵被俘(他们大部分不是战死沙场就是撤退而去)。

(3) 中国军从一开始就实行了所谓“清野政策”和“焦土政策”,纵火焚烧房舍和粮食,并强迫居民撤走。因此,在交战之初,日本人没有什么机会以和平的方式与居民接触,于是日本部队与中国居民就被彼此心存疑虑。

(4) 由于中国军队和中国当局的宣传,反日情绪是普遍强烈的。甚或有少数留在被占领区的老弱妇孺充当探子、破坏者或在黑夜袭击日本士兵。这些行动大大妨碍了日本军队的行动。日本士兵起初是想善待平民,完全是把他们与军人区分开来的。然而,事实上,面对居民如此的态度,日本士兵中遂产生了敌对情绪和猜疑态度。

(5) 中国军队在上海各处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因而那里的战线呈胶着状态。有过这样的设想:如中国军队在上海被打败,他们就会退守上海和苏州之间一线,重新进行抵抗。在这种情况下,就有必要歼灭所有中国部队,以确保上海四周的安全。出于这一目标,日本增强了其兵力,于11月初派出一支援军在杭州湾登陆。在此期间,中国军队被打败,日本军为了不让他们有喘息之机,立即追击他们并攻入南京。因此,客观情况使松井大将先前告诉我们的设想,即日本军队首先包围南京,然后攻击和占领,成为不可能。我以为混乱正是由此而产生的。

(6) 由于上述种种情况,在前往南京的路上,沿途不仅军需品、房屋和燃料都被搬走或焚烧,而且日本的给养迟迟不见运来。12月的气候还是很冷的,日本军各部队各自捡取散处田野的物品,以供使用、食用或作为燃料烧火。

即使在南京,军队营房和其他存留的建筑物,也都没有床和其他设施,因而很难让日本军队驻扎下来。

(7) 在沦陷时,南京完全处于无政府状态。我所目睹的该城刚沦陷后不久的状况如下:

(甲) 当中国保卫南京部队的司令官在沦陷前撤走时,所有军政机关

的官员都已不见人影。没有市政府,没有警察,没有能负责任的人。所有日常行政所必需的有关居民、土地和房屋的登记册都早被拿走了。警察队伍被遣散了。路上见不到警察。只有在大使馆或公使馆内会见到二三十名他们所雇佣的警察。其他城市有多处与南京大不相同,它们在中国军队撤退后,总会留下一些文职官员或当地知名人士,以便在即将到来的日本军队和当地老百姓之间进行斡旋,搞好二者的关系。

(乙) 外国大使、公使、领事和其他外籍官员,全都在城陷前撤离,因而无负责人员就保护外侨及其家人的权益,正式与日本军进行谈判。

所有外国记者都希望离开南京,以便拍发电报至其总部。南京沦陷后没几天,他们全都利用在南京的日本部队所提供的便利,去了上海。我12月17日到南京时,没有见到一个外国记者。

(丙) 南京的人口据说有100万,但在沦陷时已缩减到20万,其中大部分属下层阶级并已迁入所谓“安全区”。在此区之外的中国房舍实际上都空无一人。把难民组织起来的工作,是由组成一个委员会的约20位外籍人士经办的。

日本军队并未正式同意上述“安全区”。理由是:(i) 考虑到如果在城内发生战斗,从战术上看,该区所处位置难于保证安全;(ii) 有一些中国高级军官及其参谋人员住在里面;(iii) 该委员会没有足够权力不准溃败的中国士兵和其他不良分子入内,并保持其“中立”。(在上海的“安全区”被认为在这几点上有所不同,因而日本军对它是同意的。)

日本军始终坚持秉承如下的原则:凡无敌军或军事设施之处都不应予以攻击,而且实际上,在攻占南京时并未在该地区发生交战,也无伤亡。

(丁) 当中国军队在城市沦落之际撤退时,许多军人厚颜无耻地剥掉平民身上的衣服(有些平民被杀害),并脱去军装换上这些便装,伪装平民混入“安全区”。这种情况是当时在南京的美联社记者麦克丹尼尔(MacDaniels)和当时在上海的《纽约时报》的阿本德告诉我的。理所当然,日本军会因此而产生疑虑。

8. 上海的安全区所谓“饶神父区”(Jaquinot Zone):

当上海各处交战形势有所变化而中国军队有可能后撤时,以饶神父(Father Jaquinot)为首的英美法等国人士组成了一个国际委员会。该委

员会建议：在征得中日双方同意的情况下，在南市（上海中国地界南部的市镇）划出部分地区建立一个“安全区”。此举目的在于一旦战火蔓延至该地区时收容一些中国人。一开始，饶神父在《曼彻斯特卫报》记者田伯烈（Harold John Timperley）陪同下来我处，告诉我此建议。我当即会同上海总领事冈本（Okamoto）和冈崎总领事，采取措施促使这一建议付诸实施。松井陆军最高司令官和长谷川海军最高司令官都从一开始就对此事持赞同态度，因而该计划为两位司令官和中国人双方接受。当时，松井大将捐了一万日元给该委员会，以期资助其计划的实现（长谷川海军司令官也捐了款）。

再者，广田外相于12月8日致函饶神父，以此表达了日本人民对此项人道主义工作的赞许和敬重，衷心祝愿他获得成功。此计划之所以能得到日本当局的赞同，其原因如下：

（1）该地区完全是一个中国市镇，虽然饶神父和委员会其他委员全都是不偏不倚和公正无私的。

（2）委员会将在发生交战时收容和保护中国平民，而且此项救济和保护在交战结束后还要延续一点时间，但是该委员会同意不干涉该地区的行政，这是完全要归日本军执掌的。

（3）由于与该地区毗邻的法租界愿意进行合作，因而该委员会被认为完全有力量维持“中立”。

（4）从该地区所处位置进行判断，即便附近发生交战，它也可望保持“安全”的。

在上海战役最后阶段，战火蔓延至该区的边缘。然而，并未有炮弹落入该区。撤入该区的中国军人统一由委员会解除了武装。日本军队没有进入该区。一切平安无事。因此数千幢房屋和25万中国人得到了解救。这一事实是在委员会所刊布的一本小册子中得到了详细叙述的。

1947年4月1日于东京

作证人 日高信六郎

（HIDAKA Shinrokoro）

我在此证明：上述证词是作证人当着我的面签名盖章宣誓后作

出的。

同一日期于东京。

见证人 伊藤清

ITO Kiyoshi

我发誓,我本良心实事求是,并无虚饰。

日高信六郎

英译文本证明书

本人查理·S. 特里(Charles S. Terry)系辩护团语言组组长。就我所见,上述案卷中所附的英译文本准确无误,译者是力求忠实于原文之本意的。特此证明。

查理·S. 特里(签字)

1947年4月11日于日本东京

(吴世民 译)

46. 书证第 2548 号

塚本浩次宣誓证词

在正式宣誓如另纸之后,按照我国通行的格式,我特作证如下:

1. 我现居住于东京都武藏野町吉祥寺 2546 号。1944 年 1 月,我曾患轻度中风。之后因行动不便,一直在家静养。

2. 在 1943 年 8 月退休前,我一直是一名军法官。我在上海派遣军的简历如下:

1937 年 8 月 15 日,被委任为第十军法务部部长。

1937 年 8 月 30 日,任上海派遣军法官、检察官。

1938 年 2 月 9 日,任华中派遣军检察官、预审法官、法官。

1939 年 1 月,回国。

3. 我记得松井司令官大约在 1937 年 9 月,即在上海登陆时,发布了一项训令,要求其所属各部队严守军风纪。我曾以法务部部长身份在该训令上连署,但该训令全文现不在我手头。^①

4. 随着上海周边战役的结束和我军追击中国部队的开始,我所担任的法务部长的工作紧张了许多。进入南京后,我同样忙碌不堪。记得在南京举行入城式那一天,我就审理了四个案件。

5. 我深信自己对于破坏军风纪者,都是按照松井司令官的命令和遵循战地服务条令,予以严惩的。正是由于上海派遣军法务部的态度十分严厉,以致某些部队有时发出了尖锐的评论,非难我们严惩不贷以及就连轻微罪过也要深究的做法。这类批评,都是当时前来与我联络的陆军省法务局局员大塚操中佐告诉我的。然而,我履行自己的司法职责时,是严格按照陆军刑法行事并与松井司令官之意图完全一致的。

6. 进入南京后,日本兵是犯有不法行为,我也记得曾查问过这类案件。我还记得松井司令官召集所有将校,告知他们发生了此类案件,并

^① 此段旁有批注:“驳回。TP(法庭庭长)21561”。

严令以最严厉的态度维护军风纪。

7. 在本宣誓证词之末,我列出当时在自己笔记本里记下的我惩处过的那些人的名字。但我想还是会有些名字被遗漏的。不管怎样,我是将上海派遣军法务部处理过的所有案件、人名和处罚情况都上报了陆军省法务局,而这些记录原是能澄清详情细节的。然而,这些记录都已被焚毁,因此详情现已不得而知。但就我记忆所及,该报告总共六页二十行纸,因此我敢肯定我至少处理过 120 个案件。^①

8. 在上述案件中,有四、五名犯案人是军官,其余的都是士兵犯下的一些微不足道的案件。就我所知,所犯的罪行主要是抢掠、偷盗等,而强奸和伤害的案件很少,因之而致死亡的案件则更是少之又少。我记得发生过两起杀人案件,但记不得惩处过放火犯或处理过进行大屠杀的罪犯。上述罪行发生在不同地点,但我相信有相当数量案件是发生在南京的难民区。

9. 法务部无搜索罪犯的权力。罪犯都是由直属军司令部的宪兵搜捕后送交军法部门的。接着我们收集证据,并据以对之起诉。

违犯风纪者名单

(1937 年 9 月—1938 年 2 月)

宫浦(某)	安田顺	樱井正	土田寿	木神六三郎
藤原保雄	品川初雄	野见山(某)	相马梧次郎	石义部敏孝
山道善助	币次实义	川西素一	石川清治	大西竹二
山本清记	吉田清次	户田(某)	伊藤喜之助	广崎健吉
高桥富一	横内宫雄	迁本政雄	小野(某)	外一名
藤井(某)	日浅好藏	桂竹只一	望月军兵	铃木正治
轰高清	值冈利一	大西悦治	仓田和夫	上村昆
本间喜太郎	深泽(某)	佐藤(某)	上田一郎	北村角一
天野乡三	田中统太郎			

1947 年 2 月 26 日于东京

塚本浩次

^① 此段旁有批注:“不提出”。

我,伊藤清,在此证明:上述证词,是当着我这个见证人的面,签名盖章宣誓后作出的。'

同一日期于东京。

见证人:伊藤清

我发誓,我本良心实事求是,并无虚饰。

塚本浩次

(吴世民 译)

47. 书证第 2560 号

大山文雄宣誓证词

在正式宣誓如另纸之后,按照我国通行的程式,我特作证如下:

I. 我是 1883 年 1 月 2 日生于冈山县后月郡西江原町 463 号(我的户籍所在地)。现住东京都麹町区的永田町 8 号。

II. 至于我的简历,我自 1933 年 12 月至 1945 年 3 月任陆军省法务局局长,1942 年 4 月 1 日被授以陆军法务中将军衔。

III. 陆军省无论是平时或是战时,都不断要求陆军各军事法庭在量刑时应严正公平,并每每不失时机地下达重申此要求的训令。至于对军事法庭的诉讼,陆军省则从未进行过不正当的干预,也从未采取过措施对之进行限制或施加压力。特别是,陆军省一再下达训令告诫各军事法庭应以最严厉的惩罚来处置涉及军风纪的罪行。

IV. 即便在中国事变爆发后,上述办法亦从未予以变更,但是在战时总是要担心涉及军风纪的罪行会有所增加的。为此,在这方面尽最大的可能加以注意。陆军省以为特别有必要促使陆军战地军事法庭更为严格执法,曾三番五次发出训令告诫他们要严格履行其职责,并企盼他们彻底完成任务。

尽管传达此类训令的文件原稿以前一直是存放在陆军省的,但是在战争结束时已悉数被焚毁。因此很遗憾,这些训令的原稿现已荡然无存,但我在上面所说的一切都是毫无虚假的事实,对于这一点,那些接过上述训令的人士应该是十分清楚的。

V. 日本陆军刑法原先并无关于强奸的条款,而这类情事也是按照一般刑法处理的,即只有当受害人提出控告时才作为罪行加以追究。然而,如此处置这类罪行不足以维护军风纪之执行,因此 1942 年 2 月 20 日通过了第三号律令,对陆军刑法作了修改,使强奸成为一种“不告亦究”的罪行,而对之所加的处罚也加重了。当战地所发生的强奸被作为一种“有告方究”的罪行加以对待时,有许多案件是很难接获受害人的控

告的。

VI. 畑元帅是一位极其密切注意军风纪的人。就我所知,畑元帅在任华中派遣军司令官或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时,曾就其为严格维护军风纪所作的口头或书面正式训令,多次向中央作过报告。

1946年12月24日于东京

大山文雄

我,国分友治(KOKUBU Tomoji),在此证明:上述证词是作证人,当着我这个见证人的面,签名盖章宣誓后作出的。

于同一日期,同一地点。

见证人 国分友治

我发誓,我本良心实事求是,并无虚饰。

大山文雄

我,威廉·E. 克拉克(William E. Clark),辩护团语言组成员,在此证明:就我所见,上述证明文件的英译文本是一准确译文,译者是尽可能做到符合原文件之本意的。

威廉·E. 克拉克

1947年2月10日于日本东京

(吴世民 译)

48. 书证第 2577 号

中山宁人宣誓证词

本人按照日本通行方式首先如附件所云进行宣誓。所供述内容与上次无异。

1. 我现住在东京都南多摩郡多摩村关户。

2. 我的经历大致如次：

昭和 4 年 11 月，陆军大学毕业

参谋本部部员

美国留学

中国留学

昭和 12 年 11 月 华中方面军参谋

航空本部部长

参谋本部课长

燃料本部总务部长

3. 我任华中方面军参谋时的军衔是少佐。1937 年 11 月到 1938 年 3 月，我一直担任该职，这期间我从事的是情报工作。

4. 华中方面军大约组建于 1937 年 11 月 5 日。

为了保护上海及其周边地区的日侨，组建于 1937 年 8 月中旬的上海派遣军与中国军队在上海一带及华中地区作战。不过，由于敌人实力很强，再加上地形上的因素，日本方面在战场上并未取得有利的进展。有鉴于此，(大本营)新组建了第 10 军(柳川平助军团)，该军为了配合(上海)派遣军的进攻，在杭州湾北岸登陆。华中方面军由这两支军队合组而成，上海派遣军和第 10 军名义上归其统一指挥。

5. 松井石根大将被任命为华中方面军司令，同时兼任上海派遣军司令。

华中方面军参谋人员如下：

参谋长 塚田攻(Osamu Tsukada)少将

副参谋长 武藤彰(Akira Muto)大佐

其他参谋人员：

公平匡武(Masatake Kimihira)中佐

中山宁人(Yasuto Nakayama)少佐

二宫义清(Yoshikiyo Ninomiya)少佐

吉川武(Takoshi Yoshikawa)大尉

除上述人员之外，还有一位空军参谋，名字我忘了。另外还有 3 名副官。

参谋部总共只有 7 人。其余几人的名字我全忘了。华中方面军(总部)仅由上述人员构成，没有其他的机关和人员。

6. 华中方面军司令官奉命执行以下使命：

华中方面军司令官将上海派遣军和第 10 军置于其统一指挥之下，并管辖军需保障工作。该方面军的首要任务是协调两军具体行动。至于部队的实际使用和指挥，实际上是由上海派遣军和第 10 军司令官承担。因此，上海派遣军和第 10 军设有完善的机构，军械处、财务处、军医处、军法处，此外还有参谋部和副官处。而华中方面军司令部则没有此类机构。

7. 为了说明华中方面军为何在组织方面如此不够完善，有必要对上海派遣军和第 10 军所赋予的职责加以澄清。

上海派遣军的职责是“夺取重要的上海一线及其北部地区，保护帝国侨民。”

第 10 军的职责是“从杭州湾北岸登陆，协助上海派遣军行动。”

此外，帝国大本营还决定，华中方面军在长江三角洲福山、苏州和嘉兴一线以东开辟战场。

组建华中方面军的唯一目的就是要把承担以上职责的两支部队置于统一控制之下。正是基于这一点，华中方面军组建完善的司令部被认为是非常没有必要的。因为这支部队只是为了短期目标而组建，而且其作战区域也很狭窄。

8. 我们得到情报，中国军队从上海撤退后在南京周边地区集结了大量兵力，准备反攻。

1937年12月1日,帝国大本营发布如下命令:“华中方面军应在海陆军配合下占领南京。”

即便是在这道命令发布之后,华中方面军的总部仍相当单一化,它的指挥系统还像以前那样运转。

9. 松井将军在收到上述命令后的第二天,他向这两支部队发出命令,其内容大致如下:

- (1) 上海派遣军主力沿无锡——丹阳——句容公路向南京进攻;
- (2) 第10军沿湖州——广德——芜湖公路向南京攻击前进。
- (3) 第101旅团在松江一带为进攻杭州作准备。

(4) 第11师团和第3师团之步兵第一旅团负责维持上海市及其周边地区的公共安全。

10. 华中方面军司令部在上海以北约10公里的一个地方一直驻扎到1937年12月15日,并在当天移驻苏州。当时,松井将军卧病在床,但仍在病榻上处理所有重要军务。

12月7日,朝香宫亲王作为上海派遣军司令抵达战地前线。松井将军被解除了兼任的职务,此后,他就只负责华中方面军的指挥。

11. 到苏州后,松井将军对参谋长塚田将军说:“因为南京是中国的首都,我们占领该城将成为一起国际事件。如何利用日本军威更进一步使中国折服,如何让大部分中国民众更加信赖日本,这些都必须要仔细加以研究。”这个指示由参谋长传达给我们这些参谋官。我们把松井将军的指示精神记在心头,立即展开研究。有关国际法和国际惯例的问题,我们请教了宍发良卫(Saito, Yoshio)博士。最后,我们拟定了这样一道命令,要点如下:

(1) 华中方面军准备占领中国首都南京城。

(2) 上海派遣军和第10军将按照写在另一份文件上的《占领南京城作战方案》占领南京。

在初稿第一条原来有这样的提法“敌国首都”。不过,松井司令官将其改为“中国首都”,这一改动基于他自己对中国的看法:从总体上讲它不是我们的敌人,只不过有部分国民是我们的敌人。

《占领南京城作战方案》中的第二条与下列问题有关:

(1) 在开进到城外 3 到 4 公里处时,这两支部队都要停止前进,为占领南京城作准备。

(2) 12 月 9 日,通过飞机向南京城里的中国士兵散发劝降书。

(3) 如果中国军队投降,就从每个师团中挑选 2 到 3 个大队外加独立的宪兵队,派他们进城。他们将负责守卫作战地图上标明的区域。对一份单独文件上专门标明的那些外国人的权利和利益以及所有文化机构,必须要特别加以妥善保护。

(4) 如果中国军队不接受我们的劝降,12 月 10 日下午将发动进攻。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各作战部队进入南京城也必须依照上述要求行事。尤其必须严格维护军纪和道德,必须迅速恢复公共秩序。在拟定上述命令的同时,一则名为“关于占领、进入南京城之守则及戒律”的通知也已写成。它由参谋部起草,目的在于使所有部队都能完全明白松井将军的意图。

上述通知的要点如下:

(1) 帝国军队占领进入外国首都,在我国历史上没有先例,将永载史册。全世界都会以苛刻的目光注视着这件大事。基于以上情况,绝对禁止所有部队强行冲进该城;绝对禁止部队之间的争斗,绝对禁止任何不法行为。

(2) 每个作战单位应该极其严格地维护军纪与道德,这样中国士兵与平民才会敬畏日本军队的威严,才会归顺日本军队。因此,任何情况下都不容许出现有损日军名誉的行为。

(3) 绝不允许任何部队靠近任何外国权利和利益所在地,尤其是在所附的一份示意图上所标明的那些外交机构。除非有绝对必要,各部队一律不准进入外交使团所在的任何中立区,所有必要的地方应设置岗哨。

而且各部队严禁进入南京城外的中山陵、明孝陵和其他爱国革命家的安息地。

(4) 进入城内的单位必须经过师团长的专门挑选。占领南京城,尤其是占领城内所有外国权利和利益所在地的守则应提前发到每个单位,以避免不论何种原因产生的错误。如有必要,应设置岗哨。

(5) 对那些抢劫或即便不小心引发火灾的官兵一律予以严惩。

在部队进城的同时,必须派遣大量宪兵和助理宪兵进入南京城,以制止一切非法行为。

12. 所有外国权利和利益的信息均以我从各国驻上海领事或领事那里收到的答复为根据,我是通过日本驻沪总领事向他们询问相关情况的。随后,我用红墨水把它们全都画在地图上,以资辨认。

至于教育机构,除中山陵、明孝陵外——其位置众所周知,均经日本外交机构调查并向我作了通报。通过这种方式,我把所有这类目标全都非常清楚地画在地图上以使全体日军得以最大限度地认识它们。

13. 所有这些占领南京的命令、通知和地图都由参谋长塚田、参谋公平中佐和我本人于12月8日向上海派遣军司令部进行传达。另一名参谋于同一时间向第10军传达以便全军能够很好地了解以上的命令、通知和地图。12月9日,句容航空部队还向城内中国军队空投散发了劝降书。

当时,松井将军在苏州养病,副参谋长武藤彰大佐陪在身边。

在传达完以上命令后,参谋长和我们全体参谋官驻留汤山镇。

14. 12月10日,参谋长塚田少将和我在中山门外等待举着停战旗的中国军队信使,一直等到大约下午1点钟。然而,最终这名信使还是没来。有鉴于此,大约从下午2点开始,我们对南京发起总攻。尽管中国人依仗城墙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日军于12月12日午12时左右成功地夺取了南京城。由于担心部队会出现混乱,参谋长塚田将军让其随从参谋通知两支部队严格遵守以上各项命令。但是,大部分前线部队在我们不知情的情况下已经入城。我后来听说,在我们得到消息以前,他们已进入城内。我后来才听说,他们入城是敌人的顽强抵抗被粉碎后带来的一种自然而然的结果。另一个原因是,由于城外所有的营房和学校都被中国军人或平民破坏或烧毁,日军没办法扎营。此外还有一个原因,城外水很少,即便有,也根本不能饮用,我是后来才知道这件事的。

15. 12月13日,为了确认已经占领南京的事实,我经中山门入城。为松井将军的正式入城作准备,我分别于14、16日两天再次视察南京。我穿过中山门,沿主干道先后来到了国民政府大楼和首都饭店。

我走的这条线路就是松井将军入城时准备走的线路。除中山门附近散落着一些沙包外,我在路上没有见到尸体。我看见城内机场附近,也就是城南地区有烟雾升起。但首都饭店及其周围,也就是城北地区,没有受到严重破坏。国民政府(大楼)根本未受到损害。首都饭店尽管从外表上看不出受损,但由于中国军队似乎在这里呆过,其内部却受到极大的破坏。16日上午,在司令部副官处的领导下,首都饭店被打扫得干干净净。大家还克服困难为松井将军即将下榻的房间作了必要的准备。不过,据说参谋长以下的全体人员要准备露营。

16. 12月14日,松井将军得到占领南京的消息。尽管他的病尚未完全痊愈,但他还是在副参谋长武藤大佐的陪伴下于15日从苏州乘小型飞机飞抵句容机场,并从那里转乘汽车来到汤山镇。

12月17日,举行了胜利入城仪式。松井将军与海军司令官长谷川中将一道入城。他下榻于首都饭店。入城式结束后,松井将军召集全体参战军官开会,命令他们更加严格地维护军纪和道德。他还下令对城内部队进行调整。要求不必要的部队到城外去。他下令严格执行早先发布的命令,因为他从宪兵队那里收到一份有关其下属部队违反军纪和道德的犯罪报告。

塚田将军立即下令手下参谋官为弄清各部队驻扎位置到城外去巡视。结果发现,部队驻扎地点极不合适。鉴于这种情况,12月19日决定将第10军调往芜湖一带,上海派遣军只留下第16师团保卫南京,其他均逐步调往江北沿岸和上海地区。此次调防要逐步实施。

17. 12月18日,举办了一场战死军人和死难者追悼仪式。在纪念仪式上,松井将军强调不仅仅是日本死难者的灵魂,而且中国死难者的灵魂同样也应得到祭奠和安息。——这是建立中日和平友好的基础,也是本人一再强调的大东亚主义精神的真正实质。他下令参谋长为纪念讲话作准备,等等。

不过,没有足够的时间照此去做。因此决定,纪念中国死难者亡灵的仪式另找机会进行。松井将军对此极为遗憾。在回日本后,他在热海市附近的伊豆山上修建了一座神殿,为战死的日中两国军人的灵魂祈祷。这座神殿现在还在。

18. 由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管理的所谓贫民区,根据国际法它未被正式承认为一个中立区。但这些地方可以被认为不会有什么问题。因此,即便是在占领南京之后,(日军)依然决定保护这些地区,并由军队将其隔开,由军队守卫。当时考虑,没有特别批准,就连士兵也不准进入这些地区。

后来,我们听说国际委员会对日军士兵在安全区内犯下的暴行提出过抗议。不过,他们的抗议没有送到华中方面军司令部。姑且承认那里有过这类非法行为,也应该向日本领事馆提交抗议,它负责在特务机关与上海派遣军之间进行联络,后者直接负责南京的警备工作。此外,华中方面军没有从上海派遣军那里收到任何情报,因而司令官松井和参谋部对上述抗议均不知情。

如果真有日本士兵干出非法行为,这类行为必定会受到调查,并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调查和审判的结果也肯定会向华中方面军司令部汇报。

松井将军携手下参谋官回到上海后,他听到了驻南京日本部队存在非法行为的谣传。松井将军感到非常不安,命我转发如下指示:

据传日军在南京有不法行为。正如我在入城式上所指示的,为了日本军队的荣誉,任何情况下都不容许发生这种事。尤其是,朝香宫亲王担任我们的司令,就必须更加严格地维护军风军纪。任何胆敢胡作非为的人必定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对于已经造成的破坏,应该想办法补偿或归还。

据此,我于12月26或27日前后离开上海去南京,向上海派遣军参谋长传达了上述指示。

(文俊雄 译 张生 杨夏鸣 校)

49. 书证第 2578 号 文件遗失证明

辩护团语言组译

证 明 书

- | | |
|--------------------|---------------------------|
| 1. 1937 年 8 月 | 关于编组上海派遣军的命令原本 |
| 2. 1937 年 10 月 | 关于编组第十军的命令原本 |
| 3. 1937 年 11 月 | 关于编组华中方面军的命令原本 |
| 4. 1937 年 11 月 | 关于制定华中方面军作战地区范围的命令原本 |
| 5. 1937 年 12 月 1 日 | 关于令华中方面军进攻南京的命令原本 |
| 6. 1937 年 12 月 2 日 | 关于松井司令官发布的命令原本以及所附的训令地图原本 |
| 7. 1937 年 12 月 9 日 | 关于劝告中国军队投降书原本 |

我,美山要藏,在此证明:经核查后,上述几个文件已于战争结束时烧毁,因而现今不在本局所保管的文档中。

1947 年 5 月 1 日

第一复员局文书课长 美山要藏(签名盖章)

我在此证明:美山要藏是当着我这个见证人的面签名盖章的。

于同一日期、同一地点。

见证人:上代琢禅

(吴世民 译)

50. 书证第 3287 号

石射猪太郎宣誓证词

签署了宣誓书如另纸之后,按照我国通行的格式,我谨作出如下证明。

1. 我于 1915 年 11 月 11 日进入外交机构。先后在中国、欧洲和美洲各地以及东京外务省任职,1937 年 5 月 11 日出任东亚事务局局长,一直到 1938 年 11 月 8 日。之后,我相继担任过泰国总督,驻巴西、缅甸大使,1946 年 8 月 7 日卸任。

2. 大约在我被任命为东亚事务局局长 2 个月之后,1937 年 7 月 7 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大约在 12 月 13 日,我国军队胜利进入南京。有鉴于此,我国驻南京代理总领事福井淳(Fukui, Makoto)从上海返回他(在南京)的岗位。他从南京向外务省递交的第一份报告就是有关当地我国军队暴行的。这份电报报告随即被转交给陆军省军务局局长。当时,外相对此事感到警觉和担心,敦促我迅速采取一定的措施查禁此类不光彩的行径。我答复他,该电报报告的副本已经转交给陆军省,我还准备在即将举行的陆军省、海军省和外务省联席会议上告诫军事当局注意这类行为。

这次联席会议很快就在我的办公室举行了。(这类会议在东亚事务局局长的办公室不定期举行。起初参加会议的有陆军省、海军省的局长们以及外务省主管东亚事务的局长。然而,后来的惯例是陆军省、海军省军务局第一课的课长,外务省东亚事务局第一课的课长代替各自的上级与会。)在会上,我提出了暴行问题,提醒陆军省军务局第一课课长注意“圣战”的崇高理想以及“皇军”光荣的名声,要求他立即采取严厉的措施加以制止。军方代表理解我的感受,答应了我的要求。会后不久,外务省就收到了驻南京代理总领事的书面报告。该报告系一份有关我军暴行的详细记录,由在南京的第三国侨民代表组成的一个国际安全委员会起草,用英语打印。我驻南京总领事得到了该记录的副本,并把它寄

往外务省。我仔细阅读了这份报告,并就此扼要地向外相作了汇报。征得外相同意,在随后的一次联席会议上,我向陆军省军务局第一课课长出示了这份报告,并重申了我的要求。作为答复,军方代表告诉我,他们已经向南京占领部队发出了严厉的警告。从此以后,暴行案例越来越少。

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次年即1938年1月底左右,大本营还向南京占领军派出一名特别代表。后来我们听说这位代表就是本间少将。此后,南京暴行就绝迹了。

3. 目前在外务省的文件中没有找到本宣誓证词中所述电报和报告,其原件连同副本均在战争期间由于大火而丢失。

4. 我得知,广田外相曾经请求杉山(Sugiyama)陆相针对南京暴行事件迅速采取严厉措施。这个情况是外相广田当时告诉我的。与此同时,我也向陆军省相应的部门发出过同样的请求。

我发誓,我本良心实事求是,并无虚饰。

石射猪太郎

(文俊雄 译 杨夏鸣 校)

51. 书证第 3304 号

陆军次官有关陆军部队之通令稿

陆支密

次官致有关陆军部队(驻内地、朝鲜、台湾、满洲的陆军部队)之通稿
有关由中国事变地区回来的军队及军人之言行需加以指导和管制的命令与通知,也已多次发出,但收效不大,确实还有不少人克制不止自己的言行。再者,现今有必要对两类人予以关注:一类是掌控不严以致任凭纪律松弛的部队指挥官;另一类是对有关陆军人员从中国携回之物品的命令和通知之意义未予足够注意的干部。而且特别应指出的是,那些归来官兵在返乡后的不当言谈不仅成为流言蜚语之源,而且有损于国民对皇军的信赖,破坏国民支持皇军的一致性等等。其危害甚大。可以料想:由于换防、复员等原因,归来部队将会逐渐增多。我再次命令对管制和指导应更为严格地执行,从而光大武运,提高皇军的军威,并确保圣战目标之实现无虞。

兹另发下《由事变地归来的军队军人之状况》一书,以供加强指导时参考。

陆支密第三四九号

1939 年 2 月 6 日(4460 份) MIYAKO①

陆支密

副官致参谋本部庶务课长之通报稿

现将有关此问题的文件抄送一份给您,望采取适当措施。

陆支密第四〇四号

1939 年 2 月 11 日 奥山②

① 此处原印章上有一字不清。英译与之完全不一致。

② 此处印章字迹不清楚。

粘附的纸片：

“所有发往事变地军队之通知均将以参谋次长的名义一式两份地送出。参谋本部业经商定，《华中华北集录》将同时提取若干份送参谋本部。此事一经印刷完毕即行办妥。”

国际检察局文件第 625 号

另印件

绝密

共 4 460 份

由事变地归来的军队军人之状况

注意：严禁复印

严格保管，防止外泄

由事变地归来的军队军人，一般来说，是纪律严明和品行端正的。他们都是军队之光，而且在言行上也是谨慎的，但是他们中有一部分人，炫于国民对他们的欢迎，自感曾经历严酷的军旅生活而有优越感，等等等等，以致有不少人毫不克制其言行。有些人在被勒令退伍后回到家乡时仍想吹嘘其荣誉或功绩，并编造有关其上级和其他部队的故事，诋毁他们；这些人夸大战场悲惨情景，为了试图显露自己消息灵通，乃至任凭军中机密事项外泄；这些人为了其所说之事动听，竟夸张说军纪风纪松弛，等等。上述一些言谈有时不仅成为流言蜚语之源，而且有可能影响国民对皇军的信赖，损害国内民众的团结，等等。因而有必要就这些情事的指导和管制特予注意。再者确有必要使回归部队指挥官加强对其部队之掌管。

(1) 关于军风纪问题

尽管一般来说，士气是高昂的，军风纪也是得到保持的，但仍有少数人：有的受凯旋气氛感染而兴奋莫名，以致对指挥官的命令指示未予足够的注意；有的在欢迎人群面前行为有失体面等；有的在酩酊大醉后肆意喧哗；有的谈到军纪时使用了玷污的语言。

关于指挥官掌管不够和行进纪律很糟的例子，现列举如下：

- ① 有些人无故离开队伍与欢迎人群交谈。
- ② 有些人无故将呼唤他的人拉进队伍与之交谈。
- ③ 有些人接受欢迎人群递来的酒肴并在行进中吃喝。
- ④ 有的人挽着妇女的手行进。
- ⑤ 有的人让其妻子代背枪支而抱着自己的子女行进。
- ⑥ 有的人拿枪的样子和服饰举止都很差。

有关军风纪的言谈方面,有必要予以注意的主要例子如下:

驻□□地区的部队那里,我听说军纪很严;但在我们的部队,幸好军纪风纪都完全没有问题。

在战地,指挥官使用“征募”一词来代替“征发”。每当我们缺乏粮食时,他就下令“征募若干”。但实际上“征募”和“征发”完全是一回事。他们说皇军是严格的,但征发行为总是和战争紧密连在一起的。

在战斗中我最喜爱的一件事是掳掠。在前线,长官对掳掠行为是视若无睹的,有些人竟然是尽情掳掠。

由干部候补生出身的小队长甚或指挥不了其部下。这种军官下了命令,士兵却自行其是,反而取得良好结果。服从那些出身于干部候补生的军官之命令,只会造成更大的伤亡。

在平时的军队里纪律是要严格遵守的,但在战场上却不能这样。懒汉总是得益的。认认真真干事的人总是早早战死者多。

在□□,我们擒获了一家四口。我们玩弄这家的女儿就像玩弄娼妓一般。但当她的父母坚决要女儿回到其身边时,我们就杀死了他们。我们继续玩弄这个女儿直到部队开拔时才停止,还将她杀死。

某中队长曾非正式就强奸之事下达过这样的指示:“为了不使我们

惹麻烦，完事之后或给她们些钱，或在偏僻的地方将她们杀掉。”

如果对参加战争的军人逐个进行调查，可能发现他们全部犯有残杀、抢劫或强奸之罪。

当我们在华北在□□附近遭到中国兵袭击时，我们中出现了大约八名逃兵。

在战地，我们都不把强奸当作一回事。甚至有些人在被宪兵当场发现时竟用枪进行抵抗。

在约半年的战斗中我只懂得了两件事：强奸和盗窃。

在战场上，如若周围战火纷飞，即使上级下令“前进”，也无人向前挪移。

在战斗间隙，聚赌是常有的事，有些人归来时带回一大笔钱。

在战地，有相当多的人以征用为借口，攫取宝石、贵金属等物留作纪念。

日本军利用中国人当间谍，等到他们不再有必要时就把他们杀掉。

部队发给各级军人一些娼妓券（军官得的是些三圆券，下士是些二圆券，列兵是些一圆券），以便让他们有所消遣。

有些日本士兵很冷酷。他们逐一检查战友的尸体，发现有金牙就将其拔下。

把所掳掠来的物品带回日本的，都不是士兵而是些军官。我亲眼目

睹宪兵从归来军官行李中抄出掳掠物品并予以没收。有些军官真是厚颜无耻之极。

在兵站地区,宪兵发现我们征发牛猪时往往进行呵斥;但我们不能没有吃的就去战斗,因此在前线一遇到他们,就赶紧把牛猪杀了吃掉。

我们军队在交战地区的掳掠行为是超乎想象的。宣抚措施仅在一小部分占领区实行。

中国军的被俘人员,有时让他们排成一排,用机关枪将之扫射死,以检验机关枪的性能。

(2) 归来官兵的思想状况

一般说来,他们的思想是稳健的,也没有表露什么极端过激的见解;但在少数官兵中,有的辱骂将校指挥能力拙劣,有的对晋升之事表露不满,有的说指挥官以牺牲其部下为代价博取自己的荣誉。这些言论应予以注意。

在思想方面,需加以注意的言论现举例如下:

战死者多少取决于指挥官的能力。提高将校的素质并教育他们要比训练士兵重要。(下士官)

这次事变发生后,在各地重大交战中,各部队指挥官竞相争夺首先登上重要职位的机会。因此后方部队如战地运输大队遭受许多伤亡。这些伤亡实际上都是为部队长作出的牺牲。(下士官)

我们的中队长首先要其部下挖掘战壕,而他自己则站在那里看着。不久他的一只脚就受了伤,并在两名士兵的扶掖下撤了下去。然而某个列兵受了伤,他就得靠自己撤下去。列兵在战场上的命运的的确是很可怜

的。(列兵)

在行军时,士兵总是疲惫不堪,当他们看到大队长高高骑在马上,他们就公开相互地说“既然士兵是徒步,大队长也应该徒步”,“把他拉下马来”等等。(列兵)

在战场上,官与兵之间的差别是不分明的。我在好几个地点看到列兵申斥下士官和下士官未经允许使用军官的私人物品。谁肆无忌惮,谁就是有势力的人。(下士官)

征集来的兵,与正规兵不同,从一开始就对军官不尊敬。而军官自己似乎也感到不自在,因为他们都不是不讲理的人。结果是纪律越来越松弛,竟至发生掳掠等事。(下士官)

看来军阶愈高的就愈比兵士要胆怯。他们缺乏率领兵士的气概。究竟有什么理由要兵士按照这种上级的命令行动呢。(下士官)

在交战间隙,小队长总是毫不怜惜地使用其部下并使用很粗鲁的话,但一上火线,他们(小队队长们)就常假装胃痛而退缩回去。(列兵)

从预备役征集来的军官不值得别人将之作为领导加以尊敬,因为他们的人品很坏。(列兵)

我真不想再去打仗了。那些战死者的命运真是悲惨。(列兵)

想活着回到家乡的人,就必须落在后头。(列兵)

(3) 保守军事秘密的状况

有些人泄露了有关军队实力、部队番号以及部队之行动企图等机密。

主要例证：

某准尉在公众欢迎会上对某一县知事祝词的答谢词中，泄露了部队的确切人数，他说“我和□□□□名士兵因军令关系而退伍回来”，等等。

一名负伤的上等兵从前线返乡途中，在火车上对一旅客说，“许多人都以为我们这个师团是调到台湾去的，但那是错误的，调到台湾去的那个师团是某某师团”。

有一名上等兵在部队行进途中递给前来欢迎他的从兄一张秘密纸片，内容是“自己当天不能去看他了，想在后天去跟他见面”云云。（纸片上，有回归部队编组的记录）

有些小队长和分队长没有归还正规军用地图；有些负有特别职责的人员保留某军参谋部编成表，并向全中队成员分发中队编组表和战友名簿。

有人将一眼便认出是运输指挥官船室内所藏上有作战暗号编组原稿的纸片和全体职员名单，随意丢弃。

有人将部队编组表遗留在火车上。

某一军官（或一下士官）下令为归来部队准备便餐时，竟将根据编组的部队数目告诉做便餐的人，从而公开了部队的编成数。

有些下士官持有军中秘密地图、联队武器数量表和编组表。

有些人未经许可而在秘密要塞地带摄影。

“我所属的第□军之司令官为□□中将，该军约由□个师团组成”。有人像这样的话也对人说。

某后备役工兵中尉因战斗负伤而入医院,从而得以回乡休假,并应友人之请在不同场合讲述中国事变的战事。在他的言谈中,为了把事情说清楚,竟谈到有关一个派遣师团的编组情况;或忘乎所以地举出指挥官因维护军纪而采取了陆军刑法第 22 条所许可之行动的实例;或谈到日本军大量屠杀中国军民的事例。他的言谈是会离间军民或引起怀疑皇军正义性之流言蜚语的。

(文件上所粘附的纸片)

陆军刑法第 22 条规定:

“在镇压有许多人于敌前所策划之叛乱的紧急情况下,为维护部队军纪而有必要采取之行动,均不予以惩处。”

(4) 关于携回物品的状况

尽管归来军人所携回的非法物品或违禁物品近来在数量上业已减少,但仍有下面一些事例值得注意而需进一步掌控。

有些参谋长官或指挥官,并不清楚有关准许携回的物品之准则,却在士兵中乱发盖有指挥官印章的许可卡,而任由士兵自己填上物品名。

有不少下士官携回照相机,还有不少军属购买并带回来与其身份不相称的钻石和皮衣,部队长对这些情况必须加以掌控。

(5) 被开除的军人在回乡后是否勤奋工作的问题

他们中有些人被开除回乡后,在其就职的公司和工厂中并不勤奋努力。因此在他们被开除前有必要给他们一些良好的指导和培训,以便使他们在各自的社会活动中成为模范工作者。

国际检察局文件第 625 号

证明书

W. D. C(华盛顿文书局)第 号

I. P. S(国际检察局)第 625 号

关于资料来源和真实性的声明

我,石桥兼雄,在此首先证明:我是以第一复员局文书课的委托人之资格而与日本政府有正式关系的;其次证明:我以此官员的身份保管着上述文书,该文书共七册,标明日期为“1939 年 2 月 16 日”,名称为《一九三九年日支事变陆军记录》。我还要证明:上述记录和文书是日本政府的公文书,而且是下面列出的省或部局的官方档案的一部分(如有卷宗号或引用出处,或有有关文书在档案中的固定存放位置的官方表示,均要列出):陆军省。

1947 年 1 月 13 日于东京

见证人:小林四男治(签章)

证明人:第一复员局文书课委托人 石桥兼雄(签章)

关于文件获得的声明

我,亨利·希莫吉玛(Henry Shimojima,即小林四男治),在此首先证明:我是盟国最高司令总部的有关人员;其次证明:上述文件是我在执行公务时从上面签名的日本政府官吏手中获得的。

1947 年 1 月 13 日于东京

见证人:希拉姆·E. 纽比尔(签字)(Hiram E. Newbill)

声明人:国际检查部调查员 亨利·希莫吉玛

(吴世民 译)

52. 书证第 3393 号

大杉浩宣誓证词

签署了宣誓书如另纸之后,按照我国通行的格式,我谨作出如下证明。

1. 我现住名古屋市北□^①船住町二丁目五番地。

2. 从 1937 年 8 月一直到 1938 年年底,作为第三师团、第三炮兵联队第一大队的观察队队长(observation section),我参加了在上海和南京地区的战斗,当时我是炮兵少尉。

3. 1937 年 9 月 9 日,我们在进攻上海南市(Nanshi)时,大队长特意命令我巡视租界区,以保证这些区域绝对不会遭到我方炮火的攻击。我把巡视结果通报给在这一区域的所有中队。据我所知,在我们进攻南市的过程中,没有对租借造成任何破坏。

4. 在南市战役后,我所在的部队进行了集结,在太仓(Taitsang)进行了重新调整,12 月 2 日左右开始向南京进发。在前往南京的路上,几乎没有进行任何战斗,在南京与太仓之间,我也没有见到任何一个被完全摧毁的村庄。我们的确看到了一些局部损坏或被烧毁的房屋,当时我从来没有看到,或听说日本士兵破坏过房屋。在我们的行军过程中,有足够的房屋供我们宿营,因此我们没有必要在室外宿营。

5. 我已经忘了这个村庄的名字,但是在我们的前往南京的路上,我看到了一堆被焚毁、丢弃的粮食。在询问村民时,我们听说是撤退的中国士兵为了不让这些粮食落到日本军队手里,而烧毁了这些粮食。在此之后,我更加仔细地观察了路边被损毁的房屋,发现其中大部分是粮食仓库和其他的供给品仓库。

6. 大约在 1937 年 12 月 11 日,我奉命侦查前进路线和一个适当的部队阵地。我感觉我们的部队在句容(Chiyun),并且正在向南京城的南

① 此处原文不清。

侧进军。我想是在12月13日傍晚,我们从南门进入了南京城。路上散落着很多日本人和中国人的尸体,其中我看到了日本士兵的尸体被绑在树上,身上有很多枪眼,一看就知道他是被中国士兵俘虏并被杀害的。我砍断绳子,把尸体放在地上。在城墙附近,有很多中国士兵的尸体,当时没有平民的尸体。我们从城门开始,在城里只走了1公里,但是我看到有宪兵被部署在银行和政府机关门口,并有禁止日本士兵进入的标志。同时,我注意到在城里只有很少的居民受伤。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南京城,但是我能看得出来,整体而言,这座城市被原封不动地保护了下来。我没有看到有火烧的痕迹。

7. 在上海战役即将结束时,我们从上级指挥部不断接到有关下列内容的指示,我对我的部下强调了这些指示:

严格遵守军事纪律和道德纪律。

和善地对待中国人民。

遵守国际法。

不要引发国际纠纷。

小心行事,我们正处于列强的观察之中。

8. 12月13日,我在汤山镇回到了我的部队,并带领他们从汤山镇前往南京城南。当时,按照上级的命令,我严格禁止我的士兵外出,即使因公外出,士兵也奉命不得进入南京城的西南地区,因为这一地区已经被划为难民区。当时我从同事那里听说这一禁令是为了避免危险,有一些战败的中国武装士兵身穿平民服装,在这一区域取得了难民身份。在上海战役中,我曾经有过与身穿平民服装的中国士兵遭遇的危险经历,我要求我的士兵要特别小心,决不靠近任何中国败兵可能藏身的地方。我的部队最后向西进发,没有进入南京城。在我们驻扎在南京城附近的这一阶段,我没有听说过任何关于针对中国人的非法行动或大屠杀之类的事情,而这些事情经常被说成是日本士兵所犯下的罪行。

9. 1938年初,我们驻扎在镇江(Chinking)附近。有一天,我和大队长一起参观了附近的一座著名庙宇。这座庙宇的二楼大厅里,有大量的藏书,所有藏书都被宪兵封存,严禁拿走任何一本书,违反者,包括日本士兵,将受到应有的惩罚。

10. 大约是在那段时间,附近一个中队的一名士兵被宪兵逮捕了,我陪同中队长去领回那名士兵。但是,宪兵的分队指挥官告诉我们说这名士兵犯有强奸罪,根据松井总司令关于严格军纪,违者严惩的命令,他拒绝把士兵交还给我们。

11. 我们行动中最大的麻烦是身穿平民服装的中国士兵,当他们受到严厉围剿时,他们就藏起武器,装成平民,当我们放松警惕时,他们就会来挑战我们。由于在他们没有武器时,完全不可能把他们和真正的平民区分开来,我们最终偶尔采取了一些办法,例如由于形势的需要,把所有的村民都集中在一个地方,进行监视。一旦身穿平民服装的中国士兵投降,公共秩序就得以恢复了。我们会释放普通百姓,把投降的士兵移交给宪兵。

1947年6月24日于东京

我证明,供述者在我面前宣誓并盖章,同日于东京。

见证人 上代琢禅

我发誓,我本良心实事求是,并无虚饰。

大杉浩

(罗峰 译 张生 杨夏鸣 校)

53. 书证第 3394 号 大内义秀宣誓证词

签署了宣誓书如另纸之后,按照我国通行的格式,我谨作出如下证明。

1. 我现住千叶市稻毛町二——1234 番地。

2. 从 1937 年 9 月底,我们在吴淞口(Woosung)登陆后,我作为上海派遣军第 9 师团、第 9 山地炮兵联队第 7 炮兵小队的代理队长,参加了在上海和南京地区的战役。当时我的军衔是炮兵少尉。

3. 同年 11 月 3 日左右,在渡过苏州河后,我们联队在上海西部的一个机场附近集结。

由于炮击和轰炸,这一地区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我们联队当时还处于战斗状态,严格地执行了军事纪律。

在那个集结地区,我们接到了参谋长的指示:鉴于你联队即将被派往存在外国权利与利益的地区,每个指挥官都要严格控制自己的部下,努力保持军纪。

我随后警告了我的部下,以便他们完全理解上述指示,在我的部下中,没有一个人在集结地及周围地区违反军纪。

4. 在集结地区附近的一个村庄里还有几个妇女(我忘了这个村庄的名字了),因此严厉禁止(士兵)进入这个村庄。

因此,一天晚上,从这个村子里升起了红色和绿色的信号弹,紧接着,敌人的炮弹如雨点一般落在我军的阵地上。

第二天早上,我们对这个村庄进行了彻底的搜查,但是一个男人也没有找到,据此,我们认为即使是对于妇女,我们也要保持高度警惕。

5. 同年 11 月 14 日左右,按照向苏州(Soochow)进军的命令,我们的部队作为一线部队向前推进,在到达苏州之前,我们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抵抗。在前往苏州的路上,两侧的村庄大部分都已经被摧毁了,只有几间房屋还有屋顶,在这些村庄里,也找不到居民。

由于我们的部队是在行军的最前方，我们不可能犯下这种罪行，因此我知道这都是中国军队在开始撤退时进行的破坏。

为了中国人和后续的日本军队，我严禁焚烧房屋和抢劫财物，可能正是由于这条命令，结果是令人满意的，没有出现什么事故。

6. 我们没有遭到任何抵抗就进入了苏州，因此除了空袭造成的少许破坏外，街道没有遭到破坏。

在这个城市里，士兵个人搬动商品的行为是被禁止的，征用的准备工作是由行政官员进行的。但是由于我们部队在12月17日左右奉命向西前进，所说的征用也没有执行，士兵吃的是用饭盒煮熟的定量配给粮食，所有的士兵都是在这种情况下行军的。

7. 在南京以东约8日里的山区，我们遭到了激烈的抵抗。这个地区的中国军队准备充分，进行了顽强的抵抗，这支军队曾经以日本军队作为假想敌进行过特别训练，中国军队从来没有如此顽强地抵抗过我们。

我们的部队继续作为先头部队前进，所有的日本军队都不得不露宿野外，因为在这一地区可供士兵们住的房屋都被中国军队烧毁了。

8. 这时，我们接到了这样的口头命令：“我们部队前进的目标是南京城墙，至于进入这座城市，你们要等待另外的命令。”

经过一系列的浴血奋战，12月9日黎明时分，我们进入了光华门(Kwanghuamen)外的防空学校，我们发现大量的房屋都已经被破坏，以阻止我们的前进。尤其是机场附近的房屋都被烧毁了。

上述破坏肯定是中国军队造成的，因为在我们是先头部队，没有其他的日本军队。

9. 12月9日夜，我们接到命令，说如果在第二天(12月10日)中午前中国军队不投降的话，我们将进攻南京城，同时我们还受到了下列限制和警告：

(1) 鉴于南京市是中华民国的首都，虽然可以轰炸城墙上的敌军，但是你必须小心不要炮击城内。

(2) 尤其小心不要炮击外国的财产以及城内的难民区。(我当时有一张南京地图，但是现在没有了，在第一复员局也已经没有了，因为都被一场大火烧毁了。)

按照上述命令,我在炮击的技术问题上绞尽了脑汁,幸运的是,我最终达到了命令中提到的目标。

10. 我们对南京城的进攻在12月10日2点钟开始,我们占领了光华门附近的城墙,但是没有得到进城的许可,只有宪兵和一些小部队进了城。

那天,在城墙附近有一个国籍不明、被烧焦的人,他还有微弱的呼吸。

看到这种情况,我们的大队长芳贺(Haga)少佐感到愤怒,给我们下达了严格的命令,要求我们找到肇事者,因此,我停止了战斗准备,集合了我的士兵,对他们提出了警告,并调查肇事者,但是在我的部队里没有肇事者。

验尸的医生得出的结论是这具尸体至少是10小时之前被烧的——在我们进城前,肯定是一个日本士兵被中国军队抓住并被烧死了。

我们的部队当晚返回汤山镇。

11. 我们在12月15日进入南京城,在中国兵营里驻扎了几天,在这里,每个部队都设立岗哨,所有士兵都被禁止外出,因此除了执行公务的军官外,没有一个人外出。我们师所有的部队都是这样。结果,没有一个士兵因为违法行为而被认定有罪。

我的一位朋友,也是一个军官,告诉我在难民区似乎有很多的难民,但是他们都被宪兵保卫着,因此即使是军官——就更不要说列兵了——都难以进入难民区。

在我外出执行公务时,我看到大量的中国军用物资被胡乱地丢弃在街道上,但是我没有看到任何火灾,街道也几乎没有遭到破坏。

我在长江岸边看到了一些中国士兵的尸体,但是从来没有看到过遭到大屠杀的受害者的尸体。

12. 我们在12月20日回到了东部。

1947年9月29日

我证明,供述者在我面前宣誓并盖章,同日于东京。

见证人 上代琢禅

我发誓,我本良心实事求是,并无虚饰。

大内义秀

(罗峰 译 张生 杨夏鸣 校)

54. 书证第 3395 号

胁坂次郎宣誓证词

签署了宣誓书如另纸之后,按照我国通行的格式,我谨作出如下证明。

1. 我(胁坂次郎)现住名古屋市长种区都通四丁目 11 番地。

2. 1937 年 9 月,我是第 9 师团第 36 联队的联队长,当时我的军衔是大佐。我们联队的动员命令是 1937 年 9 月 20 日左右签发的,我在上海派遣军的统辖下参加了在上海和南京地区的战斗。

上海派遣军的司令官是松井将军。

3. 我们刚到达上海,将军的命令就通过上级传达到我这里。将军在所有可能的场合都发出指示,必须严格遵守军事纪律,必须善待并保护无辜的民众,必须保护外国的利益。为了使我手下的军官和士兵充分理会这一命令,我做出了努力,以免他们中有人做出纵火、谋杀、抢劫和强奸等恶行。

4. 在日本军队从上海向南京进军的过程中,我的部队一直处于最前沿的位置,我们注意到在我们行军的路线上有不少村庄的房屋被烧毁、破坏或遭到抢劫。当地中国人告诉我们,这些都是中国军队在准备撤退时,按照习惯,为了实行所谓的“坚壁清野”而实施的放火和破坏造成的,以便阻止日本军队的前进。同时,他们还告诉我们,中国士兵和百姓都参与了抢劫,对他们来说,这种事情在战争时期很平常。

5. 就在 12 月 8 日 4 点,我们的部队占领距南京东南 40 公里处的淳化镇后就立即对敌人施加压力,连夜行军。12 月 9 日黎明到了光华门的南面的上坊镇。当时天漆黑一片,我还未搞清南京城的方位,突然北部两柱烟火升起,直把天空烧得通红。我猜它们是从南京城发出的,就朝着那个目标进发。我的猜想被证明是正确的。在我们占领南京之前的几天里,我们每天都可以看见浓烟从城里升起。当时日军战机的轰炸并不剧烈,而且我们的炮兵联队根本没有炮击。因此我们断定,这是由中

方的清野或是由不小心失火所造成的，混乱时期这是经常发生的。至今，日本部队都严格警戒，防止意外的火情。占领南京后，我们的部队忙于灭火，从未有日军纵火的事件发生，我的部队也从未有过意外失火的情况。

6. 12月13日清晨，我的部队占领了光华门。就在城门旁发生了激烈的战斗，结果双方死伤惨重。占领南京后，我的部队立刻就开始救死扶伤，把所有的中国士兵和日本士兵的尸体集中到一处——就在光华门和通济门之间，我的士兵立了一块墓碑，并哀悼这些牺牲者。由我们部队的僧侣为他们吟诵经文，而在他们下葬的时候又为他们彻夜祈祷。

7. 12月15日我在南京城内巡视的时候想看看难民营的真实情况，然而守卫的士兵拒绝了我的请求，并说没有特殊的命令，甚至司令本人都不得入内。因而我没法视察难民营内部的情况。当时，以及后来我都未听到过日本士兵在难民营中做过非法的事情。

8. 由于想把我们联队的联队部设在一所房子里，我们的士兵巡查了这所房子。就在一个中尉，他是我们联队的旗手，进入房内，想检查里面附带的一个防空洞，这时里面有人向他射击。之后他告诉我他立刻接受了挑战，用手枪射死了两个中国兵。我立刻下令士兵严防残余的中国兵，不要进入中国民房。

9. 就在我们的部队占领南京不久，一名主计中尉在执行任务时在路上发现了一只中国妇女的鞋子。他拿着这只鞋子到总部向他的战友展示鞋子上精巧的花纹。被宪兵发现了并向军事法庭呈交一份报告指控他犯了抢劫罪。这名中尉当着我的面，掉了泪，声明他是清白的，我相信他是无辜的，并把实情向上级作了汇报。

我记得这个案子最终证明是微不足道的一件小事，不足以被起诉。当时在南京的日本宪兵的管理是十分严格的，甚至是对极小的案子都不留情面。

10. 12月18日对死难者进行悼念之后，松井将军就警告我们高级官员一定要严格遵守军事纪律，弘扬我军的荣誉并竭诚努力促进中日两国的友好关系。

在激烈的南京攻坚战后，我愈发被松井将军的正义感和仁慈所感

动。而在以后的进攻、防御行动中,我也总是尽力弘扬这种精神。回国后,我给一座庙,我现在记不起该庙的名字了,捐赠了一座观音像——这座庙位于福井县(Fukui Prefecture)。此举的目的在于为在战争中死难的中国人和日本人哀悼,愿他们的灵魂得以安息,也为了祈愿东方古国的和平。

11. 我一直在南京呆到12月24日。在我管辖的部队里没有任何违法乱纪的事件发生。南京的居民对日本士兵越来越熟悉。他们有的当厨师,没有人对日本人抱有敌意。南京陷落后我未曾听到城里、城外有过枪声。假如有人打机关枪,那么肯定会被报告上来,但我没听到机关枪的枪声。

12. 占领南京后,我们的部队担负了警备嘉定的任务。有一天,大队部一士兵向油灯加油,因而引发了火灾,总部被烧着了。由于这起意外火情,根据军事纪律我要负有一定的责任。因此我受到斥责,大队长被反省,而那个纵火的士兵和警卫队的队长被送入监狱。根据松井将军的命令,军事纪律非常严明,没有忽视任何违法的事件。

除了上述的事件之外,我记不得任何非法事件在我管辖的部门发生。

1947年9月12日于东京

我证明,供述者在我面前宣誓并盖章,同日于东京。

见证人 上代琢禅

我发誓,我本良心实事求是,并无虚饰。

胁坂次郎

(罗峰 译 张生 杨夏鸣 校)

55. 书证第 3396 号

西岛刚宣誓证词

签署了宣誓书如另纸之后,按照我国通行的格式,我谨作出如下证明。

1. 我住在埼玉县入间郡饭能町野田。

2. 大约 1937 年 9 月中旬我参加了上海远征军,任 19 步兵联队第一大队大队长并参与对南京的占领。当时我的军衔是少佐。

3. 1937 年 9 月末,我们在吴淞附近登陆并参与了战斗。

11 月中旬我们听从命令沿苏州方向追击敌军,上级给我们下了严格的命令,除非出于战事需要,否则不能摧毁或焚烧民房。我向我的下属发出了命令并加以监督。

4. 除了铁路沿线及附近的地区遭到炸弹的破坏之外,苏州没有任何损伤,有个老百姓告诉我当地的居民用钱贿赂中国军队不要在城里战斗并撤退,并乞求他们不要毁城和劫掠。

5. 在距无锡东部 1 日里(2.5 英里)的地方,也是在城里,中国军队引发了一场战斗,使附近的房屋遭到损毁。战斗结束后,我巡视了全城,发现一座粮仓里的东西都被搬走了。我立刻派士兵在粮仓前驻守,禁止任何非法搬运粮食的行径。向师团监督部门汇报过之后,我们把这个地方转交给他们管理。这种处理事件的程序很久以前就是由各个长官下令执行的,我们只是遵照执行,不仅在无锡,在任何地方都是这样做的。

6. 在摩[磨]盘山脉和南京交界处爆发了一场激烈的战斗。在日军占领前几乎所有的房子都被烧毁了,抢劫的痕迹也很明显。日军到达那儿时,几乎找不着任何可用的物品。我们只能搭帐篷,有时甚至连帐篷都没有。我们仅靠定量的干粮继续挺进。

7. 在占领南京的过程中,我军的军事行动受到严格的控制,甚至不允许随便利用突然出现的时机。大约 12 月 8 日由上级长官发布了更具体的作战指令。根据这项指令,我们的部队奉命在 12 月 10 日开始对雨

花台的进攻,然后于12日下午转向光华门,继而在13日继续进攻。接到南京陷落的消息后,我们只是在城门附近打扫战场,然后在当夜回到了汤水镇。15日我们到达了南京,部署之后,安排士兵驻扎在南京城东南。当时城里几乎所有的房子都完好无损。在日军驻扎地周围,有几处小火,但都不是日军所为。在进入南京前后,上级长官已严厉、并多次警告过我们不要纵火,我们的官兵都非常小心。一进南京,我就下令禁止所有官兵除非公干,否则不能进城,并命令他们尊重并保护外国居民的财产和权益,不允许他们做出伤害中国老百姓的事情,而应该在执行公务时对中国居民友善。在每个驻扎处,我还安排了一个管理火情的人,并对他进行了严厉的训诫,同时也给他一些预防火灾的指示。这种措施在我们驻扎的每个地方都被严格遵守。

8. 我军进入南京之后,我们随时待命,以便根据上级下达的命令能随时围剿敌军。我们在南京的所作所为如下:

12月13日,我们通过光华门进城,扫荡了在通济门西部南北向小溪东部的敌军残余部队;然后当夜又向汤水镇进发。

12月14日,我们在汤水镇周围清剿,15日晚上7点回到南京城。16日,举行了宣布天皇诏书的仪式。因为所有的官兵身上都长了虱子,我们用沸水清洗各自的物品。17日,总司令松井将军胜利进城,官兵们忙于掉换营地。18日,举行对死难者的哀悼仪式,营地的迁移工作仍在继续。19日,举行联队里的哀悼活动。20日,官兵护送总司令巡视阵地和医院。21日和22日,清理雨花台战场并搜寻失踪的士兵。23日准备返程。24日,我们离开南京到了昆山。除了上面提到的日常琐事外,我们还忙于处理各种各样关于战事的报告、对死难者亲人的告慰、发放补贴、士兵的存款、和家人的互通信件,以及远离家乡几个月的士兵们的收发包裹等。这些事情都占用我们很多时间,让我们无暇休息。

9. 当我们在南京驻扎后,出入各个驻扎地都受到严格监管。我也接到上级的指示,培训哨兵如何盘问人,以便他们可避免由于言语不通而给守法的当地人带来的麻烦。我按照命令严格执行。没有上级命令进行抢劫和施暴,更不要说松井将军本人了。恰恰相反,12月19日松井将军命令我们——22日联队长也发布同样的命令——要善待中国老百姓,

使他们能建立起对日军的信任。

10. 12月19日我骑马视察——从中山路到下关进行巡视,未发现有任何房屋遭到破坏。在我们进入南京之前,关于日军对南京造成大肆屠杀的谣言就已经满天飞了。但事实上,我能肯定这不是真的。在下关我也没有发现任何中国人的尸体。12月24日我部队撤到东部,1月9日到达昆山,接到驻防那里的命令。

11. 在昆山驻防期间,一批美国的传教士和医务人员来视察那里的教堂和医院。发现当地的教堂和医院情况良好——仅受到很小的破坏,他们非常高兴,并委托我们管辖。和他们吃了一顿饭之后,我们又合影留念,然后才分别。我也在苏州驻防了一个月,那里所有的房屋都和原来一样没有改变。街道整洁,商业兴隆。日军没有犯下任何罪行,我们和当地的居民和睦相处。日军的娱乐活动很丰富,没有任何不正常的事件发生。

1947年10月8日于东京

我证明,供述者在我面前宣誓并盖章,同日于东京。

见证人 上代琢禅

我发誓,我本良心实事求是,并无虚饰。

西岛刚

(罗峰 译 张生 杨夏鸣 校)

56. 书证第 3397 号

松井石根训示和西岛刚证明

训 示

我华中方面军于湖东之战后，继以果敢猛烈之追击，一举攻陷中国首都南京，完成一历史壮举。以此再蒙圣旨赐下优渥之词，令我感恩不已。不才石根之能恪尽职责，得以达成圣上之期望，实有赖于参战将士之英勇奋战。对此，吾亟应表示深切之感谢。

然我等之目标至为远大，我军所负之任务至为繁重，尔等切不可稍有懈怠，此数语诚须牢记于心者也。故而尔等全体应益加努力，报效国家。全军上下务须理解命令之真义，愈益整肃军风纪，集中精力于由经验得来之教育训练，竭力充实全军之战斗力，以期使下一作战行动之准备臻于完美无缺。与此同时，尔等应严防敌人可能发动之攻击，尽力保守军事机密，并维护公共治安和秩序，不予不逞之徒以蠢动之机。再者，为东亚繁荣之百年大计，亦为遵循皇国之传统，尔等应以怜悯之心对待在苛政下呻吟之当地民众，并协力以指导启蒙之道宣扶之。诚然，皇军之操守不能因有无作战有所差异。尔等各自务须行为谨慎，尽最大之努力维护和扩大我等之辉煌战果，以提高皇军之威信。

特训示如上。

昭和十二年(1937)十二月十八日

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

证 明 书

我在此证明如下事项：

1937 年 12 月，我以步兵第九师团第十九联队第一大队长的身份参加南京攻略战。本证明书所附的题为“训示”的日文文件，系 1937 年 12 月 18 日以当时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的名义颁布而在全军散发的训示之一个复份。我收到后就将之插入我大队阵中日志中，因而为我保

172 东京审判书证及苏、意、德文献

存至今。

1937 年^① 10 月 1 日于东京

证明人 西岛刚

我在此证明：证明人是当着我的面签名盖章的。

于同一日期、同一地点。

见证人 上代琢禅

（吴世民 译）

^① 原文如此。显系 1947 年之误。

57. 书证第 3397A 号 美山要藏证明

证 明 书

我现任第一复员局文书课课长之职。兹证明：前参谋本部的文件现由我局保管，以便进行整理和保存；但下列文件的原件或其副本已于投降时烧毁，故而经我们检查后在我们现今保管的文件中未找到。

文 件 名 称

华中方面军司令官于 1937 年 12 月 18 日给其所属部队的训示

1947 年 10 月 15 日证明于东京

美山要藏

我在此证明：上述证明人是当着我的面进行签名盖章的。

于同一日期、同一地点。

见证人：上代琢祥

（吴世民 译）

58. 书证第 3398 号

中泽三夫宣誓证词

签署了宣誓书如另纸之后,按照我国通行的格式,我谨作出如下证明。

1. 我曾做过中将,自 1937 年 11 月到 1938 年月底在上海派遣军的领导下作为第 16 师团的参谋长参加了围攻南京的战斗。

2. 1937 年 12 月第 16 师在执行突袭计划的时候,在 12 月 3 日左右接到了进攻南京的任务。我们立刻开始了进攻的准备,但在 12 月 8 日,接到命令——在距南京三四公里的地方停止进一步的行动。而且,据上级的命令,由于南京是中国的首都,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因此我们入城后一定不能破坏南京城,而应该特派一支部队去安抚南京居民、维护安定。我把这一点在各个部门都加以强调。

3. 在进攻南京的过程中,最令我们头痛的就是在紫金山附近的一仗。在那里,第 33 联队和敌军在中山陵附近交战。这是我们师团的主要前线。要在不损坏紫金山和明孝陵的情况下占领南京,我联队要付出极大的代价。占据中山陵附近的中国军队对于我军的推进是个极大的障碍。通过向进攻紫金山的 33 联队的侧翼和后方进行攻击,他们一直袭扰我军。然而,我军既不能用炮击,也不能用步兵联队的重型武器。这种情况严重阻挠了我军的进程,我们遭受极大损失。但在我们的让步和牺牲下,中山陵和明孝陵得以保全。而 33 联队最终克服了重重困难占据了紫金山,战后,该联队收到了来自军指挥官的感谢信。

4. 第 16 师团在 1937 年 12 月 13 日黎明占领南京中山门后,派两个大队进城,让他们扫荡了事先指定的地区、包括上元门、下关和中山路。

第二天,继续进行扫荡。12 月 15 日第 16 师团总部和一个小分队进了城。但在本师团控制下的地区,没有居民疏散。12 月 23 日本军队的部署发生了变化。16 师团的一部分被派去担任城里城外的警卫工作,取代了原先进城时的另一支部队,并一直在南京呆到第二年的 1 月 20 日。

5. 12 月 23 日军队部署发生变化后,难民区属于第 16 师团的警备

范围。自我们进城之日起,这个地区就被标示出来并被严格地守护起来。除非有特殊的通行证,否则连军官都不得进出。在华中方面军和上海远征军的司令进城后,经常下令维护军事纪律和进行人道主义的教育。我也将这些下令转发给每个部门。

6. 南京被占领时,所有负责的行政人员都已逃离南京,没有一个行政人员留下,因此日军找不着可以就维持和平与秩序进行谈判的对象。确实,当时的处境就是这样,以至于我们的军队别无选择,只能接管维持治安的任务。这对于中国居民和日本军队来说都是极为不方便的。

7. 进入南京后,我们在从中山门(Chungshan-men)到下关(Hsiakwan)的公路上发现了大量丢弃的中国军队的制服、军刀、军火、步枪和军帽。而我们在南京城内扫荡时,除了在难民营之外,看不到一个中国人。由于我们不能确信所有在难民营的中国人都是和平居民,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调查当地的居民。

8. 因此,12月25日成立了日中联合委员会来调查居民的情况。调查的方法是在日本人和中国人在场的情况下逐个审问和检查中国人,通过与日本士兵和中国委员会的咨询判断这个人是否是士兵。对一般的人,我们发放了良民证。而那些通过这种方法被断定是士兵的人则被送到上海派遣军的总部。因此,说他们都被屠杀了是不正确的。

9. 由于所有南京城外的房屋都被中国军队烧毁了——他们在撤离南京前将“焦土”政策付诸行动,日军官兵根本找不到任何可驻扎之地,只能在野外露营。尽管这种“焦土”行动非常普遍,但在战斗发生地区房屋被烧毁的特别多。

甚至在南京城里,被火焚烧的痕迹也处处可见。据说,这都是中国军队在撤离前干的。由于要在寒冷的天气保持宿营设施的需要,总部命令每个部门都要严防火灾发生,并专门派责任心强的人在每个部门负责火情。尽管种种防备措施,我们经常抓到持有良民证的中国女孩纵火。

10. 我确实从宪兵那儿听到一些日军抢劫的报告。但是,由于大多数居民都是带着他们的财物逃离的,大多房屋事实上都是空的,所以我

从未听说过任何有组织的,或大规模的抢劫行为。不用说,日军总部决没有下令、纵容、并允许此类非法事件发生。我也直接从中国老百姓那里听说战场上发生的大多抢劫和破坏多是由撤退的中国兵或是由那些竭尽全力挤进难民营的人所干的。

11. 松井将军命令要保护好外国利益和文化机构,这个命令被下达到每个部门。然而有些中国人善于以外国财产作为掩护。特别是,他们滥用外国国旗。很多时候,我们发现中国落伍的士兵躲在外国国旗之下的房屋内。我也从南京城的中国人那里听到很多这样的报告。结果,日军不可能立刻意识到外国国旗等同于外国利益。有时,他们不免要到各地去突袭那些他们认为是危险的地方。很遗憾的是,这些突袭经常演变为错综复杂的情况。

12. 绝没有日军有组织的强奸中国妇女的事件。我记得确实有一些零星的违纪问题,但我知道他们都为此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13. 根据审判中起诉方提供的事实,据说埋葬尸体的地方已被发现,而这些地方就是中国士兵在中山门和马群之间建立阵地守卫城池的地方,同样,在太平门及富贵山一带,他们有接收来自前线的死难者和伤员的设施。确实,日中双方在此次战争中都死伤惨重,但在这些地方决没有大规模的屠杀行动。

14. 第16师团守卫南京和附近地区之时,它主要把精力集中于维护和平和秩序上。随着南京城秩序的恢复,疏散的人员回到城里,逐渐回到家乡。松井将军维护和平、善待中国老百姓的命令是如此深入人心,以至于早在年初(中国人)他们就成立了自治委员会并在1938年1月1日举行了成立仪式。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前来广场参观并欢呼。随后,居民人数越来越多,小商贩也有增无减。说当时日本兵军队的非法和暴力行为威胁着居民的生命是绝对不真实的。

1947年10月15日于东京

我证明,供述者在我面前宣誓并盖章,同日于东京。

见证人 上代琢禅

我发誓,我本良心实事求是,并无虚饰。

中泽三夫

(罗峰 译 张生 杨夏鸣 校)

59. 书证第 3399 号

饭沼守宣誓证词

签署了宣誓书如另纸之后,按照我国通行的格式,我谨作出如下证明。

1. 我现住在名古屋市东区侨井町二丁目三番地。

2. 我曾是中将。在组建上海派遣军的时候,我被任命为松井的参谋长,并参加了上海和南京的战役。

3. 上海远征军组建后,松井将军给手下的军官下达指示,并命令手下的军官将该指示转达到各个部队。

(1) 上海附近战役的目的旨在征服威胁我们的中国军队,因此要尽可能地保护中国的官员和平民。

(2) 时刻要铭记,不要冒犯外国军队和外国居民,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误会,要与外国当局保持密切联系。

4. 为了执行上述的命令,日方官兵克服了极大的困难。在上海之战中,我们给予中国军民以及日本军人许多医疗救助,并给他们分发药品来防止传染病的传播。日军攻占上海南市的时候,前线的部队在技术上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使炮弹不至于落在该区,因此城市的和平与秩序得以维持。

上述的命令在各种场合被反复强调,甚至在南京战役之后仍严格执行。

5. 上海之战后,松井将军接见了来自美国、英国、法国的代表团,并就对他们国家所造成的损害致以歉意。他进一步解释了日本在当时处境下的立场,并请求他们予以配合以争取战争在短时间内结束。松井从未向我下达过任何轻视外国权利和利益的命令,也从未见过或听过在他领导下的官兵有过这样的行为。

6. 1937 年 12 月 2 日,上海派遣军接到占领南京命令,当时任华中方面军总司令官的松井将军就占领南京发布了详细的指令。我作为参

谋长,把占领南京的命令向松井司令属下的各部队传达,同时告诫他们“要对中国军队和民众宽容和仁慈(假如他们不抵抗的话),并善待和保护他们”。

7. 同年12月8日左右,又以松井司令官的名义仔细传达了占领南京的注意事项,其内容如下:

(1) 日军暂驻南京城外整装待命,准备以堂堂正正之姿态入城。

(2) 12月9日散布劝降书,12月10日下午1时向城内发起进攻。

保护南京城内之非军事设施、文化设施、历史古迹、外国权益,并禁止在上述区域使用重武器。

南京入城部队须为宪兵及经过选拔之部队,尽快恢复秩序,保证治安。

8. 12月10日,下达攻击南京的命令。

第十六师团第三十三联队作为攻击紫金山的部队,野田联队长须谨遵松井大将之命令,对驻守中山陵之中国军队不得施行炮击,只能以步枪及肉搏方式击退之,以不破坏中华民国之父孙文先生的遗迹为前提占领之。我就这样详尽地向全军传达了松井大将的命令,我本人也始终监视着,俾命令得以严格执行。

因从磨盘山麓到南京的一路,附近极为荒凉,遂命令第九师团进行调查,据其报道,乃是由于中国军队在败退之际掠夺、焚烧民宅所致,此后日本军队虽曾进入,亦因无宿营之地而陷于困境。而我本人则一再训令日本军队不得进行此等焚掠之事。

9. 尽管在南京陷落时城外几乎所有主要的房屋都被烧或毁坏,日军几乎没有房屋可住,进城的士兵比预期的多。但遵照松井将军的命令,我下令除了16师团外,其他部队撤到较远的城东地区,并命他们严格遵守军事纪律和公共道德以使南京秩序井然。

10. 1937年12月16日、20日和31日,这三天我每天都视察市区三次,但在街头并没发现尸体。在下关附近我看到几十具在战斗中死难的士兵的尸体,但至于所谓的成千上万的被屠杀的尸体,我即使做梦也未曾见过。我承认确实有几处火情,但我从未见过一例故意纵火事件,也未收到过此类事件的报告。在南京城里,确有几处烧焦的房子,但大多

数都保持原样。我常向日军下令要警惕火灾。

11. 进入南京后,也有人向松井将军报告了抢劫和暴行的案例。他对于这些屡禁不止的行为也非常抱歉。他命令军官尽最大努力严防此类事件的出现,并坚持对违法者严惩不贷。结果,这些违法者都受到了惩罚。之后,有关方面严格地执行军事纪律。我甚至听说十六师团对法律部门的程序提出抗议。

12. 有人告诉我一些部队擅自搬走家具,但他们说这样做是为了住宿的所需。他们说他们对征用所造成的损失进行了补偿,但在大多数情况下,经理们都跑走了,因此他们只能张贴便条来保证对住宿之需征用的补偿。一些士兵私自搬走家具,其中有些人搬走的家具是属于外国人的。然而,通过询问家具的主人和弥补损失,这些问题都得以解决,肇事者得到惩罚。当然,军总部从未命令士兵从事非法行为,也没有承认过他们的行为。

13. 至于南京难民营的管理问题,我命令十六师团守卫、保护此地的安全。只有持通行证的人和守卫该地的宪兵才可以进出此地。因此,我相信这个地区不可能被集体地、系统地和持续地侵扰。我也未曾听说或见过由辩护律师所证明的那些事件。我也从未向松井将军汇报过这些事,因此很自然他也从未听说过此类事件。

14. 至于南京安全地区委员会提出的抗议,我也一无所知。也未向松井将军汇报过。

1947年4月19日于东京

我证明,供述者在我面前宣誓并盖章,同日于东京。

见证人 伊藤清

我发誓,我本良心实事求是,并无虚饰。

饭沼守

(罗峰 译 张生 杨夏鸣 校)

60. 书证第 3400 号

小川关治郎宣誓证词

签署了宣誓书如另纸之后,按照我国通行的格式,我谨作出如下证明。

1. 1937 年 9 月底我接到任命成为第 10 军(当时的指挥官是柳川中将)的法务部长。在杭州湾北岸登陆,参加了进攻南京的战斗,并于第二年的 1 月 4 日归属华中方面军^①,之后受松井将军的直接指挥。

2. 第 10 军在杭州港登陆之后,立刻置于华中方面军的指挥之下。松井将军命令我们要严格依法办事,来保护中国的守法民众并保护外国利益不受侵犯,同时也严格遵守军事纪律和公共道德。

3. 我来南京之前,我处理了 20 多起有关违背军事纪律和公共道德的案例。在我处理这些罪行时,我感觉非常难决定这些罪行是通奸还是强奸。原因在于就中国妇女而言,对日本士兵有所暗示并不是一件罕见的事,而一旦被她们的丈夫或其他人发现她们和日本士兵通奸时,她们会立刻改变态度声称她们被日本士兵强奸了。不管是强奸还是通奸,我都根据军法惩罚肇事者,并权衡相关事实。对于那些采取胁迫态度的日本士兵,我更严厉地惩处。

4. 大约在 12 月 14 日中午我到达南京,下午视察了第 10 军(南京城南)的守备队。当时我只看到六七具中国士兵的尸体,除此之外,没有别的。第 10 军 12 月 19 日撤出了南京,转到了杭州。我在南京期间,既没有听到关于日军非法罪行的谣言,也没有看到任何非法行为的迹象。日军仍处于战斗状态,严格遵守军事纪律。我也从未接到上级的从事非法行径的命令,更不要说从总司令松井将军那里接到此命令了。

5. 日本的宪兵也严守总司令松井将军的命令,并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日本士兵的非法行径被严格控制。例如,上砂(Kamisago)中佐(宪

^① 原文如此,与下句话不一致。

兵)曾在—个案例中指责我太仁慈,这个案子是我亲自彻底调查的,我认为是一件小的违纪事件,因而没有起诉。

6. 1938年1月4日我在上海总部见到了松井将军,当时总司令强调,“要公正而严厉地惩处犯罪”。我严格按他的命令办事,履行我的职责。

1947年10月6日于东京

我证明,供述者在我面前宣誓并盖章,同日于东京。

见证人 上代琢禅

我发誓,我本良心实事求是,并无虚饰。

小川关治郎

(罗峰 译 张生 杨夏鸣 校)

61. 书证第 3401 号

榊原主计宣誓证词

签署了宣誓书如另纸之后,按照我国通行的格式,我谨作出如下证明。

1. 我曾任陆军大佐,现在是第一复员局人事部负责人。

2. 当上海派遣军于 1937 年 8 月(昭和 12 年)组建的时候我被任命为军事参谋,并负责该部队的后勤工作。8 月 23 日在吴淞登陆后,我立刻开始处理弹药供应事宜,但当我军到达南京之时,我负责有关的运输的工作,第二年 1 月 23 日接到命令后回到了日本。

3. 由于我总是直接听命于松井将军,并自上海派遣军组建以来一直在总部向他提供咨询,所以我对松井将军的作战计划非常熟悉。

4. 上海派遣军是在没有任何准备和计划的情况下突然组建的,当时就决定不要等到整个部队组建完成,军事动员已完成的部队就立刻被派往前线,以便及时援救上海的海军陆战队,当时该部队正在上海地区艰难作战。这一支分遣队由第 3 师团 4 个步兵大队和 2 个炮兵大队共 5 000 人,以及第 11 师团的 4 个步兵大队和 2 个炮兵大队的 5 000 多人组成。还有 8 门大炮,但由于弹药准备不足,每门大炮只有 400 发炮弹,总共 3 200 发。

5. 战斗力像我前面所说的是如此的缺乏,我们面临着巨大困难进行作战。虽然之后我们的力量得到加强,但松井将军的登陆计划耽搁了两个星期。而且,由于传染病——诸如霍乱、痢疾等的蔓延,我们把整个宝山镇都变成了一所隔离医院用来接受病人。

虽然上述的疾病在 10 月得以控制,但我们的战斗力已大大地被削弱。此外,由于弹药和物质的匮乏,战斗打得非常艰苦。我认为上述的困难绝对是由于在此地区作战的准备不足而造成的,也是根据不扩大事态的原则而逐渐增兵的结果。

6. 根据战地服务条例,上海派遣军有时也在被占领地区征用军

需品。

这种征用总是通过支付现金进行的,由该大队部的财会官员负责拟订该计划,大队以下的单位或个人未经许可严格禁止(进行征用)。当征用完成时,当然有一个支付补偿的问题。

7. 在上海和南京之间处理这种问题的时候,我们面临极为尴尬的问题——当时没有可以与之谈判的居民或行政当局。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可避免地不经所有者的同意而处置该物品。我们总是张贴一张单子,描述被征用物品的种类和数量,因而货物主人在得到此消息后可以来总部得到他们的赔偿。

事实上,我自己在无锡亲眼目睹征用一所仓库大米的理赔程序。

8. 无论何时只要占领区财物的主人或行政当局还存在,我们都会和他们谈判,征得他们的同意,并支付相应的钱,使得征用货物的事情得以顺利进行。

很多时候我都是这样做的。我记得在白茆江登陆时。当地一小村庄的村长还在,我和他进行了谈判并获得了粮食和草料。当我们付了相应的报酬,并采取措施保护仍留在该村的老百姓时,村长对我军的所作所为表示感谢并盛情款待我们。

在江苏也有同样的事情发生。

9. 此外,在许多地方我还通过张贴亲手签名的布告来指导如何保护当地老百姓,在另一些地方布告的内容是禁止抢劫。我根据松井将军的指令采取上述的措施。当时南京没有人留下负责(城市)的行政工作,因而无法谈判。结果,我军应该是根据上述的简便方法来解决对粮食的征用的。至于从城市的难民区征用粮食的事,我从未听说过。

10. 日中两军都把纵火作为前线战术的一种方法。中国军队在撤退之前的纵火给很多地方造成了极大的损失,并阻挠了我军的前进和占领后的安抚和救济工作。

在我们占领南京前,有很多火情在各地发生,但在南京陷落之后,就没有火灾了。据我所知,南京城只有少部分地方遭遇火情,绝大部分都免受火灾。很显然,假如我们看看夫子庙周围或其他地方,我们会注意到它们和战前没有两样。和东京的大部分地区相比,南京遭受火灾的地

方要少得多了。

11. 我看到外交部大楼和军政部及海军部的建筑变成了救治中国伤病员的医院。

然而,医疗设施缺乏,对病人治疗工作也非常困难。那里不可能有大屠杀,相反,我们向他们提供了大米和药品。

尽管我们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他们大多数还是由于病情严重而死去了,

12. 在攻占南京前,我们几乎没有抓到战俘。有人告诉我,我军在南京附近共俘获了大约4 000个战俘,其中一半被遣送到上海,其余的拘留在南京。

虽然我看见有几个战俘被作为普通劳工雇佣,但却从未受到虐待,而当他们的服役期满之后会把他们遣送回家。

有一个叫刘子先(音)的人是我遣送的一个例子。如何对待战俘的情况可以通过他而了解。战俘经常逃亡和偷盗,我想偷窃根据法律受到严惩,但逃跑都未受到任何惩罚。

13. 在官方的书面命令中,“提名”的含义是被提名的人被安置在一个固定的位置上,其有职有权。而“非正式任命”的含义是这个被任命的人没有固定的职位,也没有实权,他是一个无职无权的官员。在松井将军的履历上,“任命到参谋本部”(12月21日昭和3年)意思是任命此人为参谋本部的一名官员,但此人没有固定的官职。(然后他又到欧洲去了。)

1947年2月20日于东京

我证明,供述者在我面前宣誓并盖章,同日于东京。

见证人 上代琢禅

我发誓,我本良心实事求是,并无虚饰。

榊原主计

(罗峰 译 张生 杨夏鸣 校)

62. 书证第 3403 号

下中弥三郎宣誓证词

签署了宣誓书如另纸之后,按照我国通行的格式,我谨作出如下证明。

1. 我住在东京都中野区鹭宫一丁目三番地。

2. 我在昭和 8 年(1933 年)和松井大将一起成立了“大亚细亚协会”,此后直到昭和 16 年(1941 年)协会解散,担任该协会的干事和理事。

3. 在大亚细亚协会成立的恳谈会上,松井大将发表了讲话,其中谈到昭和 6 年(1931 年)作为陆军的全权委员出席在日内瓦举行的裁军会议的情形,会上中国方面的顾维钧氏频频攻击日本,日方也不甘示弱。中日两国原为兄弟之国,现在居然在白人环视的环境下争吵不休,实在令人不忍卒睹。回国后不久,将军认为这样是绝对不行的。为了使中日关系变得融洽,他愿意贡献出自己的绵薄之力。当时我自己正在组织一个名为东洋研究会的团体,听了松井将军的意见后颇有同感,遂决定一起创办大亚细亚协会。

4. 松井将军试图在不辞去现职的情况下建立上述协会,而陆军方面则对此颇有微词,甚者乃建议将军放弃成立协会的念头。而松井大将在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关注和研究日中关系,对日中融合抱有坚定的信念,故而并未终止创办协会事宜。而荒木和林两位陆军大臣也终于同意,在大亚细亚主义运动不脱离纯粹的思想启蒙运动的范畴——亦即非政治运动——的前提下,可以成立大亚细亚协会。这样,该协会的成立就得到了官方的正式承认。据此,协会根据上述前提条件,绝不从事任何可能产生政治影响的活动,始终只是会员之间进行有关日中问题的思想启蒙的研究团体。

5. 大亚细亚协会的活动包括研究会的召开和机关报(《大亚细亚主义》)的发行,其中研究会活动的具体内容就是:召开谈话会(即所谓“听事会”),倾听从世界各地出差回来的知名人士对外国情形的介绍,以此

为中心进行恳谈。此外并未设立特别的研究机构进行有组织的、积极的研究活动。在没有合适人选的时候,研究会甚至停开了3到4个月之久。原拟设立兴亚学院,后因经费问题搁浅。

6. 大亚细亚协会的成立经费全由个人负担,并未接受政府及其他公共机构的资助。具体地说,是来自松井大将从日内瓦之行的经费中节约出来的一万日元以及会员中的有志之士的馈赠。

7. 大亚细亚协会的宗旨,要言之就是以孙文的大亚洲主义作为理论指导:

- (1) 血浓于水,日中为兄弟之国;
- (2) 日中携手,可以拯救亚洲;
- (3) 亚洲为世界文明之母;
- (4) 亚洲道义文化可以拯救世界;
- (5) 然而现在亚洲独立国家甚少,原因就在于日中反目,相互对抗。

8. 杂志每月发行两千份,受众限于会员,一般人无从受其启蒙。

协会的常用经费包括给雇员的工资以及出版费用,每年为两万到两万五千日元,来自会费、出售杂志所得经费以及会员的馈赠。

9. 松井大将任台湾司令官的时候,协会几乎没有开展什么活动,此后亦因经费短缺及军方嫌恶而没能如预期的那样积极活动。

10. 内阁参议制度以解决中国事变为目的,而根据大将的观感,其不过是听听报告而已,不用建言献策,即便建言献策也不被采用,令人“难以忍受”,据我所知,大将不久就辞职不干了。

11. 昭和10年(1935年),松井将军访问华北并与中国同道探讨了有关大亚洲主义的问题。以此为契机,同年12月,华北政界、实业界和文艺界先觉在天津成立了中国大亚细亚协会。对此,宋哲元、韩复榘等人也表示支持。不过,中国大亚细亚协会并非日本大亚细亚协会的支部,而是一个(独立)团体,致力于中日提携,实现“亚洲人的亚洲”的理想。

12. 昭和12年(1937年),在大亚细亚协会同道为松井大将就任上海派遣军司令官而举行的送别会上,将军发表讲话称:“我与其说是去指挥战争,毋宁说是去调解兄弟间的纠纷。我年轻时就了解中国,在那里

有很多朋友。”当时作为陆军中枢的参谋本部也主张不扩大主义,仅给松井司令官派了两个师团的兵力。我听说,为了以短期决战的方式尽快结束战争,松井大将曾要求参谋本部给予五个师团的兵力,但最终未获批准。正因为如此,当时的外国杂志声称“松井大将带领两个师团的老兵前往上海”,似乎看到了日本对华政策软化的迹象。

13. 昭和16年(1941年),日本政府将研究和调查东洋宗教、道德、学问、艺术的众多普通文化团体及政治经济团体合而为一,名为大日本兴亚联盟,试图统一兴亚运动。大亚细亚协会也被合并到该同盟,协会的机关刊物停刊,协会的各种记录全部让渡于兴亚同盟,松井大将也被推荐为同盟的工作人员。

兴亚同盟汇集了众多会员和繁杂的事业,其间难免良莠不齐,难以统一管理。除了不断进行机构的变更,并未开展什么有意义的活动。

14. 松井大将不久就辞职隐退至热海,守着那里的观音堂,吊唁中日战争中死者的亡灵。有时候也应人们的要求发表关于大亚洲主义的演讲。我曾经去听过他的演讲,其内容主要是说,解决中国事变的关键在于日本人的反省。松井大将热爱中国和中国人,他说,为了拯救亚洲,中国和日本必须携起手来。

1947年1月27日

我证明,供述者在我面前宣誓并盖章,同日于东京。

见证人 上代琢禅

我发誓,我本良心实事求是,并无虚饰。

下中弥三郎

(翟意安 译)

63. 书证第 3409 号

松井石根：我辈之大亚细亚主义（节选）

二

如此，无视国际政治上必然之进步，徒然立足于观念上之世界主义及各自之利己主义的国际联盟，本质上不能无缺陷，此不待言。目下所谓国际政治及国际经济者，恐仅为欧罗巴联合、亚细亚联合乃至亚美利加联合、苏维埃联合或盎格鲁萨克逊联合等泛大陆的或泛民族的各集团之对立及合作基础上，受各集团指挥者而已。如此看来，我辈大亚细亚主联合之结成，非徒于亚细亚有其必要，信亦为确保世界之真正和平的最佳及绝对正确之正道。

我辈相商创立大亚细亚协会，推动亚细亚各国文化、经济等之调查研究，推动皇国与亚细亚各民族的真正的融洽关系，向各国介绍皇国之文化，终至于感化亚洲各民族，俾其致力于大亚细亚联合，其缘由不外乎我辈皆坚信此大道乃贡献于人道文化进步之趋势而确保世界和平之最佳及绝对正确之正道。此所以我辈三年前组织大亚细亚协会，传檄海内外有志之士，以大亚细亚之精神结成亚细亚，进而贡献于世界和平者。

而以今日亚细亚情势言之，为完全遂行亚细亚之大同团结，当务之急实为解决作为亚细亚中心之日本及支那间之问题。然今日日支两国间，国民反目，抗争不断，诚不幸之至。当下亚细亚运动之要务，实在于深究两国对立之根源，改善两国局面。

.....

四

其次，过去数十年间我国对支那及其他亚细亚国家所采取之政策须

深刻反省者亦复不鲜，此亦关系重大者。要言之，我辈先为前述欧美追随者阵营中脱出者，次则我国以往为欧美之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所诱惑，于支那等亚细亚诸国采取与欧美相同之侵略或榨取权谋，此不可不反省者也。此或为鉴于日本过去国情等情形、迫不得已而采取之措施，而今日之日本已是公认的世界大国。拥有率领亚洲各国致力于世界之真正和平的实力和使命。我辈当幡然觉悟，反省以往之错误政策，复苏日本主义及日本精神，将日本精神之荣光发扬光大，与支那及亚细亚同胞携手同进。

如此，我日本国民在精神和思想上保持其举世独特之荣光诚为紧要，而反观自身，反省我等国民性上之缺陷，亦至关重要。换言之，当此我辈开启救济亚细亚大使命之际，于纠正我等国民性之缺陷、发扬国民美德之时，更需反省。所谓我国国民性者，是清高还是神经质，甚或说是狷介狭量，比诸西洋各民族，乃至邻邦支那之国民性，应当反思者诚不在少数。也就是说，在自觉纠正岛国的“独善其身”的性格缺陷同时，尚应大力发扬堪称先祖之荣光的牺牲精神，转而采取从容不迫、宽容的大国民之态度，不偏于理性，大力发扬我日本国民特有的以精神立世的独特的国民性。

（翟意安 译）

64. 书证第 3409 号

冈田尚宣誓证词

签署了宣誓书如另纸之后,按照我国通行的格式,我谨作出如下证明。

1. 我在东亚同文书院学习汉语和中国事务。在该校毕业后,任上海政治中学的教师。从业期间我和很多著名的中国人士相识并成为知己。

2. 由于我已故的父亲是松井将军的好朋友,我自童年就和松井将军熟识。

1937 年 8 月他作为上海远征军的司令离开东京时,曾约我到他在大森(Omori)的家见面并告诉我他想带我到上海派遣军担任嘱托,即作为其总部的非正式官员来协助他工作。我同意了,关于我的职责,当时,总司令是这样说的:

我曾是为已故日军高级领导人川上操(Kawakami Soroko)以及中华民国国父孙逸仙先生的忠实追随者。为了亚洲的解放和建设,我在过去的几十年间为了中日之间的友谊和合作付出了努力。尽管我和我的朋友为此作出极大的努力,此次不祥的事件还是发生在两国之间。对于猝然授命派遣军的指挥官,我心中充满极为复杂而奇怪的感情。

至于为何对我这样的已退出现役的老人委以如此重要的职务,我认为不是要我立下显赫的战功,而是希望我凭着对中国的了解和热爱以非暴力方式,以最小的牺牲来彻底解决这一事件。

当然这要中国当局持负责任的态度,他们违反日本的权益,威胁日本在上海的居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对日本傲慢无理,并抱有极大的敌意。然而,这是长时期积累下来的宿怨带来的必然结果,中日双方都要为此负责任。我真诚地祈望通过两国的相互了解,以尽可能小的战斗,找出一条和解之路。

因此在上海登陆后,你的首要的任务就是尽可能地和一些中国政要保持联系。你要告诉他们松井将军从来不愿和中国交战,并将在战争中

确保两国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而且,将军还将竭尽全力尽快解决此次不愉快事件并期望中方能给予合作和帮助。

将军继续说:假如可能,我们将以巧妙的军事策略以少胜多。但那只是军事上的胜利,由于被动的战争必然带来人员的牺牲和士兵们的敌视心理,从长远来看战争的后果将是灾难性的。因此更迫切需要装备精良之师,以便尽快结束战争,避免悲剧性地延长战争。这也是最有效的办法来使我们的不扩大的原则真正发挥作用从而立刻恢复和平。

我请求政府能给我配备至少五个师团的兵力,但陆相决定只要有三个师团就足够了。对于陆军部由于缺乏对中国近况的了解而对我们的“不扩大政策”感到的不安,我感觉十分抱歉。

3. 8月底我在上海登陆,当时此事件正处在初始阶段。(松井将军那时还在船上。)为了转达松井将军的意愿,我立刻开始在租界里寻找我的中国老朋友以便把松井将军的意图转达给他们。〔通过特务机关的负责人原田熊吉(Harada)先生,我和松井保持联系。〕我还获得机会和唐绍仪(Tang Shao-I)先生——我的一位老朋友,当时中国的一位资深政治家谈了话。另外一位非常了解日本局势的李择一(Li Tse-I)先生也与我交流了看法。我们谈的内容实际是如何消除中日之间的紧张关系。

我也设法和我父亲的一位老朋友——杜月笙取得了联系,并请求他帮助我来维持作为国际大都市上海的安宁和秩序。但在他赴香港之前我们没有这样交谈的机会。

4. 12月6日我陪松井司令到了他在苏州的总部。一到苏州,松井将军就指令劝告中方军队立刻投降,并将印有该内容的传单于12月9日通过飞机在南京城内散发。他的用意是在不流血牺牲、尽可能不对城市造成伤亡的基础上占领南京。同时,他采取措施防止不同的部队对南京的贸然进攻。否则这些部队都会争先恐后进城,从而对城市造成不必要的破坏和城市居民的苦难。因此,假如我没记错的话,松井将军12月9日下令所有在他管辖下的部队立刻停止总攻,原地待命。他又命令全军确保对中山陵和其附近文化古迹及外国人权益的保护,同时要求部队严格遵守军事纪律。

12月8日深夜2点,我被召进了参谋室并依照指令把如下内容翻译

成中文：

请你们 12 月 10 日中午在中山门外南京一句容(Chuyang^①)路答复我们关于劝降的书面建议。假如你军能派出负责任的代表到指定地点，我们准备和他就南京城的接管进行谈判。假如我们在指定时间未收到你们的答复，那么我们不得不开始进攻南京。

上述内容被写在传单并空投到南京城内，同时投下的还有 12 月 9 日的劝降书。

12 月 9 日早晨我乘车和塚田(Tsukada)以及参谋公平(Kimihira)和中山(Nakayama)从苏州出发，一到南京郊外，我们就在某个部队营地休息。第二天上午 11 点，我们几个人(塚田、公平、中山和我)前往中山门并在那里等候中方谈判人员的到来。可是直到中午 1 点，他们都没有出现。我们只能离开那里，之后不久，假如我没记错的话，总攻的命令就下达了。

5. 12 月 13 日南京陷落后的一个清晨，我和陆军中佐村上(Murakami)一起进入南京城。当时激烈的战争刚刚结束，南京城里一片寂静。最引起我注意的是无数件散落在街头的中国士兵丢弃的军服和盔甲。我注意到人们在南京城的一些地方避难，并带了 50 多人到当时作为司令部的大都市旅馆，让他们帮助司令部行政局的士兵打扫清洁旅馆内部的环境。这些为我们干活的难民和其他城市居民都从司令部得到了报酬，士兵们的剩饭也足够他们充饥，他们也愿意给我们干活。

我记得当时有一个姓孙的老人，会说日语，大概 60 多岁。他来到司令部和日本领事馆，并在我们的同意下立刻开始组织自治委员会。

6. 从 12 月 17 日起，总司令官就住在了中央饭店，我也住在他附近的房间里。17 日晚上开了庆功会，总司令官和其他官员也出席了。第二天早晨，我在总司令官房间里看到他，当时他神情极为悲伤。在常规的问候后，我问他是否有烦心的事。作为一个刚在辉煌的战役里占领敌军首都的将军，他一点都没有显示出快乐。他只是平静地说：“在此之前我多次访问过南京城，都是为了实现中日之间的和平关系，为了这一目的，

① 此处英文单词拼法有误。

我已期望并工作了30年。但现在我意识到我们无意中给这个城市带来了极大的痛苦。每当想到无数逃离南京的中国友人和我们两国的未来，我就不能不感到无限压抑。我心里很孤独，没有心情去庆祝胜利。”

当他用这种沉重而悲伤的语气和我说话的时候，我禁不住地同情起他来。我知道很多日本海陆军的高级将领都对欧洲和美国事物感兴趣，而对中国问题的研究倾向于不屑一顾。而松井将军在年轻时代就对中国问题感兴趣，他也是因为对中国政局问题的杰出研究而被擢升为将军军衔，这确实是很不简单的。我也知道在我们军队里没有哪个人有他的中国朋友多。

我认为我们可以在他在1938年新年在前线写的一首中文诗里获悉他的这种中国情结。当时在我拜访他驻地的时候他曾把此诗出示给我看：

北马南船几十秋，兴亚宿念顾多差。更年军旅人还历，壮志无成死不休。

松井将军是这样解释这首诗的：

我在中国呆了几十年，为了亚洲的和平和发展尽心尽力。每当回顾我的所作所为，我就感到能力有限。现在我在战场上已到了六十一岁了，但我青年时就怀有的梦想不会磨灭。即使我的躯体化为灰烬，我也会为此理想而坚持到底。

7. 12月19日，为了视察战地，松井大将在参谋长的陪同下参观了清凉山^①和天文台。他一边聆听参谋长的解释，一边从山顶俯瞰南京城。对于清凉山的美景将军大为赞叹，并告诉他的军官说，对于打断蒋将军统一中国的努力他非常抱歉。他又说假如蒋将军能再耐心等几年，而避免两国之间的敌意的话，日本本可能会意识到用武力解决在两国间的问题的不利的一面。那么，就不会出现两个兄弟国在同一屋檐下打仗的悲剧了。当时，他的参谋们都奇怪地望着他们的将军以这种方式谈话，我也在一边肃立聆听他的感悟。

在回去的路上，使他的参谋们感到惊奇的是，松井将军说他想到附

① 原文如此，应为紫金山。

近的难民营去看看。他说去就去。在那里,他向难民们询问战时遭遇的危险和其他有关的事情,并安慰他们说,尽管他再三嘱咐官兵不要对难民们造成任何伤害,但由于语言不同,麻烦在所难免,但和平和安宁的日子肯定会到来,他们应该从事自己的职业,不用担心。

8. 将军对战后可能出现的军事纪律涣散十分担心,因此他警告并命令一定要通过严格的军纪管理和惩罚制度来确保军纪严明。当时我就在他身边并听到他下此命令。之后不久,我亲眼看到一些官兵作为罪犯被严惩并从上海遣返回国。

2月中旬,由于军队重组松井将军被调离上海即将回国。他对我慨叹说:“在我的任务尚未完成之际就派我回国,实在令人遗憾。对于我来说,战后的工作远比担任军事长官要重要的多。这份工作意义在于在南京陷落后尽快结束双方的军事敌对状态,并竭尽全力和中国政府达成和解,而不是将战线溯江而上超出南京向北推进。但既然天皇对我下此调令,作为忠实的臣民,我也只能遵命。”

9. 12月21日,在南京又呆了几天之后,松井将军乘日军驱逐舰离开南京,并于12月23日在沿途参观了乌龙山和镇江的古战场之后回到上海的方面军总部。由于与将军同乘一船,我得以有机会和将军随意漫谈。下面就是我们当时谈话的主要内容:

我们根本就不该允许日中之间的战争进一步扩散。自满州事件爆发以来,中国的抗日情绪高涨,不光在军界,而且学生也卷入了其中。结果,不仅日军的利益受到了损坏,而且中国民众的生命财产也受到了威胁。因此,我国被迫诉诸武力来保护这些权益不受侵犯。最终武力导致了这场灾难——中国首都南京城的陷落。然而,两国间的问题不能用武力来解决。即使解决,也只是暂时的而不是永久性的。

假如我们不能通过和平的方式来解决两国之间的误解,通过外交方式,那么我们两国将陷入更深、更大的灾难之中。因此,我竭诚努力来维护两国间的和平。而我作为司令官的使命也主要就是维护和平而不是以我们现在进行的军事方式来解决冲突。假如军事行动是唯一的解决方法,那么就没有理由从众多才能杰出的将军中挑选像我这样的老人来此解决问题。

自两国交战以来,双方军事领导人之间的谈判将日益变得艰难。因此,最理想的方式是两国通过各自经济界的代表(或文化界的代表,但通过前者更好)来进行谈判,并让他们不通过军事途径而是建立在理性思考基础上找到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并劝导各自政府接受建立和平秩序的建议,从而最终消解两国之间的敌对状态,而各国的荣誉也没有丝毫损失。

我非常赞同将军上述所言。经过彼此的讨论后,我们认为担当这一使命的最佳中国人选是宋子文(Sung Tsu-wen)。一回到上海,我就应将军的命令在法租界拜访李择一先生,向他转达了将军的意图并请求他的帮助。一月底,李先生和松井将军会面,同意把将军的意图转达给宋先生并让他采取行动。然后我伪装成中国人和李先生一起乘英国汽艇于1月4日离开上海,1月10日秘密抵达香港。我在九龙呆了一段时间,在那里等候李先生和宋先生的谈判结果。1月15日,我到香港酒店拜访了李先生并得到如下的报告。

通过和宋先生的反复谈判,我确信他和我的想法一致。他认为眼下的不幸局势不止是对中国或日本哪一方的灾难,也是对全人类的灾难。因此,防止情况进一步的恶化的使命是人类共同的职责。假如松井将军真诚地能代表日方坚持和平的观点,那么宋先生也代表中方坚持这一立场。

我深深感谢李先生的这一报告。恳请他进一步进行具体的谈判后,我回到了旅馆。然而,第二天(2月16日),日本领事馆官员发布近卫(Konoye)声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第二天,上海的臼田(Usuda)大佐发来电报说“松井将军命令你立刻回上海。”这样一切都结束了。我所有的努力皆在还未收到宋先生的最后决定之前就化为灰烬。

10. 2月23日松井将军离开上海回到日本。就在他踏上返程之前,他邀请我和李先生在他的驻地共进晚餐。当时他这样说:

我非常遗憾没有机会在上海呆了,也没有机会实现和平计划了。但回国之后,虽然被解职,作为脱去戎装的自由人,松井我也会继续为两国间的永久和平而努力。

对于荣誉和金钱我没有野心,更没有很多的政治抱负。我唯一渴望

的就是能成为驻中国大使,把我的余生奉献给两国间的和平使命的实现。但是,我怀疑我国政府,特别是军事当局能否希望我在此领域里的活动。

作为军事长官,我认为自己要对在我们进行的这场战争中牺牲的成千上万的人——为了各国的利益而殉职的士兵负有一定的责任。因此,我一回国,就立刻修建了佛教的观音塑像,并为这些逝去的魂灵祈祷和平与安宁。我想用浸泡着死难中国士兵和日本士兵的血的泥土来铸造这一圣像。我希望得到来自大场镇(Tachangchen)的一捧泥土,因为最激烈的战争就是在那里进行的。

应将军之请求,我来到大场镇,在中国士兵和日本士兵遗体下的泥土中取得一捧土并通过航空邮件寄给松井将军。他修建了观音像,里面就用了这捧土。至今这座神像还屹立于热海伊豆山(Izusan, Tami)将军家乡附近的小山上,其精美造型人物还清晰可见。而且,他还为这座神像建了一座神庙,并把此庙敬献给在战争中死难的中国和日本士兵。每天清晨,不论是旭日当空还是阴云密布,他都会上山悼念逝者并为死难的人祈求灵魂的安宁和亚洲的永恒和平。

11. 将军是个很有正义感的人。我在中国福州时,当时的福建省有人组建了和蒋介石将军对立的“人民革命政府”。当时,松井将军是台湾军的总司令。当他得知日本军队中有人企图通过支持福建省“人民革命政府”来制约国民政府,蒋将军本人对此非常担心的时候,他立刻宣布日军决不能支持妨碍中国统一的政府。之后,通过当时在台湾的李择一,将军的这一决定得以转达给蒋介石。我事后听说蒋将军对此非常高兴。

同时,台湾的参谋土桥(Tsuchihashi)被派往福建的“人民革命政府”,他还转达了松井将军的忠告——内战对热爱和平的人们来说,是最具有杀伤力的。革命军应该立刻停止和国民军的对立。听从将军的忠言,革命军和平地撤到广东。国民党军在没有流血冲突的情况下顺利接管了福建省。当时我就在福州,也参与了此事件,所以对整个情况非常了解。

12. 下面的记叙就是1938年1月松井将军在南京陷落后回到上海时发生的几件事情,从中可看出他的仁慈和善良。

(甲)出于仁慈之心和对南市难民营贫民的救济,最高司令官松井在1月14日向一个叫雅坎诺(Jaquinet)的法国传教士捐款一万元。雅坎诺神甫曾本着人道主义精神在上海南市北部建立难民营,并为之付出极大的心血。他本人就住在那里的教堂里,并一直掌管救济工作,其善行受到各地人民的交口称赞。

(乙)一位叫二阶堂雅亮(Nikaido)(32岁)的大阪集英(Shumei)小学的老师曾作为大阪教育协会的非正式官员来到上海,并带了些学校里孩子们画的漫画、写的信件和糖果等礼物来慰问士兵。当他见到松井将军的时候,松井将军指出日本孩子每一封信中都充斥了这样的文字“可恶的中国人”、“严惩粗野的中国人”等,这些都反映了日本孩子们所受到的教育。将军还严厉警告这位老师不许再让孩子用这种字眼。

从将军的言行,我们可以更近地了解他本人,他是个没有丧失人类正义感的人。

1946年12月10日于东京

我证明,供述者在我面前宣誓并盖章,同日于东京。

见证人 伊藤清

我发誓,我本良心实事求是,并无虚饰。

冈田尚

(罗峰 译 张生 杨夏鸣 校)

65. 书证第 3454 号

武藤章宣誓证词

宣誓证人 武藤章

1. 1922 年我是中尉军阶,从那年起就在教育总监部任职,从事操典教范等的修订工作,以适应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战术上的变化。虽然在 1928 年 1 月我生过一次病,但仍在该部工作至 1929 年。只是病后身体很差,曾在 1929 年请了半年病假。不过同年 12 月,我就奉命入陆军大学^①当一名研究生。所谓陆军大学的研究生计划,其内容就是从业经陆军大学毕业的少佐和中佐中选拔十名军官入校考攻高级战略和战术学一年。我那时的军阶是少佐。分配给我的任务是研究克劳塞维茨和孙子,俾对欧洲的和东方的战术战略思想进行比较。正因如此,关于那时张作霖大帅在奉天遇炸身亡的事件,我是从报纸上得知的。

2. 1930 年 11 月,我被派到参谋本部任职,并奉命至其第二部工作,第二部相当于美国军队的 G-2 处。^② 然而,由于我的健康状况差,我在该部欧洲课担任了多少有点闲散的职务。1931 年 8 月,我被调任第一部,从事有关通讯联络事宜。当时参谋总长试图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经验,修改有关通讯联络事宜的条规,但是这项工作尚未完成,他就命令我对之进行编纂。

在此期间,所谓的满洲事变在这一年 9 月爆发,因而参谋本部紧张了一阵。然而,实际奉令调动的兵力是有一个旅团,系由朝鲜派去增援关东军的,所以我们通讯科并不特别忙,我也就能继续我的编纂有关通讯事宜的条规工作。此项工作一完成,我就奉命重归第二部任职。这时我得知有一个社团名“樱会”(Sakurakai),但我不是该会会员,也与之无任何关系。

① 日文为陆军大学,英译为 Staff College(参谋学院)。

② 即情报处。

3. 1934年3月,我被调往第一步兵联队。在此之前,即1933年8月,我晋升为中佐。由于按规定联队长必须是一位大佐,因此我在该联队是辅佐联队长。

4. 接下来1935年3月,我被调往陆军省军务局军事课,并在那里任职至翌年6月。那时,除了正常职务外,我还在陆军大学兼任教官,教授军制学。在此期间,我特别记得的一个事件是一些青年军官在1936年2月26日发动的一场暴乱。他们杀害了数位重臣,并占领了陆军省、参谋本部、国会、警视厅等处。我作为陆军省的一员,为镇压这次暴乱和处理此事件的善后,日以继夜地辛勤工作。我后来得知我的名字已被列入第二批杀戮名单中。这是因为此前我一直反对青年军官们此类行动的。

5. 1936年6月,我被委派至关东军任参谋,掌管该军参谋部^①情报课。我担任这一职务至1937年3月为止,即约8个月之久。1936年8月我晋升为大佐。曾出席本法庭作证的田中隆吉,那时是我属下的一名资深中佐。

6. 1937年3月,我被调回参谋本部,出任第一部部长管辖的第二课课长,执掌作战、编制、动员等事。然而,当我于3月中旬到任时,1937年的作战计划业已制订。于是我就着手对下一年的计划进行研究。

至于那时的对华作战计划——就此而言,我发现,我对检察官所作询问的回答是被误解了:似乎认为我曾对检察官回答说那时曾有过一个对华进行全面战争的统一计划。我当时所说的是:与中国有关的作战计划是局部派遣武装部队前往中国,以保护华北或华中的日本侨民。因此,当1937年在华北突发事变,上述计划也就不能付诸实施。参谋本部所计划的只是加强在华的驻军,以便在北京和天津一带发生变故时保护日本侨民。然而,情势完全与设想的不同,因而有必要再加研究。我奉上司之命担当起这些工作。

7. 1937年10月下旬,我奉参谋总长之命至上海视察上海派遣军的军事情势。当我在上海进行视察期间,大约在11月4日,由柳州中将指挥的第十军,按参谋本部的计划,在杭州湾登陆;同时华中方面军司令部

① 日文本为参谋部,英译本作 Operation Department(作战部)。

成立,上海派遣军最高司令官松井大将,既出任华中方面军最高司令官,又同时指挥上海派遣军和第十军。我奉命毋庸返回东京而出任松井大将的副参谋长。

松井大将的作战任务是击退上海周边的中国军队,以保护日本侨民的生命财产,而作战区域则是福山—苏州—嘉兴一线以东的三角地带。他的任务是约在11月23日或24日完成的。

8. 那时,松井大将还未被畀以占领南京的任务。由大本营下达的占领南京的命令是12月1日收到的。于是松井大将命令上海派遣军和第十军进击南京。松井大将的司令部原在上海市近郊,至此约在12月5日进驻苏州。大约在12月7日新任最高司令官到任,松井大将乃卸去上海派遣军最高司令官的职务,而专任华中方面军最高司令官。

松井大将于12月8日左右得到报告说我先头部队已越过磨盘山一线并逼近南京,他随即下达如下的命令:

(1) 第一线部队应在南京城外3—4公里处停止前进。

(2) 由飞机散发传单,劝使南京城内的守军投降。

(3) 如中国军队投降,两支部队(上海派遣军和第十军)应从各师团中分别挑选两三个大队进入南京城,各自负责划分给他们的地区之治安,而大部队应留在南京城外。

(4) 如中国军队至12月10日正午还不投降,则应立即对南京城进行攻击;但即便如此,入城的部队仍需按前几条规定行事,严守军风纪,确保迅速恢复公共治安。

这几项命令是由塚田参谋长在两三名参谋随同下亲自分送到两支部队司令部的。由于中国军队不投降,对南京的攻击遂于10日正午开始,日本军于13日越过城墙(castle-wall)进入南京。

松井大将在上海时就已患病,进驻苏州后健康状况仍不佳,因此我经商定留在苏州照顾将军。然而,他作为陆军的最高司令官必须与海军最高司令官一起参加将于12月17日举行的入城式。于是在苏州郊区的稻田地上急忙建立起一飞机场,12月15日他由此乘一架小飞机飞往句容,并随即乘汽车至汤山镇。在12月17日入城式举行之后,松井大将第一次从塚田参谋长那里听到绝大部分部队都已违抗司令官的命令

进了城；而在这些部队入城后，又发生了掳掠和强奸事件。关于这一点，检察官对我的质询书中有松井大将因这些事件受到其参谋班子的责难之词，但这完全是一种误译。我的原意是松井大将本人对发生这些事件非常愤怒，我是以如下日文敬语来表达的：“それをこて松井大將が‘怒られた’”（意为“松井大将听到此事后感到愤怒。”）

松井大将命令两军司令官，除留下警备南京所必需的兵力外，迅速将所有部队撤至城外，并严守军风纪。我至今认为两位司令官是执行了这一命令的。然而，将部队撤至南京城外一事稍稍推迟了一点时间，因为中国军队还在焚烧房舍，将之称为“清野作战”（Cleaning Operations）；此外，城外饮用水很少。

我的职务，正如前面说过的，是华中方面军副参谋长。副参谋长的职责（按高级司令部服务条令规定）是辅佐参谋长，并且主要是在人员补充、粮秣、武器和弹药补给等方面居中协调与其他机关的工作，以便使这些事情得以顺利解决。副参谋长是在局部上辅佐参谋长，绝无权力作出任何决定。再者，这些职责都与维持军风纪无关。我在南京期间，曾奉参谋长之命，调查南京城外有多少可用作军队营地的处所，并从事把士兵撤出该城的工作。

现在来谈谈松井大将，他在南京逗留了四五天之后——我在回答检察官的质询时曾说他在南京逗留了一周，那是我记错了——就于12月21日左右在参谋人员随同下回到上海的司令部。我也回到上海。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接受了攻陷杭州的新任务。在南京入城式举行后，第十军司令官柳川中将就率军掉头向杭州挺进，而留在上海附近的第一零一师团也向杭州进军。因此松井大将火速赶向上海指挥这些军队。杭州的中国守军不战而撤，日本军兵不血刃地约于12月24日占领杭州。

9. 大约在1938年2月上旬，大本营将日本军在华中的兵力缩减至约6个师团，裁撤了华中方面军、上海派遣军和第十军，只留下华中派遣军。接着松井大将、朝香宫、柳川中将与一大批参谋军官回国，由畑大将担任新的最高司令官。我留下来任畑大将的副参谋长。

10. 1938年7月初，我被调任华北方面军副参谋长，因而离开华中派遣军，前往北平。我任此职至1939年10月。所控罪状第46条提及

1938年10月21日对广东的攻略,并以此控我。然而,这一攻略是由与华北方面军无任何关系的部队进行的,因而我与之无关。1939年夏发生的“哈勒欣河事件”^①,也就是所控罪状第26条提到的那个事件,亦与我毫无瓜葛,因为此事件发生时,我仍在北平隶属华北方面军,也因为此事件是由与华北方面军无关的部队引起的。

11. 1939年10月我出任陆军省军务局局长,同时或不久又被委派为军事参议院干事长以及约十个干事或参议之类的职务。这些职位都是因当上军务局局长一职而自然要兼的,所以并不含有什么特别意义。

我任军务局局长的时间是从1939年10月至1942年4月,但在此期间军务局的职责并无可察觉到的变化。然而在1940年7月第二次近卫内阁成立后,内阁情报局的权限加强了,诸如对涉及陆军的情事之监察,在此之前一直是由陆军省情报部行使,而现在则全转归内阁情报局管了。

12. 即便在我就任军务局局长之时,我也是对政治或外交问题一无所知的。然而,由于我在华中和华北服务了两年,我对有关中国的事情是有些看法的。我的粗浅看法是:中国5亿民众中正勃兴着一股气势磅礴的民族意识,因而当前的中国事变是以民族战争的形式演进的;其核心是蒋介石先生;中国问题将不可能以所谓中国通所持的对华老观点来加以解决;中国事变拖得越长,就越难解决;我们应立即拟出一个解决方案,与蒋政权交涉以谋打破有害的僵局,并协调日、美、英之间的关系。

我与国策研究会并无特别的关系。之时根据我的前任所告诉我的一切,我将该研究会视为持中庸之道的民间有识之士的一个团体,因为它令我们得知民间人士的意见。尽管该研究会事务长矢次先生作证说我曾到该会去演讲过两三次,但这是他记错了。我从未到该会去作过任何讲演。的确,我从中国回来后曾多次受邀到该团体讲演,但我都拒绝了。只有一次——我记得是在1940年2月或3月,该团体领导人设午宴请我,我去了。饭后我被坚请讲话,因而就说了说个人对中国问题的看法,讲了约十分钟。这是我唯一的一次到该会露面。关于国策研究会,

^① 即“诺门坎事件”。

还有一件事我要说一说。我已记不清是 1941 年秋的哪一天,大藏男爵(Baran Okura)来访,他对我谈了国策研究会经费上有困难,接着就提出是否可由外务省、陆军省和海军省给予一些津贴。我于是按照当时接到这类请求后所要遵循的程序,告诉了副大臣,他同意了这一请求,拨出了 2 万日元的津贴费。这笔钱的用途,我并不知道。而且,我也对该会所拟的关于大东亚共荣圈的研究文件一无所知,自然就从未见到过这些文件。但是,如果真有此类文件,那一定是我 1942 年 4 月离开东京后才拟出的。

联络会议(Liaison Conferance),顾名思义是一种沟通性会议,它旨在促进政府和统帅部之间的相互理解,营造政务与统帅之间的协调谐和。我是以秘书身份参见此会议的。秘书的职责是为联络会议准备和安排由我上司选定的议题,如有必要,还要准备说明书或带领专人前去说明。在联络会议中,如与会大员意见一致,他们就会在决议上签署,但秘书是没有资格签署的。我也参加御前会议,但那也是以秘书资格参加的。御前会议秘书要比联络会议的事情要少,其职责只不过是把有关机关准备好的文件分发到与会大员的席位上。

我也参加过枢密院调查委员会会议,但是以说明人的身份参加的。原本政策问题是要大臣来说明的。然而,如果发生要详加说明的情况而使说明需有具体性和技术性,那么所谓说明人就要代表各省来作此说明。但是,实际上,我从未在该会议作过说明。

如前所述,我以秘书或说明人身份参加过联络会议、御前会议和枢密院的会议,但是从职责上说,必然是毫无特殊含义的。如果一定要问为何如此,那么唯一的理由是我是军务局局长。不管是谁,只要当上军务局局长,那他就得参加这些会议。我从未参与讨论,自然也从未在达成的决议上签署。

13. 国际法庭检方提出的第 2243 号书证,系报道我 1940 年 3 月 20 日在国会决算委员会上所作讲话的一些文章之节录。然而,这节录与我所说的大有出入。首先,标题就与内容十分不一致,因而我要对当时的情况作一陈述。决算委员会由十位委员组成。通常是由经理局局长在会上负责说明即可,但有一位委员指明要大臣到场。有人告知他们,大

臣刚参加过预算委员会,他们就说只要军务局局长能代他到场亦可。因此我出席了该委员会。

当国会议员滨地(Hamaji)先生根据事先准备好的讲稿发表了一通严正的质询讲话,我作了答辩。

检察官指责我的答辩表明不赞成政党,否定自由主义和坚持极权主义。

我所持的看法——见之于议事录的速记录(辩方第2734号文件)——是:政党、官吏和军人都应同心协力,从而克服国内危机。^① 我不但不反对政党,而且衷心希望它们得到稳步的发展。

滨地先生当时所说的是我们应当采用“全体主义”。与之相反,我的答辩是,全体主义的确流行于欧洲,但我们日本应以适合于本国的国体观为基础。我说,尽管孤陋寡闻使我不能准确表达“国体主义”(日本国家宪法或国体的原则)这个词,但它在我国十之八九是有价值的。

至于否定自由主义问题,我的答辩是:鉴于以自私的个人主义为基础之错误的自由主义在我国面临危机之时理当予以摒弃,我们不应把追逐个人私利置于谋求国家利益之上。

此外,尽管滨地先生直率地批评了官僚、军人和政党,我仍回答说,经过深思熟虑后所必须要改善的一切,就一定要进行改善;我还说,由于我们以往就愿意反省关于改善的问题,亦即反省在陆军的态度中哪些是值得进行改善的,因此我们希望他们把不管是什么性质的缺点错误都能说出来。我作了如上的答辩之后,他对我表示感谢,并说他很高兴得以明白陆军方面的这些见解。

14. 我奉陆军大臣之命从事日美谈判中的日常工作。我认为有必要使美日谈判获得成功;理由与下述事实紧密关联:我推断自满洲事变以来就被号召节衣缩食的日本人民,却随着中国事变而养尊处优起来。

日本是渴望迅速结束这场事变,但是十分遗憾,我们发现英美两国对蒋政权的联合支持使我们无法迅速解决。如果事情任其自流,日本就只有面临一场严重危机之一途。然而,如果美日谈判结果圆满,那么又

^① 日文本为“国际危机”。

会是截然不同的局面：不仅日英美三国之间的关系能得到调整，而且还会有更好的结果，即中国事变会得到解决（日本也庶几可以万全）。

谈判胜利结束的可能性时有时无，但不论如何，直到1941年11月总还是抱着一丝希望的。陆军对日美谈判问题的见解是以陆军大臣和参谋总长达成的一致意见为框架的。因此决定权并不完全在陆军大臣手中。这是由于陆军结构的特殊性所致。换言之，陆军表露其对外交政策的观点时，他们是从国防和军事战术的角度着眼的。参谋本部则是依据自己收集到的国际消息和情报来进行研究和制定计划。陆军大臣没有这类国际情报机构，因而主要从国内政治、预算和物力的角度来提出论点。只有当双方的观点趋于一致时，那种见解才能被视为陆军的对外政策。

对于在日美谈判进行期间所发生的问题，参谋总长与陆军大臣常常是意见不一致的。

陆军省与外务省之间的联络，是通过军务局局长和外务省美国局局长来进行的。在那种场合，如果陆军省的意见与外务省和海军省的意见相左，我们总是重新再把陆军的意见研究一番。在与海军省和外务省举行的会议上，我好几次尽可能在我职责范围内作出让步。特别是大约在1941年8月，即日本一再向美国作出让步时，我想我就作出过这类让步。东条大臣从未因这类妥协训斥过我，尽管我因其他事情受过东条大臣的训斥，也常常遭致参谋本部的异议。我不止一次地被召到参谋本部去并被要求作出解释。在美日谈判逆转和多变之际，公众舆论非常激烈，某些人士包括我本人处在有遭致暗杀的危险境地。正是在这个时候，我被配备了一名专门的宪兵警卫，此事田中隆吉已作过证。

15. 1941年10月12日，在近卫公爵的荻洼公寓，总理、陆海军大臣、外务大臣等就日美会谈的前景进了一次讨论。此事我是在第二天才知道的。8月14日内阁会议再次讨论这个问题，东条大臣宣称他不会在日美会谈中提到的军事占领中国问题，作出一丁半点让步，亦即御前会议在9月6日的决定不能更改，这就导致东条与近卫总理和丰田外相的正面冲突。接着传出有内阁总辞职的可能。我也听到及川海相表露了自己的意愿，即希望将一切事情交由总理处置。我立即与参谋本部进行

接触,并作出如下询问:如海相将一切事情交由总理处理的提议可解释为海军省回避了公开敌对问题,亦即改变了9月6日的决定;考虑到海军在对美战争中将起主要作用,陆军方面是否应该变态度?参谋本部的答复是:陆军毋需改变态度,因为军令部^①一如既往无意改变9月6日的决定。

此时,我猜想问题在于政府与统帅部之间的意见分歧,如果真是如此,那末即便近卫内阁总辞职,问题也依然得不到解决。只要这个问题存在,不管内阁多少次更迭,事情也不能解决。近卫总理应亲自把解决这个问题的责任担当起来,而不是辞职。为此,就有必要促使海军大臣表露其真实意图。这样一来,东条陆相也就能得到参谋本部的理解。这些都是我当时的想法。于是我在这个月下午拜访富田内阁书记官长,前后约半小时,把我的上述看法告诉他,希望他妥善处理此事。但是促使海军省表示其反战愿望的尝试终究是徒劳的。这一情况立即就报告了东条陆相。

16. 按照田中新一(Tanaka Shinichi)中将的证词,参谋本部所制订的作战计划未经陆军大臣同意是不能定下来的。这也许是可以如此理解的,但事实并非如此。实际上,作战计划是参谋本部最重要的任务,而陆军大臣是不能干预这计划本身的。只不过有待考虑的是,陆军大臣是否能提供实施计划所必需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如果陆军大臣不能保证执行参谋本部的要求,那么该部就要制订新计划,直到陆军大臣能作出保证为止。作战计划自然总是倾向于制订成一个理想的,因而通常总是计划所需的人力和物力十分巨大,以致陆军大臣无法满足原始计划。

田中新一中将还作证说,陆军大臣、次官和各局局长在参谋本部发往准备参战之前线部队的命令上签署。参谋总长有权向准备参战的前线部队发出命令,但从外交和物资补给的角度考虑,此事就有必要知会陆军省。因此,为了加速这一程序,例行的做法是将电文稿送一份往陆军省,以便获得有关将领的签署。田中中将证明了这一事实。但是不管在电文稿上有没有军务局局长的签名盖章,那都没有决定性意义,这一

^① 日文本作军令部,英译本作 Naval Staff Office(海军参谋部)。

点田中的证词也是表明了。

17. 局长会报会是陆军省内的一种会议,会上各局局长将自己所掌业务的现状向大臣和次官报告,并使同僚彼此知晓,以便理顺业务联系。任何一位局长,为了获得大臣对某些事情的批准,通常是他应先征得次官的赞同,然后再呈送大臣请求批准。但是也有某些例外情况,即大臣在上述会议上对某些事情作过口头的同意决定,那么通常的做法就是会后将文件呈送给他正式批准。

自1941年8月起,我有时在这种会议上报告日美谈判的进展情况。然而在这种会议上,我只报告联络会议或御前会议上作出哪些决定,从未谈过我自己的见解。田中隆吉(Tanaka Ryukichi)作证说:在1941年11月29日前后举行的局长会报会上,我在日本收到11月26日赫尔(Hull)的照会后,曾发表应中止美日谈判的见解。我坚决予以否认。

18. 田中作证说,新闻统制是军务局报道部的任务之一,但此话不正确。报道部隶属于大本营,而军务局仅仅负责编辑供陆军阅览的《周间新闻》(周刊)或指导编辑偶尔出版的小册子。报道部是1937年12月大本营成立后才出现的,它被规定隶属于大本营,因而不受军务局局长管辖。然而在陆军省内,情报局虽依然保留,但人员是缩减了。由于大本营即参谋本部所处的房舍少,因而上述大本营的报道部遂设在陆军省内,与陆军省的情报局在一起。也许就是这种情况误使田中作出上述证言。再者,在第二届近卫内阁组成后不久,原先由陆军省情报局负责的对与陆军有关之报章杂志的检查和管制,就转归内阁情报局管辖了。不时的战况发布和对敌宣传,则是大本营报道部的职责。

正如我在前面说过的,大本营报道部部长本身完全不受军务局局长管辖,但是诸如编辑上述的陆军周刊《周间新闻》和编写就当前话题进行说明、供军队教育用的小册子,则是既受军务局局长也受陆军省情报局局长督导的。

19. 田中隆吉原是兵务局局长,他作证说:我与他的一次午餐会或宴会上同席时,我对他谈了国际问题。但是在这种场合,我从不喜欢谈起严肃的话题并加以讨论。我从未在任何场合与他认真地谈过这类问题,更不要说我谈过:在日德意缔结三国同盟的条件下,日本必须在东亚建

立新秩序,以配合德意两国在欧洲建立新秩序的企图。关于这一点,田中本人在本庭也承认他并未听过我说这些话。然而他作证说,自阿部内阁以来,在军务局存在着一贯赞成三国同盟的观点或方针,并说这是他在任兵务课长和兵务局局长时从侧面了解到的。(但是田中未能提出他得出这一结论的依据。)我全然否定他的说法。我就任军务局局长一职,是在1939年10月中旬,亦即在阿部内阁当政时。之后我才知道,在阿部内阁之前,即在平沼内阁时,陆军曾希望日德意缔结三国同盟,并作过努力促其实现,但由于德国与苏联缔结了互不侵犯条约,三国同盟之事遂终无结果。日本当时顿感自己受到德国的欺骗,并认为像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那样的狂徒是不能信任的。我就是抱着这种想法者之一。

我对德意两国的看法是,此两国的国力并不像宣传的那么强大;(希特勒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只是名上等兵;而墨索里尼当时也只是军曹)他们两人不管采取什么大胆的行动,即便遭致失败,他们也会意满志得,因为这可以使他们成为一代英雄,而这种情况不适用于日本国务活动家;如果他们一遭致失败,就会有损于一个已有三千年历史的国家之荣光;基于这一理由,日本与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结盟是危险的。每当我与鼓吹缔结三国同盟的人士交谈时,我总是把上述意见告诉他们。有一次我对一位德国空军武官格洛纳(Groner)上校谈了这些看法,他微笑着点了点头,因为他不是纳粹党党员。

1939年9月英德之间爆发战争。翌年5月下旬,德国所谓闪电战赢得了敦刻尔克的胜利。当时在日本普遍的看法是德国将获得最后胜利。在赞同缔结三国同盟的人士中又响起一片鼓噪声。但是我预料英德之间的战争将是一场持久战,因此我怀疑德国会最后获胜。先谈德国,可举出的理由如下:德国的空军力量并不像宣传的那样充足;它的海军力量远弱于英国;德国还没有充分的准备横渡海峡。至于英国,则有如下一些因素可资考虑:英国的海军力量比之德国占有压倒优势;据驻英武官辰见少将^①的报告,英国人民的态度颇为镇静;丘吉尔首相(Premier Churchill)坦率地承认英国的“敦刻尔克之败”;美国将积极地向英国提

^① 日本文为少将,并有辰见职衔;英译本为中将,无辰见职衔。

供援助。将这几点总括起来看,我得出的结论是,德国军队的前进步伐将在沿海岸线一带停止下来,而当他们一旦止步不前,英国就可赢得充裕时间重整旗鼓;从长远的观点看,希特勒会像拿破仑(Napoleon)一样无法征服英国。关于这一点,我曾三番五次对当时军事课长岩畔(Iwakuro)大佐说过。想来他是会记得我的话的。

20. 田中隆吉作证说,米内内阁总辞职的原因是:畑陆军大臣提出了缔结三国同盟的建议(田中说此建议为军务局所支持),但未获得一致同意,因而畑大臣辞职。但这种说法是大错特错。在畑陆军大臣任内,并无促请政府缔结三国同盟的任何请求。米内内阁采取了不干预欧洲战争的政策,而畑陆军大臣也是支持的。那么为什么畑大臣提出辞职从而导致米内内阁总辞职呢?那是由于如下一些缘由:当时参谋本部热衷于尽快解决中国事件,以致提议让德国居中斡旋;还促请陆军大臣稳固国内机构,以应对世界大局中可能出现的局势。对于参谋本部的这些要求,米内内阁并未做出任何热烈的反应。当时刚辞去枢密院院长一职的近卫公爵,着眼于改善国内境况,发动了一场新党运动。高高在上的米内内阁则越来越不得人心。恰好在这时,即1940年6月下旬至同年7月初这十来天的时间,我不在陆军省,因为我在欢迎满洲国皇帝的接待会工作。后来我回到陆军省时看到参谋总长给陆军大臣的一份公函,内容是应采取恰当步骤来打开局面。在处理这类事件时采用这样一种方式,乃是一种非常强硬的意图之表露。

畑陆军大臣是渴望要解决上述问题的,但事与愿违,因而他夹在参谋本部和政府之间处在一种为难的境地,终于不得不辞职。就我所知,他的辞职完全不是因为在缔结三国同盟上的意见不一致。

21. 会见武官是军务局的职责之一。因此我常常接待他们的来访。至于书证第523号所指的谈话,我猜想是我在接待德国武官时所讲的话;因为我自己从未召外国武官来陆军省见我。我查看书证中有关此事的发生时间,那时1940年3月下旬。恰好是这时流行着一种见解,即日本应请求德国斡旋以解决中国事变。因此我想谈话肯定提到此事,以试探德国的态度。“日本关心印度支那问题”这些话,我相信,可能是与下述事实有关:当时日本与法国相互达成谅解,禁止将物资运送给蒋政权,

以及由西原(Nishihara)少将领导的监视团进驻法属印度支那。这都不是我个人的见解,只是把当时正在发生的事情作一叙述而已。

22. 东条进入近卫内阁担任陆军大臣时,陆军抱着如下的外交见解:外交的主要目标应是使中国事变得以解决;至于其他外交问题,应着眼于达到上述目标而进行灵活的有建设性的外交。那是与近卫内阁政纲所表明的完全相同的。因此外交政策并非局限于需要缔结三国同盟。那么,为什么三国同盟在7月近卫内阁成立后不久,很快就在9月缔结了呢?这完全是由于松冈外务大臣发挥了积极作用所致。松冈外务大臣非常相信自己的外交能力,对外务省进行了重大的改革,并一意孤行,毫不理会别人的意见。也正是由于他单独的活动,三国同盟才如此迅速缔结的。我是到在枢密院审查会上听到条约局局长就《三国公约》文本作出说明时,才知晓该公约的含义。在本庭上我第一次听到奥特(Ott)大使曾建议德国政府授与我勋章,理由是致力于促进日德两国的亲睦关系。奥特大使谈及勋章之事的电报之发出日期是1942年5月中旬,亦即我已卸去军务局局长一职之后。按照国际惯例,这类事情的进行总是要经过相互提议这道程序的。因此我以为,陆军省之把我作为候选人提交德国,是因为我在当时曾任军务局局长。但是正如我在前面说过的,我从未见到说是要授与我的那枚勋章。

23. 我任军务局局长的时间是从1939年10月起至1942年4月止。在那段时间里有一年零八个月(从1940年7月至1942年4月),我是在东条陆军大臣手下工作。在我回答检方的质询中,我有一段答话被译为似乎陆军大臣曾亲临我的办公室征询我的意见。这是很大的误译。大臣从来不到局长的办公室去。

我可以向作为陆军大臣的东条大将表达自己的意见;但我不能向作为总理大臣的东条大将这样做。他对总理大臣和陆军大臣二者的职责是分的很清楚的;因此,只要涉及总理大臣职责的事情,他是不会采纳陆军省下属的任何意见的。

看来检方曾以为:如果与陆军大臣有意见分歧,我是可以辞职的(对辩方提出不予考虑的动议之应对)。然而,日本军人是被禁止因与上司意见分歧而辞职或擅离职守的。

只有在患病时他们才被准许辞职。田中隆吉在本法庭作证说,据他所知,有个人就因与大臣意见分歧而辞去军务局局长的职务。我不知道他这样说究竟指的是谁。我也知道有一个例子是某个人因不遵守陆军大臣的命令而带着纪律处分调走了。然而这是一个最坏的例子。就军纪而言,这是没有什么可说的。至于调动,当我任军务局局长期间,在东条就任陆军大臣后不久,我就曾再三要求人事局局长把我调走。1941年10月下旬东条内阁成立后,我在一次大臣、次官和人事局局长都参加的会议上表述了我想调走的愿望。但每一次都未获得同意。

24. 田中隆吉说我是一个政治家。但这是他特有的爱讽刺别人的品性。他有一次指责我,说我管事管过了头。我个人的经历清楚地表明,在我出任军务局局长之前,我从未对政治和外交进行过研究,在这些事务上也没有什么经验。但是在担任那个局长职位之后,作为一种职责,我就对所遇到的政治和外交问题进行了研究。我的观点有时为大臣采纳,有时则没有。田中作证说,东条大将几乎没有什么政治和外交意识,在这方面也没有什么经验,因此在这些事务上都是采纳我的意见。这是他违背事实的武断之言,田中曾在中国服务过,并在那里担任特务机关长的职务,但他高估了自己的经验,把自己看成似乎既有政治和外交意识又有这方面的经验。我听到他以这样一种观点来对平民百姓谈论东条大将时是感到十分气愤的。他对东条大将的批评是十分错误的。不用说,东条大将作为一位军人是没有政治经验。但他是一位工作不辞辛劳的人,以致他研究了所有与政治有关的问题并形成了自己的见解。他至少不会是一个会盲从像我所提意见的人。这一点从如下事实就可看出,在我调离两年多以后,作为总理大臣的他克服了多次政治困境。

我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诸事纷繁之时被调走的。

25. 田中隆吉还作证说他竭力反对军人干政,特别反对军务局干政。田中还说军人干政是为日本宪法所禁止的。首先,他关于宪法禁止的话是错的。宪法上没有这样的条款。谈到此事的法律依据,应该是这样的:现役军人没有选举权或参选资格;军事刑法限制现役军人发表政治性言论和结社的自由。明治天皇于明治十五年(1882年)赐与陆海军人员的敕谕曾告诫说:军人应履行其本职而不干预政治。(这是明治天皇

为告诫海陆军而赐给他们的最后一道诏谕,之所以有此诏谕,是由于当时有一股政治潮流促使参加明治维新的军人处于激动不稳的状态。)如上所述,军人不应干预政治。然而,陆军大臣可以而且必须参与政治,这是因为陆军大臣以国务大臣的身份有权参加内阁会议,因而实际上是一位政治家。然而,陆军大臣必须贯彻内阁会议所决定的事情。为此,就需要有一个有关政治事务的机关。军务局就是这样一个处理政治事务的机关。军务局的职能包括贯彻这类政治事务,但不包括参与政治本身。如果该局不可贯彻这类政治事务,那么作为内阁官员的陆军大臣就无作用可言。因此陆军省组织法(书证第 25 号)清楚载明:与国会联络事宜是军务局军务课的职责之一。

在这一点上,我从未被田中兵务局长指责过。倒是我听到他在本法庭上所作有关军人干政的自以为是的言论,感到十分惊奇。恰与他的证词相反,我记得他多次有过与他所任兵务局局长职责无关的政治言行,以致我劝他在这方面有所收敛。他不但是我以前的下属而且也是我的朋友,所以我对他进行了忠告(并无什么故意的动机),但是他充耳不闻。在此之后不久,在公众中出现了流言说是武藤和田中吵了一架,对此我大为震怒。确实在 1941 年我反对他以政府委员身份参加国会会议。这是基于以下的理由:在陆军省,对国会的说明和答辩都是事先准备好并经陆军大臣批准的,为的是不致在对质询的答辩中出现任何前后矛盾和误解。各省都是这样做的。但田中会自顾自地高谈阔论。这肯定能逗弄国会议员并使报界大轰大嗡起来,但是到头来必定是军务局遭到其他省和参谋本部的抗议而不知所措。

26. 1941 年 12 月 8 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当天东条陆军大臣对陆军省全体人员作了一次训话。在训话开始前,田中兵务局长走到我的面前对我说,“这场战争一打,东条就成了英雄了。”我顶了他几句,“如果日本战败,日本国体就会变更。到那时,东条不仅成不了‘英雄’,还会遭人唾为‘国贼’”。然而,我记得我很后悔对他说了如果日本战败国体就会变更的话。就此而言,我还记得在那天或第二天,富永人事局长对我说,“我真不知道田中竟是这样的人,他对我说东条将成为英雄。我指责田中,说他竟轻飘飘地将如此严重的国家大事视为东条的个人问题。”但他

在本法庭作证说此话是我自己说的。

.....

俘虏管理部是根据陆军大臣的命令在 1942 年 3 月下旬建立的,这些条规都是由我所在的军务局所拟定。然而,设立俘虏管理部的命令之颁布是在我奉令到南方巡行而不在局当值之时。我是事后被告知的。

我任军务局局长至 1942 年 4 月为止,在此之前,并无任何收容战俘的计划制订出来。这是由于如下的原因,大本营并无确实报告传来:是否将在南方热带地区所获的战俘在寒冷季节运到北方来?有什么地方和房舍适合于用作战俘营?诸如这些问题正在调查研究。因此这在当时是定下来的。随着海军部队所获的战俘由轮船运送回来,遂紧急建立起上海和善通寺两收容所。

至于战俘的劳役问题,当时完全没有进行过什么研究。我记不起在我任军务局局长期间有什么外国提出过有关战俘待遇的抗议。

30. 关于若干书证提出的问题:

(1) 书证第 2246 号提到在 1941 年 7 月 1 日军事参议官非正式会议上有过对国际形势的说明。但是我没有参加此会议,因为我卧病在床。

(2) 书证第 2245 号所提到的宪兵司令官就 1942 年 5 月 23 日空袭日本的那些飞行员所作的调查报告,此报告我从未见过。我当时已不是军务局局长,而且也因为我不在东京。我不可能见到此报告。

(3) 书证第 2247 号提到 1942 年 10 月 1 日在德国大使馆举行的授勋仪式,那时我是在苏门答腊。而且我也从未从德国大使手里接到过什么勋章。

(4) 书证第 476 号提到大本营记述 1942 年 2 月至 3 月的新加坡事件之机密日志。但我从未见过这样的文件。其实,陆军大臣的随员在大本营时是没有座位的。而且大本营的机密日志也是不会让陆军大臣的随员见到的。

31. 关于中国俘虏的待遇问题。检察官出示我的审问书(书证第 255 号)作为证据。那份文件的内容是真实的。1939 年 10 月,当时我已就任军务局局长,距日中事变爆发已是两年零三个月。在此期间,中国俘虏并不作为战俘对待,因而是以一种特殊方式对待的。就连俘虏情报

局也没有。在对待俘虏问题上,中国的做法在准则上或理论上与日本是一样的。即使在那以后,日本政府也从未宣战,也从未宣布存在敌对状态,因而对待战争俘虏的方式一如既往未变。因此,战争俘虏也就从未划归陆军大臣管辖,而军务局局长也就与之毫无关系。再者,我从未奉上司之命对此事进行研究。

32. 1942年3月20日左右,我奉陆军大臣之命前往南方作战地区视察那里的情况,计划是花三周的时间。我巡行了台湾、西贡、曼谷、仰光、新加坡、巨港、爪哇、马尼拉等地了解情况,于4月12日回到东京。当我约于中午时分到达陆军省时,富永人事局长告诉我,已有决定调我任驻苏门答腊的近卫师团长。

正式委派我为近卫师团长的日期是4月20日,而到我出发赴任之日止,为了作行前准备,我没有再从事与军务局局长有关的工作。我于5月11日到达棉兰接管了师团。在我30年的军人生涯中,这是我第一次出任一个有一定决定权的负责职位,而这样的时期是在1944年我被解除师团长职务之时终止的。

33. 我在苏门答腊的任务是按照第二十五军的命令警备北苏门答腊。我所指挥的近卫师团下辖三个步兵联队,其中一个联队之前已被派往马来,由第二十五军司令官直接指挥。

至于这一地区的军管问题,这是由分驻苏门答腊各省的军司令官直辖机构负责的。在军管和我所负责的警备之间是有严格区分的。其次,关于战俘和拘留民的问题,当我到达那里时,战俘的管理早已交由军司令官掌管,由司令官派出的军官具体负责。一般敌国侨民由军管机构拘押。因此,我的职责范围内并无主管有关战俘和拘留民事务这一项。1943年后,由于英军在印度洋上日益增强的活动,我的防区已缩小到只限于苏门答腊北端的帕坦诺里省(Patanori Province)、东海岸省(East Coast Province)和亚齐省(Achie Province),而自1944年初起更是只限于亚齐省和东海岸省了。

当我在苏门答腊任职期间,并无什么交战,因而未获有战俘。

我从未使用战俘从事劳役。然而,在我防区内有许多部队并不归我指挥,例如航空队、石油采集队、船舶部队、第二十五军司令官直属补给

部队、海军部队等。其中某些部队是使用战俘从事劳役的。

俘虏收容所或拘留民收容所的警备,并不是我的职责。我的职责是北苏门答腊的全面警备,但不包括特殊的警备,例如对俘虏收容所和许多补给仓库的直接戒备。

34. 至于与当地居民的纠纷问题,尽管我收到过联队长递来的关于惩戒我部士兵的报告,但所有这些报告谈的都是我师团内部的案件。我记得只有一个案件与当地居民有点关系,那就是有个上等兵与当地女子谈情说爱的事件。在我到任之后,我就下令全师团每个人,包括我本人,都要在左胸配上一个白底缀有红樱花的标识,使当地居民一眼就能看出近卫师团所属的任何官兵。他们称我们为“樱花部队”。即便有了这种标识,我也未听到过军官组织或当地居民对我师团有什么控告。

由于被任命为第十四方面军参谋长,我遂于1944年10月12日离开棉兰前往菲律宾。

35. 我于1944年10月20日抵达马尼拉市郊区麦肯利堡(Fort Mckanley)就任第十四方面军参谋长。至于当时菲律宾群岛总的情势是这样的:10月上旬才到达的山下(Yamashita)大将还未充分熟悉群岛的态势,美军已于10月18日在莱特岛(Leyte Island)登陆。守备该岛的第十六师团看来被一举击溃,而且送来的报告一点也没有谈情势究竟若何;而整个菲律宾群岛,特别是吕宋岛,几乎没有什么防御工事,因而陷入一片混乱。所谓在我驻守菲律宾群岛期间发生过屠戮暴行的传闻就是这种混乱的战争状态引起的。

山下大将的任务原是按照南方总军司令官寺内元帅的命令负责起防卫菲律宾群岛之责。为此,原来预计美军可能入侵菲律宾南部,当前应以海空军作好决战准备;而在吕宋岛则以陆军作好决战准备,并在驻菲律宾群岛的海空军协同下进行作战。寺内元帅当时就在马尼拉,是后来于1944年11月17日才转移至西贡的。

山下大将的任务突然发生了变更。这是由于南方总军司令部于10月22日或23日所下的命令所致,该命令称:“第十四方面军应最大限度动用陆军兵力,在海空军的协同下,歼灭入侵莱特岛之敌。”此前,作战计划一直是:如美军入侵菲律宾南部,则仅动用驻在其附近的第三十五军

参与由海空军进行的决战。因此,由于对吕宋岛运送出陆军部队一无准备,我们遂火速着手于安排船舶、海空军的护航,从吕宋岛守备部队中选出所需的兵力亦即粮秣弹药,以便遵行上述命令。但是海空军在10月24日或25日进行的决战中受挫,菲律宾南部的制空权和制海权已落入敌手。结果是,尽管至12月初分七批共派出5万多人,但除运送第一师团的船只外大部分船舶均被击沉。因此至12月初,山下大将只能承认如下的现实:尽管他已竭尽全力,但处在极端困难境地的他在莱特的决战中已遭致完败。

至于吕宋战役,山下大将的任务也有所变更。由于莱特的防卫空虚,彻底破坏了防御计划。是有三个增援的师团从日本本土调来,但这些部队中有一半或三分之一,不是中了美军的鱼雷就是遭到美军的空袭而损折,只有不多的残部抵达北吕宋。再者,由于他们的汽车、马匹等物均已丧失,他们已无机动力量。情况至此,南方总军司令官寺内元帅遂下令山下大将避免进行决战,负起坚守之责。

因此,山下大将决定采取如下方针:避免与占优势的美军在平原进行决战,利用山岳地带尽量在吕宋拖住敌人,俾能延缓敌人对日本本土的进攻。为此,大将采取了如下措施:

甲. 在马尼拉以东山岳地带、克拉克基地(Clark Field)以西山地及碧瑶(Baguio)和帕莱特帕斯(Paletepas)附近山岳地带建立三个主要阵地;

乙. 至于马尼拉市,要使港口设施陷于瘫痪状态,此外还要将绝大部分军火撤出该市,且不在该市设防,使之远离战场;

丙. 在吕宋岛北端的阿帕里(Aparri)附近派驻一支部队,以抗御登陆的美军;

丁. 派遣一部进驻八打雁半岛(Batangas Peninsula),以阻滞美军向马尼拉区突进。

这个计划是在12月15日美军登陆明都洛岛(Mindoro Island)的圣何塞(San Jose)之后不久出示的。1945年1月9日由克鲁格将军(General Kruger)指挥的美军第六军终于在林加延湾(Bay of Lingayen)登陆,紧接着艾科尔伯格将军(General Eichelberger)指挥的第八军在吕

宋岛西南部登陆。此时,日本军还未完成其部署。我不得不钦佩美军这样的敌手之作战,因为他们在莱特登陆就出乎我们的意料。他们空海陆三军之间的协同是完美的。他们一旦在吕宋登陆,就真正显示出是一股机动灵活和火力猛烈的强大力量。日本军发现自身的指挥系统在瞬息之间被摧毁,最后只得据守各自的阵地各自为战。我在战争结束后得知,各地的日本军尽管装备低劣,特别是缺乏补给,仍然一直奋战到底。但山下大将还是战败了。

36. 在菲律宾战役中,日本军的通讯联络机能极差。驻守菲律宾南部的最高司令官是第三十五军司令官铃木宗作(Suzuki Sosaku)中将,他在美军登陆莱特后将其司令部由宿务(Cebu)迁至奥莫克(Ormoc)。之后与这位中将的通讯联络就十分糟糕。12月上旬美军占领奥莫克后通讯顿告中断,只是经由在棉兰老岛达沃(Davao)的第一零零师团发来一些简短电讯。

山下在碧瑶的司令部与横山在马尼拉以东的司令部之间的交通也告中断(约于1月13日),这是由于1月9日在林加延登陆的美军切断了宿务—马尼拉铁路所致。

在5月或6月之前,无线电几乎没有可利用的,就算在这之后有所利用,由于缺乏真空管和电池,也只发出一些对作战最关重要的电报。至于山下司令部与克拉克基地以西的司令部之间的通讯联络,自美军于1月中旬突入克拉克基地之后,无论是无线电联络还是陆路交通联络均告中断。结果是我们对该地区的情况完全不明。曾经架设起一条电话线与我们在林加延附近的部队进行联络,可是由于轰炸和炮击,这条电话线被破坏的时间多,可利用的时间少。与帕莱特帕斯附近的部队,是用无线电进行联络的,但由于仪器故障,这种联络也是不充分的。

上述仪器经常发生故障的情况,是由于如下原因所致:首先,我军的通讯装备比之美军的,本来就差得不知多少;其次,这些仪器有许多曾经被海水浸湿过,因而经常出现故障。此外,美军持续不断的炮击将我们的仪器设备逐一加以破坏。正是在这些情况下,山下大将的指挥组织被摧毁了。

37. 山下大将一直到最后也没有下令要对马尼拉市进行防御。作为

他的参谋长,我是很清楚山下大将之意图的。除了到前线去视察的时间之外,我是一直跟他在一起的。即便在我外出期间下达过什么命令,我回来后也不会见不到的。因此我敢肯定地说决未下达过防御马尼拉市的命令。相反,我倒曾奉山下大将之命研究如何使马尼拉市成为不设防城市。然而,当他意识到这是超出一位大将的权限之事而且也不可能付诸实践,他最终将马尼拉市置于战场之外。

尽管有着上述的处置,马尼拉市内仍爆发了战争行动和对市民施暴的意外事件,这主要是由于下列情况所致。1945年1月3日,山下大将命令第八师团长横山中将接过驻马尼拉近郊的部队之指挥权,同时为了指挥林加延湾地区的作战,大将移驻碧瑶。接着于1月5日,海军部队最高指挥官也移驻碧瑶,而将马尼拉附近之海军部队的陆上作战指挥权交给横山中将。之后约在2月10日,山下大将得知马尼拉市内战争行动正在不断进行,遂催促横山中将立即将这些部队撤至马尼拉以东山地。然而,马尼拉市内部队的最高指挥官岩渊海军少将并未服从此项命令,个中原委我不清楚。最后他们都被歼了。我从战争结束后所做的调查中得知,当美军于2月4日或5日攻入马尼拉市时,大约有1800名陆军士兵留在那里归岩渊海军少将指挥,而海军部队则约有2万之众。

38. 菲律宾群岛存在着许多游击队。战争结束后,据公布的数字,上报给菲律宾政府的正规游击队人数达50万之多。然而,此外还有多少短暂或经常与他们合作的游击队员则不得而知。他们人数如此之多,以致美军登陆后每个当地居民看起来都像是游击队员。约在1944年11月,山下大将有鉴于游击队日益增强的活动,曾令其部下攻击武装游击队。但他决未下令不经审讯就处死任何一名游击队员或任何一名合作者。关于1945年2月或3月八打雁地区某些居民被杀害的消息,我们这些参谋人员包括山下大将,当时完全不知道。山下大将并未收到过有关所传在菲律宾其他地区发生屠戮暴行的报告。只有一件事可说一说,那就是1945年4月东京命令我们对2月发生在马尼拉市的对西班牙人俱乐部施加暴力事件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查。山下大将命令横山中将进行调查,这一调查未获成功,因为马尼拉市的日本部队早已于2月底被全部歼灭。

39. 菲律宾群岛的战俘和拘留民,在我到达那里履新时(1944年10月20日),是归山下大将掌管的。然而,从实际上说,马尼拉市俘虏收容所所长在如何对待他们上是听命于兵站总监的。即便在我到任后,有关战俘待遇的条规也未作任何重大变更。

食粮的定量,是在经理部部长、兵站总监等人调查研究后根据总的存粮状况而决定增减的,这与日本部队的食粮定量之增减办法一样。在吕宋,食粮定量是不断减少的,我现在已无法确切记起那些详细情况,但实际上至11月中旬米的定量已自400克减至300克。原因是:其一,菲律宾群岛尽管原本是一个农业国,但即便是平时也一直自法属印度支那和暹罗输入大米;其二,尽管供应给日本军的食粮也完全是由法属印度支那和暹罗运来的,但是自从中国海^①的交通被美国潜艇阻截之后,上述运输就变得困难起来。幸运的是有1万吨大米在11月初运到;可是其中三分之一又被决定立即用于支持莱特作战。至12月初,补给站的库存米都发放出来了。12月后运到的米只有1800吨。

为了应对这种粮食状况,我们着手与菲律宾政府合作到菲律宾中部购买大米。山下大将把我们的主力部署到北吕宋,其理由之一就是卡加延河谷(Kagayan Valley)盛产大米而有余粮。然而,这一计划只有一部分付诸实施,因为此时美军已在菲律宾登陆。结果是我们未能利用通过这种努力而积聚起来的大米。

40. 军司令官即战俘管理官,一接到陆军省下达的将多少多少名战俘送至某地某所的命令,运送战俘的步骤就启动了。运输他们的船舶须由参谋总长指派并须知会船舶司令官。接着军司令官就须作好输送战俘的准备,并打发他们乘上指定的船舶。他们如此这般被送上船后,就不再受军司令官管制了。1944年12月“鸭绿丸”输送他们,因空袭而躲藏入鸟狼牙坡(Orongapo),此事我是在12月15日左右方始得知的。我要解释一下,身为参谋长的我为何此前对此事一无所知。上述运送战俘的命令是在我到达菲律宾之前发布的,我也听说过包括甲万那端(Cabanatuan)在内的各地收容所的战俘被遣送至马尼拉集中,以便进行

^① 即南海。

准备工作。当运送船舶于12月12日或13日被指定下来时,兵站总监和战俘收容所所长就按照前已收到的命令让战俘登上这些船舶。故而我并不知悉。山下大将一得知“鸭绿丸”的遭遇,就命令战俘收容所所长尽快前去救助他们。我自己也奉山下大将之命,在安排汽车和火车、运送食品等方面,与战俘收容所所长通力合作。由于当时美军已于马尼拉附近的名都洛岛登陆,山下大将非常忙碌。尽管如此,但他仍尽可能关注救助工作。

41. 在制订吕宋作战计划时,曾对如何处置战俘问题进行过考虑。结果是,山下大将决定万一美军在吕宋岛登陆,就经由代表日本权利和利益的国家释放战俘和拘留民并随送一份名簿;此决定也上报了南方总军司令官。另一方面,南方总军司令官对他提出了一点意见:现在这样做还为时尚早。然而,总军司令官以前所指示的规条说:“如果真正出于战局所迫,可将战俘释放。”但是,就当时吕宋情势而言,大家都认为将战俘和拘留民转移至山区腹地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此,山下大将释放俘虏一事付诸实施,并于12月中旬将决定要旨写成命令下达战俘收容所所长。接着该所所长立即集合碧瑶和麦金莱港(Port Mckinley)二收容所的拘留民,并进行释放他们的准备工作,积聚足够一个月之用的粮食。

直到战争结束后我方始得知,战俘收容所所长犯了错,误以为上述代表权利和利益的国家是指代表美国的国家如瑞士,而那时在马尼拉又无瑞士的办事处,因之处理释俘之事不是通过代表国的中介,而是像处置其他事情一样,他采取了如下的必要步骤,即尽可能在不引起敌对行动的情况下释放他们。

42. 在交战时,为了获取敌情总是希望获取战俘的。然而,在进行防御战时,是难以获得战俘的。只有一个例子,那就是1945年8月俘获一名飞行军官,但山下大将得知该军官的态度很好,就命令将其送回美军前线。不久,美军第三十二师师长吉尔(Guill)少将通知我们该军官已安全返回。

43. 按照大本营的命令,我于1945年9月3日随同山下大将投降。

山下大将在菲律宾作战期间从未以患病或其他理由而放松对陆军的指挥,也没有作过去日本或南方总军司令部的公务旅行而暂离职守。

我经常和大将在一起,并为节省时间计与他一起听取任何报告。我对山下大将的意向是十分了解的。他从未发出过违反国际法的命令,也从未发出过违反人道的命令。他也从未允许其部下有不法行为,而一旦得知他们犯事也绝不姑息。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山下大将采取了一切可能的防备措施以阻止屠戮暴行的发生。

44. 在山下大将受审时,我曾作为证人出庭。至于我自己,我常被作为一名有战犯嫌疑的人被讯问。然而,1946年3月下旬,我从战俘营主管卡特上尉(Captain Carter)处得知:我“未犯有”上述罪行。有一位中尉,他是战争罪行调查委员会成员之一,也对我说过同样的话。

1947年10月23日

于东京市市谷

供述人 武藤章(签名盖章)

我们,冈本尚一、原清治和佐伯千仞,在此证明:上述供词是供述人,当着我们这些见证人的面,签名盖章宣誓后作出的。

同一日期于东京市谷

见证人 冈本尚一

原清治

佐伯千仞

我发誓,我本良心实事求是,并无虚饰。

武藤章

(吴世民 译)

66. 书证第 3466 号

美山要藏证明

辩护团语言组译

证 明 书

我,美山要藏,现任第一复员局文书课课长。兹证明下列八个文件现今在第一复员局的存档中未找到。

1. (甲)1941 年 5 月某日日本驻柏林大使馆陆军武官致陆军省电,电文内容为他反对日美谈判以退出三国同盟为先决条件。

(乙)军务局高级课员石井秋穗(Ishii Akiho)奉武藤军务局长之命草拟的电文稿。这是一份申诉上述武官的电文。

(丙)东条陆军大臣亲自对(乙)项所列电文进行修改后的电文稿。(以上三项均参看石井秋穗的供词英文本,辩方文件第 2786 号第 3 页。)

2. 5 月初收到的有关可靠情报的报告。其内容为美国最终将参加欧洲战争。(参看石井秋穗的供词英文本第 3 页。)

3. 岩畔为规划沿此路线进行日美谈判而拟定的腹案。〔参看岩畔豪雄(Iwakuro, Hideo)供词,辩方文件第 2589 号第 4 页。〕

4. 松井大将为令两军司令官除留警备南京所必需的兵力,速将所有部队撤至城外并严守军风纪而下的命令。(参看武藤章供词英文本,辩方文件第 2679 号第 3 页。)

5. 山下大将约于 1944 年 11 月有鉴于游击队活动日益增强而对其部下所下的攻击武装游击队的命令。(参看武藤章供词英文本,第 19 页。)

6. 1945 年 4 月初东京发来的命调查 2 月发生于马尼拉市的对西班牙人俱乐部施加暴力事件实际情况之电令。(参看武藤章供词英文本,第 19 页。)

7. 山下大将命横山中将将调查马尼拉市西班牙人俱乐部遇袭事件

之命令——尽管此调查因马尼拉市日军早于2月下旬被歼而无果。(参看武藤章供词英文本,第19页。)

8. 东京约于1942年7月为在苏门答腊建立正规俘虏收容所而下的命令。〔参看太平秀雄(Ohira, Hideo)供词英文本,辩方文件第2779号第2页。〕

1947年11月11日于东京。

第一复员局文书课课长

美山要藏

我在此证明:上述证明人是当着我的面进行签名盖章的。

于同一日期、同一地点。

见证人 原清治

(吴世民 译)

67. 书证第 3498 号

松井石根宣誓证词

签署了宣誓书如另纸之后,按照我国通行的格式,我谨作出如下证明。

1. 1937 年日本政府派遣部队到江苏南部的动机和目标。

由于 1937 年 7 月中日两国在华北出现了不和,上海地区中国军队和老百姓中反日运动与日俱增。中国军队不顾 1932 年的停战协定,不断地在上海日本租界附近集结,威胁那里的日本军队和侨民,8 月 9 日,最后导致了暗杀大山(Oyama)中尉^①,日本军队和侨民处在危险中。由于意识到为了保护日本侨民的生命和利益必须迅速加强日本的海军力量,因此日本政府在 8 月 15 日匆忙向上海派遣了由第三、第十一(缺一个旅团)师团组成的派遣军。我被任命为司令官,部队由军舰在同年 8 月 20 日陆续被运往上海。

派遣军的目标和任务是加强日本的海军力量,保护上海及周围地区日本侨民的安全。

2. 作为后备役军官,我被任命为司令官的原因以及当时我的思想状态。

在我 40 年的服役生涯中,即从我在 1894 年进入预备军校起到 1935 年我被编入后备役,我担任过以下职务:参谋本部成员、参谋本部第二部副部长、第 11 师团长、台湾军司令官等。在我的军事生涯中,我在华北和华南曾驻扎了大约 12 年,在此期间我不仅尽我最大所能促进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合作,而且自从我年轻时代起,以及在我一生中我一直致力于日本和中国两国友好相处以及亚洲的复兴。我在军队中的很大一部分工作都是为了这一理想的实现。

1937 年,上海事件爆发后派遣军被匆忙派往那里。陆军大臣告诉我

^① 事实是大山故意闯进虹桥军用机场,被守军击毙。

已在后备役名单上的我被任命为派遣军司令的原因是因为前面提到的我个人的经历。我的任命是因为当时日本政府对华政策是尽可能快地现地解决该事件,防止武装冲突的扩大。我总是坚信中日两国之间的冲突是所谓“亚洲家庭”兄弟间的争吵。对日本来说通过武力来营救日本侨民,保护我们受到威胁的权利和利益是不可避免的经历。这就像是兄长长时间忍耐后痛打其年轻而又桀骜不驯的弟弟一样。这一行动是使中国恢复理智,不是出于仇恨而是出于爱。因此,当我担任上海派遣军的司令后,我就立志在通过派遣军解决中日之间问题的过程中,不要引起相互的憎恨,而是要带来两国间的友好关系与合作。因此,我命令我的军官要使他们的手下所有人完全理解远征的真正的意义。下面是在部队出发时我给部队指示的要点:

(1) 上海周围战斗的目的只是征服向我们挑战的中国军队,因此,中国官员和人民应尽可能地得到抚慰和保护。

(2) 牢记不要给外国侨民和军队带来任何麻烦。为了避免误解要与外国当局和军队保持密切联系。

3. 上海及其周围的战斗局势。

上海远征军在8月22日陆续到达长江口的崧(Maan)岛,此时,(我们)收到报告说上海的军队和侨民处在危险中。因此,在24日黎明我匆忙让到达的军队在吴淞口和沿岸登陆,击溃了占据在那里的中国军队,并与日本海军建立了通讯。然而,根据报告中国军队在上海和在上海西部沿江的人数据估计大约有十万人,他们在各处对我们的登陆军队发起猛烈的进攻。在经历了15到16天的激烈战斗,在付出了极大的牺牲后,派遣军终于成功地占领了沿江的阵地。但中国的反攻越来越猛烈,由于他们的军队得到来自南京和杭州的增援,兵力达到了30或40个师。为了对付这一挑战,我们派遣军的兵力也得到相应的增强。10月5号,第10军(超过3个师团)在柳川中将的指挥下在浙江省的杭州湾登陆与(上海)部队协调作战。在经过2个多月艰苦的战斗后,在10月底和11月初(上海)派遣军终于有能力将中国军队从上海及其周围地区赶走以保证日本侨民的安全。

战斗过程中下列事情引起我的注意:上海及周边地区中国官员和人

民的反日情绪非常强烈,蒋介石的卫队在反攻中最勇敢。由于退路被督战队切断,中国的其他部队也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最终被击溃。在他们撤退前,中国军队采用了所谓的“焦土政策”。他们要么炸毁要么烧毁主要的运输设施和建筑。一些中国士兵将军装换成便装,变成游击队向我们士兵打冷枪,威胁到我们的后方。当地居民也与他们的军队合作,剪电报线,或安排信号火,不断破坏日本军队(行动)。我还知道许多英国、美国、法国等国军队或公民同情中国军队,并故意向他们提供帮助,在许多方面妨碍我军行动的例子。我深深地感到前面我讲过的中国人的对日态度——长期而苦难的战争已使华中的中国军民和日本军队水火不容,两国之间的敌意日益深重。同时,我曾命令我的士兵保护和善待中国老百姓,而且对于外国的权益要予以保护。南市(上海南部)之战没有给该区造成损害,就是我下达此命令的结果。

4. 华中方面军的组建和当时的情况导致了进攻南京决定。

1937年11月5日第10军在杭州湾登陆后,上海派遣军和第10军合并起来共建了华中方面军。当时我被任命为该军的司令官,同时也担任了一段时间的上海派遣军的司令官。

华中方面军的司令部管辖原来的上海派遣军和第10军的司令部,其职责是把两军的作战协同起来。然而,由于只有7个参谋,它的职责就只能限于对两个司令部进行作战方面的指挥,而对于整个监督管理和医疗事务则没有处理权。

因此,在我与12月7日被解除了同时担任的职务(上海派遣军司令官)后,我对前线部队的命令和监控就完全不是直接的了。

华中方面军在把中国军队赶出上海后,就占领了浙江省的嘉兴和江苏省的苏州、常州之间的地方,并力图在上海地区维持和平与秩序。但中国军队以南京为基地,坚持进行大规模战斗。这些战斗当时在华北正如火如荼的展开,中国方面并从其他地区集结起很多军队准备对在江苏和浙江的日军发起进攻。情况十分不利,假如不占领中国军队在南京周围的基地,就不可能维持和平秩序以及保护我们在华北地区的利益。结果,日军决定占领南京从而恢复江苏南部的和平秩序。大本营命令我们的华中方面军立刻和海军协作攻占南京,尽管阻力重重,我们的军队还

是开始了对南京的进攻战。

5. 攻占南京时以及对于发生的所谓的抢劫和暴行我们所采取的措施。

依据我国政府的“尽量使战争不扩大化”的政策,而且长久以来我一直有这种想法——尽量在日中之间实现合作和共同繁荣,于是我在南京之战中一直警惕,不要把这场战争变成对整个中国人民的战争。如前所述,我在上海的作战经验也使我愈发感觉到做到这一点的必要性。有关我在维持军纪和道德方面所采取的预防措施上以及其他有助于强化纪律的行动,我就不多说了,证人中山作证时已经进行了详细的阐述。

尽管我在南京之战中小心谨慎,但在当时忙乱的情况下,可能有一些冲动的官兵干了一些令人不愉快的暴行。事后,对于听说的士兵的不良行为我感到非常遗憾和难过。攻占南京时,我正卧病在 140 英里外的苏州,根本不知道士兵违背我的命令所犯下的这些暴行,也没听到任何有关的报告。12 月 17 日,入南京城后,我才第一次从宪兵司令那听到此事。于是我立刻下令各个部门严查此事并对罪犯严惩不贷。

但有一个事实是毋庸置疑的,即,在战争时期,中国军队和一些社会违法分子几乎总是会借混乱之机进行抢劫和施暴。南京陷落时,他们犯下的罪行不在少数,因此让日本官兵来承担所有的犯罪责任是有悖事实的。

12 月 17 日举行了进城仪式,第二天,在宁静的气氛中,又在战地举行了对死难者的哀悼仪式。19 日,我在十五六名军官的陪同下视察了南京城。当时,战火已熄灭,街道一片宁静,难民也已回到各自的家中。我们只看到大约 20 具中国士兵的尸体横在路面,城里的秩序已大致恢复。但在我们进入南京之前,所有的水电设施以及重要的市政建筑已被中国军队摧毁,当时没有火情,被火焚毁的房屋大约有五六十座。

简言之,南京陷落后到 1938 年 2 月,我在上海期间,我唯一听说的事就是有传言在 1937 年底——大意是南京有一些非法事件发生,但我并未得到任何正式的报告。因此我有把握地说:战争结束时美军在东京的广播所说的所谓的大规模的屠杀和暴行,这一点起诉方在本法庭也声称发生了,但却是我第一次听说。在我听到广播后,我试图调查在我们

攻占南京后我军的活动,但当时与此有关的人或死或被逮捕,而相关的档案都被付之一炬。不可能再回到十年前,来详细调查当时的情况了。

在南京战役中,有大量的中国老百姓和士兵遭到炮击和子弹的袭击而身亡或受伤,这种情况是有可能的。但我对于起诉方文件中所说的“南京之战中有计划的屠杀”之说不敢苟同。很显然,文件中所述的“关于日军下令,并放任屠杀的行为”只能是诽谤。

至于当时的情况,不用说,作为华中方面军的司令我是尽心履行我的职责的,采取了很多措施来防止不幸事件的发生,并严惩罪行、赔偿损失。

然而,令我遗憾的是,由于紧张的战事,结果并不如人意。(归根结底,原因在于:日军攻占南京时,我正在苏州卧病在床;而且我只在南京呆了五天,就离开了;作为华中方面军的司令官,我对前线的官兵没有直接的指挥权。)

6. 南京陷落后我的行动。

12月17日进入南京,呆了五天后,由于要指挥在浙江作战的官兵,我经由水路于12月21日前往上海。在那里,我忙于处理战后诸事,例如,就有关普遍的和平秩序以及采取利民措施和当地的中国官员进行谈判;和英美两国的海军官员接触以及和其他外国军界和政界官员谈判以便协商解决在战争中发生的各种事情。这都是因为在占领南京后,以及我回到上海后,华中方面军接到大本营的命令,集中主要精力来确保整个长江南部和南京东部地区的安宁,特别是上海附近地区的安宁。

顺便提一下,当我回到上海听到有关南京城里的谣言后,在1937年底我派下级参谋官员到南京,下令对传说里的事情进行彻底调查,并严惩任何犯罪的人。但直到我离任,都未接到任何关于此事的真实报告。

除了在上述占领区维持公共秩序与和平外,我还认为有必要和蒋介石政府进行和平谈判。我敦促上海的重要中国官员为此做出努力,并派特使前往福州和广东进行斡旋,并让他们与陈毅和宋子文取得联系。然而,由于2月底华中方面军的重组,我被解除华中方面军司令官的职务,返回日本。我现在仍然对我失去为实现我上面提到的目标而努力的机

会感到遗憾。

7. 1929年在柏林举行的武官会议的事实。

1928年12月当我被解除了参谋本部第二部负责人的职务后,我想去亚洲和欧洲各国旅行,1929年1月我开始了考察法国、印度支那、暹罗^①、英属马来西亚、印度和其他欧洲国家。1929年4月当我经过柏林时,驻欧洲各国武官利用我到达那里的机会,聚在一起叙旧。这不是一次官方会议,也没有特别的目的。

聚会由驻德国武官大村有邻(Omura)少将主持,会议是社交性质的。会议不是我召集和发起的。另外,正如我前面所提到的,当时我已被解除了参谋本部第二部负责人的职务,只有中将军衔而已。我并没有召集驻各国大使馆武官开会的权力。简而言之,那只是一次社交聚会,对当时的各种问题并没有做出任何决定。它只是一次非正式的圆桌会议,武官们对欧洲的局势表达了他们自己的看法。相应的,并没有会议记录,在我返回日本后也没有向我的上级提交报告。会议中,我坐在主宾席只是因为我是从遥远的地方来到那个地方的客人。有关这一点,起诉方证据第733号与我向起诉方的陈述相矛盾,起诉方准备的调查记录的翻译可能有误。

8. 我被任命为军事参议官或内阁参议与政府外交政策的关系。军事参议官主要是完成与军队的教育和训练有关的临时任务,他并不是能够随时干预任何事情,特别是外交事务。

由于当时日本国内外的政治局势,内阁顾问主要是作为咨询机构被任命的,没有实权。当我担任这些职务的时候,情况就是这样。有关中国、亚洲等问题,我的观点从不被采纳,我自己也从不提出自己的看法。

9. 我创建兴亚联盟的目的以及它的活动,特别是在北平我代表亚细亚运动与秦德纯谈判的真实情况。

多年来,我怀着遗憾的心情看到亚洲遭到欧洲和美国人的侵略,并一直祈祷由亚洲人重建亚洲。考虑到自满洲事件后中日两国日渐疏远,我非常希望两国人民能够以大局为重,而不是情绪化地纠缠琐事,彼此

^① 泰国的旧称。

误解。因此,为了在中国和日本对此感兴趣的人士中推进“大亚细亚主义”运动,我在1933年与具有相同观点的人一道建立了兴亚联盟。它不是一个政治组织,而是某种研究社会文化的组织。它的目的是通过传播王道的原则重建亚洲——所谓的王道思想是中国和日本代代传承下来的为在整个亚洲实现共存、共荣的一种理想——并在其和平发展过程中最终为整个人类做出贡献(辩护方证据2234号)。该联盟的日方成员超过2000人,但由于缺乏资金,它没能做任何特别的事情。

1935和1936年我在华南和华北旅行有机会亲自看到中国,并计划与我在中国的老朋友努力使这一运动取得成功。多年来,中华民国的前总统孙文一直在中国提倡大亚细亚主义。由于希望使中国的运动 and 我们的在实现共同目标上保持一致,1935年秋,我在北平和天津与对此感兴趣的人进行了会谈,1936年春,在华北的知识阶层中建立了中国大亚洲协会。的确,我劝说过当时的北平市长秦德纯。然而,几天前被法庭出示的秦先生的宣誓证词(辩护方文件2234)内容与他当时的话和声明不一致。此外,我们的主张并非一定要把欧洲和美国人赶出亚洲。我所提倡的是对我们友好,在实现亚洲人民幸福的过程中与我们合作的欧洲和美国人应该和我们一道实现共存共荣的理想。我当时发表的声明可以证明这点(辩护方文件2500、2501、2628)。

10. 大东亚振兴会(Dai Nippon Asia Development League)和大东亚振兴会的目标和活动。

大东亚振兴会是在第一届近卫内阁时成立的,包括了与兴亚运动的各个机构。当时大政翼赞会(Imperial Rule Assistance Association)刚刚组建,为了协调政府的外交政策,大东亚振兴会也被归属该协会,并受其监督。然而,由于国内和外交政策的发展造成内阁频繁更迭,大东亚振兴会被迫多次重组,活动范围也多次变化。它能做的只是与中国和满洲国的各个文化机构进行联系,并要求它们的合作。除此之外,没有实现任何具体的目标。从其创建之初,我之所以成为该同盟的副仲裁和顾问是因为我同大亚细亚协会的关系。由于上面提到亚洲开发同盟不断的变化,1944年小矶内阁时它被重组,名字改为大日本亚州开发协会。至于它的组织和活动,它受到政府监督和指导,但是该机构本身是文化性

质的，完全是由感兴趣的平民组成的。然而，随着太平洋战争的进展，通讯的困难以及国内外局势的严峻，从一开始就阻止了它的具体行动，结果它仅仅能够出版其机关报和向居住在日本的亚洲各国学生和侨民提供一些指导。

由于我过去与该协会的联系，我负责它的管理，但不久战争就结束了，在没有为它做出任何大的贡献的情况下，我不得不解散该协会。

11. 瓢虫号事件和其他的外交事务。

大约在1937年12月12日，我收到了报告，属于第十军的某炮兵在芜湖附近炮击了一艘英国炮舰。我命令我的参谋长立刻去调查，根据他的报告，大约在12月11日，中国军队开始用大小船只从长江撤退，他们许多船只欺骗性地悬挂外国旗帜。因此，第10军的柳川中将命令向载有撤退的中国士兵船只开火。12日，大雾笼罩着扬子江，陆军大佐桥本发现载有中国撤退士兵的船队，就开始射击。瓢虫号就在其中。

因此，我立刻命令第10军的司令向那里的英国海军总司令致以歉意。而我本人从南京返回上海后，不敢延误就亲自拜访了英国海军司令，并为此事向他表示了歉意。他完全明白我的意愿，并承诺将把我的歉意转达给英国政府。

巴纳号被轰炸是海军飞机误投炸弹的结果，而这些飞机不归我指挥，我与之无任何关系。但不管怎样，这是日军造成的不幸事件，我一回到上海就亲自拜访了美国海军司令雅纳尔并向他表示了歉意，因而获得了他对上述事件的谅解。

如前所述，我保护和平居民，并尊重外国的权益。上海和南京的战事结束后，我拜访了英国海军司令利特尔(Little)和美国海军总司令雅纳尔并向他们表达了建立友好关系的意愿，并对英美两国遭受的不幸损失表达了深深的遗憾。在此期间，我还拜会了法国大使和法国海军总司令，并和他们就如何处理法租界和南市问题交换了意见，并达成了共识。

对于曾保护过南市居民的可敬的雅坎诺先生我表示了深深的谢意，同时也向他捐赠一万元作为补偿。我这样做，是为了缓解战争带来的影响。

12. 江南战场上两军的伤亡人数以及对死难者的哀悼。在上海和南

京之役中死伤或因疾病而卒的日本官兵为 21 000 人,加上伤、病的士兵,伤亡总数为 80 000 多。

我否认中国目击者所称的有许多大屠杀的案例,但我认为在那段时间里有许多中国士兵及平民受害者,他们中有许多人得了腹泻、痢疾、伤寒热等病,这些病当时在上海和中国军队中流行。实际上,日本军官和士兵染病的人数就到达了数百人,有一百多人死于这些疾病。

在我看来,中国和日本两个民族应该像兄弟般地进行合作。他们互相争斗的确是一场大灾难,造成巨大的人员损失。我情不自禁地为这一悲惨的事件感到非常遗憾。我非常希望这一事件为我们两个民族的和谐生活提供一个机会,以及那些献出生命的人将起到新亚洲基石的作用。

回国后,我在我临时居住地附近的热海伊豆山建造了一座庙宇,纪念两国受害者的灵魂,并祈祷他们灵魂的安息。另外,我在庙宇里用从长江南面战场上取来的被鲜血浸染的泥土建造了观音的雕像,在观音德行的帮助下,像其他笃信观音的人一样,我日夜供奉,祈祷朋友和敌人的灵魂安息,祈祷东亚的黎明,祈祷世界和平的来到。

1947 年 10 月 14 日于东京

我证明,供述者在我面前宣誓并盖章,同日于东京。

见证人 伊藤清

我发誓,我本良心实事求是,并无虚饰。

松井石根

(罗峰 译 张生 杨夏鸣 校)

第二部分 苏联文献中的南京大屠杀^①

1. 占领者的暴行

维也纳,11月30日(塔斯社)。维也纳报纸《晨报》刊登了一封目击者的来信,内容是他上海附近的战役中,目睹日军所犯下的暴行。作者写到:

“我参加过世界大战,然而,日军在中国的所作所为,在世界战争年鉴中找不到一个可与之比拟的。日军杀害数千名妇女、儿童及无武装的平民。我亲眼目睹了这些暴行……

我们从屋顶看到日军用刺刀杀害那些已投降的中国军人;日军在杀害前,强迫他们挖自己的坟墓。”

《真理报》1937年12月2日

^① 该部分俄文资料均为台湾淡江大学俄罗斯研究所硕士杨立伟先生翻译。

2. 日本飞机野蛮的轰炸

汉口,12月11日(塔斯社)。12月7日,日本飞机再次对芜湖进行疯狂的轰炸。投下40枚炸弹,炸死80位平民,主要街道已被摧毁。

12月9日,日本飞机在江西南昌投下20枚炸弹,被炸死及炸伤的有70人,以及炸毁66间房子。一些炸弹击中医院,炸死了许多病人。

2架日本飞机轰炸河南首府开封,炸死70名平民及摧毁了200间房子。一枚炸弹击中一间小学,其中一间教室超过20位小学生被炸死。

12月6日,由20架飞机所组成的日军航空队,对离南京城8公里的淳化镇,一天就进行8次的轰炸。投下超过300枚炸弹,村庄化为灰烬。被炸死及炸伤的超过200人。

在这一天,21架日本飞机轰炸南京3次。10枚炸弹击中浦口车站,摧毁了2个主要的货仓,数十人被炸死或受伤,浦口陷入一片火海。

《真理报》1937年12月12日

3. 在中国的军事行动

华中地区

汉口,12月12日(塔斯社)。12月11日早上,日军对南京发动攻击。日军使用攻城器破坏了南边的城墙,企图在城墙上打出一个缺口。在这段期间,日军整天轰炸。一些炸弹落入“安全区”内,摧毁了数十间房子,炸死了很多平民。

南京留下的居民开始受到保护,主要是贫民,因为他们没有地方可去。他们被安置于“安全区”内,这是外国的大使团向日军提出的要求,要在战区设置一个保护平民百姓的区域,这个建议被日军拒绝。当时在南京只剩不到20万的居民,但在战前南京城与郊区的居民有1100万人。

汉口,12月12日(塔斯社)。12月12日晚上7:00,南京城的卫戍司令唐生智将军电话通知,中国军队已成功地击退日军企图进城的攻势,日军遭受重大损失。在南京东边的紫金山,中国军队控制了1号山丘,对拿下3号山丘的日军造成严重的打击,1号山丘地势较3号为高,中国炮兵可以对日军加强射击。

12月12日,6枚炸弹成功地射到日军阵地。12月10日晚间,日军在对南京第一次进攻时使用毒气。

最后证实,南京南方135公里的宣城已被日军攻下,该城是通往芜湖的铁路终点站,日军正向芜湖前进。

自从江阴要塞失守后,长江的三个补给据点已被阻断。

华北地区

汉口,12月12日(塔斯社),中国军队证实,山西的东北方,与河北及察哈尔的交界处有超过30000名的游击队,他们据有20个县。坂垣将军率领20000名部队在张家口和大同一带准备攻击这些游击队。河北及山西的交界处,即位于平汉铁路沿线的四个县是在中国军队的控制

之下。在山西的西北方有 10 000 名游击队,北平西边的山区还有 2 000 名游击队持续作战。

华南地区

伦敦,12 月 13 日(塔斯社)。记者理查德发自香港的报道,英国军队阻止日军登陆英国的领土——香港。登陆的日军约有 30 人。

《真理报》1937 年 12 月 14 日

4. 华中地区

汉口,12月16日(塔斯社)。在12月13日晚间,中国军队完全撤离南京,撤离时在城南放火烧掉一切,而郊区也完全被摧毁,若干日舰抵达南京。

日军占领浦口,南京防卫司令部迁往位于津浦铁路上的徐州。

昨天5架中国飞机轰炸靠近浦口的日军阵地。

人数超过1000人的游击队在芜湖和宣城之间的湾沚攻击日军,并掳获5挺机枪和许多弹药。

伦敦,12月16日(塔斯社)。记者理查德自汉口的报导。日军在南京未受阻挠,与在北方的日军会合,兵分三路向南京城的北部进攻。主力部队向南京西北方的滁州挺进;右翼部队则沿着大运河向北推进;左翼部队向位于芜湖北方,在长江左岸的和州^①前进。

《每日邮件》记者留在南京直到最后一刻,他离开前看到300名中国军人在沿岸旁的城墙边被日军处死。河边布满中国军人的尸体,街道上尸体多到汽车得从这些尸体上辗过才能通行。

驻上海的《泰晤士报》记者写到,12月15日在南京还有一些中国的“敢死队”,他们继续阻挡日军,在南京的西北方还有中国炮兵在射击。

《真理报》1937年12月17日

^① 音译,俄文原文为“Хэчжоу”,疑为和县。

5. 日本占领者的暴行 杀死超过 41 000 位平民

汉口,12月24日(塔斯社)。从南京回来的外国人说,日军首先抢夺难民并强暴妇女。据他们说,在头四天日军就杀了数万人。在难民营中,日军恣意枪杀许多年轻人,借口说他们是中国军人。很多妇女被他们强暴,南京的街道上布满了成堆的尸体。

在上海,日军在4个月内杀了超过41 000位平民。

《真理报》1937年12月25日

6. 日本在中国的暴行

汉口,12月26日(塔斯社)。据那些外侨说,在南京中央医院里的所有工作人员都被日军射杀。所有外国人,包括记者及从南京逃出的难民,揭露了日军血腥屠杀平民的暴行。

《真理报》1937年12月28日

7. 日本占领者在中国的暴行

伦敦,12月29日(塔斯社)。英国报纸《每日电讯报》和《泰晤士报》,以及《纽约时报》记者杜丁都报道了有关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杜丁写到,在日军占领南京之后的2天,大规模抢劫、强暴妇女、杀害平民,以及枪杀已成俘虏的中国军人。南京变成了恐怖的城市,街道上遍布尸体。这些被杀的人中,有很多是老人、妇女及小孩。很多的受害者被刺刀刺死。随着黑夜来临,日军见人就杀。日军强迫中国人搬运他们所抢来的东西。

记者继续写到,更可耻的是日军抢夺难民。日军在难民营进行大规模搜索,抢夺金钱以及值钱的东西。美国医院也难逃日军轰炸。医院人员被日军抢走金钱与手表。

日军野蛮地闯进美国大使馆。杜丁与另一位美国人这时正好在美国使馆,要求日军退出使馆。日军最后不甘心地离去,不过他们还是抢了一支手电筒。

《真理报》1937年12月30日

8. 宋庆龄的宣言

伦敦,1月5日(塔斯社)。《每日先驱报》刊登宋庆龄在上海给记者埃德加·斯诺的呼吁:

中华民国的创建者孙逸仙博士的遗孀宋庆龄透过《每日先驱报》,向英国人民发表一篇动人的呼吁,希望英国能一同反抗法西斯的侵略。以下是她离开上海租界时给我的宣言:

“今天,中国人民为世界和平、改善社会经济秩序及反法西斯战争的奋斗而团结一致。再没有一个任务比得上中国抵抗日本侵略来得重要,因为日本企图让历史倒退,征服中国、消灭我们民族独立,让我们变成他们的奴隶。为了反抗这个威胁,中国人民从未停止抗日的斗争。请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帮助世界和平,今日藉由抵制、制裁或封锁的方式来对抗法西斯的侵略,明日才能免于世界灾难。

我们独自对抗装备精良的敌人将近6个月,他们用现代化的武器和极端残酷的方法来消灭我们,使数千无辜百姓的鲜血染红我们这片土地,毁坏我们的城市与村庄,我们年轻人尸横遍野。我们的妇女及小孩被残害,失去了舌头及耳朵,数千人因日军的暴行以及夜以继日的轰炸而精神崩溃。

外国目击者目睹了南京城恐怖的事实。日军屠杀了50 000名平民。日军的暴行如同瘟疫般降临中国7个精华的省份,造成百万人无家可归,因饥渴而死。这种灾难远甚于欧洲战争。只要民主国家愿意以经济制裁作为惩罚,侵略是可以被制止的。”

《真理报》1938年1月6日

9. 日军的暴行

上海,1月7日(塔斯社)。日军在浙江省会杭州短暂地停留,随之而来的却是前所未有的暴行。

《密勒氏评论报》报道,日军闯入杭州,血腥迫害留在城里未受保护的平民。在这三天里,日军抢夺商店、学校,杀害来不及逃离的平民。强暴数百名妇女及少女。

汉口,1月8日(塔斯社)。《南华早报》引述目击者口述,日军从上海到南陶^①这一带的暴行。

日军闯入这一区,似乎把这里的人都当成曾当过中国军人而赶尽杀绝。在中国正规部队离开后,留下了一批中国“敢死队”在许多屋子里。因为日军无法击毙躲在这些屋子里的勇士,于是日军开始放火烧这些建筑物,很快地整座城就陷入火海之中。

《真理报》1938年1月9日

① 音译,俄文原文为“Наньдао”。

10. 日本占领者在中国的暴行

纽约,1月26日(塔斯社)。《纽约时报》驻上海记者报道有关日军在南京持续肆无忌惮的抢劫以及暴力的讯息。记者写到,日军在上海实行新闻检查,不准外国记者报道在南京城有关“败坏的日军”这类的报导。

据华盛顿官方人士的评论,日军在南京的恐怖行为,就如同他们击沉美国“巴纳号”炮舰一样,都证实了日军高级指挥官蓄意对中国平民及外国人采取恐怖手段。

汉口,1月26日(塔斯社)。美国政府对日军在南京前所未有的暴行提出抗议,《大公报》写到:

“日本政府无法控制自己军队的行为,以及无法履行自己的义务。日本不承认国际法,日本只承认其军事力量。”

报纸写到,日军不准外国人到南京,就是怕被揭露其极端残忍的暴行以及对平民的凌虐。甚至红十字会也无法对遭受日军武力攻击的受害者提供协助。

《真理报》1938年1月27日

11. 日军在中国的暴行

伦敦,1月29日(塔斯社)。《每日电讯报》香港记者详细地描述了日军在南京及杭州的暴行。他指出,一位传教士证实,日军在南京杀害2万名中国人并强暴数百名妇女,记者出示的文件中详细地描述了日军的暴行。一份文件显示,在日本占领南京的一个月后,街道上布满尸体。一个小孩因腹部有7处被刺刀所刺的伤口而死在医院中。这份文件的作者在医院看到一位妇女被20名日军所强暴,并在她的喉咙上留下一道深深的伤口。3名日本兵强奸2名少女,一个11岁,一个13岁。日军刺死一位试图保护自己妻子的中国人。

另一位美国传教士指出,300名中国人被赶进池塘并被射杀于水中。另一群人则被日军赶到草棚中烧死。该人士继续描述,一群中国人,日军先给他们20分钟“承认”自己拥有武器,然后把这些“承认者”全部射杀。

金陵大学非常(紧急)委员会主席是一位美国人,就日军的暴行而向日本大使馆写信,“紧邻日本大使馆的农桑系大楼上虽然有美国国旗,但是日军仍然肆无忌惮地闯进该系进行抢夺。

日军闯入蚕桑系大楼,抢劫、杀人及施暴。日本士兵及军官前往收容1500名难民的图书馆,并强暴妇女。暴行在整座城市中进行。居民根本无法从屋子里找到任何物品。无视于外国人对日本的抗议,暴力依旧无法停止。”

12月17日,非常委员会主席写给日本大使馆的信中说道:“残酷的行为就发生在你们旁边。昨晚日军屡次进入学校,用刺刀威胁要求女人及金钱。一名学校的职员被刺死。在图书馆的建筑物里很多妇女被强暴。一名日本军官打了一名学校的美国女员工。我被带有醉意的日军吵醒。这些都在大使馆旁边发生,我们不了解,使馆方面为何不采取措施。”

12月18日这名委员会主席继续说道,在学校的情况比起城里的其

他地区算是“较好”的，他写信给日本大使说：“仅仅昨晚在学校就有一位小孩被刺刀刺死，8名妇女被强暴，一些职员被日军杀死；而这些日军日夜不停地越过围墙闯入学校，难民活在歇斯底里的恐惧中。尽管有你们的承诺，但是学校大门依旧没有警卫。秋山所率领的日军就驻扎在学校附近，他们带来严重的威胁。直接了当地说，有日军在的地方，没有一个人或是一间房子是安全的。当我写信的同时，日军正轮流为自己挑选一个中国妇女。”

最近一封回日本大使的信中写道：“今日午后在你们使馆门口一名妇女被强暴，而在学校里有7个人被抢，不久前才刚阻止日军抢劫学校的医疗所。日军强迫中国人搬运他们所抢来的东西。”

上海，1月28日（塔斯社）。日军的人侵给中国人带来无法估计的灾难和破坏。

甚至一份不是特别反日的美国报纸《顺天时报》^①也承认说，日军侵犯河北省的结果，使得此地居民的处境变得格外地艰苦。报纸不止集中报导河北省西部15个村庄的情形，还报导了其他被日军占领的部分。据报导，这15个村庄有1913户家庭被毁灭，260人失去消息，这里面有63名妇女及20名小孩。十分之九的居民因日军的占领而被迫放弃财产，离开自己的住所而往偏远的地方去。所有被疏散的有2444人，差不多每一个家庭就有2个人。

报道指出，掠夺及抢劫居民的情形持续发生着，而农民也离开村庄投靠山里的游击队。这支在河北省境内的游击队被称为“八路军”。他们有良好的组织及明确的行动计划，例如他们来到离保山不远的一个小地方，他们会用从日军那里夺来的武器武装当地的农民，并组成游击队。中国的地方政府也加入这支队伍。报纸进一步报道，河北一省至少有20个县受“八路军”的影响，而“八路军”的军事行动造成日军很大的障碍，愤怒的农民找到机会便向残暴的日军报仇。

汉口，1月28日（塔斯社）。在上海发行的美国报纸《密勒氏评论报》不久前刊登了一篇有关日军在中国首都——南京极其骇人听闻的暴行。

^① 原文如此。《顺天时报》是一份在中国发行的日本报纸。

该报导转自日本报纸《朝日新闻》一篇大规模屠杀中国人的报道。

该报道在表扬两位日本军官：向井与野田，他们在比赛看谁先杀死一百名敌人。12月10日，2位军官带着日本武士刀相见于紫金山下的中山陵。

向井中尉说：“我杀了105个人，那你呢？”

野田回答说：“我杀了106。”

之后2人哈哈大笑并高声说道：“野田，你多杀一个人。”然而无法确定谁先杀了一百人，因此再次约定看谁先杀死150名中国人。

《朝日新闻》刊登了2名军官的照片，并报道说“12月11日，以杀满150人为目标又将开始了”。

《真理报》1938年1月30日

12. 中国妇女的爱国心

汉口,1月30日(塔斯社)。昨天在汉口举行了一场大型的妇女招待会,徐凯琇^①报告妇女组织在前线医院的运作情形,以及被日军轰炸过的医院状况。

华北爱国会主席刘清扬说:“日军的暴行,特别是对中国妇女那种令人发指的行为。未来得及逃离而留在沦陷区的妇女在日军军营中被强暴并被杀害,甚至连60岁的老妇人都不放过。在南京,日军强暴并杀害的妇女约2000人。在河北的清泉^②,日军强暴了50名妇女。”为了报复日军的暴行,所有中国人都应该在敌后组成游击队,妇女的爱国心更不落人后。

一些外国人参加这场演说,他们是美国大使约翰逊、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及其他人。

中国妇女会向全世界的妇女提出以下宣言:

1. 请你们的国家扩大帮助我们受伤的士兵及无家可归的难民,特别是我们的医药用品相当缺乏。
2. 请你们政府对华提供抗日战争所需的物资。
3. 请派专家并成立专门组织来观察中国的现状。
4. 在经济上拒绝贷款给日本,并禁止提供武器或军事物资给日本。

最后宣言中提到,在美国的妇女不够积极参与抗战活动,“你们把钱花在购买日本的玩具给你们的小孩,而日本就是用这些钱买枪杀害我们的小孩,我们呼吁全世界的妇女都能帮助我们,一点点的牺牲,即是对我们的帮助,也有助于世界和平。”

① 音译,俄文原文为“Сю Кай-суй”。

② 音译,俄文原文为“Цзинчжун”。

在缅甸反日抵制

上海,1月30日(塔斯社)。《大公报》报道,在缅甸扩大抵制日货的活动。在缅甸的20个地区组成抗日的专门委员会,主导扩大反日的宣传。

在南京难民的处境

伦敦,1月29日(塔斯社)。位于上海的《曼彻斯特卫报》记者依据外国可靠的消息报道,南京——这个恐怖的城市,有250 000人在“安全区”中,但提供医疗服务的却只有2位医生。

1938年1月31日《真理报》

13. 日本在中国的暴行

汉口,2月25日(塔斯社)。日军用最残忍的方式迫害在安徽占领区的平民百姓。2月21日沿着淮河,他们烧毁超过10个村庄,没来得及逃离的居民都被日军所杀。超过数千人遭受野蛮的迫害。

在浙江省,武康镇西南20公里处的一个大村——黄湖琴村^①,还有余杭镇西北10公里处的潘板桥镇和潜江村完全被毁。300多名农民被杀害。在过去的一周里,南京超过500名中国军人被杀,这些俘虏是12月在市中心的司法大楼附近被抓,死于机关枪下。

就如来自香港的报道所说,在上海的日本宪兵被允许搜查位于租界的书店,并逮捕这些商店的员工和老板。

汉口,2月25日(塔斯社)。美国在上海的海军陆战队指挥官别孟德^②将军在2月24日到达马尼拉时说:“上海受到恐怖和暴力的控制。”

日军屡次肆无忌惮的抢劫及暴力行为,已被许多外国人记录下来。

《真理报》1938年2月25日

① 音译,俄文原文为“Хуанхучэнь”。

② 音译,俄文原文为“Бьюмонд”。

14. 群众运动的现况与中国共产党 中国人民参加对日抗战

最近3个月,中国人民英勇地参加抗日战争。但是由于国民党害怕群众运动的成长以及对它一连串的限制,以致仍未获得足够的发展。

第一次伟大的中国革命(1925—1927年),培养了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憎恨,特别是对日本帝国主义。尽管在战争中遭受惨痛的牺牲与损害,中国人民绝不向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依然积极参与对日抗战,各地游击战的发展,展现出中国人民反对日本侵略的斗争。

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采取最激烈也最惨无人道的战争方式,企图摧毁中国人的抵抗意志,并灌输对战争恐惧的思想,于是在他们占领的地区放火焚烧民房、残忍地枪决百姓、强暴妇女并抢夺财物。日机到处轰炸中国的百姓,日军害怕百姓参与抗战,及加入游击队,于是放火烧掉整个村庄与城市,并对铁路、公路两侧的百姓扫射,特别是那些可能隐藏中国军队或对日军造成威胁的地方。日军扫射所有留在村庄与城市的居民。例如,在山西省一个拥有3000居民的小城镇,就有超过2000人被杀,其中甚至还有两岁的小孩子。另一个有超过100人的村庄,这里的农民反抗日军对妇女的迫害,日军占领该村后,便把所有的妇女、男子、老人及小孩开肠剖肚,且把他们的尸体放火烧掉。南京沦陷后,日军杀了4万名百姓,中国妇女及少女被强暴是常有的事。日军认为这是合法的行为。抢夺财物也是常见的现象,日军从上海、南京、太原等地掠夺来的财物,整车、整船地运回日本。

其间很多百姓在空袭中被炸死。射杀百姓、强暴妇女、掠夺财物,激起中国人民对日军兽行的憎恨,因此在靠近前线及日军占领地区的百姓,自然采取不同的方式来抗日。

保卫自己祖国的群众活动在全中国发展。国民党企图监控这个活动。但是群众运动已发展到国民党很难对它进行监控的程度,于是国民党自己开始组织群众,让这些群众臣服于其影响力及可以监控。

工人阶级,特别是运输及军事工业的工人,在对日抗战的不同组织中扮演着先锋队的角色。他们不顾危险及牺牲,修复被炸毁的铁路及桥梁,而且持续不断地支持军事运输的行动。

在沦陷区的工人同志,上海、山东、北京及铁路沿线的工人,自动组织游击队并参加群众武器组织……

档案 514,目录 1,卷宗 891,在中国抗日战争的情况: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与任务。

15. 我们的基本方针与动员群众

中国反抗日本侵略的解放战争是防卫性战争,也是革命战争。只有藉由动员全中国人民的方式,才能进行长期的抗战,我们能获得最终的胜利。由此可见,我们视动员、组织及武装群众为战争发展过程中的必要手段。我们最近几个月努力动员敌后广大群众的目标,就是要建立大批的游击队及志愿军。这些广大的组织和武装力量,渐渐成为我们解放战争的一股力量。

从最近几个月的经验来看,虽然动员、组织及武装群众需要耐心、深度和广泛的运作,但是要实现此目的并非不可能。

日军在中国实行疯狂的侵略政策,并在占领区对中国百姓进行野兽般的行为。被日军占领的城市,通常该城一半以上的居民会被歼灭,例如在山西省的一座小城就超过 2 000 个居民被杀。日军采取最残酷的手段对待中国政府的工作人员以及抗日领导者:浇上汽油放火焚烧或是在地上活活把人刺死,甚至连年仅两三岁的小孩子也不能幸免。住屋也被焚毁,年轻女子被强暴,而受害女子不计其数,很多妇女被杀。此外,日军强行将女子送往后方(有一个私人的组织在溧阳^①这个城镇就征召了 3 000 名年轻的妇女)。日军最近在占领区对平民最令人发指的暴行就是在高县^②所做之事。12 月 19 日,日军在东大村强暴中国妇女,引起当地居民的抗议。12 月 20 日,日军逮捕超过 100 人。这些被捕者被铁钩串在一起并被带往树林,然后被倒满汽油活活烧死,之后日军再放火烧毁村庄并离去。这样残暴的行为自然激起中国人民的民族仇恨。如果我们通过这个例子大力宣传,那么我们就不难动员群众了。

要动员群众,组织他们起来进行武装斗争,让男人离家参加游击队,女人给战士洗衣服、进行卫生救护,使广大群众参加维持治安,从事侦

① 音译,俄文原文为“Сооям”。

② 音译,俄文原文为“Каосен”。

查、运输等工作。毫无疑问,所有这些都可以实现,群众一定会响应,只要指派适当的人领导,开展所有这些工作。我们看到,山西的百姓正执行这个艰巨而复杂的任务。

然而为了还要达到提高群众勇敢并积极参与战争的目的,我们应该全面减轻他们的经济负担,降低关税、租金以及债务的比例。

档案 514, 目录 1, 卷宗 893, 任弼时:论山西的抗日战争。

第三部分 意大利报刊报道的南京大屠杀^①

1. 上海陷于火海

由于日军轰炸浦东居民区引起大火——租界遭
受中国炮火袭击——南京军队猛烈反攻——
以五十万大洋赎回传教士

《晚邮报》电讯

上海 9 月 3 日

今天早上,从商务专员办公室面朝外滩的窗户,我看到了自双方冲突以来最为惨烈的炮击。日军试图在黄浦江右岸的浦东登陆,但遭到步枪和机枪的猛烈阻击,11 点左右,又遭到了埋伏在腹地的炮火攻击。中国的炮击异常准确,数次击中日本领事馆、两艘停泊在对岸的驱逐舰、一艘刚刚到达的运输船和“出云”号旗舰。一艘运输船的中等口径火炮被打得鸦雀无声,随后众多伤员被转移到陆地。日本船只以猛烈的炮火反击,造成对岸外滩的公共租界燃起熊熊大火。

可怕的毁坏

在战斗开始时意外地出现在江上的一些舢板和小货船全部被击沉,在公共租界附近区域引起了极大恐慌。可怕的毁坏和灾难性的屠杀使

^① 该部分文献译出后,由刘宇菲、王卫星校订。

得刚刚恢复的尚不顺畅的通航再次停滞,并使上海商业和银行业中心再次变得空无一人。

我们注意到,在战斗的第一阶段,日军飞机没有积极参战,直至下午,当战斗还在震耳欲聋的炮声中继续,大火在浦东渐渐蔓延的时候,日机才出现。

后来才得以了解此次猛烈炮战的缘由。一名中国狙击手和停靠在上海港内的日本船只在没有造成伤害的交火时引起了这次战斗。我还可以证实的是,为了驱逐埋伏在江岸的狙击手,日军派出了一支海军陆战队,但是陆战队员遭到了中国特遣队的机枪射击。

于是陆战队员被召回停靠在港口的一支部队的船上,中国人继续从岸边射击,并开始炮击。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残酷战斗的开始。据统计,日军发射了 500 发炮弹,而飞机则投下了数以千磅的炸弹。

一发炮弹落在离外滩几步远的北平路,炸死两名中国人并炸伤 8 人,其中包括一名欧洲人。另一发炮弹在外滩法租界爆炸,造成另外一些人遇难,一些榴霰弹在《字林西报》报社大楼和位于外滩的英国领事馆爆炸。另一方面,在日本领事馆也有 4 人遇难。

整个浦东处于一片火海之中。浦东位于外滩的江对岸,外滩是靠近上海港码头的一条大道,在这条大道上坐落着众多重要的商业和银行大楼,以及一些领事馆。

在又一悲惨的一天之后,黑夜再次降临,但是通红的火舌吞噬了黑暗,对于所有留在租界的外国人来说,这是一个可怕的噩梦。

早些时候,中国人向上海的日军战线发动了猛烈进攻,攻击了一条长达 25 英里的战线。第一阶段的进攻中国人取得了胜利,据证实,中国人成功地突破了日军战线的 5 处地点。在半夜 12 点(当地时间),日军被迫退到一条长 15 英里的防线。由于成功突破,中国人重新抵达曾经失陷的黄浦江东岸,因此黄浦江的那一部分与外滩被隔离开来。

日军在黄浦江西岸、吴淞以西地区和长江口工业区的南北两侧都收缩了战线。一位日军发言人承认,日军局势十分严峻,而海军司令官长谷川清的一位发言人宣布,日军司令部认为也许不得不修改计划,下令进攻中国平民区。午夜时分,日军飞机在闸北投下捆绑在降落伞上的照

明弹,以照亮整个地区,辨别中国军队的阵地,监视中国军队的动向。

国际社会忧心忡忡。正如刚才所说,刚刚有迹象表明经济活动开始复苏,但由于今天市中心的隆隆炮声又重新陷入瘫痪。美国的亚洲舰队司令雅内尔海军上将,决定让军舰为所有前往上海的美国商船护航。美国人继续从战区撤离。

香港发生骚乱

反日行动扩展到南方。居住在香港的日本人处境十分糟糕。中国恐怖主义者开始抢劫日本商店,英国当局要求日本居民从他们的住所撤离,集中住到由英国保护的特定营地。

终于有了关于传教士马里斯蒂兄弟的一些消息,他们于8月30日在北平被歹徒绑架。可以确认的是,绑匪驻扎在离实施绑架的修道院12英里远的一处地方。绑匪现在向教会勒索高达50万大洋的赎金。将这一要求带到北平的密使报告说,歹徒穿着平民服装,团伙首领及成员都是前满洲大学的学生。

迪诺·迪里南吉

《晚邮报》1937年9月4日

(毕艳红 译)

2. 三千中国人在轰炸中丧生

天皇的郑重声明：新一批日本援军登陆上海

上海 9 月 4 日

昨天令人胆战心惊的轰炸将浦东的居民区夷为平地，中方绝望而猛烈的反攻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日军的阵线，其间双方有数小时的停战。夜晚军队留在原地露营，然而巡逻队之间的交战仍不断持续，机关枪的扫射声不绝于耳。这是一个狂风大作的夜晚，夜空被浦东的熊熊大火映红。令人紧张的几小时停战之后又是新一轮的交战。

战线后方

事实上我们看到，在黎明前的几个小时，增援部队拥上火线，骑着摩托车的传令兵直入指挥部，火炮也被搬运到前线。在他们的观察员看来，从闸北倒塌的房屋、受灾严重的郊区、日本的船只来看，双方的高级官员看清了自己所处的位置。在公共租界各入口处设置的障碍——地面沙袋和拒马——之后，驻地外国人、因交通和工业生产留下来的居民认为，这场战争不会那么严重地威胁他们的生活、损害他们的利益。

与此同时，日军作战得到了新的兵力增援。在刚刚过去的 3 天中，据说日军有 49 辆军用交通工具已经到达部队，军用物资也即将到达闸北对面的虹口区。日军第一批部队在黄埔登陆，在下午的几个小时里，成队的骑兵、3 辆装甲车、12 门火炮也同时到达。这些小分队的目的是切断中国军队到达上海和吴淞之间可以通行车辆的大道交通。

同时，日本军舰已重新开始向浦东一带的中国人开火，其飞机也出现在上海上空，并向靠近北站的中国人密集区投掷炸弹。

战斗仍在继续，大炮的轰鸣声在这座被围困的城市中几乎没有间断过。中日双方相互的口水战、讽刺、造谣也没完没了。日方宣布南京已建立恐怖统治。外交部副部长之妻——一名日本人——被处以死刑。

汪精卫——南京政府行政院长，在就地审判之后被枪决^①，相同的命运还落到其他一些涉嫌亲日的官员身上。逮捕行动仍在继续。

根据中国人的消息，驻扎在蒙古和察哈尔北部的第二师叛变，并宣布支持南京政府。该部已经到达某一位置，以便在中国北方军队的队列中通行。

领事迈出的一步

美国、英国、法国的领事以各自国家海军部的名义发言，向中国市长递交了一份清单，要求其关注公共租界的平民在今日轰炸事件中所遭受的严重损失，与此同时，还对中国和日本的海军指挥部发出抗议，这3位领事要求飞机在租界范围以外执行任务，并要求中国军队撤回到浦东大道的东面和蒋家渡(CiangKaDu)的南面。

但最重要的消息则是在最后一刻从中国内部传来的。在距离上海西北方80公里位于长江边的市镇仪征(ICeng)，3000多居民在8月23日和9月1日的轰炸中遇难。有关这场浩劫的特别消息都于昨晚来自令人尊敬的美国人史密斯(Smith)，他是到达仪征的一个传教士小队的队长。

这位传教士叙述了在城里发生的一幕幕场景是多么可怕。人们几乎被血腥的轰炸吓疯了。他的消息没有得到官方的证实。

中国炮兵的炮击给予日军阵地及日本领事馆造成了众多伤亡。基于这一事实，日本当局也有意将报复的目标指向中国平民。

此外，日本军事当局再次发现对中国这座城市进行扫荡的狙击手们叛变，对日本人反戈一击。日本军事当局将对这些人进行严厉制裁。

帝国的方针

日本的目的——整个帝国都立足于战争

东京9月5日(晨)

日本国会第72次会议开幕，天皇的出席给会议增添了一种特别的

^① 此报道有误。

爱国主义气氛。他发言说：“日本所开展的行动，其目的始终是与中国合作，维持东亚地区的稳定、和平、繁荣，但是中华民国没有理解日本的真正意图，以为这是一种挑衅行为。日本军队表现出了为国捐躯的伟大献身精神和骁勇善战的品质，克服了一切困难。所有这些举动的目的都是为了迫使中国重新考虑建立东亚的和平。我们希望我们的国民都能紧密团结起来，以实现我们所追求的目标。我们已经下令大臣向国会提交法案，要求增加财政预算，并采取在当前局势下迫切需要的其他一些法律措施。我们希望各位先生了解我们的初衷，赞成计划中的措施。”国会议员们认真聆听了天皇的发言。

今天上午，轮到外务大臣广田在国会发言。他肯定了天皇所承认和界定的日本态度：“此刻迫切需要的是对中国采取一种强有力的不妥协态度，以迫使其改变前进的方向。”大臣补充说。

如今整个帝国都立足于战争。人们参与军事动员，同时也动员民间力量——人数众多且享有重权的爱国会，以及大型经济组织：这是一项关于道德和物质力量的巨大工程。该组织由著名爱国民族主义代表 Toyano 领导，并举行了一次会议，强调与德国合作的重要性及欧亚反共势力联合的价值。

在日军的支持下，一个反共自治委员会在察哈尔南部地区成立，可以将其看作是在北平、天津，乃至整个华北南部地区建立类似自治机构的先声。

普通民众也参与到这一波爱国浪潮之中，在街头，在车站，在公开集会上，举行情绪激昂的游行。人们使出了所有的宣传手段：爱国主义电影、广播、大型集会、宣传国家理想的小册子。这是一次令人生畏的游行，也是民众意志和国家统一理念的体现。天皇庄严的话语认同了这些一致的观念。

D. T.

《晚邮报》1937年9月5日

（顾烨 译）

3. 中国战事

上海前线

远东战事开始大约两个月后,局势明显向着有利于日本的方向发展,但无法预测接下来的结果。直到这几天,日本人自己也不认为能够保证在这一长期战争中获胜。但日军在北线和上海前线接连取得的胜利,使其能够在足够广泛的基础上拟定未来的军事行动计划,使之与他们的战略相吻合,最大限度地利用军事和政治优势。

成功突破上海中国军队的防线对日军来说非常重要。日军可以在更稳定的局势中生活和作战,这在前几天还是不可能的。那时他们集结在非常狭窄的区域内,相互之间无法联络,前有中国军队的压力,后有长江。考虑到8月9日虹桥机场事件(一个日本军官和一名海军士兵被中国守卫杀死)后的一系列惨败,以及日本舰队和空军的出现,中国军队的表现已经算得上很出色了。他们之前并没能将现驻上海的日军分散兵力赶入江中,而且由于中国空军和炮兵部队持续炮击和轰炸能力的不足,也未能阻止大约5万装备精良的日军士兵在长江登陆。

在这支重要的分遣部队登陆后,中国军队将毫无疑问地屈服于这支驻扎在狭长战线上令人望而生畏的力量。与这种力量比起来,人数上的优势就没有任何作用了。日军为了扩大其在长江上的火力支援点,并与吴淞地区的兵力会合,继续扩大战线,在大约一星期内没有取得大的进展。日军宣布的大规模进攻被一天天推迟,直到兵力和装甲车的数量都足够对付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

9月13日早上,对上海前线的全面进攻最终开始了,目标主要是江湾的赛马场,旨在尝试从背后进攻中国军队,攻击更南面的在吴淞、宝山和罗店镇附近南京军队的阵地。尽管中国军队英勇抵抗,日军还是取得了这次尝试和对这些阵地猛烈攻击的完胜。日军占领了上海市中心,北至公共租界,迫使中国军队向内陆撤退了6公里。

同时,日军在浏河、宝山和吴淞成功登陆。第二天,日军继续向前推

进,占领了上海——吴淞铁路线以东除江湾居民区以外的所有地区,以及长江南岸至浏河、罗店镇、刘行镇、庙行镇一线。

中国军队的撤退有条不紊,后卫部队没有反击,15日继续向已经事先定好并标出的浏河、嘉定、南翔一线前进。这条防线在日本海军的控制范围之外,中国军队希望它是有效的。

北 线

对上海的占领有着重要的精神和政治价值,但北线仍然是战略意义最重要的战线。在蒙古战区,占领张家口之后,日军继续推进,并进入山西。9月13日,日军占领大同、张家口到包头铁路的重要枢纽,开始孤立中国与苏维埃的蒙古。

在北平和天津战线,在11日占领小城马庄(天津以南50公里)之后,日军于15日早上开始在长达80公里的战线上大举进攻,进攻前线与平汉铁路平行,目标指向保定——河北铁路线上的重要枢纽。这次行动的目的在于调整部队部署,在天津南面阵地和河北西面阵地间消灭中国军队现有的突出部。

轰炸南部沿海地区

尽管上海和北线是战争的主要战场,日军仍然在南部沿海地区发动了小规模的空袭和海上进攻,并将中日战争带入前所未有的新阶段。在南部的攻击目标是广东的一些地区。这些地区遭到日本空军和海军的轰炸,尤其是汕头港,几乎每天都被轰炸。日军在香港东面的大鹏湾快速登陆,并对广东的入海港口虎门炮台进行了轰炸。

同时,日军加紧封锁中国沿海,对中国军队的影响非常重大。

在日内瓦,当12日中国向国联理事会求援时,中国的物资供给更加困难,因为美国中立法严格规定,美国政府决定禁止本国船只向交战国提供武器和军需品。

《国际关系》第38期,1937年9月18日

(钟佳 译)

4. 中国战事

上海前线

在本周的前几天,上海周围的军事行动因为下雨和雾天暂停了下来。下雨使战场变成了沼泽,同时影响了能见度,延缓了部队的行进,阻碍了炮兵部队的行动。

9月18日是1931年满洲事变六周年纪念日,中国空军展开了针对日军在杨浦、虹口阵地和仓库的猛烈轰炸,但遭到了日本空军与炮兵的猛烈反击。据说这次中国多次空袭的结果并不如意,仅造成公共租界中一些外国人地产的损失。从20日起,江湾和罗店镇地区重新开始了激烈的战斗,准备进行猛烈轰炸的日军遇到了仍然顽强的中国军队的抵抗,双方的阵地都没有多大变化。

北 线

如果上海的形势不变,日军在保定的推进将取得重要进展。

15日起沿平汉铁路的大规模进攻在接下来的几天中持续展开。当中国军队在房山周围的山地顽强防御时,日军在激烈的交火后越过拒马河,占领了永定河南岸的牛头镇,并于17日包围了平汉铁路线上的涿州,牵制了留在这座小城以北至房山和良乡的中国军队。这支重要的中国军队(大约4万人),失去了沿铁路线撤退的可能(铁路线在涿州南边不远,被日军占领),情况十分危急,前面和侧翼有获胜的皇军,背后有活跃在山西的突击队。突击队迅速向南方移动,17日到达涞源村,即内长城以西80公里,保定市的西北面。日军利用装甲火车,继续沿铁路线快速向南推进,22日抵达距保定市北边仅几公里的地方。

同时,在19日,日军沿津浦铁路重新开始进攻,向马厂西面推进,猛攻塔城周围大约30公里处的中国军队。在马厂南面,日军继续推进,并于22日占领了沧州。

这场战役最大的战斗,被日本人比作新坦能堡战斗,使日本完全处

于优势地位。中国军队的战斗有极大的价值,但空军、炮兵和机动运输工具的不足阻碍了他们与拥有更先进自动武器和迫击炮的日军的战斗,日军继续在绥远一线推进,22日距绥远城南仅50公里。

这些天日军在中国其他地方展开的无数军事行动中,由于其特殊的重要性,应该提到的是对中华民国首都的多次空袭。

19日,日军飞机两次轰炸南京,但未造成太大破坏。但同时,日本海军指挥官,海军中将长谷川通知领事团,从21日星期二中午起,日本空军将对南京进行猛烈轰炸,旨在毁灭南京,尽快结束战争。

尽管美国和英国对东京提出了对这一轰炸威胁的强烈抗议,并要求外国外交团离开南京,但日军仍于22日对南京实行了三次猛烈轰炸,并在手无寸铁的平民中引起巨大的恐慌,对南京政府和军政部大楼造成巨大破坏。值得注意的是,外国大使馆一致拒绝离开南京,只有美国代表除外,他们显然认为逃命比坚持原则更为重要,于是躲在江上的一艘炮舰上。

《国际关系》第39期,1937年9月25日

(钟佳 译)

5. 中国战事(9月23日—29日)

北 线

根据日军前阶段的胜利,我们可以认为北线的军事行动在进一步扩大。22日晚大城县城陷落,24日保定陷落。装甲火车和机动部队向南推进,使得中国军队在保定战线的抵抗结果悬而未决。如果日军先头部队不给他们喘息之机,中国军队就只能试图在更南的地方抵抗。从石家庄开始的战线,延伸至平汉铁路和太原铁路的交叉点,东至津浦铁路。

毫无疑问,日军在这一地区的胜利具有战略价值,但应该指出的是,中国军队成功避免了大规模阵地战,在较为有序的撤退中没有与日军主力交战,却阻滞了日军的前进,没有造成损失惨重的溃败。

日军沿着其先头部队的主要路线快速南行,却没有足够的兵力维持不断延伸的战线,展开侧翼行动。现在看来,在进攻开始时,日军就没能成功牵制中国军队超过10天左右。因此,当日军还在铁路更南面的时候,不能说是他们消灭了在房山高地顽强抵抗的中国军队。可能这支部队正在从山西平汉铁路右侧的山区撤退。他们在日军后方的出现,即使没有危险,也对日军构成了游击战的威胁。游击战可以有效地使战事拖得更长,并消耗日军在这广阔土地上分散的兵力。

在河北前线,日军已经到达距离山东省境很近的地方。不久就可知省主席韩复榘将军是拒绝将他6万人的军队投入战斗,还是坚持对中国政府的忠诚。因为他被怀疑与日军达成一致。

在山西和绥远,日军和蒙古军队也取得了一些胜利,但没有哪次行动对现在来说更有重要意义。

上海前线

北线日军已进入胜利的阶段。在上海,他们重新开始对中国军队筑有防御工事的阵地展开进攻,旨在拉开中国军队与城市的距离,使其丧失最佳的供给基地,以及国际社会对日本战斗行动强加的限制所造成的

间接优势。

在坏天气带来的局势平静的几天里,重要的人力和物力支援纷纷抵达黄浦江和长江,这明确暗示着一股决定性的力量正在准备之中。

9月28日,进攻全面展开,尤其在闸北地区和江湾的中国军队阵地突出部周围最为激烈。日军炮击了浦东的中国军队阵地,浦东位于黄浦江对岸。在写这篇简短报道时,还没有关于这次军事行动的细节。如果不建立在公平的基础之上,上海战役对于中日战争全局的重要性是不能随意猜测的。

但可以肯定的是,日军在这一战线上的又一完胜,即使很难反映出什么,也将会迅速决定这场战争的命运。

《国际关系》第40期,1937年10月2日

(钟佳 译)

6. 日本的猛烈进攻

对上海重新开始猛烈的进攻

40 个小时的狂轰滥炸——中国战线在罗店镇
被攻破——日军在北部五个省份的中心
马不停蹄地前进(《晚邮报》特别专稿)

上海 10 月 4 日

在持续 40 小时的炮火轰击之后,中国战线从闸北到浏河镇一线犹如陷入地狱之火。日本步兵返回突击上海以北地区,开始了新一轮攻击,以打开通往南京的突破口。事实上大家知道,基于日本枢密院制定的新计划,在上海周围的作战已经不再具有示范性,这种作战在乡村地区占了不小比例,目的是攻取敌人首都。在对闸北区和罗店镇西部的猛烈轰炸之后,日军在黎明时分开始了新的行动,23 架飞机空袭了城市北部居民区,造成严重后果。

日军炮火突然转向阵地后方,日军步兵在三面覆盖有装甲的卡车掩护下向中国军队阵地发起猛攻,双方陷入猛烈的轻武器混战之中。日本兵普遍使用轻机关枪和手榴弹,将攻击的目标直指北站,在尘土飞扬的土堆和废墟间,一步一步攻下了中国军队的阵地。而中国人则怀着满腔怒火英勇抵抗,在乡间,第一次投入使用的新炮台开了火,使得攻击者遭受严重损失,并使日本军队无法继续推进。

于是日军将主要兵力集结在罗店镇以北地区。日本步兵耗费了一整天时间的攻击得到了航空队方面的有力支持,最终以胜利告终。

中国军队阵地被突破

中国军队的防线在罗店镇一线被攻破,中国军队在上海前线持续 8 周的抵抗失败了。凭借机关枪和轻型火炮,中国军队多多少少有条不紊地撤退到了布满碉堡的第二道防线。日军从 10 月 1 日以来已经挺进了 4 公里。中国的新防线从嘉定南(Kiatingnan)至 Hsiang。虽然日军对中

国军队的新防线有所防备,但并没有将其放在眼里,认为这不会严重阻碍日军的进一步推进。

日落之后,日本海军和陆军的其他航空部队开始展开行动,轰炸范围几乎扩展到了中国各大城市,这些城市就这样一步步陷入战火之中。

昨晚日军继续行进直达罗店——刘行镇以西,一支日军的分遣队到达了刘行镇——Sciangai 路以西不足 3 公里处。双方在吴淞的两岸继续展开激烈的战斗。众所周知,北方是由日军控制的,相反,在上海,中国军队拥有数量令人难以置信的机枪,并以此阻击日军贸然渡河。

然而中国的官员们都对战争抱着纯粹的乐观主义态度,声称尽管日本人不惜投入大量人力和各种手段,但不会如愿深入中国内地。为了证实这一判断,有关部门总是说,中国人现在在上海前线奋勇作战,并部署了一条主要战线以抵抗日军,这一战线不仅未遭到破坏,日军甚至还没有到达该防线。中国人夸耀这条战线是极其复杂的万夫莫开的防御工事。说中国人对此过于骄傲也是没有用的。

来自北方前线的最新消息表明,日军在巩固了德州(Teciau)这一新地区之后,再次开始向前推进,一路追击撤退到济南(山东省的省会)方向津浦路一线的中国军队。

日本的先头部队即将抵达距德州 40 英里的禹城(Yucieng)城门,并且将截断中国军队之间的联系。中国军队正在向南撤退,并在京汉线试图阻滞已经占领了慕道口(Mutaokau)的敌军向新陆(Hsinlo)地区继续前进。

与此同时,几天前沿着内长城成功推进到雁门关(Yenmen)的日本部队开始大举进攻平原地区,并向山西省会太原推进。山西王阎锡山几天前就弃城而去,留下民众在无法形容的惊恐中做困兽之斗。

最后,据报道,在绥远省作战的蒙古军今天离首府距离很近。他们从西北部一直前进到了归化(Kueihuan)。

日本空军的英雄主义

今天有一些关于攻占德州的细节。日本步兵部队在配备有火焰喷射器部队的掩护下,从城墙的西北部突入,而先头部队的主力则从南方

包围了主要防线。这些防线是由第 29 军军部选派的部队或由韩复榘将军率领的山东部队驻防的。

当双方激战正酣之际,日本的一名飞行员以不惧任何危险的胆量在敌军阵线之间着陆,以观察战斗的进展情况,在收集了有关中国军队的重要情报后,他又躲过防空炮火的攻击,成功起飞并返回基地。

根据在大同日本前线的消息,日本空军屡次轰炸了太原的机场和其他军事目标,摧毁了机库和大量设备。

日军在北方所有省份继续推进,在日本人看来,这促进了这些省份参与瓦解中国军队的亲日运动,因此考虑让这些省份脱离南京政府,建立自治的政治和行政组织,在东京就不足为奇了。关东军的 Kita 将军前往东京与日本政府就这一问题进行商讨。

D. Tirinnanzi

《晚邮报》1937 年 10 月 5 日

(顾烨 译)

7. 轰炸下的上海

在中国和日本占领地乘坐出租车——对中国和
日本两家新闻办公室的访问——
“出云”号主力舰上的日军高级指挥部

特派通讯员上海报道

上海 10 月 8 日

这是一场最荒谬的战争。人们可以乘坐出租车,舒适而便捷地从自己所在的宾馆到达中国或日本的占领地,在这些占领地,随处可见累叠在一起的尸体。炸弹掀起层层泥土、鲜血、碎肉、咔叽色的破烂制服。在这座国际大都市最大的宾馆之一吃早饭的时候,客人们一边手持叉子悬在空中,一边竖起耳朵聆听着十分临近的隆隆炮声,这些炮声像是要击碎宾馆的玻璃。不断有人在耳边窃窃私语:“在闸北区上空有一架飞机……”或者“在浦东有一门大口径的火炮。”

在距离那些夜间散场的大电影院及娱乐场所几十公里以外的地方(在那些娱乐场所的出口,“出租车女郎”正与一些海军士兵和国际士兵跳舞,他们的双脚都浸泡在由于连续几天下雨而被雨水淹没的这片广袤平原的泥浆中)。那些穿着咔叽色制服的中国苦力和一些不知名的日本农民在大炮的轰击和机关枪的扫射下死亡,他们正在一厘米一厘米地争夺位于郊区的一些房子。

世界各国的记者、报纸和杂志的特派通讯员在一天中连续三次被邀请参加中国和日本两家新闻办公室的发布会,以获取一些官方信息。日本的新闻办公室位于大都会酒店,中国的新闻办公室位于法租界内的上海市长办公室旁边。

在两场新闻发布会上,记者得知的消息是一样的,但是却被以不同的方式诠释着。当日军新闻发言人用手指着地图向我们解释最近几小时的战斗状况时,中国服务员围着桌子,毕恭毕敬地小声向每一个人询问需要喝些什么。

上海市长的茶

上海市长在两个小时之后，一边递给我们茶水，一边脸色苍白地否认了日方的消息。中国记者在日方的新闻发布会上避免发表任何意见，而日本记者却没有参加市长举办的招待会。这种不同寻常的微妙形势让我们感到很意外。

上海是一个和巴黎一样的大都市，它距离黄浦江和长江汇入的海岸50公里。它的核心地带拥有众多的核心商务区、大酒店、大银行，这是公共租界和法租界。这一带是中立区，所有的人在这里通行自由，他们受到意大利、英国、法国和美国的军事保护。唯一的危险就是从紧张而不太专业的飞行员驾驶的飞机上掉落的炸弹，或者向飞机射击的弹雨，或者机关枪的扫射。在公共租界的核心区域，在凯西酒店前方，在“Dogana”号轮船的抛锚处前方（它停靠在黄浦江畔，四周被铁锚链拴着，以保护其免受敌军水雷的袭击）正是日军的“出云”号战舰，它是日军33年前从俄国人手中缴获的主力舰。在它高耸的细长烟囱下，在它层层脱落的油漆外壁中，隐藏着日军高级指挥部的军事机密。在“出云”号上，各路将军、指挥官参考着地图，讨论着战争计划。

每天，中国人都想尽办法试图击破“出云”号的钢铁甲板，但却收效甚微。

在漂浮着很多尸体的江岸一带，又看到一些新的尸体漂浮在江面上。从“出云”号战舰到大海，在黄浦江和长江沿岸，每隔两百米就停靠着一艘日军驱逐舰，舰上的火炮一直指向江岸右侧中国的阵地。在江岸的左侧，载着将军的小汽车畅通无阻地疾驰着，还有一些从办公室出来骑着摩托车的通讯兵。

日军正在有序地从船上卸载梁木、大炮、小车、一卷卷的电缆和电话线，然后运往码头，他们的马被悬吊在吊车上卸下货船。

日军部队登陆

中国的搬运工正在帮日军部队搬运货物，孩子们一直好奇地看着日军部队。在江对岸，埋伏在芦苇丛和战壕里的哨兵正注视着日军的一举一动。很少听到枪声，很少听到阻止日军行动的机关枪扫射声。一整

天,挂着旭日旗的日军船只不停地靠岸、起航,这些船只满载着伤员靠岸,又满载着战略物资起航。新来的部队、武器、战车、军用品不断运抵码头(以下原文不清)。

松井将军——日军上海地区最高统帅,今天发表了一项重要声明。他宣布:日军上海派遣军一到达上海,将会发起强大的攻势。日军的行动首先是为了保护在上海的日本居民和他们被践踏的权利,其次是为了惩罚“南京政府”和“蛮横无理的中国军队”。日军的军事行动意在迫使南京政府放弃它的反日政策,该政策是基于与共产党合作共建东亚和平的基础之上的。

路易吉·巴尔基尼

《晚邮报》1937年10月9日

(潘书文 译)

8. 在中国北方的野战

日军包围了石家庄

南京 10 月 8 日

在中国北方前线，一场新的野战已经打响，战斗双方是驻扎在河北的日军和驻扎在正定(CiengTing)地区守卫石家庄铁路线的中国军队。尽管遭到中国军队的顽强阻击，日军还是成功占领了正定。经过 4 个小时的激烈战斗，他们又粉碎了中国军队的战线，打通了一条正定至太原铁路线以北的通道。

日本的空军为这次战斗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他们轰炸了敌人的后方，摧毁了堆积在石家庄火车站的战略物资。

根据日方消息，石家庄实际上已经被日军包围，很快将落入日军手中。

在日军的左翼也发生了激烈的战斗。在那里，驻扎在山东的日军机械化部队一直前进到人口稠密的禹城，该城距离德州 40 英里，位于通往济南的路上。

正在沿大运河撤退的中国军队将栅栏投入河中，以增加日军行动的难度，掩盖他们的撤退痕迹。但是日本空军十分活跃，他们有计划地轰炸了中国军队，超过 200 艘满载中国军队的船只被炸沉。

在日军的右翼，即太原以北，驻扎在山西的日军部队为了夺取该省省会再一次发起了猛烈进攻。

最后，在长城以北，在绥远到平地泉的途中，蒙古骑兵驱散了来自绥远的中央武装骑兵第二师。

今天，来自日本战争指导部的公告公布了中国上海地区遭受损失的惊人数据：从 8 月 22 日到 10 月 5 日，在日军占领区域死亡的中国人达到 56 767 人，日军缴获了 482 挺机关枪和 3 147 支步枪。但是，他们还在继续释放被抓捕的囚犯，只扣留了 500 名军官和士官。

就在今天，粤汉铁路再次遭到日军飞机的轰炸，他们还向广州郊区

投掷了一定数量的炸弹。

I. 德拉·佩德拉(I. Della Pietra)

《晚邮报》1937年10月9日

(潘书文 译)

9. 日本决定抵制他国操纵“民主”

东京召开内阁会议——今天，
日本外务省将明确日本立场

东京 10 月 8 日

华盛顿政府在九国公约会议上支持远东现状的态度受到日本各界的欢迎，但他们还持有绝对的保留意见。今天，日本外务省拒绝发表任何声明，并且宣布明天可能会发表一份公告。作出此项决定的可能是日本内阁……^①

人们猜测，公告将首先试图让其他国家政府理解日本发动此次战争的和平意图，以及其维护远东和平的决心。在政治层面上，人们确信这次九国会议的目的没有别的，正是不公正地压制日本。

今天，由众多成员国组成的小组讨论了挑衅和操纵“民主”的问题，并达成了一项协议。协议认为，需要提前在公告中声明，九国公约和凯洛格公约已经过时，不适用于现状。协议还补充道：如果违反上述公告，违反国将受到惩罚。

今天，公告交给了日本外务省。人们认为，日本政府将拒绝参加一切由华盛顿公约签署国举办的会议，并坚持不受他国干涉，独自处理与中国的问题。

F. M.

《晚邮报》1937 年 10 月 9 日

（潘书文 译）

^① 此处原文不清。

10. 中国战事(10月7日—13日)

北 线

中国军队守卫河北和山东的第二条防线也在日军的压力下崩溃了。9月底,日军没有遇到过多抵抗,就攻占了从保定向东延伸的战线。皇军在攻占了正定附近中国军队前沿阵地的据点后,迅速挺进,并猛攻了石家庄铁路枢纽附近的中国军队阵地。

战斗于10月8日夜在正定前方打响,11日,以中国军队的彻底惨败而告结束。中国军队人数明显多于日军,并构筑有被认为坚不可摧的野外防御工事,并有流向与部队部署平行的河水涨满的滹沱河形成的天然屏障。日军从平汉线左右两边进攻,夜晚越过河流,在石家庄周围重新集结,包围并压制了由南京军队参谋长陈诚将军指挥的20万中国军队。看来,中国军队由于遭到日军的接连打击,又缺少武器装备,所以没有对急速推进的日军进行太多反抗就被包围,或混乱地向南方和山西中部撤退。日军沿石家庄南面的铁路向邢台追击。太原被穿越山西山区的日军突击队和从东面而来的突击队前后夹击,很快落入了日军之手。据说日军将由西向东推进,从平遥至太原以南一线,目标直指山东省会济南。

日军的挺进部队在这个省没有取得像在河北所取得的重大胜利,战场又被泛滥的洪水淹没,但其继续向禹城方向顺利前进。

经过最后15天的战斗,不论是对一流的天然防御阵地的放弃,还是日军对这一战线的瓦解,中国军队在北线战场明显失利了。中国军队最后的希望寄托于黄河保卫战。中国军队为了在尽可能有效抵抗的情况下争取时间,这场战斗将会很快到来。不利的天然屏障和恶劣的天气阻碍了日军的进攻。他们在本月末有可能控制黄河北面和东面的所有地区。

上海前线

日军于上周取得了局部胜利,占领了吴淞河及罗店镇之外的地方,之后,上海周围的军事行动再次陷入停滞状态。据说,日军在拼死抵抗

的中国军队面前并没有取得什么战果。中国军队显示出他们的顽强和比北线军队更充分的战前准备。日军的轰炸并未取得决定性效果,中国军队仍然占据着江湾的突出部,并成功阻止了日军为解决在江湾和闸北区背后的迟滞而试图向南翔推进的行动。中国军队的反攻有效地击退了南翔至嘉定一线的日军,双方的损失都非常大。日军不得不通过增加新兵来加强部队。在我们写这篇报道的时候,日军正进行一次几天前就开始准备的猛烈进攻。其高层指挥官的意图是这次进攻的结果应该是决定性的。

《国际关系》第 42 期,1937 年 10 月 16 日

(钟佳 译)

11. 日军在上海的压倒性胜利

日军火攻进入闸北,中国军队四十支分队
逃向南方,标志着整个防御系统的崩溃

本报特派记者

上海 27 日晚

凌晨 4 点,中国军队开始溃败了。从桥蕙到太仓,逃亡者成群地逃向闸北。日本海军陆战队开始向闸北集结地发起猛攻,并于 5 点占领了北站的行政楼。7 点,由于日机轰炸或者中国军队撤出战斗所造成的大火持续在闸北燃烧。至上午 10 点,闸北区完全被包围,而大火愈烧愈旺,令人惊悚。而后日军全然不顾火势,开始向该区域渗透。

废墟中的旗帜

我经历了日本军队在火灾区域房屋间的进攻。在下级军官的带领下,成批矮小的男人,拿着手中的枪,不紧不慢地还击在城市里被大火所困的中国军队射手。晚上 6 点,闸北完全被日军占领。被困者和收缴的战利品不计其数。

中国军队虽经过激烈的抵抗,城市的北部仍然于今天早上陷落。同时,6 支中国军队的分队抱着减轻日本在闸北一线压力的希望,不顾一切在太仓和前关(KianGuan)地区向日军发起进攻。然而他们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并且损失惨重。大约 10 万人的中国军队在中午之前陆续向苏州地区转移,旨在与日军尽可能远地保持距离。城市里满是逃亡者,但是至今仍然未发现在由国际军队机枪严防的租界地发生武装越界行为。

中国 40 支部队在上海前线地区沿苏州河向南撤退,重演了 1932 年的军事行动。日军继续沿着京沪铁路前进,在黄昏的时候到达南沙地区,而中国军队的抵抗仍在继续。

前线从今天早上开始进入战斗状态。以摩托车和骑兵为单位的日

军紧追逃亡者。被占领的村庄成了日本军队激烈战斗之处。在成片的废墟上,日军插上了他们的国旗。在闸北充满硝烟和火焰的建筑中,也可以看到日本国旗。日军的胜利是压倒性的。

中国的新战线

中国军队撤退的新路线,由上海的闸北出发,先经过嘉定(KiangChian)方向的真如,然后转向小南翔的西北方,再经过广福(KwanFu),沿特桥镇(TegChiaoChen)的西北面,最后到浏河以北地区。这是一条沿长江而形成的线路,并且经过中国的农村,由苏州河到达上海的周边区域。

根据中方的推断,所谓的防御线路有这些层面的优势:远离日本军队海上大炮的射程范围,并且真正的前线被大大地缩短了。中国军队已经决定严密守卫这第二条比他们所失去的第一条战线好得多的路线。

在闸北,在被包围的四行仓库大楼里,500名中国军人被日本军和大火所围困。他们高喊着宁愿全部战死也不愿意投降。他们拒绝了英国军队为他们提供的帮助,请他们解除武装进入公共租界以获得救援。他们询问了所有还活着的人,以这些人来守卫至少一个星期。他们的机关枪就架在由水泥建造的坚固的大楼窗户上。这些大楼今天晚上估计会被周围住宅区的大火所包围。到今晚8点不会有新的情况出现。日本军队只是在大楼周围设置了由哨兵组成的警戒线。

空袭

今天晚上,中国飞机对城市进行了三次空袭,但是被日本的防空部队所击退。三次空袭分别发生在凌晨1点、2点和3点。上海的天空又一次像被子弹的红光画上了线条。在最后一次空袭中,如雨点般坠落的防空弹落在了居民区,包括我们的住宅区,造成了无数的死亡者。安东尼奥·帕杜拉就在第二条战线上,他在值班的小休息室里被击中,被紧急送到集体寝室。我们的这位同胞在几分钟后由于肺部的严重创伤去世。所有驻守公共租界的国际部队代表都将出席明天举行的

葬礼。我们的大使瞻仰了存放在集体寝室中安东尼奥·帕杜拉的遗体。

桑德罗·桑德利

《新闻报》1937年10月28日

(何佳瑜 译)

12. 在死亡与冷漠中进入上海

“改变航向”，战争的第一个信号——日本海军
舰船在中国射手的眼皮底下平静地航行
——早上轰炸，晚上轰炸

上 海

昨天——我们在离上海大约 200 英里处——一艘英国战舰（可以清楚地看到绘制在保护船尾免受日晒的篷布上的巨大英国国旗）摇晃着在地平线处停泊，然后通过无线电让我们靠近。该舰想让我们近距离直接看到信号，而不愿意发射到空中，让所有人都知道。“安德烈·勒庞”号在绿水中留下一道弧形的航迹，靠近了英国战舰。船长看到英国战舰桅杆上升起了信号旗，意思是：请你们改变航向。于是我们改变了航向。这是战争的第一个信号。也许是为了避开布雷区，也许是为了躲避空袭。英国人没有解释。

今天早上，上海附近天气很冷。水变成了类似于奶茶颜色的黄泥汤。天下着毛毛细雨。我们凌晨进入长江，沿长江而上。我们只知道在一条江中，在望远镜中从一边看到另一边，只能看到两条黑线状的陆地。船上有几家最近几周到香港避难的上海人，他们现在返回上海，宁愿冒着被手榴弹炸到的危险，也不愿意在英国殖民地感染霍乱。很多人离开了位于郊区的小别墅，他们通过报纸上复杂的消息，在欧洲语言中难免会出现汉语拼写错误的报道中，试图了解自己的房子是否仍然存在。到处都是奇怪的传闻。一位俄国老人摇晃着脑袋，向所有人保证上海已经被夷为了平地。“爆炸，我一点都不害怕……”他带着一种见过所有战争中各种爆炸场面的神情说道。一些可怕的照片在人们中传看，堆积如山的腐烂尸体，中国人粗心地将空袭遇难者的尸体遗弃在公共租界中心、华懋饭店门口、爱德华七世大街、最拥挤的十字路口，在那里，由于爆炸，同时死了 1 200 人。一些英国老妇人摇着头说：“这些日本人……这些日本人。”

在黄浦江上

“安德烈·勒庞”号沿江缓缓而上,而船上的一些人早已站起来数小时,眼睛一直朝船头看,朝上海方向看。约莫一个多小时后,我们遇到了第一艘日本运输船,这是一艘军用运输船:一艘外壳油漆剥落的旧货船,曾在日本各岛屿间做短距离沿海航行,现在装满了切割好并用链条捆好的木料和穿着黄褐色衣服的男人,他们聚集在船舷看着我们经过。高处飘着皇军的旗帜:红色的太阳及光芒。看不到其他船只。长江口就像一片黄色水的沙漠。在世界第二大港口的上海港,从几天前开始,只有意大利、法国和日本船只进入。英美船只担心卷入可怕的国际麻烦之中,几个月前已经不再停靠上海港了。连法国和意大利船只也不再沿长江而上,不再向右航行。从大洋上来的那些远洋船只沿那条浑浊地穿上海城而过的黄浦江,停靠在距上海约30英里的吴淞。在吴淞,远洋船只上的旅客、行李和货物卸载到一艘军舰上,然后由军舰将其运到城里。黄浦江最后一段距离是最危险的,因为这一江段是日军和中国军队的阵地分界线,黄浦江上经常有子弹穿梭,并不时地被手榴弹炸起水花。只有日本人驾驶着他们锈迹斑斑的货船,沿长江而上,进入黄浦江,若无其事地停靠在被他们占领区域的码头,卸载货物。

我们换乘到“迪蒙·迪尔维尔”号上,那是一艘涂成奶油色的小艇,就像一艘快艇,在船头和船尾各有两门火炮,这艘小艇把我们带进城里。商人们坐在行李上,摇着头:“什么也不剩了。哪些新建码头呢?只剩下一片废墟。”船上有裹着玫瑰色头巾的印度人、穿着西装,脸颊光滑无须就像木头雕刻一般的中国人、穿着旧时长袍的中国人、胡须及胸的传教士,还有用挥动左手代表日军、挥动右手代表中国军队来解释战斗的人。

平静的敌人

沿江缓缓而上,日军的物资逐渐多了起来,很多船上装满了马和骡子,或者被雨水泡烂的稻草和箱子。那些穿着黄褐色衣服的男人们,胳膊肘靠在船舷上,好奇地看着我们快速经过,但没有跟我们打招呼。有些船已经靠岸了,用缆绳将船绑在码头上,一些矮小的士兵卸下小车、成卷的电话线和铁丝网,然后将这些物资整齐地摆放在芦席或竹子编织

的围栏里。每个人都很平静,有条不紊,没有一丝着急的神情。船上有些旅客非常紧张地看着渐渐靠近的中国江岸。可能他们不会开枪射击,可能他们会让敌人毫发无损地完成所有工作?随时可能发生爆炸,将破旧的船壳炸穿,掀起漫天的泥浆、木材和人的肢体,马匹也将会受惊奔入田野。但周围十分平静,没有射击,连一声枪响都没有。日本人不时地停下工作,将拳头放在体侧,看着我们经过。他们的脸上出奇的平静。“迪蒙·迪尔维尔”号上的中国人看着他们的敌人,什么话也没说。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建立在第一线的军事远征基地。

我们进入了支流——黄浦江,两岸静得可怕。日军那边,奇形怪状的工厂被手榴弹炸毁焚烧,残垣断壁竖向天空。手榴弹在沿江的道行树上留下了千疮百孔。几个月前,日军光脚在泥泞的黄浦江中下船,将步枪和子弹盒高高举过头顶,他们一登陆就开始战斗,而湍急的江流将死伤者冲向大海。江两岸仍然可见当时为了防御近在咫尺的敌人而构筑的战壕,而现在则空空如也,还可以见到用芦席和石头围砌的泥坑,这是一些防御工事,士兵们就躲在防御工事后面,匍匐在地,用一只手在周围匍匐前进,另一只手则拿着枪。

日军运输车源源不断地开过去,最前面的是美国产的小汽车,在散热器上插着红白小旗,小汽车里也许坐的是上校。后面是骑着长鬃短脖马匹的下级军官和一长串小车。没有这些小车,日本人在中国无法打仗。每匹马都有一个人牵着缰绳。有些马车的形状像半只浮桥船,当需要渡过一条河流时,士兵就把这些马车卸下,拆卸开,把它们一个连一个地浮在水面上,从而可以让其他人从上面通过。队伍最后是备用马匹,矮小的男人牵着矮小的马匹,排着队,缓慢而平静地行进。

“出云”号战火中逃脱

战舰。原本停泊在遥远港湾的小型灰色驱逐舰,带着旧式的高耸烟囱驶向中国海岸,然后越来越近,只有两百米远了。干净而又有些破旧的驱逐舰一艘接着一艘。雨中,船员的衣物挂在船尾。士官们将制服领口的扣子敞开,帽子挂在脖子上,看着“迪蒙·迪尔维尔”号经过。有人不时地用口哨或军号向我们打招呼,还有四五个船员笔直地站在甲板

上。接受致意的“迪蒙·迪尔维尔”号是一艘威力巨大的战舰。可以听到远处炮声怒吼,爆炸声撕裂大地。在离江岸几米远的英美码头的一个临时场地,日军飞机朝着乌云密布的天空飞去。

中国人呢?我们听到在离船尾几米远处有步枪齐射的声音,子弹在水面呼啸而过。射击手利用法国船只经过的机会,埋伏在岸边高高的草丛中射击。一个男中音对其回以猛烈的机枪扫射。在一艘驱逐舰上,一名军官手插在口袋里,命令开火,一名水手正在射击,而其他人员则观察射击的效果,并且没有隐蔽。十几个土黄色的身影,是中国人,从高高的草丛中逃走消失了。

天下着雨。外滩的摩天大楼,沿江曲折大路旁的宾馆、银行和俱乐部,都是用灰色石头建成的,是那种如雾如烟如雨一般颜色的石灰石,这些石头是构成盎格鲁撒克逊金融体面的石头,是建成帕尔摩街和第五大道的石头,所有这些都在黄浦江的拐弯处呈现在我们面前。在这些建筑前面的江上是一片战舰。在江的另一边,即浦东的岸边,到处都是瓦砾堆、烧毁的顶棚金属架、没了屋顶的房子。浦东是中方控制的,每天下午和晚上都遭到轰炸。外滩是公共的,在守卫队的刺刀和沙袋保护下,生活平静地持续着。

江中停泊着灰色的古老的熨斗式的“出云”号巡洋舰,它曾参加过对马海战。舰上驻扎着日军高级司令部。隐蔽在浦东废墟中的中国人试图击沉这艘战舰。

本来应该落在“出云”号上的空投炸弹,却炸毁了“胡佛”号的甲板,炸弹从楼顶穿过,炸穿了华懋饭店的看台棚。不久前,一艘中国快艇靠近“出云”号,向其发射鱼雷,但是瞄准失误,鱼雷钻进了水泥构筑的码头。船员看到寻找他的望远镜反射的光,吓得放弃快艇,跳入水中逃生。日本人第二天早上找到了这艘快艇。几天后,一群苦力、志愿者,游到保护巡洋舰的铁丝网,并安置了一枚由地面控制引爆的水雷。但是手里拿着电子控制器躲在掩体后面等待信号的人等得不耐烦了,出了点问题。本应该等到志愿者发出安全信号,但他们只等了几分钟,几分钟后,他们按下了开关。当爆炸时,水雷离“出云”号巡洋舰还有两百米的距离,缠在了铁链上。水雷炸起了巨大的水柱、泥浆和人的肢体。

“出云”号巡洋舰上的排炮彻夜炮击，隆隆炮声一直传到华懋饭店，而那里歌舞升平。这几天，一个新的乐队正在庆祝宾馆重新开业。

路易吉·巴尔基尼

《晚邮报》1937年11月2日

（毕艳红 译）

13. 日军包围圈紧逼上海

中国的富庶之地将与首都南京隔离
英国的银行守护着南京城内一些豪门显贵的财产，
因此一项守护和平、拯救银行存款的运动开始了

特派通讯员

上海 11 月 5 日

这座国际化城市将会变成什么呢？日军刚刚完全封锁上海，使其处在战壕和孤立圈内，至少根据松井将军为结束战斗所确定的日期来看，交通如今已中断了 4 天。

今天，雨后的阳光普照。在满是硝烟的草丛中的机关枪掩护下，日军正在苏州河上架设桥梁，以便运输重型火炮、坦克和卡车。

日军的前哨声称，沿着乡村的小道向西，他们已经看到中国军队正向那条神秘的“兴登堡防线^①”撤退，该防线是由一连串水泥构筑的坚固的战壕和交通壕构成的，位于京沪线距离上海 50 多公里处。在那里，中国军队将要组织艰难的防守。

上海目前正处在战争的最后时期。当女士们谈论着地面上的沙袋和桥头时，她们的谈话总是被断断续续的爆炸声打断，如同十字镐的巨大冲击力把建筑物震得摇摇晃晃。

不久后，战争将悄然离去，没有人会记得上海要被割离出中国。上海存在的理由是在其身后有四万万中国人。南京政府也将继续存在。上海北部和西北部的军队还在作战，因为在公共租界当局的保护下，在意大利、法国、英国和美国士兵的保护下，少数家庭正小心翼翼地藏匿着他们的财富：价值几百万的金锭、英镑或美元信贷。

中国的金融家们掌控着整个局势，包括这个或那个由他们所掌控的

^① 指沪嘉国防工事。

政治人物,或许还有那些用金钱收买的军阀,那些金融家的名字一看便不言自明。

在现代中国,大型采矿、铁路、港口、银行和进出口业务,都集中在几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而且多年来人们一直在寻求能够保护他们的法律,以抵御战争时期抢劫的警察,保障安全。

在前些天,预料到政府要逃往内地后,整个蒋氏家族已经派遣装甲火车向外滩的英国大银行运送了数百万美元的黄金。

中国最珍贵、最值钱的东西现在都运往英国银行。日军即将完全切断这座巨大的金钱坦克和内地之间的联系,贸易已不再可能,汽油和棉花制成品的销售也已停顿,接着,每天的丝织品和黄金交易也将停顿。

最近几天,在中国金融家之间引起了不小的骚动,他们对总体形势不满并略有担忧,他们想迫使南京政府实现体面的和平。在蒋介石的随从中也形成了亲日派,他们惊恐地看到日本武力的无情崛起,尽管事先做了大量的宣传,数以万计的人与日军抗争,但牺牲还是惨烈无比。

出于国内原因和保持国家的信誉,蒋介石不能接受更为有利的和平条件。他的妻子,著名的蒋夫人,毕业于一所美国的新教大学,是位亲英派人士,也是国际联盟和坎特伯雷大主教狂热的朋友,她也认为要坚持继续作战。

在未来几天内,到底是金融家们会取得胜利,还是宋霭龄女士?(她是中国最富有的男人孔祥熙的夫人,宋美龄的姐姐,她声称应该让其妹夫保持权力。)

路易吉·巴尔基尼

日军在上海南部的新一轮登陆

上海 11 月 5 日

1 000 多名日本兵今天早晨越过位于公共租界边界西边 4 英里处的苏州河,他们必须赶走在浦东设防中国军,并将与越来越多的日军联合行动。这些日军从上海南部杭州湾的金山卫和浙江登陆。

日本对此次登陆行动仍然保持绝对沉默,但人们认为登陆部队来自中国北方。他们将在烟幕的掩护下登陆……

日本最高指挥部指出,20 000 多名日军已经位于苏州河以南,这次行动要迫使中国方面撤离南市。中国和日本今天签署了相关协议,划定了在那里的非军事区。

日军先头部队迅速包围了山西。两支主力部队将从北面 and 东面进军太原。位于太原东南方 40 公里的榆次县城,昨天又被来自河北的部队占领,同时,从北面而来的日军部队已到达太原以北 16 公里处。据来自日方的消息,中国军队已经开始撤离太原,向南无序撤退。

据最新报道,日军已经到达太原城墙外。

人们现在可以认为,北方 5 省的所有铁路均已处在日本人的绝对控制之下。

来自满洲的消息证实,最近几天,沿西伯利亚边境,在满洲和蒙古一带日军又有其他行动。根据某些资料,300 000 日本军队正集中在毗邻齐齐哈尔和哈尔滨的地区。有消息称,中国政府将调动蒙古部队,从北面威胁绥远和山西的日军。

D. T.

《晚邮报》1937 年 11 月 6 日
(潘书文 译)

14. 上海完全落入日本人手中

松井将军遵守了他的诺言，中国人被迫放弃最后的防线。成千上万的战败者和难民进入租界寻求庇护，只有一小股部队仍然在南市抵抗

本社特派员报道

上海 11 月 9 日

在上海指挥日军作战的松井将军遵守了他的诺言。他之前说将在 10 天之内将上海从中国军队手中解放出来。在第十天的凌晨，日军向上海发动了最后的进攻，中国军队放弃了最后的防线，最近几个星期刚构筑的战壕和铁丝网被炮火炸毁。

这座远东的大都市已经完全被矮小的日本步兵包围了，本日旗在各个角落飘扬，所有与南京的联系都已中断。

中国经济和政治的主要领导人都待在这座国际化城市里，被外面的世界排除在外。上海，这个中国真正的首都，已经完全被占领军控制，日本的胜利已经指日可待。

撤退和转移

当日军的先头部队占领虹桥机场时，中方已经完成了从苏州河地区及南市的撤退。正如外国军队观察到的那样，撤退是有序进行的。当发现日军即将进攻的一些迹象后，沪杭铁路沿线的驻军也撤离了。

日本军队占领了淞江和南翔之间的江桥(KiangKiao)，正在向烧毁房屋撤退的中国军队继续施压。黄埔江以南被日军占领的战线又增加了金山。由南市撤退的中国部队集结在沪杭铁路线上的龙华地区，很明显是为了和其他撤退部队会合。人们远远地看到，南市附近燃起了大火。

难民的数量逐日增加。很多难民出现在法租界的边界上，受到警察和军队的阻拦。法租界与南市间由铁丝网和栅栏隔开。今天一整天，成

千上万的难民拉着堆满桌子、箱子、鸟笼和篮子的板车及黄包车从这经过。栅栏的另一边,中国军队和警察仍然整齐列队站着。他们穿着制服,佩带着毛瑟手枪,肩上背着步枪,似乎敌人还离他们很远。高空中的日本战机几乎垂直俯冲向其目标——埋伏着最后的抵抗军的大型仓库——然后在离地面仅10多米处投掷炸弹,空中升腾起浓烟及大量碎砾和尘土,人们四处逃散。没有什么比中国人在逃跑时表现出的从容更奇怪的了:每个人的脸上都很平静,甚至兴致勃勃。小孩子们在大人的腿和平板车的轮子间来回奔跑,好像他们是要去郊游。严肃和担忧的表情只呈现在年轻母亲的脸上,她们紧紧地抱着自己怀里的孩子。

可以说没有一件家具,没有一块破布和旧衣服,没有一个袋子或者报纸被丢弃。因为这些家庭可以把所有的东西背在肩上,放在黄包车、板车、篷车和自行车上。男人们背上背着柜子,女人们怀里抱着柴火、酒坛和被褥。

在城市的另一边,教会人员收容了几百名因为乡村被战火摧毁而逃出来的难民。一些家庭离开上海回到自己的村庄,但是又不得不带着家当再次逃难,因为这些村庄已经被日本人占领了。一位留着胡子年长的基督徒说:“这些中国人去重建他们的家园,他们习惯于平静地面对这一切,没有慌乱。他们可能会遇到没有爆炸的手榴弹,但他们不会丧失灵魂。”

国际大都市的警报

在法租界里,高大的塞内加尔人在抽香烟的同时,不远处的步枪正一字排开:这一区域的防守变得没有那么困难了。在法租界的其他地方,中国军队仍陷于包围之中,疲劳而衣衫褴褛、饥肠辘辘的士兵寻求庇护和救援。警察解除了他们的武装,放他们进来。他们在人行道上吃东西和睡觉,而中国老百姓就在一旁平静地看着他们。今天从凌晨到黄昏已经有上千人进入了这里。

今天晚上,上海市市长举行了最后一次新闻发布会:从今往后,他将没有城市可管,也没有消息可以发布了,因为战争已经大大超出了他的权力范围。俞市长住在法租界内,远离大炮的轰鸣和子弹的呼啸,并远

离日本士兵。尽管局势如此,但他仍然乐观和勇敢。他向在场的记者讲述了一个故事:“从前有个很有钱的老头遭遇破产,他的朋友们去安慰他,他笑着说:我还有一个让我幸福的妻子。不久之后,他的妻子去世了,他又向朋友说:我还是几个让我感到幸福的孩子的父亲。他的孩子们一个接一个地因病去世,他仍向朋友说:他还有非常健康的身体。他生了重病后,朋友们来看他,他躺在床上看着他们笑了,这次他说:幸运的是上帝给我留下了两颗牙齿,一颗在上,一颗在下,它们可以碰到。”这就是俞市长。几个星期前,记者们就已经认识他了——一座大城市的市长。每天晚上,上海都要失去一块土地,先是这块,然后是那块。今天晚上,上海只剩下南市几平方公里的土地,这块地方目前仍由中国军队驻守,日军还未到达。

财政状况并不如市长那么乐观,今天上海的银行全部关闭,其币值也无人知晓。政府储存的黄金和白银被存入南京银行或汇往国外。或许日本人会像在已控制的地区所做的那样,强迫所有人接受日元。所有的股票证券都暴跌,美国的百万富翁将可能受到威胁:一辈子的工作,存款,财产,工业,在几小时之内化为乌有。

几位重要的英国商人已经表明,今天将是上海这座金融大都市结束的日子。他们中的一位悲观地预计说:“将来的某一天,中国家庭可能会搬进已经空无一人的国泰大酒店居住。”

有钱有势的中国人已经开始撤离,他们中的一些人设法进入了法租界,在这里,日本人没有任何特权。因此这里被看作是国际化的城市。另外一些人昨天已经悄悄地上船,今天将前往香港。

路易吉·巴尔基尼

孤立无援的中国军队 仍然必须在浦东进行抵抗

上海 11 月 9 日

有消息称,当中国的大部队向西撤退的时候,几千名中国士兵仍然在黄浦江对岸的浦东地区进行抵抗。许多人在想,他们是否愿意像他们的战友那样,在闸北的洲际银行大楼里躲藏几天。

这些士兵并不知道他们已经孤立无援了,与其联系的部队并没有告诉浦东的指挥官大部队要撤退的决定。大多数人认为在浦东的中国士兵不会超过 15 000 人,有些人认为只有 10 000 人,不过这一数字并不十分可靠。日本人并没有受这一事件的影响,他们仍然在有条不紊地准备进攻。

目前还存在一种可能性,这些孤立无援的士兵可以从敌人手里逃出去。要做到这一点,他们必须渡过黄浦江,先向南走再向西走,然后再渡过黄浦江,一直朝西走可以遇到保卫上海的一支中国军队。

另一方观点认为,中方指挥部集结了精心选拔的两万名士兵,驻扎在法租界的南部边界和苏州河之间,希望以他们来进行大规模反攻。

同时,有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中方已计划设立一道新的防线,他们将在公共租界以西 30 公里的区域进行防守。

日本军队可能已经在这一条新防线完全设立好之前渗透进来了,而中国军队这次必须撤退到青浦以西的地方。日本军队威胁说将全面包围这一防线,这也迫使中国军队不得不撤退。

D. T.

《晚邮报》1937 年 11 月 10 日

(刘宇菲 译)

15. 日本对租界的企图

——松井将军的宣言

上海 11 日晚

在居民区中国的简陋学校中小小的正方形破旧教室里,上海日军总司令官松井石根将军今天早上召集了各媒体,并向其宣布了主要关于“安民”和“租界”的重要宣言。

对他提出的关于需要多长时间占领南京的问题,日本将军没有就是否前往南京回答提问,而是反复表明,对于类似这样的问题,询问中国的总司令将更为合适。他认为由于在钱塘江和更西面的区域还有一部分有实力的中国军队,所以大致需要一个月的时间在上海周围地区恢复“平静”。

就向他提出的日本是否应该捍卫在上海的新局面和新领域,并在可能的情况下考虑建立一个日本租界的问题,这位日本将军就像回答任何牵涉到政治方面的问题一样,表明无可置评的立场,但是他向各位记者提供了推断事实的某些依据。将军非常明确地表明了他对“安民”问题是如何考虑的,并且也涉及到当今形势下“租界”的问题。“由于目前上海复杂的国际关系”,他强调说,“撇开日本不谈,我已做好了努力同其他政治力量代表合作的准备。到目前为止,我离开日本已经两个半月了。目前的情况已经有所改变。伦敦、华盛顿、巴黎、布鲁塞尔和其他在上海的政治当局都让我很失望。因为恐怕我不能实现预定的同这些当局的‘合作’。这对维护世界和平似乎不利,但是如果这些力量的政治态度维持现状,由于军事行动需要的原因,我只能采取这种做法。”

关于政治力量是否指在上海的代表,将军回答这肯定存在区别,但是拒绝解释细节。而就为了“安民”,当局应该采取的措施问题,将军这样说,大家应该相信日本并不是一个侵略者,日本进入中国是为了拯救、援助、解放中国人民。

关于是否在安民区存在军事行动的问题,松井将军回答说:

“你们难道不认为军事行动已经在安民区、在河流的另一边展开了？这些行动在安民区已经在进行了。对于我来说，河流的北岸和南岸地区都没有区别（尽管作为‘安民区’的一部分，特别是越过长江的日本居民住宅区，苏州河被当作‘安民区’和军事区的分界线。在南岸部署着国际武装力量），我不能因为中间有河流而把两个地区区别开来。”

对于记者坚持的什么样的措施在“难民区”会被采用及其原因的问题，将军表示，在上海地区，除了中国士兵之外，还有许多平民武装。

.....

《新闻报》1937年11月12日

（何佳瑜 译）

16. 五十万中国人进入南京

南京政府的军队在中国官员面前被击溃了——
仅昨天早上就死了两万人

本报特派员报道

上海 11 月 16 日

再也没有前线了，再也没有中国阵地了，什么都没有了。日军在长江岸边的登陆扰乱了中国军队从上海的撤退，并扰乱了中国军队构筑工事、整编部队，以及与第二线阵地的联系。

日军各师团向城内进军，他们不知疲惫地截断了敌人的退路。他们步行前进，没有等待马匹、帐篷或者汽车。中国军队此时还是分散的、没有组织的，只有一个师的几个小队在这里，另外远一点的地方还有一个营，他们和其他部队没有联系，也不知道敌人的前进情况。

最近几天，数百艘日军登陆艇，以及小渔船在杭州湾登陆。日军越过河网与湖沼，到达了上海的背后，并占领了重要据点，打乱了中国军队的防御体系。如同渔夫一般的士兵半裸着，用一块破布围在腰间，头上围一条头巾。军官们指挥着年轻的步兵，这些步兵在整个旅途中都穿着土黄色的军服。他们来到乡村，而在此之前人们仅能听到遥远的枪炮声，并只能从报纸上看到中国军队胜利的消息。如今，载有日本兵，并插有白底旭日旗的小船的到来，令民众感到恐惧。

有一小部分中国人没有抵抗就投降了。中国军队的后方以及与南京的联系都是极度混乱的。日军出其不意地登陆、出兵和进攻，使首都几乎完全与其军队分离开来。唯一的一条可以撤退的道路是穿过湖沼的道路。在这里，这段时间有 50 万中国人试图在混乱的军队、战车、马匹、汽车和炮弹中寻找生路。

昨天一整天和今天一整天轰炸都在进行。仅仅今天早晨可能就有超过两万名中国人死亡。日本海军准备向长江进发，并准备排除江上的阻碍物。

上海的战斗已经到了没有清晰战线的阶段。已经无法按照地图上的攻防路线来进行战斗部署。

日军指挥部的大胆攻击持续进行。他们什么都敢做,向这里或那里的目标进行突袭,并派遣载有部队的渔船在小河里向岸边扫射,以此来扰乱恐吓敌方军队。中国人总有最快的撤退路线,他们可以脱掉军装,把步枪藏在灌木丛里,穿上苦力的衣服,装作好像从来没当过兵似的。

日军说很多个师的士兵都是用这样的方法乔装打扮,并且消失在军官的眼皮底下的。

路易吉·巴尔基尼

中国政府迁往汉口

上海 11 月 16 日

面对来自上海日军不断进攻的威胁,中国政府决定撤离南京并将政府迁往内地。当日军还在不断进攻,战斗正在激烈进行的时候,此次撤离行动就已经开始了。中国中央政府把中央办公机构由南京迁到汉口,国家经济委员会迁到长沙,其他机构将设在四川省重庆市。这次迁移很明显是因为担心南京随时会因为日军的进攻包围而陷入孤立的局面决定的。不过最高统帅蒋介石很可能决定留在南京,亲自率领他的部队进行最后的抵抗。

最后时刻,许多国家的大使馆今天也把他们的同胞撤出南京,另外一些国家的使馆也将在近日撤离人员。

D. T.

《晚邮报》1937 年 11 月 17 日

(刘宇菲 译)

17. 盟军^①向中国首都进军

上海 11 月 17 日

从北面的长江到南面的杭州湾,是一个巨大的泥沙冲击而成的三角洲,其间河流、运河密布,皆注入大型湖泊。十几天前,日军乘 40 艘舰船从三角洲南部登陆,上周六又有同等数量的船只从北部登陆。

日军的进攻兵分三路:占领上海的 20 万兵力追击向南京方向撤退的敌军;三四十万兵力从右侧……^②

日军的轰炸机在中国人的头顶上盘旋,不再惧怕中国的防空炮火,因为中国人已经没有时间设置阵地、瞄准射击了。每枚炸弹都能准确地命中拥挤在街道上的人群,死尸堆积如山,逃命的人群只能从上面爬过去。在昆山,日军今日刚抵达就有 5 000 名中国人在他们手中丧命,其中包括 1 名将军和 3 名上校,他们均在空袭中丧生。

逃亡的军队丢弃了武器,从主干道撤退,他们已经顾不上隐蔽和防御敌人的进攻了,成了日军的囊中之物,但蹩脚的日本飞行员需要沉着冷静和良好的能见度才能射击。

这仅仅是个开始。

交错的河网迫使日军分散前进。在杭州湾,日军乘渔船行进,而在长江沿岸则沿着小路步行突进。在日军先头部队和大部队之间经常会潜入一群群逃亡的中国人。有时日军的指挥部无法和他们行进的部队取得联系,因此不得不等待电台架设好后才能知道部队到了何处。

中国军队仍然拼死抵抗,因为他们还不知道前线已经崩溃,某个师距日军的哨兵仅有十几米的距离,但没有任何人察觉。所有的消息都不可靠,因为中国的司令部默不作声,南京的电台也保持沉默。上海的中国官方新闻机构也不了解事态的发展。日军表示他们的指挥部只顾前

① 因意大利与日本签订了反共协定,故称日军为盟军。

② 此处原文不清。

进,没空发布最新事态的详尽报道。

士兵们就地休息,然后继续赶路。

他们对占领地区的名称只略有所知,不确定应该怎样写,因此在地图上找不到相应的地名。

如果未来有人能对这些天发生的事有所了解,将会发现它们是多么奇特、怪诞和不可思议。

《晚邮报》1937年11月18日

(孔倩倩 译)

18. 中国战事(11月18日—24日)

上海前线

在日军上周于杭州湾登陆后,中国人加速从所谓兴登堡防线向苏州方向撤退,之后日本人攻击了中国在福山和常熟的两大阵地,这两个阵地是中国军事部署的最左翼,日军准备用猛烈的轰炸为步兵前进打开通道。日本战舰也参与了攻击,以确保他们能越过上海附近的障碍,向长江上游前进。19日,中国迅速放弃了被帝国占领的地区,从而使日本人迅速在福山——嘉兴防线上打开了一个缺口,而这一切也注定了苏州的命运。这个重要的城市已经被日军从正面控制,在常熟被攻占后,其又被南下的军队包围。在一场败北的战斗中,守卫苏州显得毫无用处。在这次战斗中,中国军队主力受到重创,给日本人留下了直接向南京进攻的道路。因此中国军队从苏州撤退到西边的锡澄新防线,日本人在19日和20日间攻占了苏州。长江边至无锡境内的锡澄新防线位于太湖北面非常重要的工业中心区,这也可能是南京周围最后的防御线,这些阵地誓死保卫着首都南京。来自东边的中国军队和内地调来大量物资装备的新部队在南京待命。日本是否已经攻击和突破了新防线,暂时还不清楚。11月22日传来的无锡被攻占的消息,次日并没有被证实,但是24日这一消息再次传来。可以确定的是,即使中国顽强抵抗、无锡至江阴的防线尚未被突破,但日本军队在太湖以南对中国军队右侧要塞的包围,也将迅速导致中方战线的崩溃。

太湖北面,中国军队撤退到目前占领的阵地。南部日本军队有节奏地前进,从乍浦出发,攻击杭州湾边的嘉兴,并于20日攻占了嘉兴。日本军队迅速向西推进,次日到达太湖南面的湖州一带,23日与攻占无锡的军队配合,完成了对太湖的包围。即使锡澄防线还能继续抵抗数日,对南京的决定性攻击也为时不远了。因为不能排除日本人拓宽战线,继续向太湖南部前进,矛头指向芜湖——长江沿岸的重要城市,距离南京只有100公里,然后从南面包围南京。如果这个策略被实施并且成功的

话,那么中国可能知道如今很难实现誓死保卫南京的目的,南京阵地也将无法防卫。与此同时,11月24日,日本对南京展开了轰炸,中国方面迅速撤退政府官员、外交人员以及大量市民。

《国际关系》第48期,1937年11月27日

(应超敏 译)

19. 日本军队包围南京

中国人中的反对派对抗共产党煽动者——
据说要在上海建立自治政府

上海 11 月 30 日

今天下午从前线传回的消息显示,日军向中国首都的全面进军在所难免。

众所周知,帝国军队今天早上已经占领了广德。广德是重要的军事中心,位于安徽省,距离太湖西岸仅 70 公里,也是通往南京的交通要道之一。

广德的占领为皇军在这一地区向芜湖扩张开辟了道路。芜湖位于长江沿岸,距离中国首都约 50 公里。^①

沿京沪铁路西进的日军部队已经到达常州。另一部队在占领了位于太湖西岸的丁蜀之后,继续快速向长兴挺进。

距离南京仅 60 公里

在占领常州、宜兴、广德之后,日军事实上已经成功包围了南京。对江阴要塞的占领,让日军的战舰能够溯江而上,到达镇江,并从那里直扑南京。

另据未经证实的消息称,一支日军别动队已经赶到句容,离南京仅 60 公里。首都的陷落已迫在眉睫。

比起不断向首都推进的节节胜利的日军,中国人的抵抗显得松懈而混乱。中方司令部曾徒劳地打算在南京构筑临时防御工事和防线,但日军排山倒海似的推进显然让他们无比震惊。接连的挫败导致中国军队和民众——其中大部分是共产主义宣传者共产党——之间的互不

① 原文如此。

信任。共产党宣传对日本的仇恨,以此煽动对日本的抵抗,但是他们没有表现出原来曾允诺过的那种积极态度,他们制造的只是灾难和毁灭。

从日军占领区传来的消息称,那里已经恢复了秩序和平静。在那里,市民生活又恢复到正常的节奏,这对实施国民思想转变起到了重要作用。

事实上当反日宣传者和共产党谨慎地认为要撤到香港或其他安全地区时,希望尽快恢复和平的人在与日俱增。

与此同时,日本人宣布在苏州河以北的管辖区居住的外国人于12月15日左右可以重新回到住地,但是要服从特别规章管理,这主要是由于前不久这里是军事行动区域,而目前大部分地区已经被摧毁破坏。

美国的抗议

中国人似乎已经完全放弃拯救南京的希望,中国当局已经开始向内地转移南京的艺术品。

先前成立的国际委员会欲在中国首都成立中立区,并于今天宣布已经请求日本当局就上述建议尽快做出决定,而中国人已经对该建议表示同意。

如果日本方面对此不持异议,中立区将包括意大利和美国大使馆,以及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和金陵大学在内。

在上海,今天日本海军官员占领了停靠在法租界码头的“飞艇”号拖船。他们降下美国国旗,换上了日本国旗,并将美国国旗扔入水中。随后他们又将驾驶室外标明该船系美国所有的金属牌拆下,同样扔入水中。此后,装载了日军车辆并搭载了船员的拖船被拖至下游。美国驻沪总领事高斯向日本海军当局提出了强烈抗议。

随后,日军又没收了三艘国籍不明的拖船。

在香港有报道指出,一艘从外观无法准确识别国籍的船只向英国“鹰”号航空母舰搭载的一架军机开火,当时这架飞机正在香港附近进行飞行演习。飞机未被击中,船上所有人员都安然无恙。英国香港基地当局立即展开调查,以确认该船只的国籍。

今天,日方一位发言人就问及下一步在上海成立自治政府消息的可靠性时仅表示,日本方面友善地关注将上海的中国行政机关和企业统一起来,进行自治管理。

D. T.

《晚邮报》1937年12月1日

(毕艳红 译)

20. 逼近南京

日军势力扩展至首都西南方——大量中国市镇被占领

上海 1 日晚

日军越过太湖后,开始大规模占据山区,此山地背面坐落着首都南京。这支军队并非专门用于破击中国防线的,但在数百公里的战线上,其在通往南京的途中,粉碎了各个抵抗据点。

日军分队负责后备支援,包抄敌军,切断敌人退路,整个部队已不再是一支沿铁路线前进的主力军。面对南京古城,既无法单面突击,也很难两面夹击,而是形成了一条半圆形战线,逐渐向首都周边合围——正如我们一直说的那样——在南京一定会发生决定性的战斗。中国人已经无法抵挡日军在中部地区的任何行动。

广德陷落后,日军开始攻占芜湖。芜湖距离广德 80 公里,位于长江南岸,南京西面。日本军队沿着铁路线前进,两天内占领了常熟,之后展开兵力,抵达溧阳至南京的道路,然后沿此路和铁路线周围地带前进,分别占领了陆家铺(LuKiaPu),金坛(SzeTieng)和戴埠镇(TsiPuChen)。戴埠镇离同日被占的溧阳 30 英里。此外,日军于当天还占领了较大的陵口镇。陵口镇是京沪线上重要的铁路中心。该部队目前正向溧阳和丹阳挺进,直逼中国首都,同时也截断了南京与其南部地区的联系。^①

《新闻报》1937 年 12 月 2 日

(袁斐 译)

① 以下原文不清。

21. 日军在南京上空的胜利

13 架苏联制造的飞机被毁—— 日军阅兵式将穿过上海公共租界

上海 12 月 2 日

明天日本人将在上海商业中心举行阅兵式。各远征部队代表将从兆丰宿营地出发,在几个战斗机中队的空中掩护下,向外滩行进。据说日军还将穿过公共租界商业区的几条街道。周六将以不同的路线重复此次显示实力的示威,而这次示威的主要目的是引起中国人的注意。

从英国外交界获悉,上海的英美军队指挥官已经向日军指挥官发出通告,声明对于日军在公共租界游行可能造成的任何事件拒绝承担任何责任。

同时日军缓慢而有条不紊地向南京推进,打败了总是无法控制怒火的中国军队。在开始新一轮大规模进攻之前,日军在先遣部队之后大量集结兵力、装备和大炮。

今天得到消息称,日军部队已经占领距离南京 60 公里的金坛。今天早上,在日军最终占领整个丹阳之前,进行了一场非常激烈的战斗。

6 架日军飞机出其不意地袭击了中国国民政府原址。立刻有三十余架苏联制造的中国飞机起飞,与日军飞机作战,随后是一场非常灵活而又悲壮的战斗,战斗表现出日本飞行员的熟练、勇敢和镇定。中国歼击机徒劳地试图制服灵活可怕的对手,但是他们遭到了日军的打击,10 架飞机被击落。另外 3 架中国轰炸机在机场起飞前就被击中,并在猛烈的爆炸中起火。个别日军飞机也遭到损坏,不管怎样,所有日军飞机都飞回了基地。随后又有一批轰炸机从基地起飞,再次袭击南京。

今天早上不计其数的飞机袭击了广州,轰炸了广州机场,随后又袭击了粤汉铁路,扰乱并破坏了部分路段。

今天中国空军中队空袭了上海和吴淞地区。

从山西省省会太原传来消息称,该地区中国机关和企业的 15 名代

表与日军 10 名代表召开了一次会议,最后一致表决决定,中方将采取积极行动,在太原及周边地区建立广泛的自治政体。

昨天日本驻香港总领事否认了在国际新闻界传播的一则消息,该消息称,日本总领事警告港英当局,由于到香港避难的中国人的缘故,香港可能卷入中日冲突。但是总领事随后又补充说,不得不告知英国当局立刻停止对抗日本船运公司的行动。如果这一行动不停止,“英日关系将会受到影响。”总领事补充说。

D. T.

《晚邮报》1937 年 12 月 3 日

(毕艳红 译)

22. 中国战事(11月15日—12月1日)

此前已经宣布,后来又被否定的无锡失守的消息,在25日早上正式成为事实,日军未遇到激烈抵抗。从无锡开始,日军马不停蹄地沿着距无锡西北40公里的京沪铁路向常州前进,并于30日抵达常州。

在无锡陷落的同时,从无锡到长江防线的其他据点也被突破,然而江阴要塞尽管受到空中和江面的猛烈攻击,却抵抗到了11月30日,这样就拖住了日本海军舰队,以得到足够的时间,在镇江用装满水泥的平底船构筑另一道封锁线。滞留在太湖北面日军防区后方的中国部队尝试袭扰帝国军队的后方,并获得了一些微小的成功。

在太湖南部,虽然日军部队推进的速度要比某些消息所显示的速度慢,然而日军不断前进,并将芜湖作为最后的目标。日军28日到达长兴,30日将抵达距芜湖100公里多一点的安徽省广德。帝国的部队朝着这个方向迅速推进,没有遇到任何抵抗。

太湖北面,日军进逼丹阳,同时中国军队似乎试图抵抗从镇江南下攻击丹阳的日军。迅速撤退阻碍了新防线的组织,节节败退,加上军队士气低落,使中国军队完全不可能取得成功,不管是部分的还是暂时性的。此时,南京已被包围,虽然包围圈还很大,但是正在迅速缩小。虽然中国军队可以防卫城市周边一些日子,但是首都被占领也只是推迟几天。战况将有明显的结果。一旦占领南京,日军将毫无困难地占领浦口——位于长江左岸,这是通向天津的南北铁路的起点站。这样,日军就能轻松将他们的控制区从安徽延伸到黄河北部及江苏(与安徽东部接壤),从背后迅速攻击黄河南部的河南和山东的一些防线。

目前,北方的这些省份陷入一片沉默。11月28日,日本天皇裕仁宣称,山东日军正等待山东省落入他们手里。事实上,11月27日,一位中国将军已经带领他的7000名士兵主动来到不久前被日军占领的潍县(Ueih sien)日本驻军的指挥官面前。同时,在上海,日本人对于中国城市的控制逐渐加强。11月28日,他们接管控制了电报服务以及电台,并设

立了他们的审查机构,以取代中国的新闻审查权。上海海关也渐渐被日本人控制,日本人夺取中国海关船只,在法国租界和公共租界内的黄浦江码头旁设置了检查人员和税收人员。11月29日,英、美、法向东京发出三份类似的文件,反对日本控制上海海关,强调在对中国海关体制作出任何改变之前,应先协调各国的利益。

海关等事宜也加剧了英日关系的紧张。尤其是经由香港的中国战争物资的大量输入激起了日本的反对,这可能会造成中国南方省份情况的复杂化。撇开接近英国殖民地可能产生的困难不谈,日军由水路进攻广州,将造成向中国运输战争物资最后一条重要通道的中断,也将使香港失去重要的后方。从这方面来看,12月1日收到的消息尤其重要,根据这一消息,日军强有力的特遣分队将在 Cekkai 岛登陆,该岛位于香港西南方 100 公里。如果对日军登陆力量的评估——总数为 50 000 人——是正确的,那么很明显,日本将对中国南方省份采取大规模行动。毫无疑问,其主要目标是商业中心广州以及富饶的广东省。

《国际关系》第 49 期,1938 年 12 月 4 日

(应超敏 译)

23. 南京沿途中国防线失守

一场由俄国煽动、蒋介石期望的在上海发生的
日法武装冲突奇迹般被避免

上海 12 月 4 日

昨天在上海租界发生的对日军的炸弹袭击造成的紧张局势今天由于新的事件而加剧了。

大约上午 10 点,5 辆经过外滩的日本军用卡车在 Edoardo VII 角被法国军队逼停。法国官员示意日军撤退,声称他们接到命令,不允许军用卡车从法国租界通过。

4 辆插有法国国旗的车辆赶到事发地点并占领街道封锁交通。随后双方展开了长达 1 小时的激烈争论。一支日军机枪队赶到机动车道增援,使得形势愈发危急,只要有谁开第一枪就会引发一场冲突。但最终法国人让步了,他们解除了对街道的封锁,让日本部队在一队摩托车武装护卫警察的护送下顺利通过。

法国当局发表了一份声明,宣称法国租界应当被看作法国自己的实际领土,在未经法国当局同意的情况下,军用车辆不得通行。尽管有这份声明,但是很明显,由于今天获得了通过法国租界的许可,日军开创了军需物资在租界通行的先例。

另一事件

另一事件发生在长江口的崇明岛附近。一艘英国轮船“Siusman”号遭到岸上机关枪的猛烈扫射,英国副领事布斯巴(Boothby)也在这艘船上。

据英国前线的消息,200 发子弹击中了轮船。其中一名船员被射杀,另一人身负重伤,两位受害者都是中国人。

日本当局称:事件发生之后,昨晚在上海公共租界胜利游行时,日军司令部基于昨晚当局接受的 4 个要点,对公共租界警察的改组可能性进

行了审查,并形成了就日军撤离公共租界进行谈判的基础。

4个要点确定了公共租界警察应避免类似昨晚的事件再次上演,否则日本当局将保留维护公共租界秩序、镇压反日游行、对个人和住所进行搜查的权利。

正向南京挺进的4支日军部队对中国首都的威胁也已步步逼近。

据资深国际观察员预测,南京即将陷落,因为中国那些所谓的防线无一例外地接连失守。此时日军则处在对南京发起全面攻击的有利形势。今早开始对句容的占领已实现。与句容一起陷落的还有溧水——中国新防线上的另一个重要据点,距离南京仅30公里。

绝境中的南京

同时,日本海军部队在连续三天空袭南京之后,于今天正午再次对大校场机场和其他军用设施进行了狂轰滥炸,烧毁了一些机库,杀死了敌方的两名狙击手。

根据对中国军队进行侦察的日本空军侦察员的报告,中方已在镇江和南京开火,以阻止敌军车轮继续前进。

来自南京的可靠消息称,不断有大炮和苏联制造的坦克到达南京城,而首都附近的机场则完全被苏联部队占领。^①

被占领的中国只有一个新政府

东京12月4日

今天上午意大利大使奥利提(Auriti)会见了外务省次相堀内。

同盟社回到为解决中日冲突进行调停的问题上,称德国驻华大使正在讨论这个问题的传闻是假的。

相反,该社认为想要进行干预的是英国。但其得出的结论是,任何想要采取主动调解的国家应当考虑到日本的意图是在东亚建立持久和平,绝对不能接受列强带有自私目的的斡旋干涉。

至于那些外国流传的关于日本方面可能发表宣战文告的说法,日本

^① 指苏联飞行员驾驶的飞机抵达南京。

的消息灵通人士指出：宣战文告将造成全面战争行动的扩大，进而引起全中国人口的卷入，而这一点是违背日本意愿的。不宣战可能使得中国人民在国家统一的框架内，在免受日军侵袭的领土上组织地方政府。

这一关于中国未来格局的统一理念得到了驻北平的同盟社的证实。在这种环境下，消息灵通人士称在中国建立的新政府将不仅仅局限于北方地区，而是同时代表了中部和南方。因为考虑到南京陷落在即，重新建立的中国政府若不建立一个单纯的地方机构，将不会有任何价值。根据北平的局势，新政权的方针在于联合日本，以及其他签订了反共协定的国家，以对抗共产国际。

《晚邮报》1937年12月5日

（顾烨 译）

24. 日军先头部队今日即将进入南京

日军新闻发言人通告——城市临江区域
处于战火之中——恐慌的掠夺场面

上海 12 月 7 日晨

所有的迹象都表明,南京已经危在旦夕,即将陷落。那么中国人做好抵抗准备了吗?就在今天,尽管离采取决定性行动只差不到几个小时,而且日军先头部队离首都还有大约 3 公里路程,我们得到的消息却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大批士兵渡过长江,毫无秩序地撤退,而另一方面,一些士兵则看上去像是要准备在首都进行保卫战。

有人认为,中国政府参谋部即将放弃保卫南京,因为有消息称,军事专家们认为,南京事实上已经无法防守了,甚至中国军队还会受到日军包围行动的威胁。在这一危险前面,中国参谋部只能仓促地将部队撤回长江左岸。

另外,日军新闻发言人明确表示,明天中午,日本军队将在通向南京的道路上展开战斗。这是他昨晚在回答外国记者提问时说的。他开场白的语调并没有表现出任何情感,几乎就像在说普通的管理事务一样,而且也没有宣称是对敌国首都的占领。然后他立即排除了日本军队在今天中午能够在首都南京进行战斗的可能性。他的发言进一步失去了严肃性。这场即将展开的战斗绝对是一场日军先头部队与中方后卫部队的较量。

就在今天,松井将军派出日本所有的空军部队对中国军队进行轰炸和一连串扫射。中国军队经过京沪线上的三次战斗之后,正在向南京撤退。这样的话,任何在南京和浦口的军事行动或非军事行动都将变得更加混乱不堪和缺乏组织性。中国军队没有能力有效地抵抗日军的进攻。随后,17 架日本飞机开始执行轰炸任务,他们轰炸的目标是南京沿江港口和中国军队渡江撤退的地点。

下午,日军又增加了 9 架轰炸机,3 支空军中队在其基地和上述轰炸

地点间往返飞行多次,直到黄昏时分。同时,另外一些空军中队在浦口和芜湖地区执行轰炸任务。据日军飞行员透露,南京沿江的一些商业街区昨晚被火灾造成的黑色烟雾所笼罩。这些商业街区包含了很多大型仓库,其中储存了大量货物。

南京城是否处于战火中还不确定。战火现在只是焚烧到南京沿江街区一带。根据准确的消息,在那一带,在最近的3天里,中国军队已经在那里集结,他们经过京沪线上的战斗之后,为了建立一支强有力的保卫首都的后备军被重新组织了起来。日军飞行员昨晚还指出,南京的沿江港口已经成了船只的沙漠,在那里只能看到少量的帆船和一些炮艇,而且距离码头很远,这是为了尽一切可能避免日军飞机对码头的攻击。有3名意大利人和6名美国人于上午11点登上“巴纳”号。

到目前为止,日军飞机在芜湖轰炸造成的遇难者的准确人数已上升到42人。其中12人在乘坐太古公司轮船时遇难,3人在乘坐拖轮时遇难,15人在人群中遇难,还有12人在医院中死亡。另外,还有超过150名受伤者正接受治疗。

同时,在上海,日本人表明他们将会完全独立地采取行动,并且附带说明,区分国际难民区和本地区域是毫无意义的。很明显,抱着建立一种有助于开创日军在整个国际难民区进行独立活动的先例的意图,12名日本领事馆的代表乘坐两辆汽车出现在“大东方”酒店的门口,然后进入酒店,审问了9名中国人,并抓捕了其中4人(3男1女),然后,他们将被捕者驱赶上车,自己也登上汽车,以极快的速度驶向虹口(日军占领地)。他们对自己的行为没有做出任何解释。在那里,被捕者再一次遭到审问,然后被释放。所有这一切在不到一小时内全部完成。

D. T.

《晚邮报》1937年12月7日

(潘书文 译)

25. 迫在眉睫的占领

南京 12 月 6 日

人们可以从一部分事实看出,在中国的这场战争具有鲜明的特征。今天,在中国首都南京,由于其面积广阔和人口众多,这场战争的规模确实史无前例。南京是中国的首都,其市民比中国其他很多城市的市民更加遵守秩序,并拥有比其他很多城市更有效的服务系统,这些事实证明……^①

经常被作品描述的闸北、南市、吴淞等地的战斗场面会使那些如今健在的历史见证人脸色苍白。战争来临得如此之快,日本人强有力地证明了他们的作战实力。南京失去了所有的控制能力,不管是高层还是普通民众。今晚,人们生活在绝对的混乱之中。与此同时,日本的大炮十分准确地瞄准了紫金山麓,为他们那些正在缓慢爬上山坡并且很自信的步兵打通道路。

中山陵被爆炸的火焰不祥地照亮了。在长江沿岸,大型的商品堆积处燃起了大火,火光照亮了长江的江水。这样的情景让人记忆深刻。从大火中不断有惊恐的人们四处逃散。在江岸,人们双脚浸泡在水中,向任何只要能带他们远离战火的船只大声喊叫。

日本步兵还没有开始进攻构筑有防御工事的阵地,这里的居民看到了山上炮弹的爆炸,但由于他们还没经历过闸北和南市居民的悲惨遭遇,所以无动于衷。在市中心,已经是家常便饭并且很容易就可以熄灭的火焰,在如此的混乱中就可以任意蔓延,肆意破坏。

南京的消防力量完全不能适应巨大的需求。甚至当他们全力以赴灭火的时候,会突然轻易地放弃灭火任务。从长江吹向城市的风使城市的火灾更加严重。唯一没有受到影响的、几乎与现实隔离的,而且为明确的目标工作的,是那些抢劫者。

^① 此处原文不清。

昨天,几十个中国人被枪决,今天没有任何人顾得上他们。中国的政治机构与其说没有能力去管理这一切,不如说他们对这一切无动于衷。每个人都背离了自己的初衷。军队的领导者对城市发生的一切无动于衷,他们的部队人数众多,并且加强了防御工事。根据官方消息,这些防御工事由多达 30 万人守卫,但是又有多少人能够真正战斗呢?

在南京,组织的混乱已经十分突出。部分部队正撤向长江的另一边,而剩下的部队面对南京市民所遭遇的一切则无动于衷,甚至他们有可能被正在奋战的惊恐万分的市民抓走。

《晚邮报》1937 年 12 月 7 日

(潘书文 译)

26. 日军在南京

蒋介石逃离,可能放弃手中权力

在倒塌城墙边的激烈战斗

上海 12 月 7 日

在南京附近,中方和日方正在展开激烈的战斗。中国的首都实际上已经陷落,这不仅是军事上的陷落,更重要的是,这还是政治上的陷落,我们可以从下面搜集的信息中看出这一点。

今天,在中国政府与日本的谨慎关系中,消息灵通的权威人士证实了这样一个事实:中国中央政府已经在最近的 24 小时内宣布,如果日方提出的条件是“合理的”,中方就可能进行和平谈判。

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发起谈判

毫无疑问,来自南京或汉口的某些消息决定了此次谈判的方向。而在昨天,中国政府还表明了不妥协的立场,所以很多人都清楚地认为,对中国来说最重要的是,以各种形式挽回颜面。此外,蒋介石昨天乘飞机离开首都的确切消息被消息灵通的权威人士所证实,这更增加了上述谈判的可能性。他们是最先知道要进行谈判的人,这是中国政府领导人与日方改善关系的进一步尝试。

中国最高领导人离开首都(他昨天还宣称要和妻子继续留守在首都),这意味着他想放弃手中权力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他想将权力移交给另外一个政治团体,该团体虽然围绕着中央政府工作,但却不能接受最高领导人提出的对外政策方针。其可能就是由前行政院长汪精卫和何应钦领导的十分有势力的政治集团,该集团如今活跃于汉口。

从了解详情的外交人士口中获悉,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 15 天来一直在开展一项谨慎而又紧急的活动,也就是在政治层面上解决中日冲突。他正在小心翼翼地试探如今正待在汉口的中国政党首领的态度,这些官员都是他的私人朋友,因为他是德国最了解中国情况的行家之一,

他的目的是在南京陷落之后迅速促成和平谈判。

在试图与蒋介石沟通遭到失败后,陶德曼并没有服输,如果明天汪精卫同意与日本外交代表举行会谈,这就要归功于他了。

同时,中国最高领导人(蒋介石)的光辉可以说已经消失殆尽,这位领导人的权力和威信来自于他拥有一支“私人”的军队,毫无疑问,这支军队是整个中国武装力量中最优秀的。如今,他的这些部队遭到了大规模的杀伤,被日军消灭,已经没有能力进行任何抵抗了,南京的陷落将正式证明这一事实。这位中国最高领导人还犯了另外一个错误:过分依赖苏联的支持。

突然燃起熊熊大火

日方的消息证实了星期三中国首都将被完全占领。日军对南京守军的进攻于晚上7点准时开始。在晚上7点之前,守军已经遭到人数众多且一直在快速挺进的日军先头部队的进攻。他们放火破坏了对手的防御工事,中国的抵抗逐渐减弱了。日军通过了一些危险的核心区域,到达并且越过南京的古城墙。在另一些区域,日军遭到撤回首都的中国主力部队的奋力反击,而中国的后卫部队则留守在后方,执行尽一切可能阻击日军前行的艰巨任务。正是这些后卫部队慢慢地靠近日军,放火焚烧对手可能利用的一切东西。而后,一部分日军部队正从南京东北城门前转弯,与此同时,日军主力部队从南京东南方向进攻。

今天,日本空军中队在南京城上空的持续轰炸,造成了整个南京城大火四起。部分军械库、汽油库还有其他一些易燃物遭到日本空军袭击,另一部分则被中国军队自己点燃,燃起了熊熊大火,火势凶猛,威胁着临近的街区。

国外军事观察员得到消息说,南京卫戍部队的左翼已经无心恋战撤退了,他们是一支身负重任的重要力量。松井将军三天前直到现在一直没有出现在上海,也排除了他在先头部队于南京郊区开战的同时立即进入南京城的可能性。根据一些外交信息,日军没有能力保证南京所谓的安全区的安全,因为他们认为在这一区域内可能隐藏着一些中国士兵。他们也承诺,出于需要,他们不会攻击南京一些不设防的地区。日军的

一些将领今晚估计,在南京和芜湖之间,目前有不少于 30 万的中国士兵。

D. T.

《晚邮报》1937 年 12 月 8 日

(潘书文 译)

27. 日本人在攻占南京前发出最后通牒

对城市的轰炸还在继续——日本皇军
在江阴附近的长江北岸登陆

上海 8 日晚

日本人现在可以随心所欲地突入南京。事实上皇军已经进攻到南京城从东南到西南的所有城门前。目前,他们需要做的仅仅是避免中国士兵逼近。除了南京城墙上被日军疯狂炸开的无数缺口,他们又开辟了同样出色的攻击道路。

但似乎日本人并不急于进入南京城。事实上在上海,直到下午松井的军队还没有得到关于中国首都被占领的确切消息。上海的军事当局估计日军由于考虑到中国人的恐慌心理,会等待时机进入城市而不会遭遇中国人的顽强抵抗。实际上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已经渡过了长江。此外,必须指出的是,撤退的军队使得军需品储备的需求不断增加。因此可以认为他们并没有企图展开任何阻止日军进攻的行动。同时,这些部队还给在紫金山顶的野战炮队掩体提供帮助,从这个山顶能看到整个城市和长江。实际上,由于日军前进速度很快,重要的战略要地已经被占领,大炮和军需品都需要及时送达。这样缓慢的行动有可能造成在目前这种局势下出现新的情况。

实际上,尤其在这种情况下,应该由松井作出战略选择。根据日本官方的消息,日军坚持要求蒋介石逃跑后的南京守军司令官唐生智将军投降。同时,日本的领事馆官员也开始联系不同势力的代表,建议他们一旦中方拒绝投降,就要求所有外国居民撤离南京。日本人试图说服唐生智令在南京和芜湖之间的 30 万中国人放下武器。在上海的外国人社区,人们觉得日军似乎并不想加快进攻南京的步伐。

接下来的一份日本公告甚至谈到了将被告知敌军司令部的“最后通牒”。但我们并不清楚其究竟出于什么目的。此次攻占南京行动的停顿,其主要目的在于避免南京被战火部分摧毁,并使城市得以幸存,就如

同上海一样。

显然,在日军先头部队占领南京主要港口、并在俯瞰港口的高地上建立炮台之后,中国人几乎没有像昨天一样撤退的可能性了,因为他们只有区区几艘渡轮,以准备长期抵抗。一旦日军被迫采取强制行动,对南京的攻击便可迅速划上句号,随之而来的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屠杀。

与此同时,唐生智将军宣布首都进入战争状态,并通知仍在城内的所有外国人进入在城内设立的“安全区”躲避。蒋介石逃走后,留在南京的防御力量成立了军队指挥部,其中不仅包括唐生智将军,还有顾祝同将军和前江苏省省长。此外,据传中国军队还放火点燃了南京周边的建筑物以及政府办公建筑。一道火焰的屏障围绕着南京,同时,在其周围,尽管实质性攻击暂停了,地面部队、江上炮舰、海军中队仍然不停地用中型和重型火炮轰击残余的抵抗力量。

然而,在最后时刻突然传来一个消息,就其重要性来说,足以超过当天发生的所有事件。据传日军已渡过长江,也就是到了江阴西面,向八圩港方向前进。其进攻异常猛烈,这些日军分遣队原以为将与驻守在相反方向的中国守军发生激烈的战斗,但最终日军很快就迫使中国守军撤退,这也证明了皇军对中国人的看法是正确的。这个消息极其重要,因为长江北岸的中国军队是日军逆流而上进军南京的主要障碍。而今天占领该地后,似乎已经没有什么能阻止日本军舰向中国首都前进了。

人群撤离

抢在日军之前进入了南京城,最近几天都无法通过无线电报发送消息的本报记者桑德利,于昨天发来了他对这座被日军包围的城市的第一印象。

(特稿)南京 8 日晚

日军的包围圈紧紧围绕着南京城。远处传来了炮声。我们看见步兵正在挖掘战壕最后一条壕沟,城门紧闭。

在这座城市正经历悲惨时刻的当口,蒋介石总司令于昨晚乘飞机飞往汉口。数以百计的老百姓还坐在装着家什的行李上,在空荡荡的建筑

物之间、江边等待着渡船。

在最后的几天里,日军的轰炸越来越密集,飞机场被频繁命中,造成破坏,还引起燃料存放处的火灾。长江北岸的浦口居住区(津浦铁路所在地)也遭到了轰炸。夜里火势蔓延,死亡者和逃难者众多。在日军先头部队的进攻方向,可以看见黑烟腾空而起。

我们登上了美国“巴纳”号炮舰,但我们每天都进城。警察在维持整个秩序。星期二晚上,最后一艘满载难民的渡船准备起航。人群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挤满了船只,这样的场景给我们一个人们撤离的完整印象。还有上百居民留了下来,躲在国际社会设立的中立区内。

炮火整日都在轰鸣。在长江边和上海路方向,大火平地而起。巡逻队带着刺刀枪在街上穿行,所有强壮的男子都被招募来,准备参加南京城的最后抵抗。

日本人在中国南方建立海军基地

香港 8 日晚

据中国新闻界报道,日本已计划建立一个海军基地,负责中国南方的相关事务。他们将斥资 3 000 万日元建造一座飞机场和一个港口。此项工程将在 3 个月内完工。中国新闻界认为,这个海军基地的建成将严重影响到香港和新加坡之间的交通。

若中国承认战败,战事将停止

东京 8 日晚

东京和日本人民生活在日益高涨的激动情绪中,等待着攻占南京。外务省发言人证实,目前日本在中国并没有领土要求,但是如果中国仍然顽固抵抗,不承认日本胜利的话,这一立场可能会改变。他还补充说,应该由中国方面做出解决冲突的行动,或者由经东京确认的正在为中国的和平施加影响的其他势力提出解决冲突的方案。发言人表示,在此意义上,该力量发起的任何行动都将被日方接受。然后,发言人否认日本政府有意废除之前对蒋介石政府的承认。一旦中国承认战败,战事将立即停止,日方随时愿意进行谈判,但基本前提是,中国要放弃任何形式的

反日行动,并愿意与日本合作,重新建立远东政治体系。最后,他声明说,对南京的占领可以根据双方的协定以和平方式进行。非官方人士认为,日本政府已准备好与蒋介石谈判,但若中方不立即做出解决纠纷的行动,日方会将其作为放弃处理,并认为可以在中国建立一个新政府,依靠其签定令人满意的条约。

日军登陆下蚬(SiaCium)岛

香港 8 日晚

根据当地政府得到的可靠消息,中国军队与日本海军进行了若干次战斗,日军登陆了下蚬岛。后者在四艘驱逐舰和四架飞机的支援下将中国守军向内陆击退。守军仍然在新的驻守点顽强抵抗。

莫斯科计划建立俄一中一英三角关系

香港 8 日晚

同盟社从上海得到消息称,在中国军队受到重创无法恢复的情况下,莫斯科计划建立俄一中一英三角关系。以此为目的,在南京的苏联大使将被派往伦敦,替换……^①

《新闻报》1937 年 12 月 9 日

(刘静璇 译)

^① 此处原文不清。

28. 日军命令南京最后的守军投降

30 万中国人飘忽不定的命运—— 在被包围城市里的焦虑时光

上海 12 月 8 日

日军部队事实上已经到达南京。在首都南京的郊区,日军已经与中国军队交战超过了 24 小时。激烈的战斗还在继续。30 万南京市民仍然不知所措,他们不知道是继续绝望地战斗还是投降,或是渡过长江逃亡。日军部队从各个方向向前逼近,压迫对方,有时只要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将对方赶出阵地,有时却要经过艰苦的战斗才能击退对方。情况变得十分复杂,以下是来自前线的一些消息。

一片骚乱

日军在南京附近做好了一切战略上的准备:今天早上镇江落入他们手中。同时,在长江上迅速挺进的海军舰队、空军、陆军一直轮番对中国的防卫部队进行持续猛烈的炮击和轰炸。人们经常可以看见炮弹爆炸的硝烟、堆积的废墟和倒塌的房子,城内的街区也被摧毁。这座已经被证实遭到掠夺的城市笼罩在一片混乱的阴霾之中。人们担心那些被打败的士兵将以暴力的方式撤离,比如放火、抢劫、破坏。人们还担心那些市民中的最低层将会抓住这样的机会暴露出他们最恶劣的本性。

鉴于席卷全城的猛烈轰炸即将临近,日军司令官要求各国领事尽快将本国同胞撤往城外。日军指挥官还表示,不能保证所谓南京国际安全区的安全,因为该安全区位于天然的要塞,并构筑有防御工事的区域内。如果战斗发生在临近安全区的山丘上,不排除很多炮弹和子弹会落到安全区内的可能性。

当日军轰炸首都南京的防卫部队以及南京城内的目标时,成千上万的中国士兵还在不断加强防御,守卫着南京的 18 个城门。同时,在每个城门附近,还有很多中国工人在不断堆积军需品和生活用品。南京的内

城门在接下来的三天中实际上肩负着不可估量的重任：它们已经成为城内最后一道防线的要塞了。在这些城门周围，另外一些工人正在大量设置铁丝网，在这些铁丝网下面，他们正在挖掘可以放置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战壕。但是，人们不禁要问，所有这些工程能起到什么作用？直到目前为止，人们还不知道中方的抵抗是否有效。蒋介石的逃跑对于他自己来说是意味深长的。

上海军事当局留给了人们猜测：日军在考虑到中国人的恐慌情绪后，正等待着不受艰难阻挠地进入南京的有利时机。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渡过了长江。除了这一点，还要明确指出的是，撤退的中国军队已经丢弃了大量军需品。所以，人们认为中国人已经不想抵抗日军的进攻了。

但是还需仔细观察双方互相的试探以及另有阴谋的谈判。我们正处在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夺取南京以后，日本人还没有准备好与逃亡政府进一步谈判。该政府如果能和日本进行谈判，便还有最后一线希望夺回政权，还整个国家以和平。

据权威消息，人们得知，日军还在坚持等待南京最后一批守卫部队的统率唐生智将军投降。日军还试图说服唐将军，让其命令位于南京和芜湖的30万军队放下武器。在上海外围的军事包围圈中盛传着这样一则消息：日军并不想匆忙派遣部队进入南京并迅速占领之，他们更愿意看到民众主动投降来换取和平。这对他们来说才是决定性的彻底胜利，这也解释了目前战斗暂时停顿的原因。

同时，人们还看到，自战争开始至今，日军第一次登陆靖江，它位于长江的另一边，江阴的对岸。日军的目的是很明显，就是为了打击守卫长江封锁线的中国军队，使日本军舰能够溯江而上。

另一次登陆

尽管各方不断暗中进行外交活动，但也没能完全阻止日军的军事行动，甚至就像人们看到的那样，军事行动愈演愈烈。下午早些时候，激烈的战斗在距离城市几公里外再次打响。日军从三面攻击了防御工事的前沿阵地。尽管战斗十分惨烈，但这只是初步试探中国军队的抵抗能力。实际上，日军派出的进攻兵力还十分有限，但是这场一直持续到晚

上的战斗表明,松井将军指挥的日军大部队对南京深入作战的时机并不遥远。在首都南京,日军司令官正与南京卫戍部队的将领唐生智将军谈判,希望他们早日投降。甚至日军最后一轮进攻的推迟让许多人都相信,在首都南京的谈判可能会取得成功。如今集结在南京和芜湖地区的30万中国士兵将同首都一起向日军投降。

被紧张气氛笼罩的上海发生了戏剧性的一幕。一个陌生人向一家俄国报纸编辑部所在的大楼投掷了一枚炸弹,大楼的玻璃在爆炸中被击碎,但没有造成其他严重损失。策划此次暴力事件的人正在调查中。

D. T.

《晚邮报》1937年12月9日

(潘书文 译)

29. 日本人占领芜湖,包围 30 万敌军

南京大战

皇军直到今天中午才占领南京
日军沿长江北岸挺进,直指浦口

南 京

从上海到南京乘火车有 300 多公里,相当于弗洛伦萨和帕尔马之间的距离。

南京坐落于北方的北京与南方的广州之间,是中国的首都,其纬度适中,距离上海也不远,位于沿海与内地的中间,长江从旁流过。

1927 年,在让位于北京 500 年之后,南京凭借其神秘高贵的气质和无与伦比的美丽,又一次成为首都。

古老雄伟的应天府城墙长达 35 公里,围绕着这座城市,其紧闭的城门从日落到日出,为每一位徒步旅行者开启。除了城墙以外,还有郁郁葱葱的陡峭山丘,珍珠色的娇小湖泊,以及湿润整齐的方块状田地。

在城墙以内,也有田地,在房屋和道路之间蔓延,越靠近市中心,这些田地越是被不断扩张的城市取代。老城区的街道和新城区的街道,以及和西方大城市的道路同宽的极长的直路两边都是商店、民房和临时房屋,人们安乐地在这里经商、生活——睡觉、煮饭、喝汤。

也有一些带花园的别墅,以及带中国文化古迹风格的建筑、政府机关办公大楼和市政大楼,但是整个城市主要是由普通的房屋群构成的,都是些很简朴不牢固的建筑。

人们来到这座城市的时候,他们的家还没建造起来。许多人只能在街道旁搭建简易的平房,所以街道日夜都很繁华热闹。许多人在街边从事小生意和家庭小买卖。

这是一座正在崛起的都城,生气勃勃、多姿多彩、人头攒动。节日的夜晚,整个城区五光十色。城内有平民和士兵,显得简朴而重要。

从8月13日到现在,所有人渐渐都离开了,大约有两万个家庭撤离,其中很多家庭才迁来没几年。他们几乎全都迁到了乡村,远离城市的喧嚣。

中国人就是这样,来来往往地搬迁。他们可能是世界上最墨守成规、最安定的民族,但是自然和人为的因素常常会使他们改变,或者离开。南京什么都不是了,只有一些政府办公楼、别墅和一些公使馆。只剩下巨大的城墙保卫着不再存在的市民。长江上再也没有繁忙的商船。紫金山上的伟大革命领袖成了不合时宜的人,被抗日战争的硝烟所掩盖。

中国人到处播撒自己首都的根,将其从这里迁移到那里,并保存在人们对其深厚的感情之中,其被迁移到大家认为需要的地方。首都对于中国人来说不是由行政机关所决定的,其到处有,也可以哪里都没有。人们可以将其迁往东南西北。

人们以为这个故事已经结束,但实际上似乎才刚刚开始。

中国人的力量不在于他们的首都。北京不是力量之源,而是诗歌之源。中国人的力量在于他们懂得忍耐,懂得封闭自己,懂得认命地接受外在的人和事,不管是河水的漫延,还是敌人的入侵。

新政府成立的宗旨之一就是进行抗争,并且超越所承受的痛苦。然而,以往的痛苦还不够大,还不足以将其转化为强烈的反抗精神。

现在并存着两个中国:一个是放弃自己的中国,一个是重新崛起的中国;一个是符合传统本质精神的中国,一个是根据国家需要超越某些特殊倾向的中国。

南京就是这个中国新面孔的标志,其迁往了别处,留下了什么?未来形势将会如何发展?没有哪位圣人可以预料。

中国是这样一个国家,其在时空中发生着变化,如它的首都、它的痛苦和它的反抗。

阿尔伯特·德·斯太法尼(Alberto Del Stefani)

乡村深陷火海

日本人在南京和浦口上空的空袭行动一共有三次。尽管中国炮手

进行了顽强的抵抗,轰炸机还是圆满地完成了预定的轰炸任务,精确地用重磅炸弹击中攻击目标。几枚炸弹击中了浦口的中心地区,被袭地区的房屋消失在硝烟和爆炸产生的火焰中。当硝烟散去,大火无处不在地蔓延,传递着毁灭的信息。

日本海军当局宣布的一个消息称,在一次对南京的空袭中,由少尉 Ohbayashi 和 Mihara 指挥的日军战机消灭了 16 架敌机,以及另外 20 架当时在战区活动的战机,总共消灭敌机 40 架。

蒋介石在重庆 集结他的军队

上海 9 日晚

据可靠消息,蒋介石委员长目前把他的大军和舰船都集结在了重庆地区。

东京将如何庆祝胜利

东京 9 日晚

下午 3 点,在众议院议长办公室里召开了一个由各党派众议院议员参加的会议。会议决议如下:一、一旦得到南京陷落的消息,众议院议长将立刻前往皇宫报喜;二、众议院议长同时还将向王子报喜;三、一个众议院代表团,包括议长,将前往靖国神社参拜在战争中阵亡的将士;四、议会将发贺电给在中国的日本陆军和海军司令官。

英国大使克雷吉在下午 5 点 15 分与日本外务大臣广田进行了一次会谈,在这次会谈中双方就中国问题进行了讨论。

《新闻报》1937 年 12 月 10 日

(黄秋苑 译)

30. 南京陷落^①

日本军队准备攻击南市

城市防守在松井的最后期限到达后半小时内被日军攻破

蒋介石想在湖南组织一支军队

上海 10 日晚

日本人从光华门进入了南京城。

对南京的总进攻是在今天中午(上海时间)以后开始的,也就是日军统率松井将军给中国守军的最后期限截止后半小时。中国将军唐生智没有在规定时间内作出答复,反而以游击队用机关枪向日军开了火。

城墙的碎石

日本军队占领了南京所有的碉堡和要塞,其中包括紫金山、方山、牛首山、仙林山及其他据点,他们一直等到总攻击南京的命令下达后才开始装备步枪、机关枪和带日本旗的大炮及装甲车。

在日军司令官松井宣布要求南京和平投降的计划后,仍然有大约 10 万中国人继续构筑防御工事。南京所有的道路和街道都构筑了碉堡、壕沟和沙袋工事,这些中国人曾经保卫了南京的几座城门。同时,中国军队用炸药和汽油焚毁了一些主要大楼。

但是在经过简短但非常有效的炮火准备之后,日军在空军的协助下对南京发动了强大的总攻击,攻破了敌方所有的防御阵地。就像上海及其他在上海和南京之间被称为难以攻破的城市那样,南京这个最后的据点也落入了日本人手中。

同盟社代表确认了日本方面对南京的占领。如上所述,日本人是从光华门开始进攻的。这个要塞的失守使中国人无法再在南京城墙的东

^① 1937 年 12 月 10 日,日军在光华门一度得手,后被中国军队反攻击退。此时报道说南京陷落,显然言之过早。

南部继续占据防守位置,因此他们轻易地让出了南京,使越来越多的日本人开着装甲车进入南京的任何一个角落。日军在南京的各主要街道上穿行,攻破了所有的防御阵地,以及密集的机关枪火力点。上海时间12点30分,在日军发动总攻击之后,南京高15米宽15米的城墙已经开始变成碎石了。

京沪地区普遍认为南京的防守已经没有任何政治意义了,没有人再对首都的命运抱任何幻想。此外,似乎中国领导人也已经提前预感到南京防守必败的命运。蒋介石没有动用他最新的武装力量,而把大部分防守任务交给了在最后阶段受过军事训练的武装警察、宪兵和广大市民。

16 架飞机被毁

中国总司令保存其最后的武装实力,是因为他需要依靠这些最后的武装力量来决定其对中华民国的统治。南京的防守力量实际上就是在上海遭受日军痛击的部队。

在蒋介石的众多言论中,有一条似乎比较可信,他准备去湖南组建一支新的军队,或者重新改组政府。

被认为可能成为重新组建武装力量的南昌,也成为日军空袭的主要目标,因为这里集结了最近苏联提供给中国的飞机。南昌昨日上演了一场激烈的空中大战,结果是日军大胜。在空战中,日军击落了16架敌机,同时还炸毁了30多架中国人的轰炸机,这些飞机还没来得及起飞发挥作用。

街道上的战斗

在南京城的废墟上传来了最新消息:下午2点,日军向驻守城东南光华门的中国守军发起进攻,并突入中国军队的后方阵地。虽然理论上城市已经被占领,但街头小巷还在上演着激烈的战斗。最激烈的战斗发生在光桥门^①(KuangCiao)附近,这里的一些中国防御小部队还在顽强地抵抗。

^① 不知何指。

晚上,日本军队对桥梁进行了轰炸,那里据说还有残余敌军的抵抗力量和武装。

日本人占领南京后将进军广州?

据今天早上得到的消息,日本人有可能入侵中国南方的广东省,因为据其他消息,广州市政府正准备迁移到该省北部。日本人的进攻可能会一直达到海南岛,第一个目标可能会是 SuaTau 港。此外,舆论普遍认为,日本人在占领南京后不会再向北方扩展,而会不断向南进军,目的是占领极其重要的广州港。入侵广东省的日本军队估计有上万人。

然而,余汉谋领导的广东军将主要防守珠江三角洲。

《新闻报》1937 年 12 月 10 日

(黄秋苑 译)

31. 今天“最后通牒”降临南京卫戍军

“我们将严惩抵抗者，而宽大缴械的人”，松井将军说
——日本军包围了首都

上海 10 月 9 日

中午，松井将军向南京卫戍军发出了最后通牒。然而，日本非官方人士在下午的时候已经知道，炮兵和空军已用持续的密集火力在南京城墙上撕开了一道长长的口子。这些炮弹和炸弹给城门及城墙上的中国守军以沉重的打击，使其伤亡惨重，尤其是对于空袭的抵抗更为不利。

进攻部署

炮兵和空军的行动还有一个目的，即给皇军最后的总攻击创造最有利的条件，以避免敌人的干扰。据司令部的松井将军称，此目的已经完全达到了，因为日本的各军团已经可以非常接近中国首都城墙的外围，一些区域甚至已经被攻占。抵抗毫无作用，因为日军司令部指出，防守的中国军队士气已被一再削弱。需要明确指出的是，现在来自南京直接可靠的消息已经越来越少，甚至那些在当地派有记者的较大通讯社，从今天中午开始也没有收到任何来自城内的消息。上海租界内的中方通讯社也遇到了同样的情况，而他们在几天前还能获得关于南京方面的重要消息。

到目前为止，日本空军还没有使用炸弹和机关炮攻击那些军队集结地和物资补给处，以免伤及平民和难民。他们在轰炸南京城内时，也避免对精美华丽的建筑造成破坏。今天，日本军事当局两次表达了他们的希望：所有留在南京城内的外国人躲避到江中的炮艇上。今天中午，日本空军对南京城散发了最后通牒。

最后通牒由松井将军发出，他说：“日本军队将严惩那些抵抗的人，而对那些愿意放下武器的人将予以宽大，手无寸铁的平民也将受到尊重。南京是东亚文明的中心之一，但是如果卫戍军坚持与日本军队对抗

的话,南京将难逃战争的厄运。”

这份声明还包括了松井将军向唐将军提出将派一位官员就投降事宜进行谈判。中方代表必须举白旗,在距南京东南 20 英里的句容战场与日军接洽。

随后,松井将军的一位官员预测说,明天午夜前南京城将被占领。

日本军队在发出最后通牒的同时,已经完成了部署。在快速推进后,炮兵和后勤补给部队将严阵以待,为最后的总攻击做准备,因为如果松井将军发出的最后通牒没有被中方接受,那么总攻击将在明天中午之后开始。

同时,日军对首都的包围已经完成,南京西南方的芜湖今天下午也已经被攻占。有消息称,日本舰队已经封锁了长江。虽然这一消息还没有得到证实,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日本皇家舰队将很快完成从江面对首都的包围(如果还没有完成的话)。

大胆预测

所有消息都显示出南京已经是日本军队的囊中之物了。今天下午,日本的一份报纸称南京城已经被占领,中国军队的抵抗完全不堪一击。这个消息可以被看作是日方的预测。的确,南京的防守并不坚固,有些地方已经被攻破,郊区也已经被攻占。不过目前日军指挥官还在等待中方对最后通牒的答复,同时正从容地为进攻做准备。

中国军队现在已经筋疲力尽,信心尽失,供给不足,指挥不利。相比之下,日本军队的组织和指挥都可谓完美,士兵兴奋而自信。结果其实早已确定。

战争的持续和不间断的轰炸使上海开始担心中国货币的未来,因为政治因素往往会对货币的走向产生影响,而上海刚刚显示出重新恢复商业中心地位的迹象。中国货币目前依赖英国得以稳定,但是如果失去了这一依靠,中国货币将迅速崩溃。当地各界都在推测南京陷落后英国方面的扶持是否仍会继续。

东京大臣会议

东京 12 月 9 日

由日本首相主持,陆相、外相、藏相共同参加的会议达成了一项政治协定:日本政府应密切关注南京的陷落。中国方面考虑到接连的军事失利,正在通过中间方进行议和。不过日本政府认为这一议和举动只是中国为了获得暂时的和平而采取的一种策略,因为到目前为止,中国方面还没有与日本就东亚的和平问题进行真诚的合作。因此,日本政府认为在中国没有表示出真诚的悔改之意前,任何议和之举都将不会被接受。会议所作出的决议被提交给内阁审议。

外相和藏相已经向他们的同事保证,在大会上所作出的决议将不会对日本外交和财政状况带来困难。

为了给在中国的军事行动提供资金,以及为了给预算赤字提供准备金,日本政府今天决定发行总额为 6 亿日元的公债,其中 3 亿日元将于明天发放。在这 3 亿日元中,有 1 亿日元将被用作在中国的军事行动资金,另外 2 亿日元已经用于满洲国的工业经济发展。债券的利率为 3.5%,将在 17 年零 3 个月内按期偿还。

《晚邮报》1937 年 12 月 10 日

(刘宇菲 译)

32. 南京落入日本人手中

“敢死队”在城墙上找到突破口——日军挺进南京
在首都街道上作战——东京将宣布蒋介石政府垮台

本社特派记者报道

南京 12 月 10 日

对南京的包围今天早晨开始了。城市周围的村庄被中国军队放火烧毁了，他们这样做是为了不给敌人留下一栋房子。日本军队在战场上向三个方向推进。城市里已经没有人了，老百姓都在几天前逃难了。城里已经没有食物和任何东西了，除了几名巡逻士兵分散在山顶，隐藏在机关枪后面，一边撤退一边和敌人交火。围绕城市 30 公里长的城墙成为防守的屏障。

这是我们从被包围的城市中发出的最后一份电报，因为我们将登上美国的“巴纳”号内河炮舰。

今天上午，南京城遭到了密集的轰炸，空中落下炸弹并伴有剧烈的爆炸声。下午早些时候，防线被攻破，日本军队从南边的一个城门攻入。街道上的战斗打响了。

这个时候，我们不得不撤离这座城市，登上美国炮舰。

路易吉·巴尔基尼

日本步兵的勇敢之举

上海 12 月 10 日

南京最后一道防线即首都的城墙被攻破了。松井对中国守军的最后通牒仍没有得到回应。正如之前所预计的那样，今天下午的最初几个小时，由司令官发起的有条不紊的总攻击开始了。

据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傍晚时分，情况已经非常明朗了：日本皇军攻占了南京城东南方的光华门，并在城门上竖起了日本旗。他们渗透进了中国军队后方，确切的说有 17 处。在另一座城门，即光桥门的战斗也

十分激烈,到目前为止该门还没有被攻破。

升旗

进入南京城墙后不久,日本旗就开始四处飘扬。配备有手榴弹和自动步枪的日军突击队越来越多地以扇形队形进入首都真正的居民区。

攻城的重点仍然是光华门,昨天夜里和今天早晨,日本步兵的确发扬了集体英雄主义精神。为了使突击奏效,整个步兵队都冒着死亡的危险,趁着夜色,几个小队日军带着大量炸药来到城门外的防御工事下面,他们准备好炸药,并在非常近的距离内引爆。在中方机关枪的扫射下,他们只能保持不动等待黎明的来临。他们等待着自己的同伴,并指示同伴穿过突破口。

日军战胜了中国军队多方面的抵抗,并占领了城门边的一些建筑物,而中国军队的抵抗越来越弱。在空中,皇军空军也参加了战斗,向守军的主要防御阵地投掷了大量炸弹。与此同时,炮兵在城墙上轰出了新的突破口,而城墙上还散布着一些中国军队的机关枪。

整个城墙的外围已经驶来了一些坦克,正如大家知道的那样,坦克是在进入居民区作战时最有效的武器,它可以突破一些障碍物,扫除路障,并击溃小股敌人。司令部收到的消息透露,中国军队的防守已经崩溃,虽然他们的撤退比较迟。

这两天日本军队集结在建有中山陵的紫金山半山腰,他们守住位置并没有行动,以此来施加压力。同时,另一支左翼纵队已经到达并攻克了南京和芜湖之间的太平。

司令部让人们看到,攻占光华门是这一天最辉煌的成果。这一行动持续了整整60个小时,并获得了只有几门大炮的部队的少量支援。

当胜利者打败守军并攻入后方后,松井将军马上通过野外电台给他们发来了下面这份贺电:“热烈祝贺你们!对你们完成这么困难的任务表示赞赏。”

随后,松井将军在今天晚上对外宣布,将考虑在48小时内全面攻占南京城。在这之后,日本军队将以汉口为进攻目标,同时将继续和有意与日本合作的那些中国人进行谈判。讨论停战已经不可能了,这方面的

建议也不可能成功。必须先等到日军占领汉口,因为在以往的传统中,对于那些想要控制中国政治和军事的人来说,拥有汉口比拥有南京更为重要。

上海的战争言论

关于蒋介石的离职,现在看来越来越有可能了。政府正在进行彻底的抵抗,这无疑也标志着和平谈判可能性的降低。目前有迹象显示,这位中国的最高统帅有意放弃政治生涯并在外国逃亡几年。日本方面的消息称:很明显,他几年后回到祖国没有任何困难,因为到那个时候“宋家王朝”已经失去了重新夺得权利的所有可能性。这也符合东京的意图。

但是好战分子的呼声仍然在加强。通过一个秘密会议,上海的银行家联合另外一些企业家,决定对一项宣言进行宣传。这一宣言请求中国中央政府不要向日本人妥协,并竭尽全力使战争取得胜利。似乎持续的冲突对于那些躲在公共租界里的好战的富商们来说还不够。

另一方面,人道主义者仍然在不辞辛劳地呼吁。正在汉口的美国大使约翰逊向中国和日本的军队将领转达了国际委员会进一步的人道主义呼吁。他们请求战争双方停战3天,以便使中国人可以有秩序地撤离首都。

从我们上述报道的一系列事件可以看出,双方接受这一呼吁似乎是不可能的。

D. T.

《晚邮报》1937年12月11日

(刘宇菲 译)

33. 中国战事(12月2日—8日)

中国在镇江——丹阳——金坛——溧阳一线阻击日军向南京的进攻,但并未对日军构成严重威胁。日军12月4日攻入丹阳,随着丹阳的失守,金坛和溧阳也相继被占领。进一步的抵抗线沿长江从镇江南下至句容、溧水,距离首都40余公里,但没能阻碍帝国军队急速向中国军事中心——南京逼近。

12月5日,句容陷落,日军的先头部队迅速向首都方向展开,追击中国毫无组织的后卫部队,而中国军队无力抵抗。7日,日军兵临城下,与中国守军在首都城郊会战。与此同时,在司令长官唐生智的指挥下,数十万士兵严守城墙,紧闭城门,并构筑好防御工事。然而形势混乱,有关军事行动的消息极其匮乏。12月8日的消息显示,日军并不打算立即发动进攻,而是等待这座军事要塞自行投降,他们想让南京瓜熟蒂落,而无需南京及芜湖地区中国军队无谓的流血伤亡。本周报纸最新的专栏报道,对这个城市进行的一系列空袭、抢劫、放火,此刻让这个已经一半被放弃的城市的人们陷入恐慌,纷纷想尽办法逃到江的另一边。无论从中国国内的政局还是从日方的态度来看,首都陷落的后果都无法预测。这些日子在不确定的情况下,蒋介石批准的弃城命令则可以表明中国政府领导集团的变更,而目前与日本帝国讲和的愿望及殊死抵抗仍在矛盾之中。与此相关,调停的呼声不断传出,亦显得十分重要。德国大使陶德曼针对蒋介石的撤退提出调停建议,而日本官方宣称不予理睬这种尝试,柏林政府也否认这一提议。然而许多迹象表明,如果能够会谈,商讨一个对于冲突双方利益及尊严都可以接受的方案,则双方不反对进行商谈。事实是,任何用外交方式解决的考虑都是不成熟的。

而在北方,没有作出任何军事行动的指示,日本也承认他们没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将山西收入囊中,山西现在仍有一半在中国人手中。所谓日本军队在香港附近的CekKai岛登陆并将其占领的消息并没有得到证实。

一支日本部队在穿越公共租界时遭到炸弹袭击。事件发生后,上海公共租界的形势变得明朗了。这一流血冲突事件的结果是日本军方代表与“殖民地”工部局达成协议,日军按协议撤出公共租界。但是,东京外务省发言人表示:日本保留在中国领土上的租界内行使维持治安的权力,而“租界外国当局则由于其态度而失去了中立地位的利益。”

《国际关系》第 50 期,1937 年 12 月 11 日

(应超敏 译)

34. 日军击溃南京最后的抵抗

南京的指挥官逃到江对岸——北方的
省政府宣布从中央政府中独立出来

上海 12 月 11 日

南京已经几乎全部落入日本人手中。在 13 个小时的浴血奋战后，松井将军的大部队在英勇的突击部队之后，于凌晨 2 点进入了南京城。他们在城市中心尘土飞扬的废墟上挂起日本旗。而中国人仍然在四处抵抗，和强劲的进攻者一寸寸地争夺土地，把房子和道路变成有埋伏的防守工事。

指挥南京守军的唐生智将军把自己的驻地转移到了浦口，即长江对岸，并通过无线电向蒋介石指出了他的军队在这场首都保卫战中的价值。“我们的损失是惨重的——他说——但是中国的尊严在这次战役中完全体现了出来。”

唐将军的消息

在城墙南门外的雨花台附近，战斗尤为惨烈。日军发动了五次进攻，以击退战壕里的卫戍军，日军致命的机关枪猛烈扫射。一旦进攻的战车在中国军队的一侧打开突破口，他们就可以制服卫戍军，并以可怕的炮火打乱防守线。

昨天晚上将近 10 点的时候，南京的主要城门都落入了日本人之手，但是整体入城却因为战火和建筑物的阻挡而遭遇困难。日军做出了一个十分危险的战术决定：松井将军的军队被分为一些小的但武器装备精良的侦察队，并渗透进城市，包围了卫戍军的最后一些核心抗抵力量。卫戍军就这样被完全击溃了。

这场战役已经分解为在这座城市南部两处城墙之间的街巷中的无数小规模战斗。炮兵在外城墙上打开的突破口已经数不胜数了，而步兵则在城内破坏。

另外，皇军的舰队已经突破了长江上的所有障碍，并全速前进到可以使他们的大炮打到首都的地方。

日本空军一整天都在向城墙内卫成军的最后阵地投掷炸弹，引起了数起火灾。轰炸最严重的地方是富贵山和长江边。

一旦城市完全被攻占，松井将军将率领部队胜利入城。预计这一幕将在明天或者星期一出现。

据可靠消息称，英国驻华舰队指挥官利特尔海军上将和美国亚洲舰队指挥官雅纳尔海军上将不久后将放弃他们在上海的权利，前者将前往香港，后者将前往马尼拉。他们将不会再回到上海，除非中国大陆的情况有出乎意料的进一步发展。

中国中央政府的垮台，为中国北方建立新政府的运动起到了推动作用。这一运动在最初的一段时间内，采用的说法是“华北是华北人的华北”，而现在倾向于建立一个包含华中的政府。消息灵通人士认为，这一新政府的建立将基于以下几点：1. 不承认蒋介石政府；2. 国民党解散；3. 对第三国际行动的防守，日本、满洲国以及在反共旗帜下联合起来的国家保持一致；4. 和日本以及满洲国的经济合作；5. 恢复儒家学说的地位。

北京的维持会在今天的会议上决定控制所有中小学和大学。另外他们决定将学生课本中所有带有亲共倾向和反日文章删除。日语将被作为第一外语。

天津的决定

南京陷落后，天津决定不再承认中国中央政府。今天上午9点，天津的维持会向中国所有的公众机构发出了通告，谴责南京的无能政府，谴责他们和共产党的合作，以及分散在重庆、汉口和长沙的官员。委员会宣称他们希望在中国建立一个新政府，以取代在道德上已经破产的南京政府。

同时，另一个自治组织已经在山西建立。

根据来自香港的消息，一艘中国海关巡逻船在刚刚驶出英属殖民地海域后可能遭到了日军驱逐舰的炮击。这艘曾经属于欧洲 Stato

Maggiore 的船只装备有短射程的过时小炮,无法回击日军驱逐舰。受到攻击的船只搁浅在安全海域内的礁石上,以躲避日本军舰的攻击。

D. T.

民主促进了中国的抵抗

发给《晚邮报》的电报

东京 12 月 11 日

日本海军省的发言人水野将军在一次专访中说:“日本军队一部已经进入南京城并展开了英勇的战斗。南京城的几座城门已经被日军控制。蒋介石坚持自己的反日态度,这一态度得到了民主力量的支持,他们许诺蒋介石,如果事态更加严重,他们将给予帮助。因此,未来的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一力量对于中国的态度。”

在日本,在意大利人社团“但丁”的赞助下,作为日本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之一的《大阪每日新闻》举办了一次大型会议,在此次会议期间,举办了为促进与在日意大利人合作的各种讲座。会议今天中午在大阪市政厅召开。

南京陷落的消息在东京激起了民众很高的热情。民众举行了大规模游行活动。所有街道都被装饰上了旗帜和鲜花,营造出喜气洋洋的气氛。同时人们还在等待天皇的声明。

同样,在日本其他城市也举行了类似的游行庆祝活动。

《晚邮报》1937 年 12 月 12 日

(刘宇菲 译)

35. “巴纳”号命运悲惨 桑德罗·桑德利^①英勇牺牲

炮舰遭到轰炸——桑德罗垂死登陆——沿江岸艰难行进

上海 12 月 17 日

在“巴纳”号的姊妹舰“瓦胡”号的舰尾大炮下，我们沿着长江驶近上海，预计于 17 日抵达。4 艘军舰：“瓦胡”号、一艘日本驱逐舰、英国炮舰“蜜蜂”号和另一艘日本驱逐舰。为悼念一位牺牲的壮士，英国和美国军舰都降了半旗。

桑德利于 12 月 13 日星期一下午 1 点去世。在和县，在 23 小时前，“巴纳”号的幸存者在长江右岸登陆地十几公里的地方，桑德利牺牲了。

“我就要死了”

桑德利左侧肋骨两处受伤，可能被机枪弹射中。轰炸时，他站在军官舱内，指间夹着一支香烟。他倒在地上，一只手放在身旁，冲着身边的人大喊：“我被击中了，快要死了！”他用这几个月才学会的英语讲着这些话。然后他请求意大利大使埃贝托·罗斯去叫医生。当时军舰里如地狱一般，甲板断裂变形，鲜血四溅，人们慌忙逃窜。密集的炸弹呼啸着命中甲板，爆炸声震耳欲聋，接下来便是受伤者的呼喊声。甲板上的重机枪对着天空不停地扫射。

罗斯下到船仓里，我和医生都在那里，还有一些伤员躺在炽热的钢板上。

“医生在哪里？”他问道，“在上面军官休息室有人受伤了，医生在哪里？”

^① 此人系意大利记者，在 1937 年 12 月 12 日日军对英美军舰“巴纳”、“瓢虫”以及民用船只的袭击中丧生。

“谁受伤了？”我问，我知道肯定是桑德利受伤了，如果是美国人受伤的话，就不会是罗斯来求助了。罗斯伸开双臂答道：“是桑德利。”

“桑德利受伤了？严重吗？”

“我不知道。”

我们爬上去，看见桑德利躺在地上，外衣敞开着，伤口上的衬衫已被解开，两处鲜红的伤口已不再流血。他对我说：“这次我是死定了。”

我们试着在他头下垫些东西。我们中的一个人在美国炮舰上受到日本人的攻击就要死了，这看起来是多么不可思议，我们无法相信这是真的。

机枪在我们头顶上空几米处不停地猛烈扫射，在隆隆的巨响中，船的一侧已不知不觉开始下沉。

“落得这个下场！”桑德利说，“在别人的军舰上，在这个国家里。”他脸色苍白，眉头紧锁，好像怒火中烧，十分痛苦。

医生气喘吁吁地来了，他看着桑德利，已经回天无术。桑德利已不再流血。

我们在一艘机动救生艇处陪着他，为了上岸，水手们已将救生艇放下。我们都希望这两处伤口是由一颗子弹造成的，这样子弹从身体穿过就不会伤及肺部以外的其他部位。我们不断鼓励他坚持下去。“那么多伤者都挺过来了！”我们对他说，但他并没回答。

我们在救生艇的底部让他和其他伤员平卧了下来。他向我们做了一个告别的手势。在又一轮持续 10 多分钟的轰炸之后，我们和其他活着的人带着铺盖、饼干、肉和卸下的两挺机枪放弃了军舰。

桑德利在芦苇丛旁躺着，身上穿着海军的大衣，盖着被子。飞机向山谷飞去，周围死一般沉寂。

炮舰沉没

桑德利问自己有没有盖被子，因为他感觉冷，面色极为苍白。我们在芦苇丛中捡了四五床被子给他盖上，这些被子是船员们上岸时丢弃的，其中有一床是他的。这 4 床被子是我们几天前交了几十美元押金向

南京大都市饭店^①借来的。上船的时候,桑德利决定带着这些被子,“这些也不够!我们付了那么多钱!”他说。救生艇又回到炮舰边去取药品和蒸馏水,这时,轰炸中躲在江岸另一侧满载士兵的大船向“巴纳”号靠近。“巴纳”号已经慢慢地沉入水中。他们用机枪向被放弃的军舰扫射。远处传来了嗡嗡声,轰炸机即将返航。

“你问问医生还有没有吗啡”,桑德利说道。他已疼痛难忍。吗啡已经用完了,我们只能在午夜抵达和县时才能找到。桑德利惟一的要求就是让我们将他放在堤岸最高处。因为他周围围了许多人,使得他在沼泽中不断下沉。我们将他抬起,慢慢地挪动了几米。“可以了”,他说。

傍晚,当轰炸机不再威胁我们的时候,我们开始行进。最初的几千米,桑德利一直在美孚石油公司的小汽艇上,这艘小艇是中国船员丢弃的。我们在夜里一直拖着小艇走到最近的有人居住的地方。在这里,我们让住在稻田前面土房子里的中国人给我们准备了几张竹床。

桑德利仍躺在担架上,那是我们惟一的担架。我们花费了1个小时召集村民和一些搬运工将伤者运往侯森,那里距村子七八千米远。我们终于开始沿着堤岸前进。

为了让那些苦力们能够搬得动,我们在担架的前后分别系上了绳子,再系在竹竿上。4个赤脚的中国人在月光下抬着他,他们看起来很轻松。灌溉渠、运河,还有河泥的味道使这一切仿佛是在伦巴底。

桑德利请求他们走慢一些,每停一次,他都问我们是不是已经到了。“慢一点”,他用意大利语对那些搬运工说。搬运工马上就慢了下来,仿佛能听懂似的。他两次把我叫到身边,说想要喝水。出发前我们给他喝了两口中国茶,那是我们向所停靠的村子里一个中国村民要来的,除此之外他们什么也没有。

“没有水了”,我对他说,“待会儿到了下一户人家给你找些茶和热水,你也知道这附近的水不卫生。”

过了一会儿他答道:“巴尔基尼,是对一个快要死的人不卫生吧。”

他又一次叫住我说:“那些轰炸我们的飞机是中国的,但肯定是由俄

^① 即中央饭店。

国人驾驶的，机翼上还涂着中国国旗。”

威登·詹姆斯走近我问：“谁说的？”

我们给他翻译。詹姆斯说：“或许他发烧了，我们都看到了，是日本人。”

桑德利并没有在说胡话，我知道他想说什么。他希望能像一名战士一样，为了效忠领袖墨索里尼，在和敌人的战斗中英勇牺牲。他想让自己死得更有价值。3天前他登上了“巴纳”号，并说服我也上了船。而我们的意图是等待日本人抵达南京。我对他说：“我们不能引起事端。你想想，万一我们中的一个人出了什么事，或者炮弹击中了大使馆，那将会是国际争端，我们不能让政府和大使蒙羞。”

如果轰炸“巴纳”号和美孚石油公司轮船的飞机是俄国人的，或者是由俄国人驾驶的，或者就是我们几天前在南京一家旅店看到在吃午饭的那群俄国人，那么桑德利会因自己是为国捐躯而欣慰，即使是死在他国的军舰上。

我们对他说：“你说的有道理，或许就是俄国人，没人看清楚，可能就是那些8月份轰炸‘胡佛’号的俄国人。”

我们到了和县，中国人告诉我们那里有医院，而我们找到的是中国人用土石和竹子搭建的茅草屋。我们把担架放在院子里，等待当官的或是其他什么人来。

“我们这是在哪里？”桑德利问。

“我们到了。”

“嗯？是医院吗？”

“非常简陋。”

“那么”，桑德利平静地说，语调没有变化，“那我明天就要死了，他们要是不能给我输氧，就救不了我了。”

“去看看我的孩子们”

医生在中国士兵拿来的一堆药品中找到了吗啡，给桑德利进行了注射。我们就让他睡在外面。那天晚上我和一个美国兵一起睡在一张中国人的床上。我们浑身湿透了，又冷又饿。第二天早晨天刚蒙蒙亮，就

进来一群好奇的中国村民和士兵,他们围在担架周围。医生已经筋疲力尽,还在给伤员包扎伤口进行麻醉。我们抓住一个士兵的胳膊来到门口,把步枪塞到他手里,示意他驱散人群。

桑德利还是以与昨晚同样的姿势躺在那里,倚着未受伤的那一侧,紧握的拳头放在下巴旁。

他更加苍白消瘦。他死后的几个小时,面容严肃,眉头紧锁,一副崇高威严的样子。

他临死前曾对我说:“去意大利看看我的孩子们。”他就这样死去了。他既是一名战士,又是法西斯主义者,也是一名记者。

路易吉·巴尔基尼

幸存者和炮舰抵达上海 12月17日

中午,载着记者桑德罗·桑德利遗体的炮舰“瓦胡”号和一艘英国炮舰“瓢虫”号抵达了上海。遗体存放在一口中国棺木中,上面写着“桑德罗,意大利公民”。

东京官方公告显示,日本官方已对12日轰炸“巴纳”号和“瓢虫”号一事向美方和英方表示了歉意,各方均认为这一事件已告结束。

《晚邮报》1937年12月18日

(孔倩倩 译)

36. 中国战事(12月8日—15日)

南京陷落

日军进入南京这一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重大行动,除了其战略价值外,还有一点不可忽视,津浦铁路及其沿线地区也将随之受控于日本政府。首都陷落后,日本政府随即宣告不再承认国民政府,并且唆使建立新政府,迁都北京。此举决非事出偶然。

和安卡拉^①一样,南京是新政府的首都,它标志着人们从现状和错误中挣脱出来的决心,也暗含着人们对未来的期望。南京记载着明朝辉煌历史的开端,自1928年起,国民政府定都于此,此举不仅是人民意志的反映,更是一项政治决策。千里之外的北京标志着大清王朝的衰落及外族势力的入侵,同样,千里之外的广州,是革命第二阶段的中心,也是国民党事业的发源地。而南京,与上海的外国势力不相为敌,既非沿海城市也非内陆城市,而一心想要成为新政府的心脏,集中一切势力,在国民政府及国民党的统一领导下,成为不同历史观、经济观、种族观的平衡点。随着首都的建筑与街道美化一新,国家也在缓慢而又团结有序地向重建家园的目标稳步迈进。

今天的中国政府迫于日军的强压,已经与最初的目标和新的体制背道而驰了。他们已经将紫金山中山陵中的革命之父,他们的精神领袖抛之脑后了,如今的中山陵只听见日军的隆隆炮声。这场败仗的可悲之处究竟是什么呢?在过去痛苦的十多年间,国民党为了与一股强硬势力抗争,无法集中精力投入到精神建设和物质建设中,想要重新书写中国历史,看来只能是徒劳无功了。事实上,中国的革命遭遇惨败。国民政府退守中原,负隅顽抗,白白牺牲了大批死守前线为荣誉而战的将士。难道他们真的以为,他们会获得最终的胜利?真的可以重树威信,重掌政权吗?在很大程度上,这还要取决于日本的意愿和能力,北方新政府的

^① 土耳其首都。

建立则是一种折中的做法。

日本的大举进攻使中国历史倒退。满清末代皇帝在东北重夺皇位、蒙古独立,使日本这个汲取了中国古老灿烂文明的人侵者又有了进攻中国的想法。随着新政府的建立,日本人仍没有忘记重温旧梦,着力使中国重现革命时的分裂状态。共和政府迁都古城北京,五色旗在北京城内迎风飘扬。人们还不知道建立新政府的前部长们究竟是谁,但是可以肯定绝对是旧势力中的一些人。

日本在中国建立新政府,旨在限制国民政府当局,至少可以掌握中国大部分区域的控制权。在华北建立新政府,意义非凡。

因此,在蒋介石一味倡导顽抗到底的同时,日军已准备南下广东,进攻国民政府的最后一座重要城市,此举绝非意料之外。现在,中国政府已经无法从日本军方获得任何折中的化解危机的办法。除非奇迹出现,否则国民党作为政府和政党,都不得不在接二连三的战事中屡尝败绩。

日军向南京政府劝降无效,10日皇军攻入城内,城内的中国人三天来顽强抵抗。同时,日军渡过长江,在左岸两支部队会合,以期占领通往天津铁路的始发站。海军舰队突破了中国人的防线,进一步逼近了首都。

在政治方面,重建工作极其重要,意义重大。12月14日,由日本扶持的傀儡政权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北京成立,它将全面取代国民政府。该政府的工作核心即是在经济规划和反共事业上与日本建立全面紧密的合作关系。日本这种凭借军事胜利的方针,不可避免地导致对南方各省的进攻。尽管没有具体迹象,但进攻汉口的计划有可能提前实施。可以确定的是,中部战线的日军已经向沿海转移,等待着被调往新的战场。

《国际关系》第51期,1937年12月18日

(袁斐 译)

37. 在上海公共租界的新恐怖主义行为

向日本财产投掷炸弹,在萨沃依精锐部队的两处
地方爆炸——没有人员伤亡——
共产主义煽动者制造麻烦

本报特讯

上海 1 月 1 日

中国的恐怖主义行为毫无疑问是针对日本大企业在上海的办事处和仓库的,但是对为保卫上海而委托我们驻守区域内的萨沃依精锐部队造成了严重后果。他们知道其行为会对外国士兵造成威胁,但他们丝毫没有在意对这一区域内军队的伤害,因此不排除凶手有意挑起国际事端,使日本当局陷入尴尬的状态。

日军遭袭

事实上,今天 5 枚中式手榴弹落在萨沃伊精锐部队所在的两处地方。所幸没有人员受伤。据一些人说,此次事件是中方司令部计划的一部分,目的在于在节日期间制造全城恐怖,以此造成混乱和恐吓的气氛。

直接针对皇军的计划则十分令人痛心。在福建路和汉口路的交叉路口,他们向没有任何武装的一支日军投掷了两枚手榴弹,造成 5 人受伤,其中 1 人伤势严重。另有 5 名中国人受伤,包括 1 名妇女。所有袭击都发生在 11 点 30 分至 11 点 40 分之间,时间间隔很短,由此可以看出此次袭击是有预谋的。

精锐部队的士兵奥菲欧·巴巴拉多是罗宾逊路 74 号“中日公司”纱厂大门的哨兵,事发当时,他拇指扣在步枪背带上,正在一处小型防御工

事外散步……^①

巴巴拉多无法追上那人,就朝那人开了两枪。精锐部队的官兵们向前追赶,但追了几米之后就不得不停下来,他们看见了一群与那个袭击者很像的中国人:他们都和袭击者穿的一样。

挑衅的旗帜

第二次袭击于一两分钟之后发生在新加坡路 60 号,精锐部队在那里有一个岗哨。那里是属于日本所有的“上海纺纱公司”一家工厂的入口处。一男子在此经过,与其他中国人一样,在离岗哨三米处投掷了一枚手榴弹,G. B. 马乔拉纳举枪向他射击。手榴弹穿过岗亭的玻璃爆炸,并炸坏了附近的树木,在地上炸出了一个坑,但并没有炸伤士兵。那个中国人边跑边扔出第二枚手榴弹,手榴弹在不远处爆炸,没有伤及任何人,紧接着他又投掷了第三枚,这枚手榴弹落在一个满是水的水沟里,没有发生爆炸。手榴弹是小型圆柱形铁制的,铸有刻槽,呈灰色。

由 12 名精锐部队士兵和 1 名士官组成的巡逻队,今晚对由他们负责监管区域的巡逻,一切安然无事。

1 月 1 日是中华民国的节日,也是孙中山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纪念日。今天早上,在所有的公共居民点、法租界,在刺刀、国际部队和黄浦江上停泊的战舰上大炮的保护下,中国人在建筑物的楼顶、阳台、商铺插满了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这些旗帜几乎是一种挑衅。

……

上海的游击战不像阿富汗人在山中进行,也不像阿拉伯人在沙漠的沙丘间进行,而是在报亭、加油站和出租车之间展开的。实施街道游击战的匪徒喜欢在妓院过夜,并坐在餐馆的桌子前舒服地吃东西,而不喜欢独自一边吃着烧饼,一边等待日军卡车车队的经过。这场游击战是在强大的中间力量的保护下进行的,这也再一次揭示了中国人想制造麻

^① 此处原文缺失部分内容。

烦,从而激起日本人进入公共租界展开反恐行动的欲望。针对日本所有财产展开的攻击,对意大利士兵的安全也构成了威胁,共产党秘密组织和国民政府又一次紧密合作。

路易吉·巴尔基尼

《晚邮报》1938年1月2日

(毕艳红 译)

38. 日本海军大臣米内对英国人发出明确警告 在必要情况下日本将动用武力阻止对中国的任何军事援助

巴黎1月3日

日本东京的一本杂志发表了哈瓦斯对日本海军大将米内的一篇采访,这篇采访就像是一份公文。在采访中,日本海军大臣米内阐明了东京在远东的政治目的。海军大将米内被认为是目前日本政府的典型代表。

海军大将宣称,在中国北方需要一个特殊性质的政府。“你们不久将会明白”,他补充说,“这是事实。这个政府将与满洲国完全不同,它将会考虑中国人的习俗,保证人民的幸福,当然它是反共的,也将会在中国南方实施相似的体制。北京和南京两个政府将合并,建立一个完整的中国政府。英国首相声明说,我们想将我们喜欢的制度强加给中国。也就是说他拒绝承认我们要在远东建立永久和平的打算。”

海军大将坚持一件事情:中国、满洲国和日本应该建立一个政治、经济和思想体系的同盟。他随后分析了在亚洲出现排斥白人的可能性及后果,并表示:“我不害怕坚持这一点,我也将在全世界面前坚持这一点:白种人对黄种人的禁锢应该解除了。当然这一解放的迅速实现引起了全面战争的爆发,但是即使我们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结果也是一样,那就是全面战争。这就是天意,重要的是实现我们的目标,不要考虑次要因素。”

随后在被问及关于英国和苏联对中国的援助以及日本在中国南方扩张的利益时,海军大臣说:“要战胜中国的抵抗,需要绝对阻止英国的援助,甚至需要付出战争的代价。我们能够做什么?只要目的正当,可以不择手段。为什么英国不愿意了解他们对中国的援助毫无意义?这种援助只会引火烧身。我不愿意相信,美国人的利益将不会因为我们的行动而受到威胁。如果我们对英国动用武力,美国人也将被英国人拖

下水。”

海军大将米内总结说：“日本的经济实力超出了中国人和白人的想象。我们永远也不会落入战后德国的那种处境。”

哈瓦斯发表了这一消息，并补充说，普遍认为海军大将是深受拥护的未来首相，就像近卫文磨一样。

上海租界遭恐怖分子袭击

日军不停地向山东进军——不计其数的中国人逃往香港

上海 1 月 3 日

日军在中国南方的活动日益频繁，为应对局势，香港的英国政府则加紧实施立法措施。经英国王室同意，今天港英政府宣布，在食品检查、消费以及驱逐被认为是不必要人员方面具有自行处置权。

同时英国当局还要焦头烂额地应付不断增加的拥入英国领土的中国难民，难民人数已超过 25 万。很多人被安置在营地和医院里，但也有些人仍然睡在马路上和周边的乡村里。

当局对于难民所采取的措施根本不恰当。尽管日军飞机每天都对香港通往内地的公路和铁路进行轰炸，但是由美国和其他国家提供的战略物资仍源源不断地卸货并运送给蒋介石政府。

今天，在香港附近由日本人占领的一些岛屿上，有人向一艘英国快艇开枪。由于快艇非常靠近岛屿，因而受到轻微损坏，但船上人员都安然无恙。

上海秩序仍然混乱。昨天白天，中国恐怖分子发动了几次袭击。一枚炸弹扔进了一个非常有名的米商家里，这个米商前不久参加了一个刚刚成立的傀儡组织。一枚燃烧弹在日本总领事位于公共租界的私人洋房花园里被发现。随后日本媒体收到了一份秘密传单，传单上宣传了一些“爱国主义行动”。

.....

日军轰炸了江西省南昌市这一重要的战略中心。在城市上空，他们与六架中国飞机展开战斗，其中一架中国飞机在战斗中被击落。随后其他日军飞机又轰炸了广东省从化和湛江的机场及军事设施。在湛江，日

军飞机击毁了一艘中国军队的运输船。

昨天,中国飞机袭击了南京,投下了十枚炸弹,但是由于炸弹落到了一片空地而没有造成任何破坏。在高射炮中队的火力攻击下,中国飞机不得不离开。

日军在南京成立的自治委员会发表声明说,废除国民党专政。另外声明还指出,行政必须建立在有利于人民的基础上,中日合作将保证确立持久的和平,必须消除抗日思想,同时采取反共政策,并消除美国 and 欧洲等其他势力的影响。

D. T.

《晚邮报》1938 年 1 月 4 日

(毕艳红 译)

39. 日本要求上海的行政控制权 关于公共租界的问题 萨沃依精锐部队之壮举 孔子之城被占领

上海 1 月 4 日

日军正式向上海工部局提出了一系列要求,这些要求若能得到满足,将会带给他们真正的控制权,甚至包括对公共租界的控制权。日本高级司令部的 4 位代表与工部局主席进行了商讨,敦促其立即采取法律行动,镇压公共租界内反日分子的活动。

日本代表明确指出,由于工部局在某些情况下不重视或不作为,因而恐怖行动和恐吓行为是有可能发生的。因此他们要求将警备司令部的职权委托给日本人,以及那些有能力控制公共租界出版物发行的人,无论是那些财产归中方所有、出版中文报刊的人,还是那些外商出资用外语出版的人。

上海工部局主席承诺,将加大力度镇压反日分子的活动,使他们的行动不至于造成危害,并承诺会考虑日本提出的要求并在晚些时候公布他的决定。

在上海,人们的一致观点是:如果这些要求被接受,日本将取得公共租界的控制权,实现他们的又一野心。

日本大使馆的一位发言人向记者承认,如果工部局对这些问题不予考虑,日军司令部将不得不认为工部局的工作缺乏诚意和效率,因此工部局应该采取适当的措施。

日本方面的要求成为工部局和外交使团多次讨论的主题。许多相关国家的政府都被要求对该问题表明各自的立场。

在上海战役期间,由意大利士兵驻防的租界区域是最为暴露的地区之一,因为这条前线延伸 3 公里直达距离中国防线几米的地方,但是意大利指挥官和军队的积极举措使得该区域没有发生什么值得特别强调

的事件。随着日军的胜利,战线已离开上海,因此,萨沃依海军将执行交给他们的另一项任务,也就是防范恐怖分子的袭击。这不是一项简单的任务,不仅要熟悉这一特别适合隐藏的租界区域的地形,而且在新任务中,指挥官和下属必须克服每一道难关,以对抗中国秘密组织的一切阴谋,维护稳定的秩序。

有消息表明,日军在山东的作战又取得新进展,皇军继续前进到泰安以南,今天早上占领了山东省的曲阜(KuFau)——这里是孔子的出生地,坐落在津浦铁路线上的泰安以南。

今天早上,20架日本飞机在汉口上空盘旋,并投下了大约200枚重量不等的炸弹。这是6个月以来日本对汉口的首次空袭。

.....

D. T.

《晚邮报》1938年1月5日

(顾烨 译)

40. 日军控制下上海的重建

对电报电缆公司所有权的掠夺—— 日军在山东省的新进展——23架飞机轰炸汉口

上海1月6日

今天早上,一些日军人员开始接替上海电报电缆公司的管理人员进行工作。人事更替使海底电缆和无线电营运临时中断,因此,城市的通信在中午时分中断了。

另外,日本人还宣布,他们打算建立一个特别的电报审查机构,以审查上海所有的无线电报通讯商。由日本大使馆授权的日本代表进一步声称:记者和特派通讯员的电讯稿被审查员删除将不予通知。该日本代表还解释说,审查工作将主要针对普通电讯稿,但一些报刊文章也是审查的对象。

同时,公共租界当局也对日方提出的加入申请感到担忧。一位工部局的官员声称,任何对公共租界当局颁布的法令条例的修改都应当在权益各方的外交对话中进行。他随后表示,接受日方最大程度地参加工部局活动的申请将会降低办事效率,因为英联邦成员国和日本的管理模式有着极大的差异,更不要说双方还存在语言障碍。

与此同时,日军正井然有序地进入山东。在占领兖州之后,他们继续迅速占领了津浦铁路沿线地区。今天他们到达了济南附近,并将在明天占领济南,因为本该守卫这座城市的部分中国部队看上去似乎已经和他们的将领一起放弃了该城。

日军部队已经渡过长江到达南京北面的高地,并继续沿着铁路向北进军,他们的目的地是蚌埠。根据日本的军事计划,这支向北进军的部队将与从黄河向南进军的部队会合。人们可以预见,在未来的几个星期内,江苏和山东两省将被日军完全占领。

就第三条战线而言,正如人们所知道的那样,日军沿通往泰安的铁路线,矛头直指青岛。今天,日军已沿支线铁路向南直驱费县。费县位

于泰安以东 110 公里处。

日军指挥官宣布,他们结束了在河北中部和南部的长期而艰巨的围剿行动。成千上万的中国武装人员在一场接一场的秋季战斗中散失,下落不明,只有极少数人能够团结成统一的部队,每支部队的人数从 200 人到 2 000 人不等。他们展开游击战争,并从日军后方攻击敌人。当地人民在战争中蒙受了极大的痛苦,物资和人员损失惨重。在一次有计划的围剿行动中,日军将 21 200 名中国士兵关入监狱,并缴获了他们的武器。

D. T.

《晚邮报》1938 年 1 月 7 日

(潘书文 译)

41. 前 往 南 京

当几百艘挤满中国逃亡者的帆船和轮船沿
长江逆流而上时,日军正沿江岸前进,
他们越过了江堤、稻田和沼泽地

11月23日,桑德罗·桑德利和路易吉·巴尔基尼(记者)从上海前往南京,他们想要参观一下这座日本人即将占领的城市,体验一下中国的防守,然后从江岸离开,但是日军的快速进攻阻碍了他们离开南京,他们只能被困在首都南京的城墙内。12月9日,他们登上了一艘停泊在长江上的“巴纳”号美国炮舰,与此同时,日军开始了第一轮电闪雷鸣般猛烈的炮火攻击。为了安全起见,“巴纳”号沿着长江逆流航行了28英里。在12月12日那天——在众所周知的严峻形势下——“巴纳”号在遭遇长达45分钟猛烈的空袭后沉没。桑德利在严重受伤后,于次日在和县死亡。和县是一座距离此次灾难的幸存者登陆点10公里的小城。

以下摘自路易吉·巴尔基尼从11月23日那天一直到后来写下的日记。

11月23日

中国人已经学会,当战争爆发之时,只要买一张前往任何地点的车票,旅行3到4天,就能重寻和平。几十年前的很多场战争规模只有方圆几十公里,持续时间也只有短短的几个星期。但是这次,战争持续时间很长、遍地开花,敌方进攻的速度比逃亡部队逃跑的速度还快,而且不时会有空袭。可怜的人们不知道逃向何地。成千上万的逃难者乘小船抵达上海,这座城市已经在日军的掌控之中,也意味着在一段时间内不会有战争。与此同时,成千上万的人离开上海,绝望地奔向刚刚腾空的小船。没有任何人知道何去何从,没有任何人知道或许他们乘船前往的地方比他们将要离开的地方更加危险。

这些奇怪的中国人

这些和我们一起出发的中国人都面带满足和喜悦之情,因为他们觉得已经从深重的灾难和死亡中解脱了出来。在刺骨的严寒中,他们一个个紧挨着,女人,男人,破布衣服,孩子,裸露的双腿,穿着黑绸衣服、留着胡须的老人,鸡肉,篮子。当一个迟来的人到达码头时,小船已经发动了,于是,他将包裹丢在地上,绝望地望着那些刚刚上船离他只有几米远的人们,就好像他已经被判处死刑一样。或许,他留在上海这座被十多艘军舰保卫的国际大都市并不是一件坏事。或许,另外那些人前往的地方正是他们下一次准备撤退的地方,也正是日军前进的目的地。

.....

为了记住航行路线,我们需要在地图上标注记号,而且头两三天里,我们需要经常打开地图查阅,以记住航行各个阶段的地名。那位售票员并没有向我们保证任何事,他只是朝我们微笑。在中国,一切都有可能发生,甚至连出售那些不应该到达的地方的船票这样的事也会发生。他告诉我们,或许我们可以在一个地方的小旅馆中找到藏身之处,但他不能向我们保证任何事,尤其不能向我们保证在小旅馆中不会遇到奸细。那位售票员是英国人。然后,我们就出发了。

在船上,严寒刺骨,寒风透过不结实的舷窗吹进来,让人无法忍受。江面被浓雾笼罩着。一个小铁炉在一间小小的公共厅中燃烧着。我们坐在里面,身裹毯子,读着一些过期的杂志,等待着中国服务员准备饭菜。我们无聊地吃了一些上世纪末英国式的菜肴,边嚼着布丁,边看着周围这些奇怪的中国人。如果教他们做意大利式肉酱面,或者法式大餐,或者俄罗斯菜,他们也会在无意识中通过自身的勤劳将这些菜肴做得很好,就像做50年前英式的菜肴一样。他们吃得很差,但他们一直在愉快地交谈着。船长是一位肥胖的、衣着整洁的、神采奕奕的年轻先生,他肯定是第一次指挥船只航行。他对自己这艘在江面航行的小船感到非常自豪。他很喜欢这艘古老的船,就像喜欢一个女人一样。他喜欢这艘带有铸铁的烤炉、满是透风的舷窗、古老的杂志、伴有炸土豆的牛排的小船,他喜欢这艘墙壁上镶满了扬子江风景画,甲板上挤满了手拿鸡肉

的中国人的小船。

.....

11月24日

昨天,在黄浦江和长江交汇处,成百上千艘日军运输船正在抛锚,在灰色的天空中,这些船只的船头朝向激流,并且被一条条铁链牢牢地拴着。破旧的货船、短距离航行的小艇、捕鱼用的渔船,总之,所有能够漂浮并且能够运输枪支弹药、士兵、大捆的饲料以及小车的船只都派上了用场,它们停靠在距离上海只有几千米的水域。日本人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延长船只寿命的能力,这些船只在他们手中经过20到30年的服务期后居然还能使用。“你们为什么还在使用这艘已经使用了40年的名叫‘出云’号的军舰?”有一天我们向日本海军上将长谷川提问,他是日本舰队在上海的司令官,他就住在“出云”号上。“我们每次都在需要的时候及时修理它”,将军一边向我们致敬,一边回答。

王先生

在被灰色的天空笼罩的扬子江面,5至6艘驱逐舰从我们旁边经过,它们正慢速逆流而上。早些时候,我们在抛锚处再次看到了它们。或许它们要将一些步兵送上江岸,与此同时,它们还在不停地发射炮弹。长江南岸50英里以内已经被日军控制了,控制范围从北部一直延伸到南部,从长江一直延伸到杭州湾。日军部队正缓慢地向南京逼近。“但是前进道路是艰难的,因为日军步兵需要逐步重建中国军队在撤退过程中摧毁的桥梁,并注意河道、沟渠,还要开着运输车、拖着大炮穿越稻田和沼泽地。在沿江地区,日本海军还要击退两岸的阻击火力。同时,即将停留在某地的日军炮兵一直在等待着晚上将军的命令,在准确的时间将炮弹射出,以避免浪费炮弹。这是十分艰巨的任务。”

在长江左岸,也就是今天早上我们下船的地方没有发生战斗。通州(TongCiao)位于3天前被日军占领的福山附近。在那里有一些堡垒,它们已经被从各地登陆的日军步兵包围。在福山,或许房子已经变成了一堆堆冒着浓烟的废墟,到处都是尸体、撕碎的纸片、空弹壳、中国和日本士兵随身携带的盛满了米饭的饭盒。在这一带,有一个挤满了人的小村

庄,人们吃着饭、笑着、买着熟鸡肉,在村外的山坡上散步,并用刚砍下的竹子作为散步的拐杖。

王先生,这位戴着毡帽,穿着黑绸便服,镶了几颗金牙的中国人是航运公司的代表,正是他为我们准备了继续航行的小船。王先生会讲一口流利的没有大舌音的英语,他是一家外国大公司的职员,因此也精通西方文化。他的家在江岸边,是木制的欧式建筑,窗户都是玻璃的,还安装了电灯。因为还要等一个小时船才过来,他便邀请我们去他家坐客。我们凝望着那些满载着难民的货船在 Tungwo 靠岸,然后又满载着难民从 Tungwo 起航。王先生房子的木制外墙上刻着一些中文的诗句,大意是赞美理想的生活追求和所有中国文人的梦想,并且描绘了一位已卸任的精通书法的中国官员的悠然生活。这些都是那位殖民地问题专家刘先生给我们翻译的。一块漂亮的牌匾展示了两个正在看布料的中国女人,这块标有德国商标的布料颜色很别致。王先生是一个很现代的中国人,他巧妙地将他所拥有的传统文学书法功底和西方社会进步的文明科学融合在一起。我们问他是否相信能在几天之后从南京返回这里,他耐心地说:“人们总是能实现任何事情。”“战争亦或没有战争,这都是人们一手制造的,因此也可以轻易地从一个局面(战争)转到另一个局面(无战争)。”

沿江的道路

我们从王先生家出来后,走上了沿江的道路,挤进了成堆的人群中。人如此之多,就像在我们那里一场体育比赛结束后出口的人群。路边有一些竹竿和草席搭建起来的小吃店,卖一些馄饨、面条、香肠、豆腐、鲜美的烤鸡肉、盖着红印的猪肉、切割好的烤羊、榛子、豆角等等。人们吃着东西,大口喝着汤,将碗靠近嘴边,不停地用筷子把饭塞进嘴里,大口地嚼着。还有一些人或是席地而坐,或是散步,或是抽烟,或是喊叫,或是讨价还价。有一些扛着枪、包袱和子弹箱的士兵分散在四周,他们不知道为何而来,也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一位官员要求我们出示护照,他读着我们的签证询问道:“米兰?”到处都是辛劳的人们,各种气味混杂在一起,烤肉味,香火味,枪支味,烟草味,水果腐烂味,米饭味,胡椒味,棉花

味,排泄物的味道等等。这些气味如此浓烈,弥漫面积如此之广,以至于再强的风也无法使其完全散尽。浓重的气味就像雾一样覆盖着地面,粘在你的衣服上,就像尸体发出的恶臭一样,怎么也散不去。

我们、传教士夫妇、刘先生,以及那个有很多孩子和母亲的大家庭一起登上了停靠在一座白色石桥旁的小船,船看上去非常小。在桥上,一个穿着咔叽色军服的士兵要求所有过往行人(包括农民和家庭主妇)出示通行证。江岸上有一个防空壕,也就是一个由众多横梁覆盖的坑洞,但是在战争中它起不到任何作用,只能提醒人们附近有战斗。它就像一位战士的头盔一样恐怖。草已经从松软的土地上生长起来,看来这是一个修建于战争初期的坑洞。

路易吉·巴尔基尼

《晚邮报》1938年1月8日

(潘书文 译)

42. 桑德罗·桑德利^①的讲述： 我们在等待日本人

战争并没有在这个国家占多少空间，它和其他的灾难没什么区别。如果河流堵塞了，还有运河，如果有一天运河也中断了，所有的船都不能动了，那船夫们就可以安安静静地钓鱼了。

南京 11 月

如果有人想对大运河有一个概念，可以想象一下米兰和帕维亚之间的运河，但是大运河的宽度是它的两倍，长达 2 000 公里。无数条其他运河都汇集到这条运河，成为这个广阔无垠的国家里沟通和交流的网络。

还有很多小运河，连接着小村庄，就像我们的乡间公路一样。这里的公路很少，而且路况都很差，一下雨几乎不能行车。每条运河都有用纤绳以人工拉动的平底帆船和舢板。我从来没见过一匹拉船的马，只看到男人、女人、孩子们拉纤，船上还有一个人掌舵、一个女人煮饭，肩膀上绑着木板（那是大人们怕他们掉进运河里）的孩子们在船上看着风景。

在大运河上

经过运河的有大平底帆船或者小舢板及小型个人游船。逆流而上，风景几十年如一日。顺流前行，顺风扬帆，典型的中国式方帆。

平日大运河上的交通就很拥挤，如今长江已被封锁，交通状况变得更加糟糕。

战争并没有削弱这个国家海上和内陆之间的交通，只是改变了航道。由于不能沿江在 20 个小时内从上海到达南京，我们只能被迫在长江左岸还没被日本人占领的 300 公里的运河航道里航行。

我们观察到，战争在这个国家并没有蔓延，并没有让人触目惊心。

^① 此文显系作者死后刊发的。

战争和其他灾难并没有什么区别。如果河流被封锁了,还有运河。如果有一天运河也中断了,所有的船都不能动,那船夫们就可以安安静静地钓鱼了。只要活着就好,而且还有土地,广阔肥沃的中华大地养育着四亿人民。如果说长江右岸战火连天,家园被大炮和空袭炸弹摧毁,那么长江左岸还是非常安宁的。据翻译解释,人们知道有战争,但是并没有对此有什么反应。他们关心的是收割、播种、雨水、霜冻和干旱。对于富裕的人家来说,最重要是的吃饭,并讨论饭菜的味道和研究菜谱。所有这一切还保持着古老的传统,外来的恶作剧还没有侵蚀这里。在夜间旅行的时候,我发现有电灯的村庄很少,只是在海安我们才找到了电报机,并且那里的村长有广播设备。

我们住在一间小屋里,里面有一个小壁炉,壁炉虽然小但是散发的热量已经足够了。这里在晚上 11 点时开始提供晚餐,幸运的是,菜丰富得好像永远都上不完一样。因为下午 2 点的时候,船上曾经提供过小份的面包渣小蛋糕和牛奶咖啡,当时我们以为是餐前点心,所以都吃得很少,结果这就是午餐。接近 3 点的时候,经过漫长而无奈的等待,我们明白了自己的错误,但是已经太晚了。以大胃口著称的中国船员已经吃完了所有的食物。

枣子和榛子

快到 6 点时,饥寒交迫的我们开始焦躁起来,最后是长老会的传教士挽救了局面。他和他的妻子拿出了一些小盒子、小包裹和纸包,里面包着中国蜜饯枣子和榛子、中国甜食、巧克力和葡萄干。这对夫妻已经习惯于在中国长途旅行,所以总是准备充足。按照上帝的旨意,他们平等地与其他人分享上帝的恩惠,因此我们才能够继续忍受 3 个小时。然后他们开始唱赞美诗,之后又请我唱一些意大利歌曲,因为他们认为意大利人歌都唱得很好。我求他别坚持让我唱。小艇上又黑又冷,夜行的时间感觉过得特别慢,恼人、无聊。一切都很平静,只有掌舵的人每当隐约看见黑暗里有其他船只时,就鸣笛一声,那声音忧伤得就好像在发牢骚一样。

我们在海安住的房间里有 4 张行军床,没有床垫和床单,但是有两

条粗羊毛的毯子足以御寒。我和我的同事巴志尼(Barzini)、雷麦迪奥(Remedios)先生和一个中国人在那个房间过夜,传教士和他的妻子在别处睡。那群女人和孩子一上岸便消失了。

早上6点整,中国人把我们叫醒,说我们必须尽早出发,因为等待我们的还有10个小时的运河航行。

战争很遥远

天破晓了,地上铺满了一层厚厚的霜,让人误以为下雪了。我们穿过乡间小路来到运河边。人们像往常一样在路边看我们出发。被包裹在厚厚的蓝色棉衣里的孩子们看上去像北欧的拉普人。很多穿着棉裤的女孩子站在门口惊讶地看着我们。年迈的白胡子老头、穿布鞋的战士、头发蓬乱的老太、戴发亮的防雨布头盔的宪兵,一大群人看着我们出发。小船发动了。航行的时间过得极慢,一小时接着一小时,然而风景却完全没变化,一个村庄接着一个村庄。穿着蓝色衣服的人们望着我们经过。在岸边,我们看到一个男人,或者一个男孩,或者一个女孩在拉着纤绳;或者一群男人拉着一只巨大的船。

下午我们在船舱顶上度过。在我们眼前,运河一直延伸到视线的尽头,两边是平整的田地,田里满是正在劳动的中国农民。

接近3点的时候,船的发动机出了故障,于是不得不停船修理。我们靠岸的时候,一群中国农民微笑着靠过来好奇地看着我们。我们借助翻译问他们知不知道发生了战争,他们摇摇头,什么都不知道。运河上来自汉口的船夫曾经提到过有关消息,但是同样的消息多年来一直不断传播,人们已经见怪不怪了。如果说有战争的话,也是那么的遥远,根本就不需要在意。

故障排除了,我们继续出发。

太阳西下,快接近地平线的时候,我们发现运河变得越来越宽,渐渐进入了一个湖泊,实际上那是扬子江,也就是长江。傍晚5点的时候,我们隐约看见了英国船“吴淞”号停泊在长江上,被许多拖船和小舢板包围着,我们终于长长地舒了口气。

上船后,我们遇到了比我们早两天从上海出发的美国同事,他们才

刚到达几小时,此外还有一些太太从南京赶来,希望能在日本人占领长江左岸封锁最后一条自由通道之前到达上海。

“吴淞”号排水量2 000吨,负责汉口和上海之间的货物运输,只有很少的船舱房间可供使用,所以当晚我们只好睡在吸烟室里。第二天一大早,会有一条拖船把我们带到一艘停靠在镇江的内河船上,然后这艘船将把我们带到南京。

黄昏,长江上的颜色呈一种奇妙而恐怖的韵律,空气好像变成了紫色。接近太阳西沉的地方,有一些红色和黄色的光带,反射在长江浑浊的水面上,照射着茂密的芦苇丛。远处帆影点点,天空清澈明亮,但天气寒冷,只有零度。接着,天黑了。

“我们的冒险结束了……”

11月26日我们到达南京的时候已经是晚上8点了。在拖船上的旅行简直糟透了,5个小时一直站着受冻,脸被刀割一样的寒风无情地刮着。拖船不断地碰到长江左岸,它需要逆流航行,与凶猛的激流抗争,并且当时还有碰到中国人敷设的水雷的危险。

旅行中最先看到的景色是右边的山丘,然后是岸边以鸬鹚捕鱼的渔夫。我们本来以为这些鸬鹚是经过训练的,结果发现它们的脖子上被套上了圆环,以防止它们把鱼吞进肚子里。可怜的鸬鹚把鱼含在嘴里带给船上的渔夫,接着,又一次饥肠辘辘地跳下水继续捕鱼。等到这一天结束,渔夫会解下它脖子上的环,然后赏给它一条鱼吃。每只渔船上都有20多只鸬鹚,一排笔直不动地站在船舷上。其他的渔夫把船停靠在绑在竹架上的渔网旁边,用渔网捕鱼。

眼前只有万里无云的天空。最终,远远地可以看见镇江的两座山丘,穿过这两座山丘,长江就突然变宽,变成湖的形状。然后我们就看见内河船在等我们。船上载满了中国人,都挤在船边好奇地看着我们。我们的船渐渐靠近。这时我们知道我们的冒险结束了。6个小时之后我们将到达南京。

11月26日晚。我们告别了传教士和他的妻子以及随行的中国人,他们当晚继续西行去汉口。雷麦迪奥先生和我们一起下了船。

夜晚的南京灯火通明。我们的船停在一艘美国军舰边上,在这里第一个和我们联系的美水手是巴黎人,只是国籍是美国。他不讲我们的语言,只讲故乡的方言。最后,一艘小艇把我们带上了岸。没有公共汽车,也没有黄包车。美国同事打电话给美国大使馆,于是来了几辆车把我们送到了上海路的意大利大使馆。所有人都撤离到了汉口,只有诺斯(Ros)先生还在等我们。这里情况如何?城市很平静,至少现在很平静。没有香烟,缺乏黄油、白糖,只有一家商店是开门的,但是它又能开业到几时呢?

诺斯先生还很乐观。也许什么都不会发生,也许日本人只占领城市而不会造成破坏。空袭?是的,一天两到三次,但是他们只轰炸飞机场。几天前他们估计错了,日机轰炸了一所学校,造成了几百名学生的死亡。城市里军队的军纪都还算严明,奥地利人组织的警察也很敬业。这就是所有的情况。

南京这座被市民抛弃的城市,只能在刚刚涂上灰色的纪念建筑^①旁,静静地等待着日本人的入城。

桑德罗·桑德利

《新闻报》1938年1月9日

(黄秋苑 译)

^① 指中山陵。

43. 在中日间调解的传闻

意大利和英国驻华大使在香港会面—— 上海又发生屠杀事件

上海 3 月 8 日

媒体宣称，一轮新的意在结束中日敌对关系、调解中日纷争、维护中日和平的举措正在实施过程中。正是基于这一点，目前正待在上海的意大利驻华大使克拉(Cora)先生和英国刚上任的驻华大使卡尔先生两个星期前在香港的会面就显得格外有意义。根据广为流传的可靠消息，这两位外交官将讨论指导中日迅速停战的一系列程序，这一程序将为中日在真正意义上的和平谈判扫除障碍。但是，直到目前为止，全国各地都对这一维护和平的举措最终能否生效持保留态度。

同时，日本军方发言人今天还宣布：根据权威机构证实，中国北方地区和长江沿岸地区自战争开始至今，中方的伤亡人数已经达到 80 万人，其中包括一些由于战争、疾病和受伤而死亡的人。他还补充说，如今，中国已整编完毕中等规模的 100 个师，每师由 5000 人组成，在山西、平汉线、津浦铁路的南北以及杭州等战场整装待发。他忽略了仍待在山西的那些中国部队，因为那是不太重要的残余部队。

接着，新闻发言人说，根据一些部门及司令部提供的消息，中国位于徐州前线的防御阵地正在逐步崩溃。位于徐州南部的中国军队草拟了一份攻击位于定远(TingYuan)地区日军的计划，但他们的行动在还没有实施之前就被日军无情地击溃了。

同时，在黄河沿岸整编好的日本军队继续对河对岸的中国防守部队进行炮击，同时日本空军中队还对离黄河很远的城市中心区域进行轰炸，尤其是在山西省和河南省境内。今天早上，郑州也遭到了日军飞机在高空的长时间轰炸。

新闻发言人在谈到中国空军的战斗力时明确表示，中国自产的空军战机已经在几个星期前就被日军消灭了，不仅飞行员被日军消灭，连飞

机及机场设备也被日军摧毁。现存的空军战机几乎完全是外国的，从飞行员到飞机都是外国的。

.....

D. T.

《晚邮报》1938年3月9日

(潘书文 译)

第四部分 德国方面资料^①

1. 国务秘书冯·马肯森随笔

1937年11月3日于柏林

帝国部长先生根据他至今的印象,不认为布洛姆贝格元帅预定明天与领袖会面就撤回在中国军事顾问一事进行商谈,会仅限于接受一个相应的指示。再则,他——帝国外交部长——也指出,陆军元帅必须提出不同论据。我给他提出元首是让法肯豪森将军还是让苏联将军留在中国的建议。^②

马肯森

(译自德国外交部档案/埃尔温·维克特著《南京的德国好人》)

① 本部分德国资料来自德国外交部档案馆和台湾“国史馆”,由郑寿康翻译,张生校订。

② 编者按:当时德国和苏联均向国民政府派出了军事顾问,但德国军事顾问一直面临着要求他们撤回国的内外压力。

2. 国务秘书冯·马肯森随笔(摘要)

1937年11月8日

(埃尔温·维克特按:希特勒在与帝国国防部长的一次谈话中,就是否应从中国撤回德国军事顾问一事作过讨论,凯特尔将军说没有接触这个问题,)但元首指示陆军元帅冯·布洛姆贝格要注意帝国国防部从亲华立场的名声中摆脱出来。

(译自德国外交部档案/埃尔温·维克特著《南京的德国好人》)

3. 德国悉尼总领事馆呈送外交部报告

1937年11月9日于悉尼

致南京德国大使馆副本

内容:对日本的抵制运动

航空邮寄

日本飞机对上海、广东和其他中国城市的投弹轰炸在澳大利亚激起了普遍愤慨。

这里的媒体在批判日本“粗暴行径”和“悍然动用武力”的同时,也指责意大利和德国是同谋者。工会联合会中央执行委员会还建立了一个“声援中国委员会”,英联邦圣公会主教和悉尼大主教随即发起了一场抵制日本的运动。只有弗伦特勒和墨尔本两处港口的工人曾短期拒绝为日本船只办理装卸货物。但这次的抵制运动至今并未取得明显效果,并可预料未来也不会形成更大的规模。无论是澳大利亚的总理吕翁纳(Lyone),还是工党的头头库廷(Curtin),他们曾多次明确表示反对这次抵制运动,认为它会损害澳大利亚和日本的贸易关系以及澳大利亚劳务市场的发展。

东京和南京的德国大使馆会收到本报告的副本。

阿施尼斯博士(签名)
(译自德国外交部档案)

4. 美国麦美伦公司火油物产中国总经理嘉第 火油物产公司致南京德国大使馆函

1937 年 12 月 3 日于上海

编号:5719/1101/38/56

致南京德国大使馆

从 11 月 16 日以来,我们就没有收到过南京子公司的信函或电报。我们不知道那些人是否离开了南京,以及我们办事处和仓库现在情况如何。我们斗胆请求,如有可能,请派一名中国人到我们的办事处(大陆银行 302 室和 307 室)去查看一下。如果没有人,门是否和其他公司的办公室一样贴上了封条。凭证件去查看我们的油栈,它位于石鼓路 95 号的一处棚屋里——尽管贴有封条——查明我们的货物是否还在那里。我们将十分感激。假如我们的职员仍在南京,请你们指示他们立即和我们取得联系,书面或亲自来公司面谈;假如我们的职员还在那里,请指示他们立刻将油栈的货物卖掉,或是取出货物,然后将全部东西贴上封条。我们本不想向你们提出这个非分的请求,但又不可能给南京方面写信,也很难取得去南京的许可证。我们只知道德国大使馆的几位先生还在南京,因而提出了上述请求。

总经理(签名)

附:公司油栈地址的示意图(略)

(译自德国外交部档案)

5. 陶德曼致德国外交部电报

南京发出:1937年12月3日0:55时

柏林收到:1937年12月3日1:50时

密码,绝密!

致帝国部长先生

蒋介石先生先对德国为和平作出的努力表示极为感激。他说,中国准备接受德国的斡旋,因为中国将我们看作是朋友。我再次扼要阐明了日本上次的声明,蒋介石当即询问,日本是否仍坚持同样的……^①我回答他说,情况是这样的。在电报中只是讲述了要点,但在条件中也只包含要点。蒋介石即说,他不能接受日本人作为战争胜利者的立场。我回答说,全世界都十分钦佩中国军队的战绩。蒋介石接着……^②他也不会接受日本人的最后通牒。我回答说,这不是最后通牒。蒋介石对此表述了如下的立场:

1. 中国接受这些条件作为谈判和平的基础。
2. 不得损害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③华北的主权。
3. 德国在和平谈判一开始时就应该作为斡旋人进行工作。
4. 不得由于和平谈判涉及中国与第三国订立的协定。

关于第一点,我对他说,我认为中国声明准备以一种和解的精神和意愿……^④讨论这些条件是必要的。蒋介石声明说,他愿意如此做,但他期待日本也如此做。

关于第二点,我提请蒋介石注意日本提出的那些条件,华北的最高长官据说是亲华的。蒋介石回答说,如果已经选出此人担任这个岗位,他不会仇日的。

关于第三点,我给蒋介石解释说,德国可能不愿意直接参加谈判,更

① 此处脱落一个词组。

②③④ 此处脱落词组。

不会主持谈判。我们宁愿在幕后着手做帮助中国的事。蒋介石表示希望我们将好事一直做到底。

关于第四点,我提请蒋介石注意日本的反共要求。我认为,这个要求与中俄互不侵犯条约并不相对立。蒋介石没有反对我的意见。

有关停止敌对行动的问题,我对他说,我想象是这样的:在蒋介石的声明转达给日本人、日本人也表示同意后,元首和帝国总理就会对双方政府发出停止敌对行动的呼吁。蒋介石表示同意。最后,蒋介石强烈请求日本政府对前期谈判尤其是谈判的条件要严格保密,这是和平的先决条件。我认为,我们应该全力支持这个条件。否则很难动摇蒋介石的观点,即他要是下野,政府就会落到亲俄派的手里。日本应该尽一切努力,使他能够实施谈判。因为蒋介石在以前和我交谈时说过,中国不可能接受蒙古自治的要求。因为它意味着失去两个省。我还问过他,是否希望就这点对我说些什么。他解释说,关于蒙古的问题,可以与日本谈判。蒋介石整个交谈期间表现十分亲切,情绪很好,没有任何烦躁不安。他对保卫首都表示很乐观。我今天返回汉口,等待进一步的指示。使馆人员和德国人情况全都很好。相同内容也发去东京。

陶德曼

(译自德国外交部档案/埃尔温·维克特著《南京的德国好人》)

6. 东京德国大使致德国外交部电报

东京发出:1937年12月3日15时

柏林收到:1937年12月3日14时25分

绝密件!

编号:385/12月3日

致柏林德国外交部,帝国国防部和帝国航空部

从武官与日本参谋本部多次交谈中获悉12月初的形势如下:

华北已被占领,大规模进攻已停止,日本军队对占领作了新的划分。不会在山东省周围继续进行战斗。

在上海的主战场进军迅速,预计南京会在12月份陷落。

日本政界对中国形势的看法是,中国军队的抵抗力已受重创,在1938年夏季前不可能建组成新的有战斗力的部队。武器弹药的补给跟不上去,中方期望日本经济瘫痪的想法证明是错误的。

俄罗斯的武器援助,至今可以肯定的有30架飞机,据说正在增加到200架。

日本参谋本部方面,将重新考虑加速和平谈判。对中国来说,面对严重的失败和对布鲁塞尔会议未能发挥作用的失望;对日本来说,由于作战地区不断扩大和战争费用,这样考虑是实际的。

据可靠人士告知,参谋本部目前之所以在和平步伐上畏缩不前,是顾忌激进的反对派和少数陆军部队力图要完全消灭蒋介石。在这种情况下,参谋本部有影响的人士希望元首和帝国总理采取主动,打开谈判之门。他们认为,如果元首和帝国总理能获悉蒋介石原则同意开始与日本进行直接谈判,同样的探询在日本也会同意接受。

参谋本部强调,如有必要,必须绝对保密,避免英国和美国的干预,它们对此是强烈拒绝的。

暂时不可能等待日本政府就此提出官方倡议。

迪克森

(译自德国外交部档案/埃尔温·维克特著《南京的德国好人》)

7. 德国外交部长诺伊拉特致东京德国大使电报

柏林发出:1937年12月4日21时15分

急

绝密

编号:306/4月12日

致大使本人亲收

A. 您发来编号385和386电报与您已经收到的南京陶德曼大使本月2日关于与蒋介石详细谈话的电报报告相互交叉了。陶德曼的电报报告表明,日本的动议几乎已在所有重要的几点上得到了满足。因此,如同您的意见那样,我认为此刻到了甚至是日本政府开步走的时刻,停火并在接下来的过程中双方就缔结一项和平条约进行直接谈判。

为了排除一切误解,必须就德方至今的活动经过,给日本政府写成书面材料,我想再次重申,这种活动不是进行斡旋,只是传递信息转达争执双方告知的观点。

B. 必须提交日本政府以及中国政府前述……^①详细的历史的书面阐述,德国政府是试图结束敌对行动,创造和平,但只是作为一个信息传递者的角色承担了重大责任。如果元首和帝国总理本人在适当时机亲自出面的话,这个责任就更加重大了。

因此,将前述的历史材料递交给日本政府时,您的任务是确保日本政府已准备在这个基础上开始直接的停火谈判,并跟进日本的和中国的军事部门以及后来的政治部门之间进行和平谈判。我提请注意只有书面材料才可视为权威的基础,因而对以后援引某种其他方式的异议与限制(请比较例如您本月3日编号386电报报告的流水号8)不作考虑,一旦有了日方的承诺,定会委托陶德曼大使在中国收下该书面记录的情况下,促使作出同意的承诺。然后在双方确定同意的基础上,就会发出上

^① 此处原文不清。

述为创造和平环境停止敌对行动的庄严呼吁。

这个可能由元首亲自发出的呼吁会包含各自的政治表态。这个呼吁建立在世界共同愿望的基础上,肯定也是建立在冲突双方民众强烈感受在东亚恢复和平状态需要的基础上。再则,它也只限于建议两个参加谈判的政府建立直接联系,以停止敌对行动,然后接下来进行缔结和平条约的谈判。在外交步骤上,我请您告知日本政府,按照其所表达的愿望,中国强烈希望对整个预备性谈判直至德国将要宣布的和平呼吁予以绝对保密。双方政府的这个愿望也完全符合德国政府的愿望。因此可以认为是考虑到了各方面的愿望。

冯·诺伊拉特

(译自德国外交部档案/埃尔温·维克特著《南京的德国好人》)

8. 外交部长冯·诺伊拉特致东京德国大使电报

1937年12月10日于柏林

编号:313

绝密电报

致大使亲收

我们当然理解,随着军事行动的进展,也会改变作战人员的战争目的。我们不会由于这个事实毫无来由地怀疑我们原来的好意。通过传递服务不断推进,有助于双方坐到谈判桌旁来,毕竟我们至今作为邮递员的简单作用也有一个限度,例如不给中国递交侮辱性的无法接受的要求。我们也不能让人置我们于这样的境地:即给中国传递的条件,日本在极短的时间后又表示需要扩大要求。

冯·诺伊拉特

(译自德国外交部档案/埃尔温·维克特著《南京的德国好人》)

9. 德国驻华大使馆致德国外交部报告^①

1938 年 1 月 5 日于汉口

编号:1702/1068/38

内容:附件 2 份

谨呈送上海总领事馆本年 1 月 1 日的电报报告(编号 1),并附一份驻华使馆南京办事处的中文译稿。

经办人:劳滕施拉格尔

^① 德国驻华大使馆致柏林外交部报告全文见《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 6 册,第 301—302 页。

10. 汉口德国大使馆编号 1702/1098/38 的附件

1938 年 1 月 6 日于汉口

陈彝寿致汉口德国大使馆函

致汉口德国大使馆

敝人敬请这里的德国大使馆对下述事项进行复告：

德国驻上海总领事馆于 1937 年 11 月 17 日下午 12 时 15 分给那时驻南京德国大使馆发去下述电文：

“南京德国大使馆。106/17。陈女士(娘家姓齐默尔曼)考虑到南京即将撤退,请求将她在门东街(Eastgate street)11 号住房里的 4 只箱子和 4 只书箱取出临时安置在大使馆。请求电报回复。菲舍尔。”

上海已于 1937 年 11 月 18 日清晨收到回复电报,上海德国总领事馆格特延先生给住在上海延福路 636/38 德国大酒店的陈女士作了转告,其大意是：

“一定争取将陈女士的箱子取出来。”

因为敝人已于 1937 年 11 月 19 日将近下午 3 时离开了自己在南京门东街 11 号的房子,为此敝人不再了解事情的整个过程。敝人特敬请德国大使馆,如有可能,请告知 1937 年 11 月 18 日德国大使馆给上海总领事馆电报告知紧急帮助进行的情况。因为那些箱子里藏有敝人妻子的贵重物品和重要文件(如出生证等)。考虑到局势紧张,陈女士有可能要返回到她在德国的亲属那里去。此外,敝人请求德国大使馆如果一旦有好消息告知,将上述箱子和书箱托运给上海的陈女士,由我承担费用。假如告知 4 只箱子和 4 只书箱是否得救、以及门东街 11 号的房子是否完好无损的消息是不好的,敝人也十分感激德国大使馆。

致以崇高的敬礼！

陈彝寿(签名)

又告：敝人的暂住地址：汉口楚街(Chugai)82 号，李奈(Li Nai)将军办事处。E. M. 陈女士的地址：上海霞飞路 636/38 号德国大酒店转交。

(译自德国外交部档案)

11. 汉口德国大使馆致许尔特尔公函

1938 年 1 月 8 日于汉口

编号:1702/1098/38

附件 1 份

亲爱的许尔特尔先生!

随函寄上的附件为陈先生一封信的副本。该信首先表明,陈先生滞留在南京无所事事,而他在上海的妻子发电报给我们,要求运走她的箱子。陈先生也请人告知我相应的意见。

如蒙告知该物品的现在情况,我将十分感激您。您也许记得,我们曾商定,我们离开后,希望您能关心陈女士的那些箱子。

但愿您在经历过一切遭遇之后重又安全回到了南京。在此我也迫切请您关心德国人在南京的财产状况,因为这里到处都有遭到洗劫的谣传。也请您了解一下我自己的那些人情况如何以及我自己房子里的情况。

向您以及其他两位先生衷心的问候!

希特勒万岁!

劳(签名)

(译自德国外交部档案)

12. 礼和洋行致南京德国大使馆函

1938 年 1 月 11 日于南京

编号:5791/1016/38

致南京德国大使馆

请允许我们呈报由于日本军队士兵抢劫查明造成的如下损失:

1. 一辆福特双座轿车, 号牌 308, 1932 年制造, 行驶了 36000 英里, 带有活动车篷、备用胎和工具, 价值 1100 元。

2. 2 只古德里奇汽车轮胎, 30×5, 全新出厂, 价值 94 元; 6 只古德里奇汽车内胎 30×5, 全新出厂, 合计 248 元。

3. 1 架“特罗纳”牌蔡司相机, 6×9 公分胶卷, 4.5 蔡司镜头, 带有胶卷和黄色过滤镜(为克勒格尔先生的私人物品)价值 150 元。

总计损失价值: 1498 元

我们位于中山北路 244 号的房子, 带有受德国国旗保护的明显标志。在大门口贴有德国大使馆的证明, 清晰可见, 在大门和边门上还贴有日本大使馆的证明。该房子目前由我们的驾驶员张生吾看管。

尽管如此, 12 月 19 日上午 11 时, 有 5 个日本士兵侵入我们的车库和房子, 强行开门, 在那里停留了约 1 个小时, 带着前述物品驾着我们的汽车朝南离去。轮胎原是放在车库里的, 相机保管在房子里。此外, 还带走众多小工具, 30 加仑汽油。但我们打算扣除这些东西不作计算。

报告人这时正好不在, 但接到驾驶员的报告后立即就回来了, 但他没有能够抓住作案者。后来我们还在南京见到了我们的汽车。

已经向日本大使馆报告了这次损失, 高玉(Takadama)先生来查看了, 也告诉了他第 1 项和第 3 项列出的损失款额。

如果你们对我们的损失予以再次报告, 实现我们的赔偿要求, 我们将无比感激。

致以德意志的敬礼！
又及：随函附上副本 1 份

南京礼和洋行克勒格尔(签名)
(译自德国外交部档案)

13. 迪克森致柏林外交部报告^①

1938 年 1 月 11 日于东京

致汉口德国大使馆

编号:J. 113/38

副本一份

内容:1937 年 10 月底以来中国冲突的进一步发展

政 治 报 告

I. 军事作战行动

II. 占领区情况的发展

III. 国际突发事件和复杂性

IV. 外部事件与国内政治事件的相互关系

如果我们从相对并不重要的地区安全和整体行动来看,随着南京的陷落,进入了一个军事平静间歇阶段,由此可以对中国冲突基于最新阶段的情况作一个粗略的回顾。根据中国冲突的状况,不可避免地也会涉及到邻国的问题。严格说来,这事并不是德国驻东京大使馆的职责范围。不过,因为我们是从观察日本的角度提出报告,也许它可以给我们在中国的同事们的报告起到有效的补充作用。

最近几个月来的事态发展,表现为一方面是对南京的军事行动,另一方面试图在华北和华中建立亲日的中国政府,还有发生的一系列国际事件和冲突。

这些军事的和外交的事件,可以明显地观察到权威力量在积极加强活动。这种情况理所当然导致日本外交态度的强硬。

(一)

如果说 10 月底华北是展示巨大军事成绩的现场,那上海周围和市内的艰苦战斗就具有激烈的阵地战性质。这一页突然彻底地翻了过来。

^① 此报告在本史料集第 6 册中译出过一部分,现加以重译。

日本人于10月25日左右进攻上海的同时,在华中也开始了一场规模巨大的运动战。相反在华北随着逐渐向黄河战线接近,本可转入进行统治和令人满意的使命也就转而面临攻占的棘手任务。

早在前面提到的10月底日本人进攻上海时,通过从北面起改组日军的前线,并通过集中所有部队在城内顽强抵抗的地方,导致最后占领了整个上海。这时,即使是日本最乐观的民族主义者几乎也没有梦想过不停顿地向南京进军,然而不久就成了现实。如果说事态逐渐发展的几个月来,在上海战场不断取得的成绩意味着严重打击了中央军精锐部队的士气,但在任何时候还不能说是中国军队士气的崩溃或是杂乱无序的逃跑。中国人更多的是有计划地边战边从一个市区退到另一个市区,从一个郊区退到另一个郊区,巧妙地摆脱一切包围的企图。他们知道,身后还有许许多多几乎无法拿下的防御战线,以及辽阔的战域。人们可以把那里纵横交叉的河流与湖泊,分散在四面八方的机枪群以及混凝土阵地,视为一个巨大的堡垒。面对显然的进军中国内地的巨大困难,日本的权威部门似乎那里决定军事行动只挺到上海后方一线,从那里可以保证完全控制上海以及从上海出发的铁路线。

这时,还在即将进入建立这条战线的阶段时,发生了在其意义上不仅日本人也对中国人感到惊讶的事件。日本部队在杭州湾的乍浦(Chowpu)使用为其目的专门从日本运来的平底小船登陆成功,突破了部队对这类行动没有准备的和守卫力量薄弱的海岸线。这次登陆本来只是着眼于局部目标,但这种出乎意料的打击力,对中国的右翼战线,并在后来的发展进程对中国整个战线都具有持续的影响,最后导致中国整个防御体系的崩溃。从这个历史时刻起,中国部队抵抗的士气确实受到了致命打击,到处弥漫着一种惊慌情绪,它到了南京城外,在程度上才又重新安定下来,虽说表面的作用并不大。尽管退却的分散的中国军队还在这里和那里抵抗日本人,尽管双方都有不小的损失,但没有那个地方能够真正坚持下去。没有炮兵和空军,中国人继续战斗的自信心没有了。更为重要的是,南京的磁铁开始对日本的前线并通过它对日本起着一种不可抗拒的吸引力。突然之间人人都在谈论南京,突然之间不可能的事成了可能的,这是理所当然的,日本部队真是如鱼得水,所向披

靡。如同先前在中国北方那样,日本军队的实力重又表现在准备征服巨大的空间,人们很快就感觉到日本向南京挺进的军事力量足以使中国的中央军——尽管它作了认真的抵抗——不容易阻止日军的进攻。

即使对手还有许多不足之处,但几乎也无法贬低日军。在如今向南京开始的赛跑中取得伟大成绩,不仅是一条又一条防御战线,一个又一个坚固城市被攻占,就连地势上的巨大困难在日军的攻势面前也失去了它的威力。这些行动时而不乏快速的战略决策和良好的战术。于是,为了出其不意地把对方各个部队分隔开,日军果断决定越过太湖,在对岸迅速登陆,日军的另一翼则从南面包围了太湖。对日方的这一行动虽有德国顾问的警告,中国的防御系统对此却没有任何应对布置。

更有甚者,中国人把他们这些不加保护的地方事先以一种完全非中国式的彻底性变成了一片荒野,以这种方式破坏了由占领地给日军提供给养的可能性,并通过破坏道路和河流的交通使后勤供应异常困难。尽管如此,日军的先头部队在12月7日就到达了南京城外。在12月11日从三方面向南京发起总攻之前,日军的最高司令官松井将军于12月9日给中国卫戍司令发出了最后通牒,提出为了保护城内的文化古迹以及不可能进行任何抵抗的现实,要求交出南京城,利用这种纯粹是威胁性的姿态使日本人有时间包围这个城市以及尽可能把中国人惟一的撤退路线南京长江的上游封锁起来。众所周知,这种急于求成的企图导致了后果严重的“巴纳”号和“瓢虫”号事件。

12月15日,南京完全被攻占。17日,日本部队在松井将军和海军上将长谷川的率领下,威武地开进南京城。这时,除了在长江北岸津浦铁路处还有小规模军事行动和在杭州为保护日军南边侧翼以确保通过杭州的小规模袭击外,华中战场出现了一个平静间歇时间。按照松井将军在报纸上发表的声明说,这段时间应该使数月来十分劳累,已是疲惫不堪的日本部队获得休整,以及对占领地区进行整顿和肃清残敌,给中国人“自我反省和内心调整”的机会。如果说,日本军队需要休整和必须补充部队军用物资和生活资料是延续到今天寻求停战安排的一个主要原因的话,除此以外,争取中国问题在政治上总体解决的努力没有能跟上军事成绩这个事实是决定性的。在人们也许可能会做到但思想上

还没有完全准备好之前,南京就攻下了。对这个胜利该怎么办,应该怎样使它融合进目前不稳定的中国政策的大厦中去。再说,可能“巴纳”号和“瓢虫”号事件也对深远的最终的政治与军事决策的决心起着限制的作用。

11月和12月期间,在北方进行的军事行动与长江三角洲的事件相比,可说是相形见绌。总的说来,它们的目的在于到达黄河战线。

11月8日攻占了山西省的首府太原……^①

在中国绝大部分部队从城里撤出后,二亿日元化为了灰烬。日本人违背了当时对中方撤出山东时作出的保证,先是加大海上封锁,继而对青岛进行更猛烈的进攻。

为了完整地叙述最近的军事行动,最后还要提到日本对华南的空袭,主要是轰炸广东和广东外围的军事设施,并在十一月和十二月持续地猛烈轰炸粤汉铁路广九段(Canton-Konloon)。

(二)

对于日本人来说,将已经占领的几个省组织在一起予以治理要比占领新的地区艰难得多,何况还要尽快显示出这些地区的政通人和以及日中友谊的诱人景象。因为,一方面是日本人缺少一切自主实施全面管理的基本条件,另一方面又要尽可能地避免纯粹占领或者怀有“领土目的”的现象。为此日本人急于施出他们的传统手段,利用原已存在的管理机构,建立起小小的自治单位。于是,在日本人的导演下,一如同日本报刊一贯使用的表达那样,“根据中国居民的自发要求”,在“解放南京的被压迫民众,反对共产主义,与日本和满洲国建立政治经济和文化合作关系”的口号下,建立起一连串的自治管理机构。

为配合北京、天津和卡甘(Kargan)(察哈尔南部)先已建立的和平委员会,10月15日,在大同成立了山西北部的自治政府;10月28日,在绥远成立了“蒙古协会自治同盟”。紧接着上述组织的建立,11月22日又在蒙古人中间和绥远、大同和张家口三个蒙古边境地区组织了一个松散的联合委员会。11月27日,在常德(湖南省)建立了一个自治政府;12

^① 此处缺少原稿第7页,下面为原稿第8页的内容。

月2日,在太原建立了同样的自治政府;12月5日,日本人在上海建立了一个自治管理机构,以此在与上海有利益关系的西方大国尖锐矛盾斗争中占据了上风。12月14日,在北京成立了一个全国性的政府,冀北自治政府以及其他自治机构诸如太原的政府等随即参加了这个政府(至少在书面上是这样确定的)。11月1日,在杭州、南京和济南成立了维持会,后者还同时参加北京的临时政权。所有这些机构的共同点都是作为所有省的凝聚点考虑的,但实际上除去蒙古国以外,它们的作用只局限在占领区范围内,在一定程度上起着—个市政机构的作用。

在这些新成立的政府机构中,只有3个内蒙古自治机构还有十分清晰的轮廓,因为经过周密筹划且具有战略条件,一定程度上是对付俄罗斯的。尽管它们对中央政府以及北京新的临时政府的态度还有待澄清,但在理论上无论如何还是处于汉口的主权范围内,为此我们也许可以说,无论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和平状态将怎样发展,它们由于外蒙古的战略地位,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还享有其主权地位。为此日本始终竭尽全力,要将位于中国和苏联之间的关键阵地——对付苏联的跳板——千方百计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手里。

归根结底,也许可以说,日本人在华北的经济活动带来了明显的收益。但主要的依然是进行组织准备,制订计划,建立一个开发华北经济的日本式机构,确保某些有力的手段,诸如对华北的铁路和海关管理部门的影响。如何处理中国货币问题似乎是一件特别头痛的事情,尤其是日本媒体对在华北投资的不友好态度明显是针对美国的,但对吸引德国参加在中国的建设项目也存在—定的危险性。

(三)

日本在军事上和组织方面的成绩及其毫不动摇地尽可能最终解决日中关系的计划才清楚地显现出来。人们只要想—下,日本的胜利进军是在克服了多少国际障碍和阻力才得以实现的。

布鲁塞尔的九大国会议是在11月3日至4日举行的,也就是日本在上海取得了巨大胜利的时候,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使日本深感担心。从会议上的言语交锋和作出的决议中得出的结论是,英国可以看做是会议真正的幕后推动者,虽然罗斯福在芝加哥的讲话以及美国随后的声明对日

本作了谴责,表示美国只在一定程度上与英国合作。日本各界抓住这事大作宣传,严厉攻击英国,举行大规模的反英集会,日本的内政大臣还在最近记者谈话中对英国进行战争威胁,强硬达到了顶点。

比布鲁塞尔会议的反日决议令日本感到更为麻烦的是,不断发生的外交争端、外交摩擦和意外事件。可以预见,占领上海后,由于这个城市的复杂性质,定会发生一连串的主权冲突。日本部队行军通过国际租界以及一再对日本军队的轰炸产生的困难,促使日本要求对租界增派警察力量,参与管理,例如重点加强日本对上海海关的影响和控制。管理机关总督察的职权关系到日本数量巨大的商业利益。日本人试图行使属于中国主权范围的海关监督权,他们多次表达出这个意图,表示会顾及第三国合理的利益。所谓第三国的利益,据最近日本一些政治人士的解释即是不会损害“正当获得的财产权利”,我和英国大使会晤时稍稍谈到了这个问题,他提出了可能和日本就上海的海关管理问题达成一个条约协议,但考虑到日本人可能会损害其他国家的利益及其地位的一般原则,因而一再犹疑不决。

除去上面谈到的讨论以外,这时又传来了无数的国际抗议和责难,旨在保护上海外国侨民的生命财产问题和商业利益。

当日本军队挺进到南京城下时,日本政府正面临最严重的和影响深远的决策时,却又不合时宜地发生了一连串会导致最严重后果的意外事件,将对最近数周的决定性的政治发展产生也许决不会被完全忽视的实际影响。

12月12日,在武汉和南京附近的日本军队对英国炮舰“瓢虫”号、“蜜蜂”号以及其他的英国商船进行了轮番的轰炸、扫射和炮击;在同一天,美国炮舰“巴纳”号和美孚石油公司的3艘货轮遭到了日本飞机的轰炸、机枪扫射而沉没,英国和美国都有人员伤亡。在英国和美国的权威部门尤其是英国和美国的公众对这些事件的严重情况完全了解之前,以及在英国和美国的目击证人提出报告之前,日本政府吃一堑长一智,赶忙向英国政府和美国政府发去照会,表示深深的歉意,声称意外事件纯粹是出于误会造成的,表示愿意全额赔偿,并对肇事人员进行处罚,承诺采取严格的措施,避免今后再发生类似事件。由于英国和美国目击证人

的真实报告与日本军方及海军部门随后的报告之间有很大出入,随即引起了有关国家的极大不满,发出了严厉的照会。不过很快就发觉,由于日本政府迅速采取的行动,本来会导致政治上严重后果的火焰得到了较好的扑灭。

就在日本对严重事件进行一定程度的平息后,公众舆论和媒体根据上述情况在判断意外事件及其影响时,将美国的态度和英国相比较,发现美国对形势的判断,以及它的和解意愿、和平愿望与中立立场,与英国的态度完全不同。当英国决定派遣战舰去东亚的消息传来时,这种愤慨情绪就更为激烈。这里的一部分人觉得这项措施既意外又可笑,另一部分人则认为它是一种过时的、和日本的帝国扩张野心不相协调的后果。美国大使馆受到各界民众、学校和协会团体的严厉谴责,与之相反,英国被谴责极力利用这起事件迫使美国加入反对日本的英国阵线。这时人们都忘记了他们自己十分笨拙地误判真实的形势,企图利用这事件分化美国 and 英国之间的关系,却导致日本和美国之间真正的友好关系的终结。

对上述事情的观点也获得了日本政界的支持,对此在附上的一份日本报刊剪报上刊登的日本外务省的新年贺词中可以得到证实。贺词对日本和美国的关系使用了比日英关系更为热烈亲切的词语。

对轰炸“巴纳”号和“蟋蟀”号,这里尚须补充叙述英国和日本之间发生在香港海域附近的一起意外事件,即在轰炸“巴纳”号和“蟋蟀”号炮舰的前夕的12月11日,据说有一艘日本的驱逐舰在香港的中国领海范围内炮击了一艘中国的海关舰艇,随后又派出两艘摩托艇拖走当时搁浅在海滩上的一艘船只。英国由于考虑到其特殊的敏感性,对一切涉及香港的问题十分重视。英国大使克雷吉(Craigie)于12月22日向日本当局递交了一份措施极为严厉的照会,要求日方保证今后不再侵犯、而在之前它已多次侵犯的香港的领土主权。

法国对中国冲突的问题通常都追随英国持观望态度。大约在11月中旬,日本和法国之间发生过一起外交插曲,即海南岛在通过印度支那运送武器中起着主要作用,日本表示否认对海南岛的任何进攻意图,法国随即保证禁止继续通过印度支那运送武器。

为了完整起见,还必须提出,苏维埃俄国的观望态度在日本的中国政策后面仍然是最重要的诸多因素之一。尽管对苏维埃俄国支持中国的消息有一定程度的封锁,但这里的人仍然相信不必担心苏联会大规模地直接或间接进行干预。不久前对有争议的渔业协定延长一年之事也在这方面起着平息的作用。

(四)

在前线发生的意外事件对日本的国内政策有反作用,这种情况反过来又会对前线的决策不断相互作用,这不会令人感到惊讶。当日本军队拿下了上海后,他们将目光投向了南京,为此需要完成新的巨大的任务。由此积极要求改革派和有影响人士的目光也投向了前线。这种发展情况首先是对国内产生了一系列的影响。由于(日本)国内激进改革派的方向是致力于控制国家的绝对权力,同时外交政策也在异想天开,想在中国问题上找到永久解决的办法。为此必须明显强化他们对外交事务的地位,如同他们公开讨论的那样,和平条件也变得更加强硬了。期望占领南京和消灭蒋介石似乎是一个顺理成章的解决办法,几乎不必再作讨论。前线的将军们和国内的激进派起着很大的作用。于是,帝国大本营设立了,拥有影响力的头脑人物,即东京陆军和海军的领导部门全为主张立刻宣战,要求在占领南京后立即取消对蒋介石政权的承认,并在由日本天皇主持的一次御前会议上宣布。应该根据上述或类似的精神就日本的对华政策作出最终决策。

大约就在占领南京的同时,(日本)外交政策方面出现稍稍后退的动态,估计除去国内力量斗争发生某些不可预料的情况外,“巴纳”号和“蟋蟀”号事件也对此起了值得庆幸的作用。北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不完善和不成熟对中国计划起着妨碍的作用。由日本天皇主持的御前会议被取消,原来考虑的决策也推迟了。与此相反,日本首相近卫(Konoye)在12月14日发表了一个公告,该公告尽管语气强硬,但基本上没有任何变化。

日本广大民众并不都是附和激进分子的声音。上海被占领后,民众们在反共协定和布鲁塞尔惨败的影响下,曾经欢欣鼓舞,但随着南京陷落暂时出现的休战,对广大的日本公众来说,必然不会再有吸引人的国

家目标。在民族牺牲精神方面,开始蔓延着某种厌战情绪。之所以会如此,日本政府最近发布的公告以及某些政治家的答记者问提供了暗示,认为民众必须准备长期作战,一方面为了彻底消灭蒋介石,另一方面强调战争已面临真正的斗争或是说关键性的第二阶段。首相的新年献词和近卫亲王的谈话中暗示必要时战争只可能解决中国的一个政权。这点可参见前面提到过的附件材料。大标题是:一次新的精神动员已开始显现出来,敲响了日本最关紧要的命运时钟(近卫语)——这关系到未来——任何不彻底的解决办法是对日本使命的背叛——日本进行着一场圣战(近卫语)。斗争结束了,真正的战争开始了〔末次(Suetsugu)语〕。预计不久就会再次举行内阁和皇室会议,据说会对推迟的中国问题作出最终决策。一旦作出决策,估计它会不同于原本考虑的事情,可能与这个估计不会有很大出入——虽然有近卫的新年献词——在前几周与蒋介石和平的可能性、也即谈判的可能性,不是纯粹的命令式和平,至少在日本已经到考虑实现的时候了。诚然,尚需担心前线和国内激进阶层的情绪,内阁的内部也存在多种意见,对国内的政策不断地产生影响,对要求改革的回国部队也存在某些担心。最后,还有对“中国计划”提出的大问号,一再试图再次擎起利剑果断地解决问题。

通过可靠途径,汉口的德国大使馆将收到本报告的副本。

冯·迪克森(签名)

(译自德国外交部档案)

14. 德国驻上海总领事馆电报

1938 年 1 月 17 日

内容：关于英国炮舰事件

冈崎告诉我，他们在南京的机关对英国炮舰事件的解决甚感满意。

菲舍尔(签名)

(译自德国外交部档案)

15. 领事秘书霍特随笔

1939 年 1 月 19 日于南京

在拜耳公司的损失案卷中有下述记载：

公司这里的两个货栈当时放在宁夏路 42 号房子里的 14 只木箱作了安全处置，这期间已被移交给了公司的一位委托人。

根据公司 1937 年 12 月 27 日的通知，第二个货栈位于西康路 43 号新河公司过去的商业场所。有关这处货栈，拜耳公司在 1938 年 1 月 16 日一编号：5719/1008/38——告知如下：

“南京西康路 43 号新河公司过去的营业场所已被全部烧光，那里只留下断垣残壁。存放在那里的货物应视为已全部损失。”

这封信的副本当时呈送给了汉口的德国大使馆。

新河公司在南京商业区的那处房子当时是被日本军队有计划地纵火烧光的，日本人为此负有赔偿损失的责任。

领事秘书：霍特（签名）

（译自德国外交部档案）

16. F. 伯勒尔先生永庆巷 46 号房子 看守人宋其昌的报告

编号:5720/1827/38

被日本士兵洗劫走的物品清单:

- 2 件大衣
- 7 件西式衣服
- 4 条被子一条羊毛被
- 6 双皮鞋
- 4 双童鞋
- 3 只手表
- 1 架留声机和 26 张唱片
- 1 只皮箱
- 2 只花瓶
- 8 张壁画
- 16 副刀叉和汤匙
- 35 只碗
- 8 只锅钵
- 12 瓶啤酒
- 28 罐香肠
- 8 听汽油
- 1 只电炉

看守人被洗劫的物品:

现金	43 元
2 条被子	16 元
2 件毛衣	13 元
1 条羊毛被	7 元
1 双皮鞋	6 元

1 只手表	5 元
1 只皮箱	9.5 元
1 只煤油炉	4.2 元
1 件皮上衣	18 元
1 辆自行车	28 元

合计 157.1 元^①

该处房子在安静了很长时间后,1 月 22 日又来了三名日本士兵,寻找贵重物品,但他们什么也没有找到,其中的一个日本兵将卫生间的洗脸盆砸得粉碎。

(译自德国外交部档案)

^① 原文如此。

17. 菲舍尔发给德国南京大使馆电报

1938 年 1 月 22 日于上海

编号:2722/1018/38

通过英国炮舰转交南京德国大使馆

致南京德国大使馆

以下是从上海收到的给德国大使馆电报:

1 月 17 日的电报

冈崎告诉我,他们在南京的那些人对事件的解决很满意。

菲舍尔(签名)

(译自德国外交部档案)

18. 德国外交部对日中冲突形势的分析

1938年1月25日于柏林

副本编号:政治类Ⅷ183

绝密件

随 笔

今年1月16日,日本政府发出了一个声明,其中谈到日本将不再考虑与中国的中央政府打交道,要求建立一个新政府,并随即撤回双方的大使,远东的冲突也就到达了某种阶段。为此有必要对至今的冲突过程、外交政策的影响以及德国对此的观点和所谓德国的斡旋活动作一个总结性的思考。

I

1937年7月7日,驻防在北平郊区马可·波罗桥^①的一部分中国军队与日本公使馆警卫部队一个正在进行军事演习的分队发生了枪战。起先双方都没有认为这起不寻常的小事件会发展成一场生死斗争。今天来调查谁应对这起冲突承担责任是多余的。日本人也许确信,他们通过威胁和报复手段促使中国人屈服——至今成功地使用——能很快地解决这起意外事件。这时他们忽视了蒋介石政府的中国最近几年内在国家、经济 and 军事领域有了一定程度的统一和增强,他的反抗看来并不是完全没有希望的。由此在起初的谈判没有任何结果后,战斗行动的规模就不断地升级,直至双方出于“保全面子”的原因不再能够逆转。

后来,军事上的成就使日本军界的人逐渐下决心要在几年来一直不喜欢看到的蒸蒸日上的蒋介石变得过于强大之前,借此机会最终解决“中国”问题。对此下面这个观点共同起着作用:在陆军方面的人们认为不可避免地要与俄国清算或是海军方面的人追求向南扩张之前,必须排除中国这个潜在的对手。与之相反,中方则寄希望于国家的强大、她的

^① 即卢沟桥。

人口和原料财富以及国际联盟布鲁塞尔会议的积极干预。

接下来的情况是可以被预想到的：日本陆军迅速向中国华北的五个省胜利进军，战场扩大到上海和长江三角洲，那里的中国军队出乎意料地进行了顽强抵抗，但最终面对日本人的军力优势不得不撤退。战斗在当前到了某种程度的停止状态。日本人至今还没有能取得使中国屈服的决定性胜利。他们至今也没有成功地建立对立的地方政府来动摇全中国的统一，甚至可以说他们通过自己的行动帮助了中国民族感情的觉醒，他们强迫中国人民与之友好的方法并没有取得所期望的成绩。

毁灭中国的经济代价和日本的财政压力是巨大的，不过，由于加强鼓动宣传，两国的民众都确信战争必须继续进行下去。冲突的政治出路还不完全清楚。

II

如果说，冲突爆发后日本政府还掌握着主动权，那他们选择与中国清算的时机是好的。他们对第三国不会进行干预的考虑，至今证明是正确的。在对东亚最感兴趣的英国、美国和俄国三个大国中，英国由于欧洲的政治形势紧张受到约束，美国则如果日本不过于挑衅，几乎不会站出来进行积极干预。此外，两国的扩军情况滞后，显然对共同行动不会达成一致意见。他们由此不得不在一旁观看日本怎样有计划地毁灭中国的商业——这在东亚更为令人怀疑——及其政治声誉，只满足于提出书面抗议。美国政府致力于解决例如日本飞机炸沉美国炮舰“巴纳”号如此严重的事件，证明华盛顿意欲避免一场冲突。美国军舰加入英国在新加坡的舰队也许旨在显示力量的军事演习，至今在日本并未引起很大关注。

苏维埃俄国由于国内的政治清洗活动，他的打击力处于瘫痪状态。他也找不出多少理由来通过干预加快结束冲突。这个冲突持续越久，日本就在中国陷得越深（俄国人就是如此估计的），中国就更能接受共产主义的宣传。莫斯科至今没有给予中国人以重大支持，仅限于提供使用飞机和飞行指导人员。

东亚的所有其他有关国家则极力避免牵扯进这场冲突里，他们的态度是决定性的。只有意大利从一开始就明确站在日本一边，这种态度由

于最近承认了满洲国更加突出。中国政府随即以解雇意大利的飞行指导人员作为报复。意大利的行动表明它在中国几乎不会有经济损失,并希望打出日本牌来对抗英国。

III

德国由于这场冲突处于一个棘手的境地。在一方面,我们与日本存在一种长期的贸易政策友好关系,由于1936年11月签订反共协定更具体地表明了同属一个世界观体系,另一方面,我们在中国存在巨大的重要的经济利益,我们与中国的贸易逐年都有了可喜的增长;政治上我们关心的不仅是击退俄罗斯和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影响,也关心日本作为在东亚前线反对俄国的因素不会失去其重要性和分量。在中国的战争已于1937年秋末到达了一个转折点,就我们的利益而言,如有可能,它应该结束。在出现这种机会时我们应该采取行动而不是躲避。

几个月来在外国媒体传播的关于德国斡旋活动的报道,德国方面却一再否认,首先是因为事实上从未进行斡旋,只是传递双方的声明,其次是因为双方明确要求严格保守秘密,只有意大利政府秘密地了解最新的情况。

早在今年10月,不仅日本政府,还有中国政府,向我们的大使们——也向其他国家的大使们——探问过我们是否愿意为开启和平谈判提供良好的帮助。德国由于其公认的中立态度和与双方的良好关系似乎特别适合这项任务,为此我们必须限于在保持我们至今中立的情况下承担传递信件的服务。

早在今年11月初,我们在南京的大使向中国政府转达了和平谈判的条件。

该条件由日本外相告知我们驻东京的大使,说是缔结和平条约的基础,其要点是:内蒙古自治;在保持中国主权的条件下华北非军事化;在上海建立一个非军事化区;停止反对日本的政策;共同反对共产主义;进行紧密的经济合作。在较长时间的犹豫后,蒋介石特级上将终于在12月初声明准备在这个基础上进行谈判。

不过在这期间,主要是由于在扬子江地区的军事胜利,日本改变了态度。诸如外务省和参谋本部的部分温和人士不安地注视着冲突的不

断扩大,他们倾向于和蒋介石和解,但已不再能实现。前线陆军根据国内的胜利气氛提出了激进的要求。因此,当我们的大使对他们转达蒋介石准备进行谈判的意向时,日本外交部长广田被迫声明说,11月初告知的(谈判)条件已不再有效。

12月末,日本人已在这期间占领了南京,广田先生然后转达了下述新的和平条件:建立非军事化区域和在日本成功管理的地区设立特别管理机构;中国放弃亲共产主义的政策;与日本和满洲国进行紧密的政治和经济合作;给予战争赔偿;在年底前全部接受这些条件。鉴于条款不明和这些最后通牒式的条件,我们在转达给中国人时强调我们是遵循传递信件的角色,对此不作任何表态。中国政府再次犹豫不作答复。当她最后于1月中旬请求作进一步解释时,日本已在这期间发表了天皇宣言,宣宣称日本已不再视蒋介石为谈判的对象。

由于这个声明,(日中)冲突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为了避免误解,外交部于本月通过德国情报局(DNB)发表了一个通告,通过简单阐述我们至今的活动,澄清了这个事实。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内我们为导致和平的努力是否能再次启动,尚不清楚。在最近几天内,中方和日方确实发表了正式声明,似乎再次接触的门没有关闭——至今的尝试由于中国政府的犹豫不决和缺乏负责精神以及日本上层关于战争目的的意见不一致而未能奏效。温和派也许今天还欢迎与蒋介石政府达成协议,但激进派似乎在追求彻底消灭(蒋介石的)中央政府,将中国瓜分成多个在日本影响下的附属国家。根据这些人士的观点,只有一个这样的解决办法才符合日本生存的可能性。现今这个派别在东京占据统治地位。不再被作为谈判的对象来对待——中国政府鉴于这样的一种抉择,被迫认为只有越来越深入地向本国的内地撤退,将斗争继续进行下去,期望日本的辅助来源耗尽,将这场有组织的强盗战争一直拖下去,这是可以理解的。在这样的事实情况下,估计冲突还会继续延长下去。

(译自德国外交部档案,台湾“行政院”新闻局提供)

19. 许尔特尔致安曼公函

1938 年 1 月 26 日于南京

编号:5719/1055/38

尊敬的安曼先生!

根据我们在上海就有关贵公司南京办事处进行的交谈,现在谨告知您,我于最近和 E. 施佩林先生查看了贵公司在大陆银行楼里的办公室房间。大陆银行遭到了严重洗劫,所有的房间都被砸开了,一切容器都被彻底搜查过。贵公司办公桌的抽屉都被拉了出来,遍地都是商业文件。贵公司的房间里除去一张办公桌外,还有一张圈手椅,一只打字机桌和一只五斗橱。这些留在那里的家具几乎都没有损坏。

在同一层楼贵公司办公室隔壁的一个房间里,我们看见大约有 200 桶无环润滑油。施佩林先生估计它们都是贵公司的。

估计在南京可能要有很长时间不能开始商业活动,留在这里的中国人要能活命下去已是很高兴了。

致以良好的问候!

希特勒万岁!

忠于您的 A. 许尔特尔(签名)

(译自德国外交部档案)

20. 罗森致汉口德国大使馆函

1938年2月5日于南京

德国大使馆南京办事处

编号:5719/1590/38

内容:回复今年1月31日的指示

编号:5720(2)/1590/38

雇员孙查看了三处房子,现报告如下:

1. 梁印文(Ling Ing-wen)先生在天竺路3号的房子遭到日本士兵的多次侵入,室内物品被严重洗劫。那个仆人为此已给梁先生写了一封信,并将房子的花园重新整理好了。

2. 王廷璋先生在灵隐路10号的房子受到了日本士兵的严重洗劫,拿走了许多东西,只留下少数物品。许多房门和窗子被打开砸坏,柜子、家具和箱子都被砸开,所有容器已经打开,里面的东西被倒了出来,所有东西现在还是洗劫者留下的原样。雇员孙现在已指示仆人对房间整理好。仆人已给王先生写了一封信,房子里还住有许多难民。

3. 李体忠先生(Li Ti-tsun)在赤壁路5号的房子也受到严重洗劫。因为这条路上11号和17号的房子里住进了日本人,位于这条路附近的所有房子白天和夜里都有日本人进去洗劫。李先生房子里3道房门都被砸开了,几只木箱被砸破,箱子里的东西都被偷光了。家具基本上没有损坏。仆人对陈小兴(Chen Hsiao-hsin)已经给李先生写过一封信。此外,房子里曾被50名难民占用过,现在那里只有难民3—4人。

随后将寄上一份这里被砸坏的箱子等物品清单。关于容克(Junker)博士和莫尔(Mohr)博士的搬家物品已作过特别报告。

罗森(签名)

(译自德国外交部档案)

21. 罗森致 E. M. 陈女士函

(由上海邓·泽尔达姆/Ten Seldam 转交)

1938 年 2 月 8 日于南京

德国大使馆南京办事处

编号:5719/1087/38

事由:复告今年 1 月 25 日致行政主管沙尔芬贝格先生的来函

根据德国总领事馆去年 11 月 17 日有关安置 4 只书籍的电报,曾于 1937 年 12 月初两次派一名大使馆的事务员到门东街 11 号去取箱子。当时这名公务员报告称,这处房子的大门在外面有一把锁锁着,看上去房子里没有人。据一个邻居说,看门人离开了,好多天没有回来。那个邻居答应如果再见到看门人,一定叫他到大使馆去。但是那个看门人没有到大使馆来。昨天去查看东门街 11 号的房子时,发现该房子遭到了严重洗劫。大门敞开着,后门那里的篱笆被踩倒在地。书籍和物品散落在房间里和花园里的地上,无法确定被拿走了什么,因为房子里没有人,看上去没有留下仆人在那里。

施维宁(Schwinning)教授琅琊路 1 号的房子,据查明,也遭到了严重洗劫,那里有 5 只装有各种东西的木箱,根据中文标签可能是您的,木箱里的东西也被洗劫者撒落在地上,到处都有,现在已经大使馆同意,住在施维宁房子里的两位中国先生重又将物品包装好,并负责看守。现随函附上一份由其中一位中国先生对木箱里尚留下的物品列出的德文译文清单。

罗森(签名)

又及:1938 年 2 月 16 日于南京

几天前,派了一名事务员到门东街 11 号房子去取回一些还有用的东西到大使馆里。他的报告如下:

“门东街 11 号的房子现在住了人,据该房子现在居住的人说,他是

这处房子的主人,他的名字叫李兴芬(Li Chin-feng)。李先生声称,房子里除去几件砸坏的家具外,再没有任何其他东西。问到那些书籍的下落时,李先生回答说,所有书籍都根据日本人的命令堆在大街上烧掉了。门东街 11 号房子的邻居证实了书籍被烧掉的事。”

罗森(签名)

德国大使馆南京办事处 1938 年 2 月 8 日来函的附件

(编号:5719/1087/38)

1 号木箱装的物品:

- 34 件女裙
- 7 件围裙
- 7 条腰带
- 16 条裤子
- 1 条被子
- 1 条羽毛被
- 5 件游泳大衣
- 1 件浴衣

2 号木箱装的物品:

- 7 个枕头
- 1 条棉被
- 3 件女子中式套装
- 1 条裤子
- 4 条睡衣裤子
- 2 件睡衣外套
- 3 只沙发枕头
- 1 件皮大衣

3 号木箱装的东西:

- 2 条浴巾
- 8 顶窗帘
- 15 件桌布

410 东京审判书证及苏、意、德文献

- 93 件小桌布
- 2 件羊毛台布
- 4 件枕套
- 2 条被套
- 50 条领带
- 14 只衣架
- 1 只大礼帽
- 4 号木箱装的物品：
 - 4 只照相架子
 - 1 只文件包
 - 6 只小首饰箱(空的)
 - 1 只皮包
 - 2 只花盆
 - 1 只墨盒
 - 1 只粉扑盒
 - 3 只花盆
 - 1 只木汤盆
 - 19 本书籍
 - 11 只小瓶子
 - 2 副牙刷
 - 1 盒化妆品
 - 1 件狐皮大衣
 - 1 把刷子
 - 1 张结婚证
 - 1 本照相簿
 - 1 箱留声机唱片
 - 1 条毛毯
- 5 号木箱装的物品：
 - 1 件衣服和 2 只小箱子(看上去是仆人们的)

(译自德国外交部档案)

22. 罗森致上海德国大使馆商务专员公函

1938年2月10日于南京

德国大使馆南京办事处副本

编号:2722/1113/38

致外交部报告,连同附4件共6份

谨随函送上致外交部报告的3份文件,请凭附上的马吉牧师写的信函购买一份电影拷贝,并通过可靠途径送交外交部。

报告的另外3份文件请送德国驻汉口和东京的大使以及驻上海总领事馆。此外,由于这里无法撰写内容广泛的介绍材料,我谨请求在上海找人对影片的有关内容撰写出书面介绍——必要时可支付费用,并附上报告以及报告副本。

我请求先将一份报告用航空寄送给柏林外交部。

罗森(签名)

(译自德国外交部档案)

23. 许尔特尔致劳滕施拉格尔公函

1938年2月16日于南京

德国大使馆南京办事处

编号:5719/1088/38

附件1份

尊敬的劳滕施拉格尔博士先生!

根据您今年1月8日的亲切来函,随函附上E. M. 陈女士一封来信的副本,她同样是想查询她留在南京的那些东西的命运。您从该来信中可以看出,尽管我们在12月初作过多次尝试,仍然没有能进入她的房子。再说,假如我们能安置她的东西,那我们真是给陈女士做了一件大好事。不过,您肯定还能记得,我们出于规定的原因曾拒绝了我们帝国公民所有类似的申请。徐女士可以为没有经历南京95%居民那样恶劣的遭遇感到安慰。凡是日本人留下来还没有拿走的东西,也被留在这里的穷人一点一点地偷走了。

从这期间收到的关于德国人房子状况的报告可以看出,德国人的房子也受到很大损害。如果我们的同胞不是在轰炸前将大部分东西搬到了他们所居住区域的话,他们一定也会十分恼火的。您的房子和您的那些人情况尚好,没有受到更多的伤害,估计不会再受到不断的洗劫。

调查损失情况的工作很累人,要花我们很多时间。对一些仆人已离开的房子根本就无法调查。

致以衷心的问候。

希特勒万岁!

忠于您的许尔特尔(签名)

(译自德国外交部档案)

24. 劳滕施拉格尔致德国大使馆南京办事处公函

1938 年 2 月 22 日于汉口

编号:5720/2054/38

致德国大使馆南京办事处

梁印文先生请求调查他的两名仆人(仆人和园艺工)的情况。此两人留在他南京位于总顾问房子附近天竺路的房子里。这些仆人与总顾问法肯豪森将军的中国仆人很熟悉,后者可以提供信息。由于梁先生房子的事,这里的大使馆已经发函。

与此相同的还有王雅翁(Djahung Wang)博士(他在德国留过学,说一口流利的德语)请求调查他在南京的财产状况。王博士的物品留在安全区高楼门 28 号彭先生的房子里。据说该房子位于法国大使馆附近。

如情况可能的话,望能满足两位先生的请求。

经办人:劳滕施拉格尔(签名)

(译自德国外交部档案)

25. 汉口德国大使馆致南京办事处公函

1938 年 3 月 1 日于汉口

编号:5720/2198/38

致南京办事处

外交部的新闻处长李体忠来大使馆请求能否由南京办事处的一位先生调查赤壁路 5 号他的房子以及房子内的家具设施等情况,并了解他当时留在房子里的中国仆人赵(Chao)的下落。

李先生请求在调查时千万不要让人知道该房子和家具设施等的主人是国民政府的高官。此外,据他所知,该房子仍然完好无损,曾被中国难民居住过。

关于该房子之事,我已于不久前给办事处写过信,如能满足李体忠上述两个愿望,不胜感激。

承办人:劳(签名)

(译自德国外交部档案)

26. 罗森致上海四川路 110 号德商孔士洋行函

(由上海德国总领事馆转交)

1938 年 3 月 2 日于南京

德国大使馆南京办事处

副本编号:5719/1148/38

事由:复告今年 2 月 7 日致上海德国总领事馆的来函

根据目前正住在德商礼和洋行的贵行厨子陈述,在贵行先生们离开南京后收到的邮件,均由礼和洋行的克勒格尔先生负责保管。因为现在无论是在贵公司的、还是在礼和洋行的房子里没有任何尚未拆封的寄给贵公司的邮件,估计克勒格尔先生都带到上海去了。

最近一次到你们在中央路 392 号房子去查看表明,该处房子现在已被洗劫一空,冰箱现在消失不见了。对此不能确定是日本士兵还是中国人(他们现在也多次洗劫过房子)将你们房子里以前还有的东西拿走的。一个由房主雇佣的几天来留在房子里的看门人声称,他到来时房子里已空无一物。

罗森(签名)

(译自德国外交部档案)

27. 布尔勃里斯先生扬州路 21 号房子的 仆人易利兴、赵洪和栾兴希的报告

档案编号:5720/1827/38

1937 年 12 月 16 日、17 日、18 日和 19 日被日本士兵洗劫走的物品
清单:

1. 1 只金戒指	32 元	
2. 1 双皮鞋	6.5 元	
3. 现钞	7 元	
4. 1 件毛上衣	8 元	合计:53.50 元

厨子易利兴被洗劫走的东西:

1. 现钞	45.5 元	
2. 1 只金戒指	35 元	
3. 1 只金表	5 元	
4. 1 件皮上衣	15 元	
5. 1 双皮鞋	6 元	
6. 1 幅绸布画	10 元	
7. 6 瓶啤酒	4 元	
8. 11 罐牛奶	4.4 元	
9. 20 听罐头肉	1.6 元	合计:126.5 元

仆人赵洪被洗劫走的物品:

1. 现钞	18.4 元	
2. 1 条被子	8 元	
3. 1 只手表	6.5 元	
4. 2 件棉衣	4 元	合计:36.9 元

总计:216.9 元

(译自德国外交部档案)

28. E. 玛尔加蕾特·陈·齐默尔曼太太 致沙尔芬贝格信函

1938 年 3 月 15 日于上海

(由滕·萨尔达姆转交 E. 玛尔加蕾特·陈·齐默尔曼太太, 上海 Remi 路 183 号)

编号: 5719/2374/38

致南京行政主管沙尔芬贝格先生

我在南京的中央大学教授过几年德语课。两年前我曾去北京购买古玩物品、工艺品及其他东西, 因为我一直打算在 1937 年秋返回德国, 用这些东西在那里为自己创造一个生存条件。7 月初我去了日本, 在那里避暑过夏天。我在 9 月返回时, 打算立刻回到南京, 抢救存放在朋友房子里我所有的东西。在这里的德国领事馆里, 行政主管格特延先生十分友好, 提请我注意在战争中旅行的危险性。我不肯接受他提出的不同意见, 因为我将全部资产都投在了那些东西上。行政主管格特延先生给我建议向驻南京大使馆打电话代为询问一下, 大使馆有否可能为我将放在我朋友家中的那些东西取出来暂时保管好。大使馆于 1937 年 11 月 18 日电话回答说, 他们会试着这么做。11 月 20 日, 我的朋友们突然撤离房子, 将我的全部德语书籍(锁在几只木箱里, 上面写有德文的姓名)留在了房子里(门东街 11 号)。装有工艺品、银制品、地毯、丝绸衣料和首饰物品的 4 只木箱被存放在施维宁教授先生的房子里, 处于德国国旗的保护下。我的所有木箱以及皮箱带有德文姓名标记, 也有中文的姓名标记。

据我在 1938 年 1 月 8 日德国大使馆的来信中看到, 这些箱子里的所有贵重物品都被洗劫掉了, 而且是被日本士兵抢走的。

我存放在门东房子里的德语书籍当然没有挂国旗, 在日本士兵的命令下都被烧光了。除去由于日本士兵的这种行动, 我损失的那些书籍的价值也是无法挽回的。我的许多信件、文凭以及其他证书同样都被付之

一炬。那些词典、教科书、国民经济书籍和长篇小说中没有中文书,其中还有一些战争学的书籍。我对这件事十分恼火,因为烧毁这些书籍使我蒙受了巨大损失。

我的其他财产情况则不同,我作为德国籍人将它们置于德国国旗的保护之下。我的生存条件因为遭到如此抢劫被葬送了,我变成了一无所有的穷光蛋。为此我请求行政主管沙尔芬贝格先生运用他的影响,至少给我这些东西以补偿,使我能立刻返回德国去,使开始一段时间的生活能有保障。

此外,请允许我提出一个请求,是否有可能将我还留在南京的东西按照附上的清单寄到我现在的地址来,对此理所当然地需由我自己承担费用。十分感谢您的友好支持。

此致敬礼!

E. 玛尔加蕾特·陈·齐默尔曼太太(签名)

(译自德国外交部档案)

29. 克勒格尔先生关于中央路 392 号 德商孔士洋行房子情况的陈述

编号:5720/1827/1938

德商孔士洋行

我于 1937 年 12 月 13 日下午去查看了这处房子。事先我从这时已经住在安全区的仆人那里取到了钥匙。看到房子完好无损,一切都没有损坏,房子周围的竹篱笆都关闭着,铁门也锁着。这个地区这时已见不到中国军人。12 月 15 日下午我发现这处房子被撬开了,窗户都被打开,所有锁着的房间门都被强行打开了,大衣柜和箱子包括仆人的也都打开了。我到达时,正好有 5 个日本士兵穿过后被砸坏并踩倒在地的竹篱笆离去。位于竹篱笆后面的那些房子里住进了日本士兵。日本士兵经常到这里来,因为尽管我用钉子把那些门都钉牢和锁上,却每次都发现又被撬开了。我上次去查看时,只有冰箱和少数家具未损坏,甚至一只浴缸也被拆走,保险柜被砸破了,保险柜的锁显然是被枪弹打坏的。商品目录、案卷和信纸散落在房间四周,显然已不能再使用,办公室里的大写字桌连同几张椅子也被搬走了。这所房子的财产除去少数几件家具和冰箱外应视为已全部损失。

由于仆人们尚不敢离开安全区,大使馆至今还不能对被抢劫和被损坏的东西提出一份详细的目录。

(译自德国外交部档案)

30. 罗森致汉口德国大使馆公函

1938年3月18日于南京

德国大使馆南京办事处

编号:5719/2054/38

事由:复告今年2月22日编号5720/2054/38来函

1. 梁印文先生的仆人和园艺工人情况非常良好,但他们已有4个月没有收到工资了。

2. 留在高楼门28号王雅翁博士房子内的物品已被洗劫一空。由于旁边的篱笆已拆掉,所以到那房子去没有阻碍。那个地区也即党部大楼、法国大使馆和沙尔芬贝格房子所在地区除去警卫人员已是完全无人居住,看来那里整个地区都已被日本人封锁。

因为日本人容忍中国人的偷窃行为,对此可以预计,房子里凡是没焊牢的和钉牢的所有东西都会逐渐消失不见,例如还留在那里的门和窗子都会遭此命运。

罗森(签名)

(译自德国外交部档案)

31. 罗森致汉口德国大使馆公函

1938 年 3 月 18 日于南京

德国大使馆南京办事处

编号:3719/2126/38

事由:回复今年 2 月 25 日编号 5720/2126/38 来函

傅厚岗 69 号姬(Tjiän)先生的房子已被一个日本的军械所占用。因此,地产和房子的情况只能从门外看到一些,花园里保持得很干净。可以估计,该房子已被洗劫一空。

罗森(签名)

(译自德国外交部档案)

32. 劳滕施拉格尔致香港德国总领事馆函

1938 年 3 月 24 日于汉口

编号:5720/2386/38

中国公民王廷璋先生请求大使馆了解他在南京灵隐路 10 号房子的情况。德国大使馆南京办事处对此的报告如下:

王廷璋先生灵隐路 10 号的房子受到了日本士兵的严重洗劫,许多东西都被劫走,只留下了少些物品。许多房门和窗户被砸开,柜子、家具和箱子都被砸烂了。所有容器都被打开,里面的东西被倒了出来,被抢劫的房间里现在还像原来留下来的样子。我们的雇员孙现在安排重新将房子整理好。王廷璋现在逗留在香港,可以将信息由香港跑马厅黄泥甬道 69 号冯伯乐先生转告。

如蒙告知王先生,不胜感激。

承办人:劳滕施拉格尔(签名)

(译自德国外交部档案)

33. 罗 森 随 笔

1938 年 3 月 26 日于南京

编号:5719/2340/38

伯勒尔先生的看门人宋其昌报告了下述被洗劫的详细情况:

从 1937 年 12 月 14 日至 1938 年 1 月底,云庆巷 46 号的房子每天都不断有日本人来,他们有时 3 个人,有时 5 个人,索要钱和贵重物品,用手枪威胁看门人并抢劫。现在还可以认出朝墙上打了一枪。有几次,日本兵将妇女带到房子里来,还命令我给他们准备吃饭。看门人还被抓到城外去强迫劳动 3 次。有一次共 40—50 人,只有 7 个人活着被释放,其余的都被打死了。

罗森(签名)

(译自德国外交部档案)

34. 德商孔士洋行致德国大使馆函

1938 年 3 月 28 日于汉口

副本

编号:5720/2554/38

致德国大使馆

我感谢你们 3 月 23 日的通知。

如果我在南京的房子里所有东西现在都已没有,我请求将我据 2 月 8 日信函寄去的物品清单统计出的总损失作为申报赔偿的基础,因为各件物品不再有变动。根据这些,我受到的总损失为中国法币6304.70元。

希特勒万岁!

H. W. 西格尔(签名)

(译自德国外交部档案)

35. 伯勒尔(伯禄)先生房子的看守人 宋其昌给德国大使馆的报告

1938年3月30日

编号:5719/2412/38

我的主人已经离开南京9个月了。他在离去时给了我2个月工资,后来又寄给我30元,指示我交电费和水费。我随即交了12元电费和9元水费(各为3个月)。此外,我做一面德国国旗花去了3元。由此30元只剩下6元。2月份我向大使馆预支了30元。我7个月工资只得到36元。我每个月的工资是17元,7个月应该是119元。扣除预支的36元,还应该有83元。我主人的房间里除去被洗劫走的,剩下的东西拍卖掉估计也只值20元。这些东西是1只橱柜,2张铁床架,1只铁炉子,3只沙发,以及一些桌子和椅子等物。前几个月我完全靠朋友们的救助生活,还欠下许多债。大使馆给的30元我还了一部分债。我积蓄下来的40元钱被日本人抢走了。我已完全身无分文,欠了许多债。我不得不向你们请求给予救济。

呈文人:宋其昌

(译自德国外交部档案)

36. 罗森致汉口德国大使馆公函

1938年4月14日于南京

德国大使馆南京办事处

编号:5720/2989/38

事由:复告今年4月4日编号5720/2989/38来函

罗家伦(Lo Chia-luen)博士位于大树根88—92号的房子没有人住,完全是空的。如果说原先那里留有家具设施等物,它们就都已被一件不留地搬走了。

私下里说一下,据我的观察,这里所有的家具等物都是被运往飞机场去的,可能用于那里无数日本飞行人员的营房作家具。

但不能确定该房子是否如同其他许多官员的房子那样已被没收。

查找罗家伦博士的仆人下落至今未有结果。因为没有告知该仆人的姓名,所以很难查找,但我们将继续查找。

罗森(签名)

(译自德国外交部档案)

37. 罗森致汉口德国大使馆公函

1938 年 4 月 19 日于南京

德国大使馆南京办事处

编号:5720/2197/38

内容:复告 1938 年 4 月 14 日报告

外交部副部长徐谟博士的厨子陈希生(Chen Chi-sheng)现已查到,今天他来到这里。说明的情况如下:

他现在和妻子生活在一起,全都很健康。他们住在幸福(Hsin Fu)拍卖公司大楼里(这是自治委员会王先生的地方,他是著名的拍卖商人吉米)。

他在日本人进入南京前将高楼门 100 号房子里的东西包装好并贴上了封条,日本人来后将包装全部打开,拖走了一部分财产。现在还有三名日本军官住在房子里。

厨子陈猜测,日本人肯定早已听说该房子是徐谟博士的。关于详细情况他将写信告诉他的主人。

罗森(签名)

(译自德国外交部档案)

38. 德国驻东京大使馆诺贝尔致德国 上海总领事馆菲舍尔参赞公函

1938 年 4 月 23 日于东京

亲爱的菲舍尔先生！

日本参谋本部德国组组长细乡少佐将于 4 月末陪同派去华中前线的德国空军上尉舒贝尔特出行。在舒贝尔特上尉参观陆军航空兵结束后，将由一名日本海军军官陪同参观海军两天。

日本参谋本部委托细乡少佐在这期间，对上海德国人的情况、抱怨和要求作一番客观的了解。细乡少佐的性格一贯沉着和客观，他将会怀着良好的意愿执行交给他的任务。为此我请求与他对一切悬而未决的问题进行坦率地交谈，此外并安排他有机会会见德国社团的领导人并进行一次交谈。

希特勒万岁！

忠于您的诺贝尔（签名）

（译自德国外交部档案）

39. 罗森致汉口德国大使馆公函

1938年4月25日于南京

德国大使馆南京办事处

编号:5719/2375/38

在遭日本人疯狂洗劫受到严重损失的人员中,有一位陈先生现在已离婚的妻子,她是玛尔加蕾特·陈女士,娘家姓齐默尔曼,曾任总顾问处的译员。她申请恢复德国国籍。据上海总领事馆告知,预计该申请会被批准。

陈女士作为中国公民当然没有希望获得日本人的赔偿。为此我请求授权准许接受陈女士赔偿损失的申请,转达给日本当局。

根据我在爱沙尼亚服务的经验,这样的申请是要经历一个很长过程的。我们在1932年曾与爱沙尼亚政府签订关于赔偿被剥夺财产的德国富裕地主的协定,当时有一批被剥夺财产(1919)的人即使赔偿法(1926)生效后提出了申请,仍然没有获得依法赔偿。

上海总领事馆将收到本报告的副本。

罗森(签名)

(译自德国外交部档案)

40. 罗森致西格尔先生等人的公函

1938年4月26日于南京

编号:3720/3006/38

1) 致汉口 H. N. 西格尔先生,由汉口德国大使馆转交。

2) 致上海德商孔士洋行的先生们,由上海总领事馆转交。

根据你们今年3月28日写给领事馆秘书许尔特尔先生——他正在休假,6月初返回——的来信已收悉,我证明在仆人房子的小储藏室也无一完物。你们对仆人们行为的了解是不正确的:中央路上那些房子一开始就被日本人占用了,那里整个地区现在还是封锁的,甚至我们办事处的官员只有在一个日本宪兵的陪同下才能到那里去。中国人在今年2月以前干脆都被赶走了。克勒格尔先生十分了解这种情况,你们的人在去年12月就被命令离开这个危险地区。你们的厨子今天也还住在礼和洋行的房子里,这个地区是开放的。然后,房主直到今年2月才试图在房子里派驻一个看守人,但那个人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只在那里住了几天。因此从那时以来该处房子就没有人看守,也没有人住,遍地是垃圾,看上去景象十分可怕。

今年4月23日,上海贵公司请求给房子提供一面新的国旗。诚然,该处房子由于挂有破损严重的国旗受到保护。不过,如果贵公司不立即寄一面新的来,或者破损的国旗被取了下来,房子就会完全被日本人占领和没收。这样,根据我们至今的经验,不可避免地就会失去你们作为中国房子主人的地位。

德商孔士洋行厨子栾骏一被抢走的物品清单:

手表	1只	16元
皮大衣	1件	57元
金戒指	1只	25元
床铺	1张	7元
棉被	1条	8.5元

被单	2 条	5.2 元
毛线衣	1 件	9 元
火油炉子	1 个	12 元
樟木箱子	1 只	10.5 元
沙糖	10 磅	1.9 元
火腿	2 只	10 元
罐头鱼	5 听	1.8 元
罐头牛肉	5 听	3 元
红锡包香烟	4 听	2 元
小刀香烟	20 包	1.2 元

孔士洋行厨子 栾骏一(签名)

兰道尔博士上海路 7 号房子里被日本士兵偷窃走的物品清单:

- 1 辆汽车
- 2 架留声机
- 2 台电风扇
- 5 条被子
- 8 只钵子
- 50—60 只盆子
- 1 只床垫
- 2 只熨斗
- 2 只电炉子
- 20 张中国图片
- 3 只茶壶
- 30 张留声机唱片
- 8 个软椅枕头
- 5 套欧式西服
- 1 副麻将牌
- 3 顶蚊帐
- 2 只大钟
- 4 只痰盂

432 东京审判书证及苏、意、德文献

3 只水壶

2 张方桌

5 只洗脸盆

4 听汽油

3 只皮箱

众多衣服(数量不明)

被损坏的物品：

1 架钢琴

5 只衣柜

(译自德国外交部档案)

41. 陶德曼致柏林德国外交部公函

1938 年 6 月 1 日于汉口

编号:404

档案号:2722/4028/38

附件 5 份

副本 3 份

内容:关于特劳特领事与日本细乡少佐之间就上海德国社团不满情绪谈话的随笔。

兹将 5 份副本连同 4 份附件呈送柏林德国外交部。

陶德曼(签名)

(译自德国外交部档案)

汉口德国大使馆 1938 年 6 月 1 日编号 404 的报告附件一

菲舍尔致汉口德国大使馆公函

1938 年 5 月 17 日于上海

上海德国总领事馆

编号:117

档案号:政治 4L

附件 4 份

附件 4 份连同 2 份附件和大使馆参赞诺贝尔(Nobel)今年 4 月 23 日信件的副本呈送汉口德国大使馆。

菲舍尔(签名)

汉口德国大使馆 1938 年 6 月 1 日编号 404 报告附件二

档案号:2722/4028/38

菲舍尔致东京德国大使馆参赞诺贝尔公函

1938年5月17日于上海

上海德国领事馆

档案号:政治 4L

5987/38

附件 2 份

致德国驻东京大使馆参赞诺贝尔博士

亲爱的诺贝尔先生!

为答复您今年4月23日的来信,特告知您,细乡少佐和舒贝尔特上尉曾来过这里。我和细乡少佐会见多次,也带他见过一些德国社团的领导人员。根据他的要求,我将我们的一些要求列出清单寄给了他,并将此作为附件寄上。但愿他能帮助实现这些要求。

细乡已于昨天返回东京。我在此将细乡少佐的谈话记录作为附件寄上。向您致以衷心的问候。

希特勒万岁!

十分忠诚于你的 M. 菲舍尔(签名)

汉口德国大使馆 1938 年 6 月 1 日编号 404 报告的附件三

档案号:2722/4028/38

上海德国社团向日本当局提出的书面要求

1938 年 5 月 14 日于上海

I

如蒙日本当局重视下列各点要求,上海德国社团将十分高兴。

1) 在上海的德国人不理解,一名日本士兵对比尔特教授粗暴袭击两个月后,对行凶者的处罚至今尚未公布。

2) 令人十分难堪的一件事,一再强迫德国人甚至一名德国女士要向日本哨兵脱帽致敬。

II

德国公民普夫鲁克和贝克尔在凯司维克(Keswick)路附近散步,在

经过 1937 年 10 月 24 日划定的沪杭铁路线时,受到日本飞机的机枪扫射。他们提出了赔偿损失的要求:贝克尔中国法币 588.85 元,普夫鲁克中国法币 1729 元。日方在几个月前同意支付的款项至今未兑现。

III

1937 年 10 月 14 日在虹桥路附近的一次空袭时,德国公民 H. 迪斯特尔, W. 米勒, C. J. 埃克哈特和 F. G. 菲力普医学博士的房子被日本的飞机炸毁,损失严重。

提出的赔偿损失要求是:

迪斯特尔先生计中国法币:5447.16 元

米勒先生计中国法币:19600.58 元=1191.4.7 先令

(租金赔偿不包括在内)

埃克哈特先生计中国法币:7350.90 元=435.10.1 先令

菲力普博士计中国法币:5929 元

IV

对许多德国商人来说,为了他们的商业利益,必须出差到杭州、苏州和其他地方去,还有其他一些人要到南京去,查看他们在那里的财产。对这些旅行至今尚未批准。

V

许多德国公民由于他们的合法财产拖延很久才交给他们或是剥夺了他们享有的权利,蒙受了长期的重大损失。

下述列举的是有关迫切的利益必须立即处理的问题:

1) 处理存放在中国进出口公司和奥萨卡·索森·凯撒船厂里的德国货物的事宜进行得异常缓慢。

2) 德国西门子公司、路透公司、布鲁克曼公司和特尔格·施罗德公司想要运走属于他们的存放在浦东科水铁厂(Ko Che Iron Works)的货物,可是还没有得到日本当局的准许。这些货物计 37 吨线材,101 吨生钢板钎插,934 吨旧钢板。

3) 德国西门子公司尽管一再提出申请,仍然没有批准他们兼并的位于陇海线的上海波特兰(Poltland)水泥厂投产。

4) 德商孔士洋行拟对其兼并的位于浦东的火山造船厂投产,但对此

没有得到日本当局的批准。

5) 德商礼和洋行没有得到日本当局的批准,无法使其收购的在布伦路 Z500b 的碎石厂投产。

6) 德商希新(Chieb Hsin)工程公司的代表 F. 希勒和 O. 彼德森总经理试图接收黄浦外滩对面尚在建造的两艘轮船的努力没有成功。那两艘船是作为巨额支付债务转让给该公司的。

VI

今年 4 月 28 日,德国医生齐尔勒博士停放在南京路的轿车被一辆日本的军用卡车撞坏,造成损失 89 美元。

如果说这还仅是一起小事的话,那许多其他事件不能不令人怀疑日本人的责任心。德国社团不理解赔偿的款额为什么不立即支付。

VII

尽管在结束敌对行动后曾请求保护同济大学的校园,但并无效果,至今查明造成同济大学德国教授们的损失达中国法币 135933 元,相当于 100691.43 德国马克。除此以外,还有同济大学校园地面上德国财产的实物损失。

汉口德国大使馆 1938 年 6 月 1 日编号 404 报告的附件四

内容:特劳特关于 1938 年 5 月 13 日与细乡少佐在德国大使馆参赞 W. 菲舍尔先生家中社交聚会时的谈话记录

细乡少佐在交谈了一会儿无关紧要的事情后说,他在东京听说过上海德国社团普遍存在不满情绪,但没有具体的印象。他到上海来就是想了解具体情况。如果能够对上海有关这方面的具体情况写出材料给他,他将十分感激。这样方便他返回东京后向参谋本部报告,争取立即得到处理。因为必须承认发生了不应该发生的事,他和日本参谋本部其他军官都认为必须立刻对这些不公正的事情进行弥补。

我对他讲了几起事情(在科水铁厂的货物,上海波特兰水泥厂,普夫鲁克和贝克尔在凯司维克路上德国人的房子遭轰炸,拒绝批准等的事),我答应对上海最重要的事项按他的要求写成材料给他,并且说明,如果他能促成立即解决,我们将十分感激他。

在接下来的谈话中,细乡先生解释说,他欢迎如此坦率的交谈,但就他个人而言,他也要就日本人对德国人的行为提出不同意见,主要有三点:

1) 日本的前线军官们对德国和日本存在密切关系的情况下不理解德国的军事顾问为什么还继续在为中国工作。我回答说,一名德国军官如果在危急的情况下丢下聘用他的政府不顾,它不符合过去德国军官的荣誉观。

细乡先生承认并解释说,一些时间以来他们已就这事平息日本前线军官们的情绪。

2) 德国供应中国大量武器。

我回答说,日本自己就供应了中国大量的武器和弹药。此外,我也并不知道供应中国武器的事情。

细乡先生回答说,参谋本部的人也许是了解这件事的。相反,日本的前线军官们不理解德国为什么不停止给中国供应武器。

细乡先生继续说,不过日本方面特别感到遗憾的是:

3) 我们一次也没有从德国方面得到关于中国内政情况的信息。

为了不伤害这位显然是善意的少佐,我避免回答说是不能让人利用我们从事间谍活动。此外,我觉得对此不能保证日方对希望获得的信息予以审慎地处理。因此我只是回答说,我们对上海以外的中国内政情况根本就不了解。

细乡少佐然后谈到了今年1月天皇主持的一次枢密院会议。这次会议确定了日本对中国的政策不变,外国人对此没有充分理解。今年一月以前存在改变日本对中国政策的可能性,从那时以来就不再有可能了,尽管当时没有估计实施这项决定和政策要持续几年。

最后,细乡先生还谈到关于计划给日本派遣一个德国经济委员会的代表团消息,他指出这件事十分重要,这个委员会不仅访问日本,而且也要访问满洲国和华北(北京)。

特劳特(签名)

汉口德国大使馆 1938 年 6 月 1 日编号 404 报告附件五

兰道尔先生(林尧华)仆人的报告

1938 年 5 月 11 日于南京

编号:5720/3111/38

从 1937 年 12 月 15 日起,日本兵不断地闯进房子里来,甚至是从清晨 5 点干到晚上 10 点钟。因为大门是锁好的,日本兵就将篱笆强行拉开踩倒在地。他们一天内要来 5—6 次,每次 2—3 人或 10 人。如此持续有一个月之久。大部分东西都在开头的三天里被拿走了。有一次,日本人打包了许多东西,就命令我和从街上抓来的中国人(共有 15 人)扛着跟在他们身后走,到了五台山就命令我们将东西放在马路上,这时有其他人来将东西搬走。被抓来的 15 人只放走了 4 个人。其余的人被捆绑着带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到现在也没有回来。另一次,日本人命令我和其他 6 个中国人将汽车拖到他们那里去,我们将汽车一直拖到水西门。这次 7 个人中只有我被释放,因为我身上有大门钥匙,告诉他我是一个外国人房子的看门人。其他人也被捆绑着带走了。因为这处房子里只有我一个人,发生这两起事件后,房子就长期空着,里面的东西也被洗劫一空,当时我并不在场。当大使馆的先生们第一次来查看这房子时,还看到了房子里乱七八糟的情况。

口述记录人:罗森(签名)5 月 11 日

(译自德国外交部档案)

42. 罗森致上海德国总领事馆公函

1938年6月14日于南京

德国大使馆南京办事处

编号:5720/3910/38

附件1份

事由:复告今年6月8日 Po. 4. L. /6789/38 来函

谨以附件寄上领事秘书许尔特尔对上海比利时总领事馆关于南京比利时大使馆大楼遭洗劫情况的说明。

荷兰公使馆的 H. 博斯先生那时来过这里,与比利时大使馆的职员谈过话,使我能够在当时写给大使馆参赞菲舍尔先生的信函中对此作了陈述。该职员交给 H. 博斯先生的一切说明和书面证件都通过这个渠道给了比利时大使馆。

此外,这个地区是军事区域,平民都被搬走了。因此,中国难民们作案远比日本人的可能性要小得多,而中国军人在匆忙撤退途中可能有比搬运家具和类似物品更操心的事。

据克里斯蒂安·克勒格尔告,位于罗德寄宿学校旁边的那处房子,人所共知,在日本人占领(南京)时还是完好无损的。

许尔特尔(签名)

(译自德国外交部档案)

43. 许尔特尔随笔

1938年6月14日于南京

编号:5720/3900/38

上海的日本总领事馆向比利时总领事馆陈述,说是南京比利时大使馆的职员对我说过,南京比利时大使馆房子里丢失的一切物品都是被中国的难民们抢劫走的。这肯定是一起误会。我个人从来没有和比利时大使馆的那个职员谈过话。这起误会的起因,肯定要归咎于我在今年3月末(3月24日?)与日本的副领事福田的一次交谈。福田来找我,询问办事处是否报告过比利时大使馆遭洗劫的事。我回答说,罗森博士先生有一个私人请求,他在我的陪同下去查看了比利时大使馆的地产。(福田先生随即根据陪同我们的宪兵记录说了这次查看的准确日期,因为大使馆的楼房是锁着的,我们只能透过窗户看一眼位于底层的房间状况,能够报告的是有明显的洗劫现象。据我所知,罗森博士通过同样的私人渠道通知了该询问的单位。)

对福田的一个同样问题,我补充说,罗森先生肯定没有写过是谁犯下的洗劫罪。因为我们在那里找不到这件事的证人,我们也无法作进一步的调查,根本无法知道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洗劫的。福田先生随即说,日本方面已经肯定是中国的难民们犯下了洗劫罪。他们抓到一些抢劫犯,他们也都已招供了。

最后,福田先生表示对比利时大使馆的一封来函写的有关丢失物品的详细情况感到惊讶。我回答说,这些陈述不是我们报告的,因为如同前面说的,我们只是从外面看了一下。这些情况也许是(比利时)大使馆职员报告的。

我们在查看比利时大使的地产时,对那个职员的下落仍一无所知。此外,他在日本人进入南京前就逃进了安全区。据我现在从雇员宋希成(Sun Chi-cheng)那里听说,那个职员有一次对他说,既有日本人也有中国人参与洗劫了比利时大使馆。我们办事处理所当然地没有将那个职

员的说法转告给日本人。

根据在南京的一般经验,可以说在日本军队或多或少洗劫过南京之后,南京安全区以外的居民几乎对所有的房子进行过再次搜索,日本占领军对此丝毫没有进行阻拦。

A. 许尔特尔(签名)

(译自德国外交部档案)

44. 贝克博士石碑巷 12 号房子的仆人报告

编号:5720/1817/38

被洗劫的物品清单:

- 1 辆轿车
- 10 听汽油
- 3 瓶威士忌
- 24 瓶啤酒
- 3 罐鱼
- 6 罐食品
- 5 罐香肠
- 2 瓶白葡萄酒
- 1 瓶白兰地

仆人被洗劫的物品:

1 辆自行车	价值 35 元
1 件皮大衣	价值 50 元
1 只金戒指	价值 32 元

合计:117 元

呈送人:奥托·沃尔夫
(译自德国外交部档案)

45. 许尔特尔致唐瓦莉·冯·比勒公函

1938年7月7日于南京

德国大使馆南京办事处

编号:5720/2800/38

事由:复告今年5月21日来函

关于由德国官方代表您对遭日本部队洗劫提出赔偿损失要求事宜,您首先必须提供您拥有德国国籍的证明。

关于为您天竺路23-25号房子付租金的问题,一般说,凡离开南京的德国人房子不必再付租金。中国的房子主人对他们的房子因此归入为德国财产而感到高兴,使之不会被日本军事单位或这里的政府侵占。大部分以前南京的德国人继续给他们留在这里的仆人们支付工资。由于留下了仆人,绝大部分房子也得到了有效的保护。

外国人至今只有个别情况取得签发到南京旅行的许可证,例如美国的牧师和外国代表机构的官员。因(日中)冲突离开南京的成千上万中国居民返回也必须有日本机构的许可证。不过,对中国人的许可证似乎很容易取得。办事处派人将您在红叶村15号房子里两只柜箱连同还存在的全部书籍和证件搬到了您在天竺路23-25号的房子里。

检查那些证件时,还发现有一个蓝色的公文包,里面有纳税和交会费等的收据。遗憾的是没有发现您1927年的出生证和国籍证书。

A. 许尔特尔(签名)

(译自德国外交部档案)

46. 德国大使馆致日本外务省口头照会

1938 年 8 月 11 日于南京

编号:5720/5273/38

德国大使馆编号 68

附件 1 份

口 头 照 会

致东京日本帝国政府外务省

德国大使馆谨提请日本政府外务省注意由于日本军队的行为造成下述另一起德国人财产的损失事件。

1938 年 2 月初对西门子公司芦席营(Lu Hsin Yin)232 号的办公楼进行的查看表明,该办公楼已被洗劫一空,凡是没有被抢走的家具均已严重损坏,不再能够使用。停放在办公楼车库里公司的一辆轿车也已失踪,车库门被砸开了。据现场进行的调查来看,毫无疑问,西门子公司损失是由日本人造成的。此外,在房子里发现有一系列日本生产的物品,可以猜测许多房间都有日本军队临时作营房居住过。

由该公司提出的总损失款额为中国法币 7921 元。

关于由各项损失汇总成总损失款额的详细列表作为附件送上。

请允许德国大使馆再次提出请求,期待在中国被占领区的德国帝国公民的赔偿损失通过日本帝国外务省的友好斡旋,不久能得到令人满意的处理。

(L · S)

(译自德国外交部档案)

47. 德商西门子电机厂致德国总领事馆函

1938 年 8 月 18 日于上海

致上海德国总领事馆

编号:25371

事由:电机厂在南京的资产

我们的高级工程师艾索尔特工学士回来后,请允许我们向你们报告,由于有你们向日本人申请的旅行许可证,在往返途中和在南京逗留期间都没有遇到过任何困难。

高级工程师艾索尔特先生这次旅行的主要目的是视察南京电厂及其资产,以确保我们接收该厂的巨额债权和资产。我们在 1938 年 6 月 7 日的函件中曾详细报告了对这项投资的利益和权利。

高级工程师艾索尔特先生在这次视察中确认,该电厂仍掌握在“军队特别代表团”手中,它们将工厂交给了“新中国”管理。这个工厂和管理部门里的所有日本职员都穿半军人的制服。电厂的经营管理在日本人的领导下大约有 200 名原来的中国人和 3 名中国工程师。

该电厂使用我们提供的发电机组Ⅱ和发电机组Ⅲ持续发电,供应中国和日本的管理当局和路灯照明,更多范围的是日本人和中国人的私人及商业用电。目前每天的发电量估计约有 50,000 千瓦小时。锅炉房的燃料用的是电厂的前中国管理部门大量储存的煤。

在去年 9 月和 10 月的空袭中,炸坏的设备部件只是临时将就地进行了修理,使之能继续运转。此外,在这次视察时没有发现偷窃和战争损失情况。

原计划将该厂转为商业运行并由当局及居民对 1938 年 5 月 1 日以前的发电成本进行核算,至今未能实现。我们偶尔听说,这个电厂现在正与中国中央水电公司进行合并。

我们所以要对高级工程师艾索尔特先生这次视察结果作详细报告,因为我们认为下述观察十分重要:

1) 南京电厂被日本占领者已连续运转几个月,生产的电力供军队、机关和平民使用的是涡轮发电机,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对此拥有财产权,我们对此却并不知情,或是说没有取得我们的同意。

2) 几个月来供应给平民的以及供应管理部门和主管当局的电力,不能再视为战时的紧急状态措施,而是必须认为是电厂的商业利用。

为了维护我们对这家电厂的最大利益,由于供应的发电机没有付款,以及我们作为建造该厂的电机保证金(该保证金没有通过设备的价值和工厂收入予以确保)的拥有人,我们抗议在没有完全处理好债务和确保本公司对该设备的利益之前使用和利用该电厂。我们随函附上我们的抗议函3份,敬请转交给日本的主管当局。

此致敬礼!

中国西门子公司莫贝尔(签名)

(译自德国外交部档案)

48. 重庆办事处致德国大使馆公函

1938 年 10 月 31 日于重庆

德国大使馆

编号:5719/6394/38

新任命的驻柏林中国大使馆参赞丁文渊(Wen Yuan Ting)先生在南京峨嵋路 21 号有一处房子,位于罗德寄宿学校的附近。他哥哥地质学家丁文江有一大批书(大多为科学书籍)不得不留在那处房子里。内容目录是这些书籍中最重要的部分,他十分重视这些内容目录的安全,当时已将它们包好装在木箱里。

丁文渊博士很有礼貌地请求德国大使馆能通过南京办事处尽可能保证这些书籍的安全,并向柏林告知他此事成败与否。

承办人 昆普(签名)
(译自德国外交部档案)

49. 许尔特尔致上海广州路 20 号汉堡—美国航线函

(由上海德国大使馆转交)

1938 年 11 月 7 日于南京

德国大使馆南京办事处

编号:5719/6452/38

根据本月 1 日的来函,谨告知,在给陈女士寄送的物品中,除去陈女士收到一件皮大衣外,没有任何贵重物品。主要都是遭到洗劫后留下来的旧衣服,其中有部分无法确认是否是陈女士的。从这里寄出的五只木箱及箱子——是陈女士明确请求寄送的——都只装满了半箱,因此会产生这些箱子都遭到抢劫过的印象。为此,我想对你们的猜想给予证实,这些运送的大部分木箱遭到了抢劫,没有挂上发车,何况在这里车站上装货的贴有封条的两节车厢在白天就失踪了。

领事秘书 A. 许尔特尔(签名)

(译自德国外交部档案)

50. 德商西门子电机厂致许尔特尔函

1938年11月11日于上海

编号:3487

致德国大使馆南京办事处秘书许尔特尔

尊敬的许尔特尔先生!

我们确认已收到您1938年11月4日的亲切来函,十分感谢您对我们
在南京财产关心。

我们同意您照料等待运走我们的和拉贝先生的财产,直到重新开放
扬子江的航运,也许不久就能实现。我们今天也通知了韩(湘琳)先生。

致以敬礼!

中国西门子公司莫贝尔(签名)

(译自德国外交部档案)

51. 施佩林致埃曼先生函给德国 大使馆南京办事处的副本

1940年5月18日

爱德华·施佩林

南京大方巷21号

致上海塔楼大道路(The Tower, Avenue Road)1182号E.埃曼先生
尊敬的埃曼先生！

我从这里的德国大使馆以及(施密特公司)哈蒙先生处获悉,您又来到了上海。由于长久没有音讯,我几乎认为您是被拘留了。

在最近一段时间里,我经受了許多痛苦,一直还躺在床上,不能走路,不过医生对我说,会好起来的。

我听说,您向德国大使馆办事处详细地打听您20桶无环油(Ringfree Öl)的下落、销售、存量及命运。

这事说来话长,对此我得从头说起。

您或许是您的代理人犯了一个大错误,您的货物没有向我们或是向美国大使馆登记,或者至少留下地址。我们在这里帮助了许多人。我作为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总稽察,接受了旧政府的650名旧中国老年警察,就是说拥有警察局的权力。您犯的第二个错误是,没有通过大使馆付钱给看守人。在那里担任看守的一位老太婆声称从来没有得到过钱。

有一天,领事秘书许尔特尔叫我和他驾车到基督教堂附近的夏口路(Hsia Ko Lu)去,最近那里被偷掉了许多油。

那是中国的一个小村子,孤零零的,很荒凉,约有10所破落的房屋,有一处的房屋位于低洼处,没有窗户,是您的所谓货栈或仓库。没有地板,尽是泥地,上面大量的油迹(泄漏的或蒸发的油)。通向另一个院子的外墙上有一个1.5平方米的洞,据说在我们去的前几天那里被偷走了两桶油。

许尔特尔说,“施佩林,快叫一辆卡车到这里来,否则其他的油也会

被偷走的。”我从我有股份的运输公司叫来了一辆卡车，让他们先将 20 桶油运到我的房子里去。那个老太来要钱。我给了她 5 元钱，另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给了她 10 元钱。

油桶被滚到了我漂亮的草坪上，草地被弄得乱七八糟。过了几天，暖房里也已经又出现很大的油迹。我感到自己太笨了。我请来一个中国人，我们检查了每一个油桶。

这时我们查明的情况如下：

当时有 3 种油：深色的、浅色的和稍些深色的。没有一个桶是满的，也就是不到 50 加仑，许多桶被钻过孔，取走了油，然后灌进了水。这种油已不再有价值。

宙斯说，怎么办？——我的那个中国人已经失去了兴趣。但是我说服他将整个余下的部分拿回去，把所有的油过滤一次，不要告诉任何人。再以每加仑 3 元的价格卖出去。没有过滤的 2 桶油在开始时就卖给了日本人，每桶比半价多一些，卖了 180 元。有 15 桶共 50 加仑，以每加仑 3 元的价格卖出，每桶 150 元，共得 2250 元。有 3 桶因泄漏或被偷窃过是空的。我已通过德亚银行汇给您中国法币 1180 元，余下的 1250 元待我的那位中国人——他现在去了芜湖在那儿卖米——返回上海后，我就寄给您，肯定会在 1940 年 6 月 1 日前办理好。

我垫出的款项有：

1 辆运货卡车	18 元
6 个劳力	6 元
看守的老太婆	5 元
第二次	10 元

合计 39 元

请您将这笔款额以我的名字支付给红十字会援助的账上。

致以德意志的敬礼！

希特勒万岁！

爱德华·史佩林

（译自德国外交部档案）

52. 保罗·沙尔芬贝格^①之死

沙尔芬贝格向外交部请求休假的报告

1938年2月1日于南京

致

柏林德国外交部

我谨请求外交部同意我从今年7月1日起回国休假,同时保留国外补贴,并批准我休假结束后不用再返回中国。

我前次休假于1933年11月5日回到北京后,又于1936年4月21日调到了南京这里来。

我于1873年12月2日出生,将于1938年12月31日退休。我请求根据这个情况确定我的休假起讫时间恰好是到1938年底结束。我打算这次的旅程能从水路经过苏伊士运河,为此我不想坐快轮,而是乘坐汉堡——美国邮轮公司的一艘内燃机轮船走,如果能够买到轮船票的话。

我的妻子由于中日冲突的原因,已随撤退妇女和儿童的轮船从天津

① 译者按:保罗·沙尔芬贝格生于1873年12月2日,1888年服兵役,1903年转业进入外交界,在天津领事馆任行政主管。1934年调去北京公使馆工作,1935年调来德国驻华南京大使馆任行政主管。1937年10月大使馆撤去武汉后,他和罗森、许尔特尔3人留在南京办事处坚持工作。南京大屠杀期间,他写有9篇关于南京形势的文章,揭露日本人在南京犯下的大屠杀暴行。1938年6月18日,日本使馆宴请在南京的西方外交人员,沙尔芬贝格和罗森应邀赴宴,餐后次日即暴病死去,美国医生诊断为食物中毒,但因无从查究,沙尔芬贝格之死成了疑案。他本应于当年回国休假直至退休,却不幸死于南京。据约翰·拉贝孙子托马斯·拉贝最近新著《拉贝全传》一书披露,他在采访罗森的儿子保罗·罗森时,后者告诉他,其父亲曾对他讲过,当年日本人宴请时,主食有牛排。服务员正想将一块切下的带血牛排放到罗森的盘子里,因罗森不喜欢吃有血的牛排,就取了另一块烤透的牛排吃。沙尔芬贝格则取那块带血的牛排吃,餐后次日即暴病死去。罗森和其他人均安然无恙。故罗森怀疑日本人有蓄意谋杀之嫌,矛头是针对他本人的。

经科巴(Koba)和香港离开了中国。从天津出发的时间为1937年10月4日,就是说,那时正好是我可以休假的时间。只是由于突然发生了战争的原因,我的妻子必须提前离开。此外,我请求按照规定的额度,对我和妻子返回德国的旅费给予补贴。

由于汉口的邮政交通严重受阻,与南京的邮政交通已完全中断,如果对我的申请作出决定后,请能用电报通知上海总领事馆,以便利用偶尔来南京的信使找机会告知我本人,我将十分感激。

签名:沙尔贝芬格
南京办事处行政主管

柏林外交部给汉口德国大使馆公函

1938年4月23日于柏林,航空信

致

临时在汉口的德国大使馆

附一份指示的副本

事由:1938年2月10的报告(编号:98)以及有关1938年3月26日的指示(人事档案 M1429)

由于公务需要的原因,有保留地改变沙尔贝芬格回国休假的请求。我们同意他乘坐海轮回国休假的打算,但不是在1938年7月1日前开始休假。何时休假由大使馆确定。

说明:

行政主管沙尔贝芬格上次休假回来后于1933年11月6日在北平恢复工作,1936年4月21日起在南京工作。

此件请归入人事档案 M1457, Ang III

承办人签名:施罗德

陶德曼给柏林外交部的电报

发出:汉口,1938年6月21日,16时20分

收到:柏林,1938年6月21日,11时55分

罗森南京来电称:

“沙尔贝芬格食物中毒后不久,于星期日晚上23时去世。

请婉转地通知其家属或转告……①”

沙尔贝芬格的妻子正患重病,地址:巴德奥尔普。

请告知她住在于耳岑的亲戚魏德家。

陶德曼

许尔特尔给柏林外交部的报告

1938年6月22日于南京

德国大使馆南京办事处

编号:64

卷宗号:6415/4229/38

致柏林德国外交部

事由:关于汉口大使馆本月20日的电报报告

内容:行政主管保罗·沙尔贝芬格去世

德国驻华大使馆行政主管保罗·沙尔贝芬格患病一天后,于本月19日22时50分去世。

据这里的美国大学医院治疗医生观点,可能是由于沙尔贝芬格先生本月18日在这里的日本总领事馆宴请时吃的肉或鱼中毒所致。

在南京的美国传教士团体协助下,本月21日在金陵大学的小教堂里举行了追悼会,这里的全体外国人都参加了。沙尔贝芬格先生的尸体保存在大学医院的锡制棺材里,等待他家属作出安葬的决定。

为保护(沙尔贝芬格)在这里的遗物,已经采取了相应的措施。

随本报告附上一份死亡证明书和沙尔贝芬格夫人的普通授权书,烦

① 此处字迹不清。

请转交。因为沙尔芬贝格夫人患有重病,谨请考虑决定是否将此两份证书寄送给沙尔芬贝格夫人住在哈诺威的母亲。她母亲名叫玛丽·克里斯蒂安娜·魏德,娘家姓克里斯蒂森。

汉口德国大使馆和上海领事馆分别收到本报告的副本。

签字:许尔特尔

于尔根森·魏德博士致柏林外交部函

1938年12月21日于尔岑

致

柏林德国外交部

事由:南京遭抢劫损失赔偿事宜

我作为未成年孩子汉斯·格奥尔格·沙尔芬贝格和蕾娜特·沙尔芬贝格的监护人,向外交部提出如下申请:

1938年6月19日在南京去世的我的姐夫行政主管保罗·沙尔芬贝格,提出他在南京的房子遭到洗劫,要求日方赔偿(中国)法币1848元。由于此事似乎得不到最终的解决。据我所知,帝国给在西班牙遭受类似损失的德国官员预付了要求的赔偿款。我请求基于同样的情况也给失去父母的孩子们付给一笔预付款。

我申请的一个迫切原因是:我姐夫家与他的弟兄们为了1936年在慕尼黑去世的大哥留下的遗产向法院提起了诉讼,而诉讼的结果又对孩子们的未来至关重要,需要为此筹集一大笔诉讼款项。

我还请求在作出决定时,应考虑到孩子们的父亲是在南京为帝国服务的艰难岗位上去世的,是他参加一次正式外交活动导致的后果。

希特勒万岁!

签名:于尔根森·魏德博士

上海德国大使馆给柏林外交部报告

1939年3月27日于上海

上海德国大使馆

编号:SH307

卷宗号:5720/2323/39

事由:关于今年2月3日的指示

人事档案 BS446GV2/2

内容:行政主管沙尔芬贝格的赔偿事宜

上述指示告知,政务秘书罗森博士提出,已故行政主管沙尔芬贝格向日本当局提出的赔偿要求已经兑现和得到赔偿金乃是一个误解。这个要求至今尚未解决。南京日本总领事馆本身在收到德国大使馆官员1938年1月21日及2月8日递交的赔偿要求后,曾在口头交涉时表示愿意处理这起事件。英国大使馆和美国大使馆那时造成的损失也是立即予以赔付的,而且——据这里所知——对美国人付的是美元。但对我们的赔偿要求没有这么做,是因为起先日本总领事馆认为被拖走两辆汽车的替代汽车来历无法查实,这个问题最终于1938年6月中旬解决后,当时的南京日本总领事花轮先生在1938年6月18日(沙尔芬贝格先生去世的前一天)提出支付沙尔芬贝格的赔偿要求为中国法币1848元,和大使馆其他成员的赔偿款总计中国法币56520元。因为中国法币的汇率从约0.75帝国马克下降到约0.50帝国马克。如同汉口1938年6月21日电报报告(编号:265),行政主管沙尔芬贝格坚持给他的赔偿款也要相应升值。但花轮(Hanawa)先生声明说,他无权支付更多的赔偿款额,因此问题没有获得解决。这件事在南京也就没有再继续交涉,因为在地方上进行谈判根本没有取得成功的希望。前述报告谈的全体德国人的赔偿损失要求,必须在坚实的基础上再次进行交涉。这点当时也发电报告知了驻东京的德国大使馆。

我一定通知东京德国大使馆,对此事继续进行交涉。

签名:

于尔根森·魏德博士给外交部函

1939年5月3日于尔岑

人事档案情 BS446 GV2/2

致

柏林德国外交部

2月3日来信已悉,已故行政主管沙尔芬贝格对南京日本人提出的赔偿要求,日本当局已经承认给沙尔芬贝格先生以赔偿,并提出付给他贬值的货币,但被拒绝了。

南京大使馆应该能够改变政务秘书罗森先生的意见。

希特勒万岁!

签名:于尔根森·魏德博士

于尔根森·魏德医学博士致柏林外交部函

1942年2月27日,于尔岑

致

柏林外交部

我在空军服役的外甥和以前的被监护人汉斯·格奥尔格·沙尔芬贝格——已故前南京大使馆行政主管保罗·沙尔芬贝格(1873年12月2日生于科比尔尼茨)的儿子急需一份他父亲的出生证,虽经多方努力——不久前找过波兹南当局——仍然不能找到沙尔芬贝格的出生证。

现在我向贵部提出如下请求:可能在我已故姐夫的人事档案里有他的出生证,能否给我提供或复制一份经过公证的出生证副本?

同时我想查询一下我已故姐夫两只箱子的下落。箱子是由南京大使馆寄出的,并于1941年4月15日和1941年5月7日写信告知我们。箱子的钥匙也由外交部于1941年5月13日和1941年6月6日寄给了我。

麻烦之处,预表衷心感谢。

希特勒万岁!

签名:于尔根森·魏德博士

(以上译自德国外交部档案)

53. 罗森^①的受迫害遭遇

罗森自述

1938年9月15日

于柏林-威尔默斯多夫区宾格路28号

(Berlin-Wilmersdorf, Bingerstrasse28)

据我所知,我的家族属于德国最古老的新教派。从可以查到的资料表明,马丁·路德在世时,我们家族最早的祖辈瓦伦丁·巴尔霍恩(Valentin Ballhorn)离开了哈尔伯施塔特(Halberstadt)的胡伊斯堡修道院,结婚成家,他的男性家族成员大多从事宗教职业。研究再次表明,嫁入我们家族的女性成员都是德国宗教改革和人文主义运动的先驱者和参加者。由此我以为,我的祖辈也是宗教改革家菲利普·梅兰希顿的同一个支派。

我的曾祖父弗里德里希·巴尔霍恩为哥廷根大学的法学教授,被里佩(Lippe)的女侯爵保莉妮召去德特莫尔德,任命为司法所长,即该土邦的司法部长。我从家谱中了解到,他曾以这个身份在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代表里佩侯国。“罗森”这个姓就是女侯爵保莉妮赐予他的,和原来的姓氏并用。他由此规定只有他的儿子们才可以使用

① 译者按:格奥尔格·罗森,1895年9月17日生,1961年7月21日去世。他于1921年进入外交部工作,1924年任政务秘书,1925—1927年任纽约副领事,1931年任驻冰岛大使馆一秘。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因其父曾任魏玛政府外交部长和有所谓的半犹太血统,即将升职的他,反被调到北京,后又调去沈阳和天津。1937年夏调到南京任政务秘书。大使馆迁往武汉后,留在南京办事处坚持工作。南京大屠杀期间,他敢于冒险顶撞日本人,揭露日本人烧杀抢掠和强奸妇女的暴行,坚决要求日本赔偿给德国公司和德侨造成的一切损失。他每天都向大使馆和柏林外交部报告日本人在南京犯下的种种暴行,数量达数百件。但他的正义和正当的行为不仅未获上级支持,反遭当局迁怒,于1938年调回柏林,撤销职务,并被调查,受到纳粹当局迫害,被迫流亡北美。直到1944年才确定他退休。他1949年重返外交部工作,1953年任驻伦敦大使馆参赞,1956—1960年任联邦德国驻乌拉圭大使,直至退休。

这个姓氏。

他有一个儿子名叫格奥尔格·罗森,就是我的祖父。他在柏林大学攻读哲学,于1843年23岁时被亚历山大·封·洪堡派去第比利斯,先是研究高加索方言与巴斯克语的亲缘关系,继而任康斯坦丁奥尔公使馆翻译,成了驻俄罗斯国家机构的一名公务员。我的家族从此在普鲁士和德国的外交工作岗位上服务了将近100年。我的祖父后来担任过驻耶路撒冷领事(1853—1867年)和贝尔格莱德总领事(1867—1875年)。他的一个历史功绩是,那时已经看清俄罗斯在塞尔维亚扮演的角色,竭力阐明德国外交政策在这方面的主导作用,只是由于俾斯麦过高估计了霍恩索伦家族王朝和诺曼诺夫王朝之间的结盟关系,没有重视他的报告。我的祖父为此经常遭到俄罗斯方面的暗算。在外交部的档案里可以查到这方面的材料。

德国外交部非常了解我父亲本人的情况及其担任的工作。因此我只想,我父亲从1921年6月至10月担任过外交部部长,也许更多的人称他为“专家部长”,因为他是在外交工作岗位上服务30年后,于65岁在最困难的时期接任外交部长的。他退休时上西里西亚被强行占领,他建议外交部的高官们绝不要再接接受凡尔赛和约以外强加的苛刻条件。在这方面,他后来还试图说服民族人民党拒绝接受道威斯计划,可惜没有成功。他任外交部长时,成功地反对了法国军队通过我们帝国领土的要求。我的父亲没有参加任何政治党派,还反对那时普遍存在的完全拒绝国际联盟的态度。有一次,克维德教授在帝国大饭店走到他身边,请求他用外交部的资金支持国际联盟的组织,西蒙已在他之前提出过这个要求。我父亲回答说,他宁愿用钱购买柏林的牛犊,用来为屠宰户同业公会做宣传。

我本人始终力图继承我家族为外交工作服务的传统,我的最高愿望是能将这个传统也移交给我的两个儿子。我也许可以这么说,我随时都准备反对损害我们国家利益的行为,无论是什么人,也毫不顾忌对我个人的利害关系。今年上半年我在南京就是这么做的,那里的德国财产绝大部分遭到了日本人的洗劫、烧毁和损坏。如果外交部不将我召回,在公开蔑视帝国国旗和尊严的行为没有进行道歉和帝国的巨大损失没有

得到赔偿之前,我是不会离开我的岗位。这一点我对当时的领导陶德曼大使先生说过。

中日战争时,我在南京经历过几乎每天都飞来的日本飞机的狂轰滥炸。去年12月11日和12日,我和南京办事处的其他两位同事在英国的轮船上特别危险,被日本炮兵炮击了整整一个小时。次日又多次受到飞机的俯冲轰炸袭击(美国的炮舰“巴纳”号也在此时被炸沉)。关于这点当时我向外交部写过详细报告。我的英国同行普里多-布龙领事由于保护英国的利益以及在英国国王生日这天遭到的危险,被授予圣米歇尔-乔治指挥员十字勋章,而我为了同样的任务和保护德国的利益作出了同样的努力,还为了保护德国的利益推迟了半年休假,原本要升迁的却被迫冷搁了起来。

在我任职期间,曾代理担任过领导工作,例如1936年下半年在天津,接着在沈阳一年。在南京半年多的工作期间与国社党南京小组有过很好的合作,国社党中国分部的领导人可以证明。在发生夺权事件后不久危险时期,代办不在勒维尔(Leval)时,我成功地击败了爱沙尼亚社会民主党报刊对帝国新总理的攻击,身为外交部长的爱沙尼亚社民党头目由此狼狈不堪。

由此可见,我是一名在前线冲锋陷阵的人。如果不是如此,我早在1933年就被辞退了,连退休金也得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正是大学放假时间,我去里斯本探望父母亲,由于敌人的封锁使我无法前往。德国于1916年向葡萄牙宣战时,我去了西班牙,我在那里通过个人的努力,请求英国大使尽快伴送我回国。这点当时驻马德里的大使冯·施托勒尔先生和驻波恩的代办埃尔温博士先生可以证明。经过3个月的短暂训练,我从1917年7月直至战争结束作为炮兵(普鲁士候补军官)在西线作战(参加过1917年佛兰德战役和1918年的春季攻势)。接着,由于我懂葡萄牙语,短期在殖民部工作过,旨在揭穿殖民国家的谎言,可惜那时毫无别的办法。战后继续我的大学学业,先是在荷兰(我父亲在那里工作),后来是在明斯特大学。

由于我是在国外工作,完全没有参与过国内政党的活动。

对我来说,比个人被撤职和不予分配工作更感到思想痛苦的是,经过长期学习和工作实践的人,此刻却不受信任,要接受审查,不准许我以自己的传统精神,为帝国的利益和保护其未来而共同工作。

签名:罗森

新德意志帝国历史研究所给德国外交部的调查函

1940年4月15日

致

外交部

柏林 W8

威廉大街 74/76 号

新德国帝国历史研究所

慕尼黑路德维希大街 226 号

由于工作的需要,我们谨请告知贵部是否有关于前外交部长罗森妻子家庭出身的材料。我们已从出生证查到前外交部长罗森为半犹太人家庭出身,但无法找到前外交部长妻子妮娜·罗赫的出生证,因为她是在伦敦出生的,结婚地址不明。因为前外交部长罗森有一个儿子,1933年还在外交部从事外交工作,也许可以查到一份关于妮娜·罗赫家庭出身的材料。

麻烦之处,预表感谢。

希特勒万岁!

新德意志帝国历史研究所(公章)

办理人:霍波克博士(签名)

政务秘书罗德对罗森情况的证明书

人事档案 H

证 明

兹证明政务秘书罗森博士以前曾在驻华德国大使馆工作,目前正在休假。因为罗森博士不再返回南京,他已将个人财物及家属带回了德国。

罗森博士作为德国大使馆成员,持有一份外交护照。

承办人:政务秘书罗德(签名)

政务参赞许尔特尔的自述

人事档案 H, 12118/H 19/8

据我所知,退休政务秘书罗森在爆发战争后于去年9月3日或4日到过德国驻伦敦大使馆,向大使馆参赞兼代办科尔特先生报告过他今后的打算。大使馆参赞科尔特先生在谈话中提到返回柏林后,将向外交部主管克里贝尔先生报告他的事情。

一般说,需要指出的是,德国驻伦敦大使馆曾于去年8月30日(星期二)向路透社发过一条消息,要求帝国公民返回德国,但伦敦只有一部分报纸报道了路透社的这条消息。我不能说,政务秘书罗森在战争爆发前是否知道或者获悉这个要求。英国内政部在战争爆发后还发表过一个公告,准许敌国公民在9月6日以前离开英国。但后来表明它仅限于妇女和儿童,绝对不是指处于兵役年龄的成年男子。

现将上述材料呈送人事档案 H。

签名:许尔特尔

1940年8月26日于柏林

致科尔特的调查函

密件 1

致瑞士伯尔尼公使馆

参赞特奥(Theo Kordt)先生

外交部目前正在审查爆发战争后滞留在敌对国家的外交官员,他们是否出于个人原因尽管给他们提供了机会却没有能及时返回德国。例如退休的政务秘书罗森的情况,至今尚未查明,是否驻英国的德国大使馆成员离开伦敦时能够给他提供安全回国的机会,或者他对延误及时回国的机会没有责任,被迫滞留在英国。

根据这里的一份自述材料估计,您在爆发战争前的最后日子里,还再次在大使馆接待过退休政务秘书罗森博士,为此请您报告有否给他提供安全返回德国的机会。是由于他自己没有利用这个机会,还是由于不能由他负责的原因而被迫滞留在英国。

承办人签名

1940年8月30日

此信函前面写有如下备注:

政务参赞许尔特尔的自述中提到大使馆参赞科尔特向部务主管克里伯尔先生报告有关罗森一事,他并没有报告。

因此有必要由科尔特参赞写出书面报告说明此事。

特奥·科尔特给德国外交部报告

1940年9月11日于伯尔尼

德国驻瑞士伯尔尼大使馆

编号:D2045

事由:复告1940年9月4日人事档案处H.12118指示

份数:2份

内容:关于爆发战争时退休政务秘书罗森博士滞留英国事

退休政务秘书罗森博士从未请求我接见他,因此我在战争爆发前也没有与他在伦敦亲自谈过话。他只是多次来过大使馆的领事部,履行他作为帝国公民应该履行的义务。此外,他定期来请大使馆给他开具生活证明。据驻伦敦的瑞士公使馆告知,他被拘留在牛津前一直逗留在伦敦。

我们大使馆在离开伦敦回国时,无法给退休政务秘书罗森博士提供安全回国的机会。我对此可以说,当时控制离境的英国当局甚至试图阻止一批使馆人员离境,借口由哈利法克斯勋爵(Lord Halifax)签发的集体护照上全体使馆成员的名字填得不正确,主要涉及新闻参赞黑塞博士(Dr Hesse)和两名领事秘书以及一位女速记打字员的名字。直到我威胁说,如果检查处不准许质疑的大使馆成员离境的话,我就再次离船上

岸,请负责监督的英国参谋本部上校改变他们的决定。由此表明,大使馆根本无法将其他人作为大使馆成员在 1939 年 9 月 4 日晚登上“贝塔维”(Batavier)号轮船,从格雷夫森德(Gravesend)驶往鹿特丹。

英国政府曾在 1939 年 9 月 3 日发出公告,准许想要返回德国的帝国公民七天以内可以不必特别办理离境许可证回国。就我所知,所有在 10 月 9 日前返回德国的帝国公民都是妇女和儿童。据此可以认为,英国政府显然是为了稳定公众情绪,对这项规定作了有限制的解释,阻止处于兵役年龄的男子离境。还有一个困难:据我们以前驻海牙公使馆的同事们告诉我,荷兰政府在战争爆发后强制要求过境签证。在战争爆发后第一周十分混乱的情况下,能够取得这种过境签证的成功率非常非常小。

可以估计,在这种情况下,退休政务秘书罗森在 9 月 3 日后不再有机会安全返回德国的机会。由此可以肯定,他是由于不能由自己负责的原因被迫留在英国的。

签名:特奥·科尔特

人事档案 H,12994

1) 根据德国驻伦敦大使馆当时的代办特奥·科尔特参赞 1940 年 9 月 11 日的报告,现在可以肯定,退休的政务秘书罗森博士在战争爆发时不能随驻英国的大使馆人员一同离开伦敦。没有理由取消或减少他的退休金。

2) 请将人事档案 H12994 供人事档案 B 参阅。

3) 请(将人事档案 H12994)供罗兰德先生参阅。

4) 归入外交部档案。

承办人签名

1940 年 9 月 17 日于柏林

阿格娜丝·罗森夫人的遗嘱

第一文本的副本

1943 年证书卷宗第 38 号

1943 年 8 月 23 日于柏林审理

签字时在场的有柏林高等法院地区公证员恩斯特·冯·席姆普夫博士。

地点,柏林林荫道 W50,选帝侯大街 234 号

今天的出庭者:

阿格娜丝·罗森夫人,娘家姓克利普夫。住址:柏林-达勒姆米古尔路 16 号,即过去的柏林-威尔默斯多夫,宾格尔路 28 号。

出庭人申述说,想为她的遗嘱进行公证,目的为她的孩子们确定一名监护人。

出庭人申述如下:

我的丈夫为退休政务秘书格奥尔·罗森,生有三个尚未成年的孩子,他们是:

1. 瓦伦蒂娜,1925 年 4 月 28 日生
2. 弗里茨,1926 年 8 月 27 日生
3. 保罗,1932 年 10 月 10 日生

根据柏林-夏洛腾堡地方法院 1941 年 12 月 5 日—14X541/41 决定,监护法规定,应由我的丈夫行使作为父母亲对上述未成年孩子的监护权。由于他正逗留在北美洲,目前无法行使他作为父母亲的监护权。监护法庭为此决定,由我行使作为父母亲的监护权。兹在我的遗嘱中确定如下:

如果我去世了,必须给我的孩子们请一名监护人,我确定男爵埃卡尔德·冯·加布伦茨少将为监护人。

他的住址是:德雷斯頓-魏塞希尔施,霍赫瓦德路 1 号。

如果他不能接受作为监护人的责任,或是他尚未退職,我就确定奥托 C·基普公使替代他作监护人。他的住址是:柏林-格吕纳瓦德,托勃尔路 15 号。

我不再请另外的人作监护人。

我请求,在这份遗嘱交夏洛腾堡地方法院由官方予以保管前,给我两份证书,以便我在目前存在飞机轰炸的情况下,将此证书文本交由私人保管。

本记录由代理公证员当场向出庭人宣读,并取得她的认可。

下述为她的亲手签字:

阿格娜丝·罗森,娘家姓克利普夫

公证员签字:恩斯特·冯·席姆普夫

上述文本制作有两份文本均有如下说明:

该文本收入 1943 年证书卷宗第 38 号的庭审文本,此文本专为阿格娜丝·罗森夫人(娘家姓克利普夫)制作。

罗森夫人的住址:柏林-达勒姆,米古尔路 16 号。

恩斯特·冯·席姆普夫(签字)

地方法院地区公证员

1943 年 8 月 23 日于柏林

费用结算:

(根据 1935 年 11 月 25 日的 R. K. O 第 154 款)

业务价值:3000 帝国马克

根据 R. K. O 第 49 款收费标准的费用:2 帝国马克

邮费(按 R. K. OC 第 139 款第 1 条第 1 号):0.46 帝国马克

合计:2.46 帝国马克

公证员:恩斯特·冯·席姆普夫

此文本正确无误。

签字:少校副官

罗森的退休命令

经过公证的人事材料 2781(副本)

根据德国公务员法第 77 条,我以元首的名义命令政务秘书格奥尔

格·罗森(George Rosen)到 1944 年 4 月底退休。

帝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签字)

外交部国社党组织(公章)

1944 年 4 月 30 日于柏林

2781 人事材料副本备注

1944 年 4 月 30 日 RAH 先生的证书表明,政务秘书格奥尔格·罗森博士 1944 年 4 月 30 日后退休,由于地址不明,他的退休证书暂时无法送达。

V

本副本的备注和经过公证的退休证书副本归入人事档案 B。

签名:冯·马尔舍尔

1944 年 5 月 24 日

外交部确定罗森退休金的复印件

1944 年 7 月 6 日于柏林

人事档案 B, R389GV30/4

关于由第三者转交给您的退休证书,根据随函附上的副本计算,按照现行条款,从 1944 年 5 月 1 日起,您的税前退休金为每月 608.80 帝国马克。

政务部门获得指示,从上述时间起,将每月预付的款额如同以往那样支付给您。一旦您的地址或居住地点有了变动,请您及时告知这里。

谨请注意附上的说明书。

收到本文后,请用附上的回单予以确认。

承办人

男爵冯·加布伦茨少将致外交部政务秘书级财务处函

1944年7月29日于德雷斯頓-巴德魏塞希尔施,霍赫瓦德1号

事由:人事档案4831,

已故阿格娜丝·罗森夫人

兹向贵处报告,退休政务秘书格奥尔格·罗森先生的妻子阿格娜丝·罗森夫人在1944年3月6日死于一次恐怖袭击。

根据柏林-夏洛腾堡地方法院1944年5月30日的委任证书(编号14ⅦR5959),委任我为3个孩子的监护人。根据在此以前提交给我的证明材料,表明目前逗留在美国的退休政务秘书格奥尔格·罗森博士的退休金尚未汇入他在柏林德雷斯頓银行特设的养老金账号(编号:701183/61)。此前已故罗森夫人每月都从此账号提取600帝国马克作为孩子们的生活费用。但自罗森夫人于今年3月去世后,该项款额就再没有汇入德雷斯頓银行的第58号存款账户。诚然,我作为孩子们的监护人十分关心这笔汇款。请允许我询问要以何种方式才能办理好未支付的以及今后要领取这笔退休金的事宜,以确保孩子们能收到这项赡养费。

亟盼得到贵处的答复。

希特勒万岁!

签名:冯·加布伦茨男爵

(以上译自德国外交部档案)

54. 约翰·拉贝 1945 年《柏林日记》

1945 年 4 月 24 日,于西门子城

昨天到处传播的那些谣言没有一条是真的。一切都只是谣传。不过,离我们最近的郊区那些桥梁都被我们的部队炸掉了。持续不断地传来我们高射炮的射击声。敌机的空袭整夜没有停止过,直到今天凌晨敌机还像手风琴似地在我们头顶上方呼啸不断。凌晨 3 时自来水供应中断,现在水压变得十分微小。又断水了。我们将所有的容器都盛满了水。

下午 8 时,整天都有炸弹的爆炸声、飞机的空袭声和炮兵的炮击声。上午 11 时,哈里斯路 11 号的房子发出一阵被击中的声音,烟囱掉落到了街道上,屋顶被炸得破烂不堪,除去玻璃碎片外从外面什么也看不到。似乎是被一颗高射炮弹击中的。西门子电缆厂燃烧起了大火,工厂上空布满了浓浓的乌黑云层。据说是俄国人占领了那个工厂的一部分,我们的人随即将尚未被占领的部分纵火烧掉。我听人说,我们方面在这里附近投入了一个师的兵力,还有从西线撤退的三个师正在到这里来。

妈妈^①变得更加胆大了,我为此焦急万分。她在恐怖袭击严重的情况下出去采购,飞机俯冲轰炸前就出了门。今天中午,战斗激烈,枪弹纷飞,她却到我们的花园里去干活:种植豌豆。这是多么轻率啊!

此刻又响起了空前激烈的枪击声,给人的印象是我们似乎已被包围了,我们四周完全笼罩在乌黑的烟雾之中。

4 月 25 日

昨天夜里相当平静,今天清晨又开始了空袭行动,投弹轰炸持续不断。

昨天晚上 8 时 20 分,爆炸声——可能是高射炮弹击中的声音——

① 这是拉贝对自己妻子的爱称。以下同。

落在对面房子的屋顶上。今天上午,正在双方持续不断交火射击时,我却不得不冒险到邮局附近的武尼克去取3个面包,它们是我们全家几天的口粮。德国军队和冲锋队占领着从里贝尔路直至自来水厂的那条相邻的街道,交战中死了三个人:一名妇女,一名士兵和一名平民,是被高射炮弹的碎片杀死的。别人给我带来的消息是这么说的。

下午5时,里贝尔路13号的房子被飞机投下的炸弹全部炸毁,有5个人被埋在下面。经过我们一个小时的努力才挖出了其中的四个人,全都或多或少地受了重伤,第5个人没有能够救活,挖出来时已经死了。这时俄国人已经进入了我们的西门子城居民区,但没有干预我们的救援行动。

安静了一些时间。我们从消费合作社取了一定数量的食品(牛奶,布丁粉,等等)后,就到地下室去睡觉了。

4月26日

凌晨4时30分,有2名武装的俄国人到地下室来检查,问了一些情况后又离开了,没有找我们的麻烦。

8时正,我们又去消费合作社取了一些食品,那里没有门和窗,也无人管理,不用付费,任何人都可以进去。然后,维利和我到里贝尔路去拖了一些水回来。因为这时我们花园里的自来水也中断了。

又有一些俄国人到地下室来,不过没有停留多久就离开了。从6点钟起可以听到威力强大的炸弹爆炸声,据说是德国部队发起了猛烈的反攻,当然那都是谣传,完全无法得到证实。

昨天晚上,我和其他一些平民将一名重伤者穿过树林抬到加默路11号的急救站(布施大夫设立的红十字会组织)去时,我们看见开关厂的右边和后面升起熊熊大火,是电子管厂还是奥斯拉姆厂,我无法具体确定。

中午12时30分

一个佩戴四枚奖章的俄国士兵走进我们的住房,来到地下防空洞,用枪威胁要打死我们,拿走了我们的手表、戒指和一只怀表,还有妈妈的一只金表。然后这个士兵又和我们友好地握手告别离去。另外一些俄

国士兵在地下室里拿了一罐樱桃酱，当场吃光，他们还喝了一瓶葡萄酒，吃得很高兴。那些人给我们的印象并不坏，他们拿的正是战争扔到他们面前的东西。

飞机空袭不断，我们一再躲到地下防空洞里去，这次躲的是德国人的炸弹。

4月27日

传来了第一批强奸妇女的消息。哈里斯路1号的基特劳斯太太逃过了一次强奸，因为正有一位邻居去看她，致使那个俄国人强奸未遂。哈里斯路5号和7号的人报告说，那里有17岁和19岁的两名少女分别被强奸两到三次。里贝克告诉我，拉普路也已经发生了同样事件。里贝克离开了他在拉普路的房子，带着他的妻子搬到了里贝尔路他的朋友那里。我们为此十分担心，不知道怎样才能保护好伊尔米和艾莉卡·布莱希特。

今天凌晨5点钟以来，大炮声，机枪声和步枪射击声，直到这时也没有停止，只在10点30分有过短暂的休息时间。

那些俄国士兵到我们的住房里来找舒适，但他们都很友好——至少直到现在是如此。他们没有再找我们的麻烦，甚至还给了我们一些食品。但他们对谈话敏感，十分粗暴，如果喝过酒后，他们的表现就很难预料了。

4月28日

夜里很安静。没有枪炮声。6时半和8时半，俄方已向柏林市区发射了炮弹，情况十分可怕，我们必须随时警惕着妇女们会遭到强奸。弗赖伊太太此刻也承认，她由于拒绝一个俄国人，遭到了手枪的威胁，前天夜里不得不顺从了他。昨天夜里她只得躲了起来。我是在半明半暗的房间里匆匆写下上面这件事的。俄国士兵正不断地在我们的住房里进进出出。

西门子城的肉店（位于花圃后面的南街）免费分发了他们剩余的猪肉。一些西门子城的居民抬走了整头牛四分之一的牛肉。我听到这个

消息已为时太晚,那里已一无所有。我们多么迫切需要这些东西啊!一个士兵也拖走了四分之一的牛肉,他卖给我们索要一只金表。瞧,竟有这等事!我的两只金表都已经被劫走了。我们的邻居贝克尔太太非常同情我们,送了一些冻猪肝给我们。妈妈是多么高兴,在切猪肝时她的十个手指都冻僵了。贝克尔太太还带来了一个令人悲伤的消息:大夫奥尔莉希太太用注射毒针将自己和她的两个孩子都毒死了。我向住在附近的一个德国人询问过这件事,他亲口告诉我不知道有否真的发生过这件事。他回答说:“不知道,我没有听说过。不过,可惜我没有毒物,否则可能我也会这样做的。”

4月29日,星期日

夜里平静无事。今天凌晨7时30分,我家窗户前面的俄国炮兵部队开始炮击,但在15分钟后又停止了炮击。据俄国人对我们说,柏林已被包围了,而且分割成了四个包围圈,其中一个包围圈就是特姆佩尔机场,那里有时还有德国飞机起飞。据说元首还在慕尼黑。

昨天夜里,俄国士兵占用了我们的全部住房,我们自己和所有其他住户只得住到地下防空洞里去。

据住在我们房子里的一个俄国人刚才对我们说,希姆莱已经向美国人和英国人投降了,就是说,就地向他们投降的,但不是向俄国人投降。那个俄国人说,希姆莱错误地估计了形势。

布莱希尔特先生回到他的住房来探望家人。他和大约50名同事留在电子管厂负责维修工作,但准许他们每天都到我们这里来探望自己的家人。

4月30日,星期一

夜里比较平静。我们——妈妈和我——得以第一次重又睡在自己房子的卧室里,房间的右面和左面夜里都被俄国人占用了,这时施潘道地区受到了炮火的猛烈轰击,据说德国人还在那里进行反击。

我们美丽的花园也遭到了严重损坏,一辆俄国人的大卡车驶过妈妈的豌豆地畦。一部分灌木围篱和花园围墙也被破坏了。不过这一切都

还可以忍受,我们现在只是很想知道我们应该靠什么活命!到这时为止,都是好心的邻居们帮助了我们,给了我们一些土豆。我们也从俄国人那里得到过一些面包和肉。

维利和我费力地到一处位于邻居家的泵站拖水回来。自来水厂已有好多天不供水了,俄国人想要洗澡。有好几个地方传来消息称,有许多居民已经被俄国人从他们自己的房子里赶了出去。

5月1日,星期二

那是俄国人在我们家里最后一天宿营,一名俄国士官(学医的大学生)和几名士兵昨天被命令开拔走了,令我们深感惋惜。他们都是相当正派的人(“正派”这个词是我后来添加进去的),他们不时从他们自己的口粮中分给我们一些。他们刚才离开,就闯进来了3个俄国士兵,他们是来找姑娘的。沉着的瓦格纳先生——他说一口流利的俄语——带领他们搜寻了房子和地下防空洞,最后一无所获地离开了,没有造成任何损失。但吓得我们四肢直哆嗦,直到此刻还没有平静下来。

据说在邻居们那里又发生了许多事。一个十七岁少女被强奸了五次,然后被开枪打死。源泉路一个地下防空洞里,那里的妇女当着她们丈夫们的面遭到强奸。加勒尔特先生在路上被拦下来,被命令脱光了上衣,因为他声称身上没有首饰等贵重物品,结果被抢走了藏在鞋子里的金戒指。夜里的打枪声比较稀疏。

今天凌晨枪声又变得激烈了。

俄国人说,希姆莱已经自杀,4月28日,英美联军到了慕尼黑近郊约30公里处,这期间可能已经被他们占领了。这是一个俄国士兵亲口说的。

我们又只剩下最后一面包了。妈妈会怎样不让维利和我饿死,对我真是一个谜。因此有时我们会说,让我们将这最后一面包分着吃吧。大家真想这么做!但是我们都知道这有多难啊!我坐在小房间的一个角落里看书,这时我又拿起了作家古斯·弗赖塔格写的那本《借方与贷方》来读。我试图以此忘却周围的一切。

我们的邻居瓦格纳倒掉了他储藏的全部葡萄酒和开胃酒,因为他担

心一旦落到俄国人手里，他们会喝得酩酊大醉，然后发生暴力行动。谁能为此而批评他呢？只有妈妈哭了起来，她多么想能够得到一瓶或两瓶这种酒啊！唉，现在可是已经太晚了。我却有另外的操心事，我说，我们首先得将我们贮存的水补充足。

下午 5 时

我刚刚散步回来。我和维利走遍了西门子城，想看看是否在哪个地方还能弄到一些食品，不管哪一种东西都行。结果却是空手而归，已是什么也弄不到了。我们到了诺曼小姐那里，她在行政大楼里担任一个小小的职位，看看能否在她那里弄到一些土豆或是其他东西。她正在自己的母亲那里，可是她也无法给我们提出还可以在哪里弄到食物的建议。然后我们又去探望了保尔·迈耶先生，他在药房楼上的住房先是遭到了最后一次的炸弹袭击，后来又被一枚德国手榴弹炸得破烂不堪，有个房间已是四分五裂，从外面可以看到里面，一览无遗。因为房间的一堵墙没有了，家具全都破烂不堪，留下的只是断垣残壁。不过，迈耶先生仍一如往常那样沉着和平静。

“你们都到哪里去了？你们都在哪里睡觉？”我问他。

“还用问吗？都在地下防空洞里，和房子里的其他居民们在某个地方集体烧饭和用餐。”

后来我们还和迈耶先生再次走到水厂那里，询问在那里是否还能弄到一些食物。又是扑了一个空！都说那里有一个食品仓库，是德国国防军派人秘密设立的，连自来水厂的领导部门对此也一无所知。据自来水厂里的人告诉我们，经理部的鲍尔先生和布奥尔先生向大家发誓声明说，水厂里根本没有食品。后来有人发现了这个仓库时——据说是外国人泄漏了这个秘密——鲍尔先生和布奥尔先生据说为此就被逮捕了。我无法查证这起事件，只是根据别人告诉我们的那样写在这里。水厂的那位职员还告诉我们，那个仓库被搬走时西门子城居民的表现十分可耻，他们不仅抢走食品，而且还乘机闯进办公室，偷走办公用品，如旋转铅笔和储存在那里的材料等，还有对他们毫无用处的螺钉、铆钉，数量很多，成箱成箱地搬走。我在这里也只是依照他们愤愤不平叙述的情况记

下来,反映出这个时代人们的精神状态。

据说威斯登特和夏洛腾堡地区在进行巷战。我遇见一些从夏洛腾堡来的难民,他们要步行到很远的卡尔霍尔斯特去。他们说,在东大门前面,在纪念碑那里,在纺织厂那里,在维尔纳厂的大楼前面,都是埋着战死的俄国人的坟墓,插有覆盖苏联人用的三角形红色旗帜。

弗赖伊太太来到这里,带来了她刚从某个电台听到的下述消息:

1. 希姆莱提的投降条件没有被英美联军接受。希姆莱这时已被逮捕,并被押到莫斯科去了。
2. 戈培尔已经自杀。
3. 希特勒和戈林都在慕尼黑。
4. 蒂尔加滕有两个大碉堡,一个已被炸毁,另一个这时在用喷火器进行战斗。

据说在西门子城鲁尔达姆 43 号的房子里住着一个会说德语的俄国参谋军官,如果遇有俄国士兵骚扰,可以去向他求救。据说那里居民的食品供应也将通过这名军官得到安排。这消息听起来令人深感鼓舞。

5月5日,星期六

星期三也就是5月2日,我曾和维利去电缆厂,在那里取了一些食品。这个厂的状况非常糟糕,基本上已遭破坏,各个办公室均被洗劫一空。我们在地下室里找到了一些为时已久的干掉的蔬菜,还有咖啡代用品。我们回家时就在电缆厂的厂区内被一名俄国军官逮捕了,被送到舒克尔特达姆 368 号的房子里,同其他被捕的人关在一个小房间里。我们在那里还遇见了斯坦因贝格先生和比金先生在一起。那里的伙食很好,对待我们也不差。

我们受到了分别审讯,我不得不交代了一遍自己的生活经历,包括一切细节,然后在交代的记录上签了名。星期五也就是5月4日,在我们宣誓保证愿意协助俄国人恢复柏林这里的秩序后,维利和我就被释放了。我们乐意作出这样的承诺。可以怎么做呢?我认为,必须找到西门子公司厂的厂长们,他们特别关心重新恢复工厂的经营和生产。俄国人也是这么认为的。我请求那些俄国军官同时也释放斯坦因贝格先生,他能

够帮助我更好地寻找那些厂长们。斯坦因贝格先生因此也就被当场释放了。

我们然后到行政大楼里去找冯·基士林先生,从他那里得到了工厂各个厂长的最新地址。我们将这些地址告诉了俄国人。斯坦因贝格先生被要求今天驾车去走访厂长们。在这期间,AJ14 部门的布莱姆先生与宾格尔厂长先生和冯·维茨莱本博士先生取得了联系,后者可能现在也被关在维利和我关了三天的同一个房间里,我为当时没有能够也帮助冯·维茨莱本先生脱离关押之苦深感抱歉。不过,没有经受一些困苦也就不会那么快就顺应新的生活秩序。

厂长默勒尔先生被发现枪杀在自己住房附近的一个车库里,这时已被埋葬掉了。霍费尔先生据说先用枪打死他的全家人,然后自杀了。

关于大夫奥尔莉希女士毒死了她的孩子们和她自己的传说没有得到证实,真是谢天谢地,但大夫海德女士确实是毒针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俄国人命令我查明我们各个工厂的职工中有谁以前在苏联工作过一个艰难的差使!我不知道应该怎样才能办好这件事。

在我们被关押期间,妈妈表现得特别勇敢,但内心十分痛苦和担心。她到处去找寻我们,却一无所获。去过行政大楼,也到过电缆厂,她几乎是绝望地到处乱转,大声呼喊我的名字。当我们重又回到她的身边时,她高兴得简直无法用言语来形容。要能够完全理解她的如此情绪必须亲身经历这样的时刻才行。

现在孩子们的情况好吗?唉,我真是心事重重。我完全无法将自己脑子所想的一切全都在纸上写出来。

5月6日,星期日

昨天,行政大楼被一个有 180 名俄国士兵的分队占用了。冯·基士林先生按照俄国少校弗尔德洛夫的要求,已经列出了一份装配工和工程师的名单,他们大多是装配部的,曾经在苏联工作过。冯·维茨莱本先生在上汽车之前,我和他说了几分钟话,他要去完成一位俄军官交给他的任务。他请我到宾格尔先生的家里去,告诉他的太太说宾格尔的情况很好。我因为没有机会驾车出门,就请斯坦因贝格先生转告这个信息。

他告诉我,冯·维茨莱本太太已经知道了这个情况。

此刻我个人的健康状况并不好。我患有高血压,昨天下午我差一点虚脱,但还是安全地回到了家。可能是俄国人同情我的状况,没有阻拦我,得以准许尽快回家去,回到家里后,我立刻爬到床上去。今天早上已经好多了。9点钟我必须再到俄国少校弗尔德洛夫那里去。

5月7日,星期一

在关押期间,我患上了肠道感染,我希望用药特灵能够治愈。上午我们得到命令,三个小时后搬出我们的住房。我们搬到了拉普路71号的博洛夫斯基家。我将双桅高舷帆船、数量众多的画和青铜器以及中国的锡器搬到了地下室去,因为一位俄国军官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将地下室的门锁起来。将近傍晚时,我感到身体很不好,不得不到大夫奥尔莉希太太那里去,请她给了一盒鞣酸蛋白。

5月8日,星期二

上午我感到身体好了一些,但还是虚弱无力,但我还是穿好了衣服,作好随时要出发的准备。

10点钟传来了命令,我们必须在两小时后搬出刚刚才住进来的住房。我们费力地拖着我们的箱子、床垫以及被褥等物到拉普路69号二楼的里希特家。是否准许我们住在这里?由于没有烧灶的煤和木材,我们走到哈里斯路3号原来住房的地下室去,从外面看地下室是锁着的,但里面所有的门都被砸开了,地下室里的东西翻得乱七八糟,或是被砸坏了。有个俄国士兵来到地下室,看见我们在取煤,没有说什么就离开了。

5月9日,星期三

根据反法西斯中心站的命令,全体男子必须在早上7时去报到干活。必须将他们昨天在电缆厂拆下来的机器装车,以便运到苏联去。每个人分到吃的东西只是汤和一大块面包。今天早上,维利也去干活了,我自己还不能去,因为我的肠道感染还没有痊愈。

从昨天起,自来水管里又有水了,但压力很小,不过至少已经有水流出来了。今天凌晨有打枪的声音,可能是俄国士兵在操练,然后听到拉普路尽头处传来音乐声和高喊“乌拉”的声音。我们都很担心,不知道是否准许我们在此处居住地留下来。

中午时分,俄国士兵在跳舞,显得非常快乐。据说在这期间俄国和德国之间签订了某种和平和停战协定。谁也不知道我们这方面签约的领导人是谁?是邓尼茨吗?

弗赖伊太太到我们家来,情绪十分消沉。她是和布莱希尔特家以及费舍尔家搬到了海伊德温克尔一所有8个房间的空房子里,一个俄国的指挥员也在那里占有一个房间,夜里却在房子里发生了一连串的丑恶行为。弗赖伊太太遭到了强奸,费舍尔太太和布莱希尔特太太因为年纪太大没有动她们。几个年轻姑娘因为躲在地上得以逃过一劫。布莱希尔特先生和那个俄国人对打了起来,脸上留下了几处伤口。现在他们全都搬出了这所房子,不知逃到什么地方去了。我们接纳了弗赖伊太太,她家的一部分东西已经存放在我们这里,其余的东西还会搬过来。她带着那些东西早已在途中了,但愿她不会再发生什么不幸的遭遇!

我们家里连一点面包也没有了,不过有句谚语说得好:危难自有神来助。我们的女邻居基特劳斯太太给我家送来了一盘肉末米汤,我们将浮在表面的油小心地撇了出来,余下的那些米粒对我目前的身体状况已是上好的营养品了。另一位女邻居赫尔曼博士太太给我家送来了一块肉。我们也将儿子奥托的绝大部分药品送给了大夫奥尔莉希太太,可惜她没有吃的食物可以送给我们,她自己和她的病人们也在饿肚子,他们中有些是4月24日从里贝尔路倒塌的房子里救出来的居民。红十字会救济站就设在她的房子里。

5月10日,星期四

昨天下午直到晚上11时,发射了许多礼炮(是欢庆的礼炮),花园里竖起了巨大的展板,又是跳舞和唱歌。因为当时有许多人都喝醉了,我们担心夜里会发生十分糟糕的事。伊米尔和费赖伊太太早早地躲了起来。弗赖伊太太昨天被强奸了四次。谢天谢地,夜里很平静,没有发生

什么事。但为防止不测,我们都没有敢脱衣服和鞋子睡觉。

维利昨天5点钟回家来。他带来了四分之一的面包,白天在干活休息时只分到一碗稀汤喝。他是在电子管厂帮助拆机器(车床)。他们干活的人总共约有200个男子。拆卸机器是一个可悲的象征:机器如果被运走了,工厂再要投产自然不可能了。据说停战协定是由约德尔将军和克洛西克签字的。

我们大家分吃了维利带回来的面包,现在家里又是连面包屑也没有了。如果俄国人不准我们到我们在哈里斯路的地下室去,我们也不知道应该到哪里去取煤和烧柴。维利今天早上7时又去参加劳动了。他的身体还算强壮,中午能从俄国人那里得到汤喝。由于我患病,可能还会要求他干很长一段时间的体力活。

我十分钦佩妈妈,她很勇敢,从不叫苦和抱怨,只是不停地忙碌着,不知她是从哪里为我们求得一些食物。上帝没有亏待她!这时她还和伊尔米将家里整理得井井有条,如果还能说是井然有序的话。我们都睡在地板上,但愿别人千万不要把我们的床垫拿走,还有那些我们在多次搬家时尚能匆匆忙忙带来的箱子和衣服。

格蕾特尔和她的孩子们,还有奥托以及埃娃,他们的情况怎样了?为了免得令人感到无奈和绝望,还是不去绞尽脑汁地想他们为好!

5月11日,星期五

今天是乌尔西(乌尔苏拉)的生日——亲爱的乌尔西,我们想念你,爱你。但愿上帝保护你和你的母亲,还有古德隆,保护你们全家人安康和幸福!这是我们每天都会念的祈祷词。

昨天,俄国士兵离开了我们在哈里斯路的房子。住房里和地下室里看上去一片狼藉。床被搬走了,长沙发也不见了。或许会在邻居家某个地方,得去找找才是。我们在花园里重又找到了一部分桌子和椅子。地下室的所有容器都被撬开了,里面的东西被倒了出来,丢在地上到处皆是。他们可能是想寻找首饰或者类似贵重物品等,我们根本没有这些东西。我们会将这里的一切重新整理好的。我们没有遇到一些更糟糕的情况,应该感谢我们的造物主!

我们寄放在佩斯克家的那些东西以及城里地下室的情况怎样了，我不得而知。我们大家都已精疲力竭，但很镇定。我不可能还会有其他更糟糕的事。但愿我们不会再遇到一些其他意外的情况了！

5月12日，星期六

昨天一整天我们是在打扫整理我们在哈里斯路的住房度过的，到现在还没有收拾完毕。今天早上，维利去参加强制劳动了，拆卸机器和其他设备等等，这样他就会有饭吃。我希望星期一也能去劳动。如果不会随时有危险降临，例如我不在家时，我们的住房突然被没收，我是乐意去劳动的。妈妈在打扫住房时，她一个人无法将箱子等东西拖到另一所房子里去。对我来说收拾住房最多只能干2个小时到3个小时。

下午1时，维利疲惫不堪地回来了。今天只是分配他“铲垃圾”，所以他没有吃到饭。我刚从大夫奥尔莉希太太那里回来，有一次别人误传她连同自己的孩子们自杀身亡了。今天清晨我身体不舒服——突发眩晕、心跳等等，是身体虚弱的征兆，检查的结果是：高血压和心肌衰弱。我请她给我写了疾病证明，因为遗憾的是我不能去劳动。

我的情绪非常糟糕！祖国战败了，被打败了，被完全摧毁了，无条件地投降了！对照我们政府的一切许诺来说，千年帝国梦是如此的结局！

没有儿子们和孙辈们的任何消息。由于健康状况不在岗位上；短时间内被两次赶出自己的住房，逃到了他人的房子里；始终害怕俄国士兵会突然闯到我们这里来；一直在为每天的面包而奔波。妈妈大部分时间确实是向邻居和还活着的好友们乞求，为西门子公司继续存在以及我们也即维利和我的生存而操心不已！担心着埃娃的身体状况，她这时就要生第一个孩子了？不管朝哪里看去，到处都是困苦和担心！不过，如果要避免不受到更加糟糕的打击，我们必须保持乐观才是。要说还有更糟糕的情况，我在南京已经见得足够多了。即使遭到了更痛苦的情况，不要垂头丧气！要继续生存下去！

5月13日，星期日，是奥托28岁的生日！

我亲爱的奥托，祝你万事如意！昨天夜里是我很久以来再次重又穿

着睡衣睡觉。在此以前根本不可能,我们都穿着靴子躺在床上,随时准备传来撤出我们自己住房的命令,或是会有一次军人检查。我们已没有床睡觉了,也许我们还能将床找回来。我们睡在地板上,但我们还是高兴地找到了床垫和被褥等物。

5月14日,星期一

维利又被叫去电缆厂劳动了。电话是从反法西斯中心站打来的,说是今天和明天都有材料和机器要运走。据说俄国人明天就要撤离这里。然后会有什么人到这里来或是会发生什么事,谁都不知道。反法西斯中心站给我们分发了俄国人的宣传材料,是5月7日印的传单。传单上说希特勒已经死了,墨索里尼是被他的同胞们处死的。

情况有些可怕——我们的四周此刻显得神秘兮兮。各家房子关闭得严严实实。我无法去探望自己的朋友,因为敲了门别人也不会开门的。如果走运的话,你会偶尔遇到某个正好回家来的居民,简单地交谈几句话,他就会赶快走进门去,随手就把门关上了。为什么呢?因为每个人都害怕俄国士兵,他们只要一有机会就闯进门来试图寻找什么。我们得承认,多数俄国人并无恶意,也有一些人并非如此,他们是想抢劫钱财,不过至今还没有发生过这类事。人们主要担心——可惜是有道理的——他们要到房子里来强奸姑娘和妇女!我可以惩罚人们传播的有关这方面的谣言,但我不能这么做!

默尔曼博士送给我们家满满一桶粗碾的谷物(黑麦和燕麦——我不会仔细区分出来),我对此十分感激。我们用咖啡机将谷物加入俄国人用来喂马的饲料磨成粗面粉,可以用来做成美味可口的稀糊汤。在上个星期,我们每个人还不时地分配到一个面包或半个面包。

最近我的两条腿虚弱无力,糖尿病、高血压、心跳减弱和肠胃病,使我深感痛苦。大夫奥尔莉希太太给我开了疾病证明,据此我可以不必去参加强制劳动。就是说,现在我只需要活命,只需要挺住,我也希望是这样,因为孩子们要是没有妈妈和我,他们会有困难,无法融入到新时代的生活中去。也许这仅是我的想当然。不过它已经证实了一次,它还应该使我们两个老人支持下去!

妈妈躺在我身旁的地板上,睡着了。室外美丽的五月天展露出它灿烂的笑脸,多么美丽的春天!我们窗户前的丁香花已经盛开。如果战争的结局不是如此悲惨,前途的阴影不是如此黑暗和可怕,世界会是多么美丽啊!在打扫和清理地下室时,我又找到了两艘双桅高舷帆船,它们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损坏,但我又将它们送到了它们的老地方去了——它们曾经停靠在一个“船坞”里——海洋学的博物馆里,那里的一个波兰人会将它们整修如新,并将从中国运回柏林时损坏的地方也修好。这次损坏的情况非常严重,也许这次它们还能修理好。谁知道呢?

我们——妈妈和我——试图去看我们寄放在泽勒博士家的家具等物,但大门紧闭着,我们无法进去。然后我们去探望了迈耶太太,她送了一些糖给我们。我们家早已没有糖了。在途中我们遇见了克劳泽小姐,她对我们说,西门子公司职员必须到发电机厂去报到。我们还没有走到发电机厂时,偶然又碰到了彼特曼先生,他告诉我们,到发电机厂去报到毫无意义,他建议我要等到行政大楼重又归还后,然后再去看看我原来的工作单位。

在这期间,偶然在哈里斯路的赖因哈特家也发现了格蕾特尔家的铁床,是俄国人将它拖到那里去的。我们今天将那些床弄了回来,还有我们寄放在佩斯克家住房里的家具也找到了,它们被重叠地堆放在一起,可能受了一定的损坏。中国的衣柜也还在那里。据我们刚才听说,俄国驻军明天就要开拔走了,改由英国人来接防。我们希望英国人能更好地理解我们。尽管先前已有传说,英国部队和美国人并不像人们普遍期望的那样好打交道。那就等着瞧吧!

5月15日,星期二

维利昨天直到晚上七点钟才回家。今天清晨他6点就必须到电缆厂去。这样,一天要工作13个小时,只有半小时的用餐时间,它对于身体有病的维利来说是太长了。只要他感到不能再干时,就应该请病假。在电缆厂干活吃的饭食:早上是一些面包和甜味菜,中午是有几块肉的糊汤,晚上仍是一些面包。它对重体力劳动显然是不够的。需要干的活是:拆卸机器,装运机器,装运一种大型电缆包铅机。据说俄国人要将这

里 70% 的机器运回俄国去。

我自己还在休假,非自愿的强制性休假,因为我已年老,身体太弱,可能也胜任不了装配车间的劳动。在房子里到处走动一下,搬动一些家具,我已是气喘吁吁,上气不接下气了。

可能是由于过度辛劳使我的心脏受了一些损伤,好,那就让我休息休息吧!

由于头脑里想的事太多,太久了,但愿我的脑袋也能得到一次休息!

为在本德和慕尼黑的孩子们以及孙辈们的担忧和操心压在我们身上有数千斤重!据弗赖伊太太刚才告诉我们——她住在前面的房间里,这起事件是她透过窗户看到的——昨天晚上 10 点钟,一辆载着俄国士兵的汽车经过我们这里,俄国兵闯进对面的地下室,搬走了一大口袋东西(土豆?)。我没有注意到这点,因为我已经在地板的床垫上睡着了。这类深夜来客总是使人惊慌不已,对于在房子里的妇女和姑娘们是非常危险的。

今天下午,又有 3 个俄国士兵闯进了我们在哈里斯路的住房里,声称是搜查无线电收音机。

古特曼先生和佩希特尔小姐到拉普路来探望我们。与古特曼先生的遭遇相比较,我们的情况还算是并不危险。在施潘道区他家的房顶上经常坐着几名德军的狙击手。一旦被俄国人发现有狙击手,俄国军人通常就会连同住在房子里的平民都开枪打死。古特曼先生还算幸运,他逃过一劫活了下来。他的弟媳在轰炸时受了伤,失去了一只眼睛。后来他还讲了据说在攻占柏林时发生的一些令人发指的事情。在弗里德里希路附近,一大群妇女和儿童逃到地铁隧道里去寻求安全,但这时正好也有一队希特勒的党卫军利用那里进行抵抗。俄国人就用坦克大炮摧毁了这个隧道,自来水的总管道也被同时击穿,大水很快淹没了隧道,全体难民也都被淹死了。

还有,俄国人包围了一部分士兵和平民,他们准许妇女和孩子们挥舞着白布自由撤出来,但当他们走近德方的阵地时,竟全部被自己同胞的机枪扫射打死了。德国的负责军官在对此道歉时还辩称:俄国士兵经常会耍手腕,俯下身子藏在妇女和孩子们的身后,偷偷地接近我们的阵

地,以及诸如此类,等等。

一个会说德语的俄国军官对古特曼先生说的一件事令人很感兴趣。他说,1941年以来俄国已不再有政治委员,如果有人称呼他政治委员,他——这位俄国军官——会感到受了侮辱。

古特曼试图到西门子公司行政大楼来看一下他的办公室,别人却警告他放弃这个意图,因为:第一,有可能他会被大楼里的俄国占领军开枪打死;第二,人们预计,整个行政大楼会被炸毁。别人没有对他说谁要炸毁行政大楼,警告他的那些人都是德国人。别人只准许他走到人事部。我觉得这个警告十分愚蠢。我刚才从反法西斯中心站的沙伊希勒尔那里听说,俄国人两天后就要撤走了。他们本来今天就该撤走的,以便给到达这里的英国人腾出地方,预计后者不会住在公司总部,而是会安置在行政大楼里。

5月16日,星期三

我还请古特曼先生给我留下了他的住址,以备必要时联系。为了重新确定食品供应,昨天反法西斯中心站的沙伊希勒尔核实了我们的住址。令我们感到惊讶的是,我们听说,俄国人要慷慨地给我们——与英国人和美国人相反,可能是他们缺少吨位——供应食品,据说为此要分发新的购买券。

好吧,我们都乐意有这样的意外情况,因为采购食品至今都十分困难。这三周来我们到底是怎样生活的呢?我们的食品基础是满满一桶粗碾谷物(燕麦和黑麦),这是俄国人用来作喂马饲料的,是第一批驻军换防时友好地给我们留下来的。这些谷物我们还用咖啡机再磨了一次,以使用它们煮成糊汤,舀在碗里喝。面包(不是经常有)、肉和土豆是爱的赏赐,那是妈妈——如我已经提到的——向邻居们乞求来的,或是伊尔米在一位认识的女士家做家务劳动挣来的。是呀,如果会对食品供应作出一定安排,我们当然高兴的。

还有一个意外的消息:根据一位俄国军官的通知,俄国人根本不想将德国居民放逐到西伯利亚去!假如这话是真的,我们立刻就会站到他们一边!没有什么能比一种和解的政策会很快地使德国人投入到他们

的怀抱里去。现在我们应该在希望与担心之间等待那些会到来的事情。

孩子们的情况会是什么样呢？他们有东西吃吗？他们有自由吗？或者是被抓了起来？准许奥托继续他的大学学业吗？如果他在大学不能学习到毕业，他应该靠什么养活自己？埃娃的情况又怎样了？她有食物喂养她的婴儿吗？在本德的格蕾特尔和乌尔西（乌尔苏拉）以及古德隆生活得又怎样呢？一切所有的问题都是得不到回答的，它使我彻夜难眠啊！

在这里总是写下这些相同的操心事是没有意义的。不过，我老是这样写，别人一定会感受到我们承受的压力真是难以言表，多么痛苦，尽管我们也经常这么说，有成千上万的德国人，有千千万万的德国人也在同样地受苦，虽说担心的事情不一定会比我更严重。

我听说，日本也在几天前投降了。现在——六年后——第二次也是最可怕的世界大战，也许是就此可以最终结束了，也就是说，对其他的人来说是如此，那对我们呢？这还必须弄清楚！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它与这次相比严重程度要轻微一些——有过一个饥饿和仇恨的阶段：一切都是战败者的责任。这种情况会重复吗？毁灭的德国现在会变成什么样呢？不管怎么说，柏林已是完完全全地被毁掉了。依我的估计，只是清理大楼的瓦砾碎片和断壁残垣就得要花上好多年的时间。德国所有其他大城市的遭遇也不会比柏林好多少。去年秋天我在慕尼黑和纽伦堡所见到的情况已是够糟糕的了。

我们还是一直没有煤气和电，任何铁路和地铁交通都是禁止的。布莱希尔特家今天不得不搬出在洛尔达姆的临时住处——俄国人突然要求他们在一小时内搬出——重又搬回到他们在哈里斯路3号的原有住房里。妈妈和我向米策尔太太借了一辆轮椅车，帮助布莱希尔特先生搬家。我们很可能也会在几天后重又搬回原来的老房子里去。

说到底，哈里斯路的一部分仍然被俄国人占领着，整条路被用中世纪的栏木挡着禁止交通。我们在帮助布莱希尔特太太搬家时，遇见了克吕格尔太太，她同样也被命令搬出她的住房。我也得以在她搬出自己的住房时帮了一些忙。当一所房子里的全体住户带着他们的动产各奔东西，不能带走的家具被抛在大街上，这是一种多么令人痛心的景象，一场

大火也不会比这种情况更糟糕。

5月18日,星期五

昨天我们又搬回到了哈里斯路3号原有的旧住房。根据反法西斯中心站的规定,凡14岁到65岁的男子都应该报到去劳动。由于我有医生的疾病证明,请求推迟去劳动。同时我还让人在西门子公司行政大楼里给我作了登记,希望它能在不久的某个时候再聘用我。据我听说,俄国人释放了厂长维茨莱本博士,宾格尔厂长还被关在齐培德勒的施潘道区。别人告诉我,莱伊弗尔厂长已被开枪打死。——这一切是否都是谣言或事实,我无法得到证实。有人说,希特勒逃到西班牙去了,希姆莱死掉了,戈培尔枪杀了全家和自己。

今天我整个早上都在铲除和运走堆在我们房子前面的瓦砾垃圾(大轰炸的产物)。

俄国人说话是算数的,我们得到了食品购买券,还附有清单表格。妈妈还没有领到她的食品购买券。伊尔米也被定级为“工人”,维利仍然还要每天劳动13个小时,5月底以前都没有星期日。布伦德尔先生仍被拘留着,我无法知道他被关押在哪里。

我担心如果佩斯克和泽勒博士需要自己的住房,那我寄放在他们那里的家具该放到哪里去。我婉转地请求或者说是询问弗赖伊太太是否有可能居住到别的什么地方去。我在这样的時候提出这样的问题,使她受了很大的伤害。妈妈也认为我的询问是不合适的。

如果没有人能理解我,我该去和谁讲我的心事呢?我确实并不想赶走费赖伊太太呀!费赖伊太太或许确实有个机会在某个地方找到其他住处,那她就是帮了我们家一个大忙。不过,现在我不想再谈这个题目了。女人的逻辑和男人的逻辑是两件根本不同的事,总是只看到这一面或者另一面。最好还是闭口不谈,时间也许会带来好主意或是某个出路。

5月19日,星期六

刚才我从默尔曼博士那里听说,西门子公司罗伯特被开枪打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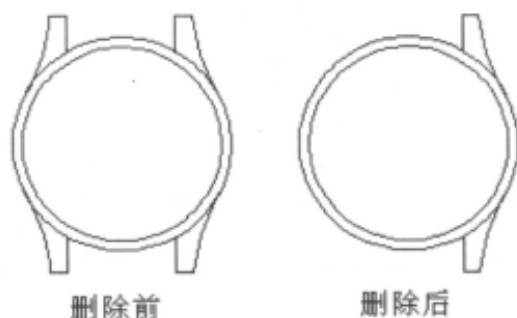


图 5-49

5.12 分解对象

使用【分解】工具可以分解多段线、标注、图案填充或块参照等合成对象，将其转换为单个的元素。例如，分解多段线将其分为简单的线段和圆弧。调用【分解】工具有以下几种方式。

- 菜单命令：【修改】→【分解】命令
- 修改工具栏：【分解】工具
- 命令：EXPLODE（或 X）

单击“修改”工具栏中的【分解】工具按钮，执行命令后 AutoCAD 会提示：

命令：_explode

选择对象：找到 1 个

//选择要分解的对象

选择对象：

//确定

分解完成后成为单一元素，效果如图 5-50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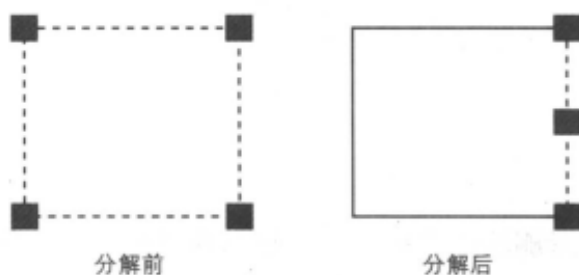


图 5-50

使用【分解】工具需要注意如下。

- 分解标注或图案填充后，将失去其所有的关联性，标注或填充对象被替换为单个对象（例如直线、文字、点和二维实体）。
- 分解多段线时，将放弃所有关联的宽度信息。所得直线和圆弧将沿原多段线的中心线放置。如果分解包含多段线的块，则需要单独分解多段线。如果分解一个圆环，它的宽度将变为 0。
- 如果使用属性分解块，属性值将丢失，只剩下属性定义。分解的块中的对象颜色和线型可以改变。

有谣言说,公司将解雇全体以前参加纳粹党的人。但我希望这仅是谣言而已。最重要的问题也许是,公司是否会以及怎样才能开工投产?但愿上帝保佑会找到一条出路!妈妈今天领到了一张“儿童”食品购买券,弗赖伊太太的也一样是“儿童”食品购买券。这对一个家庭来说,令人遗憾的是少了一份面包等食品的重要来源。

这里直到今天还没有出现美国人和英国人。看起来俄国占领军仿佛还要在这里住一个较长的时间。对我们来说,这个情况也许是最有利的,尤其是在食品供应方面,因为俄国人似乎拥有足够的粮食。美国军队方面却不是这个情况。

今天上午,伊尔米和我去了克桑特纳路,从我们老房子的地下室里取了下述珍贵物品:博孟塞的剑,歌德的面具,La belle inconnue de la Seine 的面具,弥陀佛,贝雷齐纳河畔的拿破仑,收藏的一批中国铜器,几枚奖章,以及中国秤和日本卖蘑菇女人的菜篮子。我们将那个很重的青铜人像装在借来的童车里运回来,上面盖着一块布。我们回到家里时,多拉告诉了我们一个意外的消息:今天夜里安排有3个俄国男子要住到我们家来。但我们仍可以住在自己的住房里,真是谢天谢地!默尔曼博士刚才来看我,告诉我曾是装配工人的他被西门子舒克尔特厂的木工车间雇用了。日本人投降的消息证实是不真实的,但据说日本的许多大城市都在空袭时被炸毁了。

昨天,在威尔默斯多夫路的一处半已摧毁的房屋墙上挂出了一个巨大的横幅,上面的字是:“给我十年时间,你们将不再会认出柏林!”今天,我们从大约50米远处经过那所房子时,突然爆发出巨大的喧闹声。在容克弗尔海德火车站桥下面的墙上写有过去政府的另一句口号:“我们的口号是:柏林永远是自由的!”

妈妈和伊尔米刚才得到通知,要她们明天早上7点钟去报到参加劳动。

5月22日,星期二

妈妈真走运。他们今天让老年妇女再回家去,不用参加干活。伊尔米却被派到自来水厂去从事某项劳动。我遇到斯坦因贝格先生,他告诉

我,厂长罗伊斯博士和布伦德尔先生现在还关在施潘道的齐塔德勒监狱里。为什么他要对我说这个消息?

前天夜里在我家住宿的三名俄国军官态度非常友好。不过,当我们一再听到俄国人说我们的军队在俄国表现十分恶劣时,心情是很悲哀的。如果我们不是早已从德国士兵那里听到对自己同胞所作的极坏评语,主要是对那些党内的人,即所谓乌克兰的“金凤凰”,我们一定会不相信这话的。对于我们祖国的巨大灾难,我们都是有很大责任的,现在我们必须承受痛苦来赎罪。

妈妈真是不知疲劳!我觉得,加上我由于身体虚弱不能帮她一把,与之相比,我真是无用之人。现在她去采摘西红柿了。花园里现在一定弄得又是一派兴旺繁荣的景象。生菜已经种下去了,但一切植物都有它的生长时间,没有什么东西会一夜之间就从地里钻出来的。破坏是比较快的。有一辆或三辆军用卡车将格蕾特尔的漂亮花园搞成了不毛之地,到处都露出白沙土。友好邻居们给我们送来了肥沃的有机土,我们将它们均匀地撒在土地的表面,遮盖了花园的伤口。

从威斯特法伦的明登来了一个漫游者,他在途中已经走了两个多星期。据他说,美国驻军部队在德国西部的举止并不像一般人说的那样坏,目前分配给德国居民的供应并不比占领前差。抢劫者肯定会被枪毙,如果是美国人也不例外。谣言和消息就这样在居民区里到处流传——时而坏消息,时而好消息。

人们在说,不久就要通邮了,不过暂时只是在柏林,就是说只在柏林市区的范围内,但要办到也非常困难,因为目前还没有任何交通工具。我们在这里只看到俄国的卡车,它们是运送从西门子公司各个工厂拆卸下来的机器的。的确是一种可悲的景象,展望未来令人寒心。据说通用电器公司各个工厂的机器至今还没有被拆卸下来。

5月24日,星期四

布伦德尔先生和罗伊斯博士据说还一直关在施潘道的齐塔德勒监狱里。我是多么还想到克桑特纳路的地下室去取回金色的木雕亭和其他花瓶等物,但我觉得身体虚弱乏力,心有余而力不足。饮食不足,尤其

是缺乏油,或许是我身体虚弱的原因,最近几天更加严重了。我的糖尿病一定也变得更糟糕了。我冥思苦想,怎样休息和治疗才能摆脱这种十分痛苦的状况。

夏洛腾堡火车站的桥拱上(威尔默斯多夫路)挂着一块巨大的广告牌:“红军给柏林居民供应食品!”听到收音机里通过高频整流器报告说,柏林已经有 5000 家食品店重新开业。这消息可能是真的,因为我在城里看见各家商店都开门了,商店前面有许多妇女排着长长的队伍在等待着。

我们还一直生活在关闭着的门后面。尽管严格禁止俄国人没有得到指挥员的特别许可不得进入我们的房子。可是,昨天又有两个俄国士兵强行进入我们的地下室搜查收音机。我们的所有怀表都被偷走了,我们经常不清楚什么时间。总共有三种不同的时间:莫斯科时间,中欧的夏季时间和冬季时间。这三种时间分别相差 1 个小时——出色的杂乱无章!

我听到了许多关于对过去党员进行处罚的可怕谣言。许多人如此说:西门子公司将不会再聘用他们;他们将会被逐出自己的住房;给他们的食品将是最少的。还有一些人这样说:他们还要被放逐或是干脆枪毙掉。德国共产党党部的办公室里一个宣传画上说:“今天谁还用狼外婆来吓人,就让他和成百上千的纳粹分子去死吧!”

直到今天,我还没有从西门子公司得到重新聘用我的消息。只要罗伊斯博士和布伦德尔先生仍然被关押着,也就几乎不可能会有这方面的消息。

对于重体力劳动,可惜我缺少必要的健康状况和体力,就像维利·施莱格尔那样虽然有病还有体力干活那样。因此我暂时不得不做些手工活或是家务劳动来消磨时间:修理花园篱笆,浇花,制作蜡烛,等等,真是无聊之极!现在伊尔米又去参加劳动了,妈妈承担着全部家务活,却总是给我们把饭食送到桌上来,我真不知道她是怎么做到的,何况她的身体状况比我还虚弱。

5月26日,星期六

收音机里报导说,希姆莱 1945 年 5 月 21 日被逮捕,1945 年 5 月 23

日服氰化钾自杀。据说戈林、巴克施佩尔、汉斯·弗里茨舍和其他人都已被逮捕。伊尔米状况有所好转,她必须在星期一再去劳动,因为大夫奥尔莉希太太只可以给重病人开病假证明,才可以免除劳动。

我今天去了西门子公司的行政大楼。据菲舍尔先生说,我被重新聘用的前景非常渺茫。预计绝大部分职员都会被解聘或是办退休保险,如果(养老保险)还能维持的话。传说俄国人打算给退休人员每月发给 90 马克。正常的月薪是按下述级别确定的:1 级:150 马克,2 级:250 马克,3 级:350 马克,4 级:450 马克。

根据最新的消息,西门子公司的罗伯特还活着,有人在水泵站附近某处看见过他。没有罗伊斯博士和布伦德尔先生的消息。菲舍尔对他们俩还被关押在监狱里的说法表示怀疑。

伊尔米到了警察局去打听有否出行到本德去的可能性,得到的答复是:“人员往来的交通还没有开放。也许要到两周后。”

据说星期日又要作为例假日了。听说沙赫特博士得到了他原来帝国银行主席的职位。

今天是古德隆 1 岁的生日!

5 月 29 日,星期二

斯坦因贝格先生和他的太太前天到我们家来过。斯坦因贝格先生看上去脸黑黑的。他认为,对西门子集团来说,真有可能的话,最多也只有余下的 15% 部分可以重建,公司的大量机器设备几乎已是所剩寥寥。

默尔曼博士来探望我,给我带来了布伦德尔太太的一封信,她丈夫是在 5 月 5 日被俄国人关押的。他是和巴克先生到办公室去的路上在宾格尔厂长家门前被逮捕的,至今没有回家,巴克先生则在四天后就被释放了。

布伦德尔太太非常绝望,更何况她的丈夫患有肾病,柏林被攻占前不久才作了摘除肾结石手术。斯坦因贝格先生不久以前在施潘道的齐塔德勒看见过布伦德尔和罗伊斯博士,但也只是从远处见到的。

有人告诉我,西区的电厂也要被拆除,一大批城际轻轨火车车厢已经被运到俄国去了。妈妈和我又去了克桑特纳路,在那里除取了几个瓷

花瓶外,还将在那里找到的所有中国金漆和木雕菩萨带回了西门子城。利用这个机会,我们还去了豪泽尔博士的住房,现在是 R 先生住在那里,他的太太最近几天就要生头胎孩子了。妈妈在这个住房里发现了我们失踪的成套餐具的一只碟子,其余部分可能也在那里。妈妈勇敢地隐忍了思念心爱物品的痛苦。在 R 先生和戈尔太太的房子找回东西的时机还不成熟。我们需要有耐心。

菲舍尔太太,布莱希尔特太太和瓦格纳太太从昨天起和我的意见很不一致——她们的丈夫可能也是如此——因为我坚持认为如果俄国军官们有迫切要求,我们必须给他们开门,昨天的事情就是一个例子,3 名俄国军官到布莱希尔特的地下室找电子管收音机,他储存有一批这类收音机。太太们一方却认为,我们不能给他们开门。我对他们说,要是德国士兵遇有这种情况就会毫不犹豫地砸门,如果我们再不让步,一旦发起火来,他们就会砸烂窗玻璃。可惜我的这些话只是白费口舌。

默尔曼博士很快又失去了在西门子木工厂的岗位,因为他们要的是一位木工师傅,而不是学习木工的人。默尔曼博士现在去了柏林公交公司,负责收集损坏的剩余电车线(有轨电车的),活儿并不舒服,而且也不轻松。他看上去疲惫不堪,因为这个活也要四处奔跑。柏林有轨电车公司——我在前面已经写过,它的一部分车辆已经被运走了——据说打算暂时作为蒸汽电车投入运行,不是很好看,但总比一点也没有要好!

我和默尔曼博士一起去见了施坦因贝格先生,告诉布伦德尔太太一封信的事,他答应设法将布伦德尔太太那封信送到罗伊斯博士的手里,在警备司令部那里为布伦德尔先生等说说好话,做些工作。施坦因贝格和我都认为完全不会起什么作用。任何这类尝试只会对布伦德尔有弊无利。

既不能去探望被关押的人,也无法给他们提出什么好主意,唯一可以做到的是爽快地如实地回答俄国人的提问。获得自由的其他道路是没有的!给俄国人编一些假话或是隐瞒真相是没有用的。要是处在他们的情况下,我们决不会有其他的做法。

5 月 30 日,星期三

妈妈和我今天步行去施潘道的经济局领取病号的食物购买证(黄油

和牛奶),是大夫奥尔莉希太太给我们开的疾病证明。可惜这趟路白走了,现在对病人还没有附加食品供应。然后我们在施潘道去拜访了古特曼先生,遗憾的是他也不知道有什么路子可以帮助布伦德尔先生。

古特曼先生居住的房间有许多枪击的痕迹。在攻占柏林时各种子弹穿过窗户而入,古特曼先生的嫂子在房间里被打瞎了一只眼睛,另一只眼睛也受了重伤,受伤十天后才得到医生的治疗。我们去拜访时她也在场,显得束手无策,毫无办法,给人以一种惋惜的值得同情的印象。

古特曼还描述了一些在施潘道战斗时发生的特别可怕的情形。当时大约有 120 名希特勒青年队员葬送了性命,他们的头目是个骑士勋章的获得者,他自己却逃走了。古特曼先生陪同我们走了回来。

在我们路过西门子公司的奥斯拉姆、飞机制造、汽车联盟等工厂时,看到一片被摧毁的景象,令我们痛心不已。周围都是废墟瓦砾,断壁残垣,这种情况该怎样重建如前呢?我觉得,光是清除废墟就需要花上十多年时间。

5 月 31 日,星期四

钱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起着独特的作用。对俄国人来说,我们的钱币已是一分不值,他们对它连碰都不碰一下。我在被捕时,口袋里有 12000 帝国马克,是在解雇时一次性付给我的,我的表链、小刀和钢笔却被没收了,或者说是丢失了。俄国士兵自己身上都带着德国钞票,只是钞票的颜色和我们的不同。不过这种占领军的钱币没有流通,因为这时除去食品以外,至今还只有药店是开门营业的,他们用钱也买不到什么东西。食品的价格与柏林被占领前相同,因此在这方面我们感觉到没有区别。俄国人不用购买食品,而是由德国的食品店提供的,因此几乎没有任何钱币在市场上流通。维利和伊尔米都去参加劳动了。维利是去拆卸电缆厂的机器设备,伊尔米是去自来水厂拆卸。我的虚脱疾病一直在发作,尤其是在早晨。心脏不再想正常跳动了。人们通常是不愿意谈论自己的疾病的。但我在这里必须确定为什么我不再胜任至少是不能胜任体力劳动的原因。我恐怕领不到或是只能领到一种数量极少的食品购买券了。但我不管如何努力也改变不了这种情况。

反法西斯中心站要求犹太人、混合血统的人和以前曾被捕过的政治犯前去登记。虽然我是国社党党员,但也属于后一种人,我却是迟迟没有去登记,因为我不想因为被盖世太保短暂逮捕过,从而得到任何好处。我得先了解一下要求去登记的目的是什么,因为只有极少的人知道我是由于中国的经历而被捕的,跟我这里的同胞们也解释不清楚。再说盖世太保又释放了我,并没有将我开除出党,尽管他们有足够的理由这么做,因为我对日本人明确地表达过我的观点,也许他们担心为此而惩罚我,会成为一起国际丑闻,因为全世界都知道我是国际委员会的主席。

如果今天有人问我(已经多次问过),为什么我没有退出国社党,我只能如此回答:我们在海外的人从来没有接触到那些亲眼见到冲锋队犯下暴行的证人。我们都是“天真的理想主义者”,在我们的印象里,任何可怕的叙述都是谣传,纯粹是敌人的宣传,如同前面已经提到过的,那时没有任何一个人肯承认自己曾经亲眼目睹过所描述的那些暴行。

我得承认,当我读到德国和俄国结成同盟终于追随了俾斯麦的政策的消息时,我曾流下兴奋的泪水。过了不久,当证实元首和莫洛托夫意见不一致,由此发动了后果极为严重的战争时,我更是大吃一惊,极度恐惧。

6月1日,星期五

妈妈今天不得不躺下休息,她的血管抽搐使她精疲力竭。我们去施潘道时,她的一条腿没有绑扎。我对她十分担心。要是没有妈妈,我们大家全都会束手无策,一筹莫展。谁来做家务劳动呢?谁来给我们烧饭呢?如果伊尔米去参加劳动了,谁给我们把饭菜端到桌上来呢?

昨天我又去了行政大楼,和施坦因贝格先生以及德雷舍尔谈了话。施坦因贝格告诉我,西门子公司董事会对未来是乐观的!这听上去很好,但却不可思议。我不知道。这种乐观主义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的,也没有谁能给我作解释。

6月5日,星期二

根据反法西斯中心站的公告,国社党党员及其家属,还有已经战死

的、被俘的或是失踪的国社党党员家人应该每天都去报到。

我去行政大楼找了好几家单位,但都白费精力,总是被告知,那里目前不要聘用人。人事部门似乎已经完全不作考虑,根本就没有设立一个“报名处”。虽然克洛恩先生为此作了很多努力,仍是毫无成效。布伦德尔先生仍然一直被关押着。

今天我去找施莱希勒先生,向他询问我是否可以作为“曾经被捕过的政治犯”进行登记。他对此持完全否定的态度,并指责我参加国社党完全是为了谋取个人好处。我坚决驳斥了他的无理指责,并指出我是为了争取德意志帝国对南京德国学校的资助才加入国社党的。除少数人外,在海外的所有德国人都是为着团结一致的目的才加入国社党的,这里的人似乎并不知道这点。据我所知,没有一个人是为着捞取个人好处而加入国社党的。施莱希勒先生随后将我推给了友谊之家的一个叫齐尼克先生,要我去找他谈。

今天我试图到“报名处”去找一个任何能在家干的活计,竟走到了西门子路的“西门子自来水厂报名处”,他们不肯录用我。明天我得到一个其他的报名机构去试试。

重新回到西门子公司的前景很渺茫。我不知道自己会有什么结果。他们会让我退休吗?要是如此,退休金够生活吗?这一切都是得不到回答的问题,它们沉重地压在我的心头。

令人感到不解的是,我们的整个“单轨”铁路系统将要拆除。甚至俄国军官们也不知道是为什么,不过——他们说——斯大林知道是为什么,他从来都不会错!再说公交公司的所有机器都被运走了。

据说今天又有俄国人要住宿到我们的房子里来,相邻的那所房子里住了15名俄国士兵,我们无法摆脱担心。但愿我们仍然能够住在自己的住房里!

没有吃的东西。至今只有这个月分配的面包和土豆是够吃的。一再有人对我说,西区的英国人、美国人和法国人在这方面看来还要差得多。

6月14日,星期四

我们没有多少可吃的食物,不过面包和土豆还是足够的。日子缓慢

地悄然而逝。

我是自由的,但我觉得就像是一个囚犯。我没有正当的工作。我到报名处和劳动局进行了登记,但根据医生的诊断,今后两周内我仍然不能参加劳动。

我们这家人都有病,妈妈的左手扭伤了,伊尔米的身体也不健康,维利几天来高烧 40 度,看来他也不能持续干重体力劳动——拆卸电缆厂的机器设备。目前他的身体十分虚弱无力。他说话的声音本来就不高,现在变得像是说悄悄话了,听他说话非常吃力。

这一切以及得到一个稳定工作的前景没有把握(西门子公司毫无动静!)自然使我的情绪很压抑,何况我们还一直得不到孩子们的任何消息。我们非常担心,他们处在英国人的占领区里,供应的食物会比我们这里还要少。

城里清除废墟瓦砾的工作在继续进行,部分人行道上轰炸留下的瓦砾碎砖已经被铲除,许多街头的路障被拆除了。木工正在商店里忙碌地干活,做最简单的门面橱窗。许多地方贴有通告,企业不久将重新投产。这期间我们也有了电,只是还没有煤气,邮件和交通工具也是如此。有几个地方的地铁已开始运行,也有几辆公共汽车,但还没有开通直达的正规交通。

弗赖伊太太被俄国人雇用缝枕头,每月工资是占领区钱币 60 马克,但一点也不知道她是否会使用这些钱币。

6 月 17 日,星期日

昨天我们庆祝了妈妈的 61 岁生日。我们的思想都在孩子们和孙辈们那里,他们可能也在想我们。

晚上,一位名叫福尔巴赫的先生来看我,他是反法西斯中心站的代表,他告诉我,对我这个过去的国社党党员,目前以及今后也许不会被行政机构聘用了。此外,这个人也很有礼貌,当他在我这里借到几本书后非常高兴。因为据他告诉我,在大轰炸时他失去了 5000 册藏书。

对我现在可以怎么做的问题,他说,耐心等待,在观望中让时间来说话。但愿我能够做到这点。说到底,生活是要花钱的,钱是要由人去工

作挣来的。要是我找不到工作，我又该怎么办呢？

福尔巴赫先生还给我形象地讲述了攻占柏林前的最后时间发生在市中心的一起事件。他在威廉路的住房被炸毁以后，和他的妻子逃到了一个住满着数千难民的大防空壕。那个防空壕就在威廉路附近（帝国总理吗？）他在那里住了好多天，没有带食物，只带很少的行李，同外界完全隔绝。5月1日——西门子城早在4月24日已被占领——防空壕来了一个高级军官，佩戴着骑士勋章，他对大家作了大约下面的讲话：

“同志们！我刚从元首那里来，他让我问候你们，感谢你们，你们是如此勇敢地坚持到现在。俄国人已被赶回过了奥德河。柏林不久就会得到解放。为了你们不再在这里受苦太久，应该将你们安置到一个更安全的地方去。你们随我来吧！”

然后，难民队伍跟随他穿过地铁的隧道，涉水而行，部分地区水淹到胸部，经过了许多尸体和各式各样的瓦砾碎片，走到什切青火车站——或者是另一个火车站？——我的脑子里对这个名字已经记不很清楚了。福尔巴赫说的这一通话，直到我生命终结都不会忘记。福尔巴赫先生是唯一对我描述这起事件的人，我们不应该认为这是可能的！

5月1日^①

普遍的形势已是毫无希望了，拿下市中心也是迫在眉睫的事，居然还在欺骗居民。有此必要吗？就不会换另一种方式，老老实实地告诉居民们真相？

今天，收音机里传来消息说，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在汉堡被捕了。戈林也已被关了起来。只有希姆莱和戈培尔是自杀的，戈培尔还枪杀了他的妻子和全体孩子。没有希特勒的消息，我们估计，他是在战场上阵亡的，埋在某个集体坟墓里了。

6月18日，星期一

全体纳粹党员及其家人今天早上7时45分都必须去参加劳动。妈

① 此处似乎是拉贝的回顾。

妈和我也要去！维利正患病疾，躺在床上，我们不知道他应该怎么办？也许弗赖伊太太可以去照看他。伊米尔也得去劳动。星期四，她从早上8点钟一直干到晚上8点钟。没有人在家里，没有人料理家务，没有人去购买吃的东西和烧饭。

6月22日，星期五

我们没有分配到西门子舒克尔特厂的行政大楼去做清理打扫工作——如同许可我们的那样——而是被俄国军人带到了电缆厂，在那里做清理打扫的重体力劳动。要将铁棒和金属杆搬到边上去，清除车间大厅地上炸弹轰炸和拆卸机器留下的瓦砾和垃圾。我们花了整整两天时间铲除腐蚀机器的油污。参加干活的人有12岁的孩子直至70岁的老人——全都是国社党党员及其家人——从早上7点干到晚上8点，其中只有1小时的用餐时间，在发电机厂分发的午饭相当好。

现在我们又可以休息了，可以做自己想要做的事——如果有事做的话——至少对我们这些年老的人是如此。伊尔米仍然必须每天劳动13个小时。

福尔巴赫先生昨天又来找我，又借走了一些书籍。我还给了他一些食品，稍加接济。据他告诉我，他和他妻子已四天没有吃过热的食物了。怎么会呢？难道反法西斯中心站不照顾他吗？他可是受到伤害的呀？他对此没有详细说。他虽衣着破旧，但举止文雅，给人以具有中等以上水平的印象。因为妈妈和我乐意帮助每个受苦的人，决不会对他问三问四，我们接济他也只是尽我们力所能及的绵薄之力。

伊尔米今天到一个能够帮她搞到返回本德去的旅行许可证的机关去了。但愿她能成功。我们可以体会到她很想家。

吕施博士得到消息，他暂住在乌克尔马德的父母亲去世了。是中毒死的吗？是自杀吗？——详细情况一无所知。

大部分俄国人都撤走了，但似乎又有新的部队来接防。总之，英国人和美国人还没有出现。

6月30日,星期六

俄国人还一直在这里。晚上11点,妈妈去俄国军人那里取了俄国士兵吃剩余下的汤。她不是唯一去乞求取剩汤的人,但我们确实是没有其他办法。食物不够吃啊!

我从吕施博士那里听说,不仅是他的父母双亲,还有他在乌克尔马德的姐姐及其两个孩子都死了。装配部门的默勒厂长和获得骑士勋章的吕森厂长自杀了。默勒还用枪打死了妻子。布伦德尔先生在某个住宿的地方失踪不见了,可能是被送到俄国去了。据说他在供述时没有说真话,还牵涉到了罗伊斯博士。布伦德尔承认说了假话,随即就被单独拘捕,继续关押。这些是施坦因贝格先生对我说的。我在心中自问,这个消息是否可靠。是不是罗伊斯博士没有保护布伦德尔?罗伊斯博士本人已被释放。

7月2日,星期一

俄国人昨天开拔走了,从他们居住的房屋里带走了一部分家具。英国人或是美国人坐在汽车里穿过哈里斯路寻找宿营地,但不愿意住进俄国人住过的地方。当他们听说俄国军队在我们这个地区都住过后,就继续驶过去了。

我们吃的食物不够。昨天妈妈不得不向弗赖伊太太讨要了五个土豆,使我们中午有一些东西吃。

午夜时分,从里贝尔路和罗尔达姆传来呼救的叫喊声。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又是整夜没有敢脱衣服睡觉。谢天谢地,幸好没有发生什么骚扰。今天家里只有一些面包皮了。我们已两天没有买到土豆,只希望今天能买到一些回来。

昨天我又将被住在我们地下室的俄国人严重损坏的两艘双桅高舷帆船修理好了,整旧如新,它们看上去十分漂亮。

据说在兰茨贝格发生了可怕的情况。我的三本书(孔夫子的生活,旧衣与废铁,银镶边的画集),以及孩子们到这里来过圣诞节后离去前留在那里的衣服一定丢失了。因为兰茨贝格当时是被波兰人占领的,他们驱逐了全体德国人,没有再让任何人返回。伊尔米还一直打算大约在一

周后返回本德去,虽然许多人都警告她别这么做,因为禁止任何人越过易北河去。

8月24日

我已好久不写日记了,因为太累了,但我现在还想补写一些被我耽误了的事情,只写最重要的事情:我们在挨饿,但是上帝保佑,我们还没有饿死。我们经常没有土豆吃,然后又没有面包吃。可是,当我们完全绝望时,总是还有一些吃的东西带到家里来,使我们一直还活着。

1945年7月12日,我在英国军政府的总部得到一个作为首席翻译的职位。我对此非常高兴,虽然我每天必须步行到施潘道去,晚上再步行返回。1945年8月7日,这个高兴结束了。由于我过去是国社党党员,不准担任公职,我不得不离去,英国人对我的离开也表示非常遗憾。当我失去这个职位时,英国人的伙食正好有了大改善,可惜不再有我的份了。否则我就能够不时地带一份好的食物回家。

我离开时,英国人给我带回一封写给西门子舒克尔特厂的信,表示他们并不反对我回到西门子公司任职。西门子公司那些信任我的人也没有异议,但是到今天也没有任何消息,舒克尔特厂里没有我的位子。

我毫无办法。维利又去劳动了。那是通过劳动局安排去干清理工作。沉重的劳动——他还能坚持多久呢?根据军政府的规定,今天我必须到施潘道的城市银行支行去处理我的普通保险单余额问题。保险单总额为5000先令——这是我这么多年来积蓄啊——只剩下了1027先令,这份保险单放在本德的格蕾特尔那里。我附上了银行的收据。现在失去了这笔钱!上个星期日,我和妈妈去了克桑特纳路,有人将我们地下室的门砸破了,我的打字机,我们的收音机,还有其他大量的东西都被偷走了——没有法子啊!(Meyou faze!)

妈妈的体重还只有净重88磅了;我们全都变瘦了。夏天即将结束。冬天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呢?我们从哪里能得到取暖材料、食品和工作呢?我正在翻译田伯烈的《这意味着什么》一书——虽然暂时不会有钱,但也许会得到一些比较好的食品购买券。

目前的情况是:300对夫妇结婚,出生200个婴儿,死亡的达3000

人！对此评论是多余的！

8月28日

伊尔米可能会在星期三——8月29日，也就是明天——早上，坐一辆遣送德国战俘的英国汽车到哈诺威去。莉斯尔·霍曼可惜不能一起走，因为她和伊尔米不同，她以前不是德国国防军的。我在施潘道的英国军政府为莉斯尔争取破例发给旅行许可证的努力没有成功。尽管如此，莉斯尔仍然想在星期三走，而是坐火车先到埃森纳赫去。直到此刻，我们还没有能为孩子们弄到带在路上吃的食物——至少每人一个面包。妈妈今天一早就坐车到利希特弗尔德去找布伦德尔太太了（坐车要5—6个小时），请求她给一个面包，另一个面包我们是从邻居哈尔特曼太太那里弄到的，花了10支香烟换来的，香烟是一个英国人送给维利的。

今天早上，早餐只有两片面包。我给自己留下一片作午饭。我努力争取找到一个报酬少的活干。直到现在，我们还有些什么东西可啃，但往后怎么办呢？我可不知道。

我们首先必须为两个姑娘搞来两个面包，供她们路上吃。预计伊尔米的旅程是两天，但也可能会拖长到4天至6天时间。莉斯尔·霍曼想到埃森去找寻自己母亲的行程要多久无法预料。她也许完全要依靠其他好心人了。想到这里真令人可怕！可是我们自己也没有什么东西吃呀！

9月3日，星期一

伊尔米两次试图在罗尔雷本宿营，试图随英国的运送车队继续往西去，但都没有成功，于是在8月30日被指派去了法尔肯泽，再从那里送到施塔肯宿营地。据说9月1日从那里有一辆运送车开出。她希望在星期日也就是说昨天已经到家了。我们希望她能如愿以偿。

莉斯尔滞留在哈尔茨的伊尔森堡了。埃莉卡·布莱希尔特太太也是一事无成地回来了。莉斯尔只得等待有一辆车开出。

据说每次只许40个人过境。

我带回家两个土豆（两个！），是从一辆俄国人的卡车上掉下来的。

现在是有许多人冲上前去争抢这类宝贵的猎物,动作一定要快,否则赶不上就吃亏了。是呀,我们全都沦落到这个地步了。饥饿是难挨的,但叫苦声也是不绝于耳!问题是:我们还能坚持多久?

在学校里,教师对学生们说:“饿死并不快,它来得很缓慢,最后死去时由于虚弱无力,几乎毫无痛苦。”我不明白人们为什么要对孩子们如此讲,难道这也是一种安慰?

10月14日,星期日

格蕾特尔终于来了消息,她和孩子们乌尔西和古德隆身体都很好。据暂时回到这里来的默尔曼说,格蕾特尔在英国人那里找到了工作,但愿她能得到比较好的生活供应。这期间伊米尔一定也到达本德了。奥托的岳父来了一封信,说施笃本劳赫和拉本都很好。奥托和埃娃在1945年5月12日生了一个小男孩。今天奥托也来了一封信,证实了他岳父来信中说的情况。

小男孩取名米尔·德特勤夫·尼可莱伊。慕尼黑的拉本家可能已经要迁居去曼海姆了,因为他们在慕尼黑的住房必须还给阿曼先生。外祖父施笃本劳赫还活着,现在又被聘为曼海姆的图书馆员了。

我自己此时——1945年10月1日——成了舒克尔特厂的退休人员,但在同一天又临时聘用我担任译员。我希望上帝保佑我留在这个岗位上,因为退休金非常少。

维利成了英国部队的一个出勤计时工,每天都不折不扣地带回来一份蛋卷牛排和黄油,是很小的一份,但对我们全家3口人的生活是绝对至关重要的,因为我们只有极少的食物。这期间,西门子舒克尔特厂发生了伤寒病,我们大家都打了预防针。寄放在克桑特纳路泽勒博士处的家具——只要是还在那里的——现在全都搬回到我们的地下室来了,因为克桑特纳路的地下室里有许多东西是被我们的同胞们偷走了。

天气正在进入冬季,西门子舒克尔特厂里没有暖气,我们家里只有厨房里还暖和。用电和煤气都是定量的。但愿我们的健康状况还能承受得住!其实所有德国人的生活与我们都是一样困苦不堪啊!

1946年4月18日

明天是耶稣受难日，我们的心情是与此相同的。我们挨过饿，仍在—再地挨饿。我没有什么其他的事可写，因此已很久不写日记了。我们将栎树果磨成粉，喝栎树果粉煮的汤，是我们整个食物的替代品。栎树果是妈妈在秋天私下里收集好的。现在，贮存的食物吃光了，我们每天吃的都是荨麻，它和栎果味道是一个样。

昨天，我要求非纳粹化的申请被拒绝了。尽管我作为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拯救了25万中国人的生命，但我的申请仍然遭到了无情拒绝，因为我曾经当过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南京小组的临时负责人——报纸上说，像我这样有头脑的人本不该加入纳粹党的。

我向夏洛腾堡占领区委员会请求复议。他们如果不让我在西门子公司舒克尔特厂继续工作，我不知道我还能靠什么再活下去。就是说，我必须再继续斗争，可是我太累了。

现在我还要每天到英国警察局(第23区保安警察局施潘道分局)去报到，接受审讯。

非纳粹化审查委员会的一名委员指责我是蒋介石军事顾问的朋友，是他们将中国人驱赶上了死路。我看到有消息报道说，蒋介石正在满洲反对共产党人！对此我应该说些什么呢？

如果我在中国听说过纳粹的任何暴行，我就不会加入国社党了；如果我作为一个德国人与在南京的英国人、美国人、丹麦人等的观点相左的话，他们也就不会选举我当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主席了！在南京，我是数十万人的活菩萨，可是在这里，在自己的国家里，我却是一个“贱民”，一个无家可归的人！唉，但愿我想家的愿望就能治愈我的创伤！

啊，还有一件事我还没有写下来：法人代表布伦德尔和厂长宾格尔博士在凯岑多夫俄国的拘留营里死掉了。

1946年5月16日

从5月3日起，他们已不再准许我在西门子公司的工作。正在休假的西区司令部代表——德国地区英国军政府的工业处长古尔登先生——写信禁止我再担任以前的职位。我当时虽然认为这只是古尔

登先生不准我继续在英国军政府工作,但西门子的领导机构为了避免引起各种麻烦,就不再让我进办公室了。

因此,1946年5月31日起,我就在家里工作,向一位居住在西门子城附近的厂长(耶克先生)领取工作任务。他待我非常友善,因此目前我还是避免了最大的困境——失业!

现在我可以有充分的时间,做好到占领区委员会第一申诉庭去应讯的一切准备工作。我还不知道开庭时间。我将在这几天提交我的申诉,所有与此有关的文书材料几乎都已准备好了。

这期间,1岁的小米歇米于5月12日作了洗礼。5月13日是奥托的生日。格雷特尔带着乌尔西和古德隆又从本德到这里来了。感谢上帝,他们3个人到达这里时虽然有些感冒,但身体都很健康。

7月7日

6月3日,夏洛腾堡(行政区局,维茨雷本路3-4号)英国占领区的非纳粹化委员会终于撤销了我的纳粹分子罪名。判决书称:“尽管你是德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南京小组代理负责人,回德国后也没有退出这一组织,但鉴于你在中国出色的人道主义工作,委员会决定接受你的请求”,等等。这样,精神折磨终于到了尽头!谢天谢地!许多朋友和西门子公司的领导都来祝贺我,公司还给了我几天休假,让我恢复一下疲劳。

今天,妈妈带了中国的一个木雕菩萨——是我从中国带回来的——到克雷普斯博士那里去了。克雷普斯博士不时给我们一些食物,他非常喜欢菩萨。我们将孔先生送给我的中国地毯给了托普夫尔太太,换了150斤土豆。现在食物已经不缺了。在困境中我们不得不将从中国带回的珍贵物品和纪念品换取赖以活命的食物。令我非常高兴的是,在我这个年龄还准许在西门子继续工作。

奥托、埃娃和小米歇尔——他已经会走路了——都寄来了十分出色的照片。要是开放了占领区的过境往来,就能够到曼海姆去探望一下自己的小孙子,那该有多好啊!目前还一直没有出行的可能,就是说,不准私人出行。可惜我没有带妈妈去的商务出行机会,她还从没有见过埃娃

哩。不过,我们不想做忘恩无义的人:只要他们全都活着和身体健康,我们对这种命运已是感激不尽了。

(埃尔温·维克特注:约翰·拉贝 1945 年后手写《柏林日记》到此为止,没有再开始写新的日记。)

(译自埃尔温·维克特著《南京的德国好人》)